

# 赵俪生文集

## 第五卷

兰州大学出版社

# 目 录

## 赵 俪 生 学 术 自 传

---

摇摇摇摇摇第一章 轶世 .....	(员)
摇摇摇摇摇第二章 轶历 .....	(远)
摇摇摇摇摇第三章 轶承 .....	(圆)
摇摇摇摇摇第四章 轶究重点 (一) .....	(猿)
摇摇摇摇摇第五章 轶究重点 (二) .....	(源)
摇摇摇摇摇附一 轶传 .....	(缘)
摇摇摇摇摇附二 轶撰学术年表 .....	(远)

---

## 篱 槿 堂 自 叙 ( 我 的 回 忆 录 )

---

摇摇摇摇摇第一章 轶土和身世 .....	(愿)
摇摇摇摇摇第一节 轶乡土 .....	(愿)
摇摇摇摇摇第二节 轶身世 .....	(愿)
摇摇摇摇摇第二章 轶学和初中 .....	(愿)
摇摇摇摇摇第三节 轶小学 .....	(愿)
摇摇摇摇摇第四节 轶初中 .....	(愿)

摇摇摇摇摇第三章 轱中阶段 .....	(圆苑)
摇摇摇摇摇第五节 摇浪花文艺社 .....	(圆苑)
摇摇摇摇摇第六节 摇对数学的追补 .....	(圆怨)
摇摇摇摇摇第七节 摇翻译 .....	(圆园)
摇摇摇摇摇第四章 轱学 .....	(圆源)
摇摇摇摇摇第八节 摇考大学 .....	(圆源)
摇摇摇摇摇第九节 摇清华大学(一) .....	(圆苑)
摇摇摇摇摇第十节 摇清华大学(二) .....	(圆猿)
摇摇摇摇摇第十一节 摇一二·九学生运动 .....	(圆苑)
摇摇摇摇摇第五章 轱战(一) .....	(圆园)
摇摇摇摇摇第十二节 摇太原 .....	(圆园)
摇摇摇摇摇第十三节 摇长沙 .....	(圆缘)
摇摇摇摇摇第十四节 摇离石 .....	(圆怨)
摇摇摇摇摇第十五节 摇柳林和王老婆山 .....	(圆猿)
摇摇摇摇摇第六章 轱战(二) .....	(圆苑)
摇摇摇摇摇第十六节 摇延安道上 .....	(圆苑)
摇摇摇摇摇第十七节 摇在西安 .....	(圆源)
摇摇摇摇摇第十八节 摇中条山下(一) .....	(圆猿)
摇摇摇摇摇第十九节 摇中条山下(二) .....	(圆愿)
摇摇摇摇摇第七章 轱战(三) .....	(圆猿)
摇摇摇摇摇第廿节 摇乾州中学 .....	(圆猿)
摇摇摇摇摇第廿一节 摇西安高中·扶轮中学 .....	(圆愿)
摇摇摇摇摇第廿二节 摇雍兴工业职业学校 .....	(圆猿)
摇摇摇摇摇第八章 轱中原到华北 .....	(圆源)
摇摇摇摇摇第廿三节 摇河南大学 .....	(圆源)
摇摇摇摇摇第廿四节 摇开封攻城战 .....	(圆远)
摇摇摇摇摇第廿五节 摇从中原到华北(一) .....	(圆怨)
摇摇摇摇摇第廿六节 摇从中原到华北(二) .....	(圆园)
摇摇摇摇摇第廿七节 摇从中原到华北(三) .....	(圆缘)

摇摇摇摇摇第廿八节摇从中原到华北 (四)·····	(猿愿)
摇摇摇摇摇第九章 辘华北大学 ·····	(猿员)
摇摇摇摇摇第廿九节摇正定 ·····	(猿员)
摇摇摇摇摇第卅节摇华北大学 ·····	(猿猿)
摇摇摇摇摇第卅一节摇第四部 ·····	(猿缘)
摇摇摇摇摇第卅二节摇“逃情况”·····	(猿愿)
摇摇摇摇摇第卅三节摇跟成仿吾的冲突 ·····	(圆员)
摇摇摇摇摇第十章 辘济南 ·····	(圆源)
摇摇摇摇摇第卅四节摇济南市委和市政府 ·····	(圆源)
摇摇摇摇摇第卅五节摇王献唐先生 ·····	(圆远)
摇摇摇摇摇第十一章 辘北京 ·····	(圆园)
摇摇摇摇摇第卅六节摇东厂胡同二号 ·····	(圆园)
摇摇摇摇摇第卅七节摇我跟郭沫若的冲突 ·····	(圆源)
摇摇摇摇摇第卅八节摇艾思奇对我的救助 ·····	(圆苑)
摇摇摇摇摇第十二章 辘东北 ·····	(圆怨)
摇摇摇摇摇第卅九节摇东北师大 ·····	(圆怨)
摇摇摇摇摇第四十节摇智建中同志 ·····	(圆圆)
摇摇摇摇摇第十三章 辘岛山东大学 (一) ·····	(圆远)
摇摇摇摇摇第四十一节摇三校合并 ·····	(圆远)
摇摇摇摇摇第四十二节摇华岗校长 ·····	(圆愿)
摇摇摇摇摇第十四章 辘岛山东大学 (二) ·····	(圆源)
摇摇摇摇摇第四十三节摇看京戏 ·····	(圆源)
摇摇摇摇摇第四十四节摇买字画 ·····	(圆愿)
摇摇摇摇摇第十五章 辘另册”一案的全部过程 ·····	(圆员)
摇摇摇摇摇第四十五节摇缘年的鸣放·····	(圆员)
摇摇摇摇摇第四十六节摇由青岛迁兰州 ·····	(圆猿)
摇摇摇摇摇第四十七节摇滕景禄其人其事 ·····	(圆源)
摇摇摇摇摇第四十八节摇“起解”和“回解” ·····	(圆愿)

- 游美日记 ..... (猿园)
- 摇摇摇摇摇附轶与俪生走过的路摇 ..... 高昭一 (猿园)

## 杂诗丛残

- 摇摇摇摇摇第一丛轶话新诗 (五首) ..... (猿怨)
- 摇摇摇摇摇第二丛轶和炼铁杂诗 (十六首) ..... (猿园)
- 摇摇摇摇摇第三丛轶山丹下放杂诗 (二十首) ..... (猿园)
- 摇摇摇摇摇第四丛轶员一蒺间杂诗 (十二首) ..... (猿园)
- 摇摇摇摇摇第五丛轶员一蒺间杂诗 (十二首) ..... (猿园)
- 摇摇摇摇摇第六丛轶职以后杂诗 (十一首) ..... (猿猿)

## 序跋书评

- 摇摇摇摇摇《史学新探》付印题记 ..... (猿猿)
- 摇摇摇摇摇《寄陇居论文集》自序 ..... (猿猿)
- 摇摇摇摇摇《学海暮骋》自序一 ..... (猿猿)
- 摇摇摇摇摇《学海暮骋》自序二 ..... (猿猿)
- 摇摇摇摇摇《赵俪生史学论著自选集》后记 ..... (猿园)
- 摇摇摇摇摇《中国通史史论辞典》序言 ..... (猿源)
- 摇摇摇摇摇《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序 ..... (猿苑)
- 摇摇摇摇摇高昭一《回首忆当年》序 ..... (猿园)
- 摇摇摇摇摇王劲著《郅宝珊传》读后 ..... (猿园)
- 摇摇摇摇摇程兆生《金城漫话》序 ..... (猿源)
- 摇摇摇摇摇陈连庆《中国古代史研究》序 ..... (猿园)
- 摇摇摇摇摇春波和我
- 摇摇摇摇摇——《古史钩沉》代序 ..... (猿园)
- 摇摇摇摇摇《河陇史地考述》序 ..... (猿猿)

摇摇摇摇摇 《中亚史地文献综述》序·····	(猿缘)
摇摇摇摇摇 《徐夜佚诗辑录》序·····	(猿苑)
摇摇摇摇摇 《西北灾荒史》序·····	(猿园)
摇摇摇摇摇 《益法研究》推荐书·····	(猿园)
摇摇摇摇摇 《北凉译经论》序·····	(猿源)
摇摇摇摇摇 《甘肃历史名人画传》序·····	(猿远)
摇摇摇摇摇 李振翼 《甘南藏区考古集粹》序·····	(猿苑)
摇摇摇摇摇 吕绍纲 《庚辰存稿》序·····	(猿忽)
摇摇摇摇摇 《陈大羽九十春秋书画集》序·····	(源员)
摇摇摇摇摇 《仁妙轩文集》序·····	(源源)
摇摇摇摇摇 《刘克训画选》序·····	(源愿)

## 师友回忆

摇摇摇摇摇 混着血丝的记忆 ——悼念闻一多先生·····	(源袁)
摇摇摇摇摇 谨评闻一多先生的学术成就 ——兼论新中国文献学所可能预期的水平 ·····	(源圆)
摇摇摇摇摇 忆述嵇文甫前辈的学术风貌·····	(源圆)
摇摇摇摇摇 附 嵇文甫前辈的学术风貌·····	(源远)
摇摇摇摇摇 回忆张恒寿先生·····	(源忽)
摇摇摇摇摇 回忆江隆基校长·····	(源缘)
摇摇摇摇摇 一个既过五关、又走过麦城的人 ——记我所知道的张申府先生·····	(源愿)
摇摇摇摇摇 记被《一二·九运动史要》说作是“右倾投降主义者” 的一伙人·····	(源缘)
摇摇摇摇摇 从铮园到绿杨邨,再回到铮园 ——记我与徐中舒先生的几次接触·····	(源圆)

- 摇摇摇摇摇一个绝顶聪明但被扭曲了的人  
——为童书业逝世二十周年而作 …………… (原韵)
- 摇摇摇摇摇由一个人的死引起的政治风波  
——回忆丁山先生 …………… (原韵)
- 摇摇摇摇摇明史专家王崇武逝世四十周年祭 …………… (原韵)
- 摇摇摇摇摇怀念任访秋先生 …………… (原韵)
- 摇摇摇摇摇也怀孟超 …………… (原韵)
- 摇摇摇摇摇水天同先生五年祭 …………… (原韵)
- 摇摇摇摇摇记王瑶与冯契 …………… (原韵)
- 摇摇摇摇摇宛在的音容 …………… (原韵)
- 摇摇摇摇摇记蒋□华君轶事 …………… (缘韵)
- 摇摇摇摇摇记赵正楹君轶事 …………… (缘原)
- 摇摇摇摇摇记丁则良君遗事 …………… (缘韵)
- 摇摇摇摇摇我对牛维鼎同志的回忆 …………… (缘韵)
- 摇摇摇摇摇记我所结识过的安丘当代人物 …………… (缘韵)
- 摇摇摇摇摇死三人记 …………… (缘愿)

# 赵俪生学术自传



## 第一章摇身摇世

这本小册子既以“学术自传”为名，意思是有关生活（也包括政治生活在内）的事要较少涉及。但当真正动笔的时候一想，“树从根脚起，水从源处流”，不说一点身世仿佛就无从说起似的。当然，我懂得要尽量少占篇幅。

我出生在山东省偏东偏南的一片平原之上。假如沂蒙山是山东省的一条脊梁骨的话，那么我的老家就在沂蒙山的东尽头处。水流以脊骨为界，向南流的有沂水和沭水，向北流的有潍水、弥水、淄水和胶莱河。在潍水的支流浯水之滨，就座落着我的故乡——景芝镇，它坐落在诸（城）、安（丘）、高（密）、胶（州）四县间几乎等距离的方位上。

在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记载着，景芝是明清之际山东的四大镇之一。四镇之中，三镇在今淄博（颜神镇即今博山；张店镇即今淄博市具体所在地；周村镇在淄博以西处），独景芝镇偏东些。淄博以陶瓷工业和琉璃业、大丝绸业著名，而景芝的专业是酿酒。

论籍贯，那么我母亲郭家的籍贯是诸城，我父亲赵家的籍贯是安丘，而小时候村里有人纳钱粮，则主要到高密。这就是说，人丁户籍在安丘，田亩册子在高密。这一带，是苏东坡所说的“桑麻之野”。郑板桥诗云：“过尽青山是潍县，过了潍县又青山。”我十岁以前对“山”的概念是抽象的。这里盛产烟叶、高粱、大豆（指黄豆，不

是蚕豆)。所以,高粱酒、豆油、豆饼(土称“麻山”,是牲口的精饲料,肥田的上好肥料)是景芝镇的三大出品。据传说乾隆和乾隆以前,胶州麻湾港口经常靠泊着**獾**只风船,专门运送白干酒、豆油和豆饼到海州,甚至远到扬州。

我们赵家是元末明初自河北枣强迁来,是打铁户。到清朝康熙、乾隆年间以酿酒、榨油起家,就成了商人大地主。咸丰年间,捻军打到我们那里,据传说捻军司令任柱(任化邦)和镇压捻军的淮军大将刘铭传,都曾驻扎在我们村里。经过这一场战乱,商业手工业相对说衰落了。当时兴起一场由团练头子带头倡议修土圩子的潮流,大商人地主就自然而然向恶霸地主转化,这些人的后代在土地改革中被乱棍打死的就比较多。

说文风,我们这一带的文风,在北方说,还说得上是盛的。记得章太炎说,他从苏州动身去北京,过了长江就感到荒凉,过了淮河就荒凉更甚,只有从济南往东看去,仿佛还有点文化人的踪影。我们这里,是秦汉定郡县时候的北海郡与琅琊郡衔接的地方。先秦两汉的文化人物,如晏婴、公冶长、郑玄、管宁等就不多说了,以清朝论,安丘就出过大文章家张贞、大诗词家曹贞吉,大文字学家王筠,以及理学家刘源淥。诸城出了不少大官吏,如刘统勋、刘墉、窦光鼐,更有很多诗人,其中以明清之际的丁耀亢(野鹤)最谑浪有文采。这些人,我们一方面把他们看作个人,尊重他们各自的文化造诣,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一面),则更重视他们在历史上、在乡里间所共同遗留下来的文化影响,这种影响一代一代相传下去,对后世不能说没有起作用。

关于我双亲的家门,在这里也不能不报一报。我母亲是位终生的文盲,平生生儿育女,操持家务,以坚毅给儿女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她的父亲和伯父,都有举人学衔,书法皆佳,伯外祖写孙过庭,亲外祖写颜真卿转写何绍基。昆仲均未上公车,以教家馆为业。据说我外祖教出来的进士很不少。我父亲是位有点“少爷”气

的人 ,因为他祖父 (我的曾祖 )是云南镇南州知州、昭通府知府 ,他的父亲 (我的祖父 )是举人 ,内阁中书。他考中秀才 ,补了廪生 ,科举就停废了。据说当时到日本留学有定额 ,县里衙役哀求大家踊跃前往 ,我的四位叔父都报了名 ,只父亲听说大洋中的水色不是蓝的而是黑的 ,拒绝前往。他平生喜欢填词 ,我的一位族伯也喜欢填词 ,两个路数截然不同 ,族伯走南宋吴梦窗、周草窗的路子 ,斫造气韵较浓厚 ,而诗情诗意淡薄 ,往往全篇雕琢而成。我父亲走北宋周邦彦的路子 ,诗情诗意充沛些 ,但生活的深度、厚度上稍稍逊色。族伯是我外祖的学生 ,家有土地 猿园顷 (猿园亩 ) ,后来成进士。我父穷途潦倒 ,刚 猿园岁就故去了。但由于外祖父在族伯家设馆 ,我父前往随学 ,外祖赏识了父亲的才和貌 ,就把自己大女儿许配了。我祖父和父亲也善书写 ,他父子二人全写欧阳询 ,近乎 “馆阁体 ” ,外加一点赵子昂 ,这是很多清朝人走惯的路子。

我是我父母的第 猿胎孩子 ,我出生时母亲已 猿岁 ,父亲也 猿岁了。我上边的除夭折的之外 ,全是姐姐。自我记事时起 ,我父母自祖父那里继承下来的 猿园亩土地已典卖净尽。“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到我家乡调查 ,确实证明我不具备 “地主”成分。由于我 猿岁以后就跟随母亲、姐姐到青岛去过贫民生活 ,所以历来填的表在 “成分”一栏中一直填写 “城市贫民” ,简作 “城贫”。

## 第二章 摇学摇历

一说到学历,自必想到小学、中学、大学。除此之外,还有作为辅助条件的家庭影响和社会影响。但还有一层意思,即一方面我们要回忆当时接受这些教育时候的情节,另一方面还要说出缘年后、远年后的一些反思。后者较之前者,似乎更为重要,因为通过反思,可以把当时教育的效果的各方面,反映出来。

小学这个阶段,在我个人看来,似乎是每个人必不可缺少的,但又似乎对终身影响不大的。这一点上,许多初等教育学家可以驳斥我。而我的理由是,一个人的定型期,其主要铸造期,是在中学,特别是高中,这时一个人已是十五六或十七八岁的时候了。在我们中国,似乎只有这个年龄,才是接受铸造,并且自我铸造的最佳时期。在我的感觉上,小学只不过是“顺大流”的时候。古歌中说“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而我在小学时期不过是“不识不知,顺校之则”而已。

初等小学,四年,我只上了三年,跳了一班,这也许是由于所谓幼稚期的聪慧吧。那是在本村里。这个学校的正名叫“景芝东村私立育才小学”,还受到过黎元洪大总统的金匾嘉奖。记得学校分三个院。最东院是以我曾祖为首的分支祠堂,院中有一古柏,挂一口钟,开学时将神主和主楼收拾到另外房间里,由师生上课。换言之,由祭祀祖先和教育后代两方轮换使用。中院和西院,各是两家远房叔祖的账房兼客房,也暂借出来供上课使用。东院是高小,学

生有的已近 10 岁，够做我的叔叔了。中院是初小男生班，西院是初小女生班，我就被编制在女生班，班中不是我的姑姑，便是我的姐姐。

记得这个院特别雅致，有一棵很大的海棠树。这棵海棠树所结的海棠果，自然我们也摘来吃，但我们最爱的是它的花。在我们幼小的感受里，它是最美的花了，非常艳丽，比杏花、桃花美得多。在它底下玩耍或者背书，兴致和效率特别好。我这个时代，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的事已经过去了，我们念的是：“人、手、足、刀、尺、狗、牛、羊，一身二手，大山小石，天地日月，父母男女，红、黄、蓝、白、黑。”比我们晚一辈的，又念“大狗叫，小狗跳”了。这些不同的启蒙课本，到底哪个好一点，哪个差一点，我到老来都说不清楚。只记得四年级学《地理》课，老师叫每人画一幅分省简略，我分配到的是贵州。记得家里贫穷异常，自习不但没有自习间，连桌凳都没有，只拿一只破杌子当桌，小板凳楂儿当凳，在院子里面。事隔数十年，学习条件之艰难早已抛掷到脑后去了，而贵州地理在头脑中比较清晰，有一条乌江，这一条是死死记住的了。10 岁前后亲到贵州，亲临乌江渡时，心中还油然记起儿童时画乌江的事。所谓“基础教育”，大概就指这些了。

高小就比初小复杂得多。这座学校已不在本村，而是在景芝镇上了，距家三里之遥。它的全名叫“安丘县立第八模范小学”。门口影壁上挂两块牌，一曰“学校重地”，二曰“闲人免进”，还画有交叉的五色旗，有点高高在上，关门主义的气息。同学们大都在街上有铺子，午饭各到店铺里吃，我家没有店铺，只好早晨离家时由母亲炒一个鸡蛋卷两卷饼带在书包里，中午由老师灶上的厨工老官给夹带在老师的笼里溜热了吃。一年四季，春秋二季自然好过，夏冬二季就有困难，夏季有雷，有很大很大的霹雳炸雷；冬季雪很厚，小河上的冰不踏过不去，踏吧有时将冰踏烂，棉鞋会落水飘流，自己只好穿灌满雪水的棉袜上一天学回家。大学生欺侮小学生、

功课不好学生欺侮功课较好学生的情节也已经有了。记得因为某次发作文我得了个第一，圈多，批语好，到中午老师们到馆子聚餐不在校内的时节，批语坏的大个子同学就在场里扮演一场“枪毙人”的表演，将我五花绑起，由两人架着，几个同学吹号，用炮竹代替枪响，把我推翻，给我来个嘴呛地。这种恶作剧已经接近到犯罪的边沿了。

记得当时正是张勋复辟以后，北洋军阀提出恢复读经，我们高小临毕业的那年，就增添了《孟子》。“孟子者，七篇止”，我们大概只讲了五篇，后面《告子》《尽心》两章没有讲。这可能由于毕业前学时不够安排了，但也许由于这两篇比前五篇更难讲，老师讲不了，学生怕也懂不确切。在此不免联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小学教师的水平问题。近四余年的经历使我感到，有很多因素总在破坏小学教师水平的提高。第一个因素就是待遇低、社会地位低，想多赚钱、想往高处爬的，干几年自然而然就走了。第二个因素是一些在学业上想上进的，干几年考上大学、专科学校走了。我想，只有研究儿童心理学的人也许会长期牢固就业。这是当我回忆自己上小学的学历时，不觉想到的一桩事。

中学就不大相同了。我上的中学是青岛胶济铁路中学。这座学校是由胶济铁路局作为经营职工福利，在青岛湖南路胶济铁路小学（“三座楼”）历届毕业生想升学的基础上办起来的。当然，它也有个自身发展的历史。开始几年，学校没有固定校址，靠租赁楼房上课，计自广西路迁浙江路迁明水路迁大学路，只管上课，不管住宿和自习，学生走读，所以很难要求质量。再者，老师也都是胡乱聘来的，教语文的有旧私塾夫子，教英文的有教堂里的假洋鬼子，等等。这怎么能把学堂办好呢？大概后来，他们慢慢觉悟到要办好学必须延请专家。

专家请到了。他叫宋还吾，山东成武人，北大毕业，五四运动的积极人物，因在曲阜第二师范当校长任内，鼓励师生在孔林内演

出《子见南子》话剧，被以孔祥熙为首的士绅告到当时中央政府，他被免下职来，才应聘来给我们当校长的。他高高的个儿，留一丛浓黑上须，西服革履，拿一支相当粗的手杖。记得他是 1949 年春天到任的，那时我正在初中二年级从第一学期进入第二学期，虚龄 15 岁。他不仅是一个人到任，而是带来一大帮人，其中主要是一些从北大、北师大毕业，有学识有新思想的教师。于是，风气创开了。语文课堂上讲起了白话诗、白话散文、白话短篇小说；公民课堂上讲到了辩证法三大公律；当然，在党义课堂上也在讲周佛海的《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些崭新的东西。

从此，我的头脑开始接受第一次铸造。我的灵魂，浸入了第一个染缸。自 15 岁绵延至 24 岁，甚至以后数年，历七八年甚至十年之久。我把这个时期叫做“浸润在新文艺中的十年”。

从此，我开始用白话文写作。此前，全是用文言文的。那时，我们的老师已谈不上什么桐城派了，只能按《古文观止》中的浅近篇章教，我们也只能按“起、承、转、合”的程式写，再加一些“呜呼”以及“矣”、“焉”、“哉”之类的语助词。现在不同了，形式主义的语文训练结束了，自由思想占领了阵地。你想什么，就写什么；你想怎样写，就怎样写。除非身历的人，很难想象我们那批十四五岁孩子初历头脑解放时的喜悦。前边我提到了桐城派和《古文观止》，我加以说明，我不是想诋斥它们，当代的人照样阅读《古文观止》，照样欣赏桐城派古文，因为它们已经无害了，不再起一种捆绑人的作用了。可我们小时候，它们的的确确是捆绑人的，是老的封建意识形态捆绑人们头脑的一种工具。

记得我的第一位白话文语文老师是一位女老师，她叫郝荫潭，曾在《沉钟》丛书中出过一本小说叫《逸如女士》。当时，铁路中学赁租青岛大学的一幢大楼（这里原德国驻军四幢石头楼的西南角一幢），所以可以说和大学堂是近邻，那边杨振声校长聘请的教师及其配偶，多来我们中学里兼课。郝先生当时是杨晦教授的夫人，

听说后来离异了，自己孤零零死在云南。那时我写了一篇作文，描写大学路和黄县路拐角处一洞石桥的水塘，春雨落时激起的一轮一轮的涟漪。不知为什么，它受到了郝老师的赏识，她大加圈点批语，并在发作文时大讲一通。这一行为，倒不在于在当时小小的教室里增高了我在同学中的声誉，它更高更大的作用是，启发了我终生写文章的至死不衰，甚至当代不少名人当面告诉我说，他每在目录上碰到我的文章，就非找来读不可。我是如何培养成了这点可怜的魅力？我自己不清楚，但假如有人死命要问的话，那么我只能说是郝老师赐给的。

第二个老师叫修古藩，此人还活着，已八十多岁了，是北京师范学院的退休教授。江西萍乡人，他的江西话，在一些山东土包子娃娃听来，是离奇的。例如班中有一同学叫潘瑞祥，而修老师却读作“房树墙”，引起大家给他起绰号叫“黄鼠狼”。修老师是大量将鲁迅、周作人作品和译品印成油印讲义发给我们的人。我们开始知道有《域外小说集》、《现代小说译丛》、《日本短篇小说集》，都是从他讲课中得知的。他还推荐让我们订《沉钟》和《骆驼草》这类北大继《语丝》之后出版的小型新文艺刊物。

在这里，我要插进来说一说“童话”这桩清新的新文艺形式在以我个人为例的蒙昧头脑中所引起的巨大作用。

我具体接触到的，是三家童话，不包括著名的安徒生童话在内。这三家是，王尔德童话、爱罗先珂童话和托尔斯泰短篇故事。王尔德童话，自然首先接触到的是《安乐王子》，那是周氏兄弟早年的文言译文选入了教材的，“城中柱石峙立，安乐王子之像在焉”，大家还能背。但我最受感动的，是另一篇《夜莺与玫瑰》。它写一只夜莺，为了染红一朵爱情需要的玫瑰花，不惜将自己心脏贴在玫瑰刺上，用鲜红的血去完成这朵花所需要的颜色。这篇童话启发了我少年的心灵，隐约懂得了人生的事业，是要用耗尽了的心血才能达成高点的。这件事我一辈子不断想起。爱罗先珂是一位漂泊



的俄罗斯盲人，有几年功夫居停在周氏兄弟的八道湾家宅里，以教世界语为职业。老师选他一篇《鲫鱼的悲哀》作为教材，但最使我受感动的是另一篇，写两个蝴蝶，一个飞向东，叫明天的太阳早些上来；一个飞向西，叫今天已落的太阳再重新返回来。这惹恼了害怕阳光、喜欢黑暗的猫头鹰，它命令手下去捕杀这两只蝴蝶。在我少年的头脑里就想，像“三一八”惨案中被杀害的刘和珍君，不就是这样追逐光明的蝴蝶吗？为了追逐光明，人是会被捕杀的。至于托尔斯泰，读他的作品时我的英语已培养起一定的阅读能力，我从老师书架上借来牛津版、著名译述家配森夫妇翻译的《二十三篇故事》。这本可以装在口袋里的小书，我长大后买过几回，丢失了再买，总不忘怀于它。其中不完全是童话，很多以成年人为对象的故事，但起童话作用的篇章仍然不少。例如《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对我的启发就很大。故事说在俄国少数民族地区，有的风俗规定，土地不按顷、亩出售，而是按“天”，在一天之内，买土的人按一个基本圈圈走呀走，走一段插一根标竿；太阳一冒出地平线就走，在太阳落山之前返回出发地，迟误了货款没收，土地一亩也到不了手。故事说一个贪婪的人，他贪婪着多了再多的土地，终于货款被没收，本人累死。托尔斯泰最后说，“宽三尺，长七尺这就是他需要的。”当我五六十岁研究土地制度史的时候，我还不断想起这篇童话。它启发我们，联想到人们的私有和作为社会制度的私有制。联想到中国历史上，宋代有些地主发展土地经营对整个社会繁荣也起过好的作用等等。这都是后来发生的思绪了，但假若要找它的起头，则和少年时期读童话所遗留下来的感受，有着很遥远，但又很缠连的关系。

这是我一生发生最早的一次兴趣，这兴趣很浓，它给我带来无穷的启发。缘年代，人们极力反对兴趣，这一切要按照革命的需要，培养学生提倡兴趣，就是英才教育，不时曾经力争，争不过来。现在几十年过去，才看得清楚这种左倾机械观点在效果上所造成

的损失。话回到原题目上来，新文艺和童话故事还启发我自己替自己开辟了一条文化生活的专门行当——翻译。当时我是这样想的：试探着做一些翻译工作，有着多方面的有利性。第一，它可以越来越深广地满足我自己喜爱新文艺的兴趣；第二，它可以有效地增进我的外语理解力；第三，它可以锻炼我的外语与汉语的对照修养，懂得怎样将一个外语语句像拆卸钟表一样拆卸下来，再按汉语规律装配起来，这样做对于一个作为中国人的我去娴熟祖国语文，怕也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办法；第四，搞文艺，首先想到的是搞创作，可是创作需要两条，一需要很高的才华，二需要丰富的生活体验。假如这两条不够，那么“不得已而求其次”，翻译也是一条路了。因此，我在此后悠长的岁月里就一直业余地操这个行当，从译短篇到译中篇到译长篇，从译英、美作品到俄国的、苏联的、日本的作品，从译文艺作品到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到译近代西方社会科学、哲学文章。可是有人会问，你为什么没有把自己培养成一个职业的翻译家呢？我的回答是，这其中有个思想问题。这个思想问题是，当时人们在说，翻译是媒婆！当时年少气盛心大，一心想当新娘子、新郎君，当媒婆多没出息？就是这么一回事。

套话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已到 1937 年，是民国 26 年，我已 15 岁了。在这一年，有许多发生的我身边的事情都是不寻常的。首先，我的父亲于夏远月去世。他的去世，由于家庭生活全靠几个姐姐在工厂做工维持，所以可以说是影响不大，但扶柩回籍之举还是必行的。其次，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在进一步巩固了统治之后，在学校里施行党化政治思想控制，设置训育处，增置训育员和军训教官。我们的中学，顺应这种情况，也准许了宋还吾校长的辞职，与之共进退的一些具新头脑的老师，当然也走了。这时候，我正从初中毕业，原校升入高中。在两班一百多人毕业考试中我得了第 27 名，不能算很逊色，但分数单上记载着数学的总分是 15 分！这是严重的后遗症。面对这个现实，我怎么办呢？一种

办法是，决计高中后不再升学，那么数学鬼混一下也就过去了。不少同学走这条路。另一种办法，一定要上进，一定要升学，那么数、理、化的学习成绩，必须得搞上去，不上去不行！我在三伏天扶柩回籍，将父亲安葬在祖茔之次，并且按照礼俗遭父母大丧百日内不能理发，在头发蓬蓬似鬼的情况下，回到了坐落在市郊四方的已建成自己固定校址的胶济铁路中学。这时，我在市内的家派出所已换了门牌，顺应男尊女卑的原则，“家长”栏内我父亲名字换上我的名字。这对我是极大的刺激，它警告我说，自己已经是要当家立业的人！

我是怎样萌发了决心的，几十年后我也说不清楚了。记得一天下午，我以冲动的心情，走到中山路劈柴院门洞里那家卖文具的摊店（这家摊店的练习簿又便宜、又耐用），一口气买了十大本厚厚的练习簿，回来把小代数、平面几何、三角这些初中课本以及现用的大代数、解析几何课本整理在一起（这些都是中国私商翻译的外版外文书，其编著者分别是温德华氏、霍克氏、范氏、斯密氏、盖尔氏、耐利氏等），跟着老师现行讲课演算指定下来的习题（一般五六十道），另一面作为“补课”外加演算初中三年级不曾演算的习题（自己规定不少于四五十道），每晚坐在教室里一动不动达三四个小时之久。熄灯后回到宿舍点起洋蜡把未做完的做完。是谁给了我这种毅力的？我回答不出来。假如是受了像欧阳修母亲那样的训导，那么把动力归于母亲；假如当时正在恋爱，女方鼓励了我，那么把动力归于女友；假如哪位老师把我叫到房里，处心积虑将我训导一番，那么把动力归到老师。可惜，三者都不是。那么这动力，就自然要归于“形势逼人”的四个字上去了。环视四周，父亲死了，家庭靠姐姐做工维持，我又是独子，我又不甘心堕落到叫人背后挖脊梁骨的地步，并且英语课文中不是有一课的题目是“裁缝要成为那遭劫的裁缝（要做成一个什么人物）”吗？——所有这些加在一起，我一天演算一百道题的毅力，就油然而产生了。

这样做是有效果的。在班上考试，数学再不是 15 分而是 80 多分，有时到 1954 年高中毕业市教育局会考，分数实额超过了语文和外语；大学入学考试的情况也类似，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这是效果之一，也是最明显的效果。但人究竟是有机体，经过高中一年半的奋力拼搏之后，18 岁少年的脑力和体力显出了短暂的衰败，一时病魔丛生，这是效果之二，反面的效果。但是，除却上述正反两面的效果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效果，就是我相信我的毅力是可以信赖的。经过第一次考验的成功，使我在一生中多次地凭靠自己的信心和毅力，一桩事一桩事地做下去，只有我自己心里知道，这是高中补习演算各门数学题这件事赐予我的。

但是到此为止，关于效果的事，还不曾说完。一个更大的效果是，通过几何中轨迹内容的学习，特别是有多边形边数无限增多就渐近于圆的内容的学习；通过大代数、中级数等内容的学习，特别是数由有限到无限的内容和学习——使我那久已习惯了形而上学和简单形式逻辑的头脑，不知不觉出现了向运动、变化、发展的方向上的考虑，在我看来，这才是最大的收获了。总之，西欧童话故事给我的启发，数学由初等数学向高等数学跃进所给我的启发，是读一千篇、一万篇《滕王阁序》和《阿房宫赋》得不到，也达不到的东西。

还有，数学、物理习题的演算，又给人一种训练，使你高度集中地坐在工作现场，两三个小时一动不动，每条神经都贯注在每一个数据和符号的正误的检查上。我以一生的经验证明，这种训练对数学、物理以外的其他学科项目，也都是有用的。即以料理古代历史为例，你在料理某书某卷某注释训诂方面，也需要与上述同样程度的精确。所以说，我身有感受地认为，我 15 岁~18 岁时对数学、物理的学习，即便以后我以社会科学做了终身的专业，但那三年的精力是丝毫没有浪费的，因为从其中接受了严格的训练。

中学毕业进入大学，这是自然而然的推移。我上的是北平国

立清华大学的外国语文系。现在,正如中学学习与小学学习很不一样了一样,大学学习跟中学学习也很不一样了。我以为,大学的最主要作用,是开扩眼界。在中学,人们局限在固定的教室里上课(顶多上实验、图画、音乐、体育时换一换环境),并且总是那么几位老师。大学不同了,人们要脚走或自行车代步,在许多大楼间疲于奔命,以争取不因迟到而受到讯问;至于老师,那么山南的,海北的,不同国籍的外国人,每人愿意讲什么就讲什么,愿意怎样讲就怎样讲。不是传说当年马叙伦先生讲了一个学期,一篇《庄子·天下篇》没有讲完,大家起个外号叫“马天下”吗?老师不一样,同学也不一样。在中学里,同班就那么五六十人,除少数江南人在铁路服务者的子弟外,都是本省人;虽然功课好功课坏的差别也有,但差距不太大。大学不同了,虽然以江苏、河北、山东、浙江、广东籍的居多数,但全国各省包括边远如甘肃、青海、贵州、云南籍贯的都有,每人有着各自不同的学历、方音、风俗习惯,包括特别聪明的和特别怪癖的都在内。“山外有山、人外有人”的感受,会油然而生。

并且,犹不止此。以我本人为例,虽然我所居住七年的青岛是个半殖民地,也见过一些日本的、德国的资本家和更多的中国买办,但就我的头脑(指意识形态,按二三十年代的音译法为“意底沃罗基”)而论,则基本上仍是封建的,不曾受过异化的冲击。一进大学不同了,鲜明昭著的资产阶级意识在每个角落里拂郁着,从生活到理论观点。譬如说,喝咖啡,红茶加柠檬,吃奶油点心,吃巧克力,打网球雇贫苦儿童拾球,都是进了大学才看见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意识,也处处可以感受到。当然好的方面也很多,如民主,自由。假如这种资产阶级冲力是一股明流的话,那么,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冲力是一股暗流,或者说是在暗中逐渐公开化的一种潮流。譬如说,当时在同学中流行很多歌,如“光棍的锄头不中用呀,联合机器来革命呀”,过些年后恍然大悟,这就是宣传“工农联盟”嘛。又如“生活像泥河一样流,机器吃我们的肉”,这已是

一种形式的《国际歌》了。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声音了。不但有声音,也有组织,在当时只可能是保密,只某几个外围组织半公开。即南京当权政府的一些组织系统也不公开,例如通过军训教官转手的活动经费和个人定额津贴,是在曝光之后,大家才知道。同样,一些与政府不一致的地方首长(如张学良、李宗仁等)寄给学生会和救国会的款子,也是在曝光后大家才知道的。所有这些,在中学里都未接受到过。只是有一次青岛中山路街心公园(现在是银行区)里有人被刺杀,人们传说那是个共产党叛徒、被组织决定派人处死了的,事后证明是确实如此。这是中学时期的事。一旦进了大学,那么政治斗争的事,真是越来越司空见惯了。

在这里,既然写“自传”嘛,我想就应该无罣碍地写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对于清华,我想写出我多年以来隐蔽在胸际的一些看法。当时,谁考进清华,简直比清朝中了进士还辉煌。北京市语说“北大老师大穷,清华燕京可通融”,这是市民选女婿的标准。到今年,我们那一批考进清华的~~四百~~余人中,除开见上帝和马克思的之外,在大陆剩不下~~几个~~人了,这些人多已抵达古稀与耄耋之间了,但写起纪念文章来,众口一声称颂当年的大学生活几如世外桃源。我和他们不一样。虽然我从来没有公开唱反调,但反调一直憋在肚子里。一进校门就是“拖尸”(栽赃),高年级学生虐待新学生的一场大恶作剧,这跟小学时大个子同学拉我到操场去“枪毙”,不是大同小异吗?再说上课,赫赫有名的刘崇宏教授的《西洋通史》和雷海宗教授教的《中国通史》,除了支离破碎的一些知识碎片和一些烦冗的卷、页数据之外,又给了学生一些什么呢?我这样想,我想我是严肃的,因为正是我本人恰好是教了一辈子《通史》的人,从而我最有资格评鹭当年的教课。再如外国教授翟孟生(姓音译),他的《西洋文学史》又怎么样呢?只叫我们背譬如迭更斯生于何年?卒于何年?他有多少小说著作?其主要著作(如《狄卫·高伯菲尔》)的主要情节是什么?男主角是谁?女主角是谁?几十年



致。这点 ,我办不到。即便 ~~五个~~四个观点中有 ~~三个~~二个相一致 ,只有一个不一致的话 ,我也绝不能强行一致。缺乏组织性 ,是我一生的致命点。

既然要搞文化 ,当时还不懂得搞历史学 ,就只好先搞在中学里培养起来的兴趣——文学。具体说 ,搞小说。又受生活经验贫乏的限制 ,不能搞小说创造 ,就只好搞小说翻译。那时 ,图书馆西文阅览室里有《莫斯科新闻报》,有美国出版的《新群众》,进城去在喜雀胡同白俄教授柏烈伟家里可以买到《国际文学》。从翻译中几乎可以说 ,能得到无穷无尽的启发和滋润。记得译过一个日本短篇 ,描述两个小学教师到山中的古庙去开共产党的秘密小组会。在那篇文章里 ,作者把日本山色的秀丽和景物的幽静 ,简直写得入神了。又译过一位美国报告文学家斯皮瓦克写的一篇给罗斯福总统的一封信 ,说在南部经营棉花的种植园里 ,一位怀了孕的黑人姑娘正处于极其悲惨无助的境地 ,他问正在行“新政”(~~罗斯福~~的总统如何拯救她。从这篇文章中 ,我仿佛亲眼看见了美国西南部农业庄园上雇工生活的境遇。又译过一篇十月革命后的一位俄罗斯母亲 ,经历千辛万苦搭乘不买票的火车到乌拉尔一个劳改场去探望她因为偷了一些什么吃的东西被送去服刑的儿子 ,她怀里揣了一个极小极小的苹果 ,由于揣得过久而热烫烫的了。慢慢地 ,我由翻译短篇发展到翻译中、长篇 ,我选了一篇描写十月革命后富农暴乱的故事《孤独》。记得这部小说分二部 ,我在春假一周间译了第一部。记得窗外的紫荆花已经开了 ,男女同学们这个来邀我去八达岭 ,那个来邀我去西山无梁殿 ,我都婉言谢绝了。在高中演算数学题时候的那股“雷打不动”的劲儿 ,又上来了。到暑假 ,本该回青岛看望母亲的 ,也暂停了。通过这场翻译 ,我懂得了俄国富农是怎样一个阶级 ,它的政党——社会革命党如何由于阶级利益与布尔什维克处于敌对的地位。又看到列宁的政策 ,一方面由著名将军杜哈切夫斯基率军进剿 ,另一方面在政治上调整粮食政策 ,争取个



体小农和贫农走到布尔什维克的同路上来。从内容上看,这是篇写大形势、大起大落的文章;从字数上将近四万字,一面上课一面趁春假、暑假时间,完成这件译述的工程,自己对事业的信心和毅力,不知不觉又提高了一步。我从此懂得,一个人干一桩事业,不干则已,要干就要叫它一定干成,叫它一定能够干成,这是人一生中很重要的一条纲。

当然,从译述中也遭到一些艰难和疑窦。例如,上述日本教师到山中去开秘密会,那座庙里的主神名字,其日语英译文是 韵翻这可把我难住了,我把它转到日本的假名,然后到阅览室里遍翻和汉、和英、和德、和露等辞典,记得一星期过去了,无法之余只好到图书馆馆长办公室去找当时的馆长钱稻孙先生(这时我正选修他的大二日语),他立即回答是“天照大神”。从此,我才真正懂得了专家的作用和意义。再例如,在译《孤独》的过程中,我发现前后两个版本中间有个极明显的不同,平叛的总指挥前一版本中明明写的是杜哈切夫斯基,并且在提到他时,作者还加了笔墨对他略加颂扬,说皮尔苏斯基元帅很早就识别出杜是一位有才干的将军。可是到另一版时,一切有关杜的话统统取消了,平叛总指挥换成了斯大林。我想,倘是虚幻小说,换换倒也无所谓,可这是历史小说呀。当然,历史小说究竟还不是历史,既然挂着小说字样,就允许塑造。但这显然不是塑造。后来在熟知了杜哈切夫斯基冤案的始末之后,我才懂得这后一版本的变动,是在高压政治下的一种篡改。

我在大学上了三年,翻译只是一种业余的操业,主业还是上课,积累分数。说起分数,当时分五个档次,耘是优秀,杂是良好,晕是正常,隄是尚可,云是失败(不及格)。习惯把云叫拿手枪,意思是应该自杀,就把隄叫拿棍,只能当个巡捕;把得杂叫拿钥匙,意思是“有门儿”啦。我军训、体育拿的全是手枪,其他大部分拿棍,拿钥匙的时候很稀少。所以按成绩看,我是个劣等生。这跟高中成绩比,就是个大堕落。但我自己并不这样认为,假如我真正如此认

为 ,我早该自杀了。我这样想 :这个大学的路数和气味 ,和我根本不合 ,我在这里只是混混的 ,一面混一面自己干自己想干的事。那么什么是自己想干的事呢 ? 一是写作 ,二是从事社会活动 (指全部的 ‘一二九 ’运动 ;但因此书是学术自传 ,有关生活和政治的 ,就从略了 )。反正我不曾虚度了我的光阴 ,我的自我感觉是充实的。

由小学 ,而中学 ,而大学 ,在这 四原年头中我成长起来了。做好种种准备 ,使自己向此后真正的学术生涯迈进。

### 第三章摇师摇承

蔡尚思先生说,老师有两种,一是“死老师”,一是“活老师”。他说的“活老师”意思是不管这位老师现在已经死了,但当他对你“传道授业”的时候还是活的。他执行的,是口授面喻。他所说的“死老师”是指书,意思是不管这些书的作者当年曾多么生动地活着过,但对你来说已经够不上“面炙”了,你只能通过他所遗留下来的文字的传导,接受他的教诲。蔡先生的意思,重在后者。他是说,活的老师平生得益者寥寥可数,而“死老师”们留下的东西都浩如烟海。但在我,又不是每种书都可以给我当老师的,有的书读过几遍,心心不印;只有心心相印了的才产生效果。从我的感受说,活老师言教身教,有声有色,像吃药一样,它的效果大得多。

勉强说,我的头一个文化老师,也许是我的父亲。他是一名秀才,考取过廪生,也就是说,是一位接受官家微薄生活津贴的秀才;本想考举人,但清朝的场屋关闭了。他天赋极高,而意兴极为疏懒,不事家人生产,只爱填词。所以我从小就知道词有小令、中调、大调,最长的《臧氏》三阙、《莺啼序》四阙。他对南宋王沂孙、吴梦窗的缺乏感情实质的词派并不喜欢,但对感情跌宕的苏东坡、辛弃疾也不加意称道,独对周邦彦、柳永则屡屡表现崇敬之意,说只有周才是正宗。有一次,他吩咐我去买来三本红格簿,他说旧时代小孩都读《龙文鞭影》,知道一些典故,我给你现编一部《龙文鞭影》吧。于是他就在鸦片烟吸过之后,一篇篇写下去,三个本子都写

满 题曰《集腋成裘》。当时,他已穷到连一本参考书也没有了,但令我至今惊讶的是他每个古典下都附注出出处,某书甚至某卷。这使我惊羨老一辈人读书讲究背诵,这功夫真利害呀!他还叫我熟悉“诗韵”,而我却由于已沾染了新文艺而对诗韵表现出“不入不入”,故终生不会填词,不做律诗,就是做也是不合韵的。诗情诗意,我是喜欢感染的,但“一东二冬三江四支”,我却终生感染不上。这毫无办法。

我的第二个文化(文献)老师,就要算闻一多先生了。我在中学读书时,曾在伯父的书斋里见过他,那时他是青岛大学的教授,伯父是清末的进士,是著名的词家和藏书家。当时我是小孩子,没有资格跟宾客交谈。后来,闻先生到清华教书,我也进清华,正如上一章中我表述过的,我对清华当时开的那些课都不感兴趣,只对闻先生课愿意听。当时他开四门课(《诗经》、《楚辞》、《唐诗》、《中国古代神话》),作为外系学生,即便到二三年级,也没有资格全部选修,只挑《神话》一课选修,其余旁听。旁听不缴作业,不计分数。选修就要缴作业了,记得闻先生给的题目是《远古帝王感生传说的分析》就是指那些“履巨人迹”、“见北斗枢星”、“有黑龙卧其上”等等。我平生第一次学会查类书、翻丛书,就是围绕着做这篇 ~~资料~~ 开始的,这就正式踏上文献学的边沿了。对《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以及《玉函山房辑佚书》等,开始翻查也感到过烦躁,久之尝出滋味,即根据一根线头可以找到很多花花绿绿的线头,心里很喜欢干这个事。对一件事的底蕴,像破案一样,追踪寻访,从类书中找到线索,还要缘着这条线索深入到一部部原书中去,总不能查完本题就一扔不管了吧,一般习惯是借查甲案的机会,不知不觉地牵连到乙案、丙案上来,当时年轻,精力充沛,对有兴趣的问题难舍难分,手里攒着一大把问题——“一锅下吧”。这一“下”就三个月、半年过去了。我开始感觉到这比翻译一篇或一部小说,更饶兴味,份量更重一些。当然这

种转变,也是和一个人由少年向青年的过渡相伴随着的。

我和闻先生中间,不仅有学业的传递,还有他对我人格上的陶冶。自离北平以后,我到山西参加了部队,在晋西北和晋南各地转战了两年半。在我到西安出差,读到大后方的报导时,我给闻先生写了一封信,向他报告了游击区的生活花絮。也许这些感动了他吧,他从云南晋宁破例地用蝇头小楷给我复了一封长信。这封信我珍藏下来,捐赠给先生遗著的编委会了,后来由一位师妹编入一本小集子,出版后送我一册。我深知,晋宁时代,是先生一生学术达到最醇练的时候,那部《周易义证类纂》就是这时候的产品。朱自清先生说他的作品“精悍”,而他给我复信的时候,正是他的学术闪耀着“精悍”之光的最佳时刻。我曾立志要把《义证类纂》的本事学下来,但恐怕到死也学不到手的了。

大概在 1954 年前后,我才正式确定自己由“新文艺”向“史学”跳槽。谁推动的?在这里就要说到“死老师”的作用了。这时,我已自部队转业为中学教师,偶尔自图书馆中借到全祖望的《鮚亭集》,我一下子就扑到它的卷怨和卷 101 上去,因为那里有着张煌言的传说性篇章,黄梨洲、顾亭林、李二曲的传记性篇章。在 101 卷中还有傅青主的传记性篇章。当然,当时限于时代和时局,全祖望只能采用“神道碑”这类的形式来传写。我最受感动的是张苍水(煌言)的神道碑铭。这篇碑铭长达六七千字,是一篇出格长的文章(正如钱牧斋给孙承宗写的碑文也是一篇出格长的文章一样)。不但出格长,而且出格地精彩,既有经过多方考核的精确的史实,又有充沛的感动和生动的文采。从这篇文章我才懂得,高乘的史学写作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我从事史学工作从明朝开始,从明清之际(17世纪)开始,其根蒂实与这篇文章有很深的关联,从此我就对清初明遗民展开了研究。五六十年代,人们写文章加意贬低遗民运动的作用,说什么“不过是地主阶级的拥满派和反满派”,用“地主阶级”一张大皮就把汉奸和爱国者卷成一堆去了。这个作

法，并不是坚持了什么阶级观点，而是严重地混淆了历史上的大是大非。对这种形“左”实右的看法，当时我反对，现在我仍然反对。

遗民运动的作用，是很巨大的。从满清入关开始，一直持续到三藩起事，甚至三藩失败以后，在南方边僻山区，以“复明”为牌号的反清运动，一直在持续着。甚至可以跟孙文、黄兴、章太炎的“驱除鞑虏”联成一条线。我就是这样以全祖望的著作为介绍人，参加到史学工作的行列中来，以遗民运动的研究作为自己自选的第一个课题。我说“自选”，是没有老师指定。这就是说，假如第一次题目由老师指定的话，第二次就不一定非靠老师不可了，人要锻炼自己的主体能动性。我找到的第一个历史人物是顾炎武。在这里需要着重地说明一下，我选中顾作为对象，是与另外一些顾的研究者很不相同的。他们从“学”上下手，我从“行”上下手。他们著重研究顾的经学、史学、音韵学、地理学，而我则著重研究顾在北方仆仆风尘 圆原 年所参与的遗民运动。缘着这个线头，就像拆一件毛衣一样，我拆出来很多东西。我找到，在陕西的华阴、富平，有着一活动中心；在山西太原、代州和祁县，又有一个活动中心；在河北永年（广平府），又有一个活动中心；在山东章丘（明水）和东南方的诸城一带，又有一个活动中心；甚至洪泽湖岸边，还有一组遗民在活动。所有这些，都是在全祖望及其《鮚□亭集》的伟大的启发之下展开来的。模拟，是人的许多有创发性活动的前奏。看到全祖望把浙江一域的遗民活动勾勒得如此引人入胜，这本身就引起我的模拟冲动，想把北方山、陕、齐、燕的遗民运动也试探性地予以勾勒。以上，就是我游离开新文艺和外国作品的译述事业，向史学入门所迈开的第一步。

圆原 年，日本投降了。这时，我已在高级中学里当了七八年教员，我已是三个女儿的父亲，我在史学工作的默默操作中已有五六年的光景了。俗话说，闭门造车，要出而合辙，我应该到更广阔一点的世界中去，让别人检验检验我的成就了。于是在 圆原 年冬，

借在重庆的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迁移上海的大会给我发出邀请函的机会，我在赴沪半途中在开封下车，对河南大学进行了访问。这次访问中，我有幸结识了第一位对我有影响的史学家——嵇文甫先生。

我去晋见嵇先生，是由两位青年人带领的。其一是周可任，他是陕西岐山县益店镇的人，是在乾州中学我教过的学生（他不久以后，即在泌阳被白崇禧部活埋，壮烈牺牲）；其二是牛维鼎，他是安徽阜阳人，此二人当时都是河大文史系的学生。此时，嵇先生住在刷绒街一处小院落内，由于思想新颖，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限制，正在苦闷、寂寞之际。他难得遇到像我这样一个年轻好学的后辈，我也难得遇到这样一位思维活跃、境界宏阔的长者，所以我们一拍即合了。当时，我们接连谈了三夜。谈的主题是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想界。记得我谈的是关中之学和“关中三李”，嵇先生谈的是孙夏峰（奇逢）以及从孙夏峰到颜习斋中间的学术传递。三个夜晚过去了，我对嵇先生产生了极大的崇敬，嵇先生也把我“引为同调”，对我给予了很高的期许。当时，嵇先生和那两位青年都希望我到河大来。但嵇先生说，由他推荐是不合适的，因为统治者认为嵇的色彩是“红”的，不久前还被捕过，在洛阳拘留过几个月。他听说我去上海开会，就提议找中央研究院的人担任推荐。后来我遇到同时考入大学的友人傅乐焕，由他转请他叔叔傅斯年（孟真）担任介绍。由于孟真的妹妹是我的嫂嫂，傅就欣然作了推荐人。加以次年圆月我的第一篇史学论文在《大公报·文史周刊》上刊出，这使河大校长姚从吾对我增加了信心，于是就给我下了聘书。从此，有一年光景，我得以和嵇先生朝夕相见、从容问学了。

我从嵇先生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他学术境界的宏阔。他的学术路子很大，于学无所不窥。中年曾在先秦诸子方面，有过许多精辟的见解；中年以后，浸沉在王阳明思想和王船山思想里，体会出许多精彩的端绪来。他常说，他不是不会做考据，但对清中

叶以后许多江南的琐节考据家很瞧不起。他曾经冯友兰的推荐，在北大、清华担任过专任讲师和兼任讲师，对当时赫赫负盛名的“诸沈”和“诸马”很不抱好感，那些人也在评议会上说他接近“赤化”而主张停止续聘他。这样，他就回到中州来了。他的课，都在大礼堂上，原因是听的人太多，据说连便衣侦探也来听。他的最高明之处，在于他讲的道理全是辩证法和唯物论，但这类的词句他却不用，他用的词句全是传统的，让找把柄的人什么也抓不到。他前些年教《中国社会经济史》，后来教《中国思想史》，外加一高年级小课《明清思想史》。我到河大后，他就把这小课让给我教，我心里想，像戏剧中英雄豪杰那样“试试你的膂力如何”，于是我便欣然地把课接了下来。经过一年的讲授，学生没有流露出一不叫我教下去的意思，我总算受住了考验。

嵇先生不喜欢琐琐于言教。他连自己四个儿子的家庭教育也往往放任自流。因此，我要跟他学习，那就是从“微言大义”中去体会。事情往往是这样，我写了一些什么拿去请他看，他看后总是连声说“好”，不说任何缺点，只是说某人某书中还说了一些什么，另某人某书中又说了一些什么。我明白，这是启发我的主动性，让我自己到学术的原野上去驰骋，自己去寻找自己需要的营养和补苴。孟子说，“欲其自得之也”，只有自己去得来的，才能“居之安”、“资之深”、“左右逢其源”。这比手把手的教法，比用细笔小楷去批改一字、一句的做法，路子要大得多。这样带出来的学生往往比较通达。

我们只相处了一年，开封就第一次解放了。当时的仗打了七天，街上的尸体气味已不是臭，而是辣椒般的刺鼻。解放军匀出几辆大十轮卡车，送我们一批人员和家属到中原局。我一家和嵇先生一家又恰好分配到一辆车上，经通许、鄢陵、许昌、襄城到达鲁山。中原局在这里，二野和三野联合指挥的前委刚刚成立，淮海战役马上就要打响了。嵇先生留下来筹办中原大学，其余连家属六



七十口 ,要送到石家庄的华北局分配工作。在分别之际 ,记得是在鲁山中学的操场里 ,嵇先生有一段临别赠言。他说 ,拿他和我对比 ,由于出身和经历不同 ,所以作风不同。他说他是“富贵不足以长骄 ,而贫贱又免于饥寒” ;我呢 ? 则是“富贵足以长骄 ,而贫贱又不免于饥寒” 。所以我的性格是激动性的。说至此 ,他留给我两句话 ,那是——

“欧阳公尽用其所长 ;

柳子厚避所短而不犯。”

现在距离嵇先生逝世 , 倏已 園苑年了。我反思 ,对这两句话 ,前一句我也许曾接受了他的殷殷劝导 ,后一句则在很大程度上没有遵守住 ,违背了 ;只有到老年 ,血气已衰 ,才有了某些改良。

我跟嵇先生相处的一年 ,是 园苑年夏到 园愿年夏 ;跟王献唐先生相处的一年 ,则是 园愿年初春到同一年的冬天。那是在济南。当时济南刚刚解放 ,我从华北大学派过来 ,做些各界代表会工作和工会工作。王先生当时住在市区南边沿山根上一个小院之内 ,小院住三家 ,故王先生有一方图章 :“三家村人” 。王先生 ,山东日照人。日照 ,古名海曲 ,赤眉军的原发动人吕母 ,就是这地方人。王先生的学历 ,只是青岛德国人办的礼贤书院 ,而且学的是工程。他平生学术成就 ,都是以家学渊源为基础而自学发展起来的。清末的文字学家许瀚 (印林 )和丁以此 ,都是日照人 ,王先生的父亲就曾问学于许瀚。献唐先生学名王□ ,用的是西域人以玉□献给唐朝的典故。他平生以主持并发展山东图书馆 ,而为人民留下了巨大的文化事业 ,也使自己为读书人所尊敬。

我去访问他时 ,他正极度的抑郁不欢。他原有癫痫病 ,曾在协和医院进行过开颅手术 ,未曾根除 ,以致每隔些时候就发作一次 ,发作时突然摔倒 ,有时摔伤。他的堂弟王崇五是王耀武时代的济南市长、军统头目 ,所以解放后此事对献唐先生也带来某些麻烦。我们经常向上边反映 ,后来山东省的党政大员去看望他一次 ,基层

上的态度马上就好转多了。等山东善本文物移到四川万县山洞中完好无损的情况，经二野反映到中央和文物局以后，他为人民建立的功勋才为当世所传颂。渣滓洞被蒋记人员残害的实况查清过程中，王先生子夫妇及一胎内孙儿被害之事查清以后，王先生又具有了“烈属”的身份。我曾亲眼看见，王先生的物质环境和精神状态从十分困难到一步步好转的全部过程。

王先生的学术风貌，跟嵇先生很不相同。嵇先生是北大毕业，三十几岁上又去过苏联，很早就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他见过大世面，又是搞哲学的，所以属于高明一路。王先生从治小学（文字学）起家，平生著重在古书的鉴定和文物的考订上。他在鉴别琐节的时候，是十分沉潜的；但他在赋性上又有不少狂气，狂气发作时就非常高明了。嵇先生从不诙谐，而王先生极赋幽默的情趣，经常放口臧否古今人物，妙语连篇。嵇先生晚年几乎全部从政，身兼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河南副省长、郑大校长等职，仿佛不大做什么学问了，据说晚年颇有意于“政术学”的研究，而迄未见留下成品。王先生则以布衣终身，晚年潦倒抑郁，也做不成什么大学问了，只写了许多跋文，另外就是画画、写写字。他的字独具风格，是从宋徽宗到赵秋谷（执信）那里传递下来的“瘦金体”，别具一格，我把它叫“扭秧歌体”。

记得我第一次从献唐先生案头借的一本书，是章太炎的《自述学术次第》。此书有两种印本，~~缘~~缘年代初我自修绶堂买到的，~~缘~~缘年太炎先生逝世后《制言》半月刊 ~~缘~~缘期中所载的；而我 ~~缘~~缘年自王先生处借到的则是仿宋体铅字排印的线装薄册。王先生老图书馆长的习惯就在这本小书上也打有烙印，他连这么薄薄的小本都打了布套子，也足见他对此书的重视。我可以说，我平生得益于这本小书之处，真是太多太多。一生中，我不断地翻读它，一次比一次的收获深一些。根据小注，这篇东西是 ~~缘~~缘年写的，当时太炎才 ~~缘~~缘岁，不过此后的 ~~缘~~缘年中一定经过了多次的修改增删。其中谈

了九个要点。第一点，他治佛学，主法相宗，以《楞迦》为无可超过的经典，比较偏于实在，而不主“空”宗宗旨；第二点，他治经学，主古文经，与当时正很时兴的“公羊派”恰成反调；第三点，他治《易》，讨厌汉易，而以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观点去治《易》，从其中看出人类由蒙昧到文明、从无阶级到阶级的进化；第四点，他治文字学，反对单在字形上用力，而主张从声上体会字义的转化；第五点，他认为千古文章以三国、两晋人的文字为最美，而从陆贽到曾国藩，则把文章做成公事文了；第六点，谈到政治制度，他认为议会制度有毛病，由数千年专制骤改议会，缺乏中间衍变历程；第七点，谈到法律，他认为历代法条有适宜的，也有背谬的，后人应好好斟酌；第八点，他认为晚明遗老，其思想主张中，颇有不少“道道”，由于不能不诡秘，后世人多已不能通晓了；第九点，清代考据之学极盛，但他认为其局限性仍然很大，其病在于不能贯通。试看，在 20 世纪二一十年代中就有如此高明的见解，真足以惊人了。并且，这些精义，我并不是第一次就能领会了的，而是通过几十年中鄙人自己学业逐渐开拓的过程逐渐领会了的。记得，在借阅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的同时，我还从献老那里借来刘申叔（师培）的《左庵集》，不久又借来《左庵续集》。虽然，多少年后，我从一本宋益乔先生写的苏曼殊传中得知，刘申叔及其夫人何震在政治品德上很糟糕，不惜通敌卖友；但在开国之初，当我从王献老手中借到《左庵集》的时候，我却是跟读太炎《自述》有着同等程度的受到启发。

假如我在王献老跟前的第一学程是“章太炎和刘申叔”的话，那么第二个学程就是“两周金文辞”了。这个学程不从书本开始，而是从实践，或云实验开始。经常，我坐在他的“陋室”中，有个什么青衣小帽的“古董客”走进来，鬼鬼祟祟从提兜里掏出一个什么，用绵纸层层包裹，里面原来是一件青铜器，此来是请求王献老替他“长长眼”。王献老真不愧为这方面的专家，他先从远处望一望“器”的形制；然后伸手从盖处、颈处、腹处，细细窥看有无铭文，铭

文款识文字与铸成的情况 ;最后看看青铜的铜锈。一般 ,他的“诊断”有三种情况。那时大家出语戏谑 ,惯呼罗振玉为“老贼”(老实说 ,这种谑是有些“虐”的)。第一种情况 ,断为“老贼”的贗品 ;第二种情况 ,连“老贼”贗品都够不上的货色 ;第三种情况 ,真品 !于是 ,王献老便摸着他那韩熙载式的胡须讲开了 ,何以是假 ?何以是真 ?久而久之 ,连我这个“外行”也慢慢发生兴趣起来 ,到大布政司街买回《积古斋》、《奇觚宝》、《愆斋集古录》,直到借来《两周金文辞大系》,一器一器对照查读 ,不觉也通晓了不少的有关知识。后来 ,我虽然不曾以此道名家 ,但一提起两周青铜器铭文来 ,总不至于十分无知 ,就是由于獮岁时的这一点点积累。在这里 ,还须加叙一笔的 ,我进行这些学习 ,并不是“脱产”进行的 ,经常是开大会、首长做报告 ,由于我文化较高被指定作记录 ,记录时还要整理成文件 ,打印传送。有时要出外调查 ,有时要向首长汇报。记得深夜 獮时电话响了 ,是市长从洛口黄河水情现场打来的 ,要我好好记录下来 ,立刻坐小车向省首长去汇报。这些我一一做了 ,并且未出误差 ,但同时 ,我也未曾耽误我在王献老家住补习学校的作业。当然 ,当时鄙人风华正茂 ,如日中天 ,也是一个条件。但无论如何 ,学习和职业性工作两不误 ,在我经历中是可以得到证实的。

对于以上这几位对我有过影响、有过传授的老师 ,在他们过世之后 ,我都写过纪念文章。记得闻先生在滇惨遭杀害之后 ,我正在陕西蔡家坡教书 ,当时陕西特务罗布 ,但我仍趁黑夜写了《混着血丝的记忆》一文 ,托中国银行的关係 ,递到上海开明书店叶圣陶先生处 ,转由郑振铎先生在《文艺复兴》上刊出。嵇先生逝世 獮周年( 獮年 )时 ,北师大《史学史研究》季刊叫写篇文章 ,我写了《谨述嵇文甫前辈的学术风貌》一文。只有献唐先生 ,记得有一年《山东画报》的编辑部写信来商量 ,说台湾出了很多纪念文章 (记得提到有屈万里先生的文章) ,建议在《画报》上开辟两个版面 ,由我撰文 ,由献老三儿子国华同志夫妇提供图片及纪年资料。我欣然承诺 ,

还专为此去了一趟青岛。谁知王氏夫妇一方面接待殷勤，一方面对图片、资料等事讳莫如深。察其寓意，专利思想十分牢固，似唯恐他人染指者。于是，我只好怅然而归了。所以，如上面对献老的叙述，这才是第一次，上距献老辞世已獯年了。

底下，我愿就我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学习运用它的过程，有所叙述。

记得在中学时，我买到过一本书叫《现代世界观》，德国塔尔海玛著，李达译，昆仑书店出版。这是一本马克思主义深深印入我的心坎的头一本书，我终生不忘它，丢失了，在旧书摊上遇见再买一本回来，反复几次，总要有这本书留在自己身边。抗战开始后，西安中正街（解放后更名解放路）临近东大街处路西有个旧书摊，经常有些外文版的书会在那里卖出。我想，大概是从延安回来或者要到延安去的人，为了旅途减少麻烦而甩掉的书，以苏联版为多，但有一次我遇到一本英国版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即《拿破仑第三政变记》）。这本书，封面已经扯掉了，原文尚无缺失。我买回来，白天教书，深夜在一盏油灯下就翻译它。翻译，是一种最深入的学习。记得，马克思本人和恩格斯的《序》译过去之后，正文七章，我只译了两章就译不下去了。原因很多。当时每周担任獯个课时《英语》，外兼一个级任，要看大字、周记，要参加升降旗，查宿舍卫生，疲劳不堪，此其一。马克思老人家喜欢用典故，中国人用典故多自先秦两汉处来，马克思用典故多自希腊、罗马或中世纪经院文化中来，当时我呆的那座中学十分简陋，这些典故的出处无法查找，出处查找不清，寓意就体会不准，译文就很难下笔，此其二。当时上海生活书店登出广告，说柯柏年同志的译文就要出版了，此其三。十余年后我读到柯译本，感到他的译文优于我处自然很多，但当年假如我将此书坚持译完，那么，也会有若干优于柯译之处显示出来。

译述工作虽然中断了，但书还是反复地在读。读到中半以后，

精义滚滚而来，诸如对山岳党、秩序党、社会民主派的阶级分析，对小农性质的分析，对工农联盟概念的阐发；这些精义带给我的影响不是一时而是终身。试看我个人中年以后的论文题目，多爱使用“分析”、“剖析”字样，其实我自己心里明白，这是从《拿破仑第三政变记》里脱胎出来的。缘年代初，我曾与童书业合开一门课，叫《马列主义史学名著选读》，上下两学期，前一学期童讲《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后一学期我讲《拿破仑第三政变记》，足见我对此书爱慕之深。前几年，由于某个野心者从此书的序里借用了“天才”字样引起轩然大波，也殃及此书，有人说此书并非马老人家的著作，甚至后来数年间书店里连此书的单行本也不卖了。这是很不应该的。野心者理应讨伐，但此书不应遭贬。

以上说的，是开国以前。开国之后，我在济南，当时从苏联过来不少中译的理论书，用苏联纸印刷，远较延安纸为精美。译文则每多古怪、不辞之处。但不论如何，我还是买了一大堆。大量阅读列宁和斯大林的文章，从此时开始。记得我最爱读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一篇，其中讲螺旋型的运动变化发展，还批及诡辩。列宁对诡辩说了一句辛辣的俏皮话，“脑袋钻不进去的地方就把尾巴插进去”，此语我终生不忘。尔后，几十年来，每当我展读一些煌煌大家把明明白白的大道理偏偏引到诡辩的死胡同里去的时候，我不禁笑吟吟地说，“又在那里插尾巴了”。对斯大林，我不完全否定，他滥杀若干无辜，那是政治问题；至于学术上，我一直喜爱他文章中明朗不移的逻辑。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今天看来，其中充满着若干生搬硬套、机械论和“左”倾以及右倾观点，特别当人类社会发展的多线论兴起并且越来越为更多的人所接受以后，他的五种生产方式的单线论已经明显地说服力不强了。但不论如何，我数十年来，每当考虑一个史学理论问题时，我总是把这本小册再览一下，正如考大学的学生临考前把高中数学课本拿出来翻一翻一样。

以上说的,又是“死老师”。现在来说“活老师”。~~恩~~恩后半年,我曾在华北大学工作过半年多。这座学校,是人民大学的前身,当时设在河北省正定县城内(这里是我妻的老家)。学校分四个“部”,第四部是研究部,主任是范文澜先生。当时在华大,真是进步学者如云,如过江之鲫,但我最受影响的,只有两位,一是艾思奇同志,一是何干之同志,他二人在“史论结合”方面给了我不少的教益。艾是云南人,无论说话或者对人,都带着一股醇厚沉重的气息,连一丝一毫尖酸刻薄的味道都没有。何是广东人,因写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和《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二书而知名。他是老党员,但每逢运动他都是“运动员”,运动一过,他又立刻是“红色教授”的尖子;可是下次运动一来,他又是“运动员”了。这一点,我终生不明白。当时,我正暂时地游离开明清史,想对南、北朝史的北朝一侧的历史研究研究。其动机是这样的,似乎一位日本学者有过这样一种见解,中国历史到汉晋之际,已奄奄一息了,发展不下去了,由于受到了北方和东北方野蛮民族的有生命力的冲击,中国在隋唐才又大大振兴起来。多少年后,我发现这位日本学者大概在某种程度上也受过恩格斯的启发,他似乎想套用恩格斯的观点没有套用好,从而对中国历史落入了唯心主义。恩格斯确曾这样认为,奴隶制到罗马,已经不能再振作了,来了日尔曼才展现了新的生命力。但据我的理解,恩格斯是从原始社会的生命力出发的,这种根源来自经济结构(公社),而不像猿年代某些日本学者把这种生命力影射到“大日本皇军”的“东亚共荣圈”方面去了。我当时就是从这个偏重理论的问题出发,想搞一搞拓跋魏的事情。我读了史料,写了文章,拿给艾、何二位去看。他们看了,并且都说出了自己的意见。记得艾的话是,“每当我们要去驳倒对方一种意见时,切不可草草从事,要考虑我们一方的论据,使之审慎又审慎,周详又周详。我们要立于不败之地。”何的跋语大体是,拓跋族有公社。这种公社,在拓跋族由游牧转向农业化的时候,它靠拢封建

制比靠拢奴隶制更来得自然些。他从社会发展史的理论角度,认可我关于中国北魏社会由原始末期直接向封建跃进的见解。他们都长于我 10 岁甚至更多,但当时是以同辈人对待我的;可是既受了教诲,那么,我也就顺理成章地把他二位给我的影响写进“师承”一章中来了。“文化革命”后期,我曾在大明湖边邂逅一位人民大学的中年教师,他告诉我何干之同志在北京郊区苏家坨公社沙涧大队劳动时,因心肌梗塞突然发作,撂下手中的铁掀,躺在公路上就死去了。呜呼……



## 第四章 研究重点（一）

我平生第一个研究重点，应该是“中国农民战争史”。

这要回溯到 1956 年春天，在青岛的山东大学。我当时 26 岁（虚龄 27），已经是从“而立”向“不惑”迈进的年龄了。

事情要从山大历史系说起。1955 年秋开国，开国后三年之内，这个历史系以健全“基础课”为主要事项。所谓“基础课”，主要指“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中国通史”分段，先秦段由童书业、韩连琪交替担任；两汉段由张维华、卢南桥交替担任；南北朝隋唐王仲荦一人担任；两宋段由后来参加的华山担任；清代加近代史由郑鹤声、孙思白交替担任；而黄云眉和我交替担任“明史”部分。当时教师每人要担三门课，我之所以在通史课中任务较轻，主要因为我在“马列主义教研组”中任课较多，如《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以及《马列主义史学名著选读》等等。这些课的讲授，在“边教边学”的过程中，也曾大大地锻炼了我自己的理论水平，使我在讲《明史》时，试验了“以论带史”的新方法。

到 1956 年春天，大家商议要开“专门化”课了，“专门化”课怎么开？当时很费了一点讨论。各大学，似乎各有各的开法。北大，以“断代史”作专门，如某老师专精“宋史”，那么他就在基础课“宋朝段”之后，再以深入研究的水平开“宋史专门化”。山大当时以不守旧、趋时著名。大家不同意开断代。当时，“五朵金花”正在盛开。什么是“五朵金花”？八九十年代的青年，怕很多已不太清楚

了。原来，顺应马列主义的学习和“学习苏联”的号召，中国史学界自然地对古史分期问题（即奴隶制与封建制衔接的问题）、农民战争问题、土地所有制问题（即中国究竟以土地国有占主导抑或以土地私有占主导的问题）、民族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即封建社会开始瓦解的情况），展开的讨论较多，发表的文章也较多。历史学中若干其他问题，客观上看来似乎是一时遭到了某种冷落。于是向达先生就说了史坛上只开“五朵金花”这样一种似乎是牢骚的议论，~~猿年~~他划右派，这一条也是定性的“根据”之一。山大对这些“金花”是十分热衷的，于是经讨论确定，开三门“专门化”课，（员）“中国土地制度史”，由张维华担任；（圆）“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由童书业担任；（猿）“中国农民战争史”，由我担任。三门课中，除“手工业商业发展史”要等“土地制度史”开完接着开之外，其余两门须于~~猿年~~暑后开学时搬上讲台。——以上，就是我和农民战争史产生机缘的开始了。

我本人当时对农民战争史有什么看法？过多少年后又有什么反思？这是应当写一写的。当时，我对这一门课任务的接受，是既无特别热烈的迎接感情，也无丝毫的抵触情绪。我常说一句话，“人没有后眼”；有时连“前眼”也缺乏。所谓“后眼”是指~~猿年~~毛主席的《杭州谈话》，说：“哪里有妥协让步？只有反攻倒算”。这个话是在距~~猿年~~~~猿年~~后“内部”发表的。假如我能在~~猿年~~前以感知这一信息，那么我当时就把这个教学任务婉言逊谢了。婉言逊谢也不犯错误。但更令人追悔和深思的，是连“前眼”也不曾警惕。当时，被郭沫若先生所谓“为民立极”的宝书四卷已经普及全国了，其中第二卷《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篇中，就有着“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这一段话。假如当年我具有这样的觉悟，即认识到这个话既有其正面的指导作用，又有不一定恰如其分的估量，从而给农民战争史会带来一些消极作用的话，那么我也会将这一教学

任务逊谢了的。但是说来可怜,当时既乏“前眼”,更无“后眼”,只好带着一股幼稚和盲从,在自己的讲稿和论文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真正动力”的语言和实质。直到 1981 年,在农民战争史学会的成立大会上,人们才觉悟到好长一段时间中对农民战争在历史上的作用是“过高地估计”了。在这个“过高地估计”当中,也有我的一份,也不可能没有我的一份。到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往往在“牛棚”里半夜被喊醒,说广播中又有“最高指示”要宣布了,每人要立刻记下来并背过,天亮时谁背不过要在过道里罚站,或者不准吃早饭。“真正动力”和“只有反攻倒算”也是“最高指示”嘛,这就给农民战争史带来若干若干的麻烦。只有等到拨乱反正后第一次史学代表大会上,胡乔木同志才根据“四人帮”史学的教训,说了“政治不要当指挥棒,史学研究假如总是跟着指挥棒团团转的话,那不仅害了史学研究,也害了政治”。可惜这个话说得太晚了,以我和我的农民战争史研究而言,已经“团团转”了 15 有余年了。

以上说的,是“指导思想”,现在该说说“具体措施”了。

我首先要求领导将我妻高昭一从校外单位调进来,专业地帮助我开出《农民战争史》。当时家里五个孩子,老大初中已快毕业,老二刚进初中,老三上小学,儿子在幼儿园,倒数第二的女孩刚刚出生,由保姆护理。我们的“夫妻小店”,就从这里开始,一开开了一辈子。关于农民战争,脑子里自然已经有个轮廓,知道最大规模的在“正史”中立有专传。虽然从封建统治的立场出发,不免要加上“逆贼”、“流贼”等称号;次大规模的在“正史”中往往写入其作为镇压者的将领们的传中;再其次,就要到角角落落的地方去寻找,“五行志”里会有一点,“灾祥志”里也会有一点,最后,往往有些极宝贵的资料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埋藏在某文人的书札或诗词里,这就是最难寻找的一部分了。朱熹说:“为学如炖肉,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慢火温”。“正史”里的内容属于用猛火部分,集中精力像一阵风样子就可以掌握,那最后一部分不用慢火是不可能的了,

只能在日常的泛览中去“可遇不可即”。例如，明末山东诸城有个诗人叫丁耀亢，号野鹤，他的几种诗集都见过刻本，只一份叫做《出劫纪略》的仅见钞本，其中记载李自成军占领诸城时“以割富济贫之说，明示通衢”，这对治农民战争史的人说，简直是金刚钻式价值的材料了，因为它能证明明末农民大起义曾经实行过小规模的土地改革，已经触动过封建地主所有制的根本了。在此后的数年里，我们二人（特别是我妻）从泛览丛书里若干小品、杂品中“遇”到了不少的尖子材料。

光材料不行，还要考核辨析，因为在几种不同材料中有关年月、人名、地名（包括山川城镇）间，往往有歧异。歧异一般较小，有时也有很大的（歧异）。于是我们着手做两样东西：年表和地图。这是两样最低级的劳动，但经验证明，若干精辟的、高级的认识，又都是以这低级劳动成品为基础而产生出来的，因为年表是把事情发展在时间方面的纵向显示出来了，地图是把事情发展在空间方面的横向显示出来了。经线有了，纬线有了，就自然而然织成一具网子，用这网子你才可以捉到鱼（科研成果）。我们从农民战争史研究中印证了这点小小的平凡的经验，我在以后的讲课中不断地宣讲，许多同学照我们的话作了，他（她）们事后说，在他（她）的论文写作上济了不少的事。

科学研究从基础工作向高级深处发展，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不是谁的主观意志强加的结果，不是外力引发而是内在自发的。以农民战争史为例，在一桩桩一件件料理农民起义事件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感到还有些什么共同的东西，需要另作处理，这时候，科研工作本身就显示出要上升，要飞跃，要走向专题。在此后的几年里，我们发现了一些专题，其情况在这里加以简述。

我们发现的第一个专题，是农民的身份，即不同时代中农民身份间的差异。人类开始经营农耕时就不是个体的而是群体的，那叫原始农业公社。作为原始农业公社社员的农民，其身份基本上

是自由的,但也不能把这种自由绝对化,因为酋长还会在他们身上加一点隶属性。慢慢,血缘贵族出现以后,这种隶属性就从酋长加给的转化为贵族加给的,同时,这种隶属性在程度方面大大地加重了,性质也带有了阶级压迫的味道。郭沫若先生对这种隶属性做了超量的估计,把这种身份的农民叫做“农业奴隶”。伴随着《中国史稿》第 1 卷的推广,这种看法在大学生中一度产生影响。然而不论如何,这种负荷有一定隶属性的公社农民,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身份的第一个模型。到战国时,跟着商业货币的发展,井田废弛了,血缘贵族崩溃了,在这之后一个极短时间内,出现过个体小农。用鸟来比喻,这时的小农是从第一个笼子飞出来,一时还未被捉进第二个笼子里去。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战国和西汉初、以及公元 5 世纪至 10 世纪北宋初,曾经比较大量地出现过这种身份的农民,我们把它看作是第二个模型。这种农民,正如恩格斯所说,他们有富裕的自由,也有贫困的自由,所以在西汉就有流民自卖为奴婢的事。这种债务奴隶性质的农民,由于数量不是最多、在历史上不是时间很久,因此我们不把他们看做第三个模型。东汉、魏晋以后至于隋唐,世家大族(庄园地主)把农民世代代锢闭并荫蔽在他们的庄园里,给他们身上加上越来越重的封建隶属性,使其身份大体与中世纪欧洲的农奴有某些相似,这构成中国历史上农民身份的第三个模型。“两税法”实施以后,商业货币经济比前一度更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它自身的后期,农民身份复杂化,正如土地改革中划的成分那样,有雇农(农村无产者)、贫农、中农(个体农民)、富农(手工业原料及商业的兼营者)。这四种身份并存的情况,成为第四个模型。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这些呢?那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历次农民起义所表现出来的,起义规模的大小,战斗力的强弱,坚持时间的长短,其内部凝聚力的大小,都与其参加农民的身份有关。在第一个模型时期,农民被锢闭在分散的公社里,不大可能有较大的聚众

起义。在第二个模型时期,才可能出现陈胜、吴广和赤眉、绿林、铜马那样的起义。在第三个模型时期,农民被锢闭在地主庄园里,又不可能有大规模的起义,瓦岗寨算是最大规模的了。只有在第四个模型时期,才出现从黄巢到李自成、张献忠到白莲教的大起义。农民战争,由于农民身份方面的差异和变化,而形成了各自的特点。集中表现了这方面心得体会的,是我灵隐元年写的一篇文章《靖康、建炎间若干农民武装力量性质的分析》,刊在《文史哲》上,后收入《寄陇居论文集》中。这篇文章,曾受到日本广岛大学一位先生的好评,他的文章刊在其学报上。这篇文章之具有说服力,就在于它具体分析了不同起义集团中农民成分及其聚合力的不同。

我们发现的第二个专题,是起义和国家机器间的关系。这是两个互相对立、互相冲击的力量。起义是一种近代以前的革命,是一种暴力行动,而国家则是统治的机器,它要求稳定,而起义却要把它“砸个稀巴烂”,所以国家机器的代表者就要进行血淋淋的镇压。

因此,我们就有必要分析,作为互相对立、互相冲击的两方,各有什么优越条件和不利条件,这两种条件又怎样在消长。国家机器方面的有利条件不外是,掌握的财富多,兵多,武器比较精良,有传统意识为它们服务。其不利条件是官僚机器腐朽,官吏贪污腐化,等等。起义方面的有利条件是,革命意识高涨,群众力量巨大,有形成一个更好的政治局面的愿望。其不利条件是,武器装备较差,军事训练较差,群众中容易形成分散,首领中间更容易形成不团结和分裂。哪一方能更好地发扬自己的优势并有效地克服自己的劣势,往往哪一方就能取得胜利。

但胜败虽然是战争中一桩重要的事,而更重要的是战争的后果。于是,一大堆问题说法跟着来了:在经过了农民战争的打击教训后,统治者有没有改良?或者反而会变本加厉?假如起义者本身建立了政权,这种新的政权跟被打倒的旧政权之间有多大差别?

能不能叫“农民政权”？或者只不过是新的“皇权主义”？后来，人们就沿着这些问题研究下去，后来几乎每个分支都成了一个热门。

我们发现的第三个专题，是农民起义与多民族关系间的关系。中国从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就以历史上来说，匈奴、羌、鲜卑、吐蕃、回鹘、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这是荦荦大者，小的就更多了。在中原的主干民族，是汉人；少数民族多在边远，或自疆界以外进来。中原方面有大天下，大气候；周边方面，各自有其小天下，小气候。一旦大天下方面气候有变，自必牵及小天下和小气候。这中间的关系，有时是十分复杂的。一般的情况，周边的头人和中原的统治者关系较深，而周边的人民往往同情起义。但有时又恰恰相反。但不论如何，中原的动荡对周边说，总是一种带动，启发他们生产力和文化能力的提高以及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的调整。

我们发现的第四个专题，是宗教在起义中所起的作用。农民起义，是近代革命以前的一种革命，要革命就需要力量，要力量就需要信仰。在已经科学化了的近代，革命信仰表现为主义；在主义还没有条件形成以前，信仰的力量往往需要从宗教中去吸取。宗教中有神秘主义的教旨，其中虽然科学成分不足，但其原始的鼓动性则是很大的。另外，有些宗教的教旨中本身包含了光明和黑暗、善和恶、神圣和邪魔、富贵和贫贱的转化，农民起义使用这些意思是非常现成的。再还有一层，宗教在阶级社会中存在的久了，往往形成为上层宗教与下层宗教的分裂。上层宗教专为统治者的方便而说教，从而得到统治者的宠爱；下层宗教带人民性，经常会遭到统治者的镇压，从而转入地下，成为秘密宗教，设置了若干咒语、仪式和戒律，这些也往往是农民起义所需要的。在没有政党之前，宗教的某些机能起着一种组织的作用。当然，宗教有宗教本身的很多局限，这些局限会给起义带来损失。从历史上，大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越古老、越科学不昌明的时候，越需要宗教；但也有

相反背的情况 ,即时代已经有一定的开化和明朗了 ,但跟着来的是统治者的镇压也更残酷了 ,于是对秘密宗教的需要又急迫起来。如清光绪年间 ,山东潍县一场不大的农民起义被镇压了 ,其 30 岁的女领袖刘金妮毫无畏惧地走上刑场 ,口中不断念诵白莲教咒语 “真空家乡 ,无生父母 ” ,观者都惊成疾病 ,即一佳例。

当然还会有第五、第六个专题。这些专题的次第展开 ,自然而然就大大丰富了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内容 ,并且也极其鲜明地显示了科学研究的综合特点。试看 ,仅以上四个专题的结合来说 ,古史分期问题的内容结合进来了 ,民族学和民族史的内容结合进来了 ,宗教学和宗教史的内容结合进来了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上层建筑学说诸内容结合进来了 ,阶级分析法可以充分地使用进来了 …… 一切的学术事业 ,大体都是缘着这么一条大同小异的道路积累起来的。

我平生第二个研究重点 ,应该是 “中国土地制度史 ”。

有人会问 :你的农民战争史研究不是正 “方兴未艾 ” ,热气腾腾的吗 ? 怎么又转到土地制度史上来了呢 ? 这其中 ,原因很复杂。

第一 ,是政治的原因 ,换言之 ,即我被划为右派。我的右派问题 ,虽经 1957 年山东省委的决议 ,已彻底改正了 ;但在改正之前 ,情况仍然是严峻的。1957~1958 整整 2 年嘛。在这 2 年悠长的岁月中 ,我失掉了登上讲台的权利 ,也失掉了发表文章的权利。当时的情况大体是 ,我写了一篇什么文章寄出去 ,收稿的编辑部例须发函到写稿人原单位 ,复函很简单 , “该人系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右派分子 ” ,于是一切告吹。第二 ,即便在学术上 ,我也丝毫无能为力。只举一例已足证明问题了。1956 年由史绍宾这个化名主编的《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出版) ,从其中可以看出很多问题。 “史绍宾 ” 者 ,史学界之哨兵也 ,火药味已很浓。再看书的内容 ,我个人连构成为批判对象的资格都没有了 ,由我的第一号弟子孙祚民代替我成为被批判对象 ,而实际上他与我是很



不一样的(最近得知,他已故世了)。第三,从逻辑推理上,我们只要翻开这部《讨论集》略微读一读,即便最不敏感的人也会嗅到,一股演绎法铺天盖地,大体说,毛主席教导说,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而某某不曾严格地这样说,所以某某是反动的。试设想一下,在这种情势下,对中国农民战争史怎么能继续研究下去呢。第四,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又在《杭州谈话》中表扬了我的第二号弟子孙达人,说“哪里有妥协让步?只有反攻倒算”。而我本人,则是一贯主张,统治者既有反攻倒算,也有自我调整的。而自我调整的频率又显较反攻倒算为多。可是在当时,我有七个头、八个胆,敢跟毛主席唱反调吗?

而我转移到土地制度史上来,也有我自己的原因。

最主要原因,是我看到了 缘园年代人们探讨土地所有制问题时的漏洞。恕我冒昧,缘园年代某些学者,从今天看来,真是太喜欢写文章了,洋洋洒洒,动辄一二万言,但不说明问题,不解决问题,满篇左倾思潮、教条主义,故作高深,形而上学,食古不化。这个问题,起初是由侯外庐、贺昌群两先生引起来的。他二人从中古均田制出发,说国家所有制占主导。但他二人忘记,他们提出此问题的当代现实是什么。当代现实是把阶级斗争强调到近乎绝对化的程度,地主是万恶之源,怎么不强调地主所有制,反而强调国家所有制呢?固然地说,封建国家是地主的代表者,但那究竟是第二义的了。于是,有人跳出来跟他们辩论,谴责这个提法不曾把问题提到最根本的焦点上来。

在我看来,人们对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解,一直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首先,人们把“五种生产方式”看作是绝对的(一度有人说,谁反对“五种生产方式”谁就是反对马列主义,就是反党)。于是产生了把“亚细亚生产方式”怎样安排的问题,安排在原始社会?抑或安排在两种生产方式之间?于是乎产生了什么第六种生产方式的说法,这在苏联联系“托派”政治问题,曾惹过轩然大波。

根据我的理解,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是指公有制在私有制社会(阶级社会)中的遗存。单就这个观点,就是若干形而上学观点的人所不能接受的人。他们说,公有制就是公有制,私有制就是私有制。他们连赵孟頫夫妇所说:“你身中有我,我身中有你”的道理都不明白,都不肯接受。实际的情况是,在人类公有制阶段中,私有制的萌芽早就存在了,而在私有制阶段中,公有制的经济形式一直有遗存。农村公社这件事彰明昭著,我们暂且不去说它,就就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大量出现的“计口授田”吧,这是什么所有制,就值得研究。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往往是极其寻常而又普遍的;在国家边远地带,有许多土地是长年抛荒的,从传统的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看来,这是国家的,但国家从来不管。慢慢,一些流民流徙来了,耕种起这些土地。自然,把这些“生田”垦种成“熟田”,是要花祖孙几代的辛勤劳动的。可是,在这期间,国家的职员跑来了,说要纳国税。国税,自然是一种剥削;但与地主的私租比较起来还是轻得多的,所以劳动者也就接受了。于是问题便产生了,这是土地私有制吗?显然不是。是土地公有制吗?显然也不是。是国有制吗?可以这么说,但仅只是外皮。其实质是什么呢?是披着“国有”外皮,执行着“轻徭薄赋”的一种原始共耕在阶级社会中的遗存。这是处在私有制阶段中的一种打了折扣的公有制。根据我的理解,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遗存的形式之一种。这种现象告诉我,当时无论什么私有制或国有制都不成熟。都不是纯粹而又纯粹、笔直而又笔直的。

这就有力地启发我,私有制和公有制都不是铁板一块。公有制有公有制的发展历程,这个历程,比较难于全程掌握,因为它中途被私有制所否定,而在将来还有一个“否定之否定”,即私有制被“扬弃”的时候。什么是“扬弃”?这中间有个笑话。抗日战争初期有位晋察冀的民主县长出布告说,“本县长扬弃一切官僚习气”。这是滥用名词,不懂装懂。“扬弃”,德语曰“奥夫海变”,其中带有

辩证意味，即既有“抛弃”的涵义，又有“保留其合理部分”的涵义。官僚习气有何保留之余地？故流为笑谈。言归正传，这私有制有朝一日被扬弃的说法，伴随着帝国主义垂死性的理解，在当年确实构成我们若干青年人的坚定不移的憧憬。但以二战以后情况作参考，仿佛代表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在那里自我修补，而反映公有制的不少国家则呈现滑坡，那么，将来的“扬弃”会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呢？这问题怕一时不容易说清楚了。

私有制有私有制的发展历程，这个历程，只要我们极尽努力，似乎还有可能说说清楚。但有一层障碍必须扫清，即近 猿年 的史学著作中，总把私有制一开始到其成熟，描写作是同等的凶恶。这是非常不符合历史主义的。必须指出：私有制有其自身的浅化阶段和深化阶段。什么是浅化的私有？什么是深化的私有？举例说明。原始墓葬中女酋长（酋长夫人）把贝壳系成项链跟死者殉葬，有时还附加少量的生产工具如石刀之类，这些可以被视作私有的萌芽，最浅化的私有制。而像一部墨西哥影片《玫瑰庄园》中所描写的，这处庄园的所有权完全由庄园主的意志所支配，无论美国资本家想什么办法想买下这座庄园他都不卖，最后只好采用以毒药毒死这位私有主，庄园的所有权才有可能转移。这就是深化的私有制。从浅化到深化，是一个遥遥的历程，这是 缘年代探讨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的先生们所不理解的，或者是理解不深的。

我是如何得到启发的呢？在这里我要说，“以论带史”这个提法并没有错。别有用心的的人，无端将“带”字篡改为“代”，那自然是荒谬的。但“带”，并没有错，特别在习染于琐节考据而不能自拔的人，用理论带一带并没有什么坏处。例如我，从阅读《费尔巴哈论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段中，才懂得了所有制衍变发展的全史。国家所有制在前，而私人所有制在后，这是我明白的第一点。国有制由部落所有制而来，而且在这个衍变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两点局限，即第一，属于私人的只有“占有”，它的涵义远较“所有”的全义

为浅,第二,即使占有,也主要指“不动产”(土地)而言,至于“动产”,还处在法律未予明确处置的地步。这是我明白的第二点。等到动产、不动产都成为纯粹的私有财产的时候,那已经进入“现代资本主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人”对于“物”具有绝对的支配权力,包括使用它、滥用它,甚至毁灭它。这是我明白的第三点。

那么让我们来对照我们中国的历史,那种纯粹的私有财产,那种可以任意使用、滥用、甚至毁灭的权力,在社会公认的情况下,在鸦片战争甚至土地改革以前,怕是一直不曾出现过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中国一直带有“亚细亚”色彩的原因。至于为什么这样呢?我也从上述经典著作中得到启示。现代资本主义的纯粹的私有制之出现,需要两个前提,一是古老共同体(即公社)从实质到形式,统统被抛弃了;二是国家对私有财产的任何影响,都已消除。那么,对照中国历史,我们可以说,至少在鸦片战争之前,有的甚至在土地改革以前,共同体形式并未被抛弃净尽,有时看起来净尽了又会在废墟上重新生长起来;专制主义国家权力的影响也压根儿未被消除,一两千年的历史表现出国家权力影响的时弱时强,试观以宋代干预财产力量相对最弱的年代,尚有太监杨戩的接替人李彦在临汝、鲁山一带把反映地主不动产私有制的券契横行焚烧,使地主在一瞬间变为国家佃农的事情(见《宋史》卷四六八,列传二二七)。

上述两点,虽然不曾在旧时代中国历史上大量出现过,但我们把这种理论遗产,翻过来就是方法。从此我立志,要在中国经济史的每一个关节上悉心检查,看共同体形式抛弃了还是未曾抛弃?抛弃净尽了还是未曾净尽?还要看国家权力的影响消除了还是未曾消除?什么情况下弱一点,什么情况下又强化起来?我发现,照这两条检查下去,周代半公社所有制的井田制度可以得到解释,魏晋南北朝的半国家所有制的均田制度也可以得到解释,宋和宋以后的地主(相对)土地所有制也可以得到解释。我就是沿着这么一

条线索，才写出我的《中国土地制度史论要》来的。

我自己认为，这个才 80 万字、附在拙著《中国土地制度史（讲稿）》之前的小著作，是可以代表我的作品之一。之所以有代表性，是因为在这个作品中，把我个人从马克思著作中体会出来的私有制由浅化向深化、而古老共同体和国家权力则在这由浅化向深化的发展中担任阻力的这些认识、这些思想，反映出来并结合史料写在一本小书里。当时我 35 岁（虚龄 37 岁）。就在当时，我已经摸到我自己的这一著作的不足之处了。不足之处在哪里呢？一个工作，要沿着两个互相反背方向各工作一道，成果才会逐渐臻于圆满，臻于成熟。而我却只沿着一个方向工作过了，另一个方向尚未动手。我说的两个方向，是指“以论带史”和“论从史出”。二者合拢一起就是“史论结合”。如上文已叙述过的，“以论带史”方向的工作已经做过了。在这里，再说说“论从史出”这个方向。有人很强调这方面，说只有史料里抽绎出来的，才成为理论，至于当代的若干政治理论与哲学，则如胡适所说，只是“大思想家的大假设”而已。这些显然属于谬误。但从“理论”出发和从“史（料）”出发，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出发点，相应地，其效果也各不同。我应该在结束了从“论”出发之后，再做一道从“史”出来的工序，即基本上抛开理论的影响，带着一副似乎是空白的头脑，重新回到经济史料的海洋中去，泛滥于其中，涵泳于其中，说不定会遭遇到前一工序中理论所不曾启发到的若干新点，说不定会遭遇到足以纠正前一工序中若干失误或不足之处。做完这一工序，再回过头来写一本新东西，那将与目前这本 80 万字小册不大一样了。可是我想到，自己已经六十五六岁，精力渐衰，并且这还不是最主导的原因，更主导原因下段就写。这样，我这从事了十六七年的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工作，事实上就从此暂告一段落了。

仿佛《后汉书·马援传》中有这么一句话，“伏波类西域贾胡，至一处辄止。”这是耿氏叔侄议论马援的一句话。我们对此，不妨

有两层理解。第一，是说马援在对“五溪蛮”的军事进攻中不肯锐意奋力进兵，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第二，用“西域贾胡”取譬，是说西域商人做买卖的方式，到哪里停留一阵，再到哪里又停留一阵。我说这些干什么呢？我是说，我的做学问，有点像西域贾胡做买卖，“至一处辄止”。这个特点，有很大的弊病，这我不是不知道，但我坚持了一辈子，为此蒙受了若干“京派”、“考据派”的冷讽热嘲。我的平生好友童书业常常说，做学问要有个“老营盘”。而我现已垂垂老矣，还自己报不出个“老营盘”来。我考虑过这个问题，想出来几条原因。其一，原本我就不是个学历史的，学历史是“跳槽”过来的，我从小喜欢浪漫主义文学，所以一生不愿被枯燥的史料捆绑住。当我读到说某位学者缘年间从头到尾把《廿四史》读过三遍时，我的即刻反映不是钦佩和仰慕，而是认为大可不必。其二，我从一接触史学近著起，就憎恨琐节考据。我看到有人考证了个“拐子马”，就沾沾自喜的了不得；有人考证了一个浙江士子中的败类谢三宾，就有人出来捧上天；有的老师教给学生考证某人之卒年究在某年之十二月抑在次年之正月。我常说，我宁去死，也不做这些“史学工作”，这没有办法。其三，最重要的一点是，我的最终宿营地，怕还是哲学。我爱思维。纵观我的一生，由文学而历史，由历史而哲学，历史学到头来不过是一个过渡、一个跳板。让那些琐节考证的史学家去笑骂吧，我并不是你们那里的长驻客，正像鲁迅《野草·过客》中所说的：“我还得走。”“一个声音在呼唤我。”……

## 第五章 研究重点 (二)

我平生第三个研究重点,应该是文化史,这是个晚年的项目。正如好端端地从“农民战争史”转移到“土地制度史”一样,为什么又从“土地制度史”转移到“文化史”来了呢?如上文已曾说过的,第一个转移是为了回避政治指挥棒“只有反攻倒算”不得已而作出来的,第二个转变的动因,则是由于一种“自我逆反”。关于这一点说起来话长,需要慢慢细说。

所谓“逆反”,1960年代人们使用的词是“反动”。作用和反作用,正动和反动,是相互对待的物理学名词和概念。可是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反动”一词用得太多,并且成为政治的专用定语,所以我就换用了“逆反”。那么,你“逆反”什么呢?

多少年来,我一直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书和政治经济学书,也讲过不少这两个方面的课,可是到1958年前后,我在思想深处不自觉地产生出“逆反”的心态。大体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关于宇宙规律性。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心里这么想,在教室也这么讲:宇宙是有规律的,只有一时还未认识到的规律。可是经过“逆反”,我想非规律性的现象恐怕也是有的吧,恐怕也不少吧。假如过分强调了规律性和必然性,就很容易造成在非规律性场合和偶然性堆积上,也要勉强寻找、甚至制造出规律性和必然性来。教条主义泛滥,很多情况下是这么产生的。于是我想,要承认偶然性和它的作用,要承认宇宙间有一部分是未必合乎规律的。

第二个方面是关于经济基础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

的，它是一切政治现象和意识现象的决定者，至少是约制者。在土地制度史的二三十年里，我深深信仰着这个观念，试看在我写的文章和书里，一遍又一遍多次地重复着“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这来自经典的词句，足以反映我在思想上对之信赖的诚挚。可是在这方面，“逆反”也来了。我想，经济的力量就那么大吗？人们意志的力量就那么小吗？我们不能把经济看成那么硬梆梆、死巴巴的东西，我们也不能把活泼泼的人们的意识看成是那么“无能为力”的东西。可是，五六十年来我们为什么会是这样了呢？

我想，这和政治有关。试想，自十月革命以来，有了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和无产阶级专政，政治自必要求思想为它服务，所以在苏联历来讲哲学的教科书里，就一直在宣讲哲学的党性，并且很强调这一点。这一强调，自然而然在宇宙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造成分裂，不惜过分强调必然性而排斥偶然性；在经济和意识之间造成分裂，自然而然在人类社会的问题上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或约制作用，以及人们意识之处于“被约制”和“被决定”的态势。无疑，这是一种偏颇，一种向“左”倾向的偏颇。

于是，我的“逆反”便产生了。我想：人一辈子为什么老在搞一些硬梆梆、死巴巴的东西，或者总是在把一些并非多么硬梆梆、死巴巴的东西一定要弄得非常之硬梆梆、死巴巴的呢？有些人一生流连辞章，吟花咏月，也过了一辈子。我个人虽然决不能流连辞章，但搞一搞悠长历史上人们的思维，人们的意识，把它们既作为个别又作为总体，看取它们的作用，包括既受经济约制，又游离在约制之外的诡谲的活动，不是既饶有兴趣而且也完全有可能取得某些结果吗？

恰好在这时，大陆上出现了“文化热”。这是“四人帮”倒台和开始改革开放的直接后果。我迎接了这场“热”。我从来不是拿学术做政治投机的人（那样的人以我亲身经历过的，真已经累了），但我一直认为，结合一股潮流研究学问比自己关起门来研究学问，



动力要大得多。例如,五六十年代我所投身的农民战争和土地制度的研究,不也是借了“五朵金花”的动力吗?当年我们受“老大哥”影响而掀起的“五朵金花”大浪潮,不管其中有多少泥沙,多少粗暴和强辞夺理,事过几十年再看,它仍是替中国文化翻出许多新花来的。缘年代的“热”我迎接了,愿年代的“热”我也迎接,但在这两桩事中间又有区别,第一次迎接相当天真,相当幼稚;第二次迎接就比较老练些,“全盘西化”就接受不下来,到头来我还是非常之尊重传统的。我要看一看,中华文化中哪些东西能推动我们祖国前进。看起来,我距离《河殤》很远,距离“新儒学”稍稍近一点,但也不一样。

我分两步走。近的一步,我从明中叶的王阳明思想上溯到孟子,远的一步,我从先秦诸子百家上溯到《周易》。

我一直认为,在中国文化史上,我们很难定性某一思想家为唯物主义的,也很难定性某一思想家为唯心主义的。这种认识并不萌发自我,梁启超和熊十力早就阐发过类似的观点,熊的看法见于他写给科学院院长的一封信,自然这种陈述远远不会被考虑。给思想家剪一顶纸帽的办法来自苏联,到日丹诺夫尤甚。他把唯物唯心看作两条炮火连天的前哨。这是极“左”的典型。在中国就表现为由八位学者署名的思想史中,将王阳明定性为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家,还像“出大差”一样,由三个人来“陪绑”,计一蒋介石、二梁漱溟、三贺麟。其是不伦不类已达极度,政治和学术已经完全搅得分不开家了。

我并非王阳明的孝子贤孙。当我愿岁初读《明史·王守仁传》的时候,我曾简单地把她定性为屠戮起义人民和少数民族的刽子手。但后来读了他的《传习录》及其思想衍变历程,才懂得他是个了不起的思想家。在这里,不能不说远一点。中国社会,长期残存着“亚细亚”的特色,也就是说,阶级社会以前的共同体因素一直在阶级社会中局部地存留着。它保持着一些平均主义遗存和民主

主义遗存。这一情况的好处 ,是叫剥削者、专制者的“毒性”始终达不到最高度 ,但其缺点是叫社会渐近于“停滞” ,科学技术受不到大的推动力。于是形成“中”和“西”的相互反背 ,西方世界一力向“外”发挥 ,中国向外发挥各方面都有阻力 ,乃转而向“内”——即以追求人们主体的自我完善为主攻目标。王阳明在十五六世纪 ,正是这样做的代表。他讲的“知” ,不仅表明向完善的伦理道德追求 ,也向外界知识追求。怎么追求 ?在西方 ,通过发明显微镜、望远镜、光度表、热度表等等去追求 ;在中国没有这个条件 ,王阳明才只好提出“致良知” ,即使尽一切方法把自己内部藏得很深、能量很大的“知”力充分发挥出来。他讲人的内在知力原本是“灵明”的 ,使用出去是可以到处“充塞”的 ,只要“动”起来能量是很大的 ,只不过有“蔽”就是了。学习到这里 ,我立即结合现实 ,在教条主义充塞的海洋里 ,我们不正是急需王阳明牌的“去蔽”、“致良知”、求“吾心之灵明”去启迪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吗 ?到头来 ,这是一付极好的药剂。

王阳明思想的古老素材 ,取自孟轲。我对孟子的看法也有变化。小时候感到他是个哇喇哇喇的政治辩论家 ,像资本主义世界竞选的议员 ,连“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的话也说出来。慢慢 ,我的看法改变了。“孟子者 ,七篇止” ,前五篇确实有些粗糙 ,后两篇 ,特别是最后一篇 ,其中蕴藏着很多精度很高的思维。他从很寻常的事物中取譬喻 ,他讲水 ,讲山中之蹊径 ,讲深山中的野人 ,说人的完美是本身固有的性能 ,不是从外边哪里取 ,只看你去发扬它还是不发扬它 ;自己发扬出来的东西 ,才能像水一样潺潺地流个不尽 ,才能像山中的蹊径一样四通八达 ,不被茅草所堵塞。他说 ,自己耕的地是永远耕不完的。读着这些语录 ,我心里禁不住想 ,我们这一代被教条主义、被硬梆梆死巴巴东西塞得满腹满咽喉的人 ,是多么地需要这种清凉剂、清醒剂呀 !

从孟子到王阳明 ,这自然是一种偏。偏向“内”而未曾专门去

对付“外”。这与西方恰成对照。西方生产力发展不受阻，人们向“外”有广阔天地，所以自然科学、应用技术一日千里。可是他们对于“内”则不足。虽然到19世纪，韦伯（德·宰藻）说英国基督教新教有一种“新伦理”，崇尚勤勉和节俭，也算是一种向“内”的功夫吧，但无法与东方伦理（人的自我完善）相并比。总起来看，他们是一种偏，我们是一种偏，二者应该互补，也只能互补，在悠长历史段落中互补。说“互补”，就是说不能互相代替，不能把儒学硬搬到西方去，也不能要中国“全盘西化”。文化的融合需要更悠长的时间，跟军事征服完全不相同，它需要一个“雾露晕染”的过程。

我再往前追。孔子对“内”也很强调。他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见《论语·卫灵公》）。其实，老夫子这话只对了一半，他应该说：“人能弘道，道亦弘人”，就可得满分了。但无论如何，“人能弘道”一句，对千古之人发扬其主观能动性是一个极大的鼓励。这个精神贯下来，到《周易》的“象辞”里，就出现了“君子”这样这样、“君子”那样那样一连串的说话，其中当以《乾》《坤》二卦最富代表性，其象辞曰“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以厚德载物”。张岱年先生说，前一句表现积极进取，后一句表现宽容人道，是中华文化中最要紧的内容。最近有人，一力要把《易传》接到道家去，甚至连《中庸》也想拉过去。我开玩笑说，现在爆发了儒、道两家的争夺战，我也要参战了。我怎样参战？我准备说明，说《易传》是孔子之所亲著，虽有史迁的话作证，我还是不相信的，说《易传》是道家之作，我同样不相信。因为，不管《易传》中融入了多少道家、阴阳家的观念和辞藻，其根本精神是孔子的，从“人能弘道”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看，显然是一贯的。儒家强调“人”，道家强调“天”。《庄子·秋水篇》中说“无以人灭天”。我们敏感到孔子说“非道弘人”是针对道家说的，庄子说“无以人灭天”是针对儒家的。两家时时刻刻在针锋相对。

那么，研究这两家间的交错，就是研究先秦文化的主线了。怎

么个研究法？窃以为，从时间和空间这两个条件入手，是研究一切历史问题的无他选择的法门，这就像解析几何一定要先定 载轴和再轴两个坐标一样。我说时间，主要指公元前 远世纪、缘世纪、源世纪、猿世纪，哪件事、哪个人物、哪部作品、定在哪个框里，要弄清楚。这里要插进来说，疑古派把很多古文献的年代拉后了，也拉乱了一些，我们需要花费功夫。我说空间，主要指譬如这鲁地、齐地、宋、卫、陈、蔡地、楚地、三晋地和西秦地，等等，哪股思想是孕育在哪块地方，另一股思想又孕育在哪另一块地方，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要看取地域间的互串，在这方面有很多情况我们还看不透，说不准。举例来说，孔子晚年到卫、过宋、到陈蔡、接近楚，这中间在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什么作用？齐桓公时，陈完（文子）到齐国，在文化上又带了什么影响？道家源于宋国，也可以说是东楚，它怎么北上进入稷下学宫的？吴的季札、晋的赵武和叔向、齐的晏婴等人不断聘问诸国，除既有的一些文献记录之外，还可以找到些什么迹像？《周易》的封爻辞究竟在什么年代、什么地域、经由一个什么人、或者一组什么人编写出来的？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即便最大的学者也说不准，并且往往言人人殊。只有孔子弟子子夏去了西河，到魏文侯那里形成一个晋秦文化中心，对后来法家的兴起有作用，这一点比较能说清楚些。

在上段，我提到前 远世纪、缘世纪、源至 猿世纪，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说，公元前 远世纪，基本上是孔子年代（虽然孔子实际上在前 远世纪，只占了一半，在前 缘世纪还蝉联了二十几年）；公元前 源世纪是孟、庄的年代（虽然他们在前 猿世纪又蝉联了十多年）那么，公元前 缘世纪是怎样的年代呢？这就是我要抓的要害之所在了。在这个年代里，孔子的一页已经揭过去了；孟、庄的篇章还未揭开，这时，齐国的威、宣二王尚未登台，稷下学宫未开幕，慎到、田骈、宋钐、尹文、邹衍、鬼谷之徒，尚在帘内有待登场。我认为，这正是儒、道二家“雾露晕染”的时候，正是孔子之孙孔伋（子思）生

活的时候,也正是《道德经》、《中庸》、《易传》三个重要文献被炮制出世的时候。所以,《易传》、《中庸》虽为儒家基本经典,而其中又或多或少“晕染”了道家的辞汇,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它们是前缘世纪(特别是后半期)同时期的出品。有人引用了《伊文子》中有“归一者,简之至;准法者,易之极”等语,就说《系辞》“易简”出自尹文,出自黄老。殊不知尹文为齐宣王、湣王时人,上距子思之《中庸》、《易传》近一百年,如何一百年前之文为袭自一百年后之人?!且尹人所谈“易简”为行政执法之论;《系辞》所谈“易简”,属认识论范畴,二者全不相及。

以上,说的是孔子和孔子身后的事,那么孔子以前呢?从公元前 1000 世纪到前 500 世纪,这时候的资料主要是《诗》、《书》、《易》。所以我经常对学生说,《诗》、《书》、《易》三串联,就可以找到中华文化的源头。而这三者又不是平衡的。《尚书》只是条令;《诗》中有生动而丰富的民俗;《易》虽还不是哲学本身,但已经是哲学的胎胞了。而任何一种文化都要以哲学为其轴心的,所以《易》最重要,它牵及的历史段落也最长,“《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乎?”它的上限已经引伸到公元前 1000 世纪以前去了,那时候人们的理性思维还没有完全确立,原始思维还占有相当的比重。

《易》,是一颗很难砸的核桃。兼到了当代,不少社会上的人又把它拉回到卜筮的神秘方向去,这替找寻文化源头的事,又增添了不少麻烦。《易》本是自卜筮中来,但在发展中已经变成哲学了。它成了儒家和道家的有力的前行者。前行者对后来者会具有一种产生影响的可能。许地山曾说,僧道两家均出自《周易》,这话说的未免绝对化了。儒家不出自《周易》,只是孔子晚年一伸手把《易》接过去了,把它改造成为儒家的经典。道家和《易》的关系我一时还说不清楚,这主要是由于老子(老聃、李耳……)人物的模糊特点、《道德经》写成前的情况的模糊特点所召致的。单纯从“天人”关系看,道家与《周易》的血缘较之儒家当更为亲近些。

前面说了些有关《易传》的事，现在来说《易经》。“经”比“传”还难办。古人围绕着它说了一大堆名字，什么伏羲、神农、文王、周公、孔子，几乎第一流人物都挂上了。虽然我们一桩也不相信，但从其中应该认识到一点，阴阳两个符号的创立，将它们三叠而成，愿个卦形；然后将其两两相重而成，愿卦，每卦包含，愿个阴阳符号，形成，愿爻，共，愿个爻；爻又有初（一）、二、三、四、五、上（六）愿个位。这些事情都是自远古以来经历很长很长的岁月积累、很多很多智者心血的凝聚而形成的。这件事的意义极大，它不仅替社会上卜筮者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替中华文化、替中国的哲学和某几门科学下了一个模式。这非是了不起的人不能完成的功业，所以后代的人们将之无法归属，就挂到上列的“四圣”或“五圣”的名下去了。

这些竭尽心血的智者，虽然他们的事迹已无法钩稽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他们的思维、思维的路子跟我们有所不同。近代的科学思维、逻辑思维，他们肯定有了一些，但更多的还是原始思维。那种思维路数，我们已很少懂得了，就西汉时期人也只能勉强懂得一点点，小部分。须知，我们今天的这些科学思维、逻辑思维并不是很轻松形成的。它是包括西欧产业革命以来，包括培根的思维框框在内长期形成的。远古缺乏这些。远古人比拟的范围很广泛，受启示的范围也很广泛。甲事物与乙事物，在我们近代人看来压根儿比拟不到一块的，远古人也可以联想到一块。在《周易》里，这叫“取象”。在《小雅》里，这叫“起兴”。这是两种很类似的哲学行为和文学行为。据此，我曾判断《易》卦爻辞和《小雅》的写成年代相同，即公元前愿世纪。举例来说，狩猎的陷阱里今天有东西，明天没有东西；今天抓到一个大俘虏可是小俘虏跑了，明天抓到一个小俘虏可是大俘虏跑了；做贸易赚了就笑，明天折了就哭；公羊碰篱笆，第一次折了角，第二次夹在篱笆间出不来，进不去；小狐狸过河，第一次淹了脑袋，第二次淹了尾巴——所有这些，远古人都感到在启示着什么，象征着什么。于是著录下来，

留给后世的人去玄思。

当初立卦设爻的人,肯定是根据一种“象”的。但他们当初取象、立卦、设爻时的心态,我们后代人已经非常之隔膜了。这无可挽救。但西汉的易学家们不甘心,他们硬要按照他们汉朝人当时的心态和思维,替《周易》编制甚至臆造出非常烦琐的枝叶,在原有的神秘主义上增加了更多的神秘色彩。这就是“汉易”。到三国时王弼的手里,他似乎懂得了这种无可挽救的根底,乃决心“扫象不谈”。他这样做,并非由于一位仅只活了圆原岁的青年人的狂妄,而是由于他的聪明告诉他,再死死缠住“象”不放,对后世已经没有什么好处了。还是“义理”比“象数”的用处大。试想,唐、宋诸学者不能说学问不大,他们在搞《易》学上不追踪“汉易”,而走王弼的道路,这绝不是偶然的。只有清朝中叶及末叶的一些烦琐考据家和凿死铆的人,才又在一定程度上复兴了一点“汉易”。但也没有多少油水了。另外,广大的迷信工作者以及与迷信工作血缘相近的人,还在主张走部分“义理”部分“象数”的折衷道路。

我们说,“义理”的用处大、路子宽广;“象数”的用处小、路子已经不通了,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是说,近代社会更少是迷信,更多需要哲学,需要《易》中蕴蓄很深的古代辩证法。儒家精研人道,精研人的内在的自我完善,但在宇宙问题和辩证思维方面,相对不足,道家提倡天人之道,频繁地阐发对立的观念,但在人际关系和现实社会方面,采消极态度,办法不足。这两者通过什么来体现融合呢?是《周易》。试读公元前缘世纪写成的《易系辞传》,继善成性也有了,穷则变、变则通也有了,“三才”——天、人、地的跨在自然和社会之间的“三才之道”也有了,这不就综合起来了吗?向“内”和向“外”综合,是一种互补,儒家和道家的综合、天人之间的综合,又是一种互补。补来补去,中华文化不就日益壮大了吗。研究到这里,我感到自己对中华文化源流的探索终于摸到一点点影像了。自然这还远远不够,需要此后活一天学一天的继续努力。

## 附一 摇自摇传

我原名赵牲(读“莘”,《诗·大雅·桑柔》有“牲 麋鹿”之句),字俚生,以字行。1917年(民国六年)农历四月廿五日出生于山东省安邱县景芝镇东村。母亲郭氏,诸城人。这一带是苏东坡所说的“桑麻之野”。我十岁以前对“山”的认识是概念化的。我祖父和外祖父都是举人,都未上公车。祖父和父亲写欧和柳;外祖父写颜和苏,笔姿酣肥些。祖父在光绪朝做内阁中书,遗下一大堆日记,记载与端午桥(方)、王廉生(懿荣)、吴清卿(大澂)等收购青铜器、金石、字画的过程,除记价款外,还偶尔拓下铭文,有鸟形、人形以及两只兽眼,在我幼小头脑中留下对文物的浓厚兴趣。父亲是位破落诗人,不务家人生产,酷爱填词,不推崇苏、辛,独奉周美成(邦彦)为正宗。曾有《秋籁集》诗词四卷,未刊,稿已佚。

十岁在景芝镇小学毕业,家中无以维持生活,由母亲带领三个姐姐和我到青岛去谋生。住在西镇的贫民窟里。冬季风雪,手足成疮。姐姐在日商茂昌鸡蛋公司做工,把卵黄、卵白分开,冷冻出口。后来长姊以营养不良而死,另两个姐姐在英商英美烟草公司做工,装金鼠、炮台之类的小包和大包,达六七年之久。为了年终奖金,发高烧都不请假。我在三个工人的工资养育下,得在胶济铁路中学上了六年学。初中时,热心新文艺,终日读鲁迅的《呐喊》、《彷徨》,周作人的《雨天的书》、《自己的园地》、《译泻集》以及《爱的教育》、《文章作法》等书,致数学常不及格;高中发奋理工,大代



数、解析几何经常考一百。跟同学们组织了个文艺社,叫《浪花》,后来又出一副刊《浮世绘》,我在上面发表白话诗、散文、短篇小说和译品,当时已经开始使用笔名“冯夷”。

考大学。先考税务专门学校,理由很简单:两年毕业,月薪二百两银子。哪里知道,考取的都有宋子文、孔祥熙的介绍信。我这土包子,初试就刷掉了。再报北大、清华。谢谢上帝,考中了。在北大上了一星期,又艳羨清华的洋楼和优美的校园,从北大退学,重到清华报到,是第十级。学号:10012 两校都是外语系。上了大学以后,就自然而然地不像高中那样死用功了;用功是照旧的,但活得多了。不再考虑分数,“拿手枪”(清华用耘杂晕陨云五级计分,云的样子像手枪)也不在乎。对本系课,带有“英文英文,一笑一笑”的心理。记得诗人朱湘说过,你和谁有仇,就叫谁的儿子住清华外语系,因为这里害得死人。我有亲身感受。特别是那些叫人死背西洋作家生卒年月的洋老师,他们到底有多少学问,我怀疑。所以我经常听中文系、哲学系、心理系、社会系的课。闻一多先生的四门课(《诗经》、《楚辞》、《唐诗》、《古代神话》)我全听了,闻先生给一题目《上古帝王感生传说的分析》,是我生平第一篇(未发表的)考据论文。从此,我就把我自己向“综合修养”或者叫“杂家”的路子上带,并且终生对此毫无悔意。

我在大学只上了三年,并未毕业。缘故是第一,体育都不及格,马约翰老师最讨厌我,因为我连个最简单的跟头都翻不过。第二,军训都不及格,而且还假造理由避开了以何基澧先生为训练长的在西苑的集训。不争取毕业的又一个缘故,用十年动乱中“小将”的语句说,是“该人早年投机革命”。“一二·九”的五次游行,我全参加了,而且掌过门旗,我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民族解放先锋队”,还当过清华文学会的主席,编过《清华周刊》和《副刊》。由于活动多,上课就少。法语女老师用英语对我说,“我当你死了呢,你还活着来上课呀!”我一气到“注册课”把法语课退了。

我功课成绩虽坏,但学的东西不少,大部分是自学的。家庭贫穷,只好靠稿费维持,于是拚命译东西。感谢毕树棠前辈的提携,他给我从图书馆西文部优先借到杂志的方便,我从《莫斯科新闻报》、《国际文学》、美国《新群众》以及《伦敦水星》、《读者文摘》上翻译一些文章,投寄《大公报》、《益世报》、《时事类编》上发表,有时一篇长文可以拿到近百元大洋,足够半年的伙食钱。这时,也学习做“索引”(又名“引得”),记得做过 ~~灵源~~ ~~灵源~~ 两年西洋杂志论文摘要,博得张申府老师对我的赞赏。芦沟桥事件爆发前后,我用一个暑假的功夫,一口气译完了一部 ~~四~~ 万字的苏联小说《孤独》,将译稿挂号寄沈雁冰先生,自己就到太原参加抗战去了。

在山西,我呆了约两年半。开始在太原国民师范接受牺盟会的军政训练,后来分配到离石,在第二战区战地总动员会工作。不久,日军进逼,我们就在离石、碛口、军渡三角地带打游击,曾写过一篇报告文学《在王老婆山上》,刊在胡风主编的《七月》。后来渡河,从陕北辗转 to 晋南,在夏县人民武装自卫队当连指导员,后来部队改编为第二战区政治保卫队,我任营教导员。这几年的实际锻炼,对我也有极大的好处。晋东南、东北、西北、西南四块地区,全用脚掌走到了,对民间疾苦和山川风物有了感性认识,老来翻读方志之书,每到三晋,即倍感亲切。正如顾炎武所说,不仅琐琐于典籍文字之间,而是稽之于道里徒步之下。

之后,在日军投降前后,我有八年时光,在陕西关中地区当中学教员。事情是这样的,我在中条山患了恶性疟疾,被送到西安广仁医院救治,恰逢山西新、旧军冲突,很不容易找到原部队了。我教的学校,计有乾州中学、西安高中、扶轮中学和雍兴工业职业学校。所教课门是英文,也兼教国文和历史。这八年中,所教课程繁重,生活艰苦,待遇菲薄,但生活安定了,可以用点功。于是我抽教课之暇,进行史学的学习和锻炼。我试写了一篇《清初山、陕学者交游事迹考》, ~~灵源~~ 年在《大公报·文史周刊》上刊出,这是我的第

一篇发表的论文。蒙胡适之先生来信鼓励。继之,我又写了《王山史年谱》和《张蒿庵年谱》(两稿均未问世)。当时,我泛览关中之书,逐渐览及中州之书。这两个地区的学者,以理学名儒居多,也偶有考据词章之士,所以我开始是从“思想史”进入史学阵地的。猿岁,我在傅孟真先生向姚从吾先生推荐下,第一次踏进高等院校——河南大学当副教授,教的就是“明清思想史”。嵇文甫先生在这一方面给了我很大很多的鼓励。叶圣陶先生也不断为我介绍文章在上海的刊物上刊出。

开封解放了,我得以重返解放区,迤迤自中原来到华北,在正定的华北大学第四部(研究部)当研究员。我最尊敬艾思奇、何干之二同志,每逢有所写作(如《北魏史》的研究论文),必捧呈请教,他二位也都给予指点,特别在理论辨析上,给我的教诲最多。从这时起,我才慢慢懂得了拿“史”和“论”相结合,二者中不可有一偏废。当然,要结合得很好,那是艰难的。不久,济南解放,我被派去工作,工作之暇,我又去向原山东图书馆馆长王献唐先生殷勤请教。清朝乾、嘉之学的成果,我就是在王先生的多次言谈中领会了的,而且单纯领会不成,还要自己一一复查,把某版本、某笺注、某字句、某器铭款识,一一亲自核实。这一阶段,我对郭老《两周金文辞大系》一书用功甚勤,以《积古斋》、《倚觚室》、《攈古录》、《愆斋》诸器铭款志的诠释为辅佐,一器一器核读下去,收益匪浅。同时也泛览了章太炎、刘申叔二家之作,受到启发极大。在开封住了一年,我感到自己的“宋学”(理学)水平有所提高;在正定住了半年,我感到自己的马列理论水平有所提高;在济南住了一年,我感到自己的“汉学”(文献、考据)水平有所提高。当时猿岁出头,“风华正茂”,遇到理想的老师,就如鲸之吸水,巨饮狂吞,而自己的肢体也就在不知不觉中日益壮大。试想:这段自学经历,不就等于住了一次研究生班,或者读了某种没有名称的学位吗?要善于找老师,更要善于向老师学习,这一点,对后辈青年可能是有启发的。旧时

代,很讲究学术渊源、师承,只有“四人帮”才叫后辈打倒前辈,还要再踏一只脚。以我个人的这点小经历来验证,没有上述诸前辈的教导、奖掖和提携,连目前这点可怜的成就都是不可能的。

从此以后,祖国解放,人民共和国建立,我个人的经历也就正常、平淡得多了:一直当教师。由东北师大而山大,由山大而兰州大学。朋友们在读到这里时,提意见说,此后就缺乏了“生活的足迹”。可是我想,譬如胳膊上生过一个疮,现在统统好了,再提如何发烧,如何流脓,对己对人,都无好处和必要。故此处用了省笔。我平生对教课极感兴趣,并且认为教学科研并不冲突。只有嘴巴讲清楚的,写成论文才有说服力;只有写成过论文的内容,讲出来才能保持深度。自居陇右,荏苒已二十六七年,居久随俗,俨同故里。且此间冬暖夏凉,无疾风久雨之苦。况且,对研究西北史地,颇多方便。新近故世的顾颉刚前辈曾写赐一幅字条,其末句云:“不须更问蓬莱岛,此地令人欲挂冠”。看起来,老人家是要叫我在

此安家落户的了。

我这大半辈子,研究有一个主轴,那就是研究我国阶级社会的阶级关系。其余算是“客串”(不过我“客串”的频率未免太大了一点),只此是本行。人家科班搞历史的,都精于断代,我却没有断代的过硬根底。勉强说,只明朝和北朝,还下过一点功夫,其余很差。一上来就搞专史。先搞“农民战争史”。最初,这是上边的任务,叫开这门课,个人兴趣不是太大。开始搞也很幼稚,不过是清一些起义的起迄年月、作战路线、战役胜败、领袖人物的生平,等等。方法论也很幼稚,很教条,恪守只有农民的起义和战争才是社会发展唯一真正的动力的教导。后来发现统治者也有反攻倒算,也有让步。当时讲让步,也不敢不把功劳归到劳动人民头上,于是形成一个公式,就是“劳动者打击教训,统治者才妥协让步”。不久前,读到金景芳先生的论文,说不仅只有“反攻倒算”的论点是左倾思潮,就是“打击教训妥协让步”的论点也是左倾思潮,我这才恍然大悟。本

来嘛，统治者你不打击他，他也要调整嘛。这样的例子本来多不胜数，可是有的人就是矢口不承认统治者会自行调整。在这些人看来，统治者只会反攻倒算，只会像胡宗南向陕甘宁边区进犯一样，向农民起义的自由的桃花源进攻。历史并不果真如此！我正是感到研究农民战争史遇到了麻烦，才又转到“土地制度史”这块园地上来了。

这块园地，耕耘起来也很艰苦，理论修养需要很深，史料的根底也需要很深，面上需要很广，处理起来又需要很细，积累一些年，投进去很大的工作量，它依旧岿然不动。我不喜欢把事情停留在几斗麦子几斗米、官收多少、田主收多少的这些问题上。我从人类财产由公有向私有的总的转化过程来考虑，私有制夹在原始的和高级的公有中间，但它不能最终消灭公有，而只能最终为公有所扬弃，从而完成一个伟大的历程。正如导师马克思所教导的，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就是共产主义（更高的公有制）。这是体现着一种否定的否定的肯定。（见《马恩全集》第4卷中译本页164）但私有制也在历史上起了充分的作用。我们研究古代中世纪史的人，就是面对这个私有制的产生、发展以至一步步深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并不是平静的，而是充满着阻力。人们原始的共同体——公社和它的次生形态是一种阻力。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国家权力，又是一种阻力。后者比前者，作为阻力，更为严重。在多民族国家里，基干民族中的阻力削弱了，周边少数民族又带来这样那样共同体的阻力和军事、政治权力的阻力，阻力又加大了（封建社会长期衍续问题，在这里可以受到启发）。私有制长期不能平顺地达到比较纯粹的地步，以使公有制将它扬弃。我们讲一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的历史，不就是更具体地讲上面表述的这个历程吗？自从找到这个，我感到钻研的信心就大了一些。在“史论结合”的总过程中，有时“论”可以带动史料向前进，我有亲身的体会。据此，我不赞成“竭泽而渔”的提法。因为第一，实际上鱼是捞不完

的,史料也随着考古发掘而大量增殖,它不是一片小泽而是海洋;第二,有些琐节对逻辑总括的进行是影响不大的,列宁说当我们进行逻辑总括的时候要甩掉很多很多东西;第三,这个口号只会诱导人重新回到乾、嘉琐节考据的洞穴中去,使人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中国旧话中说,有“高明”和“沉潜”两路人,高明不是绝对的,它需要沉潜来保证,来验证,但翻过来,沉潜也不能绝对化,要是专门倡导沉潜主义,那就可能有害。历史是永远不能脱离哲学的,就是你不信服马克思主义,你也一定得有其它的哲学。单纯考订谢三宾有几个孙子,我想了一辈子,想不出它的意义和价值。

与土地制度史方面的观点相联系,我对古史分期也有自己的看法。我坚决反对把西周奴隶社会塑造成“鼎盛”,把当时的阶级关系只说是奴隶和奴隶主的尖锐对立,而排斥农业劳动中大量的自由民。我之所以反对的理由,是当时私有制刚发生发展,共同体还担任着很大的阻力,深化的过程没有那么快速。所以西周只能是奴隶社会的低级阶段。任何从主观出发进行拔高的活动,都是徒然的。只有到了西汉,私有制才前进了一大步,社会总气氛才有一点古典经济的味道,而封建制又开始露芽。所以我认为两汉是过渡。杭州一位看法相同的老先生说:“今天我们的看法好像是少数派,不久的将来我们将成为多数派。”我同意他的看法。

除去阶级关系这一主轴外,我的兴趣很广泛,中西关系史也想学习,文艺的演变史我也想染指,旁及绘画史和书法史我也兴感很浓,这样就使自己缘着“杂家”的斜坡一路滑下去了。

不久前,有人叫写自传,我只写了不到两千字,这次北京图书馆叫把学术观点也写进去,不觉就写得多了。最后,我还有两点补充。第一,我遭遇过两个好校长,一位是华岗同志,一位是江隆基同志,他们对知识分子的那种爱护,是能够使我终身不忘的。第二,是我的妻高昭一,河北正定人,自在离石游击队与我结婚以来,瞬已四十有六载,我的这点小小成就中灌注着她的合作和帮助。

我今行年六十又七，古稀已近。甚愿老骥伏枥，壮心不已，锲而不舍，努力至死，以企报答，并且不辜负所有那些爱护过我、帮助过我的人。

袁鹰原年

## 附二 摇自撰学术年表

员苑年 远月 员源日 (民国六年丁巳 源月 缘日)

鄙人出生,一岁(虚龄)。

员肆年 员远岁

在青岛胶济铁路中学读高中。本年在青岛《胶济日报》上以“枕秋”笔名,发表白话诗《小羊》、《小小的白帆》两首。此为鄙人发表作品之开始。

员肆年 员苑岁

与同学六人组织“浪花社”,在《胶济日报》上发刊《浪花》副刊,共出 圆余期,为胶济铁路党部查封。

员肆年 员愿岁

考入清华大学外语系。与友人合编《浮世绘》副刊,在《青岛日报》上发刊,后为青岛市党部查封。

员肆年 ~ 员远年 员怨至 圆园岁

参加“左翼作家联盟”与“民族解放先锋队”。与同学组织“国防文艺社”及“清华文学会”,出版《国防文学》两期,《新地》两期。本年发表译品 圆篇:(员)《人性的风》,苏联皮涅克作,译文在《新地》上发表;(圆)《两兄弟》,苏联格鲁吉亚作家(名字遗忘)作,译文在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时事类编》上发表。

同年,以“赵姓”本名在《清华周刊》第 源卷(期号遗忘)发表

《~~赵姓~~西洋杂志文艺论文编目》及《~~赵姓~~西洋杂志文艺论文编



目》两篇。

1937年 21岁

抗战开始,到太原受训,参加“第二战区总动员委员会”工作。以“冯夷”笔名发表创作小说 2篇:(1)《风沙》,刊在《清华周刊》第 1卷第 2期;(2)《紫荆开花的时候》,刊在第 1期。

1938年 22岁

与妻高昭一结婚,到晋南夏县参加部队,任指导员,以“冯夷”笔名发表战地通讯 2篇:(1)《在王老婆山上》,刊在胡风主编之《七月》(期号遗忘);(2)《王海龙》,刊在武汉《新华日报》上。

同年冬,所译苏联作家微尔塔长篇小说《孤独》,经沈雁冰介绍,王任叔(巴人)主持,编入上海孤岛《大时代文艺丛书》出版(按,该书后于 1945年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再版)。

1939年 23岁

因病脱离部队,任陕西乾州中学教员,此后数年,均在中学任教。

1940年 24岁

中篇创作小说《仲条山的梦》写完。该书于 1940年在《文艺复兴》上分二期连载,1941年在上海海燕书店出版单行本。

1941年 25岁

德国作家沃尔夫剧本《奥京喋血》(又名《维也纳工人暴动记》,又名《福劳利德镇》)译完。该剧本于 194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入《沃尔夫戏剧集》中出版。

1942年 26岁

闻一多先生在昆明遇害,写悼念文《混着血丝的记忆》,在上海《文艺复兴》上刊出(期号遗忘)。

1943年 27岁

论文《清初山陕学者交游事迹考》本年 2月 20日刊出于天津

《大公报》胡适主编之《文史周刊》上,不久上海《大公报》亦照载。此为鄙人发表史学文章之开始。自此,使用次章赵俪生名字。另一篇文章《赵南星评传》发表在上海贺昌群主编之《读书通讯》(期号遗忘)。本年夏,就聘为开封河南大学文史系副教授。

戊辰年 猿岁

本年发表文章,计有:(员)《张穆亭林年谱订补》,刊在南京《学原》杂志;(圆)《诸葛亮身世考》,刊在上海《国文月刊》;(猿)《清初四大学派》,计分为①《亭林学派述》、②《梨洲学派述》、③《船山学派述》、④《孙(夏峰)颜(习斋)学派述》四篇,接连发表在上海《读书通讯》上。

同年,应友人诗人苏金伞之邀,写短篇小说《临歧》,发表在其主编之文艺刊物上(刊名遗忘)。本年开封解放,到解放区,任正定华北大学第四部研究员。

戊辰年 猿岁

在济南升平街写论文圆篇:(员)《论中国新史学的建设问题》;(圆)《谨评闻一多先生的学术成就,兼论中国文献学的新水平》,两文均发表在《新建设》杂志本年之第远期与第愿期上。本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济南,在市委领导下工作。

戊辰年 猿岁

到北京,在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工作。秋,到长春,任东北师大教授。冬,到青岛,任山东大学教授。

戊辰年 猿岁

天津《历史教学》、青岛《文史哲》于本年创刊。鄙人发表论文源篇:(员)《爱国主义思想家顾炎武的反清斗争》,刊在缘月《文史哲》创刊号;(圆)《说蜀汉的兴起》,刊在《历史教学》员月创刊号;(猿)《靳大林对史学的新指导》(副题:《学习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札记》),刊在《历史教学》源月第源期;

(源)《再论上层建筑与基础并答赵宗复先生》,刊在《历史教学》愿月第圆卷第圆期。本年,《文史学的新探索》一书出版。

### 员缘年 猿岁

论文《马克思怎样分析法国第二共和时期的历史》(副题:《拿破仑第三政变记 问世一百周年而作》),刊在愿月《文史哲》第圆卷第缘期上。后被中央党校选为辅助教材。同年,旧作修改稿《北魏史述论》在《山东大学学报》上发表。

### 员缘年 猿岁

发表论文源篇:(员)《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体认唯物辩证法的威力》员月《文史哲》第员期;(圆)《靳大林与民族问题》缘月《文史哲》第猿期;(猿)《明初的唐赛儿起义》苑月《文史哲》第源期;(源)《北魏末的人民起义》,怨月《文史哲》第缘期。

《逻辑学教程》本年在上海春明出版社出版。

### 员缘年 猿岁

发表论文缘篇:(员)《南宋金元之际山东、淮海地区的红袄忠义军》,载《文史哲》第源期;(圆)《论有关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几个问题》,载《文史哲》第远期,其中首次提出农民战争与统一战争之关系问题;(猿)《南宋初的钟相杨么起义》,《历史教学》第员期;(源)《明正德间几次农民起义的经过和特点》,《文史哲》第员期;(缘)《论历史科学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见《新山大》(报),刊期遗忘。

### 员缘年 猿岁

本年发表论文源篇:(员)《论孔尚任爱国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见《文史哲》第员期;(圆)《批判胡适的考证学方法与校勘学方法论》,见《文史哲》第缘期;(猿)《夔东十三家考》,见《文史哲》第员期;(源)《李自成地方政权所遭地方武装的破坏》,见《文史哲》第员期。

与妻高昭一合著之《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在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出版。

1957年 19岁

本年发表论文 猿篇:(员)《从五代宋初对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看唐末农民大起义的作用》,见《文史哲》第 缘期;(圆)《论明末农民军对货币财富的积累》,见《文史哲》第 远期;(猿)《靖康、建炎间各种民间武装势力性质的分析》,见《文史哲》第 5期,此篇曾被日本广岛大学寺地遵先生在其学报上写文称誉。

1958年 20岁

发表论文 猿篇:(员)《论哲学遗产的具体意义与抽象意义的区分》,与冯友兰先生相争论,载《光明日报》(日期遗忘),后收入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编辑之《中国哲学史问题》专辑。

夏 愿月,举家由青岛迁兰州,任兰州大学教授。写《从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角度看古史分期问题》,载《兰州大学学报》创刊号。继又写《综论两宋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关系》(副题《兼论资本主义萌芽在宋代发生的可能性》),已编入《兰州大学学报》第 圆期,因政治问题临时撤版。此文后编入《寄陇居论文集》中。

1959年 21岁

反右运动不断扩大化,秋冬之际被划为右派分子,撤去教授头衔,此后发表文章的权利基本上被剥夺,长达 圆年之久,直到 1978年始获改正。

1960年 22岁

以“董弼”笔名,发表《论孔尚任的诗与诗论观点》一文于《光明日报》之《文学遗产》副刊上。

1971年 23岁

以“鹿其莘”笔名,发表《论杜甫的秦州诗》一文于《青海湖》文艺杂志上。“文化大革命”中此文遭到极严峻的批判。

### 员愿年 源愿岁

经校长江隆基特许，《日知录 研究》得在《兰州大学学报》上发表 愿年中所发表文章，不过如此。

### 员愿年 源圆岁

《西辽史新证》一文，发表在东北《社会科学战线》第 源期，此为若干年来未发表文章后之首篇发表论文。

### 员愿年 源猿岁

本年计发文章 苑篇：(员)《穆天子传 中的一些部落方位考察》，见《中华文史论丛》第 圆期；(圆)《新疆出土佉卢文简书内容的考释与分析》，见《兰州大学学报》第 员期；(猿)《历史上各族人民共同建设西北边疆简述》，见苏州《中国历史教学》第 圆期；(源)《谈史学研究的工作方法》，见《郑州大学学报》第 圆期；复经《新山大》转载，又收入齐鲁书社《治学之道》一书；(缘)《我国十七八世纪的几个画派及其社会背景》，见《甘肃师大学报》第 猿期；(远)《胡适历史考证方法的分析》，见上海《学术月刊》第 员期，复经《新华文摘》转载；(苑)《试论两宋土地关系的特点》，见《东北师大学报》第 员期。

### 员愿年 源原岁

本年计发表文章 远篇：(员)《有关井田制的一些辨析》，见《历史研究》第 源期；(圆)《五种古老历头对读记》，见《杭州师院学报》第 源期；(猿)《聊斋志异 妇女形象中人性的异化》，见《文史哲》第 远期；(源)《明朝与西域的关系》，见《东岳论丛》第 员期；(缘)《张澍的生平及其著述》，见《兰州大学学报》第 源期；(远)《天下郡国利病书 研究》，见华东师大编《史学史论文集》。

### 员愿年 源缘岁

本年计发表文章 苑篇：(员)《弄清历代剥削制度的一些前提》，见苏州《中学历史》第 员期；(圆)《从土地所有制角度来理解农

民战争的几个问题》,见《兰州大学学报》第 圆期; (猿)《关于古史分期问题和农民战争问题》,见《甘肃社会科学》创刊号; (源)《亚细亚生产方式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遗存》,见《文史哲》第 缘期; (缘)《有关均田制的一些辨析》,见《文史哲》第 猿期; (远)《读 聊斋志异 札记》,见《蒲松龄研究辑刊》创刊号; ; (苑)《清初明遗民奔走活动事迹考》编入《寄陇居论文集》。本年,《寄陇居论文集》由齐鲁书社出版。

### 员愿圆年 远元岁

本年计发表文章 员源篇: (员)《恍考据不行,还需要思辨》,见《文史哲》第 圆期; (圆)《汉屯田劳动者所受剥削性质与数量上的差异》,见《西北师院学报》第 圆期; (猿)《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角度看西周的井田制度》,见东北《社会科学战线》第 猿期,复经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译载《中国人论亚细亚生产方式》一书,纽约出版; (源)《对北魏均田制的一些分析》,见厦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 圆期; (缘)《均田制的破坏》,见《天津社会科学》第 缘期; (远)《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是先秦史研究的推动力》,见上海《学术月刊》第 愿期; (苑)《试论两汉的土地所有制和社会经济结构》,见《文史哲》第 缘期; ; (愿)《朱熹与王守仁的比较的探索》,见《中国哲学史研究》第 猿期; (怨)《王阳明和他的学派》,见《文史知识》第 圆期; (员园)《读 霜红龕集 札记》,见《晋阳学刊》第 圆期; (员员)《论蒲松龄的诗及其与 聊斋志异 的关系》,见《蒲松龄研究辑刊》第 猿辑; (员圆)《为学途程上的一些遭际》,先载于《书林》,后载入《治学集》; (员猿)《读书一定要读序跋》,先载于《书林》,后被《文汇报》转载; (员源)《张澍的生平及其著述》,见《甘肃社会科学》第 猿期。

### 员愿猿年 远苑岁

本年计发表文章 怨篇: (员)《试论两宋土地经济中几个主要现象》,见《文史哲》第 源期; (圆)《试论明代土地赋役问题症结之



见西北民族学院《西北民族研究》创刊号；(源)《有关孔子思想中“仁”“礼”关系问题的辨析》，见《孔子研究》创刊号；(缘)《丝绸之路上两个大国——中国史与伊朗史的比较》，见《西北史地》第员期，(苑)《十六国春秋、晋书·载记对读记》，见《史学史研究》第圆期；(愿)《一通与唐史、中亚史有关的墓志》，见《西北史地》第猿期。

员愿苑年 苑员岁

本年主要精力，在写《日知录 导读》，故论文篇数较少，仅得圆篇：(员)《试论东晋南朝儒、道、佛三家思想交融下的精神文明成果——诗、书、画》，见孔子基金会所编《论文集》，齐鲁书社出版；复刊于《烟台大学学报》第圆期；(圆)《对易的一些看法与体会》，见《孔子研究》第源期。

员愿愿年 苑圆岁

本年计发表论文源篇：(员)《读孟子 札记》，见《齐鲁学刊》第猿期；(圆)《管子书与齐国历史的关系》，见《历史研究》第源期；(猿)《试论管子书的史料价值》，见《史学史研究》第源期；(源)《说杞》，见《齐鲁学刊》第源期。

员愿怨年 苑猿岁

本年发文源篇：(员)《日知录 导读 导论》，见《文史哲》第远期；(圆)《说明清之际安丘人物间的人际关系》，见《安丘文史资料》第远期；(猿)《从地缘看先秦诸子间的网络关系》，见《烟台大学学报》员愿园年第员期；(源)《试论周易 象、象辞之哲学的导向》，见《齐鲁学刊》第猿期。

员愿园年 苑源岁

本年发文愿篇：(员)《宛在的音容》(悼念王瑶兄)见《王瑶先生纪念集》，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圆)《试说诗·小雅与易卦爻辞之间的关联》，见《东岳论丛》第员期；(猿)《读荀子 札记》，见《齐鲁学刊》第员期；(源)《齐桓公与管仲》，见《管子学



刊》第猿期；(缘)《陈连庆学术论文集 序》，见《陈连庆学术论文集》卷首，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远)《我所接触过的安丘当代人物》，见《安丘文史资料》第苑期；(苑)《聊斋 中的商人意识》，见《蒲松龄研究》；(愿)《当代易学专著七种内容提要》，载甘肃《社科纵横》。

### 员愿员年 殒缘岁

本年写文章 源篇：(员)《说 鸥□ 兼及 金滕 》，见《齐鲁学刊》员愿园年第 员期；(圆)《易·系辞传 内容之剖析》，见本年《东岳论丛》第 缘期；(猿)《试说卫风与卫国》，见《管子学刊》员愿园年第 员期；(源)《对家乡人谈谈郑康成》，见《安丘文史资料》第愿期。

本年办理离休手续。员月，兰州大学举办“赵俪生教授从事文化活动的 远年，从教 缘年庆祝会”。

### 员愿园年 殒远岁

本年发文 源篇：(员)《读 庄子 札记》，见《齐鲁学刊》第 源期；(圆)《回忆张恒寿先生》，见石家庄河北师院《张恒寿先生纪念集》；(猿)《徐松及其 西域水道记 》，见《兰州大学学报》第 源期；(源)《顾炎武的地理学成就》，见甘肃《社科纵横》第 缘期。

本年出书 圆本：(员)《日知录 导读》在成都巴蜀书社出版；(圆)《学海暮骋》(即《倚陇居论文续集》)在北京新华出版社出版。

### 员愿猿年 殒苑岁

本年发文 圆篇：《儒道两家间存在争议的几种古籍之剖析》，见《齐鲁学刊》第 猿期；《洪范疏正 驳议》(为纪念顾颉刚先生诞生 员愿周年而作)，又曾易名《尚书·洪范篇新义》，刊在孔子基金会编《孔孟荀之比较》一书第 员愿- 员愿页。

本年出书 员本：《学术自传丛书·赵俪生自传》，在成都巴蜀书社出版。

员源年 苑岁

本年写文 员篇：《东痴·渔洋·秋谷》（十七八世纪淄博地区三大诗人之比较），次年，该文刊在《齐鲁学刊》第 圆期。

员缘年 苑岁

本年发文 圆篇：《我看儒学》，见甘肃《社科纵横》第 员期；《春波和我——古史钩沉 代序》，该书在历史教学社出版。

员远年 愿岁

本年写文章 猿篇：（员）《明清之际黄、顾、王三先生之比较》，见《烟台大学学报》本年第 源期；（圆）《汪符传略》，见甘肃文史馆编《甘肃历史名人画传》；（猿）《赵俪生史学论著自选集后记》，见该书末。

是年 员园月，兰州大学举行“赵俪生教授八十寿诞庆祝暨学术研讨会”。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赵俪生史学论著自选集》、《赵俪生先生八十寿辰纪念论文集》。毕业学生王瑞琴捐资 员园万元，在兰州大学设立“赵俪生奖学金”，以促进培养优秀史学人才。

员愿年 愿岁

本年写文 源篇：（员）《明史专家王崇武逝世 源周年祭》，载（《齐鲁学刊》），后收入《篱槿堂自叙》；（圆）《关于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见《科学·经济·社会》员愿年第 圆期，复为数种集刊所采用，有的还发给奖状；（猿）《死三人记》，收入《篱槿堂自叙》；（源）《悼黄胄》，见 缘月 圆日《兰州晚报》。

员愿年 愿岁

本年写文 远篇：（员）《我和顾炎武研究》，载《学林春秋》；（圆）《记王瑶与冯契》，见《清华十级校友通讯录》第 员期，后载《学林漫忆》；（猿）《顾炎武在关中》，见《兰州大学学报》员愿年第 猿期；（源）《论理想主义》，见《科学·经济·社会》员愿年第 源期；（缘）《二十世纪史学的回顾》，见《文史知识》员愿年第 圆

期；(远)《一篇写法奇特的短篇小说》，见《文史知识》1983年第源期。

### 1983年 愿猿岁

本年写文猿篇：(员)《说藩镇》，见《文史知识》1983年第远期；(圆)《同一故事，不同时代的不同写法》，见《文史知识》1983年第员期；(源)《对新世纪到来的一些个人看法》，见《科学·经济·社会》1983年第员期，复为几种集刊所采用。

本年出书员本：《篱槿堂自叙》(我的回忆录)，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 1984年 愿原岁

本年上半年因补写《篱槿堂自叙》续文自第怨章至第员缘章，故零星文章写作较少：(员)《关于两门专门史研究的回忆》，见《文史知识》1984年第苑期；(圆)《说“八大教授”》(原稿暂时搁置，留待身后发表)；(猿)《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见《兰州晨报》1984年员月员日元旦特刊。

### 1985年 愿缘岁

本年计写文愿篇：(员)《陈大羽九十春秋书画集序》，见该画集篇首，复载1985年愿月《文汇读书周报》；(圆)《托兆·碰碑观后》，见猿月《兰州晨报》；(猿)《白玉之玷》，见《蒲松龄研究》季刊第员期；(源)《怀念任访秋先生》，载河南大学《任访秋纪念集》；(缘)《天水二妙轩论文集序》，见该文集；(远)《刘克训画集序》，见该画集卷首；(苑)《小说与传记——张之洞与张之洞评传对读记》，见1985年《群言》；(愿)《记两位画家及其各自的不幸遭际》(副题：黄公渚先生与郭世清先生)(原稿暂时搁置)。

年底，接受《史学史研究》的学者访谈谈话整理为《赵俪生教授访谈录》，见1985年该刊；收入本文集第一卷时改名为《我对中国史学界寄厚望焉》。

# 籥槿堂自叙

# 第一章摇乡土和身世

## 第一节摇乡摇土

我姓赵,名姓。“姓”字所巾反,读莘。《诗·大雅·桑柔》有“姓 箕鹿”之句,《注疏》说,众多也;又说,聚貌。窥察父亲命名之意,也许是要我儿女众多,也许是要我事业昌盛、有所著述吧。字俪生,也是父亲起的,这也不过将“名”拆开来而已。有些朋友往往将单人旁省掉,我很不喜欢。我 夙夙年(民国远年丁巳)农历四月廿五日(阳历远月 夙日)出生于山东省安丘县景芝镇东村。安丘,是我的籍贯;景芝镇东村,是我的出生地,在这块地方我只住到十岁就离开了,所以我对乡土的感情不是多么浓厚。迆岁上回乡乘吉普车到处跑了几天,再翻翻志书,才所知略多。

安丘 现在是潍坊市属下一个不大的市。它北邻潍县,南邻诸城,东邻高密,西邻临朐,东北邻昌邑,西北邻昌乐,东南邻莒县,西南邻沂水,八县环围,是山东半岛中部偏南的平原地区,以盛产小麦、黄豆、烟叶、高粱著称。郑板桥诗云“走遍青山是潍县,过了潍县又青山”,就是说,独独我们家乡一带缺乏山峦之美。苏东坡从杭州调到密州(诸城),在文章里说“背湖山之观,而适桑麻之野”。这“桑麻之野”四个字,我认为是对我的故乡的最好的描写。不过,安丘虽无名山,但其西部邻近临朐一带,是有层层的台地的。

《左传》成公八年(公元前 缘袁),晋国派遣楚国的叛臣巫臣绕道到吴国去,路过渠丘,据说这是莒国属下的一个小封地,城池很破败,所以巫臣



这个家族来自河北枣强,这是有资料根据的。时间是元顺帝至正年间,公元14世纪中段距明朝开国为时已不远。他们在枣强,本是打铁户,可也偶尔有念书的,中了秀才,就放了山东安丘的县令。要在北宋初,进士们在翰苑中进修几年,才可以得到“权知某县事”的任命。元朝末年兵荒马乱,徐达的兵快打过来了,所以秀才也可做县官。此人叫赵太平,是我们的始祖。他在赴任途中,在今淄博市东北的金岭镇病故了,二世公据说会看风水,就扶柩将他老人家安葬在景芝镇保元门内。这地方,后人叫“老林埠”。土改中,凡有需执行死刑之赵姓男女,多于老林埠执行之,似寓有“厌胜”之意,就是说,让恶霸地主们到阴间里也祖祖孙孙不得翻身。

这个家族本来并不恶霸,是做豆油和白干酒生意的大商人地主。他们在胶州麻湾包有据说**獾**只南船,将大篓大篓的豆油和白干酒运往海州,甚至扬州。这自然要发家致富,可是清同治初年,阶级斗争激烈化了。捻军到了山东,剿捻的淮军也到了山东,传说捻军指挥官任化邦(任柱)和淮军指挥官刘铭传前后都曾驻扎在我们村里,指挥官就住在我家的高房里。阶级斗争一激化,官军不够用,就自然而然叫地主们组织“联庄会”,形成一个个土围子。地主们手里一旦掌握了一点兵权,恶霸的味道就自然而然地滋生了。我有一位叔曾祖父的神主楼子旁边就吊有龙头拐杖一只,说是刘铭传军门赏下来的。

可我们这一支系不搞武装,以读书科举为业,所以到我身上还能有一点积累下来的痕迹。我不认为遗传会有什么决定性的作用,但起一定的作用还是应该承认的吧。因此,在这里,我准备对我的曾祖父、祖父、外祖父、伯外祖父和我父亲,作出一些描述。

曾祖父叫赵鹤立,是一个颇有毅力的人。他是大商人地主的过继儿子,“长毛”来了,将他父亲杀害,他在搏斗中也受到重伤。后来他考科举,秀才已经中了,但“书办”来索取贿金,他拒绝付给,“书办”们回去在卷子上挑了个什么毛病,革掉了。报中和报革的两次报子都报到村里来,我自幼就熟悉这段故事。他发奋走“捐班”道路,户部铨发他四川仁寿县知县,“书办”又来了,索贿**獾**两,他不但拒绝,又打了人家耳光。“书

办”们回去,将四川仁寿调成云南恩安。“万里云南”,亲友们都劝他莫去,他坚持去了,干了五年,从恩安县知县调镇南州知州,再调回昭通府知府,然后告老回家。

有一年在杭州大学,姜亮夫先生请吃饭,我问“您们云南可有个恩安县?”他说“你怎么知道有个恩安县的?这个建置早撤销了,它就是我们昭通府的附郭县。”我说,“家曾祖在同治年间当过恩安县知县署理昭通府知府。”他说:“哎呀呀,是我的父母官呀。”

又有一年去大理参观。去程在楚雄打尖,返程在南华打尖。在南华县招待所里招待我们的,是县文史馆的工作人员。他们告诉我,南华县清朝叫镇南州。我马上问“同治六、七年可有个知州叫赵鹤立的?”他们说他们正修这一段,确有赵鹤立这么一位知州,山东安丘人,临去职老百姓还送了“万民伞”。我出到街上看看,这县座落在一片贫瘠的小坝子上,少数民族很多,汉民很少。

我这位曾祖父是一位遭遇坎坷时能够坚持挣扎的人。我在心里想:我是不是有一点他的遗传?

我的祖父是另外一种人。他叫赵尔璿,字晋玉。他考山东乡试,中式举人,进京当了一名内阁中书,长年在午门楼上缮写上谕、诏诰等文件。光绪十五年(1889)当了一次北闱乡试同考官。他来往的达官贵人不少,如瑞方(午桥)、王懿荣、吴大澂(清卿)等,账本子里都有贴存的信札。“红灯照”进京前一年,他源远岁就死了。他死之年距我出生之年,源远年,我是他身后的幼孙,无由得知他的形貌和性情了。他留下十几大本日记,都是用铺子里的帐本记的,记载他购进青铜器、甲骨、宋明人字画的项目、价款、来往有关的知会。帐本我看到的也不全,当时分家风俗什么都要分,四吊子画每家一吊,十几本帐每家三四本,我只能看“二份”的那个部分。

也曾和别人讨论过。有一次由乌鲁木齐乘车与周绍良先生同包厢,我问他,“一个内阁中书怎么有那么多钱买古董字画?”他答,“我曾祖父周馥是两广总督,回北京每天黎明前要上朝时,先称出犍国两银子(约合源斤多一点)一包的‘红包’若干包,去送科、房中的中书们。这不算行



贿 ;只是委托中书们遇有重要上谕及早钞寄的一种预付的酬劳金而已。试想 ,全国多少巡抚总督 ,每人一包 ,买字画古董不是满够了吗 ?”

可是这些珍藏 ,在运枢的途路上全部被窃劫了。父亲告诉我说 ,从宣武门外住宅准备启行时 ,车户们请示太太 ,道路不靖 ,箱笼轻重要有个区别。当时继祖母可能考虑到车户们与黑道多有勾连 ,问这话可能是探路的 ,于是回答说 :“一个穷中书 ,有什么轻的重的 ,不过一堆破烂罢了。”车过黄村 ,车尾绑箱粗绳被斩断 ,青铜器、字画于是荡然无存。呜呼 !

我三四十岁时 ,也曾一度迷于收购字画。我想 这是不是也受祖父的影响 ?

现在 ,该来说说我外祖父兄弟二人。哥哥叫郭金篆 ,字芝农 ;弟弟叫郭金范 ,字心亭。二人都是举人 ,都未再考会试。是诸城城内金家巷子的人。我赵家的曾祖和祖父没有著作 ,仅以仕宦传世 ;外祖父兄弟都有著作 ,所以带有学者的身份。透岁那年 ,我和我妻在诸城九曲巷 (金家巷子故址 )伫立一大阵 ,以表示对外祖家的怀念。在诸城博物馆找到两位外祖替别人著作写的《序》,而且是石印原迹 ,可以看到在书法上 ,大外祖写孙过庭 ,嫡外祖开始写颜、转学何绍基的。这和赵家不同 ,我祖父和父亲都从欧字写起 ,参些赵子昂 ,更接近 “馆阁体 ”的要求。两位外祖父为人写序的书 ,都是关于文字学和篆刻学的 ,所以其中一种是由西湖西泠印社印行。这一带 ,是有这种传统 ,例如文字音韵学家许瀚 (印林 )和丁以此 ,就都是他们同时代邻县的日照人。

遇见一位与我同龄的老者赵子封 ,他是县政协的副主席 ,他对我说 ,他孩童时随他祖父去拜望郭大先生 ,未入门即遥闻丝竹管弦之声 ,原来大先生酷爱昆曲与京戏 ,家里经常有梨园中人前来演习 ,兼作相互间的观摩。传说京剧《击鼓骂曹》的道白和唱词 ,其初稿是郭大先生撰写的。二先生才华可能没有大先生那么大 ,他一生仅以教家馆为业 ,据说他教的学生考中进士的居多 ,故他的聘金较一般优厚一倍至数倍。晚年 ,他受聘我村替族伯赵孝陆 (名录绩 )做馆师 ,此家有地产 猿公顷 (即 猿亩 )。我家贫 ,寄学此家 ,外祖赏识我父才华 ,就将其长女许配了 ,这就是我母亲与

父亲相隔百余里能够结婚的机缘。

我平生爱写字,也喜欢看京剧与昆曲。有人告诉我,大外祖父身高一米八以上。做东昌府教谕时,他黎明前到资料室一条一条查阅、翻检资料。我心里想,我显然不就是他老人家的再版吗?

该说说我的父亲了。他叫赵录斌,字仲全,似乎是取“文武双全”的意思,其实他半点也不“武”,纯而又纯的“文”。古文功底很深,什么时候积累下来,他未曾谈过。据我推测,是在北京宣武门外法源寺做中书公的二少爷时在自己家馆、或寄学别人家馆时用功积累下来的。他中了秀才,补了廪生,清朝的科举就停止了。当时提倡赴日本留学,他堂兄弟八人,五个去了,他不去。很早就沾染了鸦片烟嗜好,生活日渐疏懒,当中学堂教习要按钟点上下班,他办不到,所以连中学堂教习的职业也维持不下去,就日渐穷途潦倒了。

他酷爱填词。当时清末民初,词学界人多走“二窗”的路子,即吴梦窗(文英)和周草窗(密),都是南宋词人。词又叫“长短句”,不限五言七言,可长可短。而南宋词人弃长偏短,二字句、三字句偏多,读起来气韵狭促,有亡国之音。清朝快亡时,词人又抬出“二窗”来,这很不正常。我父亲不走“二窗”路子,但也不喜欢苏、辛“铁板铜琶”的派头,他独爱周邦彦(美成),说只有周才是词学的正宗。我,作为他的儿子,就不完全同意。周上承婉约派,下启“二窗”,专写儿女情怀,专尚雕琢词藻,似乎也谈不上正宗。当时我不满 15 岁,就辑一部词选叫《词钞》,大量选入苏东坡、陈同甫、辛弃疾、姜尧章词,拿给父亲看,他用朱笔圈点了,有关观点他却一声没有吭,他已看到自己的儿子也完全可能跟老子观点不同。

他 20 岁就故去了。留下《秋籁集》诗词四卷。稿经我亲自抄为两份:一在清华园,一在高密乡下姐姐处,遭遇日本侵略,统统毁了。

我的母亲是个文盲。但她对我的教育是身教不是言教。记得一个严冬的清早,家里要摊煎饼,需要推磨。母亲轻轻离开热炕头,到村中一家邻人家借驴,牵了回来。当时积雪成冰,驴脚上是铁掌,母亲是木头底小脚鞋,于是连人带驴一起摔倒了。但母亲不慌不忙,不惊叫,不呼助,自己

慢慢爬起 ,再慢慢将驴拽起 ,慢慢套上磨 ,磨起糊糊来。那时我才六七岁 ,是从纸窗上糊的一块巴掌大的玻璃里窥见的。母亲这种坚毅承担生活的精神在我一生中起着一种强烈的感召作用 ,每当在承担生活中感到泄劲时 ,我一想到母亲和驴一起摔倒一齐爬起的景象 ,就又重新鼓起一股劲头 ,去承担不管是多么沉重、多么残酷、多么屈辱的担子了。

以上 ,就是我的幼年环境 ,包括自然环境和人际环境。这些环境条件影响我、制约我 ,使我走上了以后的道路。

## 第二章摇小学和初中

### 第三节摇小摇学

初等小学就在本村里，距家不过 ~~四~~ 步之遥。

让我先来描写一下我的家。那是游离开那些砖瓦高屋建筑群、位置在一片片菜圃中间的一个用黄泥坯做墙、麦秆做房顶的院落。院落中北房五间、南房五间，没有厢房。北房五间，最西一间是储藏室，余四间相通。正中是过往间，盘两盘锅灶，有大风箱，烧豆秸做饭，火力可通往毗连房间的炕洞里，积蓄一点暖气。东间由父、母住，父亲长年不在家，就由母亲带着我住。两间由四个姐姐住；后来二姐出嫁了，死了，就由三个姐姐住；后来大姐姐又病死了，就由两个小姐姐住。东间还有一个套间，仿佛是一间读书的“静室”，墙上挂着日本帝国大学毕业生、我四叔写的我父亲最得意的《莺啼序》词，词四阙，字也恰好是四吊子。外有大香几一架，上置木盒装粉纸精印的《御批通鉴辑览》一部。我当时压根儿没想到后来竟会学了历史，所以这部书我连一动也未动过。

南房五间，最东一间是大门道，最西两间是磨房和厕所（濠湾）。余两间似乎空着。院中有桃树、杏树、扁桃树、枣树，有葡萄一大架，葱韭七八畦。南房外面还有菜畦十二三畦。记得张宗昌准许种罌粟，我家也种过两畦，罌粟花实在美丽，妖冶多姿。

当初分家时，我父抓阄结果，是分到昭通公的老宅，一挂砖瓦房，前后有月台，左右有厢房。可是父亲非要卖掉不可（卖给他的四叔，昭通公的

幼子)新盖了这么一处土房,麻雀将房顶抽成洞,涝雨天外面大下里面小下,记得小时经常拿洗脸铜盆接雨水,以免淋湿了被褥。家的四周还有四五棵桑树,母亲带着姐姐们养蚕,就把这东套间当结茧室,很清洁也很神秘,不准看,不准动,不准进门。茧结好,缫成丝,拿到街上去卖。我上小学的几年,家里一亩地也没有了,就靠养鸡卖蛋、养蚕卖丝去弄一点活便钱。

我三岁那年回家,一位族兄带着我和妻站在一块石条(这石条是中书公中举所竖一对旗杆的石础中的一片)上,向南望着一片绿绿的麦田说,“那就是你故居的所在呀。”

现在来说小学。这小学叫私立育才小学。别看是私立,还蒙徐世昌大总统挂过一块大匾额。学校分三个院,最东一院面积最大,原是昭通公和中书公的祠堂,祭祀时设上祭桌、安上牌位,祭祀过后,将牌位等包好吊在房顶上,底下上课。这是高小部分。中间一院,是一位叔祖的客厅,也让出来做初小男生部分。最西一院,是另一位叔祖的客厅,这家更有钱些,院子更精致些,做了女生部分。不知怎么安排的,我编在女生部读书,一同上学的不是我的姐姐,便是我的姑姑。男孩子只我一个。院中有海棠一巨株,花开得真繁盛,真漂亮。桃杏花瓣薄,里外一个颜色,海棠里色淡红,外色呈朱砂色,宋朝工笔花卉中有这种颜色的记录。学校三部,除东院配老师二人外,余两院各配一人。女生院配的教师是我的嫡亲伯父,此人经常用竹板子打女学生手心,还用铜戒尺打学生的后脑勺,所以学生非常恨他,在鹅卵石上写上“赵硕卿”名字,在花坛边挖坑埋上,还吩咐我跪着哭,以示诅咒。

我常常这样想,对于一个青少年的发育、发展来说,高中阶段应该是最关键的年头,这时人们的心扉(脑子)逐渐开窍了,或者说大大地开窍了,理科功课使他们有最初步的逻辑能力,并且当数学从初等数学进入高等数学时,他们又会朦胧地感受一点辩证思维的影响,文科功课使他们除开白话,又更多地接触到古文字和古文学,受这些积累的影响,他们已不满足于“作文”那样的摹拟行为,他们个别的已经有某些最原始的创作冲

动了,兼以麝进来外语,一方面增加了烦难,但另一方面又增进了新鲜和对比的感受。随着体育课的训练,生理发育了,训育员在检查宿舍时会在被褥上遇到遗精之类的痕迹;男学生开始莫名其妙地给女生写什么“情书”,而收信者于惊慌、愤怒之余,也会有了某些遐想和怡兴产生出来;有些人想出个头头了;有些人爱议论国家大事了;有些人酝酿着要组织个什么小团伙了。以我个人说,这些变化都是在高中、更准确些说是在高中二年级,也就是说,十五六岁时发生或遇到的。而这些变化,对于一个人一辈子来说,实在是关系极为重大。

可是在小学时,一个人不过六七岁、七八岁、八九岁,真所谓混混噩噩,按最好的情况说,也不过按时上学,按时上下班,不迟到不早退,在卷子上多得圈圈少得叉叉而已。其余时间就是玩、玩,一玩到底。玩中不免要打架。大不了就是这些事。所以我说,小学阶段是一个人不能不经历的阶段,不能超越的阶段,是打造最初基础的阶段,但也是一个令人回忆不起什么关键性变化的阶段。

转眼三年过去了。初小要四年,但不知何故,我只上了三年就叫我毕业了,名次是第一名。这使我在村中小有名气。育才有高小,但家里人叫我到三里外景芝镇上去走读高小。这家学校设在景芝镇后疃区的北阁子(玉皇大帝庙)的前边,门口挂方牌两面,各有红、黄、蓝、白、黑国旗两幅交叉,下书“学校重地”、“闲人免进”字样。校名写在竖牌上,是“安丘县立第八模范小学校”,这是公立的学校了。

高小生活,还是使我想不起什么关键性的事迹。唯一的,是大学生欺侮小学生。与我来去作伴的,是两名我的族叔,比我大四岁、五岁。他们家里有钱,午饭在铺子里吃。我是由母亲炒一颗鸡蛋、卷两卷饼、用蒸笼布包好带在书包里,由学校老师灶上的工役老宫夹带在老师蒸笼里馏熟了吃。早晚往返三里,夏季有暴雨炸雷,冬季有厚雪薄冰,半途小村庄中还有凶狠的恶狗,追咬过路之人。我这两位族叔,不但不帮我防卫,反而把狗惹怒,让它扑我,有一次就将棉裤撕开一个大口子,棉絮绽了出来。过小河,他们一跳过去了,我跳不过,只好踏冰,而冰不厚,承担不起我体

重 结果冰破了 ,我一只脚陷入水中 ,棉鞋陷入水底。我只好穿着一只鞋 ,光着一只脚去上一天学。最严重的是一次是表演“枪毙人”。那是趁老师们中午到菜馆雅集去了 ,二位族叔将我五花大绑起来 ,颈后插纸招 ,上书“枪决考第一学生赵姓一名” ,用红笔点了点 ,划了叉 ,将我拉到操场 ,叫其他同学列队聚观 ,个别学生还吹号擂鼓 ,用大爆竹一枚权当枪声 ,还将我压在地上 ,叫我来个“嘴呛地” ,这才完毕。晚上回去报告母亲 ,母亲火了 ,“欺侮人哪有欺侮到这种田地?!”她去找了那两位族叔的父母 ,那两家父母似乎也觉得不像话 ,也惩办了两下各自的儿子 ,此后他们稍稍收敛了一些。

在这两年高小的学程中 ,我也没感到什么心得 ,受到什么启发。只是当时北洋军阀恢复读经 ,在毕业的一年添了《孟子》一课 ,而老师也不过胡乱教 ,“《孟子》者 ,七篇止” ,老师只教了五篇就说“算了”。现在我老了 ,懂得多些了 ,才知道《孟子》七篇最难讲的是第七篇《尽心》 ,次难讲的是第六篇《告子》 ,因为其中有不少微妙的哲学思辩 ,连历代注释家都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小学教师怎么能啃动这些东西呢?他的任务不过叫我们认认字、顺顺句、背下来就行了。

民国六年冬天 ,我母亲毅然决然用一把大锁锁上了北屋四间的总房门 ,带领三女一儿像逃荒一样到青岛寻找活路去了。如许大一个村庄 ,如许大一个家族 ,我们临行时不见一个送行之人 ,没有听到谁说过一句温暖的慰藉的话 ,也没见哪一家送来哪怕一点点路上吃的东西。所以我常说 ,我们一家是被“赶”出来的。这也就是我对老家缺乏感情的原因之一。

#### 第四节 摇初摇中

我的中学 ,初中三年 ,高中三年 ,全是在青岛渡过的 (学校叫胶济铁路中学)。因此在这里有必要说一说青岛。

青岛是一个滨海城市 ,是德、日两代的殖民地 ,对于一个刚从封建农村自然经济环境中出来的我说 ,纯是一个资本主义世界 ,十分陌生 ,十分

不自然。有些街道,如广西路,就纯是德国味的;有些街道,如市场三路,就纯是日本味的。而且日本味不只从市场三路的菜市场表现出来,几乎处处弥漫,公园里的樱花,私人家庭院落杆子上飘浮的绸带鱼,到处可以听到的木屐声,街上精致的日本商店、特别是文具店,等等,等等。公公道道地说,少数日本男人的确是极其凶残的,但日本妇女、老人和小孩,都是很好的,跟他(她)们做邻居有时会使人产生比和中国人做邻居还安详的感觉。日本话已经渗透到中国话里来了,随便就可以举一些例,如卖花的走街串巷,喊的是“哈那”、“希来以哈那”;卖冰淇淋的喊的是“亚斯古梨”;太平路三间大饭店上写的是“ゴラトホテル”(即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大饭店)。这就是说,青岛这块地面虽然政治上刚刚收回来了,但文化上还是殖民地的。

这时青岛叫胶澳商埠,市政府叫胶澳商埠局,驻军是张宗昌的部队,在街上走过时高唱“三国战将勇,首推赵子龙”这样的歌曲。从家乡初到青岛,头一个感受就是贫富悬殊。老家也有富户和贫户,但并不那么悬殊,并且有些悬殊之际多半隐蔽着,不十分暴露。青岛不然了,有钱人、外国人住在“东山”一带,花园洋房,灯红酒绿;穷人住在台西镇、台东镇那些肮脏的聚居区,啼饥号寒。鸦片馆、吗啡馆、妓院、当铺、治花柳病的诊所,比比皆是,统统暴露着,毫不隐蔽。这就使我幼小的心灵里,懂得资本主义虽然比封建社会进步,它的科技(当时叫“声、光、电、化”)虽然发达、而且越来越发达,但在贫富这个问题上它解决不了,因而它总是一个不稳妥的社会。我每走在山本路(后来叫中山路)就总是不愉快,这跟十余年后我每走在上海南京路就总是不愉快是同一种感情,同一种心理。

我的这个家,也是飘零沦落得不像个样子,因此我初中三年的学并没有好好上,也不可能好好上。以父亲来说吧,他是“一家之主”,词填得那么棒,怎么对自己的妻子儿女竟是冷漠到如此地步了呢?固然,他当时在失业,腹中如许古文化才学,在资本主义市场上卖不出一个大钱,他自己心里也痛苦,他有词句说“中夜□徨拭宝刀,斑斓血泪溅征袍,此非吴市怎吹箫?!”他整天手里拿着《聊斋志异》,读《叶生》篇的“异史氏曰”中的一



段“频居康了之中，则须发之条条可丑；一落孙山之外，则文章之处处皆疵”。他这种心情，我这做儿子的虽仅十一二岁，但已经懂得了；但我们一家五口，究竟是你的骨肉呀；但你既不张罗住处，又不接火车站，让我们娘儿五个滚着爬着好不容易找到在铁路局作事的堂兄的家，在人家只有一间租房的家里，人家三口睡床上，我们五口在床下打地铺。而且我们到青岛一两个月，我们的父亲竟不曾来看望我们一次。

我经常对儿女们说，我吃过一种饭。那是在小港码头上卖给苦力（~~伙计~~）吃的，原料是从轮船上卸下来的一桶一桶的剩饭剩菜剩汤，其中有面包块、肉骨头、鱼骨头、咬不动的菜根、通心面等等。小贩把这一桶一桶的东西包买下来，支起锅灶，加热消毒，以一大枚铜板一碗的价钱出卖，而且生意兴隆。我有一两年时间就在下学后去吃这种饭。我对儿女们说，老来一想起这种饭，就有一种要呕吐的感觉，但当时没有办法：它便宜呀。

我还说过另一件事。上学要买练习簿，买练习簿要钱，可我那个家哪里来的钱呢？于是自己开辟财源，星期天到海边礁石上去打海蛎子。海蛎子，更堂皇的名字叫牡蛎。一番海潮过去，海蛎子就把自己的壳牢牢地贴在礁石上。我设法找一具小铁凿、一具小铁锤，拾一个别人遗弃的罐头筒，系上铁丝，以便手提。星期天一整天，星期六半天，就全在团岛的礁石上度过。海蛎子壳一被凿开，海蛎子本身就像一摊鼻涕样流出来，赶快收到筒里。一天或半天过去，就可以有一筒或至少半筒海蛎子，于是提着在云南路的街道上、里份里，高声叫卖。一个周末可得猿角到缘角钱。中山路一日本老叟开一家文具店，物美价廉，这卖海蛎子的钱就都送到他的手中了。

至于我那个家，就只好由姐姐们出卖劳动力。最初，由老乡们介绍，到一家中国人办的鹤丰烟草公司当女工。这家公司资本小、条件差、剥削重。不久，我的大姐姐就因营养不良患鼻衄之疾死了。我母送大姐棺柩返回原籍埋葬，只身往返，她又一次表现出对生活的承担力和做母亲的责任心。剩下两个姐姐，改入日本人办的茂昌鸡蛋公司，工人们穿白大褂，

将卵黄卵白分开,各装入大桶,冷冻出口,运到日本去。

至于我上的那家中学,正处于创初和不上轨道的阶段。铁路局在铁路小学毕业生的基础上,作为发展职工福利,草草办起了中学。房子是租来的,学生只上课不住宿,走读。这样生活管理和功课复习就无法保证。老师也是胡乱请来的。举几个例。一个教《国文》课的七旬老叟,他对白话文学一窍不通,只会讲归有光的《项脊轩记》。一个教《英文》的自吹叫刘博士(刘博士),其实是浸信会教堂里伺候洋牧师的。有一次他在课堂上说,“西欧和东欧人为什么有姓 O'Connell 的呢?那是因为汉人随成吉思汗西征,把男人们杀死了,夜里就同人家的老婆睡觉,临别时老婆问,生了孩子叫什么?回答说,我是你的汉子,就叫‘汉子’好啦”。呜呼!当时的老师就拿这样一些既污辱中国人又污辱洋人的胡说八道,在课堂上误人子弟。

课堂上学不到东西,社会上看到的東西可不少。北伐军快到济南了,日本借口“保护侨民”,掀起“五三惨案”。日本军队自海上登陆,帐篷就扎在火车站前的广场里,到济南杀人放火之后,又回来乘军舰而去。当时,甲午海战中的清朝被俘军舰被改装了,换了名字,经常游弋在青岛的海湾里。这两只舰叫“速磨”和“八云”。此外,他们的名牌旗舰“长门”和“陆奥”也经常在售季前来青岛停泊,还邀请大、中、小学学生参观,其中所寓的威慑之意,是十分明显的。当时的国民革命,虽一度受阻,但终究是过来了。张宗昌军队逃往东北,五色旗换上青天白日旗,孙中山先生的像章带在学生们的左上口袋边。当时,中山先生刚刚逝世,大家臂带黑纱,手提花圈,口中唱着“我们总理,首创革命,革命血如花……”这样的歌曲。这“革命血如花”一句特别动人,人们一遍一遍地重复着,一边唱一边流出来眼泪。

新政治气氛过来了,跟着新文化气氛也冲过来,而且文化气氛比政治还更容易弥漫开。在青岛棠邑路上有个齐燕会馆,本是商人的联合会所,而今每夜上演田汉的《获虎之夜》。这个震动可真是巨大的,看到一个青年为了爱情被误中的猎虎毒箭射死,多少青年男女的心扉被煽动得呼呼

价响呀！不少穿清朝紫背心的老者在会馆门口企图阻止自己的女儿或孙女,不让她们看这样“邪恶”的戏,但是徒劳的,那些女孩子偷偷从后门或侧门进去,早已入座了。书店里可以买到《呐喊》和《彷徨》,学生们在下课的路途上边走边表演着赵太爷满脸溅沫、呵斥阿 匠“你怎么配姓赵”,像念台词一样。他们背诵《阿 匠正传》的劲头,远比在教室里被迫背诵古文的劲头要大得多。

关于共产党,当时已有所耳闻。我们训育处有个训育员姓王,当时有句通用话“一棍砸杀王小”,同学们就叫他王小,他的真名倒不显著了。同学们说,王小原是共产党,国民党清党时他叛投了南京方面,成了共产党的叛徒。他教我们《党义》,使用课本是周佛海著《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仿佛他还有一定的社会科学修养。另有一位比我高一班的同学叫张维邦,上海人,父亲是广西路电报局局长。忽然,这个同学不来上学了,同学们说他是共产党,被公安局捕去了。再有,有那么一天,中山路公园(这个公园后来被撤销拆除,建筑成大银行的高建筑群了)里有人被枪杀了,这件事很轰动,报纸上全登了,说是共产党叛徒,近年读山东的《党史》,得知确有其事,是王尽美时代出的一个叛徒。总之,共产党这一事物,在我的脑海中已经影影绰绰形成一个影子,具体怎样尚不清楚,那要再等几年,头脑更成熟些,生活领域更宽广些,再去具体地接触了。

铁路中学再这样不死不活地办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了。铁路局头头似乎也觉察到这一点。他们要邀办学专家。1924年冬,专家请来了,他叫宋还吾,曹州府城武县人,北大毕业,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在担任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长任内,带领男女学生在孔林内演出话剧《孺见南子》,对孔子不免有些儿丑化。这件事轰动了全国,由国民党财政部长孔祥熙和衍圣公孔德成联名控告。这事后来虽然不了了之,但宋还吾还是离职了,胶济铁路局趁机将他聘了来。他高高的个儿,蓄一撮浓浓的上须,西装笔挺,携一根 烟嘴。他不仅一个人来,他还带来了一大批受五四影响、具有新思想的老师。当时杨振声任青岛大学校长,也有一大批具有新思想的教授,这样大学中学,串连兼课,新风气一下子就捅开了。

1937年（“九一八”那一年）夏 苑月，我初中毕业，名列班中第七，并且还留下一个疤疤，数学 源分，不及格！愿月份，父亲死去，一家人扶柩回籍。怨月份，我只身回到青岛，到新建在四方区的校址报到。从此，我进入了高中。

## 第三章摇高中阶段

### 第五节摇浪花文艺社

北京人有句话，“动真格的”。这话的用场很广泛，若干凶暴、邪恶的场合都得上。可我用这句话的意思是，上小学，我没有动真格的；上初中，我也没有动真格的；上高中了，我才动了真格的。换句话说，这时候不动点真格的，也不中了，即所谓“形势所迫”。

什么形势所迫呢？有外的，也有内的。也就是说，有环境上的，有自身的。1964年暑假，父亲死了。假如暂时游离开儒家的“孝”道，那么，父亲的死是替我们这个贫民窟中的家庭卸掉了一个包袱。我住校了，家中只有母亲和两个姐姐。她们又换到一家叫英美烟草公司做工，将轮带上的烟卷装进小包，或者将轮带上小包装成大包。年底发个双薪。她们搬到胶东路二路的一间租房里，显得比以前整洁得多了。可是我也是十五六岁的半大人了，我也懂得该想一想啦。父亲死后，派出所将户口板上的家主改成我的名字。家主，家主，我主了个什么呢？家庭的负担全在姐姐身上，她们晚婚对她们自己是一种牺牲。我无论如何要锻炼本事，早日把奉养老娘的责任承担过来。初中毕业时，父亲的意思叫我到报馆排字房中学个排字工人。母亲坚持反对。看起来，母亲想“放长线，钓大鱼”，可我究竟会是多么大的一条鱼呢？

再就我自身来说，初中混混还可以勉强混过去，高中再混怕是混不过去了。科学有连续性，第一个环节没弄好，第二个环节就失灵；第二个环

节失灵,到第三环节上就更糟糕了,这个我懂得。初中毕业数学 50 分,这说明小代数、平面几何没有学好,那么进高中怎么学大代数、解析几何呢?于是,我下决心追补。

追补数学的事,容我在下节中详述。这里还需穿插另一桩事,即了结一桩新文艺社团的公案。

原来在初三年级时,曾组织过一个新文艺团体,取名“浪花文艺社”。社员七人,丁原颐、王心正、丁蕙田、朱启明、赵君颖、王贻官和我。人家叫我们“浪花七君子”。我们在《胶济日报》上每周出半版文艺专版,有新诗、散文、杂文、短篇小说和短译文。这个刊物办了半年多,平平稳稳,虽也没有多少人夸奖,但也没见谁挑过什么茬子。可是突然的事发生了。我们浪花社的顾问、国文老师孙绍梁把我叫去了,问丁原颐开学报到了没有?我说还没有。孙老师说,“铁路党部要抓他,赶快设法通知他,叫他回日照老家躲藏一阵为好。”我们赶快到小港小火轮码头,果然丁从小火轮上下来,我们通知他转移了。但风声一天比一天大,浪花社分裂了,王贻官在校内贴告示声明退出,丁蕙田在报上登广告,声明“年幼无知”、“误入歧途”,朱启明因眼底有黑痣一颗,回济南动手术去了。“七君子”剩了三个。我们夜夜躺在四方铁中宿舍二楼的双架床上,遥看从市内开来汽车的灯光,听候被捕。白天,同学们侧目而视,小声说我们是共产党。我们咬住牙,熬过半个学期,竟然风平浪静,安然无事。

缘年后的 1957 年代,在青岛铁路局党委组织部和宣传部的人为党史资料来向我调查,才告知我,孙绍梁老师和丁原颐同学当时确是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那次的情报还是相当准确的,可能是地下工作中出了叛徒。

## 第六节 对数学的追补

“追补”这件事,我一辈子经常思考。这个方法,我一辈子经常使用。为什么?答案很简单,根底薄。而这个“根底薄”,指的方面很多,如数理根底薄,外语根底薄,汉语文字学根底薄,经学根底薄,哲学基础根底薄,

等等。当然,所谓“薄”,也是相对而言。不少人比我们还薄,但这些人已不在学术界活动了,没有追补的必要;我呢,一辈子总在这块水潭里游泳,把水底下摸不透那是不行的。

“薄”的对立面是“厚”。怎样算“厚”?比如说,郭沫若从少年时候在乐山,先秦诸子和五经四书已经读熟,童书业你拿《左传》提一段头,他就会哇喇哇喇背出来,不许有错的。这是什么?这就叫根底厚。再打一个也许比拟不伦的比方,你到一个大院找一个朋友,你只知道他住在大院,其余不清楚,那你就麻烦了,“这里有伊伊伊吗?”“对不起。”一个开始做学问的人一开头,很多精神都花在这方面去了,古人叫作“困学”。可是,这个大院的居民委员会和民警办公室就不同了,“有个伊伊吗?”“噢,在伊栋伊门伊楼。”这是专家,他们对于这个大院说,叫做根底雄厚。难道我们在自己所处理的学术部门和课题范围内,就不能达到居民委员会和民警办公室的水平吗?回答是,一开始不能,最终慢慢接近。“人定胜天”,由根底浅薄到根底雄厚,是一个人为争取的过程,这就是我一生不断执行“追补”的思想根源。

我在初中阶段,数理功课极差。这原因很多,家庭生活极度贫穷、碌乱,是一个因素;个人头脑还没有发展到理性应有的幅度,是又一个因素。那时的境况是很狼狈的,老师要缴算草,而自己不会,就去巴结数学好的同学,他算毕了借我抄抄。而老师也很机灵,立刻指出你是抄的某某的,因为他演算错了的你也跟着错了。有时,老师又提四个学生到黑板上来演算,人家都演算好下去了,只我站在那里,老师不叫下去也不敢下去,这叫“站堂”,一种示众。初中三年就是这么狼狈度过的。

现在,人已十五六岁了,父亲已经死了,派出所把我派成家主了,三年过后不考大学则已,考大学要考数理的,怎么办?“形势逼人”,“逼上梁山”,这追补的决心是逼出来的。这时母亲和姐姐扶柩回籍尚未回到青岛,我突然跑到中山路劈柴院门洞里一次买了十本很厚的数学练习簿,下决心把小代数、平面几何、大代数、解析几何“一锅下”。别人晚自习大约最多算猿道题目,我至少要算怨道题目,算不完不睡觉。遇到难题,请教班

上的数学尖子,再不然去找老师。这样坚持不到一年,“立竿见影”,我的数学分数上升到 80 分以上,有时考 90 分。

这虽是件小事,但对我一生作用很大。我的毅力,经过这次考验,使我信得过了。我偷偷地想,曾祖父在云南坚持 50 年,我追补数理化才不到 5 年,算什么呢?! 村里人说,曾祖父考秀才回来,他一位叔父说“报子插上又拔出来啦”。等从云南坚持 50 年回乡,又遇上那位叔父,我曾祖父说“这一回再也拔不出来了”。我也对自己说,我这一辈子再不借抄人家的算草,再不在黑板上“站堂”了。

就在业务本身说,给我的体会也很深。在初等数学范围内,数是常数,点是点,线是线,面是面,体是体,这都在形式逻辑范畴之内。可是一进高等数学,数可以是常数,也可以是变数;点可以运动,它的运动就形成轨迹,可以成为直线,也可以成为曲线;并且这些都能用高等数学加以计算。后来我想,这不就是大自然中的辩证法吗? 而从演算实践中学来的辩证法,要比从政治课本中学来的辩证法叫人更加信服。

这个“追补”,自从追补数学有效以后,我在一生中不断推广使用。举两个例。

追补法文。我的英文不算那么好,但还够用。法文只在大学三年级时按规定必修。教师是一位未婚的皂幕小姐(小姐),当时我参与一二九运动,校外活动多,有时来不及上课。后来又去上,她就用英语说:“我当你死了呢,你还活着来上课呀。”我认为是一种侮辱。老师可以训诲学生,但不能侮辱学生。我耽误功课不对,但是为了救国,又不是逛八大胡同去了。一怒之下,我到注册课把《法语》停修了。“文化大革命”后期,我被军工宣队动员退职(实际是被清洗),在贵州女儿家闲居两年,就决意追补《法语》。两年过去了,虽然口语不会多好(因为法语中有联读现象),但阅读力进步较大,我在原订阅的英文《北京周报》之外,又加订一份法文的,先读法文版,再拿英文版对照,发现阅读力误差不大。

另一个例子,是追补《十三经》。前面我说过,我的旧学根底只不过《孟子》七篇中的五篇,可怜得很。可是谁会晓得,自己后来自愿投身到





在心里设计着要写一部以此诗题为名的长篇小说呢。

翻译诱导人去寻觅翻译的素材,这样就不知不觉多读许多书。记得最早的两本:一本是《王尔德童话集》,另一本是毛德夫妇译的托尔斯泰的《二十三篇故事》。我一辈子爱这两本书。其中有些篇章如《夜莺与玫瑰》、《小汉斯的故事》(即《忠诚的朋友》)、《一个人需要多少地》、《上帝看到了真实,但仍须等待》,我几乎终生诵读不厌。

为了使有关“翻译”的内容叙述得圆满,在这里我不得不暂时摆脱“高中”的年代框框,提前地涉及一点大学。那座大学的图书馆里有一间极大的西文阅览室,它的一端是“期刊室”。外国杂志,琳琅满目。期刊室的主任,是一位自学成材的作家——毕树棠先生,他允许借给我我所需要的合订本。这样,我的翻译素材的来源就拓广了若干倍。记得我经常借阅的,有《莫斯科新闻报》、美国《新群众》、英国《伦敦水星》以及《斯洛文尼亚评论》等。第三国际的《国际文学》,图书馆按校务会的意旨不订。我只好到城里喜雀胡同白俄教授柏烈伟家中去买。跟着翻译素材的拓展,我的译文量较高中时大大增加,我感到我自己对外文的理解较前精细并精致化了,也感到我自己中文的表达能力也较前伶俐得多了。译出来的东西,寄到《大公报》、《益世报》、《国闻周报》、《时事类编》去,发表后还可得到不能算少的稿酬,这对于我这穷学生来说,实在是不无小补。我的这些译文发表时,多用“冯夷”这个笔名。

回想起来,高中阶段的大事就是如上叙述的三件。一、结束了“浪花文艺社”,懂得了政治会对它所不喜欢的东西加以迫害;二、从对《代数》、《几何》两门功课的追补中,开启了个人一生对根底薄处进行不懈追补的极好、并且极有益的经验与实践;三、开始了译述生活,并且对之津津有味。

但是,还该有点别的。我的意思是说,旅游。这对一个少年人的身心,也是有很大益处的。初中毕业时,由学校发起、由老师领导,我们乘坐胶济火车到省会济南做了一次旅游,欣赏了“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大明湖风光。又一次,由青岛市长沈鸿烈的邀请,临届高中入

学生乘坐“海琛”号军舰到崂山旅游，观览了下清宫、上清宫和华岩寺，亲眼见到了那棵叫“绛雪”的耐冬。一转眼，三年过去了，我们面对“会考”。所谓“会考”，意思是不让一个学校自己主办毕业考试，要由市教育局总办，市中、铁中、礼贤、圣功、文德等校用统一试题集中考试。考试结果，在铁中内部我仍考第 苑名，在全市范围近 猿园人中我考第 员猿名。当时天津大陆银行给发奖金，猿名以内奖给大洋 圆元，愿名以内奖给 员元。在我那个家庭里，十个钢洋是罕见的。当时毕业同学发起聚餐一次并摄影，要缴将近两块半。我以 缘元到亨得利配近视镜一付。剩下的钱，全缴给母亲了。我一生戴眼镜，盖自此始。

## 第四章摇大摇学

### 第八节摇考大学

从初中升入高中，人们在科学知识方面，开拓了一点眼界；等从高中考入大学，那就不仅仅是科学知识方面了，而是上下古今，对政治、对社会、对人际、对世界，眼界都在开拓之中。所以我认为，开拓眼界是进大学的第一意义。

当时我们高中两班，近 100 个学生，报名考大学的二十几个，约占四分之一强。其余的大都在铁路上就业了，当个站务司事，月薪 100 元，渐增至 150 元，还有烧煤的补贴，小日子也就可以了。至于考大学的，那么大概具备这么一些条件：一是其家长在老家是地主，有租子收入，要么在城市机关里当公务员，有稳定的薪资；二是他们本人的功课大体名列前茅，至少数理化成绩不坏，自认为够得上被录取的标准；三是他们一般看不起 100 ~ 150 元薪资的职位，他们懂得大学毕业后无论当中学教员或见习工程师，薪资就不会低于 150 元了。我们班上想当工程师的人特别多，我们就不叫他们名字，而呼之曰“藻旦藻旦”（工程师）。

我们组成团体，前往北平。事先由我们的数学老师——他刚从北师大毕业不久，与母校尚保持联系——代为洽准借给大教室一间，大家打地铺，可省住旅馆的破费。当时的北平很破烂，本来嘛，袁世凯折腾过了，北洋军阀折腾过了，而今日本人又伸过腿来，蒋介石只剩下个“华北政务委员会”，在中南海里与日本人折冲尊俎，维持局面。我们背着行李，走过西

河沿这条满是旅馆小店的街（这是我在北京走过的第一条街），到和平门外的北师大理学院安顿下来。

比起青岛来，北平又是另一番滋味了。假如青岛是资本主义的，那么北平就是封建的，当然封建中已处处埋藏着反封建的火种。北师大门口有很多黄包车，你一出到门口，马上一大堆光着膀子的黄包车夫就挤到跟前来兜生意，问“乃块儿”。我们一惊，北京话不是标准国语吗，怎么“乃块儿”我们竟不懂。日子久了，才熟悉“乃块儿”是老北京人土语，意为“到哪儿去”。当你说出你要去的街名时，又马上伸出一大堆指头来抢生意，“五大枚”，“四大枚”，“您就干脆给三大枚得啦”。这使我们对北平产生一个印象，好便宜的劳动力呀！抢生意过程中经常还出现恶声的骂人话，“操你妈嘢”、“姐儿妹嘢”等等。又使人感到中国好落后呀，北平好落后呀。

对待考试，也分两派，沉潜派终日坐在地铺上拿着各名牌大学历届考试题目悉心揣摩，孜孜不休；高明派只要踩清楚几个考试地点，像北大在北河沿三院，清华在宣武门内“大鸟笼”（民国议会），之后就是到处玩耍，游览名胜。我大概属于后者，我们的理由是，把脑子用得疲倦了，临场“抓瞎”，还不如叫脑子清朗清朗，临场好用。记得一次到北新华街一家电影院看新片子《渔光曲》，正看到得意之时，突然一声枪响，戏场里人乱了，事后知道是一场情杀。

在这里，有必要插进来叙一叙我的一位同学王承鸿。我俩初、高中同学六年，在班上总是他考第一，我考第七。他应付大小考试的方法很独特，他不死抱住课本或笔记本念或背，他只用一页不大的白纸在上面写些什么，贴在床头，他躺在枕上看着这张纸，有时口中念念有词，就凭这个考第一。大家奇怪，他纸上写的什么？原来是一些单词、公式、课文中的隽语、以及一些像是哲学原理的东西。噢，这是逻辑概括呀。这一点，我学过来，直到中老年教课我一不带课本二不带资料，只带一个小本。我的学生，无不熟悉我的“小本”，这就是我的逻辑概括，而这种方法从起源上说，是从王承鸿那里学来的。

顺便说一说王承鸿。他是山东平阴县人。《老残游记》里记老残在山中遇虎,又遇到一位深通玄学的道门女子,就是在平阴。王的父亲和叔父都在铁路局文书课做事,一个是科员,一个是主任科员,收入也可以了。王的青春期比我来的早,看上了一个姓朱的女同学,可是人家不喜欢他,这种精神异常就发生了,而且这病跟了他一辈子。第一次异常是高三第一学期,他忽然失踪了。原来他读一些虚无主义的书,助长了他的盲动。他想流浪,于是他偷偷离家,徒步在胶州、日照间乱闯,遭历了一些苦难,最后被他家里人寻觅回来。他落落大方,不拘小节。举一个例。考北大和清华的试卷不同,使用文具也不同。清华试卷,无论文理,一律横行,自左而右,纸是洋纸,用钢笔书写。北大试卷,理科与清华同,文科用毛边纸,竖格,用毛笔小楷书写。王忽略了这一点,仍带自来水笔到北大应试,发现不对头,要求回去取毛笔墨盒,考场管理人员说,你的试卷作废了(我考北大考得很成功,列榜第愿名,这是全国考试,这个名次很不容易了)。

但他还是考取了清华。入学后,我二人又同住一间宿舍。宿舍是平房,四人一间。东南角是我,东北角是王,西北角是任福善,西南角是周逵。他很瞧不上任,说他阴柔,是小人。王半夜到厕所解手,回房后照例来个“蝎子倒爬墙”,即以两手支在床上,两脚高伸贴在墙上,半小时后钻进被窝睡觉。他把这叫“~~皂墩倒爬墙~~夜半运动”。这些动作,有时轻巧,有时就笨重,会影响同屋人睡眠。任福善向他提意见,他抡起拳头把任揍了。这影响很不好。他又精神异常了,不上课,终日捧一本安德列也夫的《沙宁》读。不久,他又失踪了。这次是到绥远的清水河、托克托一带流浪。未经人寻觅,自动返回,学了一点半半拉拉的蒙古话。我写这些的意思是说,弗洛伊德学说还是具有一定的真理价值的,一个人青春期的遭遇,会影响人一辈子。

当时考学中还有一个插曲。有几个岁数大的同学提议,到一趟北平,不可以不逛一次八大胡同。大家都去了,只我一人未去。当时为什么强犟地不去,是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我至今说不明白了。王去了,回来给我讲了许多新知识,说有“打茶围”,有“住局”,后者住宿,前者只是喝喝

茶、嗑嗑瓜子而已。但我们班上有位个头最小的同学,在与一位“姑娘”恩爱中过头了,将精遗在了自己的裤子里,回来的路上两腿拉八拉八的,出了洋相。听说,此人后来是美国一个研究所的主任了。

## 第九节摇清华大学(一)

清华,是被很多很多人艳羡的所在。北京的市语说,“北大老,师大穷,清华、燕京可通融”,这说的是丈母娘选女婿的标准。是的,历届清华学生是比较少年英俊些,风流倜傥些,但也肤浅些,或多或少带着一股洋味,更具体说——美国味。

当我作为一个从山东来的高中毕业的土包子学生前去报到时,我只有“高山仰止”的心情。特别是四十年代建成的四大建筑——大礼堂、图书馆、体育馆、科学馆,巍巍峨峨;清朝咸丰年间的古建筑——工字厅、古月堂,古香古色,都使我仰慕不已。但很快这仰慕之心就复杂化起来,顶头碰到的一件事就是“拖尸”。

“拖尸”,自英文 ~~贼~~ 而来。~~贼~~ 意为抖擻一下;具体说,是四个彪形大汉将报到新生的四肢各持一肢上下抖擻,然后猛然摔到草垫子上,给你这新来户( ~~翻个跟头~~ )一个下马威,叫你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但请不要误会,“拖尸”仅仅是这么一摔而已,不是如此,它是被学校列入报到项目之一的一个整过程。所谓报到项目,如“到财务科缴费”、“到教务处注册”、“到校医院检查身体”等等,但还有一项“到体育馆检验身体”。好一个“检验”?! 这个字眼带有蒙蔽性,翻译出来,就是叫你去接受“拖尸”,去接受自美国传播过来的风俗,由二年级学生组织起来对一年级学生进行的恶作剧。或者说严重一点,去接受一场侮辱。

先是“钻狗洞”。记得昆曲《燕子笺》中有“钻狗洞”一折,那个小生念道:“罢,到这般时候,也就顾不得了。”我们当时的心情,也正好如此。那是用军训用教育步枪穿插起的一条三角洞。步枪上装有刺刀,刺刀尖向着洞内,钻洞人必须蜿蜒着才能躲过刺刀尖,英文叫 ~~推~~ 爬出洞去。

然后是“端木盘”，木盘无边缘，上置一圆木球，地板上用白油漆画着像《解析几何》里高次方程的曲线，叫你沿着曲线走，盘子里的球不能滑落，假如滑落了，那位**杂耍班**（二年级生）先生就喝斥一声“**砸桌**”（重来）……这样的程序大约有五六个，然后到最后一个程序，像“三堂会审”一样，三个凶神恶煞般的“拖尸团”头头命令你躺到草垫子上，由四个彪形大汉将你用力上下颠簸，然后一摔；我想有心脏病、高血压的就该去见上帝了。但这还没完，又听厉声吩咐你爬起来，到头头们面前的桌子跟前执行“盖章”。这“章”是专门到屠宰场仿制来的“验讫”二字，用紫印色打在你的额头上，或者腮帮上、脖子上。至于具体打在哪里，要按头头们的意向。他看你调皮，就打到脑门上；我大概由于老实，给我打在后脖子梗上了。用衬衫领子一遮，可以躲过眼目。而打在额头上的呢？我见过，一走进大食堂，立刻惹起一片轰笑。我现在想起，觉得这“拖尸团”跟**四**年代的“红卫兵”有某种类似，只是阶级属性不同，后者是“无产阶级”的，前者纯是美国牌资产阶级的罢了。

多少年来，我不断思考过这问题。这怕与清华的“前史”有关。在**一九**清华改为国立大学以前，曾有过**一九**“留美预备学堂（校）”的时期，输送了上千名具有高中水平的青少年赴美，这些青少年大都头脑简单，从极度落后愚昧的祖国走出去，接触“声、光、电、化”，先入为主，自然而然就崇洋了。其中一些人在返国之前就揭出“清华门罗主义”，倡言“清华者清华人之清华”的宗旨，这就树立下门户了。这些人回国，虽然《校歌》上说“中西文化，荟萃一堂”，而实际上是西多中少，西重中轻，并且二者间“荟萃”得也不谐和。当然，也有人会觉察到这一点。于是乎开办起“国学研究院”来，自**一九**至**一九**，招收过四班研究生，这些研究生普散到全国去，也的确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起了作用，但很快王国维大师投湖自尽了，梁启超本身是一半政客一半学者，也病故了。清华的文科，也只剩下老辈的如刘文典、陈寅恪、杨树达，半老辈搞哲学的如冯友兰、金岳霖，中年的如朱自清、闻一多等人撑台，比起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来，在根底和积累方面，在教学和研究的连续性方面，总不免逊色一点。



但作为一名新生进校,我的感觉还是良好的。首先,一年级不分系,理工科生必须选修一门文科课,文科生必须选修一门理科课,这一点就说明清华着重培养“通才”而不亟亟于“专”。理工科生多选修一门《逻辑》,文科生多选修一门《生物学》或《地质学》。我就是一年级时修了《生物学》,二年级时又修了《地质学》,以此为基础,我才有条件旁听史禄国(杂)的《人类学》和《古代人类学》。我的《大一国文》教师是杨树达,《大一英文》教师是吴宓,《哲学史》教师是冯友兰,《逻辑》教师是张申府。都是赫赫名流,但当时我作为十七八岁的娃娃,确实感受不深。杨先生一辈子搞训诂,祖述高邮王氏,与他的湖南前辈王先谦前后都是搞《汉书》的。是他给我们讲述了《左传》中的《邲之战》和《鞌之战》,至今犹有记忆。吴先生神经质太厉害,那是他与毛彦文女士恋爱失败的后果,使我们做学生的很难预估他的喜怒。在英语读音上他特别强调英国味,可是当时除吴先生外,众老师全是美国味,真是“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了。冯先生岸然道貌,俨然程夫子转世,讲课纯按他的“两大本”《哲学史》讲,由于嗜巴嘴,在表达方面比较吃力。由于这位老师在政治方面的多变性,故我一生迄不与他接近。张申府当时在清华“吃不开”,但此前他却是大人物,他曾是中国共产党巴黎支部、柏林支部的创建者,黄埔一期生入学口试的主持人。他的《逻辑》课很少讲逻辑学,而是骂蒋介石,成为热门的政治论坛。听他课的不外两部分,一部分是抱持自己见解从拥护或者反对立场上来挑检他的政治论点的;另一部分则是混混学分的。他的课缴一份读书笔记,没有不及格的。以上这些评述,都是结合我自己老来的体会得出来的,当时跟他们受教时还没有这么复杂的理解。回想起来,受教于这些人,也是“大开眼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学里,你是无缘接触到这样的人物的。

但当时有些教师、有些课,也确实不怎么样,如刘崇宏的《世界通史》和雷海宗的《中国通史》就是显著的例子。刘后来在台湾被吹捧成史学的泰斗了,可当年教我们时,他的课纯乎是一大堆 ~~遭逢至理名言~~(资料),某著者、某书、某页或某页,无摘引,无转述,无议论,无概括,两堂过去,笔记

上记的全是杂乱无章的数据。呜呼！雷呢，大概认为《通史》课嘛，你讲深刻的学生也听不懂，于是就像说相声似的“扯”吧。迨年后，我至今仍清清楚楚记得第一堂老师一上堂就念诵道：

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一万八千岁。……

假如这是讲《神话学》倒还罢了，可这是讲《中国通史》呀？！古往今来，天底下地皮上，哪有讲《中国通史》这么个讲法的？！真是令人百思不解了。

说起外语系，我心里就烦躁。当年为什么选这个系呢？当年之所以选这个系，大概不外两方面原因：一是在高中时我这门功课顶好，同学们叫我“~~赵俪生~~（英语）大~~澡盆~~（家）”，后来简称“~~澡盆~~”，成了我的译号。二是英文这碗饭总可以吃上，每个中学里都需要英文教员嘛。这个观点未免太实际了。一旦入系之后，就一直感到很不得劲。只有叶公超的《文艺批评》我还感到有点滋味，其余的我全不感兴趣。如翟孟生（~~赵俪生~~）的《西洋文学史》，完全让学生背诵譬如狄更斯生于何年，卒于何年，有多少著作，代表作是什么，再就是如《块肉余生述》（~~阅者皆悦身亲感道~~）中男主角是谁，女主角是谁……等等，等等。再如我们的系主任，他几十年来讲《戏剧》和《莎士比亚》，一直拿他在~~韵录~~（俄亥俄州）跟他老师~~韵录~~上学时记录下的那本笔记留声机般地念呀念呀，真正做到了“呻其占毕”的水平。这里顺便提个笑话，电机系副主任上课和外语系主任上课无独有偶，他是几十年全靠他在麻省理工大学（~~韵录~~）记下的笔记本，到西南联大时一个调皮捣蛋的学生把他的笔记本偷了，一面向同学们预言，下星期老师必然请假。果然请假了。这位同学又把笔记本偷偷塞回到老师办公室的书堆里，又预言说这星期老师准不请假，果然有了笔记本课照上不误。呜呼！堂堂名牌大学，堂堂名牌教授，数十年中不修改讲稿，不增加新信息，不注入新见解，全凭留学国外时的笔记，这顿饭一吃吃一辈子，这叫个什么“对学生负责”、“对学术负责”呀？！钱锺书拒绝留校当研究生，说没有一个教授配当他的导师，我十分佩服他这种高傲。

无法之余，我把触角伸向了中文系。我去旁听了三位先生的课。俞平伯~~怨~~年代报刊上很捧他，也许因为在《红楼梦》上蒙过冤屈，替他平反

平反。但当年我对这位老师,却尊敬不起来。个儿是矮的,眼睛是斜的,小平头,一袭蓝布大褂。初开学的晚会上,他献演《活捉》,他演张三郎(文远),夫人演阎婆惜,他夫妻二人的昆剧修养是够好的,但看过后,心里总不是个味。去听课,繁征博引,甚至引到“先曾祖曲园先生曰”,我心里想,做学问就做学问罢啦,引曾列祖有什么必要?!朱自清佩弦先生,温文尔雅,深通人情世故,人望很高。我们同学办的刊物请他写文章,从不推辞,而且文稿工工整整,一如其人。但我到他课堂上听,一门《陶潜》,一门《李贺》,两个工作量最轻的题目,而且讲不出东西来。我们同学们私下里常常评头论足,说“讲出东西来”和“讲不出东西来”是老师中间的一条分水岭。

真正讲出东西来的,找到了,是闻一多。闻先生我在读中学时就见过他,那时他是青岛大学的教授。记得青岛大学起过风潮,学生背后有各派势力,如山东省政府、胶济铁路局之类,目的是想撵走教育部派来的杨振声。闻是杨的文学院长,所以也被起哄了,说他“不学无术”。这当然是岂有此理。但这对闻,也是个刺激。他本是新月派诗人,在美国又是学舞台设计的,现在又教起《诗经》、《楚辞》来,自不免有功力不到的地方,所以他一回到清华就拼命下功夫,许多蝇头细字的读书笔记都是在新南院写出来的。他也搞考据、搞训诂,但他比所有的训诂家都高明之处,是他在沉潜之余,还有见解、有议论,这些议论对我们学生来说,启发很大。于是,我们就一下子把闻先生爱上了,大家争着选修或者旁听他的课,闻先生一下子在清华园内走了红。但他是有脾气的,同学们也都小心翼翼着。

我是外语系的学生,对中文系教授的课,不能多种选修,只准修一门,其余只好旁听。《诗经》、《楚辞》、《唐诗》是旁听,只《中国古代神话》是选修。选修的要缴报告,计学分。当时,闻先生对人类社会、社会经济形态的一些问题还注意不多,单纯从神话搞神话,使用训诂武器,特别是音转这个法宝,搞出许多串联来,如说尧就是“鳌”,象就是大鼻子的象之类。而我们学生主要是要从他的讲课中窥察他的治学方法。他喜欢查类书,我们也跟着查类书,他讲神话,不免多涉及两汉的讖纬之书,我们也

跟着熟悉一些谶纬。闻当时动用“经解”不很多,所以我们学生在《十三经》上受影响不大;可是到了西南联大,到了蒙自,闻的学问来了个大跃进,他通过《周易》研究,把古代民俗、古代社会经济、甲骨文、训诂文学……凝炼到一起了,写出了《周易义证类纂》那样精绝的著作来。那已到1945年了,我们受业时是1943-1944年,中间有2年的时差。但我敢大胆地说,他的神话研究和《周易》研究中间,是有一根线串联在一起的。

我中年本来是搞“农民战争史”和“土地制度史”的,那是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的结果。晚年,我不知不觉回到“先秦文化史”上来,在闻先生死后若干年,又一次“受教”于他,感到他的研究实在太精湛了。可惜死得太早,若是活个大寿数,他会写出惊动几个世纪的东西来。我既然受教于他,我就得立志,以期无愧于称做他的学生。

## 第十节 摇清华大学(二)

以上,写了不少有关老师的事,现在,该来写写同学们了。

当时同学已经分派,即所谓左、右、中。中派的特色是不过问政治,闷着头干功课。他们说,俺爹俺娘在家里辛苦种地,就该好好念书,挣个好分数。右派,是指按月从南京励志社领取缘元、元元、缘元津贴的那些人,在大礼堂里往进步教授洋服上丢生鸡蛋的是他们,举手表决时一个人举两只手,纠察队查票数,查左边一区时跑到左边,查到右边一区时跑到右边的,还是他们。我们叫他们“老法”(法西斯)。左派呢,是指在共产党影响下的一批人,他们不少人最初受虚无主义影响,热情于国家的兴亡,喜欢奔走呼号,有时不免于大哼大嗡。当时清华教务长潘光旦说学生会有三类:一类是“学生自活会”,那是指弄点福利、组织组织春季郊游之类;一类是“学生被治会”,那是指被校外政党、政派暗地操纵的情况;一类才是真正的学生自治会。在各种势力明争暗斗的情况下,这种纯自治只是一种乌托邦。

可是试问,为什么大家都向左呢?这不是偶然的。国家,社会,总得

有条出路吧。“北洋”的路子是走不通的了。原来的孙中山提出来的确是一条光明大道，一条很多很多中国人都可以走的道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扶助农工”，虽然有温和倾向，可能做起来不彻底，但这些口号能号召的群众数量还是大的。但孙先生手下得力的人少，他一死，“权”立刻就被他生前并不喜欢、并不想重用的蒋介石篡夺去了。什么“天下为公”、“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扶助农工”，统统完蛋了，剩下的只是“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和“先安内而后攘外”了。这样，大家就得另谋出路。

不少人找到了共产主义。马克思生平着重讲人们的公有制和私有制，这是人类社会里最大最大的问题，最重要最重要的问题。别看现在有的国家担任世界警察，这里派兵，那里轰炸，他还是解决不了他们国内的萧条问题，这也就是说，马克思所提的公有制私有制问题继续有效。可是有人问，为什么苏联和东欧垮了呢？我认为，东欧原本是苏联一手捏出来的，带有某种附属国气味，苏联垮了东欧自然也跟着垮。那么苏联呢？我认为，它垮在一个“左”字上。

“左”本来是指人们看问题的一种倾向。但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它却成为一种政治痼疾。论它的根源说，它来自组织性和纪律性的过分强调，惟恐出叛徒、特务、异己分子等等。久而久之，这种政治的心理状态，凝固到政策和策略中去，便是我们常说的那个“左”。虽然某一时期、某一执行政策的人，也会出来反反“左”，但那是皮相的，他们一旦反起右来则是全心全意的，不断扩大的。

我上大学时，革命组织有了，“左”倾关门主义也已经有了，当然，那时的形势和解放以后不同，蒋孝先的宪兵三团就驻扎在北平，他们的便衣侦探就混在我们食堂里跟我们邻桌吃饭。只要在你枕头下找到一本绥拉菲莫微支的《铁流》就够叫你被捕了。假如再搜出来《~~共产党~~中国大革命史（简略本）》或者《清算立三路线》小册子，那么，你就被认为是正宗正派的“共党”了。所以早期的共产党人行动多诡秘，不诡秘就保存不住。我进校时，老一班的革命者如何凤元、高承志、徐高阮都毕业走了，或

者留校做研究助理人员。据说,第一任地下支部书记是牛佩琮,此人山西崞县人,在群众中威望很高。有一天我们宿舍通道里突然响起来枪声,后来得知那是蒋孝先宪兵三团的便衣追捕牛佩琮时被他跑掉了,他是从暖气管地下管道的水泥槽里跑掉的。此人后来当过周总理十一办公室的主任。“文化大革命”过后,我在北京打听如何再见一面“老牛”,别人告诉我说,黎明时候你到陶然亭公园,看见两个老头打太极拳,其一是牛佩琮,其二就是被康生整下去的前山东省委书记黎玉。他俩总在一块锻炼。牛佩琮离开清华以后,支部书记就是蒋南翔了。蒋当时还不是大官,还没有架子,尽量做到“不起眼”,即不被人注意的地步。你很难说他是哪个系哪个年级的,他入学很早了,一直在几个系里转悠着,注册了的是中文系。后来与蒋南翔并称的是杨述(杨德基),他倒是一个浪漫的、激情的、多才的少年,淮安人,在校时与我颇谈得来。“文化大革命”时他被整得很惨,据他夫人韦君宜记述,他临终前还拐着腿爬四楼,爬五楼,找头头们询问他的“结论”是什么。

具体引导我参加到革命外围的,是赵德尊。他是辽宁人,小矮胖子,从来不发脾气,是外语系比我高一级的学生,喜欢写一些短文章,笔名罗白。此人后来成了高岗的秘书长,黑龙江省委书记,《毛选》第五卷中提到高岗手下有五虎将“张、张、赵、马、郭”,这个“赵”就是他。“文化大革命”开始,有他所在单位的人到我这里“外调”,大家谈了一两个小时,适逢“小将”们到我家做“小战斗”,捶桌子砸板凳的,外调人员说,这比赵德尊那里松轻多了,在他那里这两个钟头五次战斗都过来了,而且闹得凶,因为他是伟大领袖点了名的。他在1958年组建“左翼作家联盟”清华园小组,成员有王瑶、郑庭祥(即郑天翔)、我、冯宝麟(即冯契)、邵森棣(女);王逊因为参加过“反帝大同盟”被捕过,这次似乎没有参加。此外,还有赵德尊的同年级同学李秉忱、蒋振东、张卓华、邵景渊(女)参加了没有我记不清楚了。仿佛还有王作民(女)。我们这一伙,平时都喜欢舞点文弄点墨的,组织到一起了。这是秘密组织,还需要有个公开的名目,于是又组织了“国防文艺社”,又扩大改组成为“清华文学会”。这是一个以“左联”为核心的

统一战线群众团体,我被推为主席,陈国良(即陈落)为副主席。陈是比我高好几个年级的中文系学生,是牛佩琮一辈的老革命者。

当时我们各发挥其所长。王瑶喜欢搞文艺理论,爱读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卡斯基的书,爱写书评和文学评论与论战的文章,我们叫他“小胡风”。郑庭祥和我爱搞翻译,特别爱翻苏联和俄罗斯的短、中篇小说。冯宝麟和邵森棣爱写诗。王逊是哲学系跟邓以蛰(叔存)搞美学的,有时写散文和散文诗。此外还有一位叫杨戩生,笔名魏东明,原籍浙江,出生在东北,在组织上他是北平市“左联”的成员,在写作方面他已经在国内大杂志如《光明》、《中流》等上面发表文章。有一次他说“你们都是园内作家,我已经是园外作家了”。他的报告文学(当时报告文学这个品种才刚刚创立不久)《佯台的马》在当时挺出名。我们办过两期《国防文学》,两期《新地》。还邀请过朱光潜、沈从文等文学名人到工字厅做报告。总之,我们在清华园左翼运动中承担起了文艺的这一翼,倒也还弄得热热乎乎的。后来入校的新生中,有不少参加我们的会,如诗人查良铮(穆旦)就是一例。一位天津的女作者也给我们投稿,她叫张秀亚,后来在台湾很出名。

一个人在兴趣上、在事业上要发展,孤零零冷冷清清地干,也不是说绝对发展不起来,发展起来的例子在现实中、在历史上都是有的。但假如顺应了一股潮流,那他将发展得更快、更充沛、更完好。我正是在“左联”和文学会的大家一伙的劲头下,体现了自己青年期写作的旺盛阶段。1934—1935年这二年当中,我写了几篇比较像样的创作小说,翻译了不少外国小说,特别是译了苏联中篇小说《孤独》,这是一篇写十月革命后一股叛匪的活动的。地点是唐包夫省,主角是一个富农斯托罗折夫。说到富农,十月革命后富农和中国土地改革中的富农有所差别。十月革命后,贵族大庄园主早跟沙皇一起崩溃了或者流亡国外去了,剩下来成为革命力量绊脚石的是富农,相对于中国大革命中的土豪。他们有自己的政党——社会革命党。若干蒙昧的贫苦农民跟着他们跑,就形成了叛乱。翻译这部小说,对我以后学习历史,对在历史研究中使用阶级分析法,都

很有影响。

## 第十一节 摇一二·九学生运动

一二·九运动上距五四运动 17 年，五四运动发生时我还是个两三岁的娃娃，一二·九时我已是十八九岁的青年了。这两场运动，都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群众运动，但二者间由于情况（或者说条件）不同，又有若干相歧处。如五四是反帝反封建的，其反帝是泛指英、法、俄、日、美，而一二·九时日本成为主反的对象了。又如说领导者，五四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综合影响的结果，而一二·九则纯乎是共产党领导的，不过不是以公开合法身份出来领导，而是由秘密活动取得学生会领导权而体现的，群众大多数拥护，它就有力量。再如五四的核心基地是北大，一二·九核心基地就转到清华和燕京了。从我那个年级（十级）和高一级（九级）、低一级（十一级）——这三个年级的学生中，涌出了不少不少的优秀人才，这不能不说是爱国运动锻炼的结果，正是“云从龙，风从虎”。

一二·九运动是由两个重要条件支持成功的，其一是民心，其二是组织。我思考过，光有民心没有组织力不行，光有组织不得民心也不行。所谓“民心”就是打日本。“小鬼子欺侮我们太厉害了”，街头巷尾都可以听到这个话。日本坦克在长安街上开过，日本飞机在天空演习，日本浪人在东单牌楼随意行凶打人，“胃活”、“大学眼药”、“仁丹”、“味之素”等日货广告到处琳琅满壁。东北，强占了；热河也强占了；通州也成立了“自治”政府，现在轮到华北“自治”了。学生们说“偌大一个华北，已经容不下一张课桌了”。

所谓“组织”就是指共产党。这时，正经历了“左”倾盲动路线的错误，经历了对“围剿”的错误战略，在长征路上又发生一、四方面军头头的不合，所以到达延安时真是人困马乏。但北方局这时受影响不大，仍照正常秩序运转着。当然，“左”倾关门主义也一直严重，使组织不能在群众中起更大的作用。但话转过来说，虽不能起更大的作用，但一定的作用还



是起了。各大专院校,在地下共产党支持下,左派力量远远优于国民党操纵下的一小撮“老法”力量,在各级学生会里争得领导权,最后组成北平市“总学联”,这样,学生运动之有组织、有领导的司令部,便结构起来了。

有了指挥部,还需要扩大宣传,以发动更广大的群众。在这里,一定得提到“歌”。真是歌之力量大矣哉!很多青年参加革命,都是从唱歌开始的。如《工人歌》“生活像泥河一样流……”、《锄头歌》“手把着锄头锄野草呀……”、《五月的鲜花》“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后来成了国歌),以至以后的《流亡三部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以我来说,朋友们一致说我是身上连一粒音乐细胞都没有的人,但所有这些救亡歌曲我都会唱,而且历五六十年,的今天有时仍可引吭高唱,足见其时代魅力之大。另有一首歌,其中有三句云:

摇摇这歌声唤醒了城镇,  
摇摇也唤醒了偏僻的大小村庄,  
摇摇这歌声给我们巨大的力量,……

的确如此。所以我常说,抗战是唱歌唱出来的;又说,抗战胜利是救亡歌曲的果实。这些话听起来“玄”,但其中的意思没有错。

荣高棠现在是大人物的了,当年他叫荣千祥,专门领导大家唱歌演戏的。北平有一种行当,叫卖梨膏糖的,叫卖的调子特别优雅婉转,荣千祥学来了,编入了救亡内容,大家都爱听。久而久之,“荣千祥”三字转晦,“梨膏糖”三字反而无人不知。他后来的“高棠”二字,实由此而来。再如著名演员崔嵬和张瑞芳,当年崔是私立中国大学的学生,张是北平女一中的学生,二人担任《放下你的鞭子》活报戏的两个主要角色,记得在西山无梁殿他二人这出小戏引来人山人海。通过这些宣传手段,救亡运动的气势也越来越大了。

具体的游行共五次,历时两年。第一次是1935年12月9日,故曰“一二·九”。这次不是示威,而是请愿。示威是对抗性的,请愿还不是,带有恳求之意。恳求什么?恳求出兵抗日。请愿的对象是何应钦,蒋介石

石在北平的代表。结果,请愿的群众被殴打。于是来第二次,远月远日,简称“一二·一六”。这次是示威。对谁示威?对刚要成立的“冀察委员会”,这是在日本促动下成立的、亲日的地方政府。委员长是宋哲元,副委员长是秦德纯、萧振瀛。当时的学联领导部已经有点“左”了。试想这些宋、秦、萧,也是要区别对待的嘛,这个可能死心塌地降日,那个可能动摇于降战之间,第三个可能誓死不做亡国奴嘛。可时当时的口号喊出来了:“打倒宋哲元!”“打倒秦德纯!”“打倒萧振瀛!”一派“统统打倒”的架势,还是灵元年搞农会枪毙叶麻子时候的做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左”的苗头已经从这里发出来了。

最“左”的是第三次,发生在灵元年猿月猿日,叫“三·三一”。这是一次抬棺游行。北平中学生郭清在狱中病死,大家借机举行抗议。仿制一架空棺举行追悼,地点在北河沿北大三院礼堂。一开会,宣布唱《国际歌》。《国际歌》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声音,但拿到中国抗日遭难者的追悼会上来唱,似乎不合适,果然,立刻就有人退席了。参加的人越来越少,包围的军警越来越多,革命一点也不“浩浩荡荡”、“千千万万”,而是“冷冷清清”,抬棺队伍刚到南池子、北池子接口处的骑河楼就被打散了。不久,刘少奇来到北方局,以“三·三一”为典型事例,纠了一点“左”的偏。但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这次纠偏也成了“叛徒、特务、工贼”的罪行之一。所以我说,“左”是一种痼疾。

第四次发生在远月灵日,叫“六·一三”。第五次发生在灵月灵日,叫“一二·一二”。这个日子与西安事变巧合在一天,但我们事先毫无觉察。运动已经运动了整整一年多了,经验教训总该总结出点什么来吧,果然,这次行动是比较成功的。口号也大不一样了,“拥护宋委员长出兵抗日”,“拥护二十九军坚决抗日”,“中华民族大团结万岁”,一派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表现出来了。对方也大有转变,二十九军士兵不再打我们了,不再抓我们了,而是和我们并肩呼口号。秦德纯召集我们在景山讲话,说了人要有人格、国要有国格那样的话。他的山东话把“格”不读早而读作早蚤,事后我们得知,宋哲元不在北平,他已秘密前往冀、鲁边

界去跟韩复榘商讨蒋介石被扣以后的对策去了。当日寒风凛冽,听完秦德纯的讲话天已黑下来,大家拖着游行了一天的腿徒步走回清华园,先到体育馆洗一个热水淋浴,回到宿舍已午夜员时,蒙头大睡,醒来听到宿舍里像炸了窝,大家欢呼着“蒋介石给抓起来了!”

我,作为一个个体,五次行动都在群众中参加过了。那么,我得了一些什么呢?

我想,我参加了一次“政治”活动。“四人帮”把“政治”作用吹到了天那么大,那是极“左”的疯狂。但一个读书人,也不能一辈子关起门来“爬格子”,不过问政治,那也不好,我在亲身参加运动的过程中,懂得了合适的政策能博得群众的拥护,跟你走的群众就越来越多,反之,群众就消极,跟你走的就越来越少。懂得了统一战线这个法宝,使中国革命又走上了丰富的道路,这也是世界法西斯(特别是日本军阀)加紧猖狂的形势逼出来的。

但我和我的许多同学走的道路,并不完全相同。他们是拿革命热情在搏斗中去经受考验,从而产生了参加组织的要求;又在组织中经受考验,逐渐成为组织中低层和高层的头头,后来成为大人物(这是客观的)。在一二·九后期,记得蒋南翔到我房间来。他说,“你人很诚实,在搏斗中表现英勇,这说明你革命热情很充沛,但是革命热情是多变的,它还需要组织的保证”。我明白了,他是在启发我,要我提出参加党的申请。我说,“容我考虑考虑。”过了些日子,我去找他。我说,“我读列宁的《传》,读到马尔托夫的事。马尔托夫主张,有些知识分子可以邀请到党内来作为党的宾客,而不需要他们遵守什么组织性、纪律性。列宁狠狠地批判了马尔托夫。马尔托夫是孟什维克,当时肃反,‘契卡’已经把马尔托夫列入被肃的黑名单里了,列宁却弄来一张车票叫女秘书送去,让马赶快逃往西欧。事后,列宁想起马尔托夫说,多么精致的知识分子呀。我读过后,不知道为什么,我感到我自己有点像马尔托夫。我走不成布尔什维克的道路,我受不了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我愿意做一个全心全意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同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从那以后,蒋南翔再不来找我了。

## 第五章 摇抗摇战（一）

### 第十二节 摇太摇原

芦沟桥事变后 一天 ,我悄悄锁上我宿舍 (远院 苑四号)的房门 ,将钥匙交给工友老关 ,只携带随身换洗的衣裤 ,从清华园车站搭上平绥路火车 ,于黎明时到达大同 ,恰逢开往太原的长途汽车班车尚未发车 ,我连忙搭车 ,于日落前到达太原。

事情是这样的 清华园这座恬静的园林已经叫人住不下去了。自芦沟桥炮声打响以来 ,若干江南籍的同学 ,特别是家里有钱或做官人家的子弟 ,都接到家里的叮嘱 ,物无巨细 ,统统包装起来 :“回南 ”。仿佛北平已成异域 ,他们这次离开就再也不要回来了。学校呢 ,表面装出绝不南迁的姿态 ,但实际上 ,图书馆的善本书在装箱 ,电机馆、机械馆、航空实验馆里的珍贵仪器也在装箱 ,白天不装夜里装 ,每当夜深人静之时 ,砸钉之声响彻在大楼里 ,好像小时候听大地主人家入敛时的声响。总之给人一种印象 ,北平已经可以不要了 ,随什么人要占去就让他们占去吧 ,中国的地面大着呢。

至于到山西 ,也有充足的理由。当时在全中国 ,山西是向“抗日救亡”开放得最宽的一个省区。在这里 ,不能不从阎锡山说起。

阎锡山是一个军阀 ,统治山西多少年的土皇帝。但他和别个军阀比较 ,有个极大的不同 ,他善于思维 ,善于出新点子、新花样 ,善于应付新局面。1935年红军到达陕北后 ,在“左”倾盲动之下 ,曾向东“侵入”过阎锡

山的“领地”。林彪、徐海东、刘志丹都曾率部进入山西，在洪洞、赵城、中阳、石楼一带与阎军曾有接触。晋军是有名的两支枪的部队，一支步枪还有一支大烟枪，这么腐朽怎么能打仗呢。这时，陈诚等的中央军也插进山西来，大大搅乱了阎的“地方主义”。当时阎说，他是“踩在三个鸡蛋上跳舞”。

他先组织一个社会团体，叫“主张公道团”，简称“公道团”或“好人团”。它的团歌中，说什么共产党来了，“不论贫富都难逃”。

这看得很明白，他企图挑拨穷人和富人团结一起去反共，这是很险恶的，但也是徒然的。因为地主和贫雇农间怎么能在反共上团结得起来呢？这个团体很快就臭了。阎锡山又开始组织第二个社会团体“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当他着手组织这个团体时，形势又变了一步。共产党的信使周小舟，已往返于延安与太原之间了，以薄一波为首的大批平津学生来到了太原，他们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或者相当于共青团的“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的队员。新鲜的血液注入到旧的血管里，自然就生气勃勃起来。在八年抗战中，“牺盟”建立了新军（决死队），建立了部分新政权，所以一旦日本投降，这股势力就成为八路军的一支强有力的辅助力量。

我到山西来，是参加“牺盟”的训练班的。从清华的“民先”，已经派遣过不止一批的受训者了。其中有著名的凌松如（烈士）和纪毓秀（女），我的中学同学王承鸿，还有戴新民（女），他们受过训已经是指导员或更高的领导者了。还有王玉发，传说他在太原和托派头目张慕陶有接触，被遣返回清华。半年前，“民先”派遣的名单上就有我，可是当时我正在译一部苏联小说，腾不开身。现在译稿全部杀青，寄给上海沈雁冰去了，所以我就到太原来报到。

山西是我离开山东后接触的第二个省区（北平虽在河北省内，但它是特别市，所以到北平不等于已经接触到河北省），并且一直在这个省内工作了三年，所以我的脑海内一直在盘桓着山西与山东的比较。山东人口多，当时黄河正在决口，真是一片“哀鸿遍野”的景象，乞丐到处皆是。山

西,人们一面在骂阎锡山反动,一面也承认山西境内没有叫化子,老百姓中也有穷的,但大家日子过得很安定。我常常想,这两个省跟历史上的齐国、晋国有没有关系?怕是有的。齐国自管仲以来经营工商业,所以后来的山东人眼界较宽,生活能力强。但缺点也有,也就是历来古书里说的,不免有点“夸”,还有点“诈”。晋国当年以“兵强”著称,宋、元、明、清以来,除晋北人还有点英武慍悍的特色外,晋中、晋南人全很绵软。晋中人经营金融业务和高利贷,钱庄和票号都是他们办起来的,他们这里俨然成了北方资本家的发源地和集中地了。语言情况也各别,山东话基本上还是“中原音韵”,不会发入声;山西人是不是当年晋国执行“远交近攻”政策、派遣大批人才支援越国,把“南蛮鸩舌”输入进来了,至少晋中人是会发入声的。住房也不一样,山东除地住瓦房外,一般是麦秸房顶,很简陋;山西人住窑洞,贫户是土窑,像晋中大商人住的却全是一挂一挂的砖窑,加以油漆,也十分气派。山东人的村庄是平面的,山西人的住处则是一层一层的,高高下下。下一层的房顶就是上一层的场院,记得我们的侦察兵把手榴弹插进下一层窑的烟洞里,把底下住的日本兵全炸死了。

我到太原国民师范报了到,就立刻发给我一套灰粗布军装,一根皮带,一副绑腿,编在第十连(记得第十一连是女同志,第十二连是俘虏的“红小鬼”)。吃的蒸馍、莲花菜和土豆。上午下午全是下操,中午还有一小时的“抗热运动”,即大家整队蹲在操场上让太阳晒。军官还是晋军的旧军官,有时也行些打骂。但不管怎样,当时“抗日救亡”的气氛是高的。予生也晚,赶不上 灵囿年广州北伐、灵囿年武汉分裂前的那种大气氛了,但 灵囿年太原的抗日救亡的大气氛却是刚好赶上。记得我们大家到郊外操练回来,通过首义门的城门洞,高唱着山西的救亡歌曲,有一段是:

到前线去,大伙儿一起!驱除我们的敌人,出中国去,今天是被压迫的民族,明天一切属于我们自己!自己!(“被压迫”读 遭原野原奏)

这真是具有时代性的一段歌词。记得 灵囿年秋,上海一个电影公司要拍敦煌和常书鸿的片子,要一个像是学者那样的常书鸿的访问者,用京剧说

就是找一个“里子”，找到了我。这位总导演是山西人，说起来恰好和我同时在国民师范受训。片子拍完，摄影总技师是山东人，找来一瓶白干，三人痛饮，酒醉后总导演就和我一起高唱起这首歌来，一遍一遍，热情无法控制，使敦煌的女招待员大为惊恐，担心我俩都疯了。不想这首歌在源年之后，还有这么大魅力。

可是事情又生了枝节。我母亲在青岛，为了避开日军可能攻占青岛的炮火，要将青岛的家搬回老家。这时大姐姐、二姐姐早亡故了，三姐姐也出嫁了，只剩下四姐姐和母亲二人，搬家有困难，所以写信来叫我回趟山东。我考虑我是唯一的儿子，于是就向牺盟会和民先队请了假（这时“决死队”已开始筹组，我也报了名），经由石家庄、郑州、徐州到济南。这时方才得知母亲已迁回老家，于是再往老家奔。记得当时济南开往青岛的火车是空的，只有一家往青岛奔丧的和我，可是这列车返回时却拥挤不堪了。这说明人们都认为沿海为危险地带，所以都向内陆跑。我回到老家，与年已花甲的母亲团聚了三天，没想到这是母子间最后一次的团聚。怨月初，我又告别母亲出行到济南。这次是告别，是永别。五六年后，母亲就在沦陷区病故，终年逾岁。我连奔丧都是不可能的。

### 第十三节 摇长摇沙

从老家到济南，就遇上“平津流亡同学会”的许多熟同学。原来他们是晚一步、日本军队已经进驻以后才搭轮船到烟台的。这些男女同学，一旦离开学校，离开组织，不管曾经多么革命，现在骤然间自由主义化了，成为一些无拘无束的小布尔乔亚。举两个例。我的朋友郑庭祥的未婚妻宋守莲，在齐鲁大学医学院肄业，当时我们三人再加宋的一位女同学，四个一起逛大明湖，划船，在齐鲁小卖部赌吃冰淇淋，谁吃得最多谁可以不付钱。北大的诗人鲁笛（后改为陆平）和他的女友请大家到小布政司街沂州小馆去吃“馐”（糝），这是一种用鸡汤煮的大麦仁粥饭。他的女友即席伸出她的胳膊，叫每个人在她的胳膊上签名。推却不过，我也用自来水笔

签了“冯夷”二字。事后想起,在软骨隆咚的人的皮肉上签字,至今还不禁毛骨悚然。

我也遇见了王逊,他本是济南人。不久前他在《清华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散文《朝日的园子》,说半夜以后,有咸丰朝伺候王爷的几个宫婢在树丛里窃窃私语,说日本兵已经驻进园子里来了,还在体育馆里养马。后来日本人果然在体育馆里养了马。所以我们把王逊叫“预言家”。当时他的旅行伙伴是任泽雨,任的父亲是武昌地方法院监狱的典狱长,他邀约我们到武汉,住宿可以在他家里,有时还可以吃饭,以节省旅途开支。他们说,到武汉停一停再去长沙,看一看北大、清华、南开合组的临时大学,可以上就争取个毕业,不可上时再返回北方的交战区,亦不为晚。于是我们三人结成伙伴,在郑州又遇上山西五台的同学赵继昌,四个人一路下湖广地面上去了。

人的眼界是不断开扩的。小时候不知道“山”是什么样,十岁从黄旗埠坐火车,开出一站是岢(拏)山,还没有陕西汉唐皇帝的陵墓那么大的一个土疙瘩,但那是我见到的第一座山。到青岛,看见了大海。到北平,看见了皇帝的宫殿(这地方要叫我住我会感到很不舒服的)。现在到了武汉三镇,真是令人胸襟不禁大大开扩。当时中国航空员与苏联航空员并肩与日本飞机进行空战。由于战争刚开始,人们对轰炸的惧怕心理还不重,我们坐在轮渡的甲板上从报童手里买过《新华日报》,一个字一个字细读上面三版连载的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了。这时头顶上正有一架日机中炮,一溜烟扎下来。心里油然地觉察到,真是面对到大时代、大场面了。想起《桃花扇》里写明末左良玉镇守三镇,“想俺左良玉镇此名邦,好不壮哉!”我当时也油然有了“壮哉”的感受。

“壮哉”之外,也还有小实惠。譬如北方人总是吃面条,到武汉就尝起米粉了,四个人叫一锅子,又叫“锅面”。还有就是街上到处有卖莲子的,热热的一小壶给你倒到碗里,加一块桂圆。几十年后我又到武汉,满街上找这种莲子,已经找不到了。

到长沙,一进小吴门韭菜园临时大学的校园,就碰到朱自清先生了,



他说茅盾先生几次打电话问我报到了没有,仿佛有什么急事,他还把沈的地址告诉我,还说沈的住址很保密,不可传扬出去,他不愿接触过多的人。我按地址去找,在郊区一位教授的二层楼寓内找到了。当时鲁迅已经过世,茅盾算文艺界的头号人物。他瘦小,不多说话,说话冷冷的,不流露感情。身上裹一件皮夹克。从外表看,他很像个特工人员,而实际恰恰相反。他告诉我,我的译稿他收到了,转手交给了王任叔(巴人)先生,已编入“大时代文艺丛书”。再多的话他一句也不说了,我只好告辞了。三年后,我在陕西乾州中学教书,他在重庆军委政治部第三厅,我们之间又通了十几封信,信和谈话不一样,有些儿热情。当时他使用的姓名是沈今甫。可惜这些信,为了躲避特务搜查,统统毁掉了。

我们考入了一个“乡村服务团”。同时考入的有韦君宜(魏藁一)、程之平(骏声)、周荣德、王修(王谦益)和我。韦和程是共产党员,他们报考,怕是党的指示,表示对党外人士的事业也要支持。这个服务团,是“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主办的,领导人有关阳初、瞿菊农、熊佛西等,全是名人,特别是晏,大声讲演,声色俱厉,俨然是一位大人物、大政客。他还邀湖南省主席何键来讲话。他上身很长,下身很短,身段有点像袁世凯,文化水平大约与韩复榘处于伯仲之间,说着一口诘蹇的醴陵话。

训练两星期,我和王修编入二分团,下到衡山县石桥铺。被安排在一位保长家的二层木楼上。场景揭开了:一清早我和王修下楼小解,顶头碰见一对老夫妻和一个年轻媳妇,三人一起跪在保长门口,看样子已经跪了一整夜了。问情况,他(她)们说,老夫妻的独子、新媳妇的丈夫被抓壮丁,怕跑掉,一直捆在保长的牲口圈里。我们到牲口圈里一看:果然。我们马上去找保长,保长还在睡觉,好容易叫醒,他说,“你们只是宣传宣传打日本什么的,其余的事莫管。这不是你们的事。”呜呼!关阳初的“抗战服务”原来仅是如此啊。

我们是这样想的:抗战不是单纯地打日本,应该借打日本的机会,多多少少把国内的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松散一下,这样会放出更多的能量。譬如像阎锡山那里,至少还有那么些条文吧,什么“赚



的同学(湘西少数民族)。他分配我和王修,再增添一位比我们岁数大些的原中法大学学生吉喆,三人去离石参加“第二战区总动员委员会”;长沙来的中学生赖□另分配到一一五师学兵队去了。

我们先搭火车。这时太原已经沦陷,火车只通到灵石县的南关镇。深夜,我们在南关镇下车,住进一家店里。这里,临战景象特别明显,就以店里的那条大炕说吧,若干伤兵已像罐头里的鱼一样摆在那里了,我们三个几乎是插进去的。创疼呻吟之声,不绝于耳。翌晨,有不少于三位伤兵已于夜中死去了。我们从这家店出发,步行五天,前往离石。

一路经过双池镇、大麦郊、康家峪、中阳县等地,有一段遇见傅作义三十五军的军车,好心要带我们一段路程,却把我们带向偏西的西楼丛山之中了。这时,正好是1937年开头的几天,寒风凛冽,刺人肌骨。但我们也总算领略了晋西,这里正是1937年林彪过河与晋军交战的地方,也是两年后决死二纵队与阎军“新”“旧”两军交战(所谓“韩钧叛变”)的地方。有时,终日奔波于荒山之中不见一户人家,黑下天来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单户人家,男人们都死了或者跑了,只剩下一个70岁老婆婆,苦苦恳求,老婆婆找出一点莜面做猫耳朵,蒸了蘸着柿子醋吃。莜面是燕麦磨成的粉,我从小说里得知,俄罗斯人惯用燕麦喂马。

离石,明、清时候叫永宁州,“一州管三县”,显然为较县稍大的一种建制。它的城池虽不大,但很坚实。它北邻临县,东邻汾阳,西隔黄河与陕西吴堡为邻,南邻中阳。有一条水叫三川水,是东川、北川、南川汇合起来的,别看是寒冷地带,我亲眼看见水面上游着鸳鸯。语言和饮食习惯有点与陕北类似,例如有两种食品是我到老来都想望的,一种是“钱钱饭”,是把黄豆一颗一颗人工砸扁,像小制钱似的,熬到小米稀饭里;一种叫“黄儿”,是用发酵的小米糊放到带盖的小铁鏊子里煎出来(山东的鏊子是大,小米糊不发酵)。十字街上有一家很讲究的馆子叫“近古香”,做出来的菜和点心都是上乘的。

“动委会”就设在这里。主任是续范亭。续氏家族传统以反阎著名。续范亭原是孙中山先生的部下,由于曾在中山陵剖腹自杀以示反蒋而名

闻遐迩。组织部长是南汉宸，是做秘密联络工作的，在大学里他是经济学教授。人民武装部长是程子华，晋南解县人，跟关羽是老乡，他的十个指头在红军战争中不少于三根被打断了，他用笔写字有一定困难。宣传部长是李公朴，未曾到任，由副部长赵宗复代理。赵是赵戴文的儿子，燕京大学毕业，共产党员，“文化大革命”中他被红卫兵迫害跳楼自杀了。以上，就是“动委会”领导层的阵营。

城南三里有个村庄叫马茂庄，在“动委会”领导下有个“西北青年工作团”驻扎在这里，实际上也是“民先”的晋西北队部。我、王修、吉喆三人就被分配在这里。这里的头头叫马寅，上海人，回族，年龄比我还小好几岁，人们说他是穿着豁裆裤破格入党的，此人后来仿佛是国家民族委员会的副主任了。我们到达前不久，从河南襄城调来一批女青年，年轻活泼，天真幼稚，叽叽喳喳地整天说个不停。她们的头头叫刘大学（襄城刘氏是颇有点文化传统的），有一些才华，一只眼从小就盲了，所以总戴一副墨晶镜。在这堆女孩中，又有一个刚从“动员宣传团”调来的，她就是我以后的终身妻子——高昭一。

她是河北正定府的人，后期师范毕业，人长得不漂亮，个儿也不高，更说不上窈窕，性格有些生硬、别扭。但不晓为什么，我一上来就感觉出她比另外的女孩们深刻。我常给儿女们说，找对象不能全面要求，只有一点“配”上，就能过一辈子。截止到当时为止，我是个搞文学的，小有才，有一点肤浅，也有相当的骄傲。但我有一个优点，这就是童书业经常说，赵俪生“服善”。看见谁有某个优点，既不贬低也不抹煞，而是不断地称道。高的优点，就是她比我早涉足于社会科学，早接触到政治经济学，譬如，她当时已读过高岛素之的《资本论大纲》，而我则不曾。当然，我也读了满肚子的高尔基、绥拉菲莫维支，她也不曾。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嘛。

我们俩有两次较密切接触的机会。一次是被分配在一起编一种油印小报，拨一孔窑洞，炕上一个炕桌，我二人盘腿对面坐着编报。另一次是被分配到城北四十里大武镇（这里是西晋末匈奴酋长刘渊即帝位的地方）去办一轮“农民训练班”，给一批选拔来的农民讲“合理负担”、“减租

减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结业后他们回去组织农民救国会。离石有好几个区里的农教会是非常出色的，人干着这个工作一方面感到很累，另一方面感到比在湖南何键底下工作过瘾多啦！这是动了一点“真格的”嘛。上课之余，还给民兵教歌，这是高的事，我浑身没有一颗音乐细胞，只是陪陪而已。记得她教的一首歌的头一句是：

摇摇炮火连天响，战号频吹，决战在今朝……

当时我想，多么难记的烦冗的歌辞呀。几十年后读外国人索尔兹伯里的《长征》，才知道这是杨尚昆夫人李伯钊在毛尔盖作的曲，这时延安整风尚未出现，文学语言大众化尚未提出来，所以这首歌的知识分子气息还很浓厚。我设想，这也许是高昭一在太原国民师范十一连受训时跟十二连的红小鬼那里学来的。她教歌之余，也教我唱点昆曲《林冲夜奔》。北昆的集中地是河北高阳，距正定不远，所以她自小就有机会听白云生、韩世昌的演唱。她又教我唱一支民国年间的歌，叫《胡上招魂曲》，其中有几句云：

摇摇凄苦的湖上，  
摇摇雨斜风狂，  
摇摇没有渔火，  
摇摇也没有灯光。

我特别钟情于这几句歌，到老来还一直唱唱。就这样，我们在工作中混在一起混长了，感情就自必由一般的朋友、同志的关系，向更高处发展。

她是城里人，接触面比较广，且自幼丧母，在继母手下长大，就比我懂事得多，显得比我成熟。遇事总是她出点子，她带头，我跟在后面。我想，这样也好。不久，我们又调到离石县的“动员实施委员会”，这是一个比总“动委会”低一级的单位，但优点是能接触到基层。这机关设在离石县城内北城墙根的黑龙王庙里。主任是赵迺光（原名裕如），河南孟县人，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学生。他比我大几岁，所以同志们喊他“大赵”，喊我“二赵”。这时，王修也调来了，刘大学也调来了。女同志住正房（北房），男同志住厢房。有一天，我到街上买了圈根芝麻滚子，这是用麦芽

糖卷起核桃仁、冰糖碴等做成的一种食品，请大家开个茶话会，宣布我和高昭一已经是夫妻了。

用老式的看法，我们的成婚未免有点仓促，酝酿期太短，会不太成熟。但我们俩认为已经成熟了。这是战时嘛，宜于突击式。试想在正常时期，我们的结合会遭遇多少阻碍。要父母之命，要媒妁之言，要合八字，等等。就以属相说，她属虎，我属蛇，书上说“蛇虎如刀错”，那还了得？！但我们这一“错”就“错”了五六十年于兹了，足见相书上皇历上多是些无稽之谈。

我从长沙八角亭买来的那块手帕，终究有了它的得主。

## 第十五节摇柳林和王老婆山

县动员实施委员会的工作分配开了。离石县五个区，城关区、大武区（县东北）、吴城区（县东）、柳林区（县西）、碛口区（县西北）。赵裕如和刘大学留驻城关区，高昭一和韩昌泰去了吴城，王修和刘兴邦去了大武，我一个人去柳林，碛口由当地青年薛玉龙暂代。

听说柳林现在已独立成一个县了，已经高楼大厦林立。当时则还是一个区，不过工商业较其他区发达罢了。我手下有两个地方干部，一叫高如山，一叫王导昌（此人后改为王大昌，五六十年代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党委书记）。我住在高如山家里，办公在一座破庙里，工作依然是办农民训练班，组织农民救国会，监督执行合理负担，减租减息。我这样工作了二十多天，日本人就打过来了。但就在这二十多天里，我还是碰到并处理一些事情。作为清华园中的一名大学生，到此地才算是得到了一些实际的锻炼。

譬如康克仁的事。康克仁是康家峪的一个地主。土地不是很多，但在穷乡僻壤地方他就算个尖子了。一年前，最初号召组织农民救国会，康克仁有意见，他认为老财和受苦人怎么能尿到一个壶里呢，于是他另外组织了“富农救国会”，还挂了牌子。这行为当然不好，带有某些对抗的气

味。但当时从陕北过来的以丁玲、吴奚如为领导的文工团，感染了很深的“左”倾偏向，他（她）们不作说服工作，直接下命令叫民兵前去一绳子将康克仁捆到镇上扣押下来。后来他（她）们一阵风走了，问题给我们留下。我们经过研究分析，在土地改革时期，康可以是“革命对象”；现在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康就不应该是“对象”了，况且无论如何不经批准用绳子捆人，扣押不放，群众有反映，康也不断上告。我们呈请县里批准，将康释放回康家峪，他愉快地参加了农民救国会。许多中小地主闻风而动，对参加农民救国会不再抱有顾虑了。

正忙得不可开交，县里的电话打来了，叫紧急撤退。说日本军队自汾阳越过黄芦岭、韩信岭，以快速兵力进攻离石，并企图进一步控制黄河上通陕北的重地——军渡。县里叫我们先撤到碛口，再待命到集合地点集合。高如山、王导昌全是柳林本地人，家中的事还需处理。我就带上几个青年往碛口去。在碛口找到薛玉龙兄弟。当夜，就在碛口区公所住宿了。碛口这地方很别致，位于黄河岸边一个山包子上。路呈环形，绕到北面是临县三区，绕回到南面是离石第四区。黄河流在山陕峡谷之中，水势激荡。幼时读《木兰诗》，“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现在身历其境了。

接电话，日军已经进了离石县城了，县领导单位都进入了三角地山地中，叫到山地中集合。清早出发，中午到一个大村庄叫骆驼局，县里的人差不多都在这里，县委书记张巢来了，动委会赵迺堯来了，人民武装自卫队大队长阎志清也来了，他手下的几个连队也带到了山地中。我妻高昭一仓皇中乘三十五军军车回来，燕尔新婚，分别一个月，又聚首了。在那种年头，一旦冲散永远失迷的事是很多很多的，我们算侥幸了。

当时的情景，真有点像《铁流》。部队质量极差，只缘像的战士有枪，其余的只配几颗手榴弹，有些小鬼连手榴弹也没有，跟着走路。县里的工作人员把家属也带来了，老婆、娃娃、毛驴儿，……这样的队伍真难带呀，把个自卫队大队长急坏了。他的办法是，到一个村庄，首先严密封锁人们的来往，在附近村庄捕捉敌人的探子，同时派出我们有经验的侦察兵，出

到各路侦察,我们听取回报,研究决定应战对策。这座丛山叫王老婆山,命名有什么依据,我来不及研究。山名新奇,村名也新奇,什么骆驼局、野狐局、蓝家山、上段段、下段段……十天光景,我们这个庞杂的人流就在这些乱山中转悠着,找寻敌人封锁线上的弱点,企图突围北去,可是始终达不到目的。日本重兵,驻扎在离石、军渡、碛口,呈三角包围。三角间的公路上,由蒙古德王手下的骑兵往返巡逻。他们已知晓,县里的主要人物都在山里,所以扬言要搜山、清乡、扫荡。我们突围突不出去,在山里又稳定不下来,这真把头头们急坏了。

最后他们决定:外省干部(不能操地方乡音者),通过黄河上的筏子送往陕北;本地妇女儿童隐蔽在老乡家里,作为逃荒来的亲戚;只剩下较精干的武装人员,强行突围北去。按照这个决定,张渠、高昭一,河北人;大赵、刘大学,河南人;我,山东人,这五个人纯是外地口音,一旦被俘虏,日本人辨别不出,手下的内蒙人是辨别得出的,不好混过去,所以只有撤到陕北。指定碛口干部薛玉龙兄弟负责办理筏子和筏工之事,地点选中碛口以南、军渡以北的孟门、枣峁一带。事情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时值猿月上旬、农历正月末二月初,我们准备过渡。两块大木板用粗绳捆成一只船的样子,两头各放一只酒篓,内装沙子,以稳住筏身。经决定,我、高昭一,一二〇师的一位侦察兵三个人第一天过渡;余三人第二天过渡。当时上流飘下的大冰块甚多,对筏身的撞击力太大,终于两块木板被撞散了,我们三人一齐落水。幸亏当时距离西岸已经不远,那位侦察兵左手抓住我,右手抓住高,拖上岸来,浑身已灌满了冰水,鞋都被冰块冲走了。当我们光着脚丫子踏上沙滩时,感觉到沙滩热呼呼的。

这里是陕西吴堡县的横沟村。“横”字地方语读“斜”,所以叫斜沟。陕北的老百姓真好,他(她)们看见筏子翻了,就跑来一大堆人救护。他们腾出一孔暖窑,让我们上上下下统统脱掉,换上他(她)们的内衣,然后把浸水的衣服拿走,洗的洗,烘干的烘干。第二天,大赵、张渠、刘大学也到了。我们在这里休息四天,答谢了老乡们,向延安进发。



## 第六章摇抗摇战 (二)

### 第十六节摇延安道上

我们五个人 ,三男两女 ,打着绑腿 ,系着皮带 ,背着各自的小行李卷 ,辞别横 (斜)沟的乡民 ,向延安进发 ,这一程走了十天。这中间有个道理 ,两个女同志在三角地带的突围中消耗太大 ,有下部流血现象 ,所以我们有意把进度放慢。

从东北向西南方向走。要过三条河的流域 ,一是无定河 ,二是清涧河 ,三是延河。无定河在历史上是有名的了 ,“可怜无定河边骨 ,犹是深闺梦里人”。河边上 ,坐着绥德城。绥德城也是有名的 ,“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 ,这是指吕布和貂蝉的。这里是专署所在地 ,地委书记兼专员刘澜涛 ,我们后来在电视上看到他已经很老了 ,~~竟~~忆年他可是个中青年模样 ,记得他睡觉的地方是一架铁架床架在土坑上 ,高高的。他批评我们擅离火线是怕死 ,是“武装逃难”。我们虽然心里不服 (明明是组织决定嘛) ,也只好听着。他写两封介绍信 ,介绍两个党员上抗大 ,三个非党员上陕公。

陕北这地方是没有什么景点的 ,只一路听到山鸡叫 ,叫的调门挺急躁的。据说 ,关中土地分散 ,陕北土地集中 ,过去的土地差不多集中到两家 :艾家和杜家 ,仿佛从李自成时候就是如此。这里据说有 100 个县 ,再穿插一些镇店 ,如义和镇、瓦窑堡、甘谷驿等。第 1 愿天上我们宿甘谷驿 ,第 2 怨天上宿刘万家庄 ,鲁艺部分学员驻在这个村里 ,听到有河东来的 ,都围过来

问长问短,带着羡慕的口气说,你们已接触过敌人而我们还在学习。第二天,我们到了延安,凭介绍信在招待所里住下。

说到延安,后来人们一直叫它“圣地”。正如毛泽东说美帝是纸老虎又是铁老虎、最终是纸老虎一样,圣地有它“圣”的一面,也有不一定怎么“圣”的一面,最终还是不愧为“圣”地。我想过:“圣”在哪里?我的答案是,革命的、抗日的理想主义,百折不回,就凭这一点它“圣”。当时全国都呼喊抗日,但有假的,有半真半假的,只有这里的声音是最真诚的,最高亢的,最打动人心的。不然,为什么南洋华侨不远万里往陕北奔呢?

我常常这样回过头来想:一个人参加革命,参加一场战争,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一件简简单单的事情呀。当然,一些少年头脑一热,就参加了什么什么,这样的事也是有的。但慢慢地,他的头脑就复杂化、深刻化起来,觉察到他承担了的是一桩非常严肃、非常沉重的事情。特别是女同志,像一些四川女孩参加红四方面军、后来成了西路军,在河西遭受马步芳野蛮军队的刀砍、奸污、活埋,这些后果在最初参加时像捻麻线一样,线头早就捻到里头去了。理想主义和牺牲绞到一块,其所以伟大就在这里;其所以“圣”,道理就在这里。

我为什么说有不怎么“圣”的一面呢?因为有两桩大事,当我们到达延安的时候,一桩正在收尾,一桩正在开头。

收尾的是张国焘的事。张国焘如何评价,我不想牵涉,其实我也不懂。他在川康地带企图另立中央,这也不能说是“对”。但他究竟是到了延安了,一、四方面军总是会师了,可是“后账”却算不完,什么“积极分子”脱下草鞋打张的耳光的事也有了,把许世友这样耿直的军官判了刑的事也有了。团结是两方面的事,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我们到延安时正是张名义上担任边区代主席,实际上却是游山逛水、不理政事、策划出走的时候。毛、张不团结,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不团结——这总称不上是“圣”吧。

正在开头的事,是“反托”。我们是1935年猿月中旬到延安的,听人们讲,1935年10月有一架苏联飞机降落到东郊机场,从机上下来了王明

和康生。毛泽东迎到机场,高呼“从昆仑山上下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下来的,已经是斯大林主义了。托洛茨基如何评价,我也不想牵涉。只是上中学、上大学时听人们讲某某是托派,究竟如何我也不懂。反正在我的印象中,在斯大林头脑里,托洛茨基、布哈林是十恶不赦的坏东西;在毛泽东头脑里,张国焘是十恶不赦的坏东西——我只懂得这些,在“文革”中,人们挑出来一句话,无产阶级是解放全人类最后解放自己的,仿佛是至仁至义的,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对待当初并肩过的伙伴倒是如此的狭隘,如此的酷毒呢?!这也总归称不上是什么“圣”吧。

康生是我的小同乡。我外祖家在诸城城里,康生的张家也在诸城城里。诸城在传统上是出大地主大官僚的地方,康生从这个传统里长大出来,又到欧洲和苏联去披上了第三国际的辉煌的外衣,然后回到延安,就合情合理地成了“无产阶级”的酷吏和谗佞。我们到延安时,这些才刚刚开始,几年之后,就发展到整风运动和抢救运动了。当时在个别几个机关的大院里,已经可以看到“肃托”的大字报,其中已经有了“把埋藏在我们身边的敌人统统挖出来”这样的字句。于是我私下里对妻说:“我们不宜于在延安长期呆下去。你知道,我基本上是一个懦弱的人,一个不富于勇敢气质的人。碰见斗争,我不是凑上去,而是躲在一边。虽然我对政治不是一点也不感兴趣的,但最终还应当是一个文化人,而不是什么政治家。我们已经信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点是不变的,像封建社会的女人嫁了丈夫一样,‘妾心古井水’。但我们不一定在这么集中的场合里搞,我们可以到松散一点的场合去搞。并且,我是一个先天地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人,平生最不喜欢开会、听报告、服从组织分配,等等。像我这样的人,在延安呆下去,会有什么好下场呢?”

我妻同意这些观点。在这里,请容许我再补充一下我自己的一些观点。老革命们经常爱打一个比喻:革命像一列火车,有的人从起点就搭乘了,直到终点。可是有些人是半路在小站上上来的,这无可非议,觉悟有先后,“革命不分先后”嘛。另有一些人,从半路小车站上下车了,这就有议论。在“左”倾思潮占主导的年代里,人们说这些人是“叛徒”,少说也

应该叫“变节分子”。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关键要看他出卖不  
出卖革命。他出卖了,那就是名符其实的“叛徒”或“变节分子”。假如他并  
没有出卖,只是“不干啦”,那么革命组织,第一,不应以“叛徒”、“变节分  
子”的帽子随随便便往人头上扣;第二,“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也,我  
必不信也”。革命组织也自必有不足之处。况且,革命的终点又在哪儿  
呢?于是我二人便去告知那另外的三位,我们没有“解决组织问题”的紧  
迫要求,因而没有必要住陕公,我们要经由西安取道去晋南或者晋东南,  
回“第二战区”。他们没有表态,既未赞成亦未反对。可是钱呢。五个人  
从离石出来,全是穷光蛋,试想,每月五角钱津贴,会攒下什么钱呢?我从  
武汉回到临汾,口袋里剩下缘块钱中央票,高昭一在“动员宣传团”是有  
工薪的,她攒下了圆缘块晋钞。这就是我们结婚时的保证金额了。自吴堡  
出来,五个人的花销,全靠高昭一这圆缘块晋钞支付,现在已所剩无几了。  
恰好我有位青岛胶济铁路中学的高一班的同学叫阎世臣(改名阎晨,是一  
二九学生运动中北师大的头;当时北大的头头是陆平,清华的头头是姚  
依林,燕京的头头是黄华),他现在是高双成部队延驻安办事处的主任,主  
动资助了我们圆元,后来在宜君的饭摊上又巧遇陆平自武汉回延安,他  
在临汾曾与我交换过一套衣装,他把八路军全套军装脱给我,我把中山  
装、人造麂皮茄克脱给他,便利他到武汉做工作。现在又遇见了,他又资  
助了我们缘元。我们就是凭这圆缘块钱旅行到西安的。

这一路的景点,比北方要多了。一过□县就是三十里下坡三十里上  
坡的一条大山涧,老百姓说这是杨六郎把守的三关口,也只好姑妄听之,  
因为“三关口”太多了,豫南有,晋北有,旧察哈尔省北部也有,谁也定不  
准哪儿是杨六郎把守的。到中部,是民族始祖黄帝的桥山陵墓(这自然是  
象征的),我们由于疲劳也顾不上去瞻仰。到宜君,巧遇上安丘景芝赵家  
本族人开设的一家“店”,既管住宿也管吃饭。讲论起来,老掌柜还比我  
矮一辈呢。临别时坚不收钱,一片乡谊和族谊。离开宜君不到半天路程,  
在我们眼前便展开三十里红光火艳的桃花,老百姓说这叫哭泉,是孟姜女  
哭出来的泉水滋养出来的。我可以这样说,平生再未见过比这更娇艳的桃花,

北平西郊大觉寺的桃花是看过的了，由于地寒，较此犹有逊色。老友王瑶说过，对一个地方，你可能无数次地来，也有可能再也不会来了。对哭泉的三里桃花我是不可能再来了，但留下的印象很深。路上的不少赶毛驴的老乡，送南方旅客到延安，回程是空的，我们就商量叫高昭一搭乘一段路，我步行着“或前之，或后之”，分道时付一点“脚钱”。在第九天上午到了三原。这里是商人聚集的地方，旅馆过道里全是浓妆艳抹的妓女。“又回到资本主义了”，我和妻说。第二天一早我们走上最后一天的旅程，从黄土高原的劈缝处，我们居高临下第一次眺望见“八百里秦川”。

## 第十七节摇在西安

西安可不是个简单的地方，它是国民党反共的前沿阵地。街上经常遇见带桃红花领章在巡逻中的宪兵。双十二事变中蒋介石是在这里栽了跟斗的，他就要在这里振振他的威风。省政府是纯蒋家的了，此外，中央军校第七分校设在这里，中央训练团干四团设在这里，西北青年劳动营设在这里，到延安去的青年有一部分就从草滩渭河渡口糊里糊涂地被“转移”到劳动营去了。街头小摊上摆着《抗战与文化》这样一本刊物，主持人叶青和柳宁以污秽不堪入目的辞藻在辱骂着共产党。我心里想，像这样的货色才是不折不扣的叛徒、特务，而“不失第三号人物身份”的张国焘，跟这些渣滓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他在美国肯萨斯写成的那部回忆录还大致是有所本的嘛。

我夫妻先到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把介绍信和“民先”转关系信统统缴了，“民先”西安队部的负责人戴中衷是我大学时物理系的女同学，她说，往日这里住的地方很多，这几天港、澳和南方来的青年特多，实在住不下了，暂时另找个地方住下吧。至于晋南和晋东南方面，写信来要求有文化的青年去做政治工作的部队不只一家，只要双方谈妥，就可以转关系，随他们的人出发，路费由他们出。

我们只好找一家小店住下。然后出到街上。哎呀西安呀，雪白的面

条不带肉的愿分、带肉的员角,雪白的馒头,这对我们吃了十个月小米、棒子和高粱的人,真是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并且,西安的风味小吃,品种也真多,什么醪糟(甜酒)、油拓、白纪饼夹肉、粉蒸肉、羊汤泡馍……。不过这里不是供给制,样样要钱的,我们哪有这么多钱呢?通过一位“民先”成员的介绍,我在“灾童教养院”找了一个临时工,每天上午给娃娃们带带早操、教教歌、教娃娃们练练大字小字,每月员元工资。高昭一妇女病加重,不能参加工作,按照中医的建议,到五味什字的“藻露堂”去买一种“培坤丸”,效果良好,她就这样一直服用下去了。

在这里,有必要写到我的两位叔叔。他们都是国民党政府的中、高级官吏。五叔是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专员、河防处处长,兼山东修防处主任,是简任二级的官员。他少年中过秀才,之后就到北洋系统下做直隶的或者天津的河防小吏,从小到大,一直熬起来,靠资历吃饭。生活不免腐朽,吸少量的鸦片,身边有个扬州籍的姨太太,有一辆包车,上下班乘坐。七叔是日本广岛师范留学生,同盟会会员,参加过国共合作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以也说得是国民党的老前辈了。他和张继(溥泉)是好朋友,经张的介绍,邵力子请他担任了几任边远县的县长,因臂部伤残,就在民政厅当一名主任秘书。而民政厅厅长彭昭贤是悦毅派的大人物,七叔和他不合,就请病假在家,拿干薪了。他一妻一妾,有女儿,有家乡来一个老者管理杂务。

两位叔父算得上是民主,一看打扮就知道我们是八路那方面来的,可他们不盘问我,只按亲属礼仪接待,不加谴责,也不加表扬。有一夜,军警宪兵进行全市紧急大搜查,指着我问:“他是谁?”“舍侄。”又问“您是谁?”七叔掏出一张名片,警宪看过敬一个礼,“对不起”,退出去了。这显然就是一种保护了。他们人情世故是懂得很深的,所以不用开口,就数次主动拿出十元或五元,充当我们的零用钱。兼以我在《七月》、《文艺阵地》、武汉和重庆《新华日报》上的稿费陆续寄到,所以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并不十分困难。

闲下来,就夫妻二人去逛生活书店。这家书店在马坊门,附近南院门

还有一家旧书摊。这两处都有不少好书。另有一家开设在中正路、东大街拐角处的小书店,有时有不少外文书,如英国版本的《雾月十八日》和苏联版本的德国作家细格斯的小说和沃尔夫的戏剧等。我设想,这些书是一位自苏联回国、经延安要到重庆去、避免关口盘查的同志卖出来的。我从延安新买到的中国版《列宁主义问题》连书页还未裁开,不是就被宪兵一伸手拿走了吗?

## 第十八节摇中条山下(一)

“民先”西安队部戴中衷同学的通知来了,有全国总队部的武克仁同志要到晋南督导工作,与他同行的有夏支队(山西夏县人民武装自卫队)的梁副官,他受命接我们去部队。于是我们四人结伴启行,坐火车到陕州(今三门峡),过太阳渡到平陆(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就是平陆人)。这里有竹子,挺稀罕的。老话说,“山南曰阳,河北曰阳”,是有道理的,渭南在华山之阳,平陆在黄河之阳,都产竹子。再从平陆北行,过一座很大的镇——张店镇,再北行就到了夏县。住一宿再往北就是夏支队的驻扎地——尉(yǔ)郭镇,支队部、政治部全住在一座大庙里。人们说:“河南人有钱买炮(枪),山西人有钱盖庙”,信然。我们在晋中、晋北、晋南各地行走,几乎每个村庄都有一座“庙庙”。

晋南,又是一个新境界。它和晋北、陕北不同,气温较暖,是产麦区,人们不专靠吃小米过日子,也掺吃麦子,但不舍得吃细白面,吃带麸皮的粗面,蒸馍和擀棋花面。夏天,水果很丰富,林檎很多。林檎,山东叫“花红”,是一种小苹果,不过林檎含铁素多,咬开过一会就出现氧化铁的颜色了。这里也盛产西瓜和柿子,老乡檐下挂着一串串的柿疙瘩。这里的人没有晋北人的粗犷,也没有晋中人有的精细狡狴,而比较平易和缓。晋北梆子腔调高亢激昂,晋中梆子比较细致暖和,而晋南这里唱的是“□□”和“乱弹”,尾音拔高,和河北的“老调”有某种相似处。老乡在田野里劳动,一边劳动一边唱道:

摇摇有孤穷、行军 心好急躁，  
摇摇想起了关、张弟 痛苦号咷。

这“急躁”、“号咷”二字突然拔高，令人感到别有风味。

在民国年间，这里是反阎区。阎锡山是五台人，“会说五台话，就把洋刀挎”，他部下多起用晋北人和晋中人。于是以续氏家族为首便形成一股“反阎”派势力，续氏虽是晋北崞县的，但势力多在晋南，如运城的学者景梅九（号称“南章北景”，章指章太炎）也是续派反阎的健将。总之，在晋南这块地方，人们对阎锡山是有一定离心力的，跟孙中山先生倒有一定的接近。

现在抗战了。日本人打来了，以运城做他们的堡垒。探照灯整夜整夜向四处照耀，这是威慑，也是怯懦。没有必要时，他们龟缩在运城市内；有必要时，就出来骚扰风陵渡、夏县、平陆，杀人放火。有一首歌当时非常流行，其开头几句是：

摇摇张老三，你听着，告诉呀哈你，  
摇摇我本是山底下上来的，  
摇摇亲眼（niǎn）看见的，……

看见的，就是杀人放火。谁保卫老百姓呢？阎军不见影儿了。蒋介石派过来两支部队，云南的老三军和四川刘湘部下的四十七军，军长叫李嘉裕。他们也不是拼命抗战，而是见机行事，打有利就打，打无利就保全实力。在这样的形势下，夏支队的人们看出了要建立一支真正保家卫国的人民武装的必要。这个见地，是高明的，甚至是伟大的，但这份工作却是艰苦的，十分艰苦的。他们最初收集到的，只是些地方热血青年和四处下来的散兵流勇。要把这两股力量捏成一块，这工作可真不容易。

还有一件事，就是“左”倾盲动主义，在这支部队也非常严重。在我们夫妻参加这支部队前三个月，“夏支队”第七中队长王毅哉等八人就以“托派”嫌疑在黑夜中突然被包围枪杀。康生从昆仑山上带下来的风，很快也刮到夏县来了。王毅哉据说是一个办办报写写文章、办办剧团演演戏那样一个在山西小有名气的文化人。八人中有两人是大革命时期的老



党员,在盲动的“肃托”中也一同被杀害。1958年11月,夏县县委发出《文件》,予以平反。将这些人的家属按牺牲军人家属优待,但这已经很可怜了。

“民主建政”这桩新鲜事物已经出现了。所谓“民主县长”是指民选,经阎锡山的任命,而阎的任命又是根据“牺盟”的推荐的,推荐前这些被任命者又都是经中共研究确定了共产党人,如夏县县长李涛、芮城县长张虎臣等。除王宿人被害外,其余解放后都成了大人物。

这支部队的政委,就是李涛。李,东北人,东北大学学生,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头头。支队长王学林,河北人,是从正规军垮下来的,微有城府。政治部当时还未正式成立(霍钟秀尚未到任),只有组织、宣传二科。组织科长孙雨亭,宣传科长朱敬熙。孙是夏县本地的老革命,后来是云南省的省委书记。朱是浙江人。支队下辖三个中队,第一中队长万连芝,没有文化,是“二杆子”型的人物。我夫妇二人,就在他连担任正、副指导员,主管文化教育和政治教育、教教识字、帮助战士们写家信,替战士写入党申请书。当时大家同吃、同住,部队游动时我们随着游动,伏击时他们却编个理由叫我们留在第二线管后方勤务。这也许是一种不信赖,但也可能是一种爱护。我们接受了这种安排,第一线送下来伤员,高昭一就和卫生员一起进行护理,第一线传下来话,叫选精干战斗员支援时,我就以代理连长身份选拔上人送上去。这是我一生中担任基层连首长的经历,想起来心里很熨贴。

几个月中,我们连队就在这三四十里方圆的地面上转悠着。这些村名,至今依稀记得。计有,大洋村、挪过村、白张村、西董村、西阴村、司马村、禹王城……其中几个村,还具有历史的意义,如司马村就是司马光的故里,西阴村就是考古学家梁思永带领考古队发掘仰韶彩陶的村子,为此还出过一本专门的考古报告。当时,我们可没有功夫“发思古之幽情”,二十里外枪炮声正密集地打成一片,临战时发生的事情,往往是人们所预料不及的,必须把每一根神经动员起来才能勉力应付。

这一带社会秩序很不好。日本人的烧杀就不去说它了,当时从临汾

方向溃散下来的本国散兵流勇为数不少，他们或单身或二三成伙，凭着随身携带的枪枝和子弹，就放肆地刁人抢人，甚至强奸妇女。我们夏支队，为了建立我们的声誉，就得着实做两件事，一件是给自己战士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第二件是自觉地担负起“保境安民”的任务，对那些确实做了坏事的予以逮捕，甚至处理。想起来很可笑，当时没有法律，无法可依，我们就是法律。记得当时我们处决过三次人，都是组织科长孙雨亭担任像审判官那样的角色，我担任像书记官那样的角色，开群众宣判大会，由受害人当场哭诉，我们宣布罪行记录和判决，立刻拉到附近高粱地里就崩掉了。这样镇压一下，对社会秩序的好转有很大的效果。过境的散兵流勇就要小心一些了。

我们还得做间谍工作。派遣间谍到运城市内刺探日本人的动向。个别有成就的间谍连日本宣抚班里的情节都可以侦察出来。另一方面，还要严防从运城市内“皇军”宣抚班派遣出来的间谍，他们主要任务是“策反”，拉拢我们部队中的人动摇叛变，投到他们那边去当“皇协军”，宣传说当皇协军一个月发多少大洋、外加许多优惠等等，以瓦解我们。有党籍的侦察员进了城可以找地下组织，所得到的情报的可靠性就更大。有一次，侦察员回来跟我谈，“指导员呀，我碰见你的老同学啦，是个女的，穿一身呢子军装，可姿势啦，听说她是从燕京转到清华的。她的职务是宣抚班班长。说着一口流利的日本话……”今事隔 缘年，我到底猜不出这个人是谁。我问这个女性的姓名，侦察员说，用的是日本姓名，四个字，最后一个“子”字。

日本官兵，经受了军国主义的教育，绝大多数是极其凶残的，但也愚蠢。他们的智商没有中国人高，这是其一；其二是对中国他们是初来乍到，对我们的地理、风俗不熟悉，所以瞎闯胡来的情况是有的。举个例，和国民党军作战我们警惕心就高，相对地对日本人就低得多，日本兵进入村东口了，我们还慢条斯理地坐在村西口饭摊上吃饭的事是经常有的。有一次，运城的敌人声言要打夏县和尉郭镇，坦克、大卡车都开动了，广播说要扫荡尉郭镇上的“共匪”。我们的支队部和政治部自然都撤到山上去，

临走时他们说，“老赵 咱们给日本人留点礼物。”“什么礼物？”“在庙门山墙上留几幅日文大标语，你是通晓日文的嘛。”惭愧，我在学校确实选修过钱稻孙先生的“大一日语”和“大二日语”，可是受参加学生运动的影响，并没有学出水平来。支队部和政治部各留一名警卫员帮助我，给每人留一匹马。当时找不到油漆，只好用红土拌到胶水里，爬到高梯子上刷标语。

摇摇铁砲たくれ、優待いいだしましよ（缴枪不杀）

枪炮声已在镇北口密集地响起了，我毫不惊慌地工作着，心里油然地升起了一股中国人的自豪感。三条大标语刷完，我们三个人各爬上一骑马背，抄小路进山去了。

## 第十九节摇中条山下（二）

经历了三个多月的戎马生活，我就病倒了，是恶性疟疾。这个病跟一般疟疾不同，也许几天不发，也许一天发几次，并且对人的损耗度要大得多，不但战斗生涯维持不下去，就是躺着也十分痛苦：发烧、头痛、泄肚、不思饮食。我们的部队，连个医务所也没有，连“奎宁”这种药也没有。经头头们研究，由高昭一护送西安就医。而我们的单位竟穷到连一点医疗费都发不出来。

我已经走不太好了，但还是得走，走向平陆。在这过程中，有两件事，需要在这里记一记。一件是在冯卓村邂逅了一位晋南的民主人士吴仲六先生。前年（~~一九四〇~~）我的一个学生从太原写信告诉我，吴仲六先生还活着，还担任着山西省的政协委员。那次初识，他不过三十上下，高高的个儿，喜欢谈学问，理学、周易、马克思主义他都涉猎，他是景梅九先生的弟子。晋南的村庄有的很奇怪，是一座桶状陷在地平下的像罗马斗兽场那样的所在，陷下约有两层楼高，崖头上种着树，树根可以保持土质的稳固，崖底下就打成一孔一孔的窑洞，里面住着一户一户的人家。总起来这块桶状凹陷地就是一个村庄。我把这叫做北方的桃花源。仲六先生把我们

安置在他的客房里，深夜里不断有黑衣、黑裤的人来找他，各自掏出手枪，哗喇哗喇地理着子弹。我想，吴生怕还兼有着豪侠的身份。

第二件是从吴先生的冯卓村出来走不上一小时，在一片黄土塬下，我见到了一个半掩埋了一年光景的战场。那是北平的二十九军的一部，被日军围歼在这里。人体可能已经搬移过了，只剩下一些马体半曝露着，肋骨已经干裂爆开。还在咔叭咔叭地响。我夫妇肃立下来，向他们默哀。说起二十九军，总是有一股浓厚的感情的。

到了平陆，我就干脆不能走了。幸好，这里有卫生所，有奎宁丸，夏县的病号交给了平陆，在这里我躺了四五天。病情略好，就过河搭火车往西安去。七叔把我收容了，我和他的老仆住在一起，高昭一住到北马道巷三十五军留守处，因为她的老师、傅作义将军的机要人员崔载之先生正在那里招收政工人员，组织政治部。高昭一住在那边，白天来护理我。七叔住在粉巷，前后三道院落，第一道原由王以哲将军住，双十二事变他就被打死在这里，于是变成了“凶宅”，租给粮店存放大米包了。第二道院子由七叔家住，第三道院子由房东住。二道院子没有厕所，妇女上厕所要到三道院子，男人上厕所要到头道院子，记得我夜里扶着手杖，摸着墙去上厕所，想起房东家人说王以哲将军的灵魂夜里在院中踱步，皮鞋声清楚可闻，我就不禁毛骨悚然，感到病不觉加重了许多。

由秋入冬，七叔又想出了新点子。他过去提拔的一个人，现在是临潼县卫生院的主治医师兼副院长，七叔就托他把高昭一用为“挂号员”，有工薪，有一间住房，我就作为她的家属接受医疗，并进行疗养。当时临潼县长张锋伯（杨虎城旧部）是七叔的老朋友，如有缓急可以找他帮助。华清池就在隔邻，随时可以走过去洗温泉浴。事情就这么安排下了。而我，以病危几次之身，竟得以慢慢恢复，活了下来。

“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指着我的鼻子说我是革命阵营里的“逃兵”。现在我回忆录写到这里，我想，假如我真是“逃兵”，我真该逃了；可是我没有逃，这怎样解释呢？在游击队，每月缘角津贴，吃小米饭，害了病没有一分一角的医疗费，只好靠血缘关系来把病治好，但是一旦治好，我

们又主动地归队了,这怎么解释呢?假如不是为了打日本,假如不是由于爱国,我夫妻二人都不是傻子,我们为什么这么干呢?

回来了。几个月工夫,部队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已经不叫夏支队了,而是由晋西南各县人民武装自卫队(夏县支队、芮城支队、平陆支队、闻喜支队……)联合组成的“政治保卫队”了。原夏支队已编为政治保卫队第三支队。队部所在地也改变了,已不在平原上的尉郭镇了,现在已迁到丛山中的涧底河镇附近的关家霁霁。涧底河是牺盟中心区所在地。所谓“中心区”,实际上相当于后来的“地委”,“不是枪指挥党而是党指挥枪”嘛,部队首脑部总要在党的附近。我们回到政治部,为了照顾我的体力,我们不再下队了,我在宣传队工作,高昭一在儿童团工作。别小看我们的儿童团,那个小团员孙岳后来还成了周恩来总理秘书班子中的主力人物哩。

我几乎成了宣传科的“大拿”。宣传科定期出刊一份油印小报,发到班、排上去,是一种教育材料。报由我主编,社论、短评由我来写。支队还办了一种“军事干部轮训班”,挑选一些优秀的班、排干部到山里来听课。课由我讲。课计两门:(一)《新三民主义论》,(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用的都是延安解放社新出版的书。这讲课,在我一生中意义很大,所以记忆犹新。

记得是在一条小河沟边上,绿柳刚刚抽条,战士们排队过来,先把枪架好,每人一个坐垫,盘腿坐下。等看见我来了,指导员喊一声:“起立!”“敬礼!”等我还过了礼,他们重新坐下,掏出笔记本来。我从来不“照本宣课”,就是“宣”他们也不懂。我是把那两本书融合贯通了用自己通俗的语言讲。所以下自战士、上至部队领导,都一致反映这课的效果好。多少年后,我开玩笑地对妻说,“可不要小看当年的讲课,那是后来历史学教授的发轫之地呀。”

晋南各支部还召开一次军政干部的总结大会,由政治部主任霍钟秀做总结报告,我做记录。会毕由我编写成一本油印小册子发下去。小册子展示了晋西南各县人民武装力量的增强。

可是与此同时，踩着三个鸡蛋跳舞的阎锡山又发生了变化。他从一个一心一意依赖新军，又转变为“抚旧抑新”了。他又重新起用那些“败军之将”杨爱源、王靖国、孙楚、陈长捷们，磨刀霍霍，准备向决死队一纵、二纵、三纵和政卫队发动进攻了。他已于1945年一月召开“秋林会议”。

在这里说几句闲话。1954年、1958年，我和高昭一连续两次到昆明开会。当年游击队的组织科长孙雨亭同志刚从省委书记的任上退下来，担任人大的主任。他在翠湖饭店盛宴招待我夫妻，记得席间有麂子肉、鹿筋、猴头等，最后上来“过桥米线”。酒过三巡，孙对我说：“老赵呀，当年有个事要跟你说清楚。那次晋南干部总结会之后，调整班子，你已是公认的宣传科长啦，可是到头来还是老朱上你不上，你知道为什么吗？现在可以说破了，就是因为老朱是党员，你不是。论工作，无论编报、讲政治课，老朱都远远不如你，可他是党员呀。我讲这些都是叫你打破平生不参加党的戒律。你不入党，党不吃亏，你吃亏呀。”

我回答说：“老孙，你说错了。不是我吃亏，是党吃亏。这类事实，替入党做官论打造下坚实的基础，这跟‘不正之风’和‘党干部腐化’有密切的关系。顺便我讲个笑话。我几十年来从来不是哪一级的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有位好事之徒到省委书记那里去质问，回答说，每次增选名单都提上他去了，可每次党委审查会上都通不过，大家的理由是‘这个人谁也掌握不住’。这个话的逆定理是，只有党能掌握住的才能当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那么，我宁愿一辈子不当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仍能愉快地生活，丝毫没有吃亏感。”

话不觉说远了。赶快拉回来。我们所在的山，是一座美丽的山，不像太行那样。太行雄伟嶙峋，但缺乏娟秀。中条很娟秀，到春天黄色的小刺玫开的满山遍野，香气馥郁。它像个海星鱼，有四五个爪爪伸出去，东北方向的伸向闻喜、绛县，东南方向的伸向翼城、阳城（又叫太岳），西南方向的伸向芮城、解县，隔一条黄河，几乎和太华连脉了。古时候它叫雷首之山。到宋代道教影响似有与唐代佛教抗衡之势，也造出若干“仙”的神话，其中“八仙”是一组骨干神话，这些“仙”们最早的活动场所就在中条，

特别是张果（即张果老），他就是这地方上的人。

我和妻找一个工作清闲的时候，也出去登山涉水，感到这中条山的“里环”要比“外环”漂亮多了。碰到一家老木匠家，买了几块梨木，请师傅给推平，回到政治部做了几幅木刻，作为插图登在我们自己编的小报上。从这时起，我已经在自己的小本上做写小说的笔记了。一年过后，当我过起中学教员的生活时，我便打夜工写成了中篇小说《中条山的梦》。这小说先在郑振铎主编的《文艺复兴》上作两期连载，然后在海燕书店出过两版。1949年代初，在《人民日报》的读者来信栏中，有一位解放军战士投书说这本小说“败坏了人民解放军的伟大形象”。我读到后，感到这位战士的头脑太形式化了，不懂得什么是发展，什么是由粗到精、由小到大的发展历程。在他看来，人民解放军从呱呱坠地就都是个个雷锋。不是这样。事情都有个“前期”，我写的不是成熟了的人民解放军，而是它的“前期”——人民游击队。前文我已说过，散兵流勇的成份很大。

当然，我并不是不需要自我检讨。我写这本小说的时候，才二十三、四岁，阅世甚浅，对人物和事件融会塑造的能力低，自觉不自觉走着一条自然主义的道路。雨果说，什么就是什么，妓女就是妓女，卖淫就是卖淫。我在小说中也写着散兵就是散兵，流勇就是流勇。这样写，好处就是保留了时代的真实记录，缺点就是使那位投书的战士觉得不满足。我的缺点就是缺少塑造这段工序。

## 第七章 摇抗摇战 (三)

### 第廿节 摇乾州中学

1949年夏初,我又病倒了,这次是痢疾,大便中带脓血。并还夹杂着疟疾,是比上次更不定期的一种疟疾,中医说这更麻烦。于是仍由我妻伴送西安治疗。这次我们过的是绳池渡。在渡口遇到“牺盟”中心区的头头们回来了,情绪不高,大概秋林会议的气氛已经显示出阎锡山要“磨刀霍霍”了。

这次未住七叔家,住五叔家,在西门里城墙下的一座小院里,门口挂着牌“黄河水利委员会山东修防处”。不久,河防人员传来消息,阎老西的新旧军已经磨擦上了。在街上遇见原夏支队的政委李涛同志(现在的政委是刘裕民同志),他请我俩到东大街曲园饭馆吃饭,他说咱们的部队已经转移了,很难找,晋东南阳城一带阎记旧军已经在大规模地屠杀新军、新政权的干部了。他劝我俩在西安观望观望再说。

我中学的一位老师杨展云(字鹏飞)这时正给陕西省教育厅厅长王捷三当秘书主任,他和五叔商量,还是让我教书吧。这个意见传达给我俩,我俩犯了很大的周折。当时我们身无分文,夏初了还穿着部队的棉军装,天天跑到一个叫建国公园的亭子上,看见几个小孩每人叫一份饮料,我们就叫不起。我们考虑,从部队到教书,这是人一生中一个大转折。缘年后的今天,以宏观的眼光看,这个转折没有什么错,一辈子教学、科研的道路,这是一个开端。但在当时,舍弃了前方到后方,离开革命队伍到国





升旗 ;夜里要查自习、查宿舍卫生。直到九点多回到家里 ,这才是另一面的人了。我在油灯的碗里加一根捻子 ,坐在从学生冯德益家借来的一张白油漆二屉桌边 ,展开我几乎是通宵的写作。在这两年半的时间里 ,我完成了三件事。一是写成了中篇小说《仲条山的梦》,本拟再写一个续篇《战斗的繁花》的 ,写不下去流产了 ;二是译成了德国进步作家 云·沃尔夫的十二场剧本《维也纳工人暴动记》(又名《福劳利德镇》,又名《奥京喋血》);三是初步搜集了一些关中学者的文集、诗集和理学语录 ,这件事象征着我已准备从“新文艺”向历史学“跳槽”了。

在这里 ,关于德国作家的剧本 ,还须多写几句。这是我从西安旧书摊上买来的莫斯科版英译德国文学作品。沃尔夫和细格斯(女)是当时留驻第三国际的两位作家 ,前者写剧本(著名的《马门教授》就是他写的) ,后者写小说。我译的这个剧本描写希特勒未吞并奥地利以前 ,奥国的工人运动部分还执掌在第三国际和社会民主党手里 ,工人运动领袖对奥国独裁者陶尔斐斯抱有幻想 ,时时企图妥协。第三国际的领导人倡议展开斗争 ,一直发展到武装暴动 ,结果还是失败了 ,不得不越过国境 ,逃到苏联去。这是在季米特罗夫提出“反法西斯联合战线”口号之前 ,人们把“斗争”绝对化时代的一次典型事件。这部稿子迟到 1956 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入《沃尔夫戏剧集》出版。出版前 ,由出版社出面 ,从大牢里觅到一位据说是参加过希特勒法西斯组织的反革命犯人替我校订 ,此人文化水平不低 ,替我校订出不少误译 ,足见我在乾州中学可以动用的资料书之贫乏。但对我来说 ,这部译稿却像在离乱中养下的孩子 ,一辈子不断地想起它。

在这两年半中 ,有两个朋友来乾州看过我们 ,是我们生活中的大事。其一是王瑶 ,他刚从沦陷区混在许多山西商人队里到大后方来。不久以后 ,他又到遥远的大西南去拿大学文凭和研究生文凭去了。其二是程之平 ,原名程骏声 ,他是河北人 ,在一二九运动中因与反动派动武而引起过诉讼。当前 ,他是《西京平报》社的记者。不过 ,这是公开身份 ,而隐蔽的身份则是中共西安城工部的工作人员 ,用国民党的语言说 ,就是“匪特”

(即“共匪特务”)。他来乾州,是要发展我夫妇二人担任城工部的一些工作,如利用我的两个叔叔是国民党政府的简任官和荐任官的条件,打听国民党在军队调动、金融改革、工业实况、陆空运输方面的情况,提供参考。我夫妇愉快地承诺了。言明接头人不管姓什么,名字总叫“育人”,手里一定拿着一本罗曼·罗兰的《生与死的搏斗》。这个工作,一直持续了六七年之久。“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死叮住我是“国民党特务”,后经外调,得亏程之平兄多次为我写了详尽的证明材料,才不再被逼供。不管在多大的曲折里,只要坚持“真的就是真的”,就可以保持正气,就可以不为以后的历史再制造出更多的谎言和假案。

做情报这件事事关紧要,可是乾州的那伙小党棍都是低能之辈,无从发觉,他们却把我和茅盾先生的通讯跟踪上了,封封信检查,查完盖一印章:“乾县县党部检查验讫”。信内说的是小说或剧本稿子与发表的事,下款总是署“沈今甫”,他们也无从晓得沈今甫就是茅盾。可是我却紧张起来了,我要找他们的“上边”,于是借去西安的机会,到梁府街陕西三青团去找了老同学洪同。洪同原名洪绥曾,福建人,当时是宣传部长。他介绍我和他们的组织部长陈中经认识了,解放后陈的真正身份才公开,那么洪的身份是什么呢?至今不明显,只知道他是一位在海峡两岸间飞来飞去的大人物。当年,他一听到查信的事就提笔给乾县三青团的头头写信,说赵某人是一位爱国的青年学者,请对方和县党部书记长多多尊重,云云。这一措施很生效,查信的动作停止了。洪又写一封信叫我去看一位清华留美的老校友吴启诚。吴当时是胡宗南的中将高参,住在西安西南郊王曲镇的中央军校第七分校。我问程之平“去不去”,程说,“当然要去。接上这个关系有很大好处”。于是我就去了。

吴启诚根本不像一个军人,也不穿军装,说话夹杂不少洋话,英语、法语都有。家庭生活也是纯自由式,洋规矩比中国规矩多。那时,美国副总统威尔基到西安,就是他陪同,兼充翻译。他还喜欢写写中国诗,古诗、律诗都写,有某种文采风流。他对人也不戒备,一见如故。从他口中,可以了解到许多西安的复杂政治情况,所以此后我一到西安就必定去看他,二

人仿佛交成了很好的朋友(后来他自杀了,胡宗南亲笔为他题碑“布衣好友吴启诚先生之墓”)。

“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审问我,“你认识吴启诚吗?”我回答说,“当然认识。”“你们是什么关系?”我说,“你去问组织。”事后,这个红卫兵说,“我问了,组织也不知道。”可见组织的档案里光懂得记人家的“坏事”,好事全不著录。可是中国人不著录的美国人却著录了。1959年源月我到美国参观访问缘天,在纽约州立大学亨特学院,其历史系主任杰姆斯·哈利逊教授约我便餐,有他的两个同事作陪,其中一人叫酝即擗即定整那潭(华名张格物),是副教授。突然问我:“陨霖赠志,澡若遭藏,葬悦身,或置城,有城,蚤,藏”(“我听说你曾是共产党特务,是吗?”)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蒙受了一场侮辱;第二个感觉,就是美国人的消息比中国灵敏。于是我含含糊糊地回答说:“我一辈子只是一个读书人。”

事情说远了,把笔再回到乾州来。我在乾州中学所教约员四个学生中,只有一个最知心的,那就是周可任。周不是乾州人,是岐山县益店镇的人,个儿不高,样子较土气,脸上有块疤。他说,那是他小时候他祖母抱他下地,把他放在地头上。狼来了,叨住娃娃就跑。祖母是小脚,但仍死命追狼,拼着老命从狼嘴里抢下自己的孙儿,剩下这块疤。这个人的特点,是心地非常淳朴,一旦感染上革命文艺和革命理论,就一头扎进去,把一生奉献了。他在乾州上初中,在西安兴国中学住高中,又到河南大学文史系,因参与反内战反饥饿斗争被开除,到豫南南阳府的泌阳县当中学教员兼为人民解放军做地下联络工作,不慎被发觉,被白崇禧部活埋,壮烈牺牲了。他那老祖母从狼嘴里抢下来的孙儿,终于被另一种狼所吞噬。

在乾州,我害过一场平生最重的病——伤寒病。那时我圆原岁。发烧慢慢上去,一星期达到顶点,出现昏迷;再慢慢降温下来,一星期才渐渐平复。这两个星期是主病期,其前其后还有之前的预发期和之后的反复期,总共两个多月。毫不夸大地说,病到顶峰时,有几度濒于死亡。当时,我的长女赵绛已经出生半年多了。难为我妻,又要照料不满周岁的婴儿,又要照料重病的丈夫,有两个月功夫她几乎是衣不解带的。也难得我的学

生吴少波的祖父吴让三老先生,当时已七十开外的年纪了,扶了拐杖天天来为我仔细诊脉、仔细修改处方。天下的坏事可以转为好事,自从这场大病之后,我此后一生中很少害病。我心里想,是不是我肚肠内若干细菌经这次高烧统统杀死了。这个话被医疗专家听去也许会笑掉牙齿。

## 第廿一节摇西安高中·扶轮中学

陕西省教育厅有一年突然发动全省中学生单科抽查考试,这次是抽查《英语》,结果是乾州中学得分最多。这就引起西安高中校长侯良弼的注意,他到处打听乾州中学的英语是谁教的。有人告诉他是厅里杨秘书长的一位学生教的。于是,他去找了杨鹏飞,说从下学期就给我致送聘书,邀请我到西高去教高二级四个班的英语。于是,自1944年第一学期起我离开乾中到西高执教。

西安高中当时是陕西中学里的最高学府,原设在西安东厅门,抗战开始迁往汉中,目前又自陕南迁回关中,在泾阳县租赁商会的房子安置下来。这个小县城很平静,城外有一片泾干湖,湖中有芦苇和野鸭,老师们下了课可以到湖边散步。街上一家馆子,做的粉蒸肉别有风味,可供雅集。但我最感兴趣的是校长侯良弼。

侯,华县人,武昌高等师范(即武汉大学前身)毕业,教数学。此人是陕西教育界的名人,也是一位怪杰。他着力实干,不顾别人,所以兄弟学校说他是教育界的“恶霸”。当时,我的妻女尚在乾州一时未能搬迁,我一人只好搭公灶,侯的家眷在老家,他也是单身,所以我们一天三餐同桌吃饭。陕西的习惯,吃饭非常简陋,一碟盐、一碟辣子、一碗醋,很少专炒的菜肴,饭大都是棋花面,午饭有蒸馍,如此而已。我有时不爱吃这种饭,而侯校长却甘之如饴,吃劲很大。在饭桌上,我有机会听到他的不少怪论。

“我(侯)们陕西人叫你们山东人噻(gi)咋了嘛。”有一天他开腔了。我大吃一惊,“我们山东人把你们陕西人怎么啦?”我问。他接下去

说,“**灶燥**当过富平县县长,还当过高陵县县长,啊(哪)一个村树木多,娃娃多,田务殖得好,必然是山东庄子。啊一个村树木少,娃娃少,田务殖得坏,必然是**灶燥**们陕西庄子。打官司问你啊嗒人,回说山东人,**灶燥**说,大老爷不管,回你山东打去。又回说,回大老爷。**灶燥**们现在可成了陕西人了么,我说**灶燥**对着哩。”像这类言语,经常是他说得津津有味,我吃着棋花面低头静听,要和他抬杠是抬不完的。

有一次,他提到关麟徵。他说“**灶燥**把他开除咧,还告诉他,你驴日的娃将来有点儿出息,回来把你侯校长看**早燥**。过些年辰,**灶燥**正在南柳巷家里憩着哩,门斗拿进一张片子,上写‘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关麟徵,陕西□县’。**灶燥**赶紧招呼门斗,说侯校长莫到(意为“不在家”)。”我把这故事在家里说了,“侯校长莫到”就成了习惯用语,每逢有不愿或不便接见的访客,孩子们就使这句用语,当暗语传递。

他也有很正气的时候。有一天,他送来两个客人,气哼哼地坐到饭桌上说,“驴日的杨尔瑛<sup>①</sup>派他的手下人来高中要发展三青团,**灶燥**告他,不得成!**灶燥**不要!只要**灶燥**侯良弼(翥)当一天校长,三青团就发展不成,**灶燥**只叫学生把书念好。”这在当时政治形势下,实在是罕见的了。

可就是这个侯良弼,在**灵犀**年镇反中被枪毙了。镇反大会上,在麦克风前揭发批判的,就是当年西高的国文教员余达夫,他事后说,侯五花大绑插着亡命招子,还不时用仇恨的眼光瞪视着四周。我是这样想的:毛泽东临终前一两年的回忆录音还对有关人说,“当年你们杀了叶麻子。<sup>②</sup>像这种人,不杀比杀了好。”在镇反中,以我所见,陕西杀了侯良弼,山东杀了刘次箫,河南杀了李宏毅(逸生),都属于一类性质,都属于毛泽东所说“不杀比杀了好”的一批人。

学校又搬迁了,从泾阳迁到西安南郊翠花山。这里的风景更美了,真是小花异草,满山遍谷,随手采来金银花可以泡茶喝。西安城里闷热,翠

① 杨尔瑛,当时三民主义青年团陕西省团部的主任。

② 叶麻子,即叶德辉,清末湖南的学者、藏书家。

花山上沁凉。我想,唐朝搞政变的太平公主,这一带就是她的活动场地吧。不过缺点是太荒凉,没有充足的图书期刊,学生仅仅学习老师们教下的那么一点点东西,营养不足。但有人说,战时状态嘛,就该如此。

在这个学校里,有个姓杨的女学生,蒲城人,功课挺好,有时到我房里问功课,我挺喜欢她。我离翠花山,她一直送我到山口。后来她有信来,妻说这是插入的“第三者”。此后我就跟她断绝了来往,至今她的下落不明。

我在西安高中只教了一学期,1954年暑假后又转移到扶轮中学。理由是:一、铁路系统较地方系统多一些补贴;二、在高中只我一人有职位,到扶轮夫妻二人有职位,我是高中英文教员,她是初中历史教员。

扶轮中学全名陇海铁路郑州扶轮中学,是一个有名气的老学校,抗战开始后迁到汉中,又迁蔡家坡。蔡家坡本是一个荒僻的小车站,抗战开始后,中国银行天津分行总经理束云章(江苏丹阳人)将巨额资金投资开发西北,创办雍兴公司,选在蔡家坡办了三个厂子(纺织厂、机器厂、酒精厂),蔡家坡这一下就日益繁盛了。三个厂子建在平原上,在铁路的北沿;扶轮中学则建在黄土高原的坡上,借一个庙宇(龙泉寺)旧址又补建许多平房而成的。

蔡家坡,属岐山县。在三国时候,曾是魏、蜀两军一度在此对垒的地方。蔡家坡镇以东,黄土高原坡上有个台,俗称司马拜台,传说是司马懿筑台拜将之地;自蔡家坡向南,过了扎在渭河上的草桥,草桥以南就是高店镇,传说杨仪杀魏延于此;再往南,是五丈原,就是诸葛亮临终观星拜斗的地方了。据说“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破四旧,要砸烂诸葛庙,老农们拿起杈杆保护诸葛亮,红卫兵终究没有砸成。

扶轮中学没有教员宿舍,在一个叫小坡村里借(或租)老乡们的闲置窑洞安插。我们家被安置的,是三孔大窑洞中的一孔,另两孔闲置。我们所住窑洞,门脸上的悬土一旦掉下来,可以将全窑人窒死在内。窑内有两耳窑,筑成炕状,可作卧室。当时当地,治安情况很坏,土匪半夜烧人。“烧人”者,是将被土匪估计藏有鸦片烟或白银元的人家的男或女主人,

绑吊起来,拿柴火浇上煤油烧,勒逼他(她)们缴出黑白二物。不少老婆子宁烧死也不说出藏处。土匪当然没有必要烧我们这些穷教员,但一夜数惊,也大大妨碍备课。于是与村中不远一家老汉(叫李过海)商量,借得他家暖窑一孔,与李的儿子、儿媳、孙女同院而居,可以守望相助。这孔窑也相当大,窑洞深处喂着一头牛,夜中牛粪气味,沁人心脾。当时没有电灯,发洋蜡照明。夜中点上蜡烛在炕桌上备课。

这孔窑洞,在我们生活中是有历史的意义。因为在这孔窑洞里,我与三个学生结成了深交。他们是束布、金彭、赵宏才。束布,江苏丹阳人,其父束樵如是上述束云章的族侄,当时担任他的主任秘书。束布的母亲早故了,父亲娶了继母,从此他感到了人生的凉意。他具有内蕴的才气和毅力。不久后到重庆复旦大学,就以 圆圆- 圆岁 的年华写下数十万言的文艺批评文章,用“石怀池”笔名发表在茅盾、胡风主编的大型文艺刊物上。日本投降后,他正准备返回他的故乡参加新四军工作时,不幸在渡嘉陵江时“舟覆,惨遭灭歿”(其父讣函语)。他复旦的老师章靳以为他搜集遗文,辑成《石怀池文艺论文集》出版。当时在扶轮高二级,身体稍显孱弱,口齿微微结巴,但内蕴很厚。他的新文艺兴趣主要是从我这里读了许多手稿后诱发的。当时为了避免被搜查,我的许多文稿和许多不宜公开摆在桌子上的书如《海上述林》,统统放在房东李过海老人自备的棺材里,束布他们对此秘密已经熟悉,就像到图书馆一样,自己掀开棺材盖自己取读。

金彭,后用名金铿然,南京人。当时在班上他是美男子,真可以说是年少英俊。兼以他正同班上最漂亮的女学生骆雪娟交朋友,简直整个学校都羡慕这郎才女貌的一对。他们俩到重庆,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干新闻事业和国际联络工作,曾在约旦、叙利亚等中东国家建立新华通讯社。那种生活是很艰苦的,他们夫妇也闯过来了,并且锻炼出一份很高水平的英语和法语能力。现在,骆已是白发皤然一老姬,金也经常卧病在床,有时合力译几本左拉的小说。金至今还兼着国务院国际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



赵宏才,后用名赵洛生,浙江奉化人。他是高三学生,我没有教过他,他是跟着束和金到我家里来的。他两只眼睛骨碌碌地观察着环境中的人和事,说明他是个很精明的人。是一个精明人,但也是一个终身坎坷的人,他一辈子都有戏剧性。他父亲是陇海铁路豫东北一个小火车站上的站长,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打仗时,蒋就住在站长家里,由于是老乡,所以很拉近乎。他哥哥赵宏器,兄弟二人同在重庆中央大学,他哥哥学工,主张科学救国,他学文,及早参加了共产党,主张革命救国,兄弟俩经常辩论,引得很多同学也参加辩论。他兄弟二人,每人坚持自己的路线。他在南京被捕,住过国民党的大牢,越狱逃脱了;“文化大革命”中又坐了共产党的大牢,又越狱逃脱了。逃脱后流浪在苏北、豫东的乡野里,感染伤寒几乎倒毙在路边上。他从学生时代,就善于做秘密组织工作。在扶轮中学,他就跟他的同学、后来的外交人物——柯在铄在一起发动了一场风潮,要求改良同学们的伙食。当时,铁路职工子弟供给膳食,可是经过层层克扣,学生吃的饭很糟糕,大米中有沙子。柯、赵就领头起来反对校长林群,林是中统特务,使用政治力量把风潮镇压下去了。柯、赵是应届毕业生,学校莫奈他们何,只有叫他们走了拉倒;但束、金是高二生,于是就受到了“勒令退学”的处分。又由于柯、赵、束、金是经常在夜里到我家小窑洞里来玩、来谈的;一定有人打了小汇报,所以我夫妇二人也受到聘书一年满期后不续发聘书的处分。我们教书四年,还不曾遭遇过这样的对待。我们很气愤,但也莫奈林群何。经束布父亲的推荐,我于员毅年暑假后受聘到山坡底下三家工厂旁边的雍兴工业职业学校去教书。

## 第廿二节摇雍兴工业职业学校

### 第一分节

雍兴工业职业学校,是中国银行系统的学校,师生待遇都比一般学校优厚多多。以学生说,专门招收初中毕业水平的学生。入学后供食、供衣、供宿、供学习资料,还有生活零用钱。以老师说,所聘大多数是工程师

以上职位的人,待遇比当时在武功的西北农学院的教授还高。与现实的工厂生产相结合,学校分两科,机械科和纺织科。教师除分别属于两科之外,还有个普通科,教高等数学、物理、外语、历史等课的,隶属于这个普通科。我和我妻即属于这个科。培养三年。所用课本和讲义,多采用大学工程科系水平的教材。

我们夫妻创立的这个大家庭,经历了五年极端艰苦的阶段,天可怜见,现在进入了温饱的新生活。我们有了一处住房,一外间,一套间,后院有厨房和储藏室各一小间。有电灯。但受战时影响,窗子上还不能装配玻璃,只能用白纸糊,用桐油扫亮。距校不远有蔡家坡镇,五天一集,肉、鸡、蛋,要买多少有多少。蔡家坡以产蒜苔著名,远销外地。点心,五香花生米,也有卖的。总之,这生活比乾州、泾阳的生活,比一碟盐一碟辣子的生活,比在与牛共居的窑洞中的生活,要提高得多了。门前有一片菜圃,自己种西红柿、苋菜,随时可以采来上到餐桌。在这里,我们生下了二女儿和三女儿。

俗话说,“饱暖思淫欲”,我是饱暖思事业。英语教员,仅仅是职业,而职业和事业是有区别的。新文艺看来是弄不成了。蔡家坡是工业区,保卫工作很重要。当时“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已经实施,经解放后运动中的交待和揭发,得知蔡家坡三厂两校各出一个具有中统或军统身份的人,组成一个秘密的保安保卫小组,主要是遏制工厂中工人的异动,还要严防宝鸡工人首领和蔡家坡工人首领间的联络。连这些人在火车站照个像,他们都要把底片拿来,放大加洗了分析研究。当时,我和上海的文艺界叶圣陶、郑振铎、章靳以、孔另境、戈宝权等有通讯联系,知内情的学生告诉我,我的信封封查,不过不是剪开查后加一封条写明某党部检查验讫,而是用水将信口处润湿,再用小刀揭开,查毕再封上,不露痕迹。呜呼!

正是这时候,我实践了从新文艺向史学“跳槽”的逐渐转折过程。在乾州时,我已经委托了一个□阳的学生代为搜集康乃心的诗的零星刻页。《二曲集》和残本的《李年谱》已经有了。现在经济能力稍稍宽裕,就从西安南院门的旧书坊和私人藏书家买到一些理学家的集子,如《冯忠定公

全集》(冯少墟的集子)以及富平吕柟和三原马理的集子或语录。我一面泛览明末清初关中的理学,一面追踪江大学者顾炎武在关中活动的踪迹。一个人的最亲密朋友,总是最值得探索的知情人。我找到了王弘撰(山史)和李因笃(天生)。从而,王山史的《砥斋集》和《山志》、李因笃的《受祺堂诗》也设法买到了。至于《续刻受祺堂诗》和王山史的几种《曰札》,则是远在以后通过更曲折的渠道才买到的。我家里的线装书一下子多起来了。在当时,读线装书是不受监视的。

我也交了几个这方面的朋友。其一是傅安华,他是河北冀县人,在北大上学时与全汉升、杨向奎都是同学,听陶希圣的课,在《食货》上写文章。抗战后,他“弃儒从商”,跟蔡家坡棉纺厂经理王瑞基当机要秘书。此公温文尔雅,从容不迫,担任秘书之余,颇不忘情于文史。因此我二人间就多了共同语言。慢慢,两家的妻子儿女也交上了朋友。其二是梁黄胄,河北蠡县人,当时他还远远不是世界知名的大画家,而只是一个贫寒的青年,他姐夫是蔡纺厂的一名警察队长,住房里外两间,里间由姐姐姐夫带孩子住,外间由黄胄和黄胄的老娘住。当时,黄胄已经喜欢画画,画一条一条吊在纵穿外屋的一根长绳上,像吊着一大堆洗过的衣服那样子。他来我这里,是希望在中国语文和外语方面得到某些辅导。其三是杨镇南,正名是兆庚,山东诸城人。一二九学生运动中,他正好是“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秘书长,属于被我们嘶喊着要打倒之列。而今时过境迁,双方都另作别论了。原来这蔡家坡地面有个大村庄叫灵谷村,二十九军冯治安部在这个村里设置了“后方留守处”,有少量军队驻守,原冯玉祥部的僚属和家属多安插在这里,杨是其中之一。宋哲元临终时,送他一位川籍的侍妾,一位老勤务兵,三人共处。人们说“二八佳人八八男”,其实何止八八、快近九八了。老人家对我很好,也难得异乡遇故旧,他说他曾向我的外祖郭先生问学,在青州曾同我父一同考“府考”。他写颜体,曾为我写四幅联璧的大中堂《正气歌》。又小条幅一件,写杜甫《秦州杂诗》一首,末句是“万方声一概,吾道竟何之”,这意我明白,西北军系统的反蒋根底是很深的,他们看不惯马裤呢、踢马刺、中统、军统的这一套。杨似乎对方

志很熟悉,他经常给我谈各府州县的志书,一直到省志和一统志,对我以后使用志书开了门路。

在这一时期,我写了一些文章。这时美国罗斯福总统死了,杜鲁门下令叫投掷了原子弹,日本天皇宣告投降。八年抗战,就此结束。在大西南和大西北的蒋记文武官员,涌涌着到东南沿海地区去接收(当时叫“劫收”),如蝇蚋之争血。大学生们掀起了反内战、反饥饿的斗争。这时,我写了明末东林派人物赵南星的传,用写历史对现实舒一口气、助一把劲。不久,闻先生在昆明被害了,我又写了激愤的悼文《混着血丝的记忆》。我又试验着写一篇考据论文《山陕学者交游事迹考》,把我当中学教员以来所贮下来的读书心得加以梳理,加以考辩,把山陕学者们的爱国活动初步地勾勒了下来。这篇文章后来成了我的“成名之作”。

这时候,在重庆的“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要搬迁到上海,要在上海开一次复员大会,我在被邀请之列。于是我便于 1946 年冬 12 月只身作东南之游。

## 第二分节

我从西安搭乘“绿钢皮”东行。在潼关、灵宝之间,看见了八号桥。几天之前,另一列“绿钢皮”就从这座桥上掉下去。我们的列车通过时运行极缓,使我们得以观看事故的现场。许多兵持枪警卫着,以防止附近居民乱拿乱抢,死难家属们啾啾地哭着,辨认着各自亲人的遗体,检点着大皮箱内的金条和珠宝之类。“劫收”未成身先死,剩得妻儿泪满襟。

中途,我在开封下车,想把河南大学看一看。我投到我的学生周可任处,他还介绍了另一位同学牛维鼎(安徽阜阳人),我就在他二人居住的东二斋找个床位住下了。牛正临届毕业,把他的毕业论文《沅稔年谱》原稿拿给我看,使我惊叹河大学生的水平很不错。当时,他们也在搞“反内战、反饥饿”,同学们出出进进,忙忙碌碌。周和牛大概是地下党员,运动中的头头,所以其忙更甚。

有一天,他二人说,去看看嵇先生吧。嵇先生?就是嵇文甫。此前,我曾略读过他的一本书《左派王学》,现在他是这座大学的文学院长,兼

文史系主任。当天刚下过一场小雪,我们踏着浅雪前去晋谒。当时开封街上军警戒备甚严,可以说每个街口都设有岗哨。河大在城的东北角,嵇先生住在通往西北角去的一条叫刷绒街的街上。临街的外墙上有由河南警备司令部政训处制的巨幅蓝底白字的大标语:“纷杂错综的思想必须纠正”(总裁训辞之一)。我心里想,为什么历代统治者都要给这些无枪无炮的知识分子们如此巨大的钳制呢?

嵇先生跟北大、清华我所常见的西服革履的教授们完全不一种打扮,他大袍马褂,翁头棉鞋,一派理学家的装束。这院子也不宽敞,除厢房外,倒座就是“上房”,嵇先生和太太住西间,中间会客。家内一切清简,不讲究摆设,也没多少书籍。但他谈起学术来却有滔滔之势。记得在一篇文章里我曾借用《世说新语》中的话来形容他,“吐嘉言如锯木屑,霏霏不绝”。记得他谈的是孙夏峰(奇逢),我谈的是“关中三李”。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不就是一部 20 世纪北方文化史吗?难怪同去的两位大学应届毕业生都听得入迷了。

当时两位大学生颇有意要设法把我弄到河大来,用他们的说法是“增强进步力量”。我呢,在关中执教八年了,为时已不谓短,也应该挪动挪动了。据说,他们跟嵇先生商量了,嵇说由他推荐,效果适得其反。他说校长姚从吾是胡(适)、傅(斯年)系统的人,要找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人推荐,等姚征求文学院院长意见时,他全面支持就是了。他说他只能当个内应,不宜公开出面,他一出面就坏事了。

我告别开封,继续前行。那时的火车是一段一段的。到了徐州,去中国旅行社买火车票时,服务人员极力动员我买飞机票,说有两架飞机在机场等待起飞,机舱内人不多,票价可以折扣,两个小时就到上海了。但我很顽固,仍买了火车票。等我两天后到达上海路过胶州路殡仪馆,只见很多丧家在仪馆门口拥挤着,哭成一片。打听一下,原来徐州那两架飞机当夜因上海大雾,在江湾机场双双坠毁。呜呼!我心里想,“顽固”这个辞的意思是不好的,但是不是有时也会产生好的效应?

对于上海,我简直是刘姥姥进大观园,一切陌生,只好瞎闯。到了冒

险家的乐园里,自己本身也不知不觉带上一点冒险家的气味了。一切新奇。苏州河边一排排野殡的棺材,经风吹雨打,有的已裂了很宽的缝,快露出尸骸来了,怎么市政方面管都不管呢?坐黄包车过桥,马上一大堆孩子前来助推,我想上海人如此见义勇为,不料马上伸过来若干只小手,原来要钱的呀。这是我踏上上海地面最早的两个印象。

文化、文艺界的前辈、同辈们,则对我是一往情深的。叶圣陶先生在他福州路开明书店编辑部的一片长廊里替我安排了一架行军床让我休息,并且每当我出门时,他总是亲自把我送到弄口,用上海话替我雇好黄包车,讲妥价钱,以免我被愚弄。郑振铎先生,当我走进他静安寺路庙弄一号的住房时,他正在写字,没有等我开口,他就抢先说,“顺便也给你写一幅吧”。他的书房简直像一座古墓,到处摆的都是明器(殉葬物)。我临告辞时他说,“差点儿忘了,你的稿费我写个条子,你到中正路找李健吾先生那里去取吧。”孔另境先生的女儿现在已经是一家文学研究所的副研究员了,她的信里说,她愿开外的母亲至今还清楚记得灵隐元年冬我到北四川路他们家访问的情景,说“个儿那么高”。我这次的访问,是谈茅盾先生和我中间不少事情的交割。孔是茅的妻弟。还有一位著名作家魏金枝,他穿一身蓝布长袍,记得他是浙江台州人,老中学教员。我们似乎很谈得来,只要碰到一起就一定要谈一大阵。这也许就是“一见如故”吧。在这里,又要插一段话。我平时说过,“假如姚文元碰见我的话,他应该喊我赵伯伯。”“文化大革命”中这一条揭出来了,说我“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原来灵隐元年冬我到上海,姚蓬子曾拜访我,希望我为他新办的“作家书屋”写一两本书,“撑撑台”,有这件事。至于叫“赵伯伯”云云,那就是我顺口说的了。

在正式会议上,只记得理论部长胡风打着浓重的湖北腔讲了很长时间的话,夜晚,在九江路花旗大厦的舞厅里开娱乐晚会,绿原在会上朗诵他的长诗,其中有几句至今记得:

摇摇秦始皇,这私生子

摇摇面无四两肉,

摇摇心里一把刀。……

这哪里是在骂秦始皇,这就是径直在骂蒋介石。谁晓得,九年过后,绿原一翻身变成了“特务”。我久久地信不下来,直到 1984 年代才读到他的一篇辨白的文章,我心中才释然。

开完会后,我在返途中路过南京。

在这里,我要插进来说一说傅乐焕。

当年,我有一位族叔叫赵孝愚。我叫他三叔。他在清末从捐班做到北京西城兵马司副指挥。曾以捉拿赛金花而享盛名于一时。息景后,住干面胡同一座四合院,这院是不久前辜鸿铭住过的。三叔带着三位姨太太住后院,大哥住前院正房,二哥住西厢房,三哥东厢房;三哥留学日本去了,他和去世不久的三嫂的新房,“上边”吩咐下来每周末我进城由我暂住。于是大哥、二哥、我,还有大嫂——四个人周末就玩“出诗条子”,将唐宋诗中之一句摘出一字列五种答案叫人猜压,压中的赢,压不中的输,积下钱来到大栅栏去吃蟹黄包子。现在要说的,是这位大嫂。她姓傅,东昌府聊城县人。一个鲁西人怎么嫁到鲁东人家做媳妇?原来傅、赵两家都在省河务局做事,住家济南。大嫂的长兄傅云门是局长,前文提到西安的五叔就是他手下的总务课长。有一天,这位傅局长宴客到深夜又送客上津浦夜车,送罢客人主人未归,经发觉在西闸口外辗死了,其状甚惨。傅乐焕就是傅云门的儿子,由他二叔傅斯年扶养,在北大历史系读书。每到周末他也到干面胡同他姑姑家来。他 1924 年进北大,我 1926 年进清华,他比我高两个年级。按辈份,他该喊我表叔,但我们从来不论这一套,我总以学长对待他。八年抗战过去了,他现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我认为,我有必要到鸡鸣寺找到他。

找到了。我说,“请告诉您叔叔,我想到史语所来工作,不论多么小的职位都肯干。”他说,他叔叔到老蒋那里去了,这几天正闹美军强奸北大学生沈崇的事,中央大学都闹起来了。他一直还没回来。一会儿,傅斯年的小车回来了。乐焕就上楼去说这件事。回话说,“到史语所不合适。大学三年肄业,并且是外语系,进所连个助理研究员都叙不上,只能叙个助理

员,五口之家怎么养得活?!我介绍他到大学里先教几年书吧。”他写了一张八行信纸给河大校长姚从吾。三天之后,我拿着这张八行信纸到开封卢方胡同姚公馆去投到。姚上身高、下身短,一幅袁项城的身段。他和蔼地接下书信,叫我先回蔡家坡照常供职,听候通知。

### 第三分节

我返程的火车,于旧历年灵园年的除夕开抵华阴(今名孟塬)车站,站上的人大放鞭炮,送旧迎新。灵园年正月初一上午抵达西安。在一个学生家略事休息,续搭火车于正月初一日暮色苍茫中返到家中。我将在上海用稿费买的一件海勃绒大衣送给妻子。这是我一生中送给妻子的唯一一次礼物。

现在,我想说说蔡家坡的特务。

上文说过,蔡家坡防止“异党”和工人暴动的特务小组由源人组成:扶轮中学校长林某(浙江人),灵谷村扶轮小学校长朱某(浙江人),棉纺厂总务科长马某(河北保定人),机器厂文书科长王某(山东人)。他们大都是“中统”系列。可能由于这些人的“战斗性”还不够强吧。由机器厂经理兼职校校长从重庆请来他的一位学生到职校来当训导主任兼总务主任兼教《应用力学》和《材料力学》。一个强力的“军统”人物到了蔡家坡,并且成为了我的同事和邻家。

王德荣,安徽至德人。当时蒋介石在湖北江陵(后移临澧)和甘肃兰州办了两个特务训练班,前者简称“江训班”,后者简称“兰训班”。王是“江训班”的高材生,但毕业后并未做职业特务,却投考了重庆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系,一面上学一面组织学生中的反共活动,毕业后由助教而讲师。这次应邀到北方来,他是有一番抱负的(对这抱负他也不太隐蔽)。他认为,蔡家坡和宝鸡(包括益门镇)是工业重地和咽喉要地,本党(指国民党)不占领阵地,异党(指共产党)就要占领阵地,所以他和许多混饭吃的特务很不同,他教课之余仆仆风尘,奔走于宝鸡、益门镇、凤翔、岐山等地,没有三青团的地方他就把三青团组织建立起来,已经有三青团的地方他就与之建立联系,加强组织,在三青团的基础上发展特务。在职校内



部,他通过学生军训体系,选拔部分中队长和小队长当他的耳目,随时汇报新动向。

我明白,王德荣是一个劲敌。这时,我和西安城工部依然保持联系。并且除此之外,又增添了一层关系。事情是这样的:我的学生周可任和他的同学梁得柱,在渭河以南、高店镇以北经营了一座菜圃,名为菜圃,实为替陕北运送缺项物资的一个秘密据点。在这个菜圃的窝棚里,积贮着胶轮带、轴承、自行车和汽车部件、面粉、白糖、纱布绷带手术刀……等。这自然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但梁得柱这个系统与我联系的“育人”是横的关系,我从未接到关于菜圃一事的通知。我之所以得知,纯是我与周可任的师生关系。他选择我家作为开秘密会的场地,商量在□邑买通了一条“路”的条件下,如何将上述陕北缺项物资用毛驴队运送过去。据说,多少烟土,或多少银元,买通两个小时平安通过,过时就开枪了。他们在我家开会时,我妻替他们四处巡逻。因为我家隔壁就住着王德荣,他的每一根神经都是经过江陵训练班训练好的,要防备他需要加倍警惕。可是不管王德荣怎样兢兢业业,在他的眼皮底下就有他的敌人。在梁得柱的会议上,就有职校的一位姓王的学生参加。我心里立刻明白:就在这铁桶般统治着的职校中,就有着一名埋藏得很深的共产党员。

工人中间的情况,我比较隔膜,只是听来的。他们大都借设香堂、拜把子弟兄的形式进行组织、联络,并从而发动行动。所谓行动,也不过是要求增加工资待遇。机器厂工人的行动在未爆发之前就被镇压下去了,宝鸡方面来的秘密警察把几个头头带走了,群众无首,没有闹起来。纺纱厂闹起来了,工人们借春节闹社火做了一次演习,然后爆发出真正的罢工行动。厂警镇压,工人不服,社火队中那个踩高翘腿的小生带头往岗楼方向扑,被开枪打死了。事情闹大。车间里有半个多月在停产之中。

国民党的宣传展开了,说是异党分子从中煽动。兼以当时留在鄂豫皖边区的原红军有向西向陕北运动的迹象,于是蔡家坡三厂两校停课停产十天,宣布戒严。事后,有关学生告诉我,当时拟定的黑名单中有我的名字。他们已准备好麻袋若干条,一旦紧急,将黑名单中人一一装入麻

袋,沉入渭河。……

我们一家人在蔡家坡的生活,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渡过的。

1957年 远月,收到开封河南大学校长姚从吾寄来的《聘书》,略谓敦聘某某先生为文学院文史系副教授,月薪三百三十元正,希望八月底以前到校报到,云云。

我心里明白,在我的 猿岁(虚龄 猿)上,个人生活史又划出了一个段落。此前一年,跟着日本的投降,八年抗战结束了。随着河大聘书的寄来,八年中学教员的生活也结束了。关于这件事,我们夫妻也曾多次地合计过。单纯从生活待遇考虑,蔡家坡的银行规格的待遇是丰厚的,到了河大,很多补贴都没有了,但人不能光从生活着想,进入河大,是一生高等教育生活中从事教学和科研的起步,这个意义是大的呀。

愿月中旬,我们一家五口从西安搭乘东去“绿钢皮”中的一间包厢(独立的单间,无上铺,只下铺两席,孩子们可以比较自由地活动),离开生活了八年的陕西,东去开封。

## 第八章摇从中原到华北（三）

### 第廿三节摇河南大学

一提到开封，自然而然会提起《清明上河图》中北宋首都的繁荣景象。但 ~~竟~~ 1945年夏我到的开封，却是截然另一种情况。假如气数之说还有它一点点合理内容的话，那么，当时国民党的气数已经眼看到尽头了。物价飞涨，通货膨胀，民不聊生，把个省城开封折磨得奄奄一息。

河南人又跟山西、山东人有所不同，他们自古生活在大平原上，人们的生性平阔宽松。发音也简单，例如“学生”叫“xiao”，“鸡”叫“鳩”，“怎么啦”叫“zhua”。生活也平简，街上油馍论斤两称，红枣稀饭大碗盛，半加工食品比西北多，如面糊炸虾，炸豆腐丸子之类，拿回家来一加工就是一品菜。妇女参与商业活动，也比山东、山西的多。一清早，老婆子小媳妇挎着篮子上门串院，卖豆芽豆腐。马道街路边一大串老婆子卖线，兼为人缝缝补补。甲骨学家董作宾回忆说，他自小跟着他妈在南阳街边上卖线。当时开封人很不讲究环境卫生，你走在街上，听见一家门吱喽开了，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端个尿盆在街上哗啦倒了，怡然地回家去。菜市场徐府坑摊贩卖红糖白糖的，糖堆上爬着大绿头蝇黑鸦鸦一片。

河南大学，倒是冀、鲁、豫三省大学中比较像样的一所，也有大屋顶中西合璧的楼房，还有旧时书院和留美学校的一些传统和遗存，所以南方一些学者也每每愿意到这里来任教或短期讲学。可是当我到来时，刚刚是反饥饿反迫害斗争被镇压下去之后，学生中的精英抓走的抓走了，开除的

开除了。如牛维鼎就被抓进监狱，周可任就被开除了。党棍校长田桐林干不下去了，派来学者校长姚从吾。姚是襄城人。襄城是文化水平较高的县，姚是德国明兴大学留学生，治元史（蒙古史）的，归国后担任过北大的历史系主任。但他办事能力很差，所以河南大学也一直乱糟糟的，没有办出个模样来。

当时中文系和历史系合在一起，叫文史系。系主任是嵇文甫。教师中间颇有几位著名的，如朱芳圃、马元材（非百）、李嘉言、张长弓、任访秋、何鹏毓等。安排我教三班课，一是本系三、四年级的选修课《明清思想史》，在七号楼上；其余是工学院学生的两班《中国通史》，在南关禹王台上。《明清思想史》是嵇先生留下来的课，明朝他已讲过了，我接下来从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颜习斋讲起，后来发表的《清初四大学派》，就是那时候的讲稿。《通史》呢，就按周谷城的书讲，班上有不少去印缅从军回来的学生，受国民党党化影响较深，对周谷城书中的一些新观点每每提出来质疑（或者说抗议）。

家呢，被安排在龙虎街四号一所较整齐的院子里。上房源间，东厢西厢各两间。也不晓得怎么安排的，上房安排给我，东厢房安排给李嘉言，西厢房安排给医学院留德药学教授夏一图。李、夏都是我老师辈的人，怎么这么个安排法呢？也许把我当成傅斯年荐来的、姚从吾聘定的“红人”，“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吧？我有三个女儿，一家五口，再用一位保姆，源间房子也满满当当的了。

学生运动虽然受到了镇压，但共产党的城工部仍然在，它的主持人叫刘鸿文（解放后他是河南省委的统战部长、秘书长，后来死了）。上次来河南我已结识了他，似乎是一个福建籍的青年，很精干，很善于做秘密工作。他有时在嵇先生家里聚拢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在一起，传达一些一般听不到的信息，分析分析开封和河大的情况。当时进步势力可以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局限，只有郭海长（河南耆宿、国大代表郭仲隗的儿子）办着一家《民国日报》，还有河大体育教师、诗人苏金伞在搞着一点新文艺活动，如接待文学家曹禺、卢焚等人来汴，等等。记得我在郭海



几缸水,买下一点咸菜,听说酱园生意利市三倍。攻城战是从东面的曹门、宋门一带打响,很快攻入城内,到了相国寺街一带。1948日攻打河南省政府,1949日攻打龙亭李仲辛的指挥部,到1950日地面战争基本平息,只剩下蒋记空军的狂轰滥炸了。李仲辛死了,刘茂恩宰只鸡用鸡血涂成受伤民众,混出城去了。1951日,解放军出榜安民,布告上写着司令员陈士榘,政委是唐亮,政治部主任是陈其五。陈其五即刘毓珩,是我大学时候的同学。果然,他派吉普车把我接到他们的指挥部。我问他是如何知道我的住址的,他说我们在城外对你们城内的事“一清二楚”。这就是说,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和群众工作已经做得很深入了。

1952日嵇先生的二儿子来通知,说刘鸿文同志叫通知,解放军不准备长时间占着开封城,不久要撤。撤后国民党新五军要开过来。现在通知一些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去。人数不能太多,带东西不能太多,因为大卡车很忙,要把国民党的武器和物资抢先运走,只能拨少量大卡车来送文化人。当天下午在鼓楼街金台大旅社集合。

这使我们夫妇要解决不少难题。回到解放区去,心理反映是两股,一是向往,二是不能不有所迟疑,考虑到留在白区很快又九个年头了,在生活习惯上更多地沾染了旧社会的东西,突然回到老区,是不是会不习惯?是不是会被同志们视为“异类”?再者,当年两个人都是单身,现在带三个孩子,虽然预先也知道,要过供给制、吃大锅饭,但孩子习惯不习惯?还有,四间上房里满满当当的东西,全套家庭用具(包括灶具坛坛罐罐);九年来也买了三架子书籍,我们又不是河南人,无亲戚家可以寄存,丢了吧,也很可惜。而考虑的时间只有半天,来不及深思熟虑。最后,只好毅然把这个家留给了我,我在西安高中教的学生、河大数学系毕业生、留校助教韩靖民代为掌管处理,自己仅仅带着手底下现款,猿百万法币折合的解放区冀钞猿万(合后来的人民币猿圆元),就动身走了。古人所谓“毁家纾难”,也许就是这种滋味。

开封城本来就不景气,经此七天战火,真是满目疮痍,一片瓦砾了。街上死人的味道已不是臭,而是辣椒般的刺鼻,人们多用药棉蘸些酒精搽

着鼻子走路。在旅馆里,看到嵇文甫、王毅斋、李俊甫、罗绳武、苏金伞、田雨三……各带家属都已经到齐了。

十轮大卡车,夜里走,白天有国民党野马式战斗机俯冲、用机关炮扫射,所以停歇休息,借以防空。第二天中午,我们停在通许的张市,晚上我们停在司马村,这里是豫、皖、苏军分区的驻扎地。圆日的晚上卡车开足马力,经鄢陵、许昌到达襄城。车上装有两架机枪、两个战士,以防“土顽军”(地主武装)的突然袭击。卡车打开远灯,我们清楚地看着在睡梦中的河南大平原上的村庄和蓊郁的树木。

襄城,已经是比较稳定的解放区,已经土改过,工商业在重新振兴之中,集贸市场上物资繁荣,不像开封死死一座围城,什么也买不到。人们把我们安排在一座基督教堂里,说大家不要走远,有首长要来看望你们。过了多久,来了,自己报名:刘伯承、陈毅、陈赓。好家伙,我们这一群知识分子真是受宠若惊了。

刘伯承方头大面,目光微微下垂。他说,“蒋介石有三怕,一怕林彪同志入关,二怕陈毅同志过江,三怕我刘伯承入川。怕也不成的喽,入关的还是要入关,过江的还是要过江,入川的还是要入川喽。”一派革命的乐观气氛。陈毅才气纵横,文采风流。他说,“今天我们在这里相会,意味着两条战线的合流。我们用枪杆子打蒋介石,各位先生用笔杆子讨伐蒋介石。今天这两支同盟军凑到一起来了。”他把知识分子跟工农兵摆到相齐的位置,这在后来那些“左”倾教条主义者听来,就是明显的右倾了。说这样的话是需要勇气和革命的自信的。陈赓一身整齐的军装,很少说话,我想这是黄埔训练和在上海长期做地下工作的遗存。

两天后,我们到达了鲁山。鲁山本是一个小地方,但在当前的形势下,它却一下子变得非常要害。中原局在这里。二野、三野的联合指挥部“前总”,刚刚组班子。邓小平的“总书记”称呼,便从这里叫起来。淮海战役不久就要打响了。所以这个小小的县城,在历史上也曾经“风云”过。

## 第廿五节 摇从中原到华北（一）

鲁山城外 愿里有条鲁水 ,又叫鲁河 ,在干流和支流交汇处形成一个不小的“在河之洲” ,友人刘兴唐 (尧庭)对我说 ,那个洲上有个远古遗址 ,地方人叫邱公城 ,从地面上随便扒一扒就可以找到石刀和石斧。这引起了我的兴趣 ,就邀约刘兄和他的儿子 (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去探一次险。我们挽起裤腿 ,脱下鞋袜 ,“深则厉 ,浅则揭”地到了洲上 ,找到不少彩陶的碎片 ,大的有半个巴掌那么大 ,颜色和花纹跟别见的也不同 ,白色中夹红 ,呈粉红色 ,像张飞脸上的那种颜色 ,线条之外 ,其最突出的特点是有一个大黑点 (黑椭圆 ,这在氏族人脑子里不知象征着什么) 。刘兄父子还捡到很少的石刀。后来 ,我把这些碎片带到东北师大的古物陈列室里 ,裴文中去讲学看见 ,找我去问了情况 ,后来还进行了一次发掘 ,出了一本《报告》。此是后话不提。我们回程时鲁河的水涨了 (这使我知道一条河的水也有涨的时候和落的时候) ,幸亏那位小伙架着他父亲和我平安渡过 ,回住处才知道裤腰部分都淹了水。仿佛看到哪本杂志上有人考证 ,说曲阜的鲁来自鲁山 ,是一个氏族 (也许是媯姓)的徽号 ,那么 ,邱公城遗址是不是跟这个氏族有什么关系 ?

我们住在鲁山中学的教室里。一面休息 ,一面办关系。所谓办关系 ,是指填一些表 ,由刘鸿文一一写“按语” ,这些“按语”是保密的 ,刘对党负责 ,反映我们这批人在蒋管区时的政治表现。所以只是刘一个人忙 ,我们不忙。我们只是跟大家唱唱歌。顶头一首歌便是《东方红》。我一面唱着 ,一面心里有活动。“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一句我就有意见 ,《国际歌》里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救世主吗 ? 还有 :

摇摇山川低 ,五岳高 ,  
摇摇毛主席治国有功劳 ,  
摇摇边区办的呱呱叫 ,  
摇摇老百姓都颂唐尧。



“唐尧”二字，制歌辞者还是斟酌了的，没有用“秦皇”、“汉武”，用的是大部落联盟酋长。但显然，这也是个人崇拜的滥觞了。发展到后来就有了“毛泽东，斯大林，像太阳在天空照”、“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等等一系列出台。我是说，假如我是被歌颂者本人，那么，我将以个人的威望予以抑制，予以减削。但事实上正好相反。苏联编写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也增加了一章，说无产阶级革命也要歌颂自己的领袖。斯大林也说，“彼得大帝只是一滴水，而列宁是海洋。”可见这是共产国际一致的趋向，个别群众是扭不转的。

中原局决定，中原形势还不稳定，战争虽然从总体上已可看出苗头，但局部还会有曲折，因此，除嵇文甫少数人留下来筹办中原大学之外，其余带家属四五十口人，要送到华北局去分配工作。与嵇先生在开封相处一年，在鲁山不觉又圆月多天，眼看要分别了，不能不有所告别。于是在鲁山中学操场的篮球架旁，有了一番较长的谈话。

现在距离当年，已有四五十年了；距离嵇先生辞世，也已猿年；今年又恰逢嵇先生诞辰，五周年，我明年也将圆岁了。因此在这里不能不说出真实度百分比最高的话。应该说，经过一年的同事之后，我们二人中间的谐和度不像从前那么高了。关键在于他很不喜欢我的激情，尤其是有时激情不能控制。我不钦仰他的遇事“模棱”，是非观念有时表现得很模糊。他把我的激情，归究于我祖上做过官，这有点共产党极“左”时代“查三代”的那种唯成份主义倾向。我想到《聊斋》中卖鹌鹑的《王成》篇，狐仙看到王成夫妇的鹌鹑百结时说：“王柬之之孙一至此乎！”我曾祖父当过圆年知州和知府，不能成为我爱发脾气的根由。根由要到遗传和心理学方面去追查。我这一辈子深深感到人类科学界在心理学方面的深入还非常肤浅，光养几箱子小白老鼠是研究不出奥秘来的。嵇先生送给我两句话，上句是“欧阳公尽用其所长”，这句话无论运用到谁身上都合适；下句是“柳子厚避所短而不犯”，这个“避”字就有问题，在很多情况下“避”是避不掉的。“避”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解决问题的办法。总之，嵇先生的“世情”色彩太浓了一点，晚年据说又研究“政术学”，重在一个“术”



时临 ,诸河暴涨 ,道路难行。况且这一带是“北五处”地方 ,鲁山、临汝、郟县、宝丰、宜阳 ,简称“鲁汝郟宝宜” ,是民性强悍的所在 ,晚清行刺两江总督马新贻的张汶祥就是临汝人 ,“凌迟”时候至死一声不吭。目前在临汝这里办着一个中原军政大学 ,陈赓是校长 ,山西“决死”二纵的政委兼司令员韩钧是副校长 ,训练一批土改中翻身的农民子弟 ,做大野战中官兵额的补充。出发第一天的目的地本定是洛阳的 ,受气候限制 ,临时决定停宿临汝。这天夜里 ,有河大文史系我教过的一位女学生来访问我。

她叫罗梅欣 ,是罗梦册教授的侄女。罗教授何人也 ?他是豫西人 ,年龄与我不相不下 ,英国剑桥回来的留学生 ,南京中央大学的教授。为了竞选河南国大代表 ,他回开封 ,曾来访问过我。他告诉我说 ,他要在中国办“费边社” ,走改良主义道路。他说 ,“共产党几十万大军至今打不进南京城 ,我们组织起 100 个教授就可以打进去 ,掌一部分权力。”我微笑着。我懂得他所说的打进南京 ,翻译出来 ,就是打进陈果夫、陈立夫的复兴社 (或称蓝衣社)。

侄女和叔叔完全不同 ,她在河大学生运动中受到感染 ,偷偷跑到豫西参加“土改”。现在正逢“夏屯”(夏收、粮食收购、入仓) ,她在负责编辑一张《夏屯小报》。我没有问她是不是共产党员 ,但从谈话中已经觉察到她已经看出“左倾”苗头的弊病了。在“土改”中和“土改”以后 ,干部乱打、乱判、乱杀人的事太多了 ,使心理处于中层的农民思想不通 ,从而在生产上也不够积极。她说 ,“你可以看到 ,临汝城里的疯子很多。”这句话提醒了我 ,鲁山城也至少有三个疯子 ,不久以后我到我妻的故乡——河北正定 ,也碰到好几个疯子。多半是女性 ,因为女性感情脆弱。这使我想到 ,像“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过正不足以矫枉”这样的话头在热火朝天的革命运动中讲 ,是不是合适 ?讲了 ,其结果必然是愈讲愈“左” ,等到不好效果充分暴露出来再去纠偏已经晚了 ,很多无辜者的血已经流了 ,人的脑袋离开了脖颈是再也接不起来的。那些疯子大半是被杀者的亲属 ,思想不通就疯了。记得高尔基有一篇小说 ,瞿秋白译作《大灾星》 ,记一个女子喝醉了 ,躺在水洼里 ,一面唱着“好像是海呢”。这故事使我终身难忘。

中国土改后的疯子唱不唱、唱些什么，我没有弄清楚过。

第二天到达洛阳。当时有谣言，说胡宗南的大军距洛阳只有猿园里了，店铺纷纷上门板，“冀南钞”与现洋的兑换率也从猿豫降到圆豫，这就是说，要缘元解放区的钱才顶上现洋员元。我们处之泰然。可是旅途多艰，我病了。满街寻找医疗所不着，最后找到一所教堂附设的医院，医生全是意大利人，他们讲意大利语我不懂，他们说的中国话也很不通顺，最后找到英语这个媒介，双方比较通顺地沟通了。可是七年后肃反运动中，忽而有一条揭发材料说，我在洛阳跟罗马教廷通消息。后来我一再追思，突然想起当初从开封出来的人中曾有一人要和我一起去找诊所，也许是这位先生在追求“从宽”的过程中给我下了一块石。

过了洛阳，调不到卡车了，只好坐从老乡那里派差派来的牛车和驴车，行程就慢多了。迤迤自孟津而孟县而沁阳。沁阳，旧称怀庆府，跟嵇先生老家的卫辉府，是豫北两个著名的专区。东周时候，经戎狄的骚扰和贵族内部的叛乱，有一度“周天子”就在这一带地方流离着。《诗经》里的《王风》，就是这一带的民歌。我们到来时，这里正在“土改”，热火朝天。城门两边就像天安门两边一样，有两幅大标语，它是：

摇摇地主就是罪恶，

摇摇农民就是真理。

对此，我的心里又有活动。我想，“地主就是罪恶”，这句话在我思想上基本上是可以通过的，因为虽然就具体情况说，有很坏的地主，也有不太坏的地主，但现在是在抽象地说、概括地说、作为一个剥削阶级来说，说它“罪恶”，可以。但也有缺点，那就是“区别对待”的精神从其中表现不出来。“农民就是真理”，这句话在我思想上通不过。我想，马克思说过，农民有其趋向革命的一面，也有其小私有者的一面，所以它还需要革命的改造，需要工农的联盟。在中国历史上，农民自己去闹革命就必然走到大皇帝，刘邦、朱元璋就是例证。所以我认为，“农民就是真理”这句标语，是错误的。从具体措施看，假如承认了农民手里已经掌握了真理，那么，平均主义、报复主义……都会表现出来，“土改”岂不乱套了吗？！有人说：“在群

众运动初期 ,就是要它乱一乱。不乱 ,群众起不来。到中后期 ,我们再来落实嘛。”我认为 ,这是典型的“左”倾机会主义 ,这是旧知识分子“一纵一收”的策略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插入 ;在思想上 ,这是阶级异己思想占领了阵地。

但 ,一段离奇的故事却由此产生了。我把这一思想写进了日记 ,继之又写进我的小书《从中原到华北》,经石家庄新华书店接受 ,并运往烟台转往大连印刷。建国之初 ,三联书店打电话告诉我 ,书稿在渤海中遭蒋匪炮艇的袭击 ,沉入大海。他们以新出版的《资本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史》等来作为对作者的赔偿。我欣然地接受了。从此 ,这对我一书稿久已淡然忘怀。

“文化大革命”中 ,突然有大字报 ,题目是 :

摇摇赵俪生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 ,

摇摇他侮蔑农民手中没有真理。

这一下 ,把我惊呆了。当时 ,我已关进牛棚 ,牛棚里有《统管纪律》,其中一条是不准看大字报。我是夜里到医务室看病 ,在往返途中偷看来的。第二天拔草时候 ,恰好只有我和我系的总支书记 ,我偷偷地跟他“交头接耳” ,他说 :“你真是个书呆子。什么遇见蒋匪炮艇 ,全是鬼话 ;那份书稿就放在你的档案里。我是总支书记 ,我早已看过了。造反派进入档案库 ,你这件隐秘自然而然就曝光在群众面前了。”

原来如此。

## 第廿七节摇从中原到华北 (三)

上太行和下太行 ,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最美好的记忆。我前面曾经说过 ,在十岁以前 ,我对“山”的概念是抽象化的。后来岁数大了 ,看到新疆的大山和云南、贵州的大山 ,对山的概念丰富了。但那些大山给我的 ,只是地理学上的价值 ,而独独太行山给我的 ,则在地理学价值之外 ,更重要的还有历史学的价值。在悠长的中国历史上 ,太行和秦岭 ,是人们心目

中的一个纵坐标和一个横坐标,山东和山西,山南和山北,就是以这两条坐标而获得的系列概念和称谓。我得以在“土改”轰轰烈烈进行过之后,从南沿上去、从东沿下来,亲自看了看太行的山山水水和人文风光。

上山和下山,各自伴随着两条河。上山时,看到沁水和丹河像两条蛇样自晋东南的丛山中流出来,丹河汇入沁水,沁水汇入黄河。下山以前,我们越过浊漳水及其一道一道的支流,然后又越过清漳水,看到二水汇而为一,流在河北的大平原上,人们在河旁筑了一座邺城,成为大野心家(或者说大英雄人物)曹操和高欢事业发轫的根据地。

我们坐的是骡子车,骡子耐力强,一路斜坡上去。所经地名,也是不平凡的,如拦车镇,据说是孔子晚年要到晋国去跟赵简子会晤,走在这里被儿童项囊拦住,问太阳距地表的距离及其与光度强弱的关系,大圣人光学缺乏研究,只好回鲁国去了。再如天水岭,晋东南一带土地改革的经验大会就是在这里召开的,因为据说这里的“土改”过程中,左倾和右倾的偏向都不大。经验总结出来,凡“充分发动群众”的地方就会较少地发生偏向。这也对,所谓“充分发动群众”,也就是运动领导者所掌握的情况比较全面,政策比较能落到“实”处的缘故。

终于到晋城了。晋城是旧泽州府。土改之后,提倡发展手工业,所以从南寨到南关再到南门十里长街上全是卖铁器皮具的,也卖土布。这里的老熟人也多,原夏县县长、政卫队政委刘裕民是这里的专员;原政卫队政治部主任霍钟秀在一个区里当特派员;刘的夫人、原晋南牺盟中心区书记王竞成也在附近工作。他们对我夫妇在政治上还是信任的,以老同志相待,叫我们住较好的招待所,叫我们可以任意翻阅资料室里的资料,包括本地区出版的小型《新华日报》的合订本和一些非“内部”的上下行文件。结合下一周在长治市所看到的类似文件,使我大吃一惊,或者说一惊非小。我所惊的,就是“左”!我看到,在这一带的文化部门,主要是小学和初中或师范里,人们怎样发动学生展开在教师中的阶级清洗运动。学生中有各种名目的组织,最主要一个叫“翻先队”,这是指查教师的三代甚至三代以上,看他们的先人在“地富”、“中农”、“贫雇”中属于哪个阵

营。只要沾上“地富”，那就坚决清洗。试想在旧中国、在文化相对不发达的晋东南，能受较高教育而称职当教师的，不是“地富”家庭出身的有几个？！于是，大量教师被清洗下来，逐回家去劳动；有的给胸口挂上“地主”、“恶霸”的牌子监督上课。这种划阶级的做法在学生中发展得更恶劣，像地富子弟要背贫雇子弟去上学，贫雇子弟可以尿在地富子弟的头上叫“洗脑筋”，地富子弟要替贫雇子弟做作文、演算草、放牛、割草，女的要代替纺花、做鞋，都有定额，不足定额者开会斗争。考试成绩，要根据卷面扣分加分，如贫雇子弟加缘分，地富子弟减缘分；个别地方规定，不管卷面如何，贫雇子弟一律满分，中农子弟八分，地富子弟五分。学校出告示，“翻先队”队长（学生）名字在前，校长名字列在其后……我在这里所举是最拔尖的材料，其余复杂情况尚多，不能一一抄录下来。况且，所有这些仅仅是“复查”材料中被选录出来作为“纠偏”根据的，若干被认为不是“偏”不需要“纠”者，真不知还有多少。

在那本“掉到渤海里去了”的小册子里，我曾为以上的现象充当辩护士，我说这比国民党好得多，国民党发生了错误隐藏起来，而我们则把错误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之得到纠正。现在轮到我为《回忆录》的时候了，明年我将臻于圆满，我又有了自己的新的看法。老话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则无惮改。”“纠偏”，就是为了改的，纠而不改，等于不纠。当时是 1950 年代，相隔 10 余年，到 1960 年代的“文化大革命”，那些“左”倾偏向不但丝毫未改，不是更加变本加厉地“再现”了吗？“红卫兵”不就是“翻先队”的新版本吗？“一切又重新来过一道”，那么，要“纠偏”有什么用呢？！“左”已经是我们永难治愈的一场痼疾了。

在长治市，我们结识了一位农学家乐天宇教授。他是湖南道州人，美国留学，现在是范文澜先生为校长的北方大学的农学院院长。他早年曾在河南大学任教，所以当他从广播中得知有一批河大人要从这里经过时，他就立意要接待我们。此人属于那种无话不谈的自由主义共产党人。只要碰到整风，就不会让他漏过的，他也惯了。一见面，他就讲述一个故事。说有纪晓岚（昀）的一个裔孙，从天津投到解放区来，安排在北方大学。

范老是爱才的,但他手底下人却暗中折磨他。早晨跑步,大家都穿八路军灰棉制服跑步,独纪某穿古铜绸面皮袍跑步。范老过问了,“为什么不给他发棉制服?”回答很干脆:“仓库里没有了。”有一天,范老要来后勤上的钥匙打开了仓库一看,棉制服有好多在架子上呢。乐天宇说,“硬是有那么一批不开眼的土干部混进党内来,排挤一些有本事的非党人士。要不,党整风干嘛。就是整风,也整不完这样的人。”

长治是一个稍稍近代化的城市,有发电厂,有电灯,有些马路式的街道,可能也有几家工厂,在北平的傅作义“剿总”还没有忘记时不时派飞机来丢几颗炸弹。从长治往北,是潞城和黎城。这带地方,可能殷人在这里活动过,因为至今留有微子镇和比干岭这样的地名。可是到春秋时候,这里却被赤狄族盘踞着。晋人从曲沃兴兵来打赤狄,我设想晋城是不是晋人攻打赤狄的桥头堡?通过这场战争,晋人把车战战法改革为骑兵战法,这就是历史上记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来由。这场战法上的变革,就是在黎城一带狭窄的山道上体验创造出来的。晋国因此也得到发展,韩、赵、魏三家分晋以后,赵国的都城不就搬迁到河北平原的邯郸去了吗?所以我感到,我们这段旅行,是亲自追踪了一次古晋国发展的历程。

当然,在近代,这里也有著名事迹。灵~~建~~愿年猿月,刘伯承将军就曾在自乡党铺到东阳关~~四~~里狭窄的谷地里靠手榴弹炸毁了~~灵~~余部日本军用卡车并杀伤与之相应的军兵。

## 第廿八节 摇从中原到华北 (四)

从远月上旬到愿月上旬,转眼间已经快两个月了。时序不觉已自初夏至盛秋。我们一家人离开平静宁贴的书斋生活,经历山川颠簸,但也大开了眼界。所谓“大开眼界”,是既指对自然的,也指对社会和历史的。

经武安时,听到广播,朱自清先生在北平逝世了,终年不过五十一二。是日傍晚到达邯郸。这个城市,显得很大,很嘈杂。满街在卖联合国救济物资,如奶粉、军用饼干、奶油和乳酪、果仁等等。我们被安排在华北局招



待所 ,满院子种着青葱的扫帚菜。这里有自来水 ,可以把旅途中弄得浑身的尘垢 ,清洗一番了。休息过后 ,也偶尔带了孩子到一个像是公园那样的地方去玩 ,这就是后来叫做“烈士陵园”的地方。在这里有一番奇遇。

在一架花棚的地方 ,一位像干部又像大学生的人突然问我 :

“你们是不是刚从开封过来的?”

“您怎么知道的?”我反问道。

“我从《豫西日报》上知道 ,一批人要去华北 ,估摸着日子你们也该到了。”

“那么同志 ,您在哪一部分工作?”

“豫西。做部队工作。现在在这里休息。抗日战争时期 ,我在山西‘决死’二纵。”

“那么 ,您是韩钧的部下?”

他笑一笑。慢慢低声而诚挚地说 :“我就是韩钧。”

真是奇遇。我们立刻像老朋友似地恳谈起来。他把我们引到公园内他的住处 ,见到了他的夫人。他不像乐天宇那么开门见山 ,那么无保留地无话不说。他说话很谨严 ,口音像是豫东彭雪枫那一带的人 ,凡不该说的都抑住了。但能说的话还是很多很多 ,从晋西北一二〇师谈到“决死”二纵 ,谈到秋林会议和阎锡山所说的“韩钧反了” ,一直到某些人说他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把中原局势也给他讲了许多。我们相约 ,一两天内再谈一次。

我对与韩钧的奇遇十分重视。回到招待所 ,我叫大女儿将我的一些作品送到公园 ,请韩看看 ,借以使他对我有所了解。我们又要启行了 ,启行到此次旅途的终点——石家庄。临行前又去长谈一次 ,殷殷惜别。可是到石家庄不久就听说 ,韩钧同志服安眠药自杀了。这真是晴天霹雳 !最最使我惊奇的是 ,在那么多的谈话里 ,他竟丝毫没有叫我敏感到他要自杀。内外有别 ,他在这一点上掌握得很紧严 ,像决死二纵“叛变”以及什么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样的委曲和内幕 ,是绝对不会向我这个党外的陌生人泄漏的。我很尊敬他。

道路泥泞 ,我们的四轮卡橡胶轮上系了铁链 ,也照样在泥潭里开不出来。当天 ,只好在黄粱梦住宿。这是围绕着据说一个叫卢生的黄粱一梦故事而建造的一座道教中心。我这个人一辈子 ,对儒家有 愿 的好感 ,对道家 and 佛家也有 死 的喜欢 ;平生最憎恶的 ,一是法家 ,二是道教。前者教导那些独裁者怎样更加独裁 ,而后者则用什么 “房中术 ”、“采补 ”等等 ,勾引那些独裁者去糟蹋无数的女孩子以满足其淫欲。

终于 ,到石家庄了。在这座大城市的西沿上 ,有一座新建成的花园饭店 ,华北人民代表大会正在这里召开 ,华北人民政府要由此成立。傅作义 “剿总 ”的轰炸机队也以此作为日夜轮番轰炸的对象。我们被华北局交际处的人安排在这家饭店里住下。

第一个碰到的是原扶轮中学的学生柯在铄 ,他现在已是全国青年联合会的主席了。师生之谊 ,依然浓烈。他带领我去看了艾思奇、尚钺和作家荒煤 ,第二天还带领我和河南诗人苏金伞去华北局宣传部拜望了萧三和周扬。

夜中轮番轰炸 ,饭店的人安排我们到郊外一家农民家里休息 ,夜中屡屡被炸弹的爆炸声所惊醒。黎明前返回饭店 ,雇车到正定去。这里 ,是我妻老家的所在地 ,也是由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大合并而成的华北大学的所在地 ,在这座解放区的大学里 ,我们将参加工作。

## 第九章摇在华北大学

### 第廿九节摇正摇定

正定,原名真定,清朝雍正帝名叫胤禛,为避讳,真定就改为正定了。它更古老的名字是恒山郡,为避西汉文帝名叫刘恒,恒山又改成常山郡,《三国演义》里的“常山赵子龙”的呼号,就是改了以后的。有些年代,改郡为州,这里又曾叫恒州或者镇州。

这是一个很大的城池,到我们到达的当时,这是个很破烂的城池。试想,经过日本人盘踞,再经过“土改”,推掉了地主这座大山,像一名壮汉刚刚做过一场大手术一样,一时不免于不振了。贫雇农分得地主家的“果实”,自己不习惯用,就统统拿到市集上来,五花八门。到粉碎了“四人帮”,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时候,这里成了省会石家庄人采购副食品的集贸市场,这才慢慢地繁荣起来。

这里也是古老文化的基地。就以佛塔说吧,就有“正定四塔”:砖塔、青塔、花塔、木塔。最早的砖塔建于北魏,最晚的木塔建于唐中叶以后。青塔还是佛教中一个著名教派(临济宗)的纪念塔,我有时看见日本旅游者极其虔诚地向它鞠躬。到元朝,又建立了隆兴寺,俗称大佛寺,至今仍是旅游界的重大景点。

论人物,西汉初南越王赵佗,也就是自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的那个人,就是正定人。另外,常山赵子龙也是一个著名人物。到明末清初,有个梁清标,他是崇祯朝的进士,降过李自成,又降了清朝,在康熙朝做到

户部尚书和吏部尚书,是“宰相”那样的角色了。他搜藏的书画在全国闻名,他藏画的书斋叫蕉林书室,当时南方笄重光和北方梁蕉林的藏画图章,是鉴定家最重视的印记。记得 1949 年代我要求妻带我去找蕉林书室的遗址,却变成正定县废旧公司了。就连“蕉林书室”那块匾额,想找到拍一张照片,人们说久已不知去向了。

试想,我们在 1949 年 1 月返回正定,处境十分尴尬的。岳家的家族及其亲戚朋友,无疑属于被镇压者的阵营,而我们穿的是八路军的灰制服,从形式上无疑属于镇压者阵营,两方相见,又是亲戚,又有界线;太疏远了不对,太亲密了又不对。岳父被定为“小土地出租者”;可是近族和姻亲被定为“扫地出门”者,大有人在,有的还受了极刑。仅举二例。岳父的外家——阎家,就是正定的首富,范文澜先生告诉我,这家一个丫环阶级觉悟提高了,揭发出阎家一处秘密的地窖,内藏元宝上镌刻的年代有明朝的,还有元朝的。他家的后裔阎简弼(我妻的表兄)当年从燕京转来清华,曾与我一个教室里听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后来院系调整到东北去,听说在劳动中撂下铁锹钻进了一辆正在开驶中的大卡车的轮底。这样的结果,怕与“出身”问题紧密分不开的吧?我妻的外家——王家,也就是北洋“三杰”中的王士珍家,土地虽然不是最多,但王当过陆军总长、内阁总理,声威是大的,加以王的过继长子在家胡作非为,还为日本人干过事,逢到“土改”他是跑不掉的。与阎家的长子(简弼的哥哥)一起被“溜”死了。所谓“溜”,办法是把受刑人的双脚绑住,架在几匹骡子后面,脑袋拖在地上,到城中东西南北四条大街“溜”上一遍,受刑者不死也昏迷了。又是范文澜先生告诉我的,某天夜开完会大家到厕所解手,恰好我和范老站在一起,他问我“你怕鬼不怕”,我说“不怕”,他说“你夫人的表兄给‘溜’完了以后,就是在这里杀下头来的”。如今事隔四十多年来,我一直不明白他跟我讲这些干什么。反正我们的态度是,姻戚是历史积累下来的,其中有罪的我们绝不包庇,也包庇不了;无辜的,我们仍按传统礼俗对待,大爷是大爷,叔叔是叔叔。我们总不能像我的一位老同学那样,用铁丝牵着自己亲爹的鼻子去游街,还叫老爹在底下跪着,自己在台

上宣布罪状。当然,我这一辈子也做不到我那老同学那么大的“官”。

城的南门外,就是滹沱河。我妻母校的校歌第一句就是“枕恒山兮面滹沱”,概括得很形象。滹沱,地方人叫葡萄河,又叫吓嗒河,此河源自雁门,是少数民族地区,河名原本是胡语吧?一条河在山谷窄道里规规矩矩的,一到平原,它就像一条蟒蛇样,滚来滚去,“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话就是由此而来的。我们到来时,一下渡船就是南门,可是康熙年间安丘诗人曹申吉来看望梁清标时,在他的《南行日记》里却说南门外“十里芙蓉”,“迂回二十里始得驿道”,可见河水变迁之大。

### 第卅节摇华北大学

华北大学,是以范文澜为校长的、设在邢台的北方大学与以成仿吾为校长的、设在张家口的华北革命大学——两校合并改组而成的。改组后范、成担任副校长,另由更加德高望重的吴玉章担任校长。学校除校外,设四个部。第一部是抗大、陕公式的对初来参加的热情青年们施行训练的单位,在正定东门里的大佛寺里驻扎。第二部是准备进城后与旧式正规化大学相并的部分,也设“系”,如中文系、历史系等等,地址在东门里法国教堂,那里有西式楼房,有教室、实验室、工场等等。第三部是几个专门性质的训练班,如“外交人员训练班”、“新闻工作人员训练班”等,这些班对人员的要求更严格,带有某些保密性质,大都驻扎在附近的村庄里,也不许亮牌子,用代号。第四部是研究部,设在西门里的“王宅”。所谓“王宅”,是指北洋军人王士珍的公馆,一派砖瓦旧四合院的格式。这房子在小县城里自然显得突出,但假如与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的派头对比起来,则仍是极其简单朴素的。

几个组成部分分散在各处,这也是战时、暂时的布置,不可能自己形成自己的建筑群,更没有校园(愧也)。校部,也就是总管理处,设在小十字街,吴玉章校长和钱俊瑞教务长住在路西,成副校长住在路东,都是“扫地出门”了的大户们空出来的院落。各部分间的联系靠勤务员跑腿,

记得那时连自行车都不多。跑石家庄,跑平山(中央所在地),开一部军用吉普,送一般客人,就套一辆或几辆骡子或马拉的胶轮大车。

吴玉章校长四川人,是老革命家,老民主活动家,跟随孙中山先生多年,并且在海外组织革命活动。记得那年正逢他 80 大寿,我们大家去贺寿,看到堂屋正中高悬着两幅红色贺幛,一幅的下款是毛泽东,另一幅下款是朱德。吴老将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提纲油印成册,分送给贺寿人,亲自用毛笔题写赠词,毛笔字写得很有风格。钱俊瑞同志,安徽人,多年在上海创办经济学学术刊物,是一位经济学者。据说,少奇同志特别器重他,让他担任平山县县委书记。传说,他赶到一个斗争会现场,把一名错斗的妇女解脱出来。当时他担任教务长之外,恐怕还是党委书记。后来进城,他在文化部和高等教育部也都是担任副部长兼党组书记。此人思维敏锐,语言能力也很强,善于掌握策略,也擅长做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

范文澜先生,原籍浙江,因祖上在河南汤阴做官,所以在生活习惯上是北方人的味道。他的夫人戴老就是豫北人。多年来,他是北平女子文理学院教史学、文学、训诂学的挺古板的教授。可是由于赋性偏激,所以早在共产党的“左”以前,他已经“左”起来(这一点与鲁迅类似)。他写文章骂孔子,骂宋明理学,骂朱熹,骂佛学,都很偏激。到延安以后,他很受到尊重,当毛泽东讲“年轻人应该起来打倒老年人”、“这是历史的规律”的那场讲演时,范也在座,毛还加了“范老你是专家,我讲得不对你可要纠正呀”那样的话。范老在延安就写起他的《中国通史简编》来。我曾经有缘读到此书的初版本(而不是一次又一次的修订本),其中主要写的是历代统治者的残暴及荒淫与无耻。残暴、荒淫与无耻,这些都是毫无问题的,问题是像配方一样,这残暴、荒淫和无耻,究竟应该占多大的比例。无论如何,它不应该是历史的全部。历史中的确有这些脏东西,但除此之外占更大比例的,应该是人类社会的美好的希望和前瞻。所有这些都是背后里叽叽喳喳的,可我把它带到了长春,后来经过揭发,这个话反而成为我说的,成为我背着的一条罪状。

至于成仿吾,他是一个倔老头,当年“创造社”时期翻译法、德诗歌散文的那种才华,已经荡然无存了,只剩下当年骂“文学研究会”、骂茅盾为什么“群鬼”的那股横劲儿。我自己想起来也感到奇怪,在1949年代我在文艺界有来往的,全是“文学研究会”的人,如郑振铎、叶圣陶、茅盾、王统照等,而与“创造社”的郭沫若、成仿吾则从来就是“不相与谋”的。由于在下文第三十三节中我还要专节叙述我与成的冲突,故在此处暂时从略。

### 第卅一节 摇第四部

第四部,就是研究部。它设在正定西门里的“王公馆”。这里是北洋大军头王士珍的公馆,由一系列大院落、小院落、后花园、过厅、跨院等等合组而成。第四部的研究课题当时是有限的,几个青年人帮范老修订与续写《中国通史简编》,这是一个课题。由范老带头、由支部书记刘大年实际领导的《中国近代史》,又是一个课题。由艾思奇担任组长、由我担任副组长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思想的,又是一个课题。其余都是零星的了。

当时职称及其界线,已经有了,但较模糊。大家都按供给制,稍稍有些差别。譬如范老是“小灶”;叶丁易、王冶秋和我,似乎还有何思敬,是“中灶”;荣孟源、刘桂五、王南、王克风以下全是“大灶”。这第四部的同仁们各有各的妙处,容我在以下一一做出描述。

叶丁易,安徽怀宁人,在蒋管区时候他是设在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中文系教授,比较大个的民主人士,所以在王公馆中他是被安排在正堂屋的东间,给人一种“第一号人物”的印象。他的继房妻子白虹同志陪伴着他。他可能有些自命不凡,脱离群众,所以四周围的人对他有些闲言碎语,如说他去找吴玉章校长要求配给一名勤务员(其实这是不必要的),再如说批评范老的《简编》,只不过是拾掇自赵瓯北的《廿二史札记》,等等。开国之初,他到苏联讲学,因脑溢血死在莫斯科大学了。1954年,我与他合编《光明日报》副刊《学术》,他管西城集稿,我管东城集稿,相处得

没有什么矛盾。

王治秋, 又用“高山”这个名字, 也是安徽人, 可能是皖北。发表过一些散文和小说。他和妻子住在“王公馆”正堂屋西间。他和丁易不同, 很注意与群众的关系和领导的关系也密切。他在进北京的半路上入了党, 进城后不久就是国家文物局的副局长(郑振铎的副手)。他的太太很长时间主持《文物》的主编工作, 编辑部的人叫她“老板娘”。这两夫妇后来的情况, 我就不太清楚了。

刘大年, 湖南华容人。此人没有学历, 自学成为学者。当时他是第四部的支部书记。身体很坏, 好像肺部有毛病, 有一次聂荣臻部在正定城外试炮, 一声炮响, 大年同志的肺受了震动, 立刻吐血不止。记得血流在地上一大片。进城以后, 他一直是史学界无冕的领袖。他的观点狭窄, 很固执。

最妙的人儿, 数荣孟源了。他属河北沧州盐山的荣家, 是大家。他是最老的党员, 可当时他不是党员, 党籍被开除了。这就不能不追溯到延安时代, 那时他是延安师范的教导主任, 延安师范奉中央命令, 校址要与西北局调换。学生们不情愿, 荣的“小农”意识也出来作祟, “为什么我们辛苦一场打好的窑洞要让给高麻子呢?”于是兴起风潮, 教员罢教, 学生罢课, 由荣执笔起草了《上毛主席书》。隔一日, 毛的批示下来, 四个大字“岂有此理”。群众欢腾了, “毛主席都说西北局岂有此理嘛”。谁知周扬到来, 代表边区教育厅宣布延师解散、停课整风, 荣孟源同志停职反省。老荣的党籍就这么丢掉了。所以他满脑子装着“老革命不如新革命, 新革命不如不革命……”这样一些牢骚话。

还有两位也相当妙的人物。一位是何思敬, 他曾是中央派驻李宗仁那里的代表。这种身份是很高的, 如南汉宸就是派驻杨虎城那里的代表。何现在老了, 在这个第四部替他设一个“国际法研究室”, 只他孤单一人, 纯是“因人设事”的性质。记得每在大院子里开会, 一般人蹲坐在地上, 独“何老”让勤务员搬一架圈手椅, 每当辩论到问题焦点时, 他总是挥舞着两手, 高声地喊着“这是个原则性问题!”黄华是他的女婿, 听说晚年就



住在外交部长家里。

我们第四部的另一位怪人,叫王锦第,他的儿子是鼎鼎大名的作家王蒙,他晚年就住在文化部长的家里。此人与张岱年似乎是老朋友和好朋友,因为在张的《学术自传》里几次叙述到王锦第,张的划“右派”言论中有一条说,王的历史早已交待清楚,交待清楚的可以不批不斗,但北大在“三反”运动中又把王锦第斗了,张替他鸣放了一下,就被划为右派了。王这个人据说德文极好,只是按北京人的说法有点儿“黜”。

第四部除却这些“老牌”的之外,还有中青年们,其中萧前是我们哲学室的秘书。另有一位叫牟安世,此人乃四川自流井的人,在北大上学时与德语教授冯至关系密切,在第四部与我过从较密,被认为是在自由主义的共同点上“臭味相投”。

范老住在后花园里。那里的花房花棚,经过“土改”,早已荡然无存了,独王士珍的花厅依然存在,范老、戴老和勤务员住在里面。所谓“花厅”,也无什么特殊,只是玻璃窗多些,采光较好,他们的卧室里只不过一片河北式的大炕,长长的,据说住兵可以住一个排,戴老睡在炕的东头,范老睡在西头,头边安一小桌,放一盏油灯,桌上放着他平生喜爱的《文心雕龙》校注稿,上面朱墨斑驳批着若干增注,这稿子是他睡觉也不离开的。他和乐天宇是好朋友,现在乐的农大也迁到石家庄来了。每隔些时,乐要骑匹马来看望范。范必叫勤务员到大什字北去买两斤肉,包饺子相待。每次包饺子,总叫勤务员送一盘给我。所以当时我一看见第四部门口拴一匹马,我就跟妻说,我们又有一盘饺子好吃了。

## 第卅二节摇“逃情况”

在 1945 年的初冬,我们接到情报,蒋介石可能要将傅作义部调到长江沿岸以加强长江防务,北平防务交中央军接替。调动的方式可能有二,一是由天津乘美国轮船,二是由陆路由北向南纵贯河北、河南。这第二条路自然而然会在石家庄发生战事。科研教学人员属于非战斗人员,必须

事先撤离,以减少军事考虑者的过多顾虑。所以我们华北大学的较高级人员奉命都要向南稍稍撤退。这用解放区的习用语说,就叫“逃情况”。初步确定的目的是邢台。根据通知,生活日用工具和书籍,暂留原处不动,由留守人员保管,撤离人员只要轻装跟着走就行了。主要交通工具是骡子拉的胶轮大车。

这样,在我心中就油然引起一个想法:这不又是一个旅游的好机会吗?夏末秋初来时,只在邯郸略作停留,其余一晃而过了。目前,正是补课的大好机会。

记得是在一个下午动身的。我们这辆胶轮车上坐的有:我夫妇二人带三个孩子,成仿吾,何干之同志的夫人刘炼女士,还有牟安世。第一站是元氏。元氏城虽不大,但历史传统很久,恒山郡一度曾设在元氏;写字人经常遇到的一部汉隶帖《封龙山碑》,原刻石的崖壁就是元氏。城中有座孔子庙,房舍全已破坏了,独孔子像还在,每天黎明一位极老的老者身穿长袍,在孔子像前跪拜。这就使人想到,世界上的人有激进的,激进到超越的地步;也有的人就是保守,固执不化。他每天黎明静悄悄地来三跪九叩首,又不搅扰或破坏生产,你没有理由抓起他来。

第二天过高邑。说起高邑,它是东汉光武帝刘秀起家的地方。当时他在“铜马”丛中绕来绕去,一度曾十分狼狈过,只能吃点“溲沱麦饭”度日,后来得到下曲阳一带耿氏宗族的支持,才慢慢积累力量,在这高邑即起位来,算是立住了脚根。他讨的第一位夫人(皇后)就是附近藁城的。到明朝末年,这里出了个赵南星,他是个有大才学的人,在政治上能力也很强,是东林党中的大人物,当时正人君子的领袖,当过天启朝的吏部尚书,与阉宦们做了坚决的斗争。他对他的故乡也很有感情,说“青葱掩映,则知其高邑也”。可惜他晚年政治斗争失败,流放到雁门代州,他说代州“白沙黄草,三月不春”。崇祯朝的冤案平反公文被人有意滞发,致使他终于没有能够活着返回他“青葱掩映”的故乡高邑,死在代州了。我有个同班同学王勉写过一篇文章,考证《金瓶梅》的作者有很大可能是赵南星。这自然不是定论,但赵南星生前对歌舞姬妾之事,经验体会也是很丰

富的。可惜我们是过路打尖，并且旅程上也有纪律，不允许进城访古，只好带着遗憾离去了。

底下一站是赞皇。这是贴近太行山边的一座偏僻小县城。我们在一家饭馆就餐，见一位老妪白发苍苍，龙钟呆滞，但仍扶着拐杖、挎着饭篮，在饭馆的饭桌中间讨饭。当然你给钱，她也欢迎。跑堂的告诉我，“别看这老婆子，他儿子在后方是大工程师。”这话引起我的追问，跑堂的进一步告诉我，“她姓杨，她儿子叫杨世骧。”这一下令我吃惊了。杨世骧在陕西蔡家坡西北机器厂是总工程师，在当年的“工程人员英语进修班”上，他坐第一排。他是日本留学生，英语基础差，所以来补习。他的语言学习进步很快。他曾告诉我，老家是河北赞皇。想到这里，我赶紧跑到街上去追赶那个老妪，想奉赠她哪怕是极有限的一点钱财，但是已经找不到了。胶轮大车定时要启动，不允许我大街小巷再去寻觅。

我们终于到达邢台了。这里是旧顺德府，与偏南的广平府（永年）、偏东隔省界的山东东昌府（聊城县）无形中组成一个具有独特气质和人文风格的地区。这里的人粗壮敦厚，街上卖的烧饼、面条、烩饼一般都比其他地区大一倍、份量重一倍，所以新到人假如按其他地区习惯安排饭食的话，桌上会剩下好多吃不完的东西。小说中武大郎卖的那种炊饼，就是这一地区的名产。

原北方大学就设在邢台，自离去后校舍空着。那又是一座法国教堂，楼房很多，树木也很多，在这里有一个我个人一辈子仅仅见过一次的景观——大乌鸦群。这里的乌鸦是纯黑色的，似乎很肥大，叫声也特别粗壮聒耳。它们的组织性纪律性很强，清早集体大叫一阵，一齐飞走了，到日落山时又呱呱叫着飞回来，入夜后寂然安歇，翌晨拉下一地的粪粒，是农田中上等的肥料。

邢台这地方，卖旧书、文物、碑帖拓片的，似乎比邯郸的多。王冶秋在这里呆过，并且他也有这方面的嗜好，于是由他带领，我得以结识了不少这方面的小行商坐贾。我想，这地方自有它的地域特色，试想，北魏时候赵郡李氏是大族，他们遗留在地上地下的墓碑墓志铭不在少数；北齐时

候,邢台以南的邺城又是高家的都城,又在这一带留下了很不少贵族官僚们的碑石,清末同(治)光(绪)间康有为出来,在书法上贬抑“帖学”,大力提倡“碑学”,一时酝酿成风气,于是洛阳的魏碑,邢台的北齐碑,一直到泰山的金石窟,顿时声价十倍起来。所以这一行业在这一地区兴盛起来,是有其必然的。在王冶秋的带动下,我也买了不少份拓片,对我当时正在进行的《北魏史》研究也起到一些辅助的作用。

当时大家没有正经事干,就经常彼此串门。例如诗人艾青和历史学家尚钺就来看望我,作为我到正定东门里第二部看望他们的回拜。记得尚钺扶一根很粗的手杖,据说这是摹拟闻一多先生的风格。闻师母高真女士有一天也跑来串门,她喜孜孜地说要给我们讲一个故事。

她说,有一天你们闻老师下课回家,把书包一摔也不说话。我和儿女们怀疑他在学校里又跟谁生了气,也不好问。半天,你们闻老师发话了:“咳,咳,我真惭愧呀,当了这些年教授连一个女学生都没拐上手,你看王瑶,才当了一年多五华中学的国文教员,就拐上一个女学生跑了。”我们一听,原来是讲笑话,才放了心。

其实,闻先生所使用的这个“拐”字,有点委曲了王瑶夫妇。据我所知,王瑶的夫人杜□女士当时是真心真意地爱上了王瑶,并且在婚后生儿养女的几十年里,受尽了王瑶兄的精神抑制。就说当时的出走,也是冒了生命的危险的,因为杜的父亲是卢汉手下保卫人员的头头,他坚决反对这场婚姻,曾派人前去追踪,他(她)们俩躲在运送货物大卡车的篷布里,才幸免于难。闻先生用了一个“拐”字,只不过是“语不惊人誓不休”罢了。

不久,大家奉命重回正定去,傅作义不但不会取石家庄,而且准备和平解放北平了。在返程中,我要求在元氏多住几日写点东西,钱俊瑞同志许可了。所以当我们这一家重新返回正定西门里“王宅”时,已经是腊月快要过年的时候了。

### 第卅三节 摇跟成仿吾的冲突

有一天,一辆中型军吉普从平山开来,直开到小学十字街吴校长门口。车上下来的是周扬,他是中宣部副部长。此来,是下达中央命令,北平即将和平解放,进城后接管大专院校和文化部门的任务,就交给华北大学了。要大家组织讨论。

从此以后,每天下午在吴校长住的大厅里,就总在开讨论会。被邀请参加的人似乎很广泛,只要小有名气几乎都被邀参加了。记得从堂屋一直坐到廊沿底下。讨论一直很热烈。

有一天,讨论到北平各大专院校教师都要到军管会的文管会报到、并办理登记的问题。有人主张,不管年龄老少,全要亲自前来报到。于是有人说,譬如像陈寅恪,眼睛看不清楚了,身体也很衰弱,由家属或朋友代替报到就行了。这时,成仿吾副校长用宏亮的湖南话发话了。他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机关来报到,来办理登记,一定要亲自来,本人来,不得由别人代替,因为……”他特别提高了声音说,“这是个态度问题!”

他这句高亢的湖南话,叫人听起来特别刺耳。会场上鸦雀无声。我当时的内心活动很多。我想,这是把自己当成征服者,把知识分子当成被征服者,要他们“迎降”,在文管会门口办个受降仪式吧?我又想,同是共产党领袖,为什么在河南三位高级将领前来拜访我们,陈毅将军还讲了“两条战线的合流”那样的话,而成仿吾则一口咬定即便像陈寅恪那样国际闻名、又那么病残的人也要亲自来报到呢?

于是,我发言了。

我说,我讲点题外的话。我读过一些列宁的传记。十月革命后,俄国知识分子可比中国知识分子凶得多,嚣张得多,像巴甫洛夫,他开口闭口骂布尔什维克“匪帮”(匪幫,轉世譯)。可是列宁怎么样呢?他隔几天就拿着黑面包和黑鱼子酱来看望巴甫洛夫。他骂,列宁并不抓起他来,也不同

他吵,而是耐心地等他回心转意,替苏维埃共和国工作。我说:“这一切,我觉得值得我们大家学习。”话假如只讲到这里,将会一切太平无事,可是我却提高嗓音说,“特别值得成校长学习!”

这一句话,可把马蜂窝给戳下了。当时在会场上,仍是鸦雀无声,没一人反驳,没一人表示同情。事隔几十年,当我在北京又遇见李何林同志时,他对此事记忆犹新,他亲切地握着我的手,对旁边的几个人说,“在那种场面,讲那样一段话,可是需要勇气啊。”

我说,“也需要接受惩罚。”

他说,“我听说了,贬到山东一年。不过,你当时没进北平也好,那里面五花八门,你应付不了的。”

在那次发言后三天,我接到华北大学调离的通知。通知说,现在山东已经解放,山东分局来函,要求华大在干部人员上提供支援。赵俪生同志是山东人,理应支援桑梓……云云。我看了公文后对妻说:“我被开除了。”

校部的秘书又来通知,鉴于赵俪生同志有三个孩子,年岁幼小,并且夫人身怀有孕,冷冬朔九,车马颠簸,会有诸多不便,经吴玉章校长提出,将吴老随身的两名勤务员之一苏春芳同志派遣来辅助赵俪生同志,一直送到华东,不必回程,在当地济南公安部门另行分配工作。

实在感谢吴老对干部的人道主义之情了。

1953年 12月 14日 写毕

## 第十章摇在摇济摇南

### 第卅四节摇济南市委和市政府

1945年 圆月 ,旧历年刚刚过完 ,春寒料峭 ,我们一家五口 ,再加警卫员苏春芳同志 ,由华北大学包租胶皮轮大车一辆 ,由石家庄直往济南。

成仿吾有点象诸葛亮 ,诸葛亮斩了马谡 ,还要祭马谡。成开除了我 ,还为我设宴饯行。但这宴不是专为我的 ,首席是正要调任南京市长的石家庄市长柯庆施。我夫妇是次席。柯庆施高大的个头 ,大声嗓 ,酒量之大我平生未见第二人。他带着一个机要秘书 ,频频给我们加酒 ,当时还未来及问其姓名 ,事后人们告诉我 ,那个人是张春桥。真是失敬了。当时他恂恂若属吏 ,足见这种人是能屈能伸的。后来的张春桥 ,我给他斟酒 ,他还会怀疑酒中放毒呢。

那个初春 ,也是个大境界 ,也就是说 ,错过那段时间 ,就再也看不到的境界了。在内战期间 ,津浦、平汉两条干线扒的七零八落 ,桥梁也都炸伤。我们一路所碰见的是两大景观 ,第一是第四野战军正调往中南 ,去打白崇禧 ,真是车辚辚马萧萧 ,当年日本装备和蒋记的美式装备 ,现在都落入人民解放军手里 ,就格外显得威武。空中呢 ,一排排编队的重型飞机隆隆在头顶飞过 ,但是不须害怕 ,它不是轰炸机 ,而是受阎锡山租雇的陈纳德运输机大队 ,前往太

原 将兵工厂的精密机器拆卸运往台北。浩浩荡荡的炮车和马队由北向南 ,运输机由东往西再由西往东 ,西去时机声还不那么沉重 ,东返时机上已装重型机械 ,机声就特别沉重了。我们一辆胶皮轻车 ,驰行在积雪的河北平原上 ,看着解放战争中的一个特写场景 ,心里不觉增加了若干人生的体会。

到了济南。

济南刚刚经历了解放战争 ,跟开封大同小异。只是在我们说 ,开封一解放 ,我们就离开了 ;济南刚解放 ,我们就进来了。记得二大马路路南那家最大邮局门脸高顶上的那座水泥亭子被迫击炮打得粉碎 ,狼藉在马路上 ,尚未清扫。

我们住进石泰岩。现在 ,旅馆的花样越翻越新 ,什么五星级、四星级等等。当年的旅馆 ,不过什么联昇栈、悦来栈 ,像石泰岩就算拔尖的旅馆了 ,可见华东方面还把我们看做重要来宾接待。至于手续 ,原来说清楚的 ,由苏春芳同志代办。可能他先到了山东分局 ,经批下来 ,我夫妇由济南市具体安排 ,在济南市人民政府协助工作。

我要去“认认门 ,认认人”了。市委在斜马路 (济南商埠全是经纬东西和南北的直路 ,只这条马路不正 ,所以叫“斜马路” ,就如北京的杨梅竹斜街一个意思)。书记叫刘顺元 ,是说着我们青州府一口地方话的一位老“土八路”。人挺和蔼。见过书记 ,再见宣传部长 ,他叫夏征农 ,上海方面的风格 ,原来是作家 ,我见过他的文章 ,他看过我的档案材料 ,也知道我喜欢写文章 ,所以见面还谈得来。再到市人民政府。这是设在二大马路路北的一个小洋楼大院 ,可能是“五三”惨案时期日本人经营下的一个机关驻地。在中间一座小楼里 ,我见到市长。他叫姚仲明 ,东阿县人 (东阿是出产驴皮胶的地方)。他是济南老小学校长 ,老共产党员 (大革命时期也具备老国民党党员身份)。他的秘书长叫管大同 ,是我邻县的潍县人。他们家以在各大城市开设惠东大药房而著名 ,他本人也喜

夙園



欢写写文章,后来为一篇歌颂武训的文章被毛泽东点过名。此外,还有丁梦孙和李澄之,前者是民政局长,后者是教育局长。这两个人也各有风格,丁原籍日照常住济南,是一位带旧知识分子气味很浓的老干部,后来我和他交成很亲近的朋友。李是沂蒙山区的人,老资格的国民党员,他夫人隋灵璧也是大革命时期的妇女领袖。跟这些人打交道,人倒感到比跟华北大学的人打交道更心情舒畅点。

我在丁梦孙领导下,办“济南市各界代表大会”的秘书组事务。所谓“各界代表会”,就是以后各级“政协”的试办。有工人代表,有农民代表,有知识分子代表,有爱国资产阶级代表。我不是党员,只能是副组长,正组长派来的是陶钝。此人是我外祖家诸城的人,一口土到不能再土的诸城腔(带“咬舌子”),不修边幅,大咧咧的。我们办一份《会刊》,他在上边写一篇《会场巡礼》那样的文章,写工人和农民代表多么正气凛凛,等写到资产阶级代表时,却用“肥头大耳”、“脑满肥肠”一类带侮辱性字眼。我一看,当面说,这篇文章不能用。他坐在对面一拍桌子,质问为什么不能用。我说,你既然请了他们,他们就是宾客,就不该当“阶级敌人”来对待。我们吵起来,官司打到市委宣传部,“上边”的意思下来,这篇文章不能用!陶钝才不吭气了。这又一次证明,“左”是我们的一种痼疾。这位陶公后来活到 80 多岁,做到全国文联的副主席。

## 第卅五节摇王献唐先生

在济南南郊的十大马路上,有一座房东盖起来就是为了出租、收房钱的小平房院,北房、东房、西房各三间,南沿未盖房子,所以不能叫“四合院”,只能叫“三合院”。在北房里,住着患癫痫病的王献唐先生和他的庶母。这位庶母已经很老了,但仍然勉强担任着母子二人的炊爨事务。献唐夫人当时住在青岛,青岛一时还未

解放，还过不来。

献唐先生原名王□，号献唐，是用了西域人将玉□献给唐朝的典故。日照县两城镇人。两城，后来成了一个考古遗址，还出过一本考古报告。王先生的尊人是一位老中医，不惜奔波为人诊病，当病家谈到报酬时，老人说，“你就挖些石刀石斧送给我吧，我最喜欢那些东西”。老人看医书之余，还爱看《说文解字》。当时，大文学家许瀚（印林）还活着，在家里督工刻印桂馥（未谷）的《说文义证》。献唐的尊人经常到印林家问学。兼之，王家的姻戚丁以此（字竹筠，按此人即国民党老组织部长丁维汾的父亲，近代物理学名家丁肇中的曾祖）也是文字学家。这样，以乡土为纽带，就形成了一个研究古文字学兼及古声韵学的一个无形的基地。而王献唐先生这样一位全国级的地区文献专家，就是在这样一个无形的基地上茁壮培育出来的。

我第一次看见王献唐先生，那是在 1949 年代，我还是中学生，他也比我后来看见的模样年轻许多，不到 40 岁，但已经是山东图书馆的馆长了。那是在我伯父赵孝陆（录绩）的客厅里。忽然有一天，桌子和椅子都拉到一边去了，空闲出来的地板上放着两块大碑，里面用油纸包裹，外面用麻袋包裹。我问这是干什么？伯父的仆人说，山东图书馆长要拓这两块碑。一会儿他来了，我是娃娃，当然够不上寒暄，但我冷眼一望，就感到此人跟我伯父经常来往的客人不一样，感到此人似乎先天地具有某种特异的神态。

现在他显得老了（实际也不过五十二三）曾到北平协和医院动过开颅手术，有一定程度的成功，也有一定程度的不成功，所以还偶尔犯病会猝然摔倒。比这更使他不愉快的，是居民委员会对他的骚扰。事情是这样的，献唐的堂弟王崇五是解放前王耀武蒋记政府的济南市长，是军统局的济南站站长。这后一个官衔是带有爆炸性的。我就碰见过几次居委会的纠缠。

“王献唐，王崇五是你什么人？”

“俺兄弟 叔伯兄弟。”

“他是个什么人？……是个大特务头子吧？”

“哽。”

“那你是个什么人？”

这对一位老学者来说 ,实在是一种摧残。他猝然倒地的次数就加多。于是我和李澄之商量。李当时除管中小学教育外 ,还兼点“统战”方面的职务 ,所以我催促他把情况反映上去。后来山东分局书记康生和副省长郭子化坐一部小汽车来把献唐先生看望了一次 ,还赠送了一袭高级滩羊皮袍 ,以资御寒。这个风声一传出去 ,居委会方面的压力就马上减轻了。居委会干部遇见献唐先生散步 ,还问一声“王大爷 ,出来逛逛？”

献唐先生当时还没有工资收入 ,靠卖书 ,卖私人收藏文物度日。不久 ,庶母逝世了 ,当时我正出差未在济南。等我回来 ,丧事已经办过 ,太夫人走了 ,青岛已解放 ,自然夫人就回来了。

说起夫人 ,我们叫她王大娘。她娘家姓丁 ,是丁维汾的族妹。她和献唐先生中间既有合 ,又有分。合是中年时候大约夫妻尚好 ,接连生了四个儿子 ,而且个个挺拔。分是各干各的 ,王大娘是文盲 ,献唐先生这一套版本目录她根本不着边际 ,不感兴趣。她最热衷于乡土戏曲 ,叫“搯姑子”后来又称“茂腔”。当时她来之后 ,增赁西房三间 ,她住在里面 ,招来老家拉板胡的唱戏的 ,于是土腔扬艳在庭院之中 :

摇摇

赵美英 ,那个进灯棚 ,  
闪闪那个柳眉来观灯。  
东门灯那个观过去 ,  
一观观了个西门灯。  
西门灯 ,也有明 ,  
上边坐着那秦叔宝 ,  
下边坐的是那小罗成 ,哽……

献唐先生从北房里听到这糟杂而又俚俗的声音，蹙蹙起眉头，露出来“不可忍”的神态。但王大娘还是有贡献的，她做的一套家乡吃喝，如豆瓣子酱、小豆腐、生辣菜、熟辣菜，很适合献唐先生的口味。自她来后，献唐先生的面颜日见丰腴了些。

献唐先生对文化事业的贡献，是不容易被一般群众所了解的，更不被刚刚入城的那些枪杆子干部所了解。譬如吧，抢救重点文献资料，这就是献唐先生在中国文物史上，特别是山东文物、文献史上，永远抹不掉的一份功劳。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在这里略举一些。如《穆天子传》是汲冢竹书之一种，清版本校勘学者黄丕烈（尧圃）反复校勘，其书藏东昌杨氏海源阁。光绪四年海源阁书散出，各书肆（包括日本书商）争相采购。当时阎锡山部晋军打入山东，“炮声隐隐，市语苍皇”，献唐以一月俸钱购归，以免书流域外。此书是黄氏集八家校勘于一本，后世凡有研治《穆传》者，深得益于此本者最多。此例一。再如，乾嘉间山东栖霞学者牟庭（号默人）一生闭户著书，不求闻达，著述等身，其中以《诗切》与《同文尚书》二种新见解最多，亦最精辟。但学术界多年只闻其名，未见其书，每每引以为憾。其家藏稿迟至卢沟桥事变始愿求售。献唐先生辗转寻觅，始得有今齐鲁书社之影印本行世。牟氏自云，周秦师儒，皆训诂学义，而不切文意，致古意难晓，牟氏如中医切脉，以得三百篇之本怀。自此诗人俯仰之情，音辞婀娜，如枯槎春生。《同文尚书》取“今古文同”的意思，摒弃各派“家法”，单凭作者的悉心揣摩与独立思考，提出若干新见解，成就一家独立的尚书学。本文作者亲见顾颉刚先生在齐鲁出书以前，千方百计求一见此书，寤寐以求的情状，犹历历在目。而以上两书，均由献唐先生运往抗战后方四川万县租赁十数山洞贮藏，得留传后世。此例二。再如，南宋最末年内廷供奉汪水云随末帝赵昀及皇太后、太皇太后，受蒙古军俘送燕都，又往大都；后不仕，为黄冠（道士），云游西岳、川湘浙赣之间，遗诗四百余首。这些诗，不是寻常的诗，是一部南宋亡国的

诗史，故历来各家流传，本子很多。献唐先生约集当时学者顾实、柳诒徵、王重民诸家进行合力校勘，终成佳本流传于世。此例三。再如清道光、咸丰间山东莱阳学者周悦让（梦白），自科举得一进士之后，就辞官闭户读书著书，“偶有所得，即下一笺”，积成《倦游庵槧记》一书，其书稿也是经由献唐先生以 100 元买下，运往四川万县山洞，才得以保存下来的。

因此，我就跟李澄之商量，不仅王先生与特务无涉的事要反映上去，他这些汗马功劳也要反映上去。慢慢有了效果，王先生被聘为山东古管会（后来改称山东文管会）委员，有了职务，也就有了点工资。再后，以郑振铎、夏鼐为首的全国考古学会也向他发出了请柬。我记得他去北京那天，第一次脱下长袍，穿上崭新的中山装时，他捋着上须对我说：“王胡子大爷也要进你们的北京城了。”

献唐先生四个儿子，没有女儿。大儿子据说是地下共产党员，重庆的特务本已把他列入抓捕名单，但碍于他是丁鼎臣的外甥，王站长的侄儿，一时未捕，但后来还是捕了，关在渣滓洞。有一天，献唐老泪纵横地告诉我“挖出来两口子的尸体，老大女朋友肚子里还怀着我的孙子呢！国民党对我有什么好？”二儿子是他最心爱的，华西医科大学优秀毕业生，已预先订妥公费资送留学，可是谁会想到，突然感染脑膜炎，一两天功夫就没了。献唐非常悲痛，不惜将自己珍藏的“饕餮脸”（又叫“金盖脸”）卖给卫聚贤，始为儿子营了葬。四儿子学工程，历来跟老家庭疏远，并明确表示献唐先生身后所有遗物、遗产，以及所有知识产权，他一概不过问，不染指。所以献唐身后继承人，就只剩三儿子王国华兄了。国华自小留在日照老家，跟他祖父长大，未受足够的中、高等教育，靠自学的一点积累勉强操持一些老人的遗事。此人逝世，也已十余年，闻其子媳双双在青岛开出租车。“三姓之后，于今为庶”了。

我和献唐先生的关系，只能被描述为非正式的师生关系。他从来未正式地给我讲授过什么，我只是在济南工作的十个多月中，

经常到他的寓所里去聆听他的“警发之微”。而我的亲切感受是，从“警发之微”中所得到的收获，远远比在讲堂里“他在上边讲，我在下边记”要大得多，大得多。当然也要结合另一个条件，即我本人也不是什么蠢的家伙，献唐先生也是在透视到我这猿猴岁刚刚出头的年轻人，只要他“告之往”，我就可以“知来者”的，他才放开来对我施教。

國歷年 源月 愿日 写至此

# 第十一章 摇去北京

## 第卅六节 摇东厂胡同二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 1949 年 10 月 1 日宣布成立的。此前一个月，津浦线已经修通了，我便搭车到了北京，住在石驸马大街北师大宿舍叶丁易的书房里。我到北京饭店，找到当年西安城工部单线联系人程之平同志，他当时是民主人士接待处的处长，经常跟钱俊瑞在一起研究事情。他说，我的事他业已知道了，党内研究那么做也不一定合适，可以通过钱俊瑞把我调进北京。他叫我先回济南，听候通知。

11 月我正式调到北京，安排在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编译局担任编译。这个局设在东厂胡同二号。邻家是一号，是有传统的名人宅邸，黎元洪住过，蒋梦麟住过，胡适住过，现在范文澜住。倒座的南房里住着邓广铭，解放前他是胡适的秘书，所以住在这里。解放后他未搬，仍旧住在一号。

二号也是一个大宅院，不过主院是北大文学语言研究所占着，把中门封闭了，从后门出入。我们占的是东跨院，所谓“一堂二内”，不过这堂是大堂，内是大内，暂时容下两个局：编译局和国际联络局。前者的局长是杨锺健先生，陕西华县人；后者的局长是钱三强，我在清华时的高年级同学，名教授钱玄同先生的儿子。我被分配在杨老手下工作，按副处长待遇，每月 15 斤小米（当时北大

的高级教授是 ~~五~~四斤小米)。临街的倒座房,隔成单间或者两单间的套间,给一般人员当宿舍。我被分配给了一个套间,准备从济南接来家眷一起住。

在半年时间里,我跟杨老一直配合得很好。原因之一是我在陕西当过八年教员,像个半啦子陕西人了,在语言和某些习惯方面,能达到谐和。当时局里其余的人都还没有来,只我们二人匹马单枪创办起一个局。主要工作有二,一是创办《中国科学》和《中国科学通报》两个杂志;二是把原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下属各所各科学期刊进行合并、分开,总之一句话是调整。调整之前是先登记、填表。不清楚的还要下到所里一一落实。杨老了,跑腿的事情是我,但干这样的事我津津有味,不怕辛劳,反而精神愉快。

这时,“上边”派来了一个关肇直,这是一个“宝贝”。看戏时,看到宋仁宗被包拯请来观花灯,出来一个灯官报灯种,我们这个关肇直就活龙活现地像这个灯官, ~~猿~~岁的人尚未婚娶,却留上两撇仁丹上须。他的父亲是广东人,母亲是山东人,他的外祖父是北京师大教《通史》古代一段的老教授——陆懋德。很多著名史学家的《中国古代史》都是陆教的。关不学历史,学数学,是清华比我低一班(十一级)的学生。在学校时根本不认识,连听说也没听说过。可是不知怎么一来二去的他到巴黎留学了,并且似乎在中国参加布拉格世界和平大会的事情上起了什么作用,于是他入了党。所以一进编译局,他就摇头摆尾起来,因为他的直系上司杨锺健当时还未入党,直系下属我也不是党员,他承上启下,内心中就自封为编译局中的核心了。我常常这样想,自从政策和策略是生命的话传世以后,也会带来正面的和副面的影响,许多非正规的、不正常的甚至不正派的都通过“策略”二字的绿灯就进来了。“他对我们参加世界和平大会起作用嘛”就是一句“策略”的话。这样,一个对中国国情,对世界革命的来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派茫然的人,就以党员身分出现在新中国新建立的科学院里去了。我



想,当年巴黎支部管组织的人,不能对这件事推卸开责任。

编译局是一间大房子,东南角摆最大号写字台一座,安有电话,由局长杨锺健使用。西南方摆中型写字台二座,安有两架电话,由关肇直和我对面坐。其余人员是普通书桌,不安电话。关此人心眼非常小,唯恐怕我以副处长名义冒他正处长的权柄,所以打电话时总是谆谆叮嘱对方再打电话一定要找“正”处长。办公室的人听惯了,就误认为他姓“郑”。于是就闹出了笑话,有访客找关处长,接应人竟说了“我们这里没有关处长,只有郑处长”的答辞,其实,我的“官”有比他小的部分,也有比他大的部分。我是整个科学院学习大组组长,兼院长副院长学习小组组长。关坐在我对面,经常听见副院长们如吴有训、陶孟和、竺可桢等因事或因病向我请假的电话。

杨局长一直对我很好。他把他父亲杨松轩先生(陕西咸林中学校长)的墓志铭初拓本送给我,我至今事隔 缘年 还有时找出来在客厅里挂挂,因为这份墓志铭是张伯苓撰文、于右任书丹、马衡篆额、李书华撰铭,真是一派名人,可以说得上是“扬名声,显父母”的事。特别是于右任那带有魏碑气息的小楷书,我没在其他地方见过。所以,我一直把它当做一件文物珍品收藏着。

## 第卅七节 摇我跟郭沫若的冲突

郭沫若,我从小对他的文章有好感。在初中时,我读到他那情诗集《落叶》,“你那飘浮在逝水上的落叶啊”,我常常吟诵。又读了他的短篇小说《叶洛提之墓》,这是一篇“盗嫂”的故事。还读了他的译品《茵梦湖》,开头几句我一直能背,“一日晚秋薄暮,一老人衣冠楚楚,徐行走下城市”……这一切都说明,一开始我对他并无反感。

反感,是自到科学院以后。我是院长副院长学习小组组长,但

郭沫若、陈伯达不在院部学习（郭在中南海与周总理一起学习，陈伯达在党校学习），所以我们一开始并没有非接触不可的机会。但我被指定同局长们一起列席院务会议。只是列席，不发言，也没有表决权。但这就赋予了“静观”的机会。我亲眼看见他拍着桌子训斥吴有训和陶孟和。吴有火性，不服，跳起脚来同他吵；陶则安安稳稳地承受这种凌辱，其状甚惨。于立群当时并不是科学院人员，但也搬一把椅子坐在郭老身后帮腔，说三道四。

我忍不住了，就写信给当时设在王府井大街南头路西的《人民日报》社，说有情况要反映。他们打电话约我傍晚 7 点到报社。我去了，当时还没有录音机。有四五台打字机围在我周边，啪啦啪啦价打。但最使我吃惊的，是事隔一月，我收到一封复信。可惜这封复信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了，不然我一定把它影印出来，“立此存照”。

复信分两段，前一段是“应酬”的口气，说您向我们爽直地反映了科学院领导同志的一些作风问题，我们很感谢。后一段就利害了。“但是”，（一个“但书”，毛泽东就几次阐发过“但书”的重要作用）毛主席教导说，假如拿敌对的态度对待自己同志的话，那么我们自己的立场就不知不觉站到敌人那方面去了。“谨供您参考”！好家伙！这不就是说，谁给郭沫若提意见，谁就是反革命吗？最有代表性的大报的编辑室，表的就是这样的态，对自己的成员不惜用威慑别人的口吻予以保护，而且在此后历次运动中也都是一贯地保护积极分子，打击提意见者，这个传统才造成了此后一直是“党天下”的传统。我这个匹夫小子，在开国之初，不过是初试锋刃罢了。

另外一件冲突是为了一篇文章。当时，叶丁易和我合编了一个《光明日报》上的副刊，叫《学术》，他管西城集稿，我管东城集稿。有一天，叶说，请你们院长写一篇文章吧。我就找个机会对郭老说了，反应很痛快，一口答应了。而且没隔几天，就把稿子交给

了我。题目是《蜥蜴的噩梦》，文内不点名地骂了董作宾，也不点名地骂了郭宝钧。说这样的人只好到台湾去“殉葬”。这一下，我们犯难了。董已去了台湾，骂他“殉葬”关系不大；郭现在考古所担任研究员，这样骂法合适吗？叶和我商议，郭老是大人物，他的文章我们不宜改，于是叶说，“你就近问一问是否由郭老自己改一改？”我问了。郭沫若很不客气地说，“你们嫌不好，给我拿回来，别的报刊会要的！”好家伙，大人物的架子我是感受到了。我和叶商量，没有其他办法，“原样照登”就是。

这件事使我憋了一口气，在脸色和语气上都可以觉察出来。杨局长敏感到了，就问“你和谁生气啦”？我憋不住了，就“竹筒里倒豆子”统统说了，而且是在办公室说的，于是被“听者有意”的正处长关肇直听去了，就连忙向党组汇报。适逢周末，我去打开水，遇见党组书记恽子强了（他是革命先烈恽代英的弟弟），他说，“到我家坐坐不？”我敏感到党组书记大概有什么话要对我讲，就立马去了，果然。恽十分温和地对我说，“此后有什么事到我这里来说，好不好？在办公室里人杂，传来传去，会产生影响的。”这一下，我就完全明白了。

我的气越憋越厉害。《人民日报》的复信叫我憋了第一口气，关肇直打的小汇报叫我憋了第二口气，当时我才三十二三岁，火气盛，就接连写了三封信：辞职！当时已经是去留的事依靠组织安排，已经没有“辞职”这一说了，可是我还是走老路了，辞职。再说，要辞职第一找杨局长，第二找人事处长恽子强，但我都没有找，我的《辞呈》是自己跑到郭沫若院长室交给秘书的，明显带有向郭沫若挑战的意思。当然，郭沫若也不是吃素的，在我第三份辞呈递上去的中午下班时，编译局的女秘书姚舞雁同志（她是姚蓬子的妹妹，姚文元的姑姑）交给我一张《中国科学院便条》，上面写着：

编译局编译赵俪生三次请辞，碍难再留，应予照准。郭沫若。

这样 ,我这一辈子跟 “创造社 ”的两员主将各碰了一下头 ,虽然在形体上并未碰得头破血流 ,但都是以鄙人的失败而告终。我失败了 ,但精神是愉快的。

## 第卅八节 摇艾思奇对我的救助

辞职照准 ,这件事办的很麻利 ,但麻烦的事还在后头。当天晚饭后 ,院部的总务主任黄某 (按 ,此人南通人 ,两年后镇反运动中被揪回南通 ,原来是个军统特务 ,枪毙了 )到家下来说 ,院部的宿舍很紧张 ,离职人员按规定限三天搬出宿舍 ,最多不得超过六天。超限 ,我们要派工人强行搬迁了。

这一下 ,可叫我 “抓瞎 ”了。我搬到哪儿去呢 ?难道黄某人会把我们家的铺盖撂到马路上去吗 ?

首先 ,我先联系北京的几个大学。回话是 ,正在改造调整 ,不进入。无法之余 ,我想到的只有一个人 :艾思奇。他是原华北大学第四部的副主任兼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小组的组长 (我是副组长)。但他现在很忙 ,到处作报告。因此 ,我首先要打听哪一天在哪个大学作报告。有一天有人打电话告诉我 ,他那天下午在清华大礼堂作报告。我就赶去了。清华嘛 ,轻车熟路。先到同方部 ,看见冯友兰先生杂在人群中精心记笔记。再到大礼堂 ,前门的人很拥挤 ,我就到后门。当年这里是高年级女同学朱画晴女士练钢琴的地方 ,记得上学时夜里从大阅览室出来疲倦之中听到琴声幽扬 ,不觉又提回一点精神。这时我凭科学院的工作证明 ,进到后门里通着主席台的地方坐下 ,看见吴晗、费孝通、钱伟长一排坐着 ,台的前沿就是艾思奇在作报告。等到中间休息时 ,我就找到艾本人 ,说有件急事要找他。他考虑一下 ,就说 “这样吧 ,你在后台等我讲完 ,坐我的车回党校 ,夜里好好地谈一谈。”

中央党校当时设在颐和园对门 ,临时使用清华农学院的房子。

门口警卫森严，叫我登记，还对我进行盘问。事后，艾思奇解释说，“这两天党校紧张，因为两天前有一无名男子要找陈伯达同志，经怀疑搜身，带匕首一双，意图行刺，所以门卫上就紧了一点。”

艾思奇同志，云南人，原姓李，名字的西文简字是 隳隳，所以就取了这个名字（这一点与郑振铎类似，郑的名字的简字是 隳隳，所以叫“西谛”为笔名）。以我与艾在正定共事近半年的体会，艾思奇同志天性淳厚，从来不见他刻薄过人，也从来不见他用坏心眼考虑过人，他总是拿好心对人，以厚道待人。他生活十分俭朴，当时他已是马列学院的副院长了，却连个勤务员也不配备，一切自己来。当时他爱人和孩子大概还在平山，所以他一人经营生活。一个套间，他住里间，在外间书房里安放一架行军床叫我睡。自己到大厨房用两个饭盒打来两份“盖浇饭”，他一盒我一盒对坐而食。吃完就谈，在谈话中他听的多，表态少。谈完他就安排我睡，并说他自己睡还早哩。半夜醒来，我看见他光着身子只穿一件裤叉，到院子井里打上一桶井水，浑身淋浴，把旧裤叉洗好晾到铁丝上回屋睡觉。

第二天，他不比我起的迟。他告诉我，他昨天夜里想好了，他要介绍我去吉林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去教书，他用加急电报打给张如心校长，并嘱他电汇路费。说完这些话，他就做出姿态，表示不多留了，于是我就告辞回城。

就这样，我跟关肇直、郭沫若中间因纠纷而造成的危机，从而得到了解救。我们一家五口，做搬迁长春的准备。那个关肇直调升数学研究所所长，想来更是威风八面了。听说此人在“史无前例”中是造反派，领起一支战斗队要打倒华罗庚，至少要把华搞臭，未能得逞。据说抑郁而终，阳寿未到 遽 后来又在报上看到一篇文章，讲他在担任所长期间，如何压抑和迫害天才数学家陈景润。

1957年 源月 员远日写完

隳隳

## 第十二章 摇去东北

### 第卅九节 摇东北师大

截止到当时为止 ,我的脚未踏出山海关一步。现在要出关了。我们买了北京——莫斯科一次国际列车的车票。车没有硬席 (旧说法叫三等车) ,除卧铺包房外 ,全是软席的散座车 ,绿绒弹簧的座位。旅客不多 ,稀稀拉拉的。

东北 ,学生运动中经常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还有“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有些偏抽象的理解。现在具体化了。东北地面很大 ,当然带着日本统治近二十年的创伤 ,也带着国共内战的创伤 ;可是另一面 ,则是铁路网比关内密 ,铁路支线多 ,像人的血管一样 ,血脉比较通达。假如青岛的房屋和街道 ,是半德国半日本的话 ,那么这里除老的中国村庄外 ,其余几乎全是日本派头的了。村里人睡火炕 ,城里人睡踏踏实实。房间是木头格、拉门。

东北的人 ,大多是山东“闯关东”人的后裔 ,个儿偏高 ,挺爽直 ,比原山东人更粗犷。以上说的是主流。此外 ,还有原八旗人的后裔。再就是中国人与俄国人、日本人的混血儿。江南人的味道 ,这里比较少。一种较普遍而其他地域甚少的吃喝 ,是高粱米 ,简直就像江南人吃大米饭一样。但大米算细粮 ,高粱米是粗粮。此外 ,还有一种区别于谷子、小米的粮食叫稗子。稗读“败” ,稗子糊糊摊的煎饼就是比小米糊糊的香。

东北的语谈,也有个别的地方,如电车叫“磨电”,汽车叫“电车”。我们是黎明前四五点钟到长春的,没人来接,打电话给东北师大校长办公室,说马上派电车来接。我们一听好怪,电车在轨道上走,怎么好派呢?原来这又和日语有关,日语把汽车叫自动车,读曰“吉电啥”,说的时间长了,就成了“电车”。

火车站的老市区,从老市区什么头道街、二道街、三道街出来,一条直通南部市区的大道,叫斯大林大街(现在叫和平大路),顶头一条垂直的东西大街叫自由大路,东北师大的许多大楼就座落在这条街上,据说都是伪满洲国各部院的办公大楼,所以构不成惋惜。假如沈阳及其毗邻的几个城市,构成一个工业基地的话,那么长春似乎是文化基地了。著名大学就有两座,东北师大和东北人民大学(现称吉林大学)。此外,还有著名的东北电影制片厂,简称“东影”。毛泽东时代的若干著名片子都是这里拍出来的,许多苏联著名片子都是这里译制出来的。我们初来乍到印象很深,大学生还是日本大学生的装束,一律白色学生制服,大盖帽。每逢假日,部分大学生受雇到东影去当群众演员,还有一点微薄的报酬,相当于勤工俭学。

东北师大的校长兼党委书记是张如心。教务长是何锡麟,是从延安解放社出来的,带有理论家的身份。他把他译的《列宁选集》第二卷签名送给我。不晓得为什么,我每到一个地方,总跟偏重理论的人交成朋友,在正定是艾思奇和何干之,到长春又交上了何锡麟。大约这样,对于我的理论修养会有增益。可惜的是何不久调到北京师大,不久就去世了。艾思奇也只活了缘岁。

东北师大的理学院叫自然科学学院。文学院叫社会科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是智建中。此人我在下一节中将有专文叙述,故此处不赘。我在历史系中是中国古代史教研组长,开《中国通史》课的上古史段,徐喜辰先生担任我的助教。我的上古史教完,接着就是陈连庆先生的中古史段(即魏晋南北朝隋唐段)。我与

陈连庆先生结成了终生的好友，~~愿~~愿年他去世后，他的女儿要我  
为他的遗集写了《序》。

我们的家最初安排在自由大路偏东的一段，一座简陋到不能  
再简陋的水泥小二楼，我家住楼上，楼下由两位俄语女老师母女二  
人居住。母亲叫 Сополева (~~苏波列娃~~)，女儿叫 Нерюбина (~~聂留宾娜~~  
~~娜~~)，中国字是索波列娃和聂留宾娜。我们邻居关系处得很好。  
我在她们家的台桌上看到她们丈夫索波列夫和聂留宾的放大照  
片，都是沙俄军官，前者已死去，后者还活着，自西伯利亚回来，成  
为苏联公民。这中间还夹杂一段故事。到东北后，我家养了一只  
小狗，也经常到俄国人家去串门，那母女二人也经常拿剩面包和菜  
汤喂它。狗，俄语叫 собака，简称 бака。这年愿月，我家唯一的儿  
子在长春市立医院下生了，出院后我们跟邻家唠咯，说起个什么名  
字，那母女说，就叫 ~~苏波列娃~~吧，又嫌音节太繁，就叫了 ~~苏波~~。后  
来肃反运动中，山大的积极分子宋锡民怒斥我，“你不崇洋媚外，  
连你儿子都是起的英文名字嘛！”天老爷，我真是欲辩无言了……

也许由于我是艾思奇推荐来的吧，张如心校长对我很看重，加  
聘我为校务委员。这个角色挺要害，有很多重要或机密的事，都在  
这会上讨论。参加会的都是党委委员、院长，教师参加的极少。讨  
论的事举个例，有一次，讨论该不该聘高亨到学校来？高亨先生，  
东北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首届毕业生，跟王国维先生精研经籍训  
诂之学，对《周易》有精湛的研究。他的路子跟同是东北人，同是  
《周易》研究者的金景芳先生就截然不同。高亨主张研究《周易》  
一定要把《经》和《传》分开来，使《经》是《经》、《传》是《传》，互不  
干扰。金景芳主张，《经》和《传》必需联系起来研究，才能看透《周  
易》的辩证思路。两派各有所长，都是海内大家。高亨除《周易》  
外，还长于诸子之书的训诂。找训诂学者，除唐兰外，就数高亨了。

可是高亨有严重历史问题，那就是他在蒋介石快完蛋的前夜，  
担任了东北勘乱委员这个职务。真是搞起学问来那么聪明的人，



在政治面前,竟是如此糊涂。他还亲自到东北来“莅”了一次“新”,看到炮火连天,事无可为,才狼狈逃回重庆去了。现在全国解放,他也慢慢老了,写信回来,要求为桑梓服务。记得在张如心校长的客厅里讨论了两夜,每次都讨论到午夜以后,当时吸旱烟和纸烟的干部多,满屋烟气弥漫,最终还是只两票支持,大多数反对而否决了:不聘。高亨只好另投青岛,被华岗校长聘用了。

这时,我们的家搬到了西康路,两份 ~~葬期~~ ~~葬期~~ 两套噶斯(煤气),两只浴缸,比前边那一份宽展多了。因为有婴儿,就雇了一位保姆。她姓刘,我们喊他刘婶。她对我妻讲了她很多悲惨的经历。她的第一个丈夫是个开天车的工人,不慎从天车上摔下来摔死了。第二个丈夫是跑老山挖人参的,国共交兵,怎么敢乱跑,只好赋闲在家了。最悲惨的是长春围城中的饿殍们得到郑洞国准许可以到城外八路军的粥场就食。她讲,出城有走不远就躺倒的,有的距离粥锅只有几步就死了的,有的饿久了猛吃下碗粥撑死了的。真是惨不忍睹。她带着女儿,总算奔到了粥锅旁边,喝上了粥,才活了下来。

## 第四十节 摇智建中同志

智建中同志,苏北盐城人,是周扬领导下的陕甘宁教育厅的科长。同他一同担任过科长的,还有原兰州大学副校长林迪生和辛安亭。这样一说,就可以看出他的辈份了。我之所以专诚立一节来写他,是因为他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和之后,有着明显的转变。我亲眼看见过不少干部,“文革”之前,他忠实执行极左路线;“文革”之中,他成为“走资派”,受尽折磨;可是到“文革”之后,当他重新掌握一点权之时,他仍然一“左”到底,毫无悔悟,对那些他曾迫害过的“牛鬼”们毫无歉愧之心。跟这些人对比,智建中截然不同。当 ~~员~~ ~~缘~~ 年下半年我跟他同事半年的时光里,他虽然不是最左

的，却也是左的阵营中有力的一员。他派两名青年（大概是助教吧）一名叫宋广应，一名叫薛虹，经常到我家走动套近乎，仔细听取并记录我在日常生活中的琐言琐行，半年后，当我要调往山东大学时的临行晚会上，则将这些资料，上纲上线，恶言恶语，统统抖撒出来，使我过晚地觉悟到原来我中了一场“阳谋”。

一转眼 1956 年过去了。到 1957 年，我又到长春来，参加由《历史研究》编辑部召开的“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会”，在南湖宾馆。说起南湖宾馆，据说它是周恩来总理批评过的规格逾制的楼堂馆所之一。开幕式那天，我有自知之明（是摘帽右派嘛），就坐到最后一排上。可是奇怪的事发生了，《历史研究》一位副总编在会场里到处寻觅我，当他找到我时，他说“请到主席台上就座”。这对于我说，真是莫知所措了。那位副总编看到我犹豫不肯去，又说：

“这是会议筹委会的决定，在北京就定下来了，请不要辜负这番好意。”

只好上了。记得我的左手边是杨公骥，右手边是金景芳，再过去是何兹全、白寿彝……。会议还没开到一半，就有会议工作人员来小声通知我，叫我到宾馆门口接待室去接待来访者。并说宾馆出过事，所以门卫森严，访客只能到门口接待。我悄没声地从主席台后门溜出去，原来是智建中同志和当年我教的学生，1956 年后已是正、副教授了，有吴枫、杨树森、高振铎。他们此来是通知我，不要预订火车票或飞机票，因为东北师大要请我作五场讲演，师生们还准备了一系列的宴请。这边会议一结束，那边就派车来接，到他们招待所住。

智建中同志明显老了，比 1956 年前明显老多了。他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是“走资派”，还是“现行反革命”。拨乱反正后，他什么职务也不担任了，只担任一个“党委顾问”的空衔，逍遥在家。他谆谆嘱咐，一定要来参加他的家宴，宴倒没什么紧要，宴前宴后他有很多话要对我说。

十几天后,我如约赴了他的宴。宴前宴后,他说了很多话。事隔 1984 年,原话的次序和词藻已经记不清了,但“微言大义”则还记得清清楚楚。现在只能按我的记忆和思路,写在下面。

他说,“我是党员,老党员。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这个话,从总体上讲,作为一种概括,我可以接受。但还须加以补正。伟大光荣,就不去说它了,我们只说正确。应该补充说,在个别历史段落上、在个别人的执行下,也会出现很不正确。这一点,必须要补充上去。‘文革’以后,我就认识了这一点。”

“以我为例。我从延安下来,一直没做过违背党、对不起党的事。运动来了,把我打成走资派,我乖乖地受着。我下乡做过‘四清’,农民对我感情很深,听说我打成走资派,不服,进城来游行,这可不得了了,说我煽动农民反对无产阶级的领导,在长春大街上开盛大的斗争会。咱们系一位从福建来的中学英文教员,善于自我塑造,把自己塑造成世界古文明的大专家,被市革委会‘三结合’结合进去了,他坐在主席台上,我跪在下面,头戴高帽。这种颠倒,能说是正确吗?”

“再以你为例。你在我们这里只呆了五六个月,自然不可能有什么建树,加以你说话随便,于是闲言碎语天天往我耳朵里灌。你走时候的会,名为送别,实是一场批判斗争会。我老了,那位副系主任的司马昭之心人人皆知了。他就是想把你赶走,把我打倒。现在这个人如愿以偿了,他是党委委员、历史系主任兼古代史教研组主任了。几十年过去,谁为事业,谁为自己的小账本,不是一清二楚啦吗?!”

智建中的话很多,我也记不下那么多啦。比他在家宴上的讲话更令人感动的,是在长春火车站上为我送行的一幕。我要走了,但火车票很难卖。软卧是根本没希望的了,就是硬卧也难,只买到一张上铺。上铺在开车前是很闷的,所以我就临时坐在下铺的边上。送车的主要是我当年教过的学生,把行李放好都一一告别走

了,忽然有人敲窗玻璃,我一看,原来是智建中同志来给我送行了。那么大年纪,头发已经苍白,身体微微有点伛偻,没有陪伴的人,在怨点多的夜色中来给我送行,这个意思我是完全能够领会的。

圆年后我在写着自己的回忆录,心中油然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情。我想起,被罗曼·罗兰自己封闭了缘年才公诸于世的《莫斯科日记》。日记中记载着这位法国大文豪在一个截然新样的国家里逗留了一个月,他会见了这个国家的领导者,一些出头露面的人物和一些普通的人民。他看到了一些光明,也以敏锐的感官觉察到一些阴影。对于这些阴暗面的萌芽,这位作家不敢放开来写,原因之一是担心会替他的好朋友高尔基带来麻烦。高尔基到火车站送别了罗曼·罗兰夫妇,双方都带着异常的心态。

当然,罗曼·罗兰和高尔基是大文豪,大人物,是人类中稀罕的花朵。智建中和我,纯是小人物,在这一点上无法与上述两位构成比拟。但有一点是可以构成比拟的,即送火车站和送火车站时的心态。什么心态,可以说是一种忧患的心态。《易系辞》中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诗经·黍离》篇中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自古代至当代,自国内到国外,人们都会产生这种忧患的心态。忧患什么?忧患的,是新生事物体上所携带的不健全的东西。这些东西有些会被克服,但很大一批留下来了,而且发展了,甚至会把新生事物带向毁灭,带向消亡。这是人们忧患之所在。古书上说,“不患恶衣恶食,而患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忧患的,正是这个。

智建中同志在那次车站送行之后不到一两年就死了,患的是癌症。

圆年缘月圆日写毕

## 第十三章摇青岛山东大学（一）

### 第四十一节摇三校合并

缘年冬，应华岗校长之邀，我们一家又自长春迁往青岛。我上初、高中时，曾在青岛住过七年，这次回来，又住了七年，所以我跟青岛这个港口城市前后有 员年的缘分。这时正逢抗美援朝开始，沿途会车多是军车，战士们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去了。

这时，设在青岛的山东大学正在三校合并。所谓三校，指由原设在青岛的青岛大学改名为山东大学，原在苏北新四军下成立的华东大学和原设在济南的教会学校齐鲁大学三校合并。这是开国之初全国院系调整的组成部分之一。

仿佛给人的印象是世纪之交的当前的这次院系调整，主流倾向是“分久必合”，而半个世纪前 缘年代的那次院系调整，主流倾向是“合久必分”。当然这也不绝对，实际是合中必有分，分中必有合。但对 缘年代的那次院系调整，几十年来听到的反映，则往往偏重于它的负面效应。举一个例。

有一年我到杭州大学去讲学，一位老教师告诉我，原浙江大学自贵州遵义迁回来，不少学科的教学班子和科研班子本来已经很像个模样了，但天外飞来一个话，说张其昀在台湾要对浙大进行策反。张其昀何人也？他是与竺可桢齐名的著名地质地理学家，解放时竺留在大陆，张跑到台湾，并且据说还当过“教育部”部长。

于是通过肃反,极力清查张其昀的黑根黑线,然后有人提倡,把浙大拆散,张其昀就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了。于是很大一批学者调整到上海复旦,另一批调整到上海同济,还有新成立的华东师大,真是“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这样一来,所谓的张氏黑根黑线虽已化为乌有,而浙大多少年积累下来的教学凝聚力和科研凝聚力,也跟着扫地以尽。事隔 16 年,人们感到浙大班子拆散造成的损失,立意要弥补,这才又新成立了杭州大学。可是学术人员的凝聚力绝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培养起来的。那么,当年拆散浙大班子的调整,究竟是产生了正面效应还是负面效应,究竟正面效应大还是负面效应大,那就很难说清楚了。

山大的情况,又跟浙大不同。这里的办法,是丢石头、掺沙子。齐鲁是教会学校,并且其中著名的医学院留在济南没有过来,过来的只是少数文学院的师生,起不了多大作用,好好“改造思想”就是了。唱主角的是原山大和当“石头”、“沙子”掺进来的华东大学。华东大学,按规定说,应该跟我两年前呆过的华北大学是同等级的学校,但据我亲身经历,无论对马列主义修养的深度或者掌握政策使其不出偏差的稳健性方面,华东比华北要浮薄得多,浮躁得多。对此山东大学早就有所闻,所以很早就出现过不同意合并的大字报、签名和请愿团。但“上边”的政策定下来是不好轻易变动的,所以华大的学生和山大的学生掺到一块了,华大的教师和山大的教师掺到一块了,而最最重要的是华大的党委和山大的党委掺到一块了。后来的若干矛盾和纷乱,根源就出在这里。原山大党委的成员陆续调走了,赵纪彬调往河南,罗竹风调往上海,结果是华大的班子占领了阵地。这时,由香港来到青岛的华岗被大家请来当党委书记,而华岗又是多年搞白区工作经验丰富、而对老区种种风俗习惯很不熟悉的人,所以实权就捏在副书记刘宿贤的手中。

刘宿贤何人也?先看他的下场。“文化大革命”过去以后,中央派遣陶铸的爱人曾志到武汉查处原武大校长李达同志被陷害至

死的究竟，查到原湖北工学院党委书记刘宿贤在其中做了手脚，就约刘谈话。其前夜，刘就在自己家中吊死了。再看 1956 年我刚到山大后不久，就发生了山大医学院著名女教授陈慎昭服氰化钾自杀的事情。在刘宿贤领导下泡制的材料中说，陈慎昭是蒋匪帮特别培训出来双手会打手枪的女特务。有一件事是我亲自看见的，我在华岗校长的第二间会客室里等候谈话，我听到在第一间会客里华岗拍着桌子骂刘宿贤在陈慎昭问题上“太左”啦，“影响很坏”。刘不服，一摔门就走了。这是我亲见的，经 1989 年犹历历在目。

有一次我在一个会上遇见原渤海游击区的一位老干部，他说，刘宿贤从渤海游击队开小差回他老家，在日本统治下当了两年保长，觉得给鬼子干不是个味，又跑回部队去，这不是严重的历史问题吗？可是刘宿贤的本事大，他把这一条从档案材料里抽掉了，叫这么重大的事不留痕迹。

刘宿贤的行政职务只是总务处副处长，行政职务任教务长的是余修。他是山东革命家鲁佛民的儿子。原叫鲁方明，我上清华时他是中国大学的学生，我二人同是《北方文学》的编委。假如刘宿贤的风格是一“左”到底的话，那么余修的风格是需要“左”的时候他就“左”，需要“右”的时候他就“右”。这两位联起手来，实际上就是三校合并以来山东大学的领导核心。

在他们上面，凭空又加了一位校长——华岗。

## 第四十二节 摇华岗校长

说起华岗，现在距离他死在济南东南方雁翅山下的监狱中，转眼已经 36 年了，对他平反昭雪的会也早已开过，但围绕他的一生，仍然有不少问题解决不了，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说法，也一直是众口纷纭。

譬如说吧,他是一个老资格的革命家,这一点没见有谁对此持反对看法。以我为例,1957年初清华共产党支部审查当时的“社联”、“左联”、“民先”的成员认为够了入党水平的人,每人发给两本小书,都是用留声机钢针精心在腊纸版上小字刻写印出的小册子,一曰《清算立三路线》,一曰《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简本)》。这后一本的著者就是华岗。假如他不是老革命,假如他有什么问题,党中央会批准以此书作为发展新党员的必读书吗?可就这样一个活了83岁的人,平生坐了16年的牢,其中愿年是两次坐的国民党的牢,这是可以理解的,而其中15年竟是坐的共产党的牢,并且最后惨死于狱底,这怎么理解呢?平反是平反了,但平反的词也欠清楚。当然,1957年代,法制还很不健全,一切党说了算,而很多情节都习惯于“捂着”,叫它不透明。现在只按透了明的说,华岗是判了刑的是犯了罪的,那么,犯了什么罪呢?据说有三条:

(一)在蒋介石已打倒之际,仍呼他为“蒋委员长”;

(二)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与浙江籍同乡特务,有许多说不清的往来;

(三)山大要逮捕外语系有反革命历史的副教授方未艾时,他以党委书记身份出面阻拦。

第一条根本构不成罪。第三条他阻拦也并未拦住,人还是捕了。只剩下第二条,这需要很确凿的人证和书面证据,据说也没有。但就凭这些,就判了15年!于是社会谣言纷起,有人说是周总理叫这么办的,有人说是康生叫这么办的,有人说是华岗得罪了中宣部长陆定一的后果,又有人说是山东省委宣传部长彭康叫这么办的。但所有这些,都属于谣言,没有根据。

但若干年后,我有一个想法。说上述四人或其中的任何一位在华岗事情上“插了手”或“下了手”,那是没有根据的。但这四个人都“不干预”、“不过问”,不也是一种态度吗?举一个例。贺龙



快要叫“红卫兵”揪出来了，周总理立刻把贺龙夫妇藏在自己家里，这就是一种“保护”，一种“干预”和“过问”嘛。华岗虽比不上贺龙人物那么大，但也是老革命家、老理论家，可是一直坐到牢底，无人吭声。这里面恐怕就会有文章了。

至于华岗这个人，我可以说一说。他是一个学者型的人，是一个知识面挺广而不在哪一方面搞专精的学者，往往这样的学者更能给后辈人才带来多方面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华岗死后山大学生久久怀念着他的原因之所在。作为一个革命者，他属于白区地下工作者的类型，从而与长征过来、延安下来的老区工作者间，不大容易形成谐和。他与其说是一个共产党员，毋宁说他是一位大民主党派人士，他在这方面规模宏伟、恢恢乎大哉，风格与宋庆龄、何香凝是一个等级。这就容易叫一些土包子人物看不顺眼。大家试想，当刘少奇“叛徒”问题要彻底平反之时，纪登奎、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等人不是坚持表示思想不通，说什么在沈阳和张学良、在湖南跟赵恒惕，怎么说也是叛卖么。华岗平反追悼会迟了几个月才开，也属于相同的道理。白区工作方式和老区工作方式中间，就是存在着严重的区别，拿老区工作方式到白区，不到一个小时就会被抓进监狱，拿白区工作方式去老区工作，很多评语就会迎面而来，什么“丧失立场”，“缺乏阶级感情”，等等。在以刘宿贤为首的那组人上面加上一个民主人士派头很重的“书记”，这就是许多矛盾产生并积累下来的根源。

至于我本人，我是在许多方面从华岗那里受益，这一点不能忘恩负义。举一个例，~~1956年~~1956年11月，我在天津《历史教学》上发表了一篇阐述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文的文章。斯大林这篇文章主要是阐述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跟着经济基础的变动将如何变动的问题。他的大意是说这种变动“或迟或速”，而我当时在阐述中对此做了“急剧的归纳”，竟把这种变动概括为上层建筑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而变动的“不迅速性”。这一

论点 被赵宗复同志抓住了。赵是阎锡山的老朋友、老顾问赵戴文先生的儿子,老共产党员,当时是山西大学的校长。他写了一篇争鸣文章,稿子由《历史教学》编辑部转来问要不要写答文。我把所有这些统统拿到华岗那里,他是理论家,有责任做出评论。他仔细阅读看了所有的文件,打电话叫到我龙口路 140 号的家里去。他说,你的归纳是犯了粗疏的毛病,但还谈不上是右倾错误;但赵宗复先生反其道而行,说某些风俗习惯犹如“破砖烂瓦”,言外竟是一扫除即可净尽,这可带有了“左”倾虚无主义毛病。双方各有精彩,各有失误,不是一方为绝对性的对,另一方为绝对性的错,所以这个“局”,还是有充分答辩的余地的。他叫我回去再把资料仔细过一遍,平心静气写一篇答辩文章寄去。我按照这个安排做了。愿月份,两文同时刊出,赵先生再没写文章来。从这件事情里,我明白了为什么华岗一从反省院出来就被任命为《新华日报》的总编辑的道理之所在,他确实确实是政治论争和学术论争中的一名老资格的舵手。

现在我还要说说华岗先生在生活方面的事。他是个书生气很重的人,不善于料理生活。他一心扑在革命上,一心扑在革命理论上。其余的事不大理会。就以家庭说吧,他也一生充满了不幸。他的第一任夫人是他的革命同志、党员,而且在一个小组。小组三个人,那第三个是邵荃麟,后来成为著名作家,后来又因为提倡写中间人物而被批判。当时(大革命时期),身患着很严重的病(大概是肺结核)。为了发扬同志爱,华夫妇就精心地护理。可是突然华岗被捕了,只剩华的夫人一人护理,护理着护理着,同志爱就转变为夫妻爱。这件事令华岗终生遗憾。他说过,他到北京开会遇见邵荃麟,两个擦身而过,不打招呼。

他的第二任夫人姓谈,跟他生育了两女一儿。华岗从 1957 年中期就被关禁闭、蹲监狱,到“文化大革命”前不久,情况一度松弛些了,管监狱的人都对他表同情,在普通监房之外,另给他盖了两

间平房，准许他有一个像勤务员那样的人叫小陈，准许他二人另起伙做饭。最后，准许他保释在外就医，他可以回到青岛他的家。可是这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红卫兵”不准许谈氏夫人和儿女住在龙口路 100 号的花园洋房里，勒令她（他）们搬迁到鱼山路山大教师宿舍中不到十平米的一个单间里。这时，华岗回来了。于是就发生了据说是小儿子不欢迎，而后又发生了据说夫人也不欢迎的局面。当然她（他）们的心理状态也是可以理解的，从高干家属骤然落到黑五类家属，心里有一股深深的怨气，又不敢怨别人，就一古脑怨到那个当丈夫和爸爸的身上了。这不是华岗一家，很多人家普遍如此。

于是华岗的书生气又发作了，他想，回到雁翅山下还有两间平房，一片菜圃，还可以自己起灶，还可以著书立说。他跟小陈商量，“还是回去吧”。可是他学了一辈子辩证法，讲了一辈子辩证法，他竟没想到事物是变动的，监狱也变了，旧的“公检法”砸烂了，换了一套造反派，他不能享受优待了，小陈也走了，他被编到大炕上跟盗窃犯、杀人犯睡在一起。并且，造反派的心眼是很诡的，他们懂得管理人员打犯人是犯法的，犯人打犯人犯法不犯法还没有规定。于是他们就唆使那些盗窃犯、杀人犯起来斗争华岗，殴打华岗。当时华已虚龄 70 岁，怎么受得了？收殓的人说，华岗死在一条空荡荡的土炕上，身无完衣，体无完肤，大小便淋漓在尸体四周，房内扬溢着一股恶臭……

一代革命家，一代理论家，下场如此。

最后，我还要记一下彭康的下场。话说有一年我被清洗了住在贵州女儿家里。距离不远处是厂子的招待所，平时空荡荡的，可是忽然有一天住满了中级军官。我打听一下，原来是来取证的。西安交大校长兼党委书记彭康被造反派学生殴打死了，贵州厂里一位工程师是凶殴人的大学同房间同学，所以来取证。取证的人们走后，我路上遇见那位工程师，问起究竟。他说，那天开大会斗

彭康。凶殴者是大会发言人。发言到结尾处，一般的词令是：“彭康要老实交代，不老实交代，我们就要砸烂尔的狗头！”这个凶殴者感到这个词令太熟了，想变个新花样，就说：“彭康你要老实交代，不老实交代，我们就枪毙你！”

要在一个一般的“牛鬼蛇神”听了这个话，他会想第一，这只是随口说说的，不会真的枪毙我；第二，就是真的要枪毙，也只好跟着去。但彭康的反映不是这样，他是老干部，他是大干部，只许他枪毙别人的份儿，怎么会轮到他被别人枪毙？！他想不通，他就用胳膊轻轻拐了下那位发言人，一面说：

“走，走去枪毙去，走”。

这还了得！一个“走资派”，敢在千万人众目睽睽之下公然对抗革命造反派，嚣张到如此地步，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一拳下去，彭康就倒下了。第二天，学校公告，彭康已死亡。

事隔三十几年以后由我们来看，彭康的下场，不是比华岗的下场也好不了多少吗？

一九五五年 缘月 怨日 写完于兰大

## 第十四章摇青岛山东大学（二）

### 第四十三节摇看京戏

《回忆录》写到这里，家里人提意见了：政治太多了，生活太少了；写别人太多了，写自己太少了。我就得好好考虑这些意见。

恰好从 1957 年开始，我的生活内容也比以前丰富了点。这是肃反产生的副作用。肃反运动，本来是与我沾不上边的，但在左倾盲动的华大领导班子却提用了他们手下的一个人，此人叫蒋捷夫。湖南人，与我同龄，与我并齐地讲马克思主义大课《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教学效果上，他当然比不过我，我知识面丰富，他知识面单寡，只会按苏联提纲粤月悦阅，甲、乙、丙、丁地教，又不好好备课，打一通宵麻将，第二天去上课。这样，学生的反映自必不好。他心里想，“我是党员，他是非党员，他怎么会反映比我好呢？”恰好来了肃反运动，他就向党委建议，历史系头一个斗争我，理由是要打掉我的嚣张气焰。党委副书记都投了弃权票，可是蒋还是赢得了另外的四票，通过了。斗争会格外盛大，在讲大课的大教室里，从下午两点半到六点半还没有完。斗争完，我回到家里，稍稍休息，家里人问我情况，我说：

“像簸糠秕子一样，一颗粮食也簸不出来。”

可怕的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蒋捷夫就敢提议，党委会就敢通过，掌握政策水平之差，可见一斑。而在我，不过没头没脑地、不

着边际地挨了四个钟头的恶毒詈骂而已。而那些骂我的人,在此后数十年运动中暴露出来,有的家庭是恶霸地主的,有的是参加过反动党团而且是骨干,有的甚至是货真价实的特务。这些认识的积累,就使我对积极分子政策,一直采取怀疑态度。我的大学老同学赵德尊,1957年在河北平山全国土地会议上的发言,竟敢在那么些大人物面前说,土改中积极分子愿~~愿~~是流氓。我佩服他的勇气。可是这些现实资料并没有打动最高人物的心,在此后的运动中还一再申讲什么不能在积极分子身上泼冷水,要保护积极分子,等等。

从此以后,我夫妇在政治上就消极了一大步。除了教学和科研是属于“职业”范围之内不能收缩之外,在生活上就自己放松了些。看京戏和买字画这两件事,就是在肃反运动以后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的。

我猿岁才开始看戏。为什么这么晚?理由很简单:家里穷。有的人就与此不同,谭其骧夫人李永藩女士告诉我,她从小看“堂会”积累久了,所以自己也会演荀派戏。我妻高昭一在老家正定还有机会看到北昆演员白云生和韩世昌的戏。杨向奎先生一篇小文中说,他小时候在丰润一早起揣上两个饼子一天跑着看两个村庄的两台子戏。这些经历我都缺乏。我在高中的经历只是背英语单词和解方程式,曾等于几、赠等于几。后来住了清华,中学同学王承鸿,跟我同房,夜里有时不回来睡觉,我问他,他说他到前门外看杨小楼、余叔言的戏去了,我问他多少钱,他回答说,五块大洋还只能是一张站票。我听了,只能伸一伸舌头。

到猿岁上,已经是三级教授了,每月有圆余元的工资。又兼出几本书,有稿费、版税汇来,记得总是到棠邑路中国银行去取,那时支票的传递还用铁丝,吱吱价响。有了这点经济基础,看看戏买买字画就成为可能的了。

一个学历史的,爱看京戏,是理所当然。因为京戏,绝大部分是

历史剧。昆剧就不同，它多半是男女间的所谓言情戏，又是小折子戏。而京剧，如三国戏，就是站满全台的大戏，与历史有很密切的关联。

我们学历史的，天天读正史，而正史除《史记》富有文采，《汉书》和《后汉书》也有一点外，后面的那些正史，几乎都是“断烂朝报”，枯燥乏味，缺乏形象化。在这一点上，京剧就是一种有力的弥补。当然，弥补之中，会有不少的歪曲，这也要预先有思想准备，而歪曲不是主流，弥补是主流，它能提供若干原始性的发展，那是正史中所没有的。

譬如《飞虎山》表述五代后唐国创立者李克用和他的义子李存孝中间，因虎吃羊、牧羊人打杀虎的纠缠而被收为义子的故事，剧中若干民间味道极其浓郁的内容，那是从新、旧《五代史》中绝对得不到的。并且犹不止此。在关汉卿的戏曲里，还不只一次地写到李存孝。这个李存孝，终究因为一次叛变行为被他的义父老李克用残酷地处了车裂之刑。总之，戏剧的内容，大体上等同于野史所起的作用。它不能用来做考证，但它可以增强史学工作者的意念、思考和想象。保守派的考据家是严格排斥想象的，但我不。我认为这些虽不可用之于考据，但不妨碍搞活脑筋，使一位史学工作者的头脑丰富起来，不要叫脑子里充塞的全是老的教条和新的教条。

大体每当两个大朝代更替之际，也就是通常所说两个“盛世”之间所夹的“乱世”，戏剧的素材就更多些。三国戏多，是一个证明。五代的素材也不少。如《古今小说》卷五《史弘肇龙虎君臣会》中所记五代周国国主郭威（郭雀儿）和史弘肇二人原来是两个无赖，赖人家一只狗子打杀煮烂了去卖狗肉。读到这种地方，就自然而然地对那些煌煌《本纪》的“神光”产生出不少冲淡的作用。

京剧中除《飞虎山》外，给人提供启发的正多。如《白良关》，表述尉迟敬德父子凭着两支铜锏相认的故事，使人想起戏剧中不

少剧目都包含有中原主干民族与边境少数民族间又冲突又融合的关系,如哪一个将领的儿子被少数民族掳去收为女婿成了驸马,也生养了儿女。试想,所谓融合,就是通过血缘融合、风俗习惯融合、渐至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的融合而慢慢形成的嘛。《白良关》、《霓虹关》、《当阳公主》、《牧虎关》以及经常看的《四郎探母》,其中就蕴含着这些内容。所有这些,就在“断烂朝报”之外,给我们提供出若干生动的、原始的景象。这些景象,考据派说是假的,而在我看来,它比那些“真”的还更真些。

我常对儿女们说,我平生有两股埋怨情绪。先说第一股。我埋怨,我在 1949 岁至 1954 岁间为什么就没有这样的一种机遇,在邻居中邂逅一位画家,他喜欢我,叫我替他磨墨展纸,慢慢陶冶我成为一名画家。从我写字的笔姿看,我完全有这种可能。可是,缺乏这种机遇。现在再开始,已经过了那种含蓄期,那种接纳培养的稚气阶段,不可能了。第二股埋怨,是埋怨自己在 1954 岁至 1959 岁间,为什么就没有这样一种机遇,在邻居或亲戚中邂逅一位拉京胡很娴熟的人,他喜欢我,教导我把我经常顺口胡唱的若干唱段纳入胡琴的规格,合乎板眼。当然,唱戏和画画中间又有不同。只要经过精心的培养,我相信我自己可能成为一名中流以上的山水画家。这恐怕不是吹牛。唱戏呢,怕只能清唱,不能登台。第一我的个儿太高,穿上厚底靴,就成为黑白二无常了,不是人们说杨小楼“个儿太高,摆手撂脚”吗。第二,我自中学到大学,体育课及格的时候很少,像“吊毛”(翻跟头)之类,我就很低能。但我的嗓子不坏,宽嗓窄嗓都好用,所以只要经过艰苦培训,生旦净都可以来一点。但所有这些,都等于说傻话了,因为人生是不可能反过来再重新走一遍的。我之所以在耄耋之年还想这些事,那是因为我懂得画过一幅长轴山水画自己挂在墙上,胸中就会有一股浩然郁勃之气,第一它很好受,第二它可使人长寿。我还懂得,一个演员唱过一段淋漓唱段之后,走到后台时也会有一股郁勃之气。而当你写完一篇很



自我欣赏的大史学论文之后,除却疲劳,没有这种浩然郁勃之气。这就是精神劳动门类不同中间的差异。或者只有我讲完三个小时的课后,回到教员准备室,也许有过一点点与画完一幅画、唱完一段戏时“具体而微”的感受。

我写这些,不是要显示自己的才分,竟如此之大,之多。不是这样。譬如体育运动,我就是个低能儿。在清华时多少同学热爱着马约翰教授,我就不爱,路上碰见也不招呼。如今看电视时,每到欧洲足球赛,英国足球迷和流氓们闹得赛场大乱的时候,多少观众看得入迷,我却“卡叭”一声关掉电视机回屋睡觉去了。再譬如对时下流行的歌手、歌星我也有相同的厌恶。我觉得,她(他)们不是在引导人一种美感,一种愉快的享受,而是让观(听)众与一个患剧烈头疼或剧烈腹疼的人在分享着一种痛苦。

## 第四十四节 摇买字画

在写到童书业的一段文章里,我提到过去 缘年代初在青岛曾有过一度买字画的较好机遇,东西多,价钱比较便宜。在当年青岛买字画的群体中,大体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厚古薄今,二是厚今薄古。前一派追逐什么宋画、元画。在这一方面,一是东西少,二是假品多。说起假品,我从来就不一口否定,而是持“一分为二”的态度。有的假品诚然是毫无价值,纯乎是骗人的,但有的假品则不然,它起一种在真品不可能的情况下,从一定程度上反映真品的某些原始特征,足资后人借鉴。后一派追逐明清画,特别是晚清。它的特点是一东西多,二虽然也不免真假混杂,但究竟从假品堆里不时冒出来不少真迹。但真的不一定好,好的也不一定真,有些作品给人的艺术享受不一定低于真品,这也是玩字画人经常有的经验。

我基本上属于厚今薄古派。我首先追逐清末民初的几个大



俗气太重,郑甚至在信札中公开宣扬“断袖分桃”的“龙阳之宠”的“美妙”,令人恶心。再如金冬心,他也想把“书”和“画”往一块融,他写隶书中的漆书一门,和伊秉绶类似浙派,渐近于现代的艺术字,但拿书法融入画法的成功度不大。

在“扬州八怪”中,我偏重于李复堂(李鱣)和罗两峰(聘)两家。我爱李,第一是他老功底深,他是老科班出身,当过内廷供奉;第二是他思想解放的幅度大,敢于大胆创新,纵横挥洒。我珍藏有他的一本册页,中有一幅画的是一幅翡翠鸟和芙蓉花,诗曰“兴来勾勒翡翠鸟,狂发涂抹芙蓉花,古人行草常连楷,工写相间亦不差。”这是书法史和美术史上的一段高论。从王羲之献之父子的几片“帖”里,从颜真卿的几个“稿”里,我们不是经常看到他们写着写着行草,不知不觉就带出几个很工整的楷书字吗?画画亦复如此,工笔中带写意,写意中又带有工笔,这也是老画家们画了一辈子画不知不觉达成的自由境界。

罗两峰画《鬼趣图》,其实是一种社会讽刺画,加以黄慎画驴,渐近于社会风俗画。这些画衍变下去,就成了后世的漫画。试观丰子恺的《老鼠做亲》,这条线不就是这么传统下来的吗?

徐悲鸿先生当北平美术学院长的時候,在班上大力攻击“四王”。“四王”确实有其不足之处,如公式主义,三棵树、一堆山石、加一个水口,等等。但王石谷不如此,他惯写江南的初春,用枯墨画杏树的老干,用铅粉轻轻加点胭脂,点出一片桃花,再少少加点绿柳条,最后用水一润,一幅美丽的江南春景就宛然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像这样“师法自然”的画,有什么必要要对之加以攻击呢?

## 第十五章摇“另册”一案的全部过程

### 第四十五节摇缘年的鸣放

我不是缘年划的右派。我的右派是缘年被提出来，缘年秋冬之际才宣布处理，缘年开始执行。这过程很复杂。

回忆缘年青岛的人们正在大鸣大放的时候，我在“八大关路”的疗养院里接受医疗。采取这一步骤，大体有两方面的动因，第一，接连两年开设《中国农民战争史》的课，又要看材料，又要写论文，又要写讲稿，又要上讲堂，人确实是累了。虽然正在好的年龄，但这种消耗法也维持不了多久，所以要疗养疗养。第二，在下意识上，也想避一避风头。假如说那时已清楚地觉察到了“大放”之后马上会来个“大收”，说已经觉察到那是一场“引蛇出洞”的“阳谋”的话，就未免把自己看得太聪明了。但迷迷糊糊的预感是有的。说一点预感也没有，那也是不真实的。究竟自己好吧歹吧是参加过十几年的政治斗争和战争的人了。

但疗养院也不是世外桃源。我在疗养院是摆开摊子画画的。宣纸、毛笔、颜料都带来了。而且真的画了不少幅，有的甚至裱起来题上款送朋友。但所有这些也抵挡不住“鸣放”的冲击波。诗人高兰到疗养院来了，说“大鸣大放么，怎么能少了你？！”这当然就是拉我下水了。

我下了水。但没参加任何一场鸣放会，只在《青岛日报》上发

了一篇文章《放的关键在于领导》。这种文章,在以后就叫“毒草”,甚至是“大毒草”。记得是跟冯沅君先生的一篇文章紧接着刊发的。她的文章的要害句子是“一个人入了党就像鲤鱼跳过了龙门一样”。我的文章不是一句两句,而是全面开花,对灵慧缘年的肃反运动和积极分子政策进行了全面的评估,甚至指名攻击了高教部部长杨秀峰和山东大学校长晁哲甫。他二位在一次大会上谈到肃反运动出了偏差,把一些好同志当成敌人斗了时说,“我们已经磕了头”;“但不要我们已经磕了头,你们再踢我们两脚”。这个话,显然带有不服气的气味。于是我在文章中质问“究竟磕了几个头?”“究竟是谁踢谁脚?”这些句子,用后来红卫兵的语言说,就是“十分恶毒”的了。

记得这篇文章发表的第二天一清早,胡华同志来看我了,他当时也在青岛疗养。他对这篇文章既未表示赞许和支持,也未表示反对,而是使用十分隐蔽的语态,对我表示一种惋惜,意思是,你这么聪明,也竟被“阳谋”的炮弹击中了。他比我小四岁,在华北大学时他是第二部学员班的班主任;开国之初,经常是他在“文委”做报告,我们“文委”属下各单位都去听,回来在自己单位做传达报告,所以我曾对他说,“鄙人成为老兄的传声筒了。”多少年后,因为人民大学和“二炮”的纠缠他曾和学生一起到中南海请愿,站在吉普车上讲话,被塔斯社记者拍了一张照,登到了《真理报》上。那时中国正在反修,所以最高方面看了照片非常恼火,胡华后来告诉我:“我的党籍差一点没有丢掉。”此公下世,迄今也有灵慧缘年于兹了。

山东大学看起来是很难呆下去了。校园里,通过大鸣大放,整天乱糟糟的。像一座污水池,各种各样的气泡都在往上冒。我一直不介入的,但社会的力量会来介入我。例如丁山先生的夫人,那位质朴的南京老太太,就到我家哭着诉说了整整一个上午,她说她知道我是最主持正义的,她要求我到广播站去控诉杨向奎和刘

敦愿,她说丁先生正是被他二人给害死了的。论正义,我是该替已故的丁先生去鸣一鸣的,但我平生胆小,终究没有敢“跳出去”。

再有,那个由华东大学组成的领导班子处理起事情来也确实不像话。譬如,开始叫大家大鸣大放,群众绝大多数是不敢鸣,不敢放。领导提出一个办法,叫党团员带头鸣放。党团员是服从组织的,就去鸣了放了。等“反戈一击”的时机到来,从群众中抓出来的右派不足“定额”,万般无奈,只好从领导发动出来的党团员中去揪右派。这就是组织迫于“上边”的压力,出卖了自己的群众。这样做的效果非常非常糟。

于是,我提起笔给高教部写了一封信:要求调离。通常,这种信投出去总是渺无回音的,但这次反应却格外迅速,高教部高教司司长王越同志很快到了青岛,他来过我家,熟门熟路,一进门把公文包往玻璃板上一放,就说“你去兰州”。这一句话,我这后半生灏年就定局了。

他继之告诉我,兰州大学也在大鸣大放,学生还闹了点事,谴责学校当局不请好老师。高教部也知道兰州大学的师资力量弱,所以作为“整改”,就从四面八面调集力量,支援兰大。我们已将这个决定通知兰大了,兰大方面在电话里说,很快将派专人来青岛帮办搬迁的事。

## 第四十六节 摇由青岛迁兰州

兰州大学派来的人,叫陈克敏,甘肃甘谷人,很年青,皮带上带一支小手枪,显然是属于保卫人员的范畴。他很能干。五十几件行李,连包装加运,是一件不轻松的活,但他干的很轻松愉快,还和我的儿女混得很熟。

我们选择的路线,不走南路走北路,在北京稍作停留。住在前门外鲜鱼口的高教部招待所,那是同仁堂乐家的许多套房舍中的

一套。记得张政烺先生首先来看望我们，还有当时正帮助范老写书的青年学者卞孝萱。我也去看望了几位老人。在马神庙老北大二院的院子里，正糊满着批判林汉达的大字报，叶圣陶先生那么老于世情的人，在反右的声浪中已经有点魂不守舍的味道了。在原辅仁大学，我们初次谒见陈援庵先生，寒暄未竟，从书架后面就闪出一位女士，朗声说道：

“陈老已经上了年纪，奉周总理指示，会客时间不得超过四分钟，现在已经一刻钟了。”

陈先生马上插话：“这是远路客人，这是远路客人，要适当放宽些。”事后我们才打听得知，此位女士乃援老门下“金童玉女”中的“玉女”刘乃和先生。多少年后，她到兰大讲学，到家下小坐，我提起此事，大家相对大笑。就此公，辞世也不觉好几年了。

我还到琉璃厂萃宝斋去买了一幅齐白石的《牵牛花》，~~是四元~~。这数字在今天是微乎小哉，在当年还是大开支。那两排七八朵牵牛花我倒不怎么看重，倒是叶子和藤蔓的画法很别致，有草字的笔法。也就是说，没有写过草字的人是画不出那样的藤蔓的。而最令我不忘的，是那位中年半老的售货员。三年后，当我又从兰州到北京又到萃宝斋坐坐的时候，他对我讲了一段话：

“您老敢情是三年前来过鄙店一次吧。那幅齐白石的牵牛敢情是您老客买走的吧。那画今儿个就拿~~源四~~块也买不到手喽。记得您老是从东边一个什么地方来，到西边一个什么地方去的。那会子，您还是跟宝眷一起来的。”

我心里想：这个人要是到一个什么情报局工作，岂不更合适？

这时，兰州大学的几个副领导也正在北京，他们请我们到苏联展览馆的餐厅去吃俄式西餐，有黑面包、鱼子酱。对鱼子酱，我们一家都不吃，只我一人大口大口地吃。我说我是海边的人，不怕腥。他们还邀请我们看叶盛章的《三盗九龙杯》。曾几何时，现在在舞台上演杨香武的，已经是叶盛章的再传弟子了。

买火车票。我们一行七人，买了一间半包厢的座位。那另半间包厢的乘客是一位苏联专家，他买了西瓜请孩子们吃。但俄罗斯人切西瓜的风俗却跟中国人不同，中国人是切成三角形的，俄国人则是切成圆圈，从中间把瓢掏着吃完，剩下的瓜皮是大大小小的圆圈。我想，孩子们会从其中增加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间有着不同风俗习惯的体会。

截止到当时为止，我的脚还不曾踏过宝鸡以西的土地，现在要接触陇上的风光了。火车过了宝鸡，就穿越一连串的山洞。山洞过完，就到了天水。天水以西，就出现了甘肃的典型地貌。用地方话说，就是“一挂原，一挂川”。所谓“原”，其实也可以叫“山”，所谓“川”就是平地。火车碰到山，就钻洞；一出洞，就看见“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这样川原交替，就到了兰州。

那时的兰州，要描写给现在的少年听，就成了《天方夜谈》。火车站的站房，像看瓜人搭起一个棚棚。马路是土马路，当时刚下过一场雷雨，“有雨一街泥”。现在兰大的车库里，小车至少有七八辆，那时却一辆也没有，从医学院借来一部“中巴”，车身上带着红十字。那时的兰州大学，东岗的新校址刚刚规划，高楼大厦还全无踪影。当时校址在西关什字，一部分是旧时的贡院，一部分是左宗棠大帅的驻节之地，所谓“致公堂”，所谓“静观园”。当时反右派斗争正达到高潮，门口贴着大字报，告诉大家数学系的大右派刘古杰已经从郑州抓回来了。

像太原、开封、西安各有其特点一样，兰州也有它的特色，而且花样不少。如“酿皮子”，是一种用面糊蒸的凉面条，吃起来筋筋道道的；如“灰豆子”，是一种豆粥；如“软儿梨”是一颗颗冻得像黑色圆石头的东西，放在清水中一泡，梨内的冰冻就转换到梨外，形成一个冰壳，将冰壳弄破，里面就是“软儿”了。对外来者说，这都是新鲜事物。



兰州人的性格 ,按我的理解 ,是陕西移民和四川商人的混合型。不像陕西人那么生硬 ,也不像四川商人那么滑溜 ,仿佛是一种中间状态。在语言上也有特点 ,如孩子们中间传说一段话 ,“我 fu-fu (叔叔)给我买了一本画 fu (书) ,我坐在石头上看 fu ,你 fuo (说) fufu 不 fufu (舒服不舒服)”。我们在牛棚里 ,每逢兰州人读“最高指示”时 ,总听见“毛 Vu (主)席教育我们 Vuo (说)”……

## 第四十七节 摇滕景禄其人其事

滕景禄此人我从来没有接触过 ,但他的举措却害苦了我一辈子。

此人正和刘宿贤、彭康一样 ,是左倾教条主义老母鸡屁股底下孵出来的雏鸡中的一只。

恰好我奉高教部之命调离山东大学的同时 ,他奉派到青岛来担任市委书记。他一到任 ,就举动很大 ,把前任市委书记孙汉卿、组织部长矫枫、宣传部长孙蒲风一齐打成“青岛市委内部右派反党集团”。更奇怪的 ,是还把民盟青岛市主委葛慎修和无党派人士赵俪生二人打成这个右派反党集团的“外围分子”。

为什么我沾上这个边？这纯系我和孙汉卿是大学同学。孙汉卿 ,在学校的名字叫孙德香 ,山东栖霞人 (后划归牟平) ,物理系学生。当时清华学生的左、中、右分派的情况是 ,山西籍学生绝大多数是左派 ,这恐怕跟牛佩琮领起来的风气有关 ;山东籍学生以中间派居多 ,大都闷着干功课 ,不大过问政治 ,只有两个较早走向革命的 ,一个叫宫曰骊 ,一个叫曹桂馥 (后改名曹言行 ,解放后担任过北京市城市建设局局长等职) 。孙汉卿就是在他们俩影响下参加革命的 ,当时北方局属下有个西郊区委的乡村社会工作部 ,孙从那里干起来。社会工作部属下有个平民子弟小学又叫工人子弟小学 ,就设在清华三院后身。记得吴新之和孙德香一个是校长 ,一个

是教务长，而我是六年级国文教员兼班主任。记得两位女同学——高景芝大姐和戴新民大姐也同在这个小学里任教。孙和我从这时候起就相熟起来。芦沟桥事变后，我去了太原，孙去了渤海地区，一直从事渤海抗日游击区的创建工作。青岛解放，他被调来做市委组织部部长，渐升至市委书记。由于当年子弟小学有那么一段，所以在青岛就走得比别人近乎，他曾邀请我给青岛中级党校教马列主义课，这在别人看来就是不寻常的了。划成“外围分子”，恐与这类事有关。

再回过头来说滕景禄。他也是栖霞人，和孙是小同乡，同是党员干部，当时是个工会主席，平时泡病号，一到运动就瞪起眼睛来整人。不知为什么他要把孙往死里害。转眼到了 1957 年代初，他正在上海华东医院接受医疗，少奇同志从北京给他叫通一个长途，说“你划的那个青岛市委内部右派反党集团到底是怎么回事呀？也应该向中央说说清楚嘛。”滕也是政治经验丰富的，他一听不妙，预感到那件事怕要“翻”了，就从五楼窗上一头栽下来，一命呜呼了。

据说，中央指派华东局书记柯庆施料理这一案件。他到了潍坊市，召集济南、青岛两方面的有关人员开会，结果孙汉卿、矫枫、孙蒲风宣布平反，降级使用。在会上有人问，“还有党外那两个呢？”柯庆施答曰：

“党外吗？面子就大了。我们不可把口子开的太大，那会惹出很大很多麻烦来的。那两个人，我看就靠他们自己争取摘帽子吧。”

我和葛慎修的冤案，就这样被“草菅”了。

可是在当时，山东大学的蒋捷夫并没有躺在火炕上睡大觉。他也是政治斗争经验丰富的。他确认此机可乘。他下令，重新搜集并整理赵俪生的反党材料，呈请山东省委转甘肃省委将赵某人揪回山东大学处理。打个比方，像在哪里杀了人要揪回哪里枪毙一样。可是老天爷，我杀过谁呢？！……

## 第四十八节摇“起解”和“回解”

大约在 1958 年的远月末的一天 ,兰大党委书记刘海声同志派工友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去。这个举措自然有些异样。试想 ,兰大新校舍已经建成 ,我住一楼 ,刘住二楼 ,有事来往招呼。现在变换形式 ,第一说明不存在“友谊” ,剩下的只有“公事公办”了 ;第二说明我的身份已经低落 ,再不是部派“专家” ,而是敌我矛盾作内部处理了。

我到了公事房 ,刘还是带人情味的 ,当然他的话也很难讲 ,软了不对 ,硬了也会出毛病。他大体说 ,“山东那边要你回去 ,我们也反复交涉 ,那边仍然坚持叫你回去。回去就回去吧。你从山大带了三个学生过来 ,其中一个叫尹居诚 ,是党员 ,我们派他陪你回去。你要放宽心怀 ,世界上的事没有过不去的 ,早去早回。”这话听了只觉得很沉重。多少年后 ,许多事情曝光以后我才明白 ,蒋捷夫和山大当时领导班子的“底牌”是要把我划为“极右分子”发往寿光农场劳改 ,叫我死在那里。这个“底牌”我自然不可能知道 ,但刘会知道一部分。他从兰大利益出发 ,自然要抗争。“早去早回”一语的着重点 ,在于一个“回”字。

出发了。当时火车还不直达 ,要在徐州转车。我们住了旅馆。第二天 ,尹居诚说 :“我们去逛云龙山吧。”他随身携带两个比小学生书包大五六倍的草绿帆布大包 ,逛云龙山时他一肩扛一个 ,挺累的。我问为什么不寄存在旅馆里 ,他说 :“你知道这是什么 ,这全是你的档案材料 ,历次运动人家揭发你的 ,属于绝密材料 ,怎么好摆在旅馆里呢 ?”我颠了颠 ,约三四十斤不止 ,真可以说得上是“罪行累累”的了。

到达后 ,把我安排在文学馆一楼的一间小房里 ,两张床 ,派我教过的一学生罗仑 (按此人后来是南京大学的教授了) ,与我相

伴,或者说,对我进行监督。而罗仑此人对当时那一套是并不怎么看重的,他“瞒上不瞒下”,白天他从来不在房中,就是夜里他只好隔三差五地回来睡一次。所以若干年后我对他的同班们说,“罗仑当年对我行了仁政”。但我睡觉的墙并不仁,那上面贴着两幅标语:“赵俪生要老实交代!”“拒不交待,死路一条!”

自从“政策”和“策略”被提到齐头并摆的地步以来,几乎人人都娴熟策略,人人都擅长运用策略。当然蒋捷夫在这些人中间也不比谁落后。他对我就像猫玩老鼠一样,当年气焰那么“嚣张”的赵俪生,现在沦为阶下囚,任我蒋某人摆布了。他不露面,而是派手下跑腿的,来对我宣号传令。开始是吓唬,说要有充分思想准备,“你在同学中间是民愤很大的”。暗示斗争会声势一定很浩大。其实,学生都“勤工俭学”去了,宿舍里剩下不几个人。继之是另一种吓唬,说你罪行太重了,怕要送农场改造,回不去兰州了等等。策略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有一天,跑腿人告诉我下午两点半在房间里等候,全系师生要传唤你去在定案书上签字。我一直等到三点半,传唤的人才来。我去了。教师和学生代表坐了满满一教室,中间一小课桌,桌后坐三个人。中间是黄云眉,他是杨向奎走后的系主任,一位好好老先生,平时与我交往尚密,可是到这时候就不得不绷起脸膛来了。两边坐的是蒋捷夫和孙思白。他们拿一张纸叫我看,并叫我签字。我一看,上列我罪行的主诉是三条:

(一)赵俪生说,南斯拉夫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百家中之一家,百花中之一花。

(二)赵俪生说,他假如在马路上碰见蒋捷夫,他将给他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三)赵俪生说,武杰(按山大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像个土匪。

现在事隔 18 年,我在写回忆录,我们试来分析这份定案书。第一、第三条根本构不成一条罪名,俗话说“关上门可以骂皇帝”,

何况是一个只当过县公安局长的武杰？而且没有录音，只是根据“积极分子”小汇报而来。第二，第二条简直可笑，就像读《金瓶梅》似的，西门大官人要送来旺去吃官司，不恰好就捏造了这一条吗？第三，唯一有分量的是第一条，但就这一条，也是根据演绎法的一个大命题推出来的。这个大命题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对学术问题而言的，至于政治上，就只有两家，不是无产阶级一家，就是资产阶级一家”。而这个大命题就恰好是典型的左倾论断。假如这一论断继续有效的話，我们又该怎样来论断改革开放中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该怎样来评价在科索沃战争中中国对南斯拉夫的支持呢？从 1999 年后的今天看来，什么山大党委，什么总支书记蒋捷夫，他们简直是应了一句陕西话，道是：

“人在世上，猴在树上，胡捌哩。”

但事情还没有完。定案会结束后的傍晚，孙思白承蒋捷夫之命来传达：“你不能回兰州去了。明天一早七点半，学校有一部大巴士送一批极右分子和反革命去寿光劳改场，其中也有你。你要做好准备七点钟我来叫你。”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第二天我从七点等到八点，等到九点，等到十点，不见有人叫我。我心里想，孙思白又在吓唬我了。多少年后，我才继续得知，那不是吓唬我，而是夜中事情有变。据说那天夜里，兰大党委有长途电话，说“从人事关系上说，赵俪生已经是兰大的编制；至于政治处理问题，那么山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兰大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天下一盘棋嘛，你们给我们送回来，我们也会处理的”。

孙思白又来了，说：“山大党委对你宽大，放你回去，但不能一个人回去，你跑了怎么办？今天傍晚，有一批山大毕业的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分配到西北，你由他们押送回去，你要好好服从他们的管教。”

这批学生大约有八九个人，各不相同。有的陈旧思想占主导，认为师生之谊不可废，还不断地让茶送水；有的则纯乎是八年后

“红卫兵”的派头了，“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其中一位分配到新疆去的姓王的，创造发明的能力特强，跑到列车的广播室，跟女广播员拉好关系，从话筒里广播道，“乘客同志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右派吗？毛主席说，右派就是反革命，不过因为人民秩序巩固，所以客气点，不杀头，不判刑，但是性质不变，还是反革命。现在我们押在列车上的就是这么一个反革命，他叫赵俪生，四十多岁，发案前是山东大学的教授，现在押往兰州。希望全列车的乘客同志们提高警惕，加强监管，只准他规规矩矩，不准他乱说乱动。”

我就是这样回到兰州的。

转眼又过了一年。1958年冬，兰州大学文科划到西北师范学院。记得有一个冬天，一位工友在院子里喊，“赵俪生在这里住吗？党委组织部长叫他去训话”。

我去了。组织部长坐在办公桌后的椅子上，我站在他的对面，立正，低头。

“现在，给你宣读处理。经甘肃省委与山东省委联合决定，赵俪生划为右派分子，撤去教授学衔，降四级，监督使用。”

“完了。你回去吧。”

多少年后，我才陆续获悉，这个处理，是经一年之久在两省间、两校间反复讨价还价的结果。原处理是，“赵俪生划为极右分子，解除公职，劳动教养……”

1959年10月，蒋捷夫以84岁高龄在济南千佛山麓的山东社科院院长级的宿舍的厕所里死去了。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欲置我于死地，可他终究死在了我的前面，而我还活在世界上，还有最后剩余的一点精力，把蒋捷夫的“英雄”事迹，写在了我自己的《回忆录》里。谢谢上帝！

1959年 远月 10日 写完于兰州大学  
圆楼之 圆室 时年 84岁

# 游美日记

丙寅年 猿月 圆日 (星期五)

今日起程 ,由儿子伴送到北京。下午 缘时 ,兰大派车到 ,只能容纳四人 ,其余送行的人只好走到火车站 ,幸好距离不远。

乘次列车 愿车厢 猿包房。我对面下铺是兰州铁路局的一位官员 ,我的上铺是兰州军区的一位参谋 ,对面上铺的河北蠡县一家涤纶化纤厂的厂长 ,是属于乡镇企业的新型人物。

猿月 圆日 (星期六)

黎明 缘时醒来 ,列车已过宝鸡。中午与儿子在餐车上吃饭。入睡前列车似乎在豫北汲县一带运行 ,这里是嵇文甫先生的故乡了。车过石家庄时 ,我犹在梦中。

猿月 圆日 (星期日)

过保定时 ,那位蠡县的厂长包装得非常整齐下车去了 ,车厢里剩下的三个老派人自必有一番议论。在良乡车站 (这里是出产板栗的有名的地方) ,列车停车两小时 ,原因是本次列车已晚点一小时半 ,铁路上的规矩 ,只能晚点车给正点车让路 ,没有正点车给晚点车让路的道理。黎明前后 ,由首都开出来的车一列接一列 ,我们只好“靠边站”了。怨时 圆分 ,我们列车晚点 源小时抵达北京。到张自忠路 (原铁狮子胡同)中纪委招待所住下。我的助手左书谔同志早两天到 ,他已把我的飞机票买好了。

这一天是阴风惨惨，黑云漫天，气温骤降。

### 猿月 猿日 (星期一)

早晨，到教委外事局去了一趟。

中午，请助手和儿子吃一顿馆子。到砂锅居，开口点了一个“干烧鳊鱼”，服务员（旧称“堂倌”）说，“对不起您，这两年鳊鱼缺货。海子里鳊鱼多着哪，可就是买不到，也不知道到哪儿去了，您老就凑合着一品干烧鲤鱼吧。”

跟儿子和助手去逛北海，后门里有个静心斋，过去在北平呆多少年，就没到过静心斋。原来是慈禧晚年颐养的地方，院子里太湖石垒石太繁重，什么东西过头了总不太好。又参观一个“友谊展览”，是各国首长或代表团送给中国首长的礼品。从这里发现一个问题，即越是发达国家的礼品越不怎么样，越是不发达国家的礼品倒是艺术吸引力满强烈的。科技能力提高了，是不是艺术创造性会减低？

夜里看英语电视，有周培源、费孝通、雷洁琼、钱伟长四教授答外国记者问的场面。

### 猿月 猿日 (星期二)

今天休息。养精蓄锐，以待支付在飞机上十一二个小时，加起飞降落、以及东西半球时差变换等等的损耗。

夜里看电视，有赵紫阳总理与港、澳人士谈话，说中国已不搞清理精神污染了。

### 源月 员日 (星期三)

黎明缘时起床，洗脸刮胡，换衬衫。昨天预约的租车已经停在院中。远点源分上车，苑点圆分到机场，行车猿分钟，这时间早，还没有交通阻塞现象，所以显得快。我们算是最早到达机场的乘圆



客行李问都没问,就揉进轮带里去了。给的座位是悦意,据说是好座位。怨点猿分,飞机启动了。

猿点圆分到达上海虹桥,大雨滂沱。候机厅里电视在放映《阿信》,在家里已看过的了。因飞机需要小规模修理,故迟至下午员点猿分才继续飞行。这一飞,要持续员个小时以上,越过太平洋,到旧金山着陆。按中国大陆的时间计算,到达旧金山的时间该是午夜园时,而实际则是回到了前一天的黎明苑点缘分。

越过太平洋的这段飞行,倒是非常平稳的。机舱里的大多数人在睡觉,大电影屏幕上在演老得没有牙了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愿听唱腔的就带上耳机子。一路上送正餐两次、点心三次,果子汁随便喝。

(美国)源月员日(星期三)

早苑点缘分到达旧金山,因须办理入境手续(个别人在证件和携带物品方面可能有问题),所以停机较久。员圆点猿分继续起飞,可以从舱窗里俯看砾礁赠云彩城译(落基山脉)的山顶积雪。下午近缘时,到达纽约肯尼迪机场。

一出门,就感到我们这些封闭型知识分子的愚蠢。举两个例。行李箱注入轮带,到终点又经轮带输出到轮盘,这个我知道,也在电影电视上看见过。但同行若干人都是从差不多的百货公司买的箱子,临行前为什么不懂得做个记号呢?这假如不是愚蠢,又将怎样解释呢?结果苦头便吃下了,从轮盘用大力抱出一件,不是自己的那件,于是放回轮盘上去,再抱。今年我已整整苑园箱里又装了不少送国外人的书,非常沉重。兀的不累死我也么哥。

第二个例。从肯尼迪机场搭乘中国领事馆的大巴士到市区去,沿途看见许多招牌,上写责则,责则……心里糊涂起来,美国的公园怎么这么多?后来又看见一块招牌,上写责则,心里一亮,这是个“动名词”,又看见一块写道责则,噢,大概



角硬币的小费。

系主任叫杰姆斯·哈利逊，是一位倜傥洒脱的中年人，他自己说他是越战中的空军驾驶员，退伍后到哥伦比亚取得博士学位。新出版一本著作《无休止的越战》，签名赠送我一本。当时已是下午两点到三点之间，按美国人的风俗，要吃一顿“午点”，这使我想起在甘肃下乡搞“四清”，在午饭与晚饭之间有一顿“腰食”。他们的大楼里就有一个自助餐部，缘元一客，哈利逊叫来另一位客人叫馥，还取个华人名字叫张格物，怪茁茁的。又是美国人的风俗，主客的餐费归主人掏，陪客的餐费自己掏，这在中国人看起来又是新鲜事儿。这位张格物副教授送我一份论文的抽印本，研究的主题是光绪年间在南京及江南各地兴起的反洋人、反洋教的运动。这个选题本身就带有一股寻衅和反华的气味。在进餐过程中，他突然问我“隋朝姓隋志深苦遭禁葬悦皂皂欲留城再藻贼蚤蚤”（我听说你曾经是共产党特务，是吗）。这一下，我感到似乎是蒙受了极大的侮辱，几乎要拂袖而去了。

美国人的绅士风度，原来如此。

哈利逊替我叫一辆招手停，车子似乎专门从联合国大厦前开过，使我领略了联合国大厦附近的风光。后来，又经过一条溪涧，看到迎春花已经盛开了，这是我在国外看到的一次春天的到来。

源月 源日（星期六）

倾盆大雨，终日未出门。

源月 缘日（星期日）

从今天起，换夏季时间，提前一小时。上午 12 时我去打饭，厨房的人说，“过时了，是 11 点了。”但仍很客气地打给我酱肚、油炸花生米和两个煮鸡蛋。

## 源月 远日 (星期一)

今天的节目是访问赫赫大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冯友兰先生就是这座大学的研究生。美国的总统,不少也是哥伦比亚出身。我自少年就听说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中学、大学、留洋的经历是“六中、北大、哥伦比亚”云。

哥伦比亚有几处校址,这一处叫 ~~西敏寺~~ 一个大学,大体总有一个似乎是个有代表性的景点,英文中叫 ~~悦老贵~~ 例如清华一进二门,正北是大礼堂,西壁是科学馆,中间是草坪,这就是清华的 ~~悦老贵~~。哥伦比亚的 ~~悦老贵~~ 房屋很密集,雕像,喷水池,等等,挺唬人的。一座矮小破旧的三层楼上写着 ~~孕~~ 噢,这就是冯友兰读博士的地方了。

按照安排,先参观它的东方图书馆。馆长贾可璧 (~~角~~) 彬彬有礼,拿出宣册来叫题辞。看样子,他们很自负的,但下到书库里一看,特点显出来了:在他们心目中,台湾是中国的代表,大陆够不上。架子上安排的是《胡适年谱全编》、《傅斯年全集》,以及台湾“国师”陈大齐的著作。郭沫若、唐长孺、周一良、岑仲勉等人的著作,一本也无。问起来,他们推说我们跟大陆的关系还未理顺,买书买不到,云云。可是关于“文化大革命”大字报专辑则琳琅在架,被视为珍品,这些东西为什么买得到呢?其实这里面好多是假造了骗“老外”的钱的。

发生一件奇怪的事。在哥大东方图书馆门口,一位中国面孔的女大学生拉住我的衣角。她说,她爸爸嘱咐她,只要看到有大陆来访的人,就赶快回家去通知他,他们家就在这条街上,很近,一会儿他就到。果然来了,此人叫潘力生, ~~苑~~ 湖南澧陵人,善书法,大陆有不少名山古刹都有他题的匾额。可是此人又似乎具有相面、算卦这样的法术,这就使我感到“江湖气”了。我们萍水相逢,可是他就微微透露几点对我的“预知”,如我老伴长我三岁,我一子五女,并且二女儿因登山失慎已经亡故了,等等。我在心中暗

暗警告自己,不可流露过分的惊讶,要沉着应付。他邀请我当即跟他去参加一个纽约华人总商会的晚宴,我委婉地辞谢了。(后来,此人还不断写信来纠缠我,要我替他觅一部泰山金石峪的《金刚经》拓片。)

哥大门口玻璃亭里坐着一位老太太叫 ~~闵葆真~~ 汉字名戴琦琼,是一位资深的接待处的高级顾问,她对我非常好,在我回到领事馆后还打电话来,问我在哥大还有什么要她办的。我忽然想起,哥大哲学系有一位叫做 ~~闵葆真~~ 的教授(汉字名狄百瑞)写过不少有关中国儒学的文章,我问他能不能接待我一下,谈一谈。戴答应代办,叫我等回电话。晚上,电话来了,是一位邱女士,她说,“狄百瑞教授老了,又很忙,没有精力接待。但他说,他可以指派他的一名研究生对阁下进行一小时的辅导,条件是必须把质疑的内容写成大纲事先送来经研究后再定辅导的时间。”好家伙!中国教授只能接受美国教授的研究生的辅导,我又一次感到蒙受了侮辱!

第二天我打回电话,说我的心脏病犯了,去不成。

### 源月苑日(星期二)

要到波士顿去了。下到七楼结了账,不到七天,房费 ~~圆缘~~ 美元。

### 源月愿日(星期三)

夏女士送我去火车站,小罗开车。车子专门绕过一个场,他(她)们告诉我,这叫 ~~莱茵选择~~ 在全世界都有很有名的。

火车站叫 ~~莱茵选择~~ 美国人时兴坐飞机,火车几乎很少乘客了。所以铁路很落后,火车站也不起眼,外观像个普通的小市场,进到后头,才是售票和候车的所在。火车进入市区转成地铁,所以进站时像进防空洞似的,黑糊糊的。

美国的火车不像中国是国营,他们是私营,公司叫 ~~莱茵选择~~

列车的牌号也不像中国 员次、员次等等。他们这列车叫 韵猫 (猫头鹰) ,那列车叫 晕夜莺 (夜莺) 等等。一国有一国的风俗嘛。车中的长列的皮卧椅 ,座位全向开车前方 ,没有对面座 ,也就是说 ,不使旅客有倒退行车的心态。铁路、桥梁、涵洞都比较陈旧 ,有我小时乘坐胶济路或正太路的感觉。

列车一直北行 ,微偏东北 ,有从徐州开往沈阳的那股子劲。沿途所经 ,尽是所谓的 晕工业 (工业) 气象 ,不带一点 晕农业 (农业) 的味道。时值初春 ,迎春花刚开 ,柳树树头刚刚发绿。居民纯是英国式的小二楼或小三楼 ,墙皮刷成赭红、青白、纯黑不等 ,各随所爱。楼梯有的是内楼梯 ,也有的是外楼梯。有两样东西是家家如此的 ,一是百页窗 ,一是三角墙 (早晨 枣树上插风信鸡。沿途看见不少沼泽地 (这是小说里经常描写的) ,污染得很利害。偶尔也看到一片坟场 ,一排排十字架很整齐。

下午 圆点 缘分到达波士顿。没人来接。只好自己叫一辆招手停 ,到剑桥镇的 圆索车费 员美元 ,这就是“宰人”了。住 缘号房 ,不管饭 ,每日房租 缘美元 ,也是“宰人”的。宰就宰吧 ,谁叫我们人生地不熟来?! 与我前后到达的原山东大学同事徐绪典 (民国时期大总统徐世昌的侄子) ,就夤缘哈佛·燕京这条线索 ,在哈佛校内租赁学生宿舍一间 ,月租金约与我的日租金相当。

原 缘上写着 ,“当你到达波士顿车站时 ,邱姆 (缘 ,有人译作孔姆) 先生将到车站接你 ;如果他实在忙不过来 ,那么 ,他的弟子们将去接你。”我小时候跟别人到洋教堂去听布道 ,那洋教士说 ,“你们中国伦 (人) 最不讲信用 ” ,言外之意自然是洋人最讲信用啦 ,喏 ,我初出国门 ,遇到的就是这样的“信用”。

迟至傍晚 ,来了一个女孩子 ,叫 缘碧眼黄发 ,圆岁 ,自己说是 缘教授的研究生。她说 ,她的老师正忙得不可开交 ,旧任的太太在法院为离婚索赔的事打官司 ,缘先生必须出

庭 新任的太太马上要分娩 ,孩子一生下来就需要父母的结婚证明 ,否则 ,教堂拒绝给孩子行洗礼。用俗话说 ,“事情赶到一堆了 ” ,所以他不能来。

她问在哈佛有什么熟人 ,我只能举出两人 :一是伊朗史专家云翥教授 (汉字名费耐生) ,一是华裔儒学教授杜维明。但我说明 ,我和此二人亦非深交 ,前者仅在乌鲁木齐的“敦煌吐鲁番学会”的年会上见过一面 ,后者曾到兰州大学来访问 ,由我接待 ,组织过座谈会。如此而已。

#### 源月 怨日 (星期四)

我在美国的生活 ,是我自己安排的 ,我把它叫“不出门的自助餐” ,不去餐馆 ,只从百货店里买回来面包、纸盒牛奶、花生或榛子、柑橘或香蕉 ,自己沏好茶 ,就这么过日子。也并不感觉到营养不足。

云翥先生来了 ,我把 这~~点~~事告诉他 ,他摇摇头 ,表示他不愿与此人打交道 ,因此事情的困难不能从这个人身 上求解决 ,只好另寻他途。他问我和杨联陞的关系 ,我说是大学同学 ,他高我一级 ,他九级 ,我十级 ,在学校住一栋宿舍 ,见面打招呼。云翥告诉我 ,杨在哈佛的学术地位非常高 ,他们都是哈佛学术委员会的委员 ,于是他拿起电话拨了杨联陞家里的号码。

电话接通了 ,他们用英语说了一阵 ,然后把听筒递给我 ,说杨要直接跟我说几句话。

杨用中国话说 :“我听说你来了 ,但是我只能告诉你 ,第一我不能到旅馆看望你 ,第二我不能请你到家里或馆子里吃饭 ,因为美国史学年会就要开了 ,我的若干弟子都要到波士顿来 ,都要来看我 ,我老了 ,接待不动 ,所以一律挡驾。我挡了他们的驾 ,怎么好单独应酬你呢 ?”

我告诉他 ,我并不要他到旅馆来看我 ,也不要他请我吃饭 ,只

希望在 ~~运德~~ 先生这里打开僵局。中美交流协会指定的是 ~~运德~~ 灏,可是 ~~运德~~ 躲着两三天不见踪影。我困居旅馆,又不习惯吃西餐,又不习惯打美国电话,所以情况很困难,希望有所解救。

杨发话了:“~~运德~~ 那里,我不能打任何交道。至于你,又不能吃西餐,又不会打电话,我要问:你到我们美国来干什么?像你这样到美国来,只能给中国人丢人!”他在电话里,声色俱厉了。

“杨联陞同学,‘丢人’二字,是您先出了口的,那么底下,就得容我来说了。记得芦沟桥炮响的第二天早晨,我二人在清华六院(新斋)门口碰见还说过几句话。你说,这一来就要各分东西了。不久,我就到了太原,在山西新军打了两年日本鬼子,弹片至今还留在腿里。可是您哪,您却在中美处在极不友好的情形下跑到美国来,替侵华军师当了军师。试问,咱们二人谁丢人?!”我也在电话里声色俱厉了。

电话那边没有回响,但明显也没有挂上。可能,对方也会受到些震动吧。

客人走后,我一个人躺在床上想,为什么这些人这么气粗?我的解释是,这些人在大学里受的殖民主义者的教育,先入为主的就是崇拜西方,而西方又是在悠久的传统里崇尚“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利为己”的,所以这些人从来不是理想主义者。什么是理想主义者?理想什么?我想,我们理想主义者首先瞅着的就是贫富不均。宋朝杨么起义的指导者钟相说,“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当然他的话里把“贫富不均”的纠正看得太轻松了,落入了空想。但视贫富不均 of 不正常现象,立志要矫正它,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追求大同社会的理想,永远不能放弃。这就是近代史上若干志士仁人、抛头颅洒热血黽勉以求的理想。而这些在美国的人不是这样,他们追求的是高薪资,一处小楼带草地,汽车房里四部小汽车,先生一部,太太一部,儿子一部,外小货车一部。至于现实社会的那些贫富不均,他们则视而不见,充  
圆



耳不闻,反而放口咒骂一切激进主义者都没有好下场。用中国老话说,这都是些“全无心肝”之辈,跟他们有什么可讲呢?他骂你“丢人”,你就“丢人”就是了。

### 源月 癸日 (星期五)

我告诉联络员 ~~杂音~~,请她转告 ~~运~~的秘书,说我不准备在波士顿再呆下去,请这位秘书打电话给在华盛顿的“美中交流办”说,我马上到华盛顿去,请他们接火车,并安排住宿。

~~云~~先生要请吃饭。电话是张广达的女研究生周锡娟打来的,说 ~~云~~的夫人 ~~晕~~要从伦敦回来了,~~云~~先生请我明天下午到家下吃饭,他亲自开车来接。

夜里,一位说中国话的女人给我打电话。她姓刘,叫刘静,英文写出来是 ~~刘静~~,这后一个字是她丈夫的姓,是一位古董商人。她是中国盐城人。“美中交流办”共有两位高级(科长以上)雇员,其一是刘静,其二是 ~~孕~~(美国人)。我在电话里告诉刘静说,我一到华盛顿,就准备把“交流办”给我的四千多美元金全缴回去,只讨一张飞机票立即回国。刘女士以温和的声音在电话里说,那样做未免有点过分了,她劝我还是把 ~~费~~勉强执行下去为好。我说我在纽约,住的是领事馆,到华盛顿,能不能住大使馆?她说这种事交涉过的,大使馆说,它只接待特殊的中国人,不接待普通的中国人。她说,她们已经在乔治·华盛顿大学附近替我找下旅馆了。

### 源月 癸日 (星期六)

~~云~~先生的房子不在哈佛校内,而在 ~~悦~~小镇的一条小街上,房子买下已经 ~~缘~~年了,小二楼,显得旧一点。夫人 ~~晕~~穿一件红线衣、一件红线裤,光着脚丫子招待客人,也不知道这是哪国哪地方的礼俗。~~缘~~岁半的儿子带着一脸阿拉伯人的神气,用

盔甲把自己装扮成中古武士,拿一柄木剑到处乱砍乱刺,还在地毯上乱打滚。我心里想,这就是美国儿童的典型模样了。云从龙先生小我五岁,晟园年生,父母的籍贯是瑞典,所以身上带有明显的北欧气味。他的衔头上写的教授学衔前边多加一字,叫粤字从林社孕从春从土云从龙。我问他,他说他念大学、念研究生都是粤字从林社家族资助的,所以在衔头上要加上人家家族的字样。他说,他在哈佛念学位的时候,跟周一良同房间。

这餐饭很奇怪,无肉,无鱼,无鸡,只有酸黄瓜,煮洋葱。长桌上倒是燃着几支长长的白蜡烛。匆匆把场面走过,云从龙先生亲自开车送我回旅馆,在旅馆门口他和我拥抱两次,嘴里嘟哝着“蚤从春从土云从龙”,意思是按俄罗斯方式向我告别。

### 源月 晟园日 (星期日)

今天,我要离开波士顿了。

杜维明打来电话,叫我下午远点前办好离旅馆手续,远点他开车来接我,先到餐馆里吃晚饭,晟园点他开车送我到火车站。在碰了杨联陞那么响亮的钉子之后,云从龙和杜维明二人总算在我的心态上做了有力的弥补。

常熟餐厅开设在悦老道与源镇的一条主街上,菜肴品味是地地道道的江南风味。杜小我晟园岁,晟园年在昆明出生,父母可能是浙、赣地方的人。他请了三位客人,第一位是陈荣捷老先生,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已经晟园岁了,身体还那么硬朗。他喜欢讲儒学中的一个“中”字,阐发得很绵密深刻。第二位是我。第三位是陈来,他是张岱年培养的研究生,现在哈佛做访问学者,不久回国后要安排他当北大哲学系的系主任了。

菜肴虽然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味,但有时还夹杂一些美国的庸俗噱头,譬如炸饺中夹带一条字条,我的一条是“很快你会遭遇一个情人”,杜维明的一条是“你马上要发一笔大财”。陈荣捷也吃









的,后来有人说,台湾的学生有些英文阅读力不怎么强,于是就有人提议出一中文的。而我本人已没有精力写,于是由我的弟子某某教授、某某教授……译成中文,由我校对,准予印行。呜呼,其泰已甚了。

文集里还附了胡适写给杨联陞的信,向他提供一条经济史的材料。说朱熹的全集里有一篇临安“婆子”(老妇人)制假钞票(“会子”)的供词,说在一个小院落里,套板印制,通过太监从宫中弄到绵纸……。这封信的刊入,在于说明胡、杨二人的关系有多么亲切。

### 源月 圆日 (星期二)

一转眼,李老李和朋友们到 灾源温泉 温泉三天的度假期过去了。她回到华盛顿打电话告诉我,“交流办”的主任要接见我。我想,他不来旅馆看我,而要我到公事房看他,这中间已经有点“架架子”的味儿了。可是又一想,中国有句老话“走客见坐客”,于是提起皮包跟在 李老李后面去了。

“交流办”就在白宫的西栅栏外。办公室里琳琅满壁,尽是齐白石、徐悲鸿等的画。这叫美国人看,是挺唬人的。但我一看见就知道全是琉璃厂买来的水印画,一张真迹也没有。

主任叫盖耶(鄧陳陳),源回来岁,像一位侵朝的大兵。据说,他曾在北京美国大使馆当过好几年干事。他用龙井茶相待。寒暄已过,我打开皮包,把所有的 悦源支票(支票)摊在桌上,用英语对他说:

“这是美国给我的钱,请收回去。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尽快替我弄一张飞机票,我要回国去。”

鄧陳陳的脸色很难看。他用结结巴巴的中国话对我说:

“这样做,未免过分啦吧。前一阶段的工作,我们没有安排好。底下的工作,我们安排得好一点就是啦。”

……

事后，~~源~~背后告诉 ~~源~~说，“我接触过不少中国人，但像这个人，我从来没有遇见过。”

### 源月 圆日 (星期三) 阙记

### 源月 圆日 (星期四)

华盛顿街上我来后的第一批花(如郁金香)已经残了，第二批花取而代之。它们是水仙和杜鹃，都不在盆里养，而是在花畦里。水仙比中国看到的水仙裸子大，花大。杜鹃不仅有红的，而且有白的。白的比红的更引人喜爱。

晚上，~~源~~(舒尔茨，女)，从康州打来电话，解释她不能不把我的访问时间推迟一点(安排在 ~~源~~日)的理由。她说，她新近刚刚生了一个儿子，产后身体很弱，而她们那边熟悉中国语、在业务上能跟我交流的只有她一人。她说，她在的州是康州(悦)，~~源~~所在镇叫 ~~源~~，学校叫 ~~源~~(煨斯莲大学)，下的火车站叫 ~~源~~，火车开过耶鲁大学所在 ~~源~~(纽海温)一站，就到 ~~源~~了。

### 源月 圆日 (星期五)

今天，~~源~~开着她自己的那辆破旧的车子带我去美国国家美术馆去参观，真是叫我大开眼界。我平生最喜爱印象画派的画，这里就有几个大的展室，画经过精心的装潢，死死地钉在墙上，每室都有一名带手枪的警卫，以防抢劫或盗窃。展品在墙上并不密集，重要的画一面墙上只挂一幅，小幅挂两幅。世界名画在世界的分布，是按自由贸易规律，谁掏钱谁买到手，所以很分散。法国卢浮宫比较集中的多一点，其余德国、英国、美国都购藏一些，再其余就归了私人(如美国的富翁哈默)手中了。

令我更高兴的，是每幅展品都有仿制品和印品出卖。仿制品



由社会上的二、三流甚至三、四流画家所画,可以看出仿制得很精心,并不粗制滥造。价钱比较高,我们过路人买不起。印品可以买得起,我就买了源张,准备回国分送子女或友人,是最好的礼物。

源月 缘日  
源月 苑日 阙记

源月 苑日 (星期一)

刘静女士请我吃饭。预先有电话约定。下午远点半她开车(她的车比孛孛孛的车豪华些)到旅馆接我。先开车到她家接她的丈夫。她(他)们家座落在华盛顿的西郊外。到达前先经过一座庞大的自然公园,真是美极了。过了自然公园就到了一片住宅区。这片住宅区也漂亮至极,一排排小二楼或小三楼。看起来住在里面的都是些富裕人家。分心做希腊、罗马、埃及以及中国、日本的字画、骨董生意,家里放着一些古盔甲、古陶器、古瓷器和古油画以及日本的浮世绘。我看贗品居多数,但贗品照样可以卖出价钱。他拿出几样中国字画,我微微露出一一点鉴定的能力,他立刻对我更加刮目相待了。

我们三个人,开车到华盛顿的中国城,这里有一家蒙古烤肉店,中间一架大圆鏊子,底下笼着木炭火,四周摆着猪肉片、羊肉片、牛肉片,任顾客选择,选好交给站在铁鏊中间的大厨师,他给你拌好调料,放到鏊子上烙,一面烙一面翻腾,等认为好了时,就给你盛出来。记得梅兰芳秘书许姬传写的《七十年见闻录》里提到北京有蒙古烤肉这件事,具体情节是否与华盛顿的相一致,则不知道。我好事,跑过去跟大师傅握手拉近乎,顺便问一句“府上”,回答竟是“贵州”。呜呼,所谓“蒙古”者,仅仅是招牌上如此写而已。

源月 愿日 (星期二) 阙记



提起张先生,话就长了。我是在《逻辑》课班上认识他,可他并不认识我。后来我发表在《清华周刊》上的《~~北平~~ ~~燕~~西洋杂志文艺论文编目》被张先生看到了,他辗转叫同学转告我,叫我到他的~~煤~~ ~~窑~~(~~煤~~ ~~窑~~办事处)去。我去了,那地方在图书馆的下层,黑黝黝的。花玻璃上写着他的名字,他正把两条腿架在书桌上读杂志(这种架式我从照片上看到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在加里福尼亚圣克里门蒂家里也这么架着)。他告诉我,除了文艺论文外,希望也留意哲学论文,包括逻辑论文,有什么新动向随时来告诉他。我应诺了。这是我第一次跟张先生见面并交谈。

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有一次在西直门大街我被临时派遣作“通信员”,跟另一位同学到“北平总学联”去汇报西路游行大队的情况。总学联的秘密指挥部设西单亚北点心铺的楼上,三个人坐在一间单间里,装作喝咖啡的顾客,一是姚克广(即姚依林),一是张申府,一是许德珩。从那以后,我才知道,张先生原来也是学生运动的幕后领导人之一。这是我和张先生见面的第二回。

在~~猿~~年代,我就见过他这两次。不久他被捕了,清华教授会也通过决议:解聘他!此后,我没见过他,也不可能。事隔~~圆~~年,全国解放后我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时到辅仁大学去听苏联专家吉谢列夫报告,这时才又遇见他。以后,就是我在政协《文史资料选辑》那篇文章中所说的那些情节了。

舒尔茨似乎很忙,教学外她还从政,是康州的州议员。她说,你不是山东人吗,你们山东代表团正在这里和康州结为友好省(州)。她拨出~~猿~~日这一天专门跟我交流关于张申府先生的事。我把我所知道的张先生的情节告诉她,她也把在中国留学时采访到的情节告诉我。到头来给我的印象是,她比我知道的要多得多。

最后,我提出一个问题:一个学者,是做纯学者好呢?还是兼任政治家好?我说,兼做政治家会赚很多便宜,但也会吃大亏。在中国,政治家又叫“政客”,话音里就带些贬意了。人们提到梁启

超就用这个词。我看张先生一生也跟梁先生走了类似的路。梁先生背叛了戊戌“革命”，随顺了北洋，最后落了个富裕寓公而终；张先生在“宜将剩勇追穷寇”之际，选择了李宗仁，一篇“划江而治”的文章召致来废斥终身的下场，比梁启超还惨。

舒尔茨问我对美国的看法。我说，你们美国自然有美国的优越之处，如自来水灭菌，我们中国就办不到。但假如就文化积累（~~精粗~~而言，那么，我说，美国薄，中国厚。积累中当然有坏的东西（也就是“糟粕”），中国和美国的文化中的坏东西都很多，但我们用抽象的谈法，试把中、美文化中的坏东西割掉，那么剩下的好东西（也就是“精华”），也还是中国的厚，美国的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显得浅薄的道理之所在。所以我不喜欢美国。

舒尔茨听了很不愉快。她说，她请了我来才明白，“一二九”时候热爱民主的那个赵俪生已经没有了，现在是作为破落地主的赵俪生又复活了。我听了自然不会愉快。

### 缘月 员日（星期五）

下午三点半，仍是那一对“勤工俭学”的黑人大学生情侣开车送我前往纽约。车子开到 ~~曼哈顿~~ 时，他们有意在耶鲁大学的一些主要建筑间绕行一圈，以使我得以浏览一下耶鲁的风光。车开到一个高坡时，男大学生指着远处对我说，“~~我~~（那是大西洋）我想，我这一辈子总算看了一眼大西洋了。下午近苑点，到了纽约的另一个火车站，大学生替我买票，送我上车。苑点 ~~缘分~~ 上车，苑点 ~~猿分~~ 火车就开了。

这是一条东西行的铁路，令人想起陇海线。公司还是 ~~哉~~ 但这次的车型，是我没有经验过的。个人一个小单间，相当狭窄，但需用的东西却一应俱全了。看风景，有一片大窗子；睡觉，有一个床位，盥洗，从穿衣镜下可以转出洗用的盆；要大小 圆

便,又可以转出便池。总之,东西都装在墙里,以使房间不至显得太窄。看起来,这是经过设计师精心设计出来的。但当我津津乐道地跟美国朋友谈这种车厢时,他们却流露出近乎羞耻的样子,说那都是老掉牙的东西,在美国已经没有多少人要坐这样的“包厢”了。

### 缘月圆日(星期六)

昨天傍晚一上车就疲乏得呼呼睡去了。醒来缘点多钟,临窗一望,目之所及全是农田。时值大雨倾盆,田野里一个人影也看不见。这是韵藻(俄亥俄)州的地面。说起韵藻,我不免记起青年期热心西洋文学的时候,记得一个戏剧家叫韵藻,仿佛就是韵藻州的人,要么就是韵藻大学的教授。后来,卓别林成了他的女婿。我们外语系的系主任给我们上《莎士比亚》课就是拿韵藻的讲课内容写成笔记来给我们“呻其占毕”的。

我下车的站口叫韵藻,从这站通往密西根大学所在地的韵藻。据说,很早一对欧洲的移民夫妇住到这里,种植叫做韵藻的一种树,夫人叫韵藻死了,丈夫为了纪念妻子也纪念事业,就给这地方起名叫韵藻。

张春树先生,山东惠民人,夫人骆雪伦,福建人。夫妇二人是台湾大学文史系的同班同学,我见过他(她)们的毕业照片,中间坐的是姚从吾,模样我还认得,只是比河南大学时候苍老了些。前几年,张氏夫妇回大陆,到兰州大学讲过学,还担任了兼职教授。张是专研汉朝历史的,一心想看到发现的几千条竹简,更想亲自去居延看一看。但当时,“开放”程度还很有限,“反美蔑美”的气味尚未完全退缩,官方没有让他达到目的,所以他们还准备二次重来。从这一点出发,他对兰州大学成员之一的我,立意要殷勤接待。在华盛顿时,我就接到他的长途电话,说他夫妇亲自开车到火车站来接我,但时间稍迟一些,火车怨点到,他们怨点半来接,嘱

我在火车站耐心等一等。

五点半,他们夫妇准时来了,到他们府上,按山东习惯喝小米粥,就咸菜。这在美国,已很不容易吃到。早餐罢,他们开车去住旅馆。这家旅馆名叫 匀 缘 造 旅馆性质叫 匀 缘 造 美国人善于造字,旅馆原叫 匀 缘 造 可是目前这种旅馆既住人又可安放汽车,汽车叫 匀 缘 造 于是乎将 匀 改成 匀,就构成 匀 缘 造 了。我想这和中国的车马店有某些类似。住 匀 缘 造 号。房间比“大学小店”那一间大三倍,而每日租金仅 匀 缘 造 美元。

### 缘月猿日(星期日)

按预定规划,我在密西根只停留两日,圆日算半天,源日也算半天,那么今天猿日是唯一完整的一天了。所以,除了在主人陪同下观览了美丽的植物园外,最要紧的是在主人的书房里细针密线地谈一谈了。

我问主人“我到了美国,为什么到处受到冷遇?”他沉吟着说,这半天,他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他说:“第一条原因是你们兰州大学的知名度不够。全世界都知道有牛津、剑桥、哈佛、普林斯顿,对中国只知道有北大、清华,谁知道有个兰州大学来?”我说“第二个原因呢?”他沉吟下去,我抢过来说,“第二怕是鄙人的知名度也不够。”他没有反驳,算是默认了。“第三条原因是你来得不是时候。中美刚开始交流的时候,双方还派遣了一些像样的,慢慢也就滥了,一些乌七八糟的人也来美国讲学,讲不出东西,各大学请人的部门的胃口吃倒了,所以他们现在不热络请人讲演。陪吃一餐饭,游览游览,这与礼貌有关的事不可缺,其余的那就另当别论了。”

我说,“像 匀 缘 造,不是连礼貌也没有做到吗?”

他说,“所以 匀 缘 造 向你做了检讨。”

张先生是既这样说也这样做的。他到火车站接我,替我找旅馆,亲自开车陪我到中国餐馆吃饭,陪我游览了密西根大学的植物

园 我临走结账时店主人说张教授早就预付了,等等。但他从来不介绍我接触密西根大学的教师、学生、教学、科研。这中间是有一道深深的闸门的。偶尔,也有例外。有一天下午趁图书馆下班时候他带我到图书馆的大厅里,指着书目卡片橱说,“看看你自己的著作。”我打开悦字开头的橱(美国“赵”字不按新拼法开头字母是在,而仍按老拼法悦)在我的名下竟有怨张卡片,想不到美国竟连我自己都已阙存的书也搜集到他们的书库里了。我一面翻着卡片箱,一面对张先生说:

“这样看来,鄙人的知名度不是也不能算太小吗?”

张没有积极回答我的问题。看起来,除了知名度,人缘也是个重要的因素。无论在美国,甚至在中国,我的人缘都很差,这才是我一生到处碰壁的最根本的原因。北京话有“来事儿”这个词,鄙人一生最吃亏的地方就在于不会“来事儿”。

缘月 源日(星期一)阙记

缘月 缘日(星期二)

上午 员点 源分,张先生夫妇开车送我到底特律(阅阙)飞机场,飞赴洛杉矶。

这是一架较小的飞机。大飞机有两条通道,小飞机只有一条通道,两排乘客。飞机下午 员时起飞,飞行 源个半小时抵达洛杉矶。假如没有时差,到达时刻应该是 缘点半,但东西部时差 猿小时,所以到达时刻是两点半。

没人来接。坐等了一会,周鸿翔教授来了。他是广东人,加州大学的历史系主任。这位先生挺古怪,没有架子,不太修边幅,跟东部那些衣冠楚楚的教授毫无相似之处。他开着他那部破旧的汽车送我去旅馆。旅馆的名字叫 匀(阙)这名字带点法国味。这家旅馆的特点是不时髦,有点儿陈旧,但住起来挺宜人。据说,刘宾雁来洛杉矶,就住在这家旅馆里。我住二楼 圆(阙)室。每日租

金猿美元。

### 缘月 远日 (星期三)

天气热起来了。在东部穿的那些衣服穿不住了。上街,只穿衬衫就行。上街上走走,看到洛杉矶商业大萧条,货窗上的货品多标明削价 圆猿,有的甚至 缘猿。这地方,中国化得很厉害,饭馆林立,看看名字,差不多都是“梅林”、“陈苑”、“小上海”等等。

### 缘月 苑日 (星期四)

心情比较安谧,因为这次“不适应”的旅行,已经到达最后一个站口了。我的“洋罪”已经快要受完。

周先生跟东海岸那些教授确乎不一样,他诚恳坦率,很容易接近,办事样样令人感到妥帖。他说,有一年底特律美国人父子用棒球棒子打死了中国人,他还到底特律去参加过示威。

他的前任系主任是陈观胜。说起陈观胜,我上大学的时候,他是我们邻家燕京大学的教授,还是《燕京大学学报》的编委,一度担任过主编。他的一部著作叫《印度佛教的中国改造》。我几年前在西宁碰见一位藏族青年,到日本留过学,从日文版把陈先生这本书的《序言》译成了中文,我拿过来发表在《西北史地》上。这件事陈先生还不知道,周先生在电话里告诉了陈,陈氏夫妇邀约下星期二(缘月 愿日)上午 猿点在办公室里接见我。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劳幹(贞一)也在洛杉矶,他扬言说,当年王国维说他自己清朝遗老,民国(其实是国民党)的人他一律不接待;劳贞一仿效说,他是蒋记的中国人,所以从大陆来的中国人他也一律不接待。

### 缘月 愿日 (星期五) 阙记



### 缘月 怨日 (星期六)

周先生带不少研究生,其中一名叫赵仁冠,上海同济毕业生,曾在兰化当工程师,现在在加州大学读博士。因为我二人共有兰州同地供事之雅,所以谈得比较近乎。旅馆没有电视机,他给我抱来一部电视机,他还带来一个多月的《人民日报·海外版》,真是使我的精力有所关注了。

脑子里又开始接触学术问题。我刚到洛杉矶不久,周先生就向我打听两件事:一件是他听说,唐兰先生写了一篇有关大汶口文化的文章,因其中观点与某大权威不合,遭到非议,抑郁不欢而死。(这件事我回国后打听过,没有得到证实。)另一件是他听说,有一位彝族人的学者写了一本书说中国文明的源头在金沙江。(这本书我回国后找到了,寄了一本给周先生。)现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又看到一位叫赵国华的人说八卦和彩陶陶纹中有密码,这个观点我很欣赏,而且很久以来在自己脑子里早就孕育着类似的想法。又看到在大陆人们在品评花,品评的结果是梅花第一、牡丹第二。这个品评的结论,我不服!我认为这是南方人观点领了先的结果,假如把北南方统一起来考虑,特别考虑自唐朝以来中国人的普遍爱好,那第一花的称号无论如何不能不归到牡丹的头上。

### 缘月 怨日 (星期日)

美国书店里,杂志架上在最醒目地方总是插着两种杂志:一是《花花公子》,一是《阁楼》,前者中译名是《花花公子》或《纨绔子弟》,后者中译名《阁楼》,阁楼是男女幽会的惯常用场。我是个老土包子,从未见过,现在开开眼。看过之后感到很没意思,例如照片中很多拍的“口交”,这在中国古代早就有了,叫“品玉”和“品箫”,虽然没有照片,但“春宫”画早就画了很多。

### 缘月 怨日 (星期一)

今天,我的小女儿要从夏威夷到洛杉矶来看我。她在夏威夷大学读硕士。作为准备,我从二楼~~园~~搬到一楼~~园~~,因为前者只摆一架床,后者则有两架床。

飞机到达的预定时间是下午 源时,周先生猿点半就带我去了,但荧屏上的告示说,这~~园~~航班要到 苑点 源分才能到达,我们只好回去。远点 源分再去,终于在 怨号门门口接到了。

这一夜午夜 源时才睡,父女们谈了很多家中和大陆的事。

### 缘月 员日 (星期二)

今天,要做些真正的学术交流活动。

上午 员时去看陈观胜老先生。伉俪二老均已 愿多岁,脸上都有老疤,老先生的驾车证还没有吊销,他还有资格开车,但实际上已经不开了。他的书已经绝版,无可赠送。他说,他的书里,注释比正文的篇幅大得多,并且,注释比正文的价值也大得多。当天下午周先生就将陈先生这部专著复制了让我带回国去。

结束时大家一起照了像。

下午,南加州大学有约会。东道主卫思纬(宰~~宰~~)先生、中国河南人铁先生、美国人骆思典(杂~~杂~~)、中国复旦来的研究生吴家宪,大家座谈了一下午,留吃晚餐而罢。

南加州大学校园里有一种树盛开蓝色的花,我从来没见过,不知树名是什么。

### 缘月 员日 (星期三) 阙记

### 缘月 员日 (星期四)

今天赵仁冠夫妇带我父女出去看看。先到日落大道(杂~~杂~~ 月~~月~~),在这条街上住着许多最有钱的大亨、退休下来的大官、外国贵族,以及最享盛名的电影明星,等等。一般汽车 员万美~~圆~~





从上午 10 点半等到下午 1 点 15 分 ,等了 2 个钟头 ,才等到去北京的航班。

### 缘月 13 日 (星期三)

一直在飞机上。飞机稳渡太平洋 ,要飞行 12 个多小时到达日本成田机场。有广播 ,乘客不要下机 ,只由七八个穿防毒衣帽的卫生人员上机来清扫卫生。不计时差 ,现在应该是午夜 1 时 ,但东京却是华灯初上的时候 ,大约是下午六七点钟吧。继续飞行 ,夜 12 时到达上海虹桥。

### 缘月 14 日 (星期四)

凌晨 1 点 15 分 ,到达北京首都机场。儿子和儿媳来接 ,仍然到张自忠路 (旧铁狮子胡同 )中纪委招待所 ,住 1010 号。继续飞行约 12 个小时 ,现在已经是耳聋眼花之甚了。这日子 ,已经快到我 70 岁的生日。

### 缘月 15 日 (星期五)

昨夜 1 时自北京乘上北京——兰州特快。不料正午 12 时却在三门峡因故停车 2 小时。原来在阎乡站发生撞车事故 ,我们列车开过时 ,一架蒸汽机车头还躺在铁轨上扶不起来。

### 缘月 16 日 (星期六)

下午 1 时 ,抵达兰州。返回家中。此番旅行 ,首尾 缘 5 天 ,将近两个月。

1988 年 缘月 16 日重写完毕于  
兰州大学 ,时虚龄 70 岁

## 附摇我与俪生走过的路

高昭一\*

按中国人的纪龄习惯,俪生今天正满 愿园岁,看见他健康地跨越这道生命里程线,我心里感到莫大的欣慰。我比俪生长三岁。人进入老年以后,睡眠的时间相对少了,在醒着的时间内往往思绪连篇,一幕幕的往事涌现脑际。我常想把这些浪费掉的思想记录下来,留给后世子孙,也许还是有益的,尤其是关于俪生的一些事情,诸如他的为人品格、思想、遭际等,由我来写也总归会真实些。好在我还有过治史的底子,趁现在脑子还不糊涂,想来还是能够把握好这种分寸的。

---

\* 高昭一,原名肇义,愿愿年 愿月生,河北正定人。愿愿年在正定女子师范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次年赴山西太原加入牺盟会,在前线与赵俪生结为夫妻,此后在山西吕梁、中条山地区的新军游击队中参加了两年的抗日战争。愿愿年秋转入后方,从事教育工作。解放后,在山东大学历史系任教,辅助赵俪生完成中国农民战争史科目的开创工作,合著《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历史上山东农民的起义》等著作和论文。此后因受政治牵连病退在家,为赵俪生竭力维持学术后勤基地,空暇著有《盐铁论译注》、《回首忆当年》等。现离休在家。

1937年 7月 7日爆发的卢沟桥事变 ,标志着日寇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 伢生和我也都以这个时间为坐标 ,开始了新的生活历程。 7月 13日 ,伢生在完成苏联小说《孤独》的译作之后 ,受“民先”(全称“中国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派遣 ,毅然离开清华校园 ,前往山西太原接受“牺盟会”(全称“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的军政训练班。 比他略晚几天 ,我也以“民先”身份从(河北)正定来到太原 ,参加同一个训练班。 有那么一段时间 ,我们都在太原 ,同在国民师范 ,然而彼此并不相识。

此后 ,伢生敏感到故乡山东可能沦陷 ,于是请假回家探亲 ,这是他们母子间的最后的一次团聚。 在归途济南站 ,他遇到“平津流亡同学会”的许多同学朋友 ,于是便结伴南下湖北、湖南 ,参加“乡村服务团” ,去做动员民众的工作。

10月底 ,就在忻口战役的最后相持阶段 ,大概预感到局势即将恶化 ,我和一批青年被编入第二战区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宣传部下属的动员宣传团 ,深入敌后去做广泛的抗日救国思想工作。 我们从太原出发 ,北行经静乐、五寨、苛岚……等县 ,作巡回动员演出。 这时正值 11月 11日太原被日寇攻陷 ,而我们继续向西北进发 ,到达保德。 接到“动委会”让我们回归离石的消息 ,并命令我们向总部靠拢 ,于是我们南下 ,途经兴县、临县 ,返回离石。

伢生在湖南农村 ,目睹了国统区政治的腐败与黑暗 ,认识到在蒋记官吏重压下 ,农民要动员起来那是很困难的 ,故决意重返第二战区 ,经湖南省“民先”队部的介绍 ,经郑州、临汾 ,直奔“动委会”总部所在地——离石。 也正是在这里 ,我们二人会合相识了。

马茂庄是离石城南三里的一个小村 ,“动委会”下辖的“西北青年工作团”设在这里 ,我和伢生一前一后来这儿。 有两次在

一起工作的机会使我们彼此熟悉了对方。一次是被分配在一起编辑一份抗战油印小报；另一次是一块被派到城北源里的大武镇去主办“农民训练班”。我们从一开始工作就合作得很好。在我眼里，他是一个“一二·九”式的标准大学生，很会讲话，而且讲话时总带着刺儿，有点儿清高孤傲。这是我对他的初步印象。在短短的合作期间，我发现我们的思想感情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也并不像人们所传的那样难于接近，而且恰恰相反，他温和热情，是很好相处的。而我给他留下的印象，按俪生的叙述是：遇事能想办法解决，显得比他老作，再一点使他比较佩服的是，我读过高岛素之的《资本论大纲》，在政治经济方面的知识比他略长。在大武办农训班时，我们朝夕相处，吃、住均在一处，很自然的感情也更为接近，就这样双方订下了终身。

农训班结束后，我们又被调往“动委会”下属的“离石县动员实施委员会”，机关设在离石北城墙根的黑龙王庙。在主任赵迺光的主持下，由俪生到街上买了二十几根芝麻滚子，请同志们开了个茶话会，向大家宣布了我们的婚姻关系。我们的婚礼就是如此简单，按传统老眼光未免有些仓促草率，拿今天年轻人的观念衡量，又不免寒伧丢份儿。然而就是这样，我们共同战斗、生活了三年。天假一岁，明年我们就可以庆祝“金刚钻婚”了。

战时根本没有什么婚假蜜月，婚后我马上被派往吴城区，俪生被派往柳林区（现在已经是柳林市），组织动员备战工作。此时汾阳已陷落，日寇继续向西面的离石扑来。我们奉命向黄河岸边的碛口撤退，在一个叫骆驼局的小山村，凑巧与俪生一伙人会合。此后我们便转入当地山区，同日伪军展开游击斗争。当时的各种条件都是十分艰苦，为此俪生曾写过一篇报告文学，题目是《在王老婆山上》，发表在胡风主编的文艺刊物《七月》上，署名冯夷，介绍了我们当时的战斗状况。

一九四二年猿月上旬，在日益险恶的形势下，组织决定留下本地



干部和部队突围北上,外地(不能操当地方言者)干部渡河去陕北。于是张渠、赵迺光、刘大学(女)和我们两口共五人,在当地老乡与贺龙元帅的一位侦察兵的协助下,选择碛口与军渡间的孟门渡乘筏渡河,结果木筏在中流被冰块撞散,幸赖这位侦察兵紧紧拉住我和俚生的手,才像落汤鸡一样被拉上对岸。时值料峭春寒,上岸时觉得脚下的沙滩都是热乎乎的。

此后我们又徒步迤邐南行至延安,在那里待了将近两个星期,最后我二人商量决定不住陕公或者抗大,还是参加具体抗日战地工作对我们更加适宜。于是我们又徒步南下西安,经“民先”组织安排,去晋南夏支队(全称“山西夏县人民武装自卫队”)工作。

1938年的初夏,日寇已控制了同蒲铁路,夏县以西不远的运城就是日寇集结盘踞的重镇,不时派兵向周边地区进行“扫荡”。我们夏支队就是在这中条山区,组织动员民众与敌人展开斗争的。我们刚来,分配在政治宣传部工作,任务是编辑油印军报和宣传品,刷写汉、日语标语,给战士上文化课等。后来我们又被派往基层,担任第一中队万连芝部的正、副指导员,这样面对面与敌人作战的机会也就多了。战斗的生活风吹雨打、风餐露宿,往来于丛山平原之间,其辛苦之状确实难以言表。秋后,俚生患上了恶性疟疾,一日发作数次。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部队批准我送护他去西安治疗。当时部队穷得连一分钱也没有,我们就是靠着亲戚的周济和朋友的支持,才挺了过来。年底当俚生身体已基本康复后,我们又返回了部队。这时晋西南各县已联合组成更庞大的队伍,原夏支队已改编为政治保卫队第三支队。为了照顾我们,俚生被留在宣传部,我则去管理儿童团。别小看这些小家伙,其中孙岳后来成为周恩来秘书班子中的主力人物。俚生这时期开办“军事干部轮训班”,由他主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新三民主义论》两门课程,他把融会贯通了的内容再用通俗流畅的语言表述出来,得到战士和领导们的一致好评。后来俚生经常对我说:“我当教授的

基础 就是当年给战士们开课打造下的。”

1947年初夏 ,俪生又一次病倒了 ,这次是痢疾和疟疾并发 ,比上次还难治。部队又让我伴送他去西安治疗。这时期的形势有了很大变化 ,国、共矛盾开始加剧 ,阎锡山利用旧军已开始在晋东南屠杀新军和新政权的干部。我们在西安街头遇到原夏支队政委李涛 ,他告诉我们部队已经转移 ,很难找到 ,他劝我们在西安等等再说。为了维持生计 ,我们接受了朋友的介绍 ,到陕西乾州去从事教育工作 ,从此我们脱离了火热的抗日前线 ,踏上了教育工作的途程。

以上回忆的是我们在抗日前线两年多的大致情况。对这段历史 ,尽管俪生后来每以“文革”小将的术语自我调侃说,“早年投机革命”,但它在在我们心目中确实是引以自豪的。试想我们当年才刚刚 19岁出头 ,血气方刚 ,不谙社会人情世故 ,摆在我们面前的路是多种多样的 :延安、西安 ,顺民、良民 ,甚至是汉奸 ,而我们却义无反顾地走了一条最艰苦的道路 ,甘冒生命危险 ,不计私人报酬 ,上了前线 ,而且选择的还是那些并无正规军团作保障掩护的游击区。对那些世故佬而言 ,这叫“犯傻”;对那些不关痛痒的后世功利者而言 :“革命了半天 ,既没当上官 ,又没发了财 ,图个啥?”不错 ,我们对于政治始终都是幼稚的 ,而且那段历史确实在当时和后来也都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物质利益 ,但我们至今不悔 ,因为在那个国难当头的年代 ,我们诚心诚意地尽了一个中国国民应尽的义务 ,对此我们心安理得 ,无愧于当时父老和后代子孙。

## 二

1947年 9月的一天 ,我和俪生乘一辆大卡车沿西兰公路风尘仆仆地从西安来到了乾县 ,当时正值国民党政府施行强化治安统治 ,防止异党活动的开始。在人们眼里 ,我俩的行迹确实非常可疑 ,和一般到任的教师不同 ,我们没有皮箱、行李 ,甚至连一些必备

圆源

的生活用品也没有,像是一双在逃的通缉犯,或是私奔的男女。

乾县中学是在一座城隍庙基础上新建立的,招收四个初中班,全部英语课由俚生一人独担,每周圆原节课,喊一上午,到中午下课时已累得喘不上气了。再加上当班主任、批改作业等工作,每天忙得没空闲。他身体底子又单薄,就这样勉力支撑着。精神上为了自拔,不致沉沦,只能充分利用夜晚这段属于自己的时间,拼命地写作和读书。我们在乾县呆了两年半,俚生利用四个学期的业余时间和假期,完成了三件工作:一是写就了十余万字的中篇小说《中条山的梦》。这是他根据自己的战地笔记和回忆、加以整理提炼完成的,先在郑振铎先生主编的《文艺复兴》杂志上作两期连载,后来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二是翻译完成了德国进步作家云·沃尔夫的圆幕话剧《维也纳工人暴动记》(又名《福劳利德镇》或《奥京喋血》);三是初步搜集了一些关中学者的文集、诗集等资料,为日后向历史学的发展,铺垫了一些基础。

这一阶段的生活异常艰苦,因为抗战,按当时教育部规定,工资一律打对折。因此,俚生名义上的月薪员圆元,实际只拿到圆元,我的猿元工资,也只发员缘元。我俩白手起家,一无所有,一切都要从头置办,所以经济状况相当拮据紧张。这时期俚生清华好友王瑶曾专程来看望过我们,目睹乾县的闭塞和我们生活境遇的贫寒,他曾发过很大的感慨,意思是佩服我们能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生存,换了他,那是绝对忍受不下去的。

贫困是可以忍受的,让我们心理上倍受压抑的却是“双重人格”,从乾县中学到开封解放,甚至到后来的政治运动中,每提及此事,总使我们感到愤怒。我们必须隐瞒曾在山西新军的经历,白天和大家一样参加“纪念周”,朗读总理《遗嘱》和“总裁”十二条《守则》,只有晚上俚生才能重操革命文学旧业。当西安城工部的程之平(原名程骏声)专程来乾县和我们接上关系后,我们就开始为组织收集军事、经济情报,有意识地培养进步青年学生,宣传组

织学运 ,掩护对延安紧缺物资的运输等工作 ,这在当时按国民党的话叫作“共匪特务”。我们并不隐讳干过这些工作 ,然而我们从心里厌恶“特务”这字眼 ,比起那些货真价实的特务来 ,我们简直是无地自容 ,即无一丁点经济实惠 ,还要甘冒身家性命的风险。就在事后 ,“文革”中的红卫兵还死咬住俪生是“国民党特务” ,~~1956年~~俪生去美国访问 ,纽约州立大学的一位副教授还问 :“听说你是共产党特务 ,是吗?”类似这样的事情真是叫人啼笑皆非 ,哭笑不得。不错 ,当年做过的那些工作 ,是我们出自对当时反动腐败政府统治的一种心理反抗 ,是出自对一个能够代表人民大众的政治团体的一种憧憬和向往 ,我们对此终生无悔。

一份耕耘 ,一份收获。我们原本就是学生出身 ,也都曾有过教书的经历 ,所以对教学也算是驾轻就熟。再加之认真卖力 ,很快就博得了良好的教学声誉。当然也还有人在背后说什么来历不明呀、大学没毕业呀 ,等等。~~1956年~~愿月 ,我们的长女降生了 ,俪生为她取名为绛 ,这是因为他崇敬明末清初的思想家、活动家顾炎武。顾原名绛 ,后更为炎武 ,俪生拿这“绛”字来给孩子定名 ,既寓以其节操学问自励 ,也作为自己开始从事史学研究工作的纪念。家中有了孩子 ,增加了不少生机和乐趣。俪生的教学负担有增无减 ,在绛儿周岁时 ,他终因劳累过度 ,又患上了伤寒 ,曾经一度濒于死亡。多亏当地一位吴老大夫的精心医治 ,才转危为安。此后不久 ,陕西省教育厅突然发动全省中学单科抽查考试 ,抽查的科目又恰巧是英语 ,结果乾县中学这个新建的学校总分名列全省第一。这件事引起中学校长的注意 ,于是俪生成为各校争相延聘的香饽饽 ,俪生最后接收了西安高中的聘请书 ,离开了乾县。

西安高中是当时陕西中学里的最高学府 ,原址在西安东厅门 ,抗战开始迁往汉中洋县 ,后又迁回关中泾阳县 ,校址大半占用的是民房、商会办公处和庙宇。~~1956年~~春 ,俪生来这里担负起全校高二英语课的任务 ,教学工作量很重 ,加之住集体宿舍 ,吃公灶 ,生活  
圆苑

很不方便,更丧失了利用业余时间搞写作、研究的自由。所以在这里只教了一个学期,没有再接受西安高中的续聘,就离开了。这个学校给俩生留下较深印象的是校长侯良弼,他是陕西教育界的一位怪杰,力主实干,却又脾气犟拗乖戾,毫不顾忌任何势力与情面,他当众羞辱调皮学生关麟征,激励他走上黄埔军校的故事,在关中传为美谈,我们也曾亲眼见到他公开激烈抵制三青团在西安高中发展组织……然而在1957年的“镇反”运动中,他却作为“学霸”被镇压了。作为一位曾在陕西教育界颇有影响的人,可不可以对他的结局有另外的处理方式呢?这留给历史去作评论吧。

以后我们应聘去蔡家坡的扶轮中学任教。蔡家坡属岐山县,原是陇海线上一个不起眼的小站。抗战开始后,一些银行实业家在内地转移中,把许多资金投到这里。兴建起一批工厂企业,使这个小地方逐渐兴盛繁华起来。扶轮中学全名是陇海铁路郑州扶轮中学,是属铁道部的一个颇有名气的学校,也是抗战后迁到这里的,校址选在黄土高坡上的龙泉寺,后陆续扩建了一些校舍。扶轮中学的师资阵容要比普通省立学校强。由于是全国招生,所以学生也显得与众不同,大多都比较精干。这些学生后来有的成为学运领袖、大学教授,绝大多数成为后来遍及全国的工程师。

1957年正是全国抗战最艰苦的阶段。国统区由通货膨胀所造成的货币贬值,使学校教师和学生的生活水平都已降到最低限度。我俩工作带一个孩子,比起那些人口多的家庭来,生活尚可勉强维持。俩生给两个高二班级带英语,我带四个初一班的历史。我们的家安置在小坡村边的窑洞里,每晚我们都要备课用功到午夜后才休息。当时没有电灯,全靠小炕桌上的蜡烛来照明。

俩生那时19岁,正值精力旺盛时期,加之思想开放活跃,很得一批进步青年学生的推崇,彼此间志趣意气相投。经常来我家讨论问题的学生有高三级的柯在铄、赵宏才(赵洛生),高二级的束布(束衣人,笔名石怀池)、金彭(金铿然)等,他们都知道俩生的许

多手稿笔记和被当局查禁的革命书籍(如《海上述林》)都藏在房东老人自备的棺材中,也经常像去图书馆一样,掀起棺盖自己取读,后来他们全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也正是在他们的组织带动下,扶轮中学掀起了学潮,要求改善学生的生活待遇和津贴、驱逐反动校长林群(中统分子)。后来林使用政治力量把学潮镇压下去,柯、赵是应届毕业生,学校莫能奈何,束、金却受到“勒令退学”的处分,他俩此后报考复旦大学去了。我俩也牵连在内,一年聘约期满后,没有再接到续聘,很明显是被解聘了。我们从未受到这样的对待,心里自然也是非常气愤的。经束布父亲的推荐,1948年暑假后,我们受聘到坡底下的雍兴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简称雍兴高职)去教书。

雍兴高职是雍兴公司投资自办的私立学校。雍兴公司总经理束云章(束布父亲的族叔),原为宋子文手下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经理,“七七事变”后,天津陷落,束用天津分行的资金在蔡家坡投资买下地皮,先后设立三厂一校,即机器厂、酒精厂、棉纺厂和雍兴高职。建校的目的就是为工厂培养工程技术人才。学校设机械、纺织两专业,各招 100 名学生,从初中毕业生中招选,学制三年,毕业后由雍兴公司分配各厂录用。学生食宿包括制服全由公司负担。这个学校有企业作后盾,故经费充足,设备齐全,有自己的实习工厂,做到了学以致用。直到解放后,在西北、西南一带的机械、纺织、电力行业中,雍兴高职毕业生都充当着技术骨干的角色。这个学校的教师阵营也十分强壮,从校领导到各科主任,清一色的日本东京高工毕业资历,连普通课程也延聘的是一批名家高手,因此教学质量并不低于大专水平。有实业撑腰,教职员工的待遇也相当优厚,按当时水平,远远超过邻近的武功农学院的教授。教师(不带职务的)底薪 100 元,外加饭费 20 元,家属米贴一石(100 斤,按市价折合钱币),一年发 6 个月的工资,还有冬夏两季毛、棉制服两身,这在当时确实是高水平的了。

我们创立的这个大家庭,在经历了五年极端贫困艰苦的阶段后,现在开始进入了温饱的新生活。我们有了一套住房,有了电灯照明,吃穿都有了明显的改善。也就在这里,我们的二女儿纪(1948年)、三女儿缙(1949年)相继出世,成了一个五口之家。作为母亲,我开始为家务所羁绊,于是暂退居在家专理家务,只偶尔作为代课老师教几节历史。俚生则努力于他业余的史学研究,他在科研方面进步迅速。年轻时的辛勤劳动,今天回想起来,还是很动人的。当时教员宿舍电灯只供应到晚上 10 点,这也是为了节约能源,10 点以后我们就点起蜡烛,窗上挂起黑布帘,将书桌抬到墙角里,这样从外边一点儿也看不见室内的灯光(因为巡夜的更夫会向治安当局汇报),如果次日无课,他就工作一个通宵。我们两人的工作方法不同,我是从通处下手;俚生是找重点突破,结果还是他见效快,有成绩。他研究历史先从人物入手,充分利用当地文献资料,追踪顾炎武后期在关中的活动,这样便又涉及到李□(二曲)、王弘撰(山史)、李因笃(天生)等一批学者的生平与思想。他的第一篇史学论文《清初山陕学者交游事迹考》,1949 年发表于《大公报》胡适主编的《文史周刊》上,胡先生还亲自写信给俚生表示鼓励。初试成功,更增强了他治史的信心和干劲。

然而雍兴高职的这几年对我们来说并不宁静,在这里我们“双重人格”的“弦”被绷到了最紧张的限度。原来蔡家坡的政治安是基本依借中统势力来维持的,这批人官僚习气重,多为庸碌之辈,“战斗力”自然低下。可是自从雍兴高职从重庆聘来王德荣为训导主任兼总务主任后,局势顿然发生变化。王是军统“江(陵)训班”高材生,又是重庆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系毕业,来雍州高职教授《应用力学》和《材料力学》两门课,确实是个多面手。他并不隐讳自己来蔡家坡的意图和抱负,他认为:蔡家坡和宝鸡一带是工业重地、交通咽喉,国民党不占领阵地,势必导致共产党占领。所以他和那些混饭吃的特务不大一样,工作教课之余,仆仆风尘奔





狂的镇压,甚至连一些知名的民主人士也不放过。1957年 苑月李公朴、闻一多惨遭特务杀害的噩耗相继传来,闻先生是侬生在人格、学问上最崇敬的老师,他怀着无比激愤的心情,挑灯连夜赶写出《混着血丝的记忆——悼闻一多先生》,发表在当年上海《文艺复兴》刊物上,以示对暴行的抗议。

抗战胜利后,我们也开始为自己的前途考虑:我们还年轻,生活水平也还可以,如满足现状,不求进取,似乎在良心上有所遗憾。恰巧1957年底在上海召开的“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复员大会为我们提供了一次契机,侬生作为西北地区代表在受邀请之列,遂有东南之行。侬生途经开封下车,受到河南大学学生周可任、牛维鼎的接待,他们为加强学生运动的领导工作,策划侬生来河大执教,他们将侬生介绍给进步史学家嵇文甫先生。嵇先生专治思想史,侬生呈上自己的《王山史年谱》请求指教,于是双方在明清思想史的话题上切磋得十分投机,颇有一见如故之感。老先生很欣赏侬生的文采风格,愿意同侬生共事,只是他本人不宜出面推荐,因为他是国民党特务黑名单上列名的人。他建议侬生可以利用与傅斯年的姻亲关系,通过傅的介绍进入河大。这样,侬生在上海参加了由胡风主持的文艺界代表会议后,专程到南京中央研究院拜访了傅斯年、傅乐焕叔侄,傅斯年为侬生写一张八行信纸的信给河大校长姚从吾,推荐他到河大任教。

1957年 远月,侬生收到河南大学校长姚从吾寄来的聘书,敦聘侬生为文学院文史系副教授,月薪 猿园元整,希望 愿月底以前到校报到。在侬生 猿园岁时,生活又划出了新的段落。八年的陕西中学教员段落业已结束,新的高等教育生涯已然开始起步。

### 三

河南大学座落在开封城区东北角,铁塔的南面,牌楼式的校门非常堂皇,有门警荷枪站岗,对出入的人却并不盘查。

嵇文甫先生当时是文史系主任，在排课和选择授课教师方面是他说了算。俪生报到后，嵇老主动提出除教《通史》外，让他接替自己主讲的《明清思想史》专题课，这对初登高校学府的俪生来说，确实是一种栽培和锻炼，内心深处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俪生下决心一定要把课讲好，以不辜负嵇老的信任与厚望。这门课每周四小时，给本系三、四两个年级合开。为了把工作做好，他花费了很大的心血，记得盛暑天，他穿一条短裤，光着脊梁，汗流浹背，几乎整天坐在书桌边，临时备课、写讲稿……课也上得很顺利，就这样俪生在大学讲台上开始获得成功。

俪生初进河大，正逢教育部下文明令解聘经济系王毅斋、教育系陈中凡两位进步教授之时，他俩均以煽动学生游行闹事等罪名，被扣上“共党嫌疑”的帽子。其实当时真正在幕后领导学运的是刘鸿文、李淑英等，他们都安然无恙。在这样的环境中必须加倍警惕，所以俪生在讲课时格外谨慎，只是在给工学院一年级开的《中国通史》课上，在讲原始共产社会母系氏族公有制时，引起右派青年从军学生反感，课后有人在黑板上画了漫画，使俪生感到扫兴。

在河南大学刚刚一年，解放战争豫东战役的序曲就奏响了。1948年远月苑日华东野战军三、八纵队向开封发动进攻，攻城战役历经六天，我和俪生当年都曾打过仗，却还未经历过如此激烈的场面。我家前院就落了两发炮弹，将厨房顶给打掀了，所幸没有伤人。1949日国民党缘军残部据守的最后一个据点龙亭被攻克，军长李仲辛自杀，至此开封获得第一次解放。这次战役的胜利非同小可，是解放军首次攻克一个省城，在当时政治影响极大，但解放军不准备长期固守，决定不久主动撤离。

军管会陈其五同志（清华同学）在和俪生一次长谈后，临别时再三叮嘱：“一定要离开开封，重回解放区去。”不久城工部也发出通知，特邀进步人士嵇文甫、王毅斋、李俊甫、赵俪生、苏金伞等去解放区，可携带家属，但不宜带过多的行李，因为那时车辆短缺。远

月末的一天,我们十几家人,分乘两部十轮大卡车,随解放军撤离开封,辗转向豫西解放区进发。自从1947年与伢生回到西安大后方,到1957年重返解放区,前后首尾十年。这十年我们在国统区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这也是我们为事业打造基础的十年。当时我们总觉得离开了抗日战场,好像对国家和人民做下了什么亏心事,所以在后方工作时,要加倍的努力,才觉得对得起前线浴血苦战的同志们。现在又终于回来了,倍觉亲切高兴。

我们一行从开封启程,先是向南经尉氏、许昌到达襄城。在这里刘伯承、陈毅、陈赓将军接见了我们,然后到中原局所在地鲁山作了将近一个月的休整。嵇文甫、王毅斋等几位先生留在河南,准备筹办中原大学,其余大部分人到华北局分配工作。从孟津渡河后,经孟县、沁阳,开始上太行山。过去我俩在晋西北、晋西打过游击,晋东南没有来过,从感情上说我们爱山西、更爱山西的人民,这次上太行我们都有回故乡之感,心情十分高兴。从晋城、高平、长治到潞城,这正是轰轰烈烈土地改革刚刚过去,正要纠偏的时候。沿途各人民政府行署中又遇到了不少过去的同学与战友。到达黎城时已是愿月份了,记得广播报告新闻,听到清华大学朱自清先生在北平病逝的消息,伢生心里很难受,总想写点作品来纪念他的老师。

渡漳水到涉县,进入河北省境,也开始下太行进入平原。又经邯郸到石家庄,此时正值华北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选举董必武为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的时候。北平“剿总”派出的飞机也几乎天天轰炸石家庄,有时吃一顿饭就要跑两次警报。在这里见到不少同学、朋友和学生,如柯在铄,还看望了闻师母高真女士。小住数日,我们便到北面的正定华北大学报到去了。

华北大学刚刚成立,它是由华北联大和北方大学合并而成的,任务就是为适应全国解放的新形势,培训大批干部。吴玉章任校长,范文澜和成仿吾为副校长。学校设四个部,教务长是钱俊瑞同

志。我们报到后，被分配到第四部——研究部工作，部正副主任为范文澜、艾思奇。这儿人才荟萃，仅历史学方面就有刘大年、叶丁易、王冶秋、荣孟源、何干之、尚钺等。俪生以研究员身份被分配为艾思奇同志的副手，任近代思想史组副组长，秘书为萧前同志。在工作中，艾思奇同志一直对俪生非常爱护。

整个研究部住在正定西门里王宅，那正是我大舅父王士珍建造的私宅，他没有子女，死后家产由过继儿子和三个兄弟平分，土改中充公，这些房屋现在归第四部使用。自1957年离家出走，16年后我又回到故乡。我领俪生回家探亲，我父亲很欣赏他的这位女婿，俪生对岳丈也很尊敬。

这时期北平对石家庄、正定一带的空袭不断，傅作义的部队也曾组织反攻，声言要夺取石家庄。为谨慎起见，华北大学组织了一次部分人员的战略转移演习，大家称之为“逃情况”。我们被转移到邢台，在这里得知济南解放的消息，这对和平解放平津极为有利。我们又奉命回正定，归途路过元氏，这时俪生酝酿已久的一部书《从中原到华北》已经成熟，于是申请留住元氏，得到钱俊瑞教务长的批准。原来这部书是应三联书店邀稿撰写的，旨在向全国介绍解放区新的气象和形势。书稿写成后，我们一家人又回到正定华北大学。手稿交付后，据说由烟台带往大连，途中遇国民党舰艇截击，书稿沉入渤海。建国之初我们在北京科学院工作时，俪生突然接到三联书店电话，意外地提出赔偿书稿费，在当时供给制条件下，俪生不懂得客气也就把钱收下了（具体数目已忘记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也几乎对这件事忘怀了。可是后来在“文革”中，红卫兵批斗俪生的大字报上竟然摘录的是这部书稿的内容，使俪生惊异万分。在劳动时他私下向历史系总支书记王翼洲打问是怎么回事，王说：“你真是个书呆子，那本书稿根本没有丢入大海，而是在你的档案里。红卫兵冲击了档案库，自然就掌握了那本书稿的内容。”

1949年元月北平可望和平解放的局势日益明朗,华北大学受命准备对北平各高等院校的接收工作。在一次会议上,当讨论到陈寅恪先生眼睛瞎了,是否也必须到军管会报到的问题时,俩生与一位领导意见不一致,他举列宁对巴甫洛夫的态度来争辩,带了一些不驯服的口气,于是这位领导借口山东解放区需要人员,调动我们去山东。吴玉章校长对此颇感不妥,派他的勤务员苏春芳同志一路护送我们到济南。沿途尽是南下的大军,炮车辚辚,战士们戴着皮帽子,都是进关的四野部队。

1949年从初春到入冬,我们是在济南度过的。当时的市长姚仲明、文教局长李澄之等同志都给予过我们不少关怀与帮助,我们也以兢兢业业的工作来予以回报。俩生参与了济南市首次各界代表会和工人代表大会秘书处的的工作。繁忙的事务工作之余,俩生专程去南山根一带的“三家村”,拜访了仰慕已久的王献唐先生。王先生当时正处在贫病潦倒之中,诙谐开朗的风格使他俩成为忘年之交。俩生从他那儿学到不少古籍版本学和文物鉴定的知识,弥补了治史的一些缺憾。同时也不断地向省、市领导反映王的情况,使王先生的物质环境和精神状态逐渐改善好转。在此期间俩生撰写了《论中国新史学的建设问题》,发表在《新建设》第六期上,当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文章提出在改造旧史学的同时,必须进行新的通史、新的断代史、新的专史的创建,而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史料相结合,则是中国新史学建设的必由之路。

在济南,我们原来是想重返高教专业的,可是当时这里没有国立的高等院校,纯事务性的行政工作也非我们之所能与所好。于是在钱俊瑞同志的帮助下,俩生又被调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工作。那时科学院刚刚建立机关,俩生被分配到编译局,局长是古脊椎动物专家杨钟健先生,机关设在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二号,我们的家也安在这里。

自入解放区以来,我们过的是供给制生活。平津解放后,入城

干部待遇有所改变,对那些接收下来的专家、教授们最高待遇是每人每月 员肆肆斤小米,折合市价也就是 员肆元之谱。我们算入城干部,俪生的等级是编译,每月 员叁斤小米就算是很不低了。这样全家靠六七十元生活,加之需要添置家具和买书等,日子比过纯供给制并不显得宽松。因此俪生经常利用夜间写些零星论文在报刊上发表,得点稿费,补贴家用。《光明日报》的《学术》周刊便是由丁易和俪生创办的,西城编辑是丁易,俪生负责东城的稿件。他们每星期碰一次面,商量定夺一切编辑事宜。

在科学院俪生是院部学习大组组长并院长副院长学习小组组长,郭沫若、陈伯达、吴有训、竺可桢、陶孟和等均在组内,不过郭按民主人士在国务院学习,陈在中央党校学习,其余在科学院学习。俪生对院长有时以训斥的口吻对待副院长的作风很看不惯,有时憋不住就会在办公室中议论一二,经过别人汇报,便难免得到“影响领导威信”的评语。俪生终因过不惯这种官场生活,上书请求辞职,蒙郭院长手准,我们就这样离开了科学院。临行时,杨钟健先生本着惜才的想法挽留俪生,说了“为名于朝,为利于市”的话,做官、求利均非俪生之所好,故而又恢复走上教学、科研之途。

从 员肆肆年到 员肆肆年的这三年期间,是我们生活中颠沛动荡的三年。从开封到正定、到济南、到北京,真是席不暇暖,光置办起来的家就扔了好几个。但按俪生自己的话说则是:“在开封住了一年,我感到自己的‘宋学’(理学)水平有所提高;在正定住了半年,我感到自己的马列理论水平有所提高;在济南住了一年,我感到自己的‘汉学’(文献、考据)水平有所提高。当时 猿肆岁出头,‘风华正茂’,遇到理想的老师,就如鲸之吸水,巨饮狂吞,而自己的肢体也就在不知不觉中日益壮大。试想,这段自学经历,不就等于住了一次研究生班,或者读了某种没有名称的学位吗?”所以这三年时间虽然不长,但在我们的人生旅程中,确实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四

我们又开始了教书生活，这要感谢艾思奇同志，是他打电报将俪生介绍给东北师大校长张如心，从辞去科学院职务到应聘为东北师大历史系教授前后不到十天。1954年春夏之交，我们全家乘北京开往苏联的国际列车抵达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是一座规模不小的大学，校址在市区斯大林大街与自由大路交叉之处，房屋建筑高大气派，据说这里是过去伪满洲国政府所在地。学校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院部，社科院院长为智建中同志，他还兼任历史系主任，俪生在这里担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给他配的助教是徐喜辰先生。这里文科教师人才济济，中文系有穆木天、彭慧夫妇、杨公骥、孙小野、蒋锡金等，历史系有邹有恒、郭守田、陈连庆、林志纯等，师资阵营比较整齐。长春的住房很宽敞，厨房装有管道煤气，食宿问题比起北京、济南来要方便多了。

俪生工作仍然很忙，又是在大热天光着脊梁看书、写作、备课。这期间他写了不少文章，一本史学论著文集《文史学的新探索》是这时期由海燕书店出版的，同时还出版了《中条山的梦》单行本。我在这年愿月生下我们唯一的儿子赵缙。“缙缙生化”是传统词汇中讲辩证法的对立面的，俪生取之为他的第三和第四个孩子命名。

东北的季节变化很快，立秋以后天气骤然转凉，就在我们愁怅如何过冬时，俪生接到青岛大学校长华岗发来的一封急电，约他速来山大。青岛是俪生的老家，从童年到初、高中都是在这里度过的，他对青岛有特殊的感情，现在故乡在向他呼唤，他心情十分兴奋。东北师大的领导也十分通达地批准了我们的调离，10月我们一家又乘车南下入关。那时正逢热火朝天的抗美援朝，沿途看见一列列的兵车和军用物资运往东北，运往朝鲜。

设在青岛的山东大学当时刚与华东大学合并不久,里面还包括齐鲁大学的一部分人。我们来到时,罗竹风同志已调往上海,赵纪彬先生已调往河南,华岗被邀请到山大任校长,副校长为生物学家童第周和文学家陆侃如,历史系主任为杨向奎。那时老师们除了教学外,主要的任务是学习。记得华岗校长每周星期六下午都要作一次大报告,讲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辩证法等,讲这些都是为了思想改造。

刚解放时山大的马列主义课程开不出来,没有人会教。除了华岗校长一马当先,俪生也就临时滥竽充数了。他开课讲授次数较多的是《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以及《马列主义名著选读》。给整个文科开大课,颇受同学们的欢迎。不久学校组建了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由华岗兼任,副主任为吴大琨、赵俪生、蒋捷夫,我被分配为吴大琨教授的助教,教政治经济学。此后随着陆续培训出来的师资增多,马列主义教研室的工作逐渐走上轨道,我们也结束了这门教研任务,回到历史系本专业上来。

山东大学当年办学以不守旧、趋时而著名。1952年春在提倡开设专门化新课的风气下,历史系准备拿出《中国土地制度史》、《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和《中国农民战争史》三项专门化课来。前两项由张维华和童书业两人承担,俪生接过了这第三项任务,而且上面要求在当年暑假后就开出课来。我作为俪生的助手,和他一块儿全心全意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来。中国农民战争史这一课程在全国来说是首次开创,凡事开头难,草创一个新局面,假如没有牺牲精神,是不会作出成绩来的。记得我俩付出了不少的辛勤劳动,浩繁的资料整理、摘录,有影响的历代农民战争地图的绘制,编辑历代农民战争年表,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理论观点的建树。由于对工作有浓烈兴趣,所以工作进展比较顺利。在这期间我们撰写了不少有关农民起义的论文,试探着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来分析具体的农民战争。俪生对教课是富有经验的,他视上课如



临大敌，课前总是一丝不苟的再三备习，一定作到胸中有数。上课时他则以清晰的逻辑条理，用感情驱动着流畅风趣的语言，来诱导学生们对问题产生兴趣，直到深思。课一开出，就轰动了全校。这样一来，非但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反而招致了宵小之徒的嫉妒与仇视，埋伏下了被人暗算的杀机。

思想改造运动过后，全国又展开了肃反运动，先从基层整起。山大历史系吴大琨教授首当其冲，接着就是赵俪生。经过“群众”的分析、拔高、提炼，结论是“赵俪生是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疯狂向党进攻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我受到的株连就更莫明其妙：“群众”要求开除现行反革命分子家属高昭一的公职，从此财务科便停发了我的工资，真是国立山东大学，就好像是私家开的饭馆一样，这门饭叫谁吃不叫谁吃老板说了算！我们半生的历史比带头整我们的任何一个人都要清白干净，可我们却成了反革命。这件事后来由青岛市委如实地呈报省委宣传部，不久省委的结论下来了：“在多大的会议上给赵俪生戴上的帽子，原样在多大的会议上陪礼道歉、摘掉帽子。”

对比起华岗校长来，我们这点冤屈真算不得什么，他居然也被当作反革命揪出来，最终竟然身陷囹圄，这实在是让我们感到震惊！记得在一次群众揭发批斗会上，他只说了一句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众所周知，山大《文史哲》这个刊物，原本是由华岗带头创建的同仁刊物，最初是以华岗校长自己的稿费收入做基金，历史系同事杨向奎、董书业、吴大琨、赵俪生等，大家凑稿子，不取任何稿酬，慢慢一步步开展起来的，使《文史哲》创出了牌子。然而这时它却成为批判这些开创者的园地，一篇篇大言不惭地吹牛、骂人的文章，给学术界带来了什么呢？除去教人投机、陷害，难道还有什么别的积极意义吗？

自肃反运动过后，我们在思想上起了很大变化。我们已是六个孩子的父母，且已步入中年，埋头教学科研，过苦行僧的日子，得

到的客观效果却往往相反,于是我们便去在物质精神生活上寻找一些慰藉。这时我们搬进蓬莱路一号居住,这是一幢北欧式的别墅建筑,在半山腰上可以俯瞰大海,室内有黑色大理石壁炉,细木地板和护壁,房间多,面积大,在当时是教授们居住条件最好的住所。为了将房间充实起来,我们买了不少的家具。我们在衣着上无甚开支,和孩子们一直保留着供给制时穿破烂儿的家风,然而伙食却不含糊,必须要吃像样的,青岛海鲜多,鱼虾之类饭桌上是少不了的。俪生从王献唐先生那儿学来的一些版本、古董文物知识,现在也都派上了实践用场,他的稿费、工资差不多大多数都送进了书店和古董字画铺。那时在土改、公私合营等一系列运动之后,许多地主、官僚、资本家的私人收藏品在市面上廉价出售,一些有此嗜好的先生们不免去挑拣选购,来点缀自己的居室,我们当然也未能免俗。鉴赏之余,俪生尚不觉过瘾,难免捋袖也舞弄舞弄丹青笔墨,虽在行家把式眼里不免嗤鼻,然自己也每以“文人”字画自娱。再一大癖好便是听戏,当时来青岛港献艺的京剧班子络绎不绝,我们得以有机会尽情欣赏了各流派艺术大师们的表演和唱腔。俪生在看戏上不惜花钱,有时请同事、朋友们一齐看,过后再认真地进行讨论评价,从编剧、唱腔到表演,各抒己见。他对戏剧的欣赏由外行变为内行,甚至当地一些剧团在新剧目的编导彩排上,还要来请他进行指导。俪生还花钱搜集解放前高亭、百代公司灌制的前辈艺人唱片,多达三四百张,闲暇时放来自娱,“文革”中红卫兵勒逼俪生亲手把这些唱片一张张像掰烧饼似地掰碎,那真是在掰他自己的心啊!就在这种玩和娱乐中,俪生也没有把它和学术研究隔离开,而是互相发明,为此他写出了许多有质量的文学、文艺评论文章,得到这些领域内行的赞许。

尽管如此,俪生的气质仍很特别:天生的自由习气,不加约束;神经质的敏感,看事料事透彻;一遇见事就心直口快地发表己见,而这些意见八成又要得罪某些人,这些都埋伏着以后的恶果。

他也清楚自己的处境,迟早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在青岛眨眼居住七年了,也该到大天地里去活动一下了,说不定能痛快地工作。因此俚生向中央专家局申请调动,不计条件,支边也行,因为我们不就是从西北干起来的嘛!重回西北也好,就这样下定了离开故土的决心。

1957年初,高教部调赵俚生支援兰州大学,为了搬家,我们忙活了一两个月,于愿月抵达兰州。那时兰州的城建规模尚十分落后,刮起风来是天黄地黄一片土雾,下起雨来深一脚浅一脚尽是烂泥。兰大当时还在老城西关什字萃英门一带,正在准备向东岗新校迁移。当时兰大的反右工作已近尾声,副校长陈时伟、左宗杞夫妇(化学专家)被当作反党集团首犯正在批斗。我们天真地认为,这次调动也许使我们躲过了这次灾难,事后我们才知道真是太幼稚了。山大多年来一直盯视着俚生的某些人,乘我们已经走开,材料可以随意炮制,他们说,“肃反叫你溜掉,这次你可跑不了啦!”俚生的右派就这样被划定了,时间是1957年秋冬之际,距1957年是一年多的时间;地点是青岛,距兰州则是数千里之遥。直到1958年底,处分才批下来:“撤去教授学衔,降四级,监督使用。”俚生的工资由高教三级降到七级,从1000元降到1000元。被剥夺了教课权,被剥夺了写作权。这两项是俚生的第二生命,这样等于把他推上了不是断头台的断头台。

反右、拔白旗、大炼钢铁……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没完没了,俚生已不再是一个专家教授了,而是一个待罪的囚徒,在艰苦的劳动场所,干最苦的活。一阵风吹来,兰大的文科下马,人员合并到其他院校,我们被并入西郊十里店的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大有旧时代母亲带孩子改嫁“拖油瓶”的滋味。记得那时给俚生的粮食定量是每月100市斤,还不如孩子的定额。学校在河西走廊的山丹县设立了一个农场,那是一片戈壁荒野,没有任何生产条件,声言要白手起家,命名这些黑“五类”分子下去开荒建场。当时,俚生虚

龄源岁,又逢到这样一个饥饿的 员圆年 头。在农场里挨骂、挨打、罚跪是家常事。有时罚三天不准吃饭,还要跟班劳动。他经常在饥饿中苦苦煎熬。就这样他还是改不了读书科研习气,工暇休息时总是一个人读书,作了大量读书笔记。农场同事用“太史公,牛马走”来形容他,寄寓了嘲讽、同情、钦佩等复杂心情。

兰州家中的状况也是苦不堪言。全家的人生活再加上六个孩子上学受教育的费用,仅靠俪生那点可怜的工资来维持。我的工资又停发了,学校既不说是开除,也不说是暂停。为了生活,我的大孩子们在假期只好去打零工,小孩子们则到野地里去挖草根、拾野菜,用来充饥。有一次我吃野菜中了毒,全身浮肿,指甲发紫,头昏眼花,上天可怜,居然没有死掉。更悲惨的事还在等着我,二女儿赵纪在兰大附中高三即将毕业,寒假为备高考没有回家,她在校几乎门门功课考第一,短跑又是校记录保持者,她为人谦和,老师同学们都和她很好,可就是背着父亲是右派的政治包袱。 员圆年 圆月 圆日,刚下过小雪,她和两个女同学散步到皋兰山底,见有地衣(一种可食菌类),于是不知不觉寻捡上山,在老虎口险要处,她和另一女同学不慎滑下山崖,不幸双双殒命。

二女儿意外死亡的事引起到任不久的兰大校长江隆基的关注,他通过省委叫师院党委发急电通知俪生返回兰州。 圆月 员圆日 黎明,有人敲门,我开门看到的是一具骷髅架子似的鬼状人物,披一件老羊皮,说:“我回来了!”这声音我熟悉,我不免失声,这怎么会是我的丈夫呢?!赵俪生是学术界有名的风采人物,人去不到一年功夫,怎么会竟然如此!怪不得事后农场的人纷纷议论:“孩子的死,救了爸爸一条命。”农场已预定俪生为“第四号亡人”。他回来了,木木然地躺在床上,皮贴着骨头,只是有一口气。这口气很宝贵,它说明生命虽然微弱,但还持续着。我很诧异:是什么样的神奇力量支撑着他从河西荒凉的劳改场所徒步走向火车站,是怎样爬上了东归的闷罐子货车,又是怎样在冰天雪地的黑暗之中摸

回了自己的家？我苦思着这股劲儿是什么？可能是一个人的求生愿望无比强大，它征服了所有设下的陷阱，小心翼翼地争取生路，争取生还。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生命之火帮他重新点燃！最初一个阶段，由于虚弱，他似乎没有思想，没有感情，超然物外，大有四大皆空之势，我悟到佛教大概就是从痛苦已极的基础上产生的吧？稍稍恢复过来一点，他就又要读书，读书好像成了他的本能。他把手底下方便的英文版的《王尔德全集》反复阅读，之后开始动手翻译王尔德的《道廉·格雷的画像》。天天持续工作，精神身体日渐好转，转眼书稿译完了，人也恢复了。他事后常对人说：“译一部书，能救下人一条命。”这以后他又写了白话长诗《哭赵纪》，当着全家人朗诵，大家眼里都流着眼泪。

## 五

江隆基校长决心要把兰州大学文科重新恢复起来，这样我们就又回到了兰大。重新恢复后的历史系已是元气大伤，师资不足，江校长指名叫俚生上基础课《中国通史》，从原始社会一直讲到鸦片战争。这门课开了两年半，共五个学期，给 1956 年入校的 1956 届历史系学生打造了扎实的基础。俚生教课任务繁重，除了正式课外，每周还有两次四小时的辅导课，学生对此尤感兴趣，因为它不拘泥于形式，活泼、自由，学生可以随意提问题，教师要在瞬息间思索考虑，即刻作出答复，往往产生新义，连锁反应，以不断引出新的问题。同学们背后常说：“上赵先生的正课有时可以打马虎，但对辅导课一定要抓紧。”为此这班学生对俚生种下了特殊的感情。此外，他又给本系助教们开小课，用对研究生式的方法认真培养，为此花费了很大的精力。

恢复后的兰大历史系，总支书记是王翼洲同志。1956 年春，学校给俚生摘掉了右派帽子，恢复职称的事则暂且搁置。我家经济条件此时十分困难，俚生工作忙，又常饿着肚子上课，熬夜搞科

研,紧缺的食品价钱昂贵,为了俪生和孩子们的营养,我把能卖的都卖了。到最后实在没办法时,只好下狠心将珍藏的珍本书籍拿去变卖,连已懂得爱惜书籍的孩子都哭了。更有乘人之危进行讹诈者,如甘肃省博物馆一职员以向俪生借用展览为名,将我家宋、明、清精品画幅十五轴拿走。事隔一年,由省文化局的一位副局长来家里说了些不三不四的话,他的话是:“什么是右派?就是亏欠了党,亏欠了人民,亏欠了就该补偿,拿你这几幅字画缴公,就算是一种补偿吧。”扔下缘四元的一张支票,扬长而去。我俩相顾愕然,这不是明火执杖地抢劫吗?俪生的牙不好,满口只剩十来个牙齿,因此吃饭、讲课、发音都受到影响,为此住医院进行拔牙、镶牙手术。江校长知道我家经济困难,特批补助费缘元作为镶牙费用,谁料此事竟也在“文革”中成为江校长的罪行之一。一位大厨师咬牙切齿地说,你的狗牙你江爹赏了缘块,他给我们劳动人民一个蹦子来?!中国人喜欢用善恶报应说来宽慰自解,这在总规律上也大致不差,然而在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中却又未必如此,经常能够看到的是好人在哭、恶人在笑。

俪生教完了通史课,随即准备开出专史《中国土地制度史》。系领导的原意是让他开《中国农民战争史》,这对他讲是驾轻就熟,简便省力,但他本人考虑结果是宁愿花大力准备《土地制度史》,也不愿回首《农民战争史》。实际上他是对阶级斗争夸大论的一种逆反抵制。他安慰我说:“只要人还在,我有能力开辟更多的研究途径,不怕别人压制剽窃,他们是压制不住更剽窃不完的。”就在俪生充满信心投入新的科研教学领域的同时,一场史无前的运动也正在酝酿之中。缘年缘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公布,新课刚上满一年,兰大师生就开始轮番下乡,到农村去参加“四清”运动。文艺界也在这年年底刮起了大批判风潮,什么对《海瑞罢官》、《燕山夜话》、《李慧娘》等的批判,成为报刊上最出风头的文章。其他学术领域也不甘落后,一轰而上,气

势汹汹。侬生在 1957 年《青海湖》杂志上发表的《论杜甫的秦州诗》一文，也遭到激烈的批判，说他使用的笔名“鹿其莘”，其谐音是“戮其心”，意思是共产党把他的心戮碎了。其实这个名是自《诗经》“牲 其鹿”中取来的。

1957 年初，侬生就被派到榆中县南坡湾公社去参加“四清”运动，暂时避开了城市繁嚣的文化斗争，而此刻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五·一六通知》下达不久，一夜之间，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小女儿神色恐慌地跑回家告诉我：“不得了了！兰大校园里全是爸爸的大字报，说要把爸爸揪回来交群众批斗。”事到临头我反而冷静了，反正横竖不得免焉，何如硬着心肠去迎接，除死无大祸，批斗就批斗吧！满校园的大字报，没想到我成为最忠实的读者。从贴大字报的那天起，我每天吃过晚饭后，总要一张不漏地看完，我自信能从这字里行间分辨善恶是非、预测形势的发展动向。就在贴大字报的第三天，侬生奉命乘军区吉普车赶回兰州，进门没几分钟，学生小将们便破门而入，反剪着侬生的双手，推搡着带往校部，一路上口号震天。

这场运动开始阶段很有意思，各级领导显然是胸中无数。以兰大而言，一开始校委级领导一致趋向在党员中牺牲一个王翼洲，“权威”中牺牲一个赵侬生，便以为可以向上向下交差塞责了。远月 11 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又使风头突变，不仅揪出了更多的人，而且矛头逐渐指向以江隆基为首的校党委。北京市委垮台的前车之鉴，使省委也无所措手足。为了主动配合、因势利导，于是学习北大聂元梓的样板，在兰大扶植起以历史系学生李贵子为首的一批造反派，准备把兰大党委送上文化革命的祭台。校内运动由大字报、大辩论开始，升温为武打式的斗争会，许多人经受不起这种身心交加的摧残和污辱，纷纷自杀或逃亡，江隆基校长就在这种形势下自杀身亡。侬生常说平生遇到过两位好校长，一位是开创新山大局面的华岗，另一位便是振兴兰大

的江隆基。两位校长无论从修养学识到人品风格,都堪为师表,然而两人的结局和下场又都是同样地无情、酷烈。

俪生的罪责虽然有增无减,但随着“文革”运动斗争的扩大化,相对的压力却在减小。对那些造反派——后来的红卫兵,我们深为他们的幼稚、无知,被政治利用后形成的病态疯狂而痛心。客观地讲,他们中的许多人天良并未泯灭。以俪生言,在批判斗争间歇,有人会悄悄地端来一杯水,有时甚至是一杯糖茶;同样五花大绑的绳子,他的却是虚绕着;几次最酷烈的武斗,在开打前总有人大声吼着,叫赵俪生这个老家伙滚蛋,驱逐出现场以避皮肉之苦;我们最感激的就是“文革”伊始他们就以“兰大革命师生”名义把我家的书橱、书架、画箱等全加上了封条,文革浩劫,我家的书画没有损失,全赖这些封条作了护身符。

被揪出来实行专政的人越来越多,为了加强统一管理,为他们设置了隔离禁闭的“牛棚”。俪生被拘留关押在一间空教室里,和其他“牛鬼蛇神”一起集体生活、劳动,叫这些人互相揭发、互相作贱。俪生的工资停发,按家属人口发生活费,记得当时按四口人计算,我家只领到 15 元钱,除了维持最低生活外,可说是一无所有。俪生又干起了劳改活儿,我每天看见他拉车子,一车车的砖、瓦、石子按定量完成,此外还要打扫厕所、挖粪、拔草等。这时期我的子女们也都支边的支边、插队的插队,最后只剩下小女儿在家上学,与我相依为命。

到 1973 年底,林彪又要拿人民练兵了,扬言外蒙、苏修要入侵,搞所谓的军事行动大疏散。兰大军、工宣队下令:“限一周之内,大家都要离开兰州,有亲投亲、无亲投友。”我们要求到贵州息烽大女儿那里去,蒙格外开恩,批准俪生请假一个月,送我和小女儿一同走。贵州这地方虽有“地无三里平”之说,然而到处都是绿水青山,风景很是优美,到处开遍山花。俪生的假期很快到了,他又得重回兰州,到兰大新办的永登县“五·七”干校去接受劳动改



造。

1954年缘月的一个黄昏,我接到一封俚生从兰州拍来的电报,看了电文,一家人都惊呆了。兰大革委会积极动员老教师退休退职,俚生不够退休年龄,就动员他退职。在政治高压下,他只好服从领导的意图,办理了退职手续。我心急火燎地赶回兰州,俚生没在家,正在办理回城手续的儿子说:“爸爸前天被永登五·七干校的人给带走了。”当时又在搞什么“一打三反”运动,干校又贴了他的大字报,抓他回去批斗,实际上是嫌他不赶快离开兰州。我在家等他归来。他终于给放回来了,气色很坏,他对我说:“我只能很快地走掉,走得远远的,离开这个地方,精神也许才能舒坦些。”我深知就是用退职的代价也赎买不了那被批斗的代价,他还是抱着幼稚天真的想法。在这一点上他白学了历史,还没弄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含义。就这样他拿着我俩被注销转移的粮户关系和两年薪金的退职费,源源元人民币,匆匆离开兰州,往贵州而去。我留下来对尚留在兰州的一儿一女进行善后处理工作。承蒙革委会还算客气,给我们留了一间五平方米的土坯房,这里成了我所有家私的堆栈,和我一双儿女的栖身之地。

像这样凄凉仓惶离开兰大的也非我一家。儿子在校园里遇见数学系主任周慕溪先生,他家属远在上海,退职后孤苦一人背着沉重的行李去赶火车。出于同情,儿子主动替他背起行李,扶着他蹒跚而行。在马路边休息时,周先生苦笑着指着手杖上雕刻的一只蝉,说:“人家都说我周慕溪心理很阴暗,连手杖上都落着一只大苍蝇。”周先生终于回到了自己渴望已久的家,大约半年后接到他儿子的信,告知老人溘然长逝的消息。

料理好兰州的一摊子,我又匆匆赶去贵州。在息烽,我们又开始了新的生活。当年大女儿大学毕业后支援三线建设来这里的拖拉机电机厂当技术员,她把妹妹赵红也接来当学徒工,在这里,我们又组成一个小家庭。每天的家务事做完或是吃过饭,我和俚生

就到处散步游玩,贵州确实风景如画,闭塞的田园村落因山势自然错落有致,一个个恰如《桃花源记》所描写的模样。我们常坐在高高的铁路路基上,观看夕阳落山的景色,“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确实是这一带的真实写照。然而这里也并非世外桃源,远在数千里之外,兰州的一双儿女经常使我们牵心挂肚,跟踪而至的大批外调人员,也增加了厂里两个女儿的政治压力,最重要的是靠着那点坐吃山空的退職金,还能维持多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压力也就越来越大。人到绝处,或逢生或走险,这是必由之路,退職快两年后,俪生决定到北京去上访。

1984年怨月,俪生到北京,住在兰大物理系毕业生于尔果家里,于同学不仅接待了他,还帮俪生谋划了一切。俪生将简历及退職前后经过,简明扼要地写出来,交给“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文革联合接待站”。出乎意料,这份材料竟得周总理亲自过目,很快总理办公室专为此事给甘肃省革委会发出一份《便函》。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甘肃的冼恒汉不得不将这件事抓起来,尽管兰大和历史系领导们一再推委拖延,也最终在10月国庆节后正式宣布赵俪生复职。按中央规定,退職期间工资照发,累计扣除退職费源444元,还补发了两个月的工资。这件事对我们一家人说,是件大好事,我们将永远铭记在心。

此后俪生又先后参加了历史系《古代十大战例》的编写工作、西北三省(陕西、甘肃、新疆)五校合作搞的新沙皇侵略我国西北地区历史的研究,都是投入的精力很大,得到的批判也最多,“赵俪生是苏修大特务”的帽子便是此时背上的。俪生已将届花甲,负荷能力差了,很快身体渐感不支,心血管病也明显显示出来。系领导又一次动员他办理个“编外”手续,给八折工资,实拿源444元,不致没有饭吃。就这样,他再一次退出历史舞台。回到家里也好,至少不面对着重重难解的矛盾,剩余的精力还可漫步于学林、书海之中。在这期间他完成了《中国土地制度史》的写作,业余对《聊

園隱

斋志异》的重要篇章进行了剖析，并写出大量的论文。他悲观地估计此生所有已完成的著作不会在有生之年公之于世了，于是在书稿后面写下“篱槿堂遗著”字样，由此讹传到社会上，不少友人还以为他业已去世，屡有唁电、唁信到来，在学术界传为佳话。

“四人帮”终于被打倒了，“文革”也终于结束了，随着国家形势的好转，我们的家庭也逐渐有了起色。我的一双在兰州当工人的儿女，~~1977~~年分别考取了兰州大学历史系和外语系，儿子学历史，小女儿赵结学外语。我对他们讲：“按年龄，这次大学考试对你俩说是最后一班车，你们凭自己的能力挤上去了，但不要满足，你们已经被耽误得够呛了，儿子开始上大学的年龄 ~~19~~岁，仅差一年，就是你们爸爸进大学当副教授的岁数，而你们才开始读大学一年级。要加倍努力，弥补已失去的时光。”一年后我那贵州当工人的女儿也考取了兰大外语系的硕士研究生。

最感兴奋的是中央领导决定，给 ~~1978~~年划右派的事重新甄别、改正。我们目前是在兰州大学，而当时被划右派是山东大学搞的、山东省委批的，所以在改正问题上还是遇到很多曲折。甘肃省平反工作上做得利落、快当，而山东那边却迟迟不动，脚步很慢。但不管怎样，生总算熬到不情愿地给他卸下政治枷锁的这一天。那时我们全家人觉得如同久禁的囚徒，突然窥见了明亮的天空，其兴奋程度确实难以言表。但反过来深思，这苦难的 ~~19~~年，我们有啥罪呀？我们侥幸看到了这一天，那些屈死的冤魂们呢？

由于政治上的初步松动，兰州大学决定让俪生招收研究生。俪生原本是“编外”人员，哪有资格招收研究生？一天在路上遇到教务长崔乃夫同志，招呼俪生准备招生，俪生回答说：“我是编外人员，没资格招生。”崔笑着说：“书呆子！编外编内不就一字之差嘛。”俪生于是下决心一次招收两个专业的研究生，即《中国土地制度史》和《中国农民战争史》。全国招生，考试结果，录取了七名学生，土地制度史五名，农民战争史两名，合编为一班。基础课、专

业课全由俪生一人独自负担，从讲授、到辅导、到科研，他全力以赴，辛苦极了，他又开始了不要命的工作。每逢上完三节课回家，即便是隆冬季节，他的衬衫、衬裤都被汗水湿透了，每次下课回家都得换内衣。名义上是七名学生，其实教室里挤得满满的，学生们为了听课都预先去占座位，这样他不是讲小课而是开大课，那时所有的文科高年级大学生及新入校的文科研究生都来听他的课。

从带研究生到研究生毕业，整整三年，在这三年里，俪生不辞劳苦，昼夜忙碌，总想更多地为国家、为人民多出一份力，多培养出几个学术人才。回想 10 年的岁月白白流逝，人生有几个 10 年呀！他从不考虑个人得失，他也很清楚自己处境维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树人谈何容易，打马虎眼走过场确实容易，就是一丝不苟、认认真真难，所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学生服务，俪生当之，庶几无愧！

在经历了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的风波之后，俪生的研究生及子女都被分配到四面八方。人去楼空，剩下的依旧是那寂落冷清的作坊“夫妻小店”。伤心之余，俪生从此下决心再也不带研究生，但却也禁不得系上一再把别人的研究生寄在他的名下。教学不仅是他的职业，也是他的生命，只要有精力，他总要支撑着去给学生们开点课，不是去向学生陈述什么教条、旧知识，而是用他那总是走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和感情，去激发年轻人对专业的热爱、对历史的反思、对文化的继承和弘扬。

历史系的天地太狭小，我们也该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舒涣一下身心，何况中国原本就是当客人容易、做主人难。于是我陪他到社会上走“江湖”，应各大学之邀，到处讲学。这样，一方面可以把他的学术思想和成果扩大到更大的空间，接受实践经验，反馈总结提高；另一方面可以考察研究一些问题，包括学术的和大学教育体制的，等等。计到过的学校有：山东大学、河南大学、郑州大学、苏州大学、杭州大学、杭州师范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大、复  
猿园

旦大学、青海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湖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四川西南交通大学、湘潭大学……。

在这期间，山东大学为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原拟将我们再调回山大，可是甘肃省委副书记刘冰（原兰大党委书记兼校长）抱着爱才的想法说：“我在甘肃一天，你也得在甘肃一天。”兰州大学也有意将俪生竖为文科学术带头人，屡次向教委申报博士点，可是最终皆以“人缘”之故未获通过。有一次，~~员~~袁个评委竟投了~~员~~袁张弃权票。假如无人从中作梗，怎会产生这么离奇的事？对此我们以东汉古文经始终“降在小学”的待遇来宽慰自己。就在研究生毕业离他而去的那一年（~~员~~袁年），俪生自己的学术科研也达到高潮，当年各种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达到~~员~~袁篇的记录。~~员~~袁年，就在他的三女婿倪逸家因病去世前后，他又积极响应教委号召，招收了来自各地的年轻教师，举办了助教进修班，以对待研究生的标准严格要求，并开出“绝唱”式的大课《中国综合文化史》，结合当时社会上的“文化热”，他在开宗明义的序论里指出，政治气息过于浓厚而学术空气过于淡薄，发展的趋势势必是虎头蛇尾。他提倡还是应当多从中国的文化传统以及继承与扬弃的关系中去提高认识能力，他对原始思维、迷信与科学、宗教哲学与美学、从孟子到王阳明对主观能动性的弘扬等一系列命题，提出自己多年来独到的见解。课开出后，又引起轰动，当时来听课的学生又是人头攒动，教室总是塞得满满的。

人过~~员~~袁以后，体力精力明显下降，科研和教学应该让年轻或更年轻的人去扛梁顶柱，俪生的离休终于也获得批准。~~员~~袁年~~员~~袁月，兰州大学和历史系联合为他隆重地举行了“祝贺赵俪生教授从事学术~~员~~袁周年，从事教学~~员~~袁周年”纪念会。各级领导、同事和学生们济济一堂，对他所从事的教育和科研事业作出了充分的肯定，这对我们含辛茹苦的历程来说，终于圆满地划上了一个句号。

## 六

现在我们双双离休在家,享受着颐养天年的清福。俪生仍免不了读书写文章的习惯,然而随着衰老,效率也是越来越低了,他也有时因此而急躁。入老以后,俪生的文风越来越凝练,文章短小精干而且通俗易懂,这庶几可以为时下年轻人文章越写越长、越写越晦涩提供某种借鉴和参考。俪生一辈子不沾染吸烟、打牌、下棋、气功等活动,惟嗜喝茶,进餐时偶酌绍兴黄酒数盏。老来尤以书法自娱,开始时写些条幅、中堂,到现在只写大字对联了。每有亲朋索要,总是很高兴地即兴挥毫相赠,这也成为他惟一锻炼身体的方式。

俪生从年轻到老脾气甚急,有时候暴躁,似乎是有周期性的,所以往往在对待外部事务上,不该忍的他忍受了,却又在该忍的时刻他又爆发出来,这样他便得罪了許多人,其中包括朋友和亲人。理解他性格的人宽容了他,不理解他的人却难免耿耿于怀。我常和他开玩笑:“换了我,谁也很难侍候你一辈子。”我这辈子也经常和他发生争执,但是我知道他这个人绝无害人之心,他的心地是善良的。说实话,我们不像夫妻,而像朋友、同学或兄弟,经常总是一块切磋琢磨问题,不会卿卿我我,这可能是我们从事的职业以及苦难的经历,铸造了我们这样的生活风格吧!到老来我哑他聋,在交流上增添了一些障碍,也经常因误会弄出些笑话,但彼此之间还是心领神会的。

我来谈谈我对他的认识。俪生是个天生的自由主义者。说天生不是指先天遗传,而是生就他的社会时代氛围,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形成的新思潮。千百年来钳制中国人民的封建专制,抹煞了人的个性自由,“五四”像决堤洪水冲刷而过,使觉醒的人们思想一日千里地奔涌。俪生憎恶烦琐的教条主义,并以自己学术不断的更新来予以抵制。尽管在客观现实面前,他也为此付  
猿

出了惨重的代价,碰得头破血流,但他那个性自由分明的棱角最终也未被磨光磨平。

在思想上侂生又是一个人人文主义者。他憧憬司马迁父子所理想的“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也真诚地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政策,渴盼以学术思想带动起社会宽容、理解的气氛。人们在权、钱、物、欲面前的障蔽太多了,想凭着摇头摆尾的几首流行歌曲、撕胸裂肺的几部言情小说、玩世不恭的几出“痞子”电视、滔滔雄辩的几场现身说法,就想砸开这冷漠的链条,那是幼稚的,甚至是虚无的。侂生的人文主义不是来自西方,而是根植于中国大地,人际间和谐宽睦的认识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思想体系里就已具备了,到董仲舒“天人合一”,更把人、社会、自然三位一体的和谐平衡关系通过政治表达出来,而从孟子到王阳明更以调发本体良知良能,充分发扬人的自我主观能量去改良社会。这些线索应该就是我们东方中国人传统中的人文主义。在这一点上侂生与“新儒家”观点有相似之处。特别是与梁漱溟、熊十力每有契合,而与他的授课老师冯友兰则相去甚远。尊重个性,倡导人们独立思考与实践的能力,充分发挥个体人在社会中的创造作用,并承认和尊重这种创造价值,这才是本质意义上的人文主义。

侂生又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毕生研究顾炎武,并以之为楷模,这不仅仅只是钦佩他学问“知”的广博渊大,更钦佩他为理想而终生执着于“行”的务实精神。侂生就是秉承着这样的原则,孜孜不倦地开垦着一片又一片的园地,把对真善美的追求化作理想事业,忘我地工作、认真地写作、卖命地教学,在实践中化作一种无私、自觉的敬业精神。他从文学跨入史学,又从史学涉向经济学、哲学,最终把自己融化在文化的海洋里,无有止境地前进,从未想到停下脚步去占领一座山头、一块阵地,来为自己树立门户、经营地盘。为此他受到讥笑嘲讽,但他依旧我行我素,不予理睬。道不同不相为谋,理想在前方召唤着他。

以上述三种思想为脊柱,构成了俪生的人格,如果套用中国哲学术语,把这人格称之为“内”的话,那么那个“外”又是什么呢?我觉得那应该就是俪生的学术风格。

俪生治学宛如一位上乘厨师,同样的材料一经他手烹调炮制,味道就是别有其风味。这种与众不同的根谛何在呢?那就是刀案工、火候、水温、油温、时间、佐料、调料等技术处理手续。你会说“这些我都知道”,但操作调动起来却未必如此。人们思考问题,通常只调动起大脑皮层某个区域或部位的兴奋,却使另外的区域或部分处在休眠状态,故沉潜者往往有竭泽而渔的功力,然却无情,高明者往往有纵横捭阖的法术,然却无义。俪生对此皆不以为然,他于教学科研,既以现实主义的严谨去进行缜密的逻辑推演、高度的抽象思辩,又以浪漫主义的热情去调动活跃的形象思维、超时空的直觉感觉,从那些没有生命的材料符号中去扑捉“象”和“情”。即便是相像的思维程序,到头来俪生与人仍是不同,那只能归之于模式的不同,终结点上的模式便是支撑俪生的那条人格脊柱,上乘厨师终结点的与人不同,就在于他能全身心地体验色、香、味——真、善、美的和谐统一,刻意工求那是绝对办不到的。这就是俪生在学术上不畏扼制的底牌,同样这也是俪生在教育上无私奉献的底蕴。历史资料是死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它们又都属于公众,不是某人某家所能专擅独揽的,只有思维灵感那才是个人的专利,也是任何人或势力所不能代替或抹煞得了的。因此他深信把金针悉数度于学生弟子,只能使百花园地更加斑斓多彩,百家之堂更加人才济济。而赵俪生也终归是赵俪生,像一颗流星一样,自有他闪烁、运行、陨灭的轨迹。我很拙钝,实不能传达俪生一生的业绩,拉杂写来,仅供大家参考。



# 杂诗丛残

## 第一丛摇白话新诗（五首）

### 小旗手

摇摇摇摇您瞧，那个小女孩子，  
摇摇摇摇顶多也不过十一二，  
摇摇摇摇背上拖着一支小毛辫子，  
摇摇摇摇绑一点头绳，  
摇摇摇摇枯瘦成那个样儿。  
摇摇摇摇就不说她应当吃点大肉丸子，  
摇摇摇摇（像晋惠帝所“指示”的）  
摇摇摇摇至少也该到学校里去识几个字儿。

摇摇摇摇可是您猜她干啥啦！  
摇摇摇摇天不亮就从宋门跑进城，  
摇摇摇摇一直跑到南京巷的轿铺门口，  
摇摇摇摇等着，去抢一柄清道黑虎旗。  
摇摇摇摇我几乎天天看到那个女孩，  
摇摇摇摇那么严肃地捧着竹竿，  
摇摇摇摇随了锣鼓，  
摇摇摇摇一溜小跑把新郎送到岳家，  
摇摇摇摇或是把一具龙头罩引到曹门外去。

摇摇摇摇不管人家欢笑地带了缎花，  
摇摇摇摇或是在白布“搭头”下哭得死去活来，  
摇摇摇摇——她总是同样严肃地  
摇摇摇摇摇摇从事于她的职业。

摇摇摇摇每次我坐了包车上下班，  
摇摇摇摇一看见她就像做了什么亏心事。  
摇摇摇摇但这几天听说城壕外头在拆房，  
摇摇摇摇我也就再没有看见过她的影子。

灵隐元年开封

## 山摇茶

摇摇摇摇半年前我就眼巴巴地盼着你，  
摇摇摇摇你却有意延宕地不肯放开花苞；  
摇摇摇摇我甚至担心你会含苞而萎，骗我一场，  
摇摇摇摇谁想你是在锻炼和折磨我的急躁。

摇摇摇摇清明前后，你一口气开了九大朵，  
摇摇摇摇还有十几朵想来也擦不过旧历的三月末。  
摇摇摇摇可怜你的瓣儿在苞内受了过久、过紧的束缚，  
摇摇摇摇初开时它蜷屈、紫黑、而不伸展，  
摇摇摇摇可是三天过后它们就都恢复了应有鲜艳。

摇摇摇摇硃砂般的颜色那么深沉，  
摇摇摇摇层层的花瓣儿，纤纤的花瓣筋。  
摇摇摇摇像芍药，芍药比你香得浮躁；  
摇摇摇摇像芙蓉，芙蓉又比你孱弱小巧。

摇摇摇摇你茁壮、浓艳，不靠香气向人们夸诱，  
摇摇摇摇默默地在书房里伴着书香向主人点头。

灵苑年 源月 愿日

## 我爱小港

摇摇摇摇人们喜爱汇泉和燕儿岛，  
摇摇摇摇又爱海滨公园，也爱栈桥；  
摇摇摇摇我爱小港。

摇摇摇摇不错，这儿有些个尘土飞扬，  
摇摇摇摇有些个繁嚣，也有些儿肮脏，  
摇摇摇摇但它更贴近普通的生活。

摇摇摇摇这里有成箱成篓的咸鱼，  
摇摇摇摇不管它多么臭气熏天，  
摇摇摇摇煎一煎，烤一烤自会香味扑鼻；  
摇摇摇摇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家常用具，  
摇摇摇摇从三担水打不满的水缸，  
摇摇摇摇到石匠们一凿一凿就的蒜锤和蒜臼子。

摇摇摇摇这里有麻袋、苇席、草绳、石灰，  
摇摇摇摇也有一群群黑色和白色的毛猪，  
摇摇摇摇被用卡车和网套运送到西岭上去。  
摇摇摇摇冷藏车自对面开来，  
摇摇摇摇里面是包装停妥的肉品和“下水”，  
摇摇摇摇送到各个销售和出口的部门。

摇摇摇摇这里有整排整排的大帆船，  
 摇摇摇摇从阴岛、石臼所、海州等处开来，  
 摇摇摇摇船头上贴着红春联，祝福风平浪静，  
 摇摇摇摇桅杆上挂着小红旗和风铃，叮当作声。  
 摇摇摇摇唐朝的诗人说：  
 摇摇摇摇“一铃犹独语，  
 摇摇摇摇颠风当断渡”，  
 摇摇摇摇不到小港你不知道这诗韵的真实。

摇摇摇摇再还有火轮船——客轮和货轮，  
 摇摇摇摇它们有的来自外国的港口，  
 摇摇摇摇它们在跟杜勒斯的“禁运”政策搏斗，  
 摇摇摇摇增加中国血液在世界脉管里的交流。  
 摇摇摇摇海鸥呀呀地叫着，  
 摇摇摇摇在甲板四周盘旋飞翔，  
 摇摇摇摇它知道甲板上会有面包屑，  
 摇摇摇摇而没有射杀的汽枪。

摇摇摇摇每当落日一片殷红，  
 摇摇摇摇在水平线上滞留着半个脸孔，  
 摇摇摇摇小港内的一切都拖上一条深灰色长长的阴影，  
 摇摇摇摇水纹像木刻家的雕刀刻出来的，  
 摇摇摇摇一条宽、一条窄，一条暗、一条明。  
 摇摇摇摇突然长啸一声，  
 摇摇摇摇又一只轮船入港。  
 摇摇摇摇身后拖着一片郁勃的烟云。

灵峰年 源月 园日

## 再哭赵纪

—

摇摇不止一个人曾经善意地告诉过我，  
摇摇要我在漫长的岁月里把你逐渐忘记；  
摇摇他们又劝我把“孬娃”们好好地扶养起，  
摇摇（这自然是我的天职）  
摇摇用她们的安慰来冲淡对你的记忆，  
摇摇孩子（我们爷儿俩背地里偷说一句），  
摇摇这算不算得上是人性的残酷？！

摇摇自然，我并不想把你当成一个沉重的包袱，  
摇摇像讽刺画里背起山岳的那副怪样子。  
摇摇你已经先我一步，到达了宿营地，  
摇摇我又何苦人为地制造许多痛苦，当作包袱，一直背到有  
朝一日，  
摇摇我们会在一个什么地方重逢再遇？！

摇摇但是，孩子，你确实是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摇摇你离开我们，未免过分地急促？！  
摇摇哪怕只叫我们到医院中探望你一次病，  
摇摇哪怕让我们给你嘴里倒进一 悦的酒酊，  
摇摇哪怕给你的脉管里输血一小瓶，  
摇摇哪怕只让我们听到你弥留之际的  
摇摇一句隐约不清的呼叫、关注、留恋，甚至是一点遗憾之  
情，

摇摇——那我和妈妈也会比较地平静，  
摇摇也不会像今天这样经常地不能平静。

## 二

摇摇是印度泰戈尔的一首小诗，  
摇摇我们女作家谢冰心翻译过来的，  
摇摇说一世纪后有那么一个女郎（为了纪念诗人），  
摇摇在自己的洋台上，她点起来一抹灯光。  
摇摇可是孩子，即便我有一座洋台，  
摇摇你能不能看到我的灯光（从另外的一个世界）？！  
摇摇也许，我不一定要刻板地那样做，  
摇摇要想你的机缘，在我身边并不难于寻求；  
摇摇我可以写一本书，画几幅画，  
摇摇做一首到一百首、一千首的诗，  
摇摇来加固人们对你的记忆。  
摇摇可是孩子，这对于你那确实过早的离去，  
摇摇究竟何济于事？！

摇摇说来说去，总嫌我的脑袋太拘泥，而且冬烘，  
摇摇不能把失却爱女的父母的那一片想念之情，  
摇摇叫它在心头上存在得那么真纯、那么空灵、那么虔诚，  
摇摇像洋台上——冥冥中点起来的那一盏灯。

一九九〇年 远月 愿日

## 咏法国画家莫耐的一生

摇摇你早年的风格那么精严，  
摇摇二十五六岁的人，心胸才刚刚开展，

摇摇你就用库尔贝的恬静、马奈的热情和色彩的鲜艳  
摇摇去拥抱阳光——  
摇摇在钟楼上、顶楼上、船帆上，  
摇摇在人影历历的方场和红紫绚烂的花坛上。  
摇摇你在画面上拖绘出一条条黄色的带，  
摇摇叫我们亲耳朵听到了鼓风猎猎的海。

摇摇中年三四十岁，胆子更大，技法更准，  
摇摇你的画面就如盛夏中万木葱茏的树林。  
摇摇那强烈阳光下塞纳河对岸耀眼的倒影，  
摇摇那泰晤士河桥边西敏寺尖塔上阴暗的初冬，  
摇摇那些愉快的游艇和水面上的光影重重，  
摇摇一排排绿树，一排排暗影  
摇摇——你——将它们收进了你的画中。

摇摇从日本人那里，又复感染到用色的泼辣和浓重，  
摇摇你把它们——一点上了山鸡的彩翎。  
摇摇你从笔底下涂出了——  
摇摇摇日出时光影的橘红，  
摇摇摇田野中罌粟花的朱红，  
摇摇摇深草丛里读书人身旁的浓绿葱葱，……  
摇摇还有那裙裾上的夹绿夹蓝，其中色调的沉潜  
摇摇充分衬托出了你妻子卡密尔的阴沉和娇艳。  
摇摇更难得情如手足的雷诺，  
摇摇他，作为一个画家，跟在兄弟画家的背后替他留影，  
摇摇描写他在画室里，游艇上，花园中，  
摇摇一头蓬发，一部大须，  
摇摇衬托出一幅伟大智慧者满有风趣的面容。



摇摇在老年你有了年寿带来的成熟，  
 摇摇笔触里含蓄了仿佛无限的严肃和静穆。  
 摇摇你写海边嶙峋的岩壁，  
 摇摇摇写哥德式教堂的建筑，  
 摇摇摇写威尼斯的河街，给画布蘸饱了湛蓝颜色的宁谧。  
 摇摇直到你生命的最终，从你的作品里  
 摇摇看不出塞尚的故作颠狂，和梵·高的有意乖僻。  
 摇摇你使用了师友毕萨罗的斑斑点点，  
 摇摇它们那么枯涩，可又那么酣炼，  
 摇摇使人记起中国金陵城中潜修的龚半千。

摇摇我们已经隔代，  
 摇摇你跟我的爷爷在道光年间一起出生到人世中来。  
 摇摇由于你的高寿，当你向人生辞别，  
 摇摇那时节，我已经在高等小学里肄业。  
 摇摇现在转眼我也到达了我的中晚年，  
 摇摇才得从一种巴黎版本中读着你平生作品的选刊。  
 摇摇在我“揽揆初度”的这一天，  
 摇摇我极其偶然地领会到你的神髓，  
 摇摇（至少，在我自己的感觉方面是如此）。  
 摇摇由于这一点点感受，仿佛给我的体劳神疲，  
 摇摇注入进来无穷无尽的志趣……  
 摇摇你不相识的异邦异代的画人哪，  
 摇摇我该怎样地感谢你才是？！

1995年 远月 愿日  
 夜于兰州十里店

## 第二丛摇西和炼铁杂诗（十六首）

### 无题诗七首

一

斯是古仇池，氏羌互争歧。蜀图中原地，诸葛六出此。  
街亭去不远，祁山堡垒遗。身在此山中，四望方向迷。

二

西和佳胜地，烟酒著陇蜀。獐麝驰山麓，芝草出幽谷。  
太古此多犀，遗角犹在畦。于兹劳动久，临去难舍离。

三

江水何溅溅，林木何葱葱，羊肠何崎岖，宛入武陵境。  
山花戴露艳，炼烟入夜浓。黎明古树下，铁水正殷红。

四

朝露化作雨，淋漓沾我裳；泥泞何滑达，负重觉路长。  
回看民工队，麻衣黑馊粮。童稚或无裤，伐木送柴忙。

## 五

山花有红白，山花有青紫，山花有绿色，莹莹如美玉。  
大如小锦葵，小如大雏菊。婀娜似芙蓉，袅窕如罌粟。

## 六

阴雨兼旬日，今朝喜放晴。上流水暴涨，江浪滚滚流。  
牧童多讴歌，抑扬动人听。土语苦不解，辞意终难明。

## 七

炉火正熊熊，炭花舞夜空。炉头司料勤，炉口钢钎劲。  
六人鼓风班，鼓风声轰轰。山头月更小，不觉夜影轻。

## 告别庙台子

来居庙台子，倏忽二十天。山中风雨骤，临去增怅然！  
我来江水清，雨暴涨水浊；我来树青葱，而今半黄色。  
青黄相掩映，川原何潇洒！坝上筑炉群，式样各不同。  
群各策群力，铁水不畅行。究根虽多种，燃料供不应。  
既乏煤与焦，木炭势又穷。此穷而之他，远行去老林。  
原始森林木材多，源源鼓铸不虞贫！  
明朝将上路，今夜仍鼓铸，黎明仍值班，风寒衣单不畏惧。  
初离金城时，炼铁期一月；后改五十日，而今无限扩。  
风雪山林中，妻孥应念我。远寄诗一章，权当相慰藉。  
炼铁任务完，自当复相聚。灯下倚暖炉，共话山林趣。

## 青羊看山诗七首

一

越岭到陇南，步步是新山；云雾蒙峰顶，树顶如点园。  
始悟米襄阳，画法有本源；不然大小米，何以千古传？

二

沿路看山壁，裂缝处处新：缝纹如蛇曲，曲曲似绳纹。  
始悟古皴法，笔笔皆有根。谁云清湘古，我说石涛真。

三

地面如雾白，山顶雾昏黑，如入妖幻境，伸手不见掌。  
下有羊肠路，盘盘九十九。俯听涧底处，只闻人语响。

四

画家李可染，尝写略阳图。我来颧水河，饶有画中趣。  
四围山势陡，市廛屋瓦密。颧水滚滚流，流向嘉陵去。

五

雄雉振翎鸣，雌雉藪中应。啼声何躁急，幽谷失沉静。  
红叶已满山，青松相辉映。徽、成去不远，山景更佳胜。

六

黎明散工回，晚月亮如□。层峦争嶙峋，薄雾成烟障。  
树叶尽黄枯，坚冰随雪霜。翘首念妻子，羁客思还家。

## 七

一路泥泞去，归人尽杖行。麦苗展新绿，莽稽尽鲜红。  
云雾锁峪口，冰雪峰顶凝。雉鸡啼不断，依依难舍情。

## 闻郑振铎先生堕机失事

沪上静安寺，庙弄有幽居，先生尝居此，反日收古书。  
戊年初访谒，于今一转支！伟岸目矍烁，慷慨健谈姿。  
架上多冥器，累累如墓墟。丑年初解放，先生过济南，  
逆旅偶握见，馆名石泰岩。翌年在北京，文物在团城，  
院中古柏静，室内列鼎钟。先生导我游，宣册题姓名。  
斯后未再遇，忽忽又戊年，突闻堕机事，能不伤我怀？！  
近年报刊上，时时读鸿文。曾序汉卿剧，新说足重论。  
未及相质证，先生已千古。山中闻噩耗，木然无所已……

## 第三丛摇山丹下放杂诗（二十首）

### 初饮祁连雪水

祁连雪水汇成塘，微夹泥沙味甘芳。  
何日烹茶得一酌，宛然身在历下堂。

### 坞摇壁

一入凉州界，居宅触目新：黄土筑高墙，四角如斗樽。  
房舍与庭院，隐隐在其中。或筑望楼堡，枪口凛然存。  
仅留小窄门，略与外人通。我国四合院，想从此滥觞。  
遥想东汉末，陇人来居停；各各筑坞壁，或即此制形。

### 见旋风柱

九日九场风，十日十无雨；东风才吹罢，西风平地起。  
晨昏履薄冰，当午汗浹背。坐看长城下，旋风遍地走。  
三五如天柱，上矗重霄九。

## 听鸟语

天色昏黑未黎明，垆上百鸟已喧腾。  
 鸿雁嗷嗷起复落，瓦雀啁啾傍田塍。  
 最是鹁鸪声嘹亮，衬得雉鸡远啼轻。  
 可怜绅商笼蓄鸟，何如老农耳底聪。

## 山丹一片月

山丹一片月，夜溲起乃见。我心随月色，东去十里店。  
 东苑三□一，儿女睡正酣。老妻爱勤苦，灯下犹织编。  
 四壁橱与架，藏书尚安然。稍稍沾尘土，事势所不免。  
 溲罢不成寐，反侧复辗转。

## 浇水遇大风雪

暴雪狂风双目迷，圈腮冰结腮不知。  
 壮伙足蹬长橡履，老龙身披白毡衣。  
 百里祁连水滚滚，冰雪凝块似黄泥。  
 顿知水利灌溉事，古代东方大政题。

## 巡摇水

遥望大黄山，大黄山岭秀。积雪齐浮云，山中松柏茂。  
 我一巡逻兵，昼夜巡渠道。朝看黄羊奔，夜听豺狼嗷。  
 水源何自来，李寨有水库。偷水与漏水，我所谨防杜。  
 手荷一铁锨，锨轻职责巨。

## 驼摇耕

驼声似牛鸣，而无悠扬韵。有时戛然止，颇类猫鼠音。  
庞然果大物，犁行慢吞吞。耕作不数亩，偃然垆上蹲。

## 曳犁重劳动中，诵苏东坡超然台词有感

平生不曾到外家，闻说台前门径斜。  
东坡作记复填词，长叫荒台著声华：  
烟雨中春千家暗，半壕春水一城花。  
何年何日得登览，南望马耳、长山岬？！

\* 东坡原词前半阙云，“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

## 山丹医院杂咏六首

—

五月将残初夏临，山丹犹然才中春。  
杨花滚滚满庭路，渠水潺潺绕城堙。  
桃杏初结小如豆，葱蒜骨朵似戟林。  
枕间读书百页满，赢得一天头昏沉。



## 二

花椒幽芳满圃香，习习微风动晚凉。  
病房庭院何寂寂，宛如梦到桃源乡。  
左邻鼓催梁红玉，右院银幕广播忙。  
岑寂鼓噪成对比，无垠惆怅在病床。

## 三

小圃五天结情深，隔墙梵塔唐风存。  
几株老杏浓阴绿，芹韭满畦雨后青。  
数载未闻鹃啼韵，今午突闻两三声；  
听罢色喜复心悸，漫向窗外痴凝神。

## 四

窗外绵雨声潇潇，炎暑七日周末耗。  
朝接家书两勩勉，午进盘蔬杯酒浇。  
方志夜读倍饶趣，宵半辗转睡不着。  
遥听观剧归来者，笑踏泥水过圃壕。

## 五

陀翁巨著似锦屏，页页幅幅逗奇浓。  
昔有任颐伯年父，善绘十八屏景通。  
观画读书有同感，顿觉方寸获性灵。  
何年练成巨匠笔，著书绘画两擅能。

\* 陀翁指陀斯妥耶夫斯基。

六

小住山丹二十天，遍地绿树尽蹁跹。  
朝听布谷满城唤，晚看燕宿发塔沿。  
档案馆里贮方志，新华架上书刊全。  
伶仃疲体觉丰满，抖擞归来垦滩田。

无题诗一首

牧马如今才五天，荒滩渐识水草源。  
牝畜已满十二岁，半老犹当追少年。  
清早渠头啣露草，傍午阴下饮酒泉。  
郊原日日有旅伴，燕支山前不思还。

喜收到汇款并购得金笔一枝

款困两款至，笔损双笔临；渠头读《国语》，廿卷七日完。  
月终腹常饱，水清茶味醇。追思端阳命，苦痛无限沉。

删丹咏史

四围山色中，牧马残照里。北望是龙头，嶙峋多煤铁。  
山北界草地，塞马多驰逐。东南大黄山，删删丹青楮，  
匈奴失燕支，“妇女无颜色”。西南是祁连，遥遥积冰雪。  
山外大通河，水利极磅礴。俯看是长城，墩台可指数。  
何人倡筑此，明季有杨博。际兹大界中，胸怀当恢扩。

## 杏林牧马

杏园十亩有嘉阴，植榆周边渐成林。  
苜蓿夏来贴地绿，芽草雨后似箭喷。  
醇读唯闻笔触快，马饥频传啣声勤。  
时见六旬牧驴叟，倦来笑答互温存。

## 摘食野生枸杞

红豆生棘内，原来是枸杞。初见牧人摘，颇疑会中毒。  
初尝味酸甜，屡食竟成癖。嫩者类樱桃，干者似果脯。  
啖多竟成醉，山林风味足。

## 第四丛摇<sub>1</sub>远<sub>1</sub>~<sub>1</sub>远<sub>1</sub>间杂诗（十二首）

### 无摇题

#### 一

年来苦迫促，竟无一句诗。野哭畏肠断，园游恨履迟。  
春秋芳菲涩，夏冬寒暖移。搔首看山色，大河日东漓。

#### 二

寒暖苦无定，朝烟复暮烟。路灯笼薄蔼，黄月照远山。  
行人渐寥落，车马声不喧。诘朝严霜霰，应念步行艰。

#### 三

突见五泉水，湍入中山林。源头融雪激，心边会意深：  
不虞三朝卧，得亏终岁勤。安得如激水，常发垂老根。

#### 四

癸卯已三日，寂寥乏诗思。非徒楚坐股，复缘弱脑枢。  
夜读东辽史，朝翻西夏书。除夕更元旦，混然不知区。

## 五

可怜最小女，垂老倍觉亲。 低头随咏哦，杖笔习挥抡。  
难读诘屈句，不识复笔横。 呀呀同笑语，老少两韶齿。

## 六

不忍见谷口，去岁绝命时。 思父兴陟岵，念母拾地衣。  
蒙茸雪盖地，盘屈径绕陂。 失足惊呼处，掉头不忍思。

## 七

散馆闻蛙鼓，缓缓不甚器。 想缘天尚冷，未似暑雨浇。  
才嚼山谷味，又被玉茗招。 夜行苦关节，槐香十里遥。

## 八

来居大岔口，河阳多枣林。 氤氲蒸雪气，月色初凌蒙。  
大河冰封厚，兰山土嶙峋。 遥忆金城阙，无限玉塞情。

## 咏史诗二首

## 一摇吴□·吴璘

建炎塞马正颠狂，兄弟吴家扼凤翔。  
迫叫兀□割须髯，传呼撒离“啼哭郎”。  
杀金坪上晓吹角，和尚原边夜输粮。  
东望中原岳少保，两家事业一般强。

## 二摇杜摇甫

容易赚得左拾遗，难饱皇家糊口醅。  
才去秦州卖药草，更迁同谷捡橡实。  
步趋麦积视雕塑，跋涉冰林（炳灵寺）探秘笈。  
自兹踉跄西川去，稍稍喘息浣花溪。

## 花摇事

摇摇摇摇一年花事太匆匆，误却牡丹猫眼红。  
摇摇摇摇蹀躞园林粉瓣萎，邂逅枇杷金背浓。  
摇摇摇摇担间卖取白芍朵，归去点装洋彩瓶。  
摇摇摇摇顽女还嫌香未足，深宵潜入蔷薇丛。

## 袁世硕以其新作《孔尚任年谱》见寄

摇摇摇摇多年裹足违山林，怎抑今朝见猎心？！  
摇摇摇摇卧看东塘唱酬迹，长忆山史交游痕。  
摇摇摇摇于两可处谨束扎，多转折间费耕耘。  
摇摇摇摇五十童心犹未死，愿连轺辇逐前尘。

## 第五丛摇摇远间杂诗（十二首）

### 一

摇摇摇旅京十日将赴青岛前夕，独步北海五龙亭成此。

京华十日倦淹留，去去山东海尽头。

往岁山丹成梦寐，明宵岛景供重游。

长躯五载始来复，仲女一朝成墟丘。

多少槐荫并柏影，可能遮得许多愁？！

### 二

在济，于赵东甫先生壁上见献唐王先生遗画，因询葬处。

云烟自诩状峨嵋，傲笔嶙峋已可哀。

八塞间关探遗事，万灵遥瞩拜土堆。

山呼“四里”路半圻，村叫“三家”墙近埋。

异日鲁东访墟址，阿谁领去拭莓苔？！

### 三

摇摇与老友王瑶同游碧云寺、至水泉院，忆邵、冯旧事。

三十年前此洞天，水清潭碧一宛然。  
白云松啸鸟语萃，红叶香山指顾闻。  
爱妬无常少年事，飘零故友隔云烟。  
重来皓首亲旧物，渊穆有恒半老年。

### 四摇游十三陵，观定陵、长陵

枫叶初丹柿叶橙，昌平山水从复横。  
诸陵星布山阿里，一库斜欹水天明。  
享殿飘香落桂蕊，宝城雀噪兆晚晴。  
亭林七拜天寿底，我乃初来谒山灵。

### 五

摇摇摇与友人张政烺先生在中山公园盘桓竟日，拍照一打。

何来莽莽一硕夫，白尽毛颠余壮躯。  
闯遍花园乱拍影，茶亭稳坐大讲书。  
评人论世具双眼，深厚醇朴见性初。  
不佞常夸书同画，君前不敢更做诗。



## 六

到汴，访老友任访秋先生，见庭中有楝树，摘实以为纪念。

重上华堂十七年，中庭有树才拂檐。  
闻说花放紫薇致，想是香飘夜合欢。  
撷取枝头金铃子，我心长系汴水沿。  
再来何日迎花信，苦楝风轻看春残。

## 七

摇摇自京到汴，自汴返陇，车过三门峡遇雨。

出入弘农几多重，今番遇雨更关情。  
崤巔函底丰收遍，柿叶苞仁兼黄红。  
雷首北峙划河曲，太华遥矗指关陇。  
曲折无限终有尽，八百秦川一砥平。

## 八

摇参加“社教”，居榆中南坡湾大队五十日，始喜见杏花盛开。

拘守寒村五十天，一朝风景何独妍？！  
白桦依依葱色溢，红杏蒙蒙粉气渲。  
树树鸣禽鼓劲力，声声布谷促耕播。  
画人好自研丹粉，勾取一篇南坡湾。

## 九摇梨摇花

杏花残去梨花开，青碧沉沉戴雨泽。  
多叶浓条托云萼，无香不艳立风霾。  
磨房轧轧桔槔动，戽斗潺潺活水流。  
做罢“四清”看风景，兴隆山下春气回。

## 十

摇“社教”中与兰州军区后勤参谋长石进元同志极称莫逆。  
秀才难得遇将军，日日南原两登临。  
危涧陡陂焚灰粪，水平梯地播芋群。  
岗峦日色分明暗，峰际霞光辨两晴。  
阔论高谈双挥手，人间不解费精神。

## 十一

摇摇摇摇 在南坡湾，日日登山赏黄刺玫以为游乐。  
黄花人道小刺玫，谷涧丛生多蓓蕾。  
不卑不矫善独立，亦刚亦柔半低垂。  
锄田老妇成雁阵，箫鼓童蒙歌落梅。  
花事一春又去也，只余绿树日浓肥。

## 十二

“社教”群众会在庙院中召开，檐前有紫牡丹一株，洵盛事也。

巨花如碗干拂檐，百朵煌煌当庙前。

夜夜闻香作记录，铮铮诉语惨人寰。

贪污盗窃齐俯首，贫下农家正气完。

革命高潮花下起，名芳激浪两结缘。

## 第六丛摇退职以后杂诗（十一首）

### 一摇游成都西郊杜甫草堂

两日两番到草堂，当年蹊径石苔芳。  
千章乔木藏鸟语，万点桃花傍幽塘。  
题咏笔姿竞舒卷，成双游客说短长。  
倚天拔地丛丛竹，近趋遥瞻苍茫茫。

### 二摇掇拾杜甫寓蜀杂诗中

#### 辞藻成句堆砌漫成

摇摇杜老乘兴蜀作家，锦官城外筑溪沙；  
摇摇手植四松今安在，天桃五株尽着花。  
摇摇幽鹇慈鸦藏林表，宿鸥乳燕傍堂榭。  
摇摇每叹世路常多梗，穷喜此生将有涯。

### 三摇追忆去冬西湖游踪

记否去年钱塘渡，湖山初瑟复饶趣。  
澹滟里湖、外湖水，依迷苏堤、白堤树。  
随着山回山转了，陡向峰南峰北去。  
最是雨中过虎跑，清泉翠竹迷烟雾。

## 四摇自重庆去息烽火车中口占

车沿綦江去，蜀山断入黔。乌江东北绕，娄岭西南环。  
洞著凉风埡，峰多石灰岩。才离遵义府，息烽在眼前。

## 五摇偶摇成

夜雨倾盆听到明，朝来云轻日欲晴。  
远山苍翠真欲滴，小涧潺湲恰似铃。  
遥念陇间人未至，俯思此生途欲穷。  
山花隔日采盈把，落瓣缤纷映窗棂。

## 六摇闻蟋蟀

促织振其羽，终宵亦有声。入床情已慰，在壁听更真。  
陇右断斯久，黔中续得闻。已非小儿女，篱落不呼灯。

## 七摇与昭一在铁路八孔桥观落日

处处杏花傍舍开，踟蹰春色次第回。  
水田新灌明如镜，山影倒悬苍似莓。  
虹彩潏滳警野火，残阳凝滞疑血卮。  
黔中难得晴如许，相伴高墩看景来。

## 八摇游黔灵山

上巳春游正佳期，黔灵翠色堪疗疲。  
千叶天桃多异彩，百年荆树蕃高枝。  
松杉挺耸凌霄汉，野卉蒙茸隐湖湄。  
一岁一番来登览，终年尘染尽无遗。

## 九摇游花溪

明丽春光正旖旎，荆妻与共过花溪。  
穿桥九曲闻跌水，越岭千寻眺墅居。  
依依柳青映潭碧，绵绵藤曲缠枝欹。  
迎春细蕊沿溪散，开遍谿川无尽期。

## 十摇儿女返兰探亲，口占

十里槐香漫，一城絮雨飞。担卖牡丹首，瓶插枇杷枝。  
儿女散复聚，壮盛衰又微。翳翳夏将至，新韭已荐畦。

## 十一摇清明为次女扫墓

墓苑掐来小桃枝，权将春色掩哀思。  
一从失足十三载，活到而今三十一。  
日久年深心已老，死生流转人渐痴。  
回看瓶插烂漫发，羡他哀乐两不知。

# 序跋书评

## 《史学新探》付印题记

缘年 月,我曾在上海海燕书店出过一本论丛式的小册子,题名曰《文史学的新探索》。这本小册子的缺点,主要是只以某一时期内作者自己所写的论文为收选标准,即性质不同者亦一并收入(例如论自然科学的文章也收进去了),因而不能免于庞杂之弊。但根据读者意见,认为其中有些论文还很需要。今年这本小册子的版权转移到新知识出版社,我便趁机会将它大大地修删了一番,从原来的 圆篇中删去了 苑篇(这些被删去的假如不是由于太肤浅和有错误,便是由于已经失去了作用),只留 缘篇。我又从近年来所写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论文中选出与史学工作有密切联系的两篇补入。此外,《论中国新史学的建设问题》一文刊出于 缘年冬的《新建设》杂志,距离现在已有五年的功夫了,其中有不少地方,对于五年来的现实说,已显得陈旧。故再将我 缘年 远月刊在《文史哲》双月刊上的与本文内容可以互相联系的一篇论文《学习 矛盾论,联系史学工作的一点体会》,和新近在山东大学校刊《新山大》上刊出的另一篇论文《论历史科学内容的多样性与复杂性》,都编入了本集,以为补充。这样,这个新版本的部头,虽然由于只有 怨篇文章而较前缩小了,但在内容上,却紧凑了一些。因此,书名也随带地改变了,把原来“文”(当时的意思,是叫它代表文献学,但却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代表文艺)的字样取消,简名之曰《史学新探》。



这本小册子虽然经过这样的淘汰 ,但其中的错误与肤浅之处也仍是不免的 ,希望读者诸同志能够不弃指正。

一九五八年 八月 一日 ,于青岛

## 《寄陇居论文集》自序

感激齐鲁书社为我印这本文集。齐鲁是我的父母之邦，十岁以前，我就在这片“桑麻之野”上长大成人。可是很快就流离转徙，成为一个“东西南北”之人。特别是近二十三年来寄居陇右，居久随俗，俨然故土。今以寄陇名集，由齐鲁出书，方寸之内，盖有其戚然于怀者。

集内收文章 180 篇，划为五类。

第一类是有关土地所有制方面的几篇文章，都是新近一二年的作品，故置于集首。近十三年来，致力于中国土地制度史的教学和研究，曾写为一部不像样的讲义，油印过也铅印过，都不算正式的东西（最近才拟动手写比较像样的书）。在这过程中间，也偶尔抽出一点像是心得那样的东西，以论文或札记形式表达出来。此集中的开首五篇，即属此类。

第二类是有关一位学者顾炎武的四篇文章，前三篇是 1949 年初的作品，已隔近 18 年了。顾氏有三大代表作，《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音学五书》。本应该逐一写为文章的，但对古音韵，我实在没有这份修养和才干，只好缴白卷。所附一篇活动事迹的文章（1956 年就已写过一篇的了），是建国初年写的，也已 18 年了。最近，读到有的同志认为顾氏北来不为抗清，而是为调查总结明亡教训的说法，私衷殊不服膺，最近始著文予以争辩，今编入第二类末之。

第三类是有关西域史的几篇文章。我对西域史兴趣很大,但起步很晚,大约七八年前由领导分配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才动手来干,在干中学习。仅有的一点点外语修养,在这方面济了一点事。翻翻古籍,再翻翻外籍,考一点,译一点,再跑跑敦煌和新疆,慢慢也就弄假成真了似的。

第四类是与思维和哲学有关的一些杂文。应该承认,我一直是喜欢哲学的,从来没有不喜欢它。书是要念的,但死念书不行,还要想,要多想。这一类文章,大都是想出来的,里面反映个人的思维情况。当然思维就必然有正确的思维,也有不正确、与客观不符合的思维。所以这一部分东西,出岔子的可能性也大,希望读者更多的指教和纠谬。

最后一类是有关农民战争史的几篇文章,都是旧作,是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以前的作品了。这次之所以纳入,有一点心情存乎其间。我在缘年代原是搞农民战争史的,为什么开了小差了呢?这中间有缘故。就是由于个人一贯认为既有反攻倒算又有统治者们的“调整”或“调节”,但突然“只有反攻倒算”成为了不可违反的时代信条,我立刻敏感到不妙,就离开了这块园地,转移到土地制度史方面,从阶级斗争转移到阶级关系的检查方面去了。其实这二者是相成的,并不抵牾。从前出过一本论文集,凡那本集子未收的、在结集以后续写的,选其可存者,纳在本集之尾。

我今花甲早逾,古稀尚须有待,寄陇以还,心血所结,不过如此。愿以余年,锲而不舍,能写出质量更好的书和文章出来。

缘年元月 员日,于兰州大学

## 《学海暮骋》自序一

试想,一个七十五六岁的人,还能在自己生前亲眼看到一本著作问世,其喜悦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

先来释释名吧。《学海暮骋》,“暮”,一般指“日暮”或“岁暮”,但也指“迟暮”,即一个作者的暮年;“海”,一般指“海洋”,但也可以指“瀚海”,即大草原,在现实中只有大草原才可放马奔驰,而海洋是不可以的,只神话中有马在水浪中奔驰的说法。

这本书是作者缘~ 缘岁间的作品,它已经明确地带有“暮”的色彩了。其一是篇数多(约缘篇以上);其二是篇幅短,很多都是只排三个印刷页那样的篇章;但其三,比青年和中年时候的东西凝炼了,老作些了。

书分六个部分,而其重点在第一个部分。为什么呢?

试来作解答。大约在本世纪愿年代初、中期,在中国大陆上出现了一股“文化热”。作者也感染了这股“热”,于是乎就萌发了想探讨中华文化的源流这样的心思。此前,我是搞农民战争史和土地制度史的,阶级斗争不可以不搞,阶级分析法这方法也不可以不用,但积久下来,也感到有“太死巴”、“不活”的弊病,这就自然而然转移到文化这个较灵活、较诡谲的方面来了。中华文化源流,自必首先是先秦文化,而在这方面早有若干人做出业绩来了,什么孔子如何,孟子如何,庄子如何,荀子如何,不需要我炒剩饭。我不孤立地一个一个看他们,我要看他们之间的网络,通过网络我要看

取中华文化发展的一些层面。

为什么又提到层面上来？

请允许我说两句闲话。五年前，我的一位至亲患了肝癌，到一家大医院做悦·裁照片取来，一个个层面上，密密麻麻都布满了癌点。这自然带给我巨痛，也带给我启发。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给先秦文化做悦·裁呢？从此，我就写下了本书第一辑中的系列文章，并隐约看到了一些层面：

在头一个层面中，我看到人们在悠长时间内经营着卜筮过日子，他们正在蒙昧和文明的边缘上，充满着神秘主义。

在第二个层面中，人们有了两个符号（—、—），并且开始使用这两个符号在做像近代数学中所说的“排列”与“组合”的试验。

在第三个层面中，愿个卦发展到远源个卦，又发展成为獾源个爻。

在第四个层面中，人们编排成了《爻辞》，这是从原始思维向理性思维的过渡。《小雅》也与《爻辞》同时期前后写成，它二者都使用“取象”和“起兴”的手法。

在第五个层面中，大约在公元前远世纪，孔子出现了，儒家出现了，他们把《易》一伸手接了过去，将其改造成为儒家的。同时，自然也接过去《诗》和《书》。

在第六个层面中，大约在公元前缘世纪，孔子死了，孟、庄二家尚未走上舞台，这是孔子之孙孔伋（子思）所代表的时代，也是道家《道德经》、儒家《中庸》（包括《大学》）、以及《易》学中的《易传》这三部东西当令的时候。这时候，中国早期辩证法特别泛滥。这个特点很重要。

在第七个层面中，孟、庄二家各领一支人马，形成两支反对反对派的战线。“争鸣”，由此表现出来。

在第八个层面中，通过稷下“大染缸”的综合，由荀子出来总结。不过他这总结并不公允，仍有偏在儒家一家之嫌，这与汉武帝

“定儒家于一尊”恰好不谋而合。

这八个层面,正是在作者写作本书中第一辑十四五篇文章的过程中陆续看出来的。看是看出来了,但看的还不够精确,看的还不够深刻,现在拿它写在这篇《自序》里,抛一抛看,抛砖是可以引出玉来的。

其余的五个部分,想我不再一一做自我介绍了。只最后一个部分(“师友纪念”),倒是当真倾倒了心几滴来的,所以自己特别珍爱。总起来看,作者的毛病在这本集子中还是暴露无遗的。即如《后汉书·马援传》里所说“如西域贾胡,至一处辄止”。志趣太广,涉猎太宽,转移率太大,缺乏“老营盘”。所有这些,留下来做后世学人的鉴戒,从反面是会产生效果的。

是为序。

癸卯年 缘月 圆日 本人 殁 周岁初度日,  
作于兰州大学之 圆楼 圆室

## 《学海暮骋》自序二

本书系作者 远缘- 殒缘岁间的论文综辑。大体分类 远辑 ,而以第一辑为倚重。

第一辑 ,是要追寻先秦文化的源流。不少先秦思想史家 ,大都是孔子如何、孟子如何、庄子如何 ,而不讲地缘社会传统 ,不讲发展的各个层面。作者有鉴于此 ,就特别著重鲁、齐、晋、楚这几个地区 ,以及《周易》远源卦、獠原文、《易传》以及儒、道两家以孟、庄为代表的争鸣。这个研究 ,还未终结 ,但从这一辑文章中 ,至少可以看出一些新的端绪。

第二辑 ,是与魏晋南北朝史有关 ,也与祖国的大西北有关。从当前看来 ,大西北落后 ,远远比不上特区。但我们也应辨证地看问题 ,这大西北 ,在中世纪确很重要。鲜卑族的活动很突出 ,佛教意识与儒、道两家的交融也是一大公案 ,都值得我们研究研究。

第三辑 ,作者的乡邦是山东 ,对之也不可能没有一点乡土之情。特别对蒲松龄和孔尚任这两位 灵苑灵世纪的巨匠一直不能舍弃于无动于衷之地步。蒲学是很有研究余地的一门学问 ,他与王渔洋、赵秋谷 (执信) 这三位是居处邻近的大作家 ,是很值得做并比的研究的。

第四辑 ,是关于祖国的大西北。本书作者暮年三四十年间即寄迹并寄情于此。这片草原 ,是大有研究余地的。作者深知 ,迄今尚有若干底蕴 ,未曾发掘而公诸于世。当清之中季 ,受到西方的侵

凌 ,中国人才觉悟到研究西北学的重要性。本辑主要是追踪那些钻研西北学的先驱人物的足踪 ,看他们是怎样筚路褴缕的。

第五辑 ,是关于宋、明理学。作者一贯认为 ,宋、明理学在思维的水平 and 开阔度方面 ,是远逊于先秦的。不能说两个高峰 ;应该说 ,先秦是主高峰 ,宋明是次高峰。但在朱学与王学之间 ,我们对王学应该估价更高得多。它主张发挥主观能动性 ,对于后世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是一种对症的破除剂和补救剂。

第六辑 ,是对生平师友的一些纪念。往往从这样的文章中 ,看出作者的心声。试想 :“死生亦大矣 ,能不痛哉 !”假如退一万步 ,对活人还要说一些半真半假的话的话 ,对死人是半点假话也讲不得的。不过 ,还要说明 ,这里收入的只是一小部分 ,其余因牵扯到活在世上的人 ,不得不从略。

猿猿年 远月 猿猿日兰州



## 《赵俪生史学论著自选集》后记

要给自己的《自选集》写后记,根据我个人的体会,就等于写一篇自我检讨。

自然,这跟猿年前的那种检讨,是截然两码子事。那是自上边贯下来,以“勒令”的方式下达,而自己也不能不按当时的“风俗”给自己胡乱上纲上线一通。两方面都是不负责任的。

现在不同了,人已到愿岁,回首一望,四海茫茫,心里想,也总该自己很好地总结总结了吧。

在圆世纪的四五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我勉强算得上是中国史学园地中的一朵寒葩,受到客观的和主观的限制,这朵寒葩总给人一种发育不正常的感觉。客观的云云,所指尽人皆知,就无需再说它了。主观的局限性,倒需要在这里说一说。我认为,在这方面我要分两条来表述。

第一,我将史学定为一生本业,为时未免晚了一些。这要吃些亏,在《自传》里,在《回忆录》里,我都记载了是圆原-圆缘岁之时,我从新文艺的创作和翻译“跳槽”到了史学中来。我说过多少次,我的旧学根底只是一部《孟子》,而且七章之中只学了五六章。在这一点上,我就无法跟郭沫若和好友童书业相比,他们旧学根底是“幼功”,像梨园子弟自五六岁历三冬两夏之苦积累下来的。与他们相比,我简直是不堪以道里计。

可是我后来为什么也能够驰骋史域、似无挂碍了呢?回答是,

我有一个“法宝”，那就是我在《自传》、《回忆录》里不惜频频记述的那个“追补”。这个“法宝”，是从追补代数、几何、大代数、解析几何过程中锻炼出来的。中年以后，追补廿四史、十三经。特别是追补十三经，它花费了我自缘岁至苑岁二十多年的精力，我纯乎使用了万斯大、万斯同的办法，“非通诸经不能通一经，非通诸经不能穷《传》、《注》之蔽”，我就是走这条路过来的。我缺乏“幼功”，这是无法追悔的；但用“老功”来追补，到头来不是也还像一回事吗？

第二，是我在从事史学操作中，在取向上有所偏。具体地说，在史学操作中，理性主义的努力和感性主义的努力总是结合着的，两者间要保持平衡与谐和。而我倚重在理性一边。对比起来，对感性一边就用力不够。试看，我当初介入史学就是带着理性进来的。举一些例。明清之际的遗民运动，是不是仅仅“地主阶级的反满派”？北魏帝国的作用，是不是像某个日本学者所说，是“东北方野蛮民族的能动性”救活了魏晋奄奄待毙的社会？西周的奴隶制，是不是像某位大学者所描述的那样笔直而又笔直、纯粹而又纯粹？人类的私有制是不是从一开始到它的末期总是同样地“凶恶”？中国的私有制有没有它自身的浅化阶段和深化阶段？社会发展是不是像“五种生产方式”描写的那样，总是单线的，可不可以也考虑复线发展和个别的变异？……我就是搅拌在这样一些问题里活了一辈子的。

史料，我不承认我不重视。考据我也不是不会做。不重视史料，我花几十年精力去“追补”二十四史、十三经干嘛？但我一辈子不扞史料，不处理像某人之卒年究在本年之十二月抑在次年之正月那样的问题。琐节问题，只有当它紧密地联系着大关节目问题时，不处理好它，大关节目问题就解决不好时，那么，琐节问题就躲闪不开地需要处理一下。但乾、嘉学派教给人的是，把大关节目先撇在一边不管，从琐节开始到琐节收尾，这样的路子怎么能叫

后人服膺呢？

有一句话说，一种倾向带来另一种倾向。反考据带来的另一种倾向，就是在不知不觉中对史料的重视不够，对史料之增殖的迫切及不上对理论之增殖的迫切。这一点，我发觉到了，并且在晚年努力纠正它。

现在，该让我来描述一下我在具体收选这本《自选集》中的每一组文章时的心理活动了。

我平生第一个像样的科研项目，是农民战争史。这个课题大有可为，像我在《自传》中所写的那些专题，及今思之犹津津有味。但时令不好，风雪来得骤，也像敦煌卷子《寡妇赋》中的两个名句，“雹碎春红，霜凋夏绿”，一场农民战争史发展的美梦，就此烟消云散了。现在只选一篇，不过是由于这一篇曾蒙一位日本学者为之著文予以奖誉罢了。

第二个科研项目是中国土地制度史。这个项目我坚持的时间长一点，约四年。我从事这个项目，也有我自己的特点。我是从中国古代土地公有和集体所有解体的不利落，土地私有制中夹杂着公社残余和国家权力的干预，来展开研究的。一句话，就是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角度来研究问题的。这一点，被李约瑟注意上了，发函邀请我参加他的一次盛会，可惜恰好碰上国内不稳定，没有去成。

在这方面的具体文章方面，还可以说几句话。公社（悦燥鄂皂感藻）这件事物，在先秦史和井田制中，是躲闪不开的，但郭老却说不能讲公社，讲公社就没有了奴隶社会；在北魏史和均田制中，公社已经不是躲闪不开的问题了，但唐长孺先生却说公社是均田农民之父，等等。当时，郭、唐是上古史、中古史的最高权威，我抖起胆来跟他们争辩，这篇文章就选在本集里。

再一个项目，是顾炎武。这项目原本不是这样的。原本是明清之际黄、顾、王三先生的比较研究。但黄、王资料多在南方，而顾獠远

晚年 缘年在北方,齐、鲁、秦、晋文献中多可觅到踪迹,所以研究中心不知不觉偏了,偏到顾一人的身上来。顾的一生,著作都很严谨,活动有时诡秘,也值得我们留意。缘年以后,我写过一部《日知录导读》,海内外的评价颇不谓恶,只可惜那都是些段段,虽然加一些《井》,也流露一点晚年为学的心声,但究竟很难选到《自选集》中来了。

我自 源岁以后,举家移居陇右,至今已 源年,此生已不再迁徙。借到大西北的机会,接触到不少少数民族的文明成果,感到津津有味,不觉又延伸到历史上的少数民族的活动,做过一些研究,涉及五凉史、西辽史、蒙古在西域诸汗王史、帖木儿汗国史等等,由于条件的限制,这些研究多半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就又转移到另一个方向去了。现在拿来选在《自选集》中的,仅是讲鸦片战争以来,中原学人为了救危扶倾把眼光转向西北史地、西北民族方面来的几篇文章罢了。

值得遗憾的,是有关先秦文化、有关《周易》的文章,碍于《自选集》系列书规格的限制,没有选到集子中来。“孔子老而好《易》”,一个人人生经验积累多了,自然而然对《易》的体会就深一点,人们说,等下本再选入吧。可是到那时,怕已经“隔世”了。

感谢金景芳先生,以 缘岁高龄亲为此书撰序;感谢白寿彝先生,刚出医院就亲笔为鄙书题签。盛情高谊,当至死不忘。感谢山东大学前后两任文科校长乔幼梅同志和齐涛同志,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持,有关鄙人八十的两本书是不容易以如此快的速度、如此精美的装帧与世人见面的。感谢责编王桂琴同志,她冒着酷暑,砲砲编校,不过她是我的潍坊同乡,所以就不多饶舌了。

缘年 愿月 愿日立秋后一日,  
写于兰州大学 圆楼之 圆室

## 《中国通史史论辞典》\* 序言

但凡有过教与学经验的人都知道,受教的学生们喜欢一种教法,不喜欢一种教法。他们(从高中生到大学生到研究生)不喜欢的,是一种平铺直叙的、人云亦云的、重点不突出或者根本没有重点的、不提出问题不解决问题的课。他们喜欢的,是重点突出的、提出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的、从而鼓励和启发了学习者的兴趣并从实际中诱导了学习者的独立操作能力的课。我们讲中国通史的,也不例外。当然并不是说一堂课 缘分钟全讲争论,不是这个意思。全讲争论,势必对讲授内容的系统性、连续性起一种伤害作用。我是说在系统知识传授的基础上,一定限度地诱导一些争论,这对启发学生独立思考、独立操作能力方面,将起到很好的作用。我从事历史学研究多年,并经常指导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论文,深感中国史学范围中课题甚广,论争甚多,要具体了解各家之论点、论据,查阅资料也甚为费时费事。如有一部集诸多争鸣性问题,予以介绍的书籍,定会给史学研究工作带来帮助和方便。

在这个问题上,宝琦同志和我有同感。宝琦同志和我是 缘年代山东大学的老相识,近十年来他在信函中经常抒发这一方面的感受,得到我的响应。也许,这就是他后来挺身而出、一心一意要

---

\* 此书由赵俪生、孙宝琦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缘年 怨月出版。

编这么一部《辞典》的最早的契机。在中国通史(包括近代)范围内,已经争论过和还有争论价值的问题,很多很多。有大型的,有中等的,也有近乎琐碎的。大型的,如开国之初的所谓“五朵金花”等问题,是1954年《历史研究》编辑部已出过一本《举要》,对老师备课和学生复习都起了很好的作用,就是明显的例证。但大型问题之外,中等的和甚至琐节上的争论,在教与学中有时也很需要。我们很难要求老师们,在他们的备课过程中,在他们平时的阅读网络中,这些大大小小的争论已被他们统统钩稽到、网络到了。想到这里,自然而然就感到编一部这方面的辞典,是非常之必要的了。

我也是一名教历史 10 年以上的教员,对以上所说的,亲身有所体会。举一些例。(一)对中国上古水利灌溉,我是在与人争论并自我辨识中,提高了认识也提高了教学的。开始,有的书上照印度和伊朗的“框框”套,说先有了灌溉然后才有了方块田。慢慢觉得不是这样,上古沟洫是排水的,而方块田在甲骨中已有刻录了。中国水利是战国秦汉兴盛起来,那时方块田已败落了。在讲课中把这件周折说清楚,也表示了争论在通史讲授中的作用。(二)井田和均田,是上古和中古历史上的两大田制。讲通史也逃避不开,要交代。但两种田制与农村公社的关系怎样?有的学者说,讲井田不能讲公社;又有的学者说,均田制带着东方公社色彩,说国家是农民之父。公元前七、八世纪没有公社,公元后四、五世纪却有了公社,这怎么办?经过研究才知道,井田时期是有农村公社,不讲公社是交代不过去的,均田时期私有制和阶级关系已经深化了,公社只是残余形式。把这些内容结合详密的考证和论证讲给学生,学生方面会产生感受。(三)资本主义萌芽也是个大问题。过去人们喜欢划杠杠,有人把杠划到晚唐,有人划在宋,有人划在元、明之际,有人划在明嘉靖、万历。并且一方总说另一方不对。那么,我们讲时划在哪里?后来逐渐明白,资本主义萌芽,也如暖气

源源袭来，不是一次而是多次。封建后期，个别发达地区总有萌芽现象出现，只不过嘉靖、万历更茁壮一点而已。说自己一方对，说另一方不对，是不应该的。（四）明太祖朱元璋是个大历史人物，可是每讲到他，教学双方都感到有难度，起义领袖和封建大皇帝中间怎么统一起来？为此，报刊上周折了很长时间。其实，不要把农民领袖和近现代革命领袖在想象中划等号，此其一。封建皇帝为了他自己的统治，他也要为国家做些事，此其二。把这两点联系起来，不仅可以把朱元璋说通，并且可以使学生减少一些绝对化倾向……从以上这几个事例中，我深深感到史论对通史的教与学之间的紧密关系。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我才对这部《辞典》的编著工作，自始至终给予了由衷的支持。

但我本人终究是七十三四岁的人了，并且兰州距离上海又比较远一些，所以除与宝琦同志频繁联系外，其余终于落了空，但我对这种“落了空”是并不甘心的。辞典全部工作，是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副社长田兆民同志的支持下实现的，是在宝琦同志协同上海师大、哈尔滨师大、中共中央党校、上海政法干部管理学院、上海市区业余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大、湖南师大、江西师大诸校老师们的辛勤编写下完成的。我给宝琦同志写信中说出了我的惭愧心情，并说将以撰写《序言》来“立功赎罪”。现在，《序言》已至结尾，我发现即便这慢“功”也立的不怎么样，但也只好如此了。

1983年 8月 8日于兰州

## 《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 序

这部书稿,自从创意编写,到达到付印水平,这中间一晃就是十多年的时光。拖拉如此之久,这是应该向出版单位和读者道歉的。不过,我们还有我们的困难。写这么一部不小的书,一两个人是很难胜任的,不能不集体编写。幸而集体之中,颇有几位“行家里手”,如清代部分、汉代部分,甚至唐代、宋代部分,其撰写者都是在其各自的历史段落中写过专著或论文。写过专著,再凝缩起来写成屯田通史中的一个分部,那就越发能够显示其驾轻就熟的优越性了。这一点,是在对不起出版者和读者的心情中,稍稍可以自慰的。

屯田是中国历史中的一件大事。凡是讲过中国历史的老师(不论是小学的、中学的、大学的、讲习班的),都省略不下“屯田”这个“节目”。作为制度,它由粗创到一步步细致化;作为作用和意义,更值得我们细针密线地分析。粗略说来,它是一种土地国有制,而土地国有制又是介乎人们财产(土地是其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公有制和私有制中间的一个两栖因素,也是一个变异因素。因此,它经常会起着一种调节的作用。具体说,土地私有制的体现者是历史上各种类型的私有主(通常叫地主),它从劳动人民身上

---

\* 此书由赵俪生先生主编,甘肃文化出版社,1987年6月出版。



取到的，通常叫“私租”。土地国有制的体现者是国家，一种很高的、或者说最高的权力机关；它从劳动者身上取得的，通常是一种劳役租形式，到后期也有慢慢衍化为实物租甚至货币租形式的。它的租额，一般比私租轻，因为这种租额就其衍变的渊源看，是来自“国税”。“私租”是土地私人所有权的体现，“国税”是国家管理公众事务职能的体现。二者不仅在税额轻重上有所差别，在剥削的意义上也有所差别。在这一点上，屯田常有某种原始公有制的后裔的味道。有些农业劳动者（各个历史段落上带有不同身份特征的农民）往往宁愿选择土地国有制，这一点使得历代的屯田都有其一度繁荣的历史。

我们再从地域来看。自古至今，差不多都是东南经济发展较快，西北和西南经济发展较易受到阻滞，这自然和气候、土壤有很大的关系。在经济容易发展的地区里，往往私有制发展较快，小片土地的分割比较严重；而在经济发展容易受阻的地区里（例如西北）私有制不容易发展起来，于是大片大片的荒地就自然而然留下来由国家牵头组织人民，特别是组织军士来进行垦种了。这就是我们这本书创意写作的特殊性之所在。从这里面，可以看到开垦荒田为熟田，有效地获取军粮，巩固军队，巩固国防，稳定国家粮食生产，保持西北和东南间经济发展之一定的平衡，一句话，保持国家的统一和稳定——这种种的作用。

再从民族关系方面来看。历来的情况显示，主干民族总是住居在中原，少数民族大多住居在东北、西北和西南。它们中间的关系，在古老的年代，由于各种水平的低下和原始，总是表现为征服和被征服的关系，或者说你杀我、我杀你的关系。可是，跟随着经济和文化水平的逐渐提高，这种关系由残暴转向文明，人们在族与族间寻求往来、沟通，渐至于相互间取长补短，趋于一致，以至于融合。屯田在这一方面，成为重要的纽带。我们在历史上经常看到，开始是主干民族的民屯，慢慢地附近老百姓也聚拢来，或者加入民

猿

屯,或者自立军屯。再慢慢地,少数民族的人也聚拢来,他们之间交换籽种、农具,互相在风俗习惯方面感染,男女通婚……最终,民族间的隔阂也逐渐消除,民族差异也无形中大部分消融了。所以说,从屯田上最容易看出民族间的谅解和融洽。

可是,屯田的历史,并不是一鼓气连绵着的,它有盛有衰,有兴建和破坏,又有再兴建和再瓦解,总是跟着朝代的兴衰而起伏。理由很简单,它有朝廷办的,军队办的,朝廷和军队兴旺时它也兴旺,朝廷和军队衰败时它又经常成为叛乱的渊藪。可是等新秩序恢复时,在老屯田的废墟上建立新屯田,也往往有驾轻就熟的方便。

屯田一开始,自然是自然经济的,带有强制的味道。但慢慢地商业和货币的联络网也会孳生并且贯穿起来,也会产生借贷、租赁、雇佣等现象,因为到头来这也是一个小社会,是外面大社会的反映。总之,屯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都会有它自己的创造和创新,它反转过来,又会替中原的大社会提供新的素质和影响。

我是这个研究和写作组合的所谓的牵头人。可是,我这个头牵得很不好。自然,年龄是个很重要的因素,我写序时已经 78 岁,耳欠聪,目欠明,所以只有“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了。这就是说,虎是别人射的,我不过跟在后边罢了。就连这篇短短的序言,也是依靠自己当年曾亲自射过虎时候积攒的一点旧“底”,盲人瞎马地乱写一通罢了。我写这些,意思是要表达自己的深深的惭愧之情。

再一次请求读者和出版者多加原谅。

1998年 10月 15日 写于兰州大学之 圆楼 圆室

## 高昭一《回首忆当年》序

我妻高昭一同志癸酉年已满 苑 周岁了 ,按虚龄整整 愿 我们一家人商量如何替她庆祝八秩大寿。有好几种方案。有的主张设两桌宴席 ,友好家属 ,欢聚欢聚 ;有的主张到灯料行访问一下 ,看大陆有没有那种 “寿 ”字电磁管灯出售 ,装起来也形成一种气氛 ;最后 ,还是确定下来 ,把目前这部回忆录稿 ,自家庭储蓄中支出一部分充当印刷费 ,印成一本书 ,留给子孙和教过的弟子们 ,做个纪念。旧时代这样做的例子很多 ,他们刻成木版 ,藏之家塾或者家祠 ,留给后裔。反正 ,它是不向全社会扩散的。

为了付印 ,我把原稿又精读了几遍 ,自愿担任了像责任编辑那样的工序。在这过程中 ,我深深感觉到 ,这不仅仅是她个人的活动纪录 ,也是我 (我是她的 “半边天 ”)的纪录 ,也是儿女们早年经历的纪录 ,总起来看 ,又是 愿 世纪自 愿 年代至 愿 年代间社会变迁的纪录。这短短 愿 个章节 ,其实也是一部历史。

高昭一同志与我结为夫妇 ,一转眼已 愿 年 ,“金婚 ”过去了。“翡翠婚 ”过去了 ,现在就再等 源 年 ,到 “钻石婚 ”期了。我们虽然共同生活了这么些年 ,但各自在性格方面仍保持着差异 ,这在文章风格上也表现出来。譬如说 ,刮起风来 ,我是在大门口顶着 ,她在后院里顶着。几十年下来 ,我的折损率就比她大。我慢慢产生了 “刚 ”中之 “柔 ” ,比年轻时候诡谲了些 ,文章风格也表现为胆怯、逢事想说又不敢说、又不甘于不说 ,文风就曲折了。高昭一同志不是

这样。就在“史无前例”时期,她的身份也与我截然不同,她是“人民内部”;而我是“敌我矛盾”,后来转化为“敌我矛盾作内部处理”、“帽子拿在群众手里”。举一个例。本市另一座高等院校的一位党委书记忽然被怀疑为“汉奸”,他的名字与我们在晋西北一直工作的同志韩昌泰雷同,于是“神话”编造出来了,说原来那个老韩并未被日本人毒死,而是投敌了,日本投降后他转到晋南摇身一变,又成了老干部。对这件事,可充证人的只有我夫妇俩,但方式很不同。对高是用小汽车接送的,并呼之曰“先生”;我是由牛棚里提出来,由两个院校红卫兵各二人押着,乘敞蓬吉普来去的。当然证人作用还是起了的,“这鸭头不是那丫头”。我们二人总算替一位无辜的老干部帮了一个忙。

我说这些的意思是高昭一同志文风梗直,不喜欢打弯。不但文章,就连她这个人也是不打弯的。时下有句惯用语,“买账”。不管这词的含义是好是坏,在我呢,实在非“买帐”不可的时候也只好“买账”,而高昭一同志我和她过了一辈子,她是“绝不买账”的!凭这一点,她没有白活了 80 岁,没白受了这一辈子的“折腾”,留下了这样的人格,留下了这样的文风。

1988年 圆月 18日 雨水节

## 王劲著《邓宝珊传》\* 读后

这是一本值得向读者推荐的书。我这样说是有我自己的理由的。

首先,写邓宝珊的传,天然的难度就很大。我们经常喜欢说,“解剖麻雀”,意思是难度不小。但邓宝珊先生则远远不是一只麻雀,他是一只山鹰,一只大西北的山鹰。他翱翔的地域很辽阔,关系很多样。他和胡厉生、杨虎城、于右任、续范亭、邵力子、傅作义、董其武等,都有很深的人缘关系。他和陕甘宁边区以及毛主席、周总理关系也不可谓不密切。他在榆林,是独据一方的“节度”,但他不具备普通“节度”所具备的“大老粗”性格,他有“小诸葛”之称,这是天水人的特点之一,文武兼备。可是他又不是一个模棱两可的人,他能看清方向,假如看不清,他就不会在和平解放北平过程中,做出那么卓越的贡献。总之,这只山鹰是不容易解剖的,可是在这本书里,作者从容地解剖了。

其次,写邓的传,作者假如不具备多方面的修养,也是很难完成任务的。我的意思是说,思维高度、分析方法、实事求是、不偏不颇的主宰力,再加以勤奋搜集资料的毅力,在这些方面,只要哪一方面稍稍虚弱,在成品中马上就有反映。举例子说,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中间,邓先生究竟是哪一边的人?问这个问题的人,本身就不

---

\* 此书于 1985 年 7 月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免幼稚、简单化,希望得到“左”的或“右”的结论。邓是邓,不是别的什么人,他遨游于两大之间,推动了一些什么,截止了一些什么,本书作者所写出的,正是这样一个具有自己特点的历史人物。没有一定的不偏不颇的主宰力,就很容易把人物写偏了。再者,这是一个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人物,这跟古代史人物不同。研究古代人物,基本资料是整方整块的,有定额的,当然也不排除稗史资料,但究竟是少量的,近现代史人物资料是极其零散的,要到角角落落的地方去寻,举例来说,假如没有图书馆特殊保存的邵力子主甘时的报刊资料以及邵力子故乡浙江方面一些纪念资料的话,那么邵、邓主甘一段就写不成。总之,不要小看写这么一本篇幅不大的传记,假如缺乏方法论和资料学工作经验,缺乏二者中之一,或者二者全缺,那么这本书就远远不会是目前的这个样子。

再其次,谈到文章。一篇文章、一本书,主要是看观点,还要看资料,但还要看文章。光有观点和资料,没有文章,也上不去。就是说,要有点文笔,有点文采。作者在这方面,据区区弊见,也不是下乘的。作者娓娓的叙事之笔,是足以引人入胜的。但稍嫌弱一点。假如笔头子再硬一点,那么邓宝珊人物形象,像一幅油画像一样,将更加栩栩如生。

王劲同志自 1951 年起,担任我担任的《中国通史》课程的课代表,历五个学期之久。课代表是沟通教师与学生间意见的,王劲同志做的很茁实,很稳妥。至今忽忽二十六七年,际兹《邓宝珊传》问世之际,不揣老朽,爰为写出敝人一孔之见如上。

## 程兆生《金城漫话》\* 序

时下流行的地方特色介绍性质的小册子,已经读过不少了。可以说,满意的很少。主要原因是,那些小册子的作者,没有花费足够的精力和功力,随便翻翻方志,随便打听一点民间传说,掇拾掇拾,补缀补缀,就出版了。这样的书,对于那些匆匆一过的旅游者,并不能说没有一点价值;但假如更追深一步,就会发现内容肤浅,甚至包含错误,更甚至很严重的错谬也在所不免。

目前这本书却不一样。当作者把原稿 缘个稿本拿给我看的时候,我最初的臆想:“也不过掇拾、补缀一类而已。”由于忙,我先请我的两位助手读一读。他们仔细读过后,回来说“很不坏”。于是我就花费了差不多十天功夫,一篇篇读下去,古话说“是亦有心人哉!”我读完这 缘个稿本后的感想,就是本书作者确是一位“有心人”。他怀着对兰州的满腔热情,根据多年积累下来的资料和传闻,一篇一篇地写下来。说是方志吧?它没有方志的陈旧格套,说是导游资料吧?它不使人感到肤浅。当然,这还不是什么科研成果,但其中已经容纳了不少科研成果了。当然,在这本书中也不排除错误的存在;但以我所见,错误恐怕已压缩到最低程度。这样,已可以心安理得地应作者之邀,来写这么几句推荐的话了。

我个人的家乡,距离兰州甚远。但自从居住在兰州,一转眼已

---

\* 此书于 员愿年 源月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猿年了。这已是一生的七分之三。所以说,兰州是我的第二故乡,怕不存在问题。这就是说,我对兰州、甘肃、大西北,也是有感情的。带着这种感情,我写了如上的一些文字,敬请通家、专家指教。至于具体意见,已另纸写成小册呈给作者,想来作者会融入书中去的,故此处不赘。

猿愿年 缘月 愿日于兰州大学



## 陈连庆《中国古代史研究》\* 序

连庆兄长我一岁,先我而去了。侄女陈翰写信来,叫给文集写序。这意思我是明白的。旧籍中一位学人逝世,其墓志碑传,全是托付得人,而被托付者也都能“不辞而为之文”。但要我来承受这种委托,是有局限的,也就是说,有合适的部分,也有不合适的部分。论情谊,应该说是够了,我二人同事虽仅半载,但其后神交,溯年,鱼雁频通,学术见解几乎尽同相是而无所忤。但论学问,特别是所谓旧学根底,我却望不到连庆兄的项背,他太渊博了,根底太厚了,让我来状述他,怎么能配得上呢?我说这话,丝毫不带有谀人或自贬以示谦抑的意思。有井水饮处皆知我最不富于谦抑的品性。我说这话的意思,是要把连庆兄一生晦为人知的一些底蕴留给后世。我很快也要随连庆兄而去了,我再做作谦抑,又有什么意思呢?

大凡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免不了要受他所处环境的这样那样的诱导与奖进,也免不了要受他所处环境的这样那样的抑制和局限。有时,这些外力是无可超越的,自己无可选择的,也就是说,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这几天我们从电视中看到巴格达住进指定公寓里的那些美英平民,他们能选择吗?同样,述年前日本军阀统治东北近 述年,这对连庆兄来说,能选择吗?当然,个别东北人跑到重庆的也有,跑到延安的也有,但那究竟是少数,绝大多数还

---

\* 此书于 述年 述月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不是在水深火热中忍受过来。试想,这不是一年两年,而是 缘至 圆年呀。在我与连庆兄的应对进退之中,我深深体会到这件无可超越的事在他身上打下的沉重的烙印。他在骨子里更顽强;但在表面上更晦黯。这个特点,从他的全部学术上也可以体察出来。

我常说,我平生有两位最爱谈学问的朋友,一位是童书业先生(号丕绳),另一位就是连庆兄。他二位都是谈起来没有完,两三个小时持续下去,由于兴趣充沛,所以谈者听者均不感疲劳。但两位在方法论的方向性上,却截然反背。丕绳兄最爱谈观点,他的话往往总是这样开始,“我又有一个新观点”。你仔细听下去,观点,观点,他与古往今来的观点有什么差距,与另一观点又有什么差距,几乎一点史料的事儿都不沾。可是等他过几天写出文章来时,史料全托出来了。连庆兄与此恰恰相反,他是史料,史料,一直是史料。你仔细听下去,有微妙的体会。那就是说,他的史料不是三刀两爪子现抓现拿来的,也不是为了说明某一结论有意组织起来的,他是从长期自如的读书中涵泳出来的。那么自然,那么绵密,一点不沾强证成说的迹象。我懂得这样子谈学问,是很不容易的。他一句不谈观点,你听过之后,经过反思,他的观点本身,不就埋藏在谈话之中么。

这两位都是魏晋封建说的主张者。但表现又有不同,丕绳一直有惧怕什么的心态,总是担心会与某权威相抵触,所以写文章时不免把观点变来变去,给别人留下的印象不是最好,自己也经常说心不谓妥。连庆兄有没有惧怕心态我说不清楚,他的办法是藏在肚子里,不表露。他在晚年的自述里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他只发表过一篇文章;三中全会后的不到十年里,他一鼓气发了 缘多篇。三中全会以前的那些悠长岁月,也就是他有受抑制感的年代,也就是他顽强而晦黯的年代。试想, 缘年代在南湖的会议上,还有人说魏晋封建说是“托派理论”嘛,你叫连庆兄如何不晦黯呢?

但在我看来,只有连庆兄才够得上是魏晋封建说的盟主,只有他才是中国历史上奴隶制的彻头彻尾的研究者。他研究了西周奴隶制的早期性,继之他阐述了春秋的过渡性,然后他揭示了从战国到王莽间猿园年古典奴隶制在中国历史上之降格的出现。他对债务奴隶和西汉小农破产的研究,是精湛的。再继之,他又研究了奴隶在北朝和南朝的残余,作为尾声。这样,他对中国历史上的奴隶身份,也就是说,人身的全强制身份,亦即经济强制与超经济强制加在一起的一种强制,自始至终,自浅到深,自初期到发达期到衰落转化期,做了细致、绵密的研究。在这方面,他和有些人是区别着的。那些诸公们,往往是只抓住几条条死抠,有的抠经典文段,有的抠罗马史,有的抠《左传》、《史记》中的只言片语,以及与这些只言片语关联的若干琐细考证。他们给人的感受是醒目的,但也是单寡的。连庆兄不是如此。他从一种类乎“南高派”<sup>①</sup>的学风出发,慢条斯理地进行罗列,比较,分析,从更广阔而不局促的天地里强化自己的说服力。现在,这些文章都收在本集之中了,读者可以自取。其实,外国学者凡要真正搞清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之究竟者,满可以将本集内的一些精彩片段摘译过去。

连庆兄并不单止研究历史上奴隶身份的衍变,他还结合了土地所有制和兵制来综合在一起研究,这样不仅仅加深了对奴隶制的阐述的说服力,并且对井田制、屯田制、占田制和均田制都有了更透辟的看法,他对占田制的种种阐释,是精湛的。这种透辟和精湛,据我的理解,是由跨越而来。过去搞历史的,讲究搞先秦的不涉两汉,搞两汉的不谈魏晋,这样搞出来的学问是狭隘的。连庆兄不是如此,无论讲课也好,写论文也好,总是跨越三段,这在不知不觉之中,使自己史学幅度宏阔,见解通达。那些只会拿一点竹头木屑教给学生

<sup>①</sup> 指以柳贻徵、缪凤林、向达为代表的原南京高等师范的一派史学风格。

的,虽然自己也沾沾自喜,但到头来只可能是三家村的学者。

任何人都有局限,连庆兄也不能例外。譬如说,“文”、“史”、“哲”三个方面,连庆兄一生是相当集中集中在“史”上了。对于“文”(文学),他在自述里说过,他对诗词极饶兴趣。我也听到过他谈诗,那是很精妙的。但他自认缺乏灵感,所以一生不以辞章擅扬。“哲”呢?这当我考虑连庆兄一生时,不能不是一个谜。他读书如此渊博,不能说对孟、荀、老庄以及程朱陆王没有心得体会。他为什么不写文章呢?这问题,在他生前我未及问他,而今已莫及了。可能这与缘年代、愿年代的学风有关,那时讲历史最著重经济基础,至于社会意识和人们心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则是到愿年代才被普遍关切的。但潮流是一回事,自己在肚子里的又是一回事。当时潮流不提倡,我们私下里照样搞,这样的经验是很多的。那么,连庆兄为什么不、或者很少涉入哲学呢?我这样想并且这样问的原因是,历史是少不了哲学的,也就是说,少不了理性思维。理性思维能使感性史学发生惊人的变化,产生升华的认识。连庆兄不搞这些,这一点上我至今困惑不解。另还有一种揣测。有一位非常权威的老一辈史学家评论章学诚时曾说:“读书少的人爱发议论。”这句话的逆反命题自然是:读书多的人就发不出议论来了。连庆兄是否因为读书太多就自我抑制了哲学兴趣和理性思维了呢?姑悬此,以待后世高明者的论定。

据说,责任编辑同志许诺我可以秉笔驰骋,万字不禁。但我究竟是老了,就这四千字,已经是断续想了四天,写了四天,只好结束。连庆兄很爱的两句诗是:“天意怜幽草,人间爱晚晴”。我认为,用“幽草”自况是不确切的,连庆兄哪里是幽草,他是一片东北大森林,茫茫无际。“晚晴”倒是确切的,在晚晴的光辉下,连庆兄一生呕血之作才得以按目前的样子托给人世,托给学术界。连庆兄有了这部文集,庶几乎可以不朽了。

缘园年 愿月 缘日于兰州

猿猿

## 春波和我——《古史钩沉》\* 代序

苑园岁以前,对于为人写序这样的事,我是一直坚决地婉言推拒的。理由很简单,我算什么,我有何德何能,哪一点配给人写序?为此,还开罪过几方人士,甚至说我有架子。呜呼!我是一名卑微到不能再卑微的人物了,像蝉的幼虫一样,是活在很深很深的土里的,架子从何而来?但到苑园岁以后,我这堵堤坝不知不觉也被时代潮流冲了几个窟窿,掐指算来,也为人写过几篇序的了。

但在我们中间,春波老棣,应该属于另当别论。我们中间有一点缘法。我常常这样想,人缘和地缘总是纠缠在一起的。具体说,是指泉城济南,在它的怀抱里,我前后两度缔结下平生可贵的翰墨之缘。第一度发生在源袁年前的员怨愿年,那时王耀武刚刚打垮,我从华北调来当个小干部,工作之余,我就主动到经十路王献唐先生的“三家村”去拜访,去请教。王老长我圆员岁,老家日照(海曲),与我老家不过百里之遥,都属于“胶东”这个片片。转瞬之间,王老辞世已整整猿园年了。当他弥留之际,我正在河西祁连山下接受劳改,无法亲侍床第。王老学问之浩渺,像我这样再活三辈子也不堪望其项背,但我一点也不自卑,王老也并不因此而不看重我,因为他老人家聪明绝顶,他会看到除开我之所短之外,也有我之所长,时代的增新,也为我的所长增翼,例如哲学,严格的汉学家是不

---

\* 此书于员怨缘年缘月由(天津)历史教学社出版。

搞的,只搞考据。王老就像“宁都三魏”的魏禧那样,对青年王源(昆绳)这匹“抉纆之马”表现出又约制又宽纵的复杂心情。

话又说远了。现在说第二度缘法。愿年前的~~1988~~1988年,我从兰州到山东大学做半年的讲学,春波不声不响来听课。有一天在四大马路书店里碰上了,他主动上前打招呼,我们就结识了。我长于他~~10~~10岁。他老家潍邑,距我家乡不过~~100~~100里。他中等个,微胖,一支脚似乎稍稍不良于行,是一位军官的儿子,没有拿过什么高等文凭。他思路纵横绵密,如抉纆之马。当然他有他的所短,但也正如我以一个~~10~~10岁的小伙出现在王献老面前的时候一样,我也不是十分不聪明的人,我也懂得他在所短之外,有所所长,并且随着时代的增新,所短日有所补,所长日有增殖。羽翼渐丰,有朝一日就会如垂天之云。我们的缘法,就是在这样的认识上缔结下来的。

春波一进入学坛,一上来就搞先秦史,先秦经、子,先秦思想,先秦文化。这没有很大的勇气,再加以卓识,是很难达到的。在这里,我有一段新义,准备借题发挥一下。我是说,一个人一辈子专精的方向,是很难确定下来的,以我为例,最初想专精英语,其中带有甚深的谋生气息,因为翻译稿子可以赚稿费,当外语教员可以拿薪水。后来感到光图“谋生”不行,还得远大点,才开始搞历史。可是一开始胆子小,只敢搞明、清。慢慢胆子一天比一天大,从时代上由明、清而南北朝、而秦汉;从范围上由人物、思想而社会经济、而阶级斗争,最后~~100~~100岁以后,才落到先秦历史、先秦文化上来。到这里,“妾心古井水”,再不动的了。不少人拿我这一生的治学,作为奚落的话题,说我像《后汉书·马伏波传》里的一句话:“类西域贾胡,至一处辄止。”又有人说,我像梁启超和章学诚。这个话,在我看来,不是贬低我,而是拔高我了。试想,我何人斯,而敢与实斋、任公相比拟?!但我要严肃地说一句,像我这样这边爬爬、那边滚滚,一辈子算下账来,我感到我没有吃亏,而是赚了很大便宜的,我要比那些考证竹头木屑还沾沾自喜的先生们,要开阔得多。我

爬来爬去 ,没有白爬 滚来滚去 ,没有白滚。我沾了满身的泥土、落花、落叶、木屑 ,到头来 ,我的综合能力得到了培养。

春波一上来就搞先秦 ,是会遭遇种种困难的 ,但这不要紧 ,许多根底方面的东西是会追补起来的 ,我们不可被陈寅恪先生 “不敢读先秦两汉之书 ”这句话吓倒。而春波搞先秦还有很大的优越性 ,就是他思维的幅度广 ,思维力锐利 ,别人想不到的那些面 ,他会一个一个去想。这样是会开出很大很大的花的 ,这一点我敢预言。但顺便提一句 ,等这花开出来的时候 ,我个人化灰约已 圆年 ,正如王献老化灰已经 猿年了一样。

圆年 猿月 圆日 ,兰州

校后记 :兹春波同志 圆年 远月不幸以 缘岁过早逝世 ,书此志痛。

## 《河陇史地考述》\* 序

中国历史长,地面大,所以历来治中国史的往往采用从时间上截取一段、从空间上截取一片的办法来研究,这样就有了断代史和地域史这两种史学品种。守忠同志一生研究中国史,在断代上重点研究《宋史》,在地域上偏重西北史,或曰甘青宁史,也就是书名上所标的“河陇”的史事,因为这是他的乡土。过去常说的一句话,是“热爱祖国,也热爱自己的乡土”。前辈学者张介侯、慕少堂、冯国瑞诸先生已经这么做了,守忠同志继他们之后又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是深深蕴藏着对自己乡土的热爱的。

底下,我准备说另一码事。缘年代后期,我也像很多人一样入了“另册”。那个变化是新奇的。不仅仅像溥仪别人不再叫“皇上”而改叫“老溥”的那种感受,有远远超过的情节,像好端端教过、而且心爱过的学生,竟打起耳光来了,而且打的那么真诚,那么凶狠。当时,守忠同志一度是顶头负责管理我们这种人的人,但他与上述情节截然相反。记得一次国庆节前夕,他代表系总支对我们“训话”,却用了抱歉和悯人的语调说,由于上头有文件,你们暂时不能回家,明天从广播里只要听到天安门的讲话一讲完,你们就可以随便活动了。这是几句普普通通的话,但我从中嗅到了浓烈的人道气息。“仁者,人也”,这短短四个字的一句话,我是在听了

---

\* 此书陈守忠著,兰州大学出版社 1984年 7月出版。



守忠同志那一席话后更明白了的。

傅青主有两句话，“由来高格调，发自好心肝”。我今年 苑苑岁了（守忠小我 源岁，也 苑苑岁了），深深体会到这心肝之好与心肝之不好是大有区别的，和做学问也有关系。时时存心害人的，学问也不会真正做的好。仁民爱物的人，写出文章来，即便没有那么花哨，它是朴实的，其中藏着一颗好的心肝。

我研究顾炎武，不仅仅表彰他的“学”，更着重表彰他的“行”。今于守忠同志，亦然。是为序。

苑苑年 怨月 圆日于兰州大学

## 《中亚史地文献综述》\* 序

自从东部沿海的改革开放日奏成效以来,西部开发就自然而然提到日程上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先生为此颇动了些脑筋,写了系列性的文章。西部和东南沿海是有着很大差异的,第一是地理方面的,如黄土高原、戈壁大草原,等等;第二是民族问题,在西部不仅存在着少数民族,而且存在着几个在历史上发放过巨大能量、曾经对中原施加过这样那样影响的少数民族。近代以来,一些西欧的、东欧的、东亚的国家很早就对之感兴趣了。他们的考古家、探险家、旅行家,较中原人们更早地涉足到这一地区,涉足到这些民族中去并留下了一大堆这样那样的记录。

鸦片战争惊醒了中原的人们,使他们把眼光转向西部,转向民族的研究。徐松写了《西域水道记》,张穆写了《蒙古游牧记》,何秋涛写了《朔方备乘》……这个端绪就启开了。国民党时期有个“蒙藏委员会”,也办过两种刊物。解放以后,兰州大学办过一个《西北史地》季刊,发刊至今,已逾十年,不少学者在上面发表过有分量的文章。接着,西北民族学院的《西北民族研究》大型季刊也发刊了。再接着,甘肃省民族委员会的民族研究所也发行了相应的刊物。加之敦煌研究和丝绸之路研究,以及相应的旅游业的发展,可以说西部开发这个题目,近年来是越做越热闹了,未来的前

---

\* 此书由满达人编著,兰州大学出版社 1983年 猿月出版。

景也是极有希望的。

但是,有句老话叫做“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于当年那些西欧的、东欧的、东亚的探险家、旅行家、考古家所留下的记录,我们也不可忘怀,不可置之于不顾。有些当年考察的痕迹后来已经见不到了,此其一。那些考察者们是不是有个别的带有“覬觎”心态呢?也说不定。窥察窥察他们那些“覬觎”心态,提高一些我们中国人本该有的爱国主义,这也是本分的,不应该受到什么指责的,此其二。

满达人同志早年曾去日本考察,对 猿园年代前后的日本文化成果,是做了充分吸收的。近 源年来,达人同志又较长期供职于兰州大学图书馆,兼及教学科研,泛览各种各样的资料。兰州大学图书馆的收藏不能说是尽善尽美的,比起首都几家最大型图书馆来,自有其逊色之处,但有些收藏也颇足自慰。达人同志寝馈其中,见到与西部开发有关的资料就辑录下来,加以日本学者之所辑录,就完成了目前才摆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部书。

达人兄与我同龄,我们都是七十六七岁的人了。在兰州大学同事,已近 源年,有着深厚的友谊。际兹达人兄《中亚史地文献综述》问世,嘱我写一点什么,谨黽勉应嘱而为之序如上。

癸酉上元书

## 《徐夜佚诗辑录》\* 序

清初明遗民的活动,是清朝前半截历史上的一个不容忽略的课题。

但在本世纪 50 年代,这件事却曾引起过争论。当时,多民族大家庭的共和国刚刚成立,拿历史与现实相影射的心理总是难以去除的,于是康熙被绝对化了,谁反对康熙,谁就带上了消极的意义。遗民们是反清的,于是被定成“地主阶级的反满派”和“地主阶级的降满派”(汉奸们),二者处于差不多的地位和意义。这就值得争议了。

不错,清末像章太炎提出来的口号“驱除鞑虏”,拿到多民族大家庭的年代中来看,是狭隘了;但在当时是革命的,毫无问题。这就需要用辩证法来处理,按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具体分析,获致各自符合实际的结论。

满族及其帝国的卓越人物——康熙,反映了历史的前进步伐:他们完成了统一,并且扩大、强化了这种统一,从而也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但这些是从以后的“功业”中总结出来的。清初遗民们看不到这些,他们看到的是:大明江山没有落到李自成之手,却落到满洲贵族之手了;而满洲贵族一开始也不懂得政策,什么剃发呀,什么圈地呀,什么屠城呀,这些在在都引起了汉族人民的反感。

---

\* 此书于 1956 年 10 月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社。

这种反感是自然而然的,无可谴责的。这些“人民”,按严格逻辑来界定,地主也是其中的成分。但必须指出,不是唯一的成分。试到这种抗清资料中去查,其中有农民,有手工业、商业者,有知识分子,有少数民族,特别重要的是,还包括农民革命的若干老干部。当然士绅也是大量的,并且在封建社会士绅总要出头露面的,这毫不奇怪。但无论如何,拿“地主阶级”的阶级帽子来扣在遗民运动的头上,是无论如何扣不周严的。

我个人对遗民运动感兴趣,是从全祖望及其《鮚□亭集》开始的。在那部书里,把清初浙江地区的遗民活动,可以说勾勒得淋漓尽致了。这就给我一种启发,我们不也可以学习全祖望的精神,把浙江以外其他地区的遗民运动研究研究吗?当时我居家陕西,把山(西)陕(西)的遗民运动的资料进行了初步的搜辑,我又是山东人,后来又把山东的遗民运动资料也做了一些搜辑,特别是通过当时大学者顾炎武在北方活动的线索,能看出很多过去书里没有提到过的若干踪迹。

遗民运动,大体以某地区、某山地为根据地,形成一个集团。最著名的像浙东的四明山,大学者黄梨洲就属于这个集团;再像江西的宁都,大学者魏禧是这一集团的主干;在湖南,陶汝鼐等人在南岳衡山活动,大学者王船山也与参与其中;在北方,河北大学者孙奇逢在河南夏峰形成一个中心,大河南北的遗民们通过这个联络中心互通声气;在太行山北端,有以五公山人王馮佑为首的一个练武集团;在太原,以大学者傅青主为中心,也形成一个集团;在苏北洪泽湖畔也有一个遗民集团,明末山东青州的大人物房可壮和徐振芳,就和一批侠士隐居在这里,也有活动;在章邱,有个白云湖,小说《醒世姻缘传》里对明末这一带社会之繁荣做了极生动的描写,而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遗民据点,试观学者顾炎武自江南初到山东,就在这白云湖畔结交了不少的志士;此外,在诸城的卧象山中,也颇有一批遗民在那里经常聚会……以上种种,都是有大量资

猿園

料足资证明的。

徐夜跟白云湖集团 ,恐怕有联系。甚至连清朝大诗人、大官吏王渔洋 和他们也有声气相通 (在他的笔记里可以找到线索)。现在 张光兴等同志以乡邦人的便利 ,搜辑到徐夜的佚诗 整理出版 ,这对清初遗民活动的研究添砖加瓦 ,是极大的好事 ,值得大家欢迎。

我们必须学会使用辩证法。康熙代表了当时历史前进的脚步 ,但这只是一个方面 (最主要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 ,我们又不可忘记 ,他是人民的统治者、压迫者 ,他是一个少数民族的成员 ,但他建立的国家又是其他少数民族的牢狱。所以我们切不可一锤定音 :康熙是碰不得的。不能这样。有清三百年中 ,遗民们的活动此起彼伏 ,后来和秘密宗教联到一起 ,终究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取得推翻清朝帝制的最后胜利。这一条历史的长线 ,是不应该受到菲薄的。

徐夜只是这条长线中的一个小疙瘩。但是 ,就着乡邦的便利 ,把这个小疙瘩解一解 ,这个工作不是很有价值、很有趣味的吗 ?

是为序。

员 愿 年 愿 月 员 远 日 于 兰 州

## 《西北灾荒史》\* 序

袁林同志把他这 100 多万字大著的校样抱到我家来 ,让我看看 ,并嘱我写篇《序》。我毫无推卸之意 ,满口地应承下来 ,并且还说 ,替这样的书作序 ,是我一生中少有的光彩。

因为这是一部不寻常的书。这话我不是乱说的。等出版后一两年 ,这个“不寻常”就显影出来了。西北地区各级管理者 ,必定得参阅它 ;东南开放地区的中国的和外国的投资者 ,也必定得参考它 ;搞历史和自然人文地理的研究人员 ,也必定少不了它 ;甚至联合国搞环境改良的官员们 ,也少不了它。一句话 ,这本书的使用价值 就是如此之广泛。

这和作者的眼光与选题能力的“稳、准、狠”是分不开的。我熟知这种情况。袁林同志早年在西北师大附中上学时 ,就是班上的尖子。可是由于这样那样的原故 ,大学竟数年不录取他。他在窑街煤矿当了八年矿井下的工人。他曾对我说 ,同宿舍四个人 ,三个人因透水事故报销了 ,他得以生存下来。这也好 ,正所谓“苦其心志 ,劳其筋骨 ,饿其体肤”的锻炼。他终于考上了大学。在大学期间 ,他以逻辑思维能力强、中西哲学修养深而为同学、老师所称道。至于辛勤攻读 ,更是四年如一日。他之所以具有独特的眼光 ,选择了西北灾荒史这样的题目 ,恐怕与以上我所表述的那些情况

---

\* 此书袁林著 ,于 1989 年 10 月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分不开的。

试想 ,像这样的工作 ,并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人就可以做得了的。什么人做得了? 答曰 :南宋末的马端临、南宋初的郑樵和中晚唐的杜佑 ,这些大手笔才能做得了。他们不是那种抠抠搜搜搞一点小考据的人 ,他们着眼于社会的盛衰、民族的兴亡、生民之立命的这些大问题。一句话 ,做学问就是为了“经世济用”。而这本八十万字的书恰好著成于发展开放东南之后人们自然而然想到继之而发展开放大西北之时 ,这“经世济用”的作用 ,不是格外明显吗?

为了这部书 ,作者花费了六年精力 ,不声不吭地查阅浩繁的志书及其它资料 ,精细地做出若干统计表、核算值、和值得信赖的许多总结。目不锐 ,志不坚 ,心不细 ,阅读不广 ,是做不出这些成果的。

我有幸 ,在 1984 年代得到袁林同志做我的助手 ,历三四年 ,我们曾经一起南到昆明 ,东到苏、沪 ,与当时的各种不同年龄档次的才学之士 ,交流学术。而今我老了 ,眼看着袁林同志卓然有成 ,确实确实感到比我自己得到什么荣誉还更加光彩。是为序。

赵俪生七十八岁

1992 年 猿月 14 日大雪中写于兰大 圆楼之 圆室



## 《溢法研究》\* 推荐书

《溢法研究》一书在学术界不是可有可无之书,而是必不可少之书。古往今来,谈溢法的人和文章虽然不多,但总有一些;而把它安排使之成为一个学门的,则自本书始。从此,“溢法学”成立了。为什么叫“学”?第一,对其本身,要进行条理化、系统化,也就是说,从若干丛脞现象中抽象出一些什么来。第二,“学以致用”,用在哪里?就用在历史文献这广袤的场地上。清朝人爱把史学考证比做刑狱审案,不是没有道理的。一滴血,一根头发,是很琐细的东西,但在侦破上往往起关键的作用。溢法学也是如此。不少人说溢法是很琐细的事,诚然。又说,它是帝王贵族的事,诚然。但这件事的用场却很大,它是一件年代前后、内容真伪的测量仪,借助这件测量仪(当然,要和其他方面的测量仪联合使用),就能测量出某书、某事、某书中之某段之真伪和时代先后。并且,还可以有效地教导若干后辈的研究生们,在阅读古籍时,连这么微细的溢法也莫要随便放过(如同一个干练的侦察员连一根头发、一滴血也不放过一样)。研究生们学会了这种过细的本领,才能通向过硬。人们常说:“博古通今”,其实很多号称“博古”的先生们

---

\* 此书汪受宽著,经赵先生和刘乃和教授推荐,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将其列入《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第一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 1983 年出版。

是“博”得不够,从而也不够过硬的。那么,这部书将会影响他们如何确凿地去博古,从而去确凿地通今的。

窃以为,这部书作用在此,谨为推荐如上。

员源年 远月 员日于兰州大学

## 《北凉译经论》\* 序

斗城同志叫我在他这本新著前写点什么 ,这我不能推辞 ,也不愿推辞。但是 ,把到家的话说出来 ,我是不配给这本大著作序的 ,理由很简单 ,我在佛学、佛经、佛教史诸方面的根底和素养 ,远远盖不过这本书所涉及的范围。由我来写序 ,实在是一种“僭越” 。但他提出来这个意思 ,也许由于我的岁数几乎是他岁数的一倍。对此 ,我谨表感谢。

但也并不是说 ,我与这本书的内容毫无毗连之处的。从三十几岁起 ,我在从“十六国史”、“北魏史”的学习过程中 ,就一眼盯上了北凉 ,一眼盯上了沮渠家 ,一眼盯上了昙无讖这个和尚 ,直觉地感觉到从这中间能抖搂出很多东西来。但由于个人的兴趣太泛太杂 ,一转眼就被别的题目挡掉了 ,几十年来每一提及 ,总觉得是一块心病。

当代 ,有人宣扬 ,不须读内容就可以写序。惭愧 ,我没有那种本领 (这也证明 ,我属于更低一个档次的人类) 。两天以来 ,我老实巴交地读着《北凉译经论》这 ~~四百~~ 个打印页的内容 ,感到精神上得到了平生未有过的享受和满足。当年我想抖搂的东西 ,现在由我的同事抖搂出来了。他比我年轻 ,他比我精力旺盛 ,他比我佛经根底深厚多多 ,兼以对河西洞窟的熟悉等优势 ,所以由他来表达这

---

\* 此书杜斗城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灵隐缘 年出版。

段历史底蕴 ,是顺理成章的 ,合情合理的。我感到了一种暮年人少有的心情上的愉悦。

我与斗城同校同系 ,凡同事近 四十年 ,但我们过从甚疏 ,无杯酒之欢 ,只是在采购生活日用品的店铺里遇见 ,彼此相跟走一段马路 ,交流交流各自的心得、心情而已。但我很早就预感到 ,此人的能量是非凡的。现在这种预感已逐渐显影了。我愿在我还活着的时候 ,能够亲眼看到这种能量的更汹涌的宣泄。是为序。

赵俐生摇时年 苑岁  
员缘年 愿月 员园日于兰州大学

## 《甘肃历史名人画传》\* 序

我的籍贯 ,不是甘肃。但我在出生的省份里 ,只住到 15 岁就离开了。而在甘肃 ,自 1949 岁上来此 ,已整整 50 年了。假如一时还不死 ,那居住年份的数字还会增加。所以 ,我已是甘肃和兰州市的合情合理的公民了。当年 ,顾颉刚先生写一条幅 ,引一首咏崆峒山的诗 ,末句说“不须更问蓬莱岛 ,此地令人欲挂冠”。我听从了顾先生的话。

我对少数民族有认识 ,是到甘肃以后的事。所以我常说 ,到甘肃以前 ,对祖国历史只懂一半 ;到甘肃以后 ,才懂了另一半。这里是我补课的课堂。

大约人才辈出 ,要和时代氛围有密切的关系。以甘肃说 ,汉、唐出的人物多 ,人物的局度也大。时代气氛枯弊了 ,人物就少 ,人物的局度也涩缩些。以明、清两代说 ,明自正德以后 ,就越来越封闭 ;清代虽然不封闭 ,但向西用兵的频率大 ,影响甘肃的生产和人文 ,所以明清两代 ,甘肃出的人物、特别是大人物 ,就偏少了些。

现在好了 ,大时代、大氛围又到来了。正是出版《甘肃历史名人画传》的极好机会 ,甘肃的人才眼瞅着要风起云涌 ,风云际会。再过一百年、二百年 ,人们再编一部《甘肃名人传》的时候 ,内容将较这一本丰富若干倍。故书此 ,以当预言。

---

\* 此书由甘肃省文史研究馆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8 年出版。

## 李振翼《甘南藏区考古集粹》\* 序

—

振翼老弟写信来,说他甘南考古的论文集就要出版了,催我在好多年前就应诺下要写的《序》。我呢,不觉年事已高,光春节期间就住了两趟医院,的确在体力精力方面有困难。但一想到和振翼源年的友谊,立刻就懂得,这个约不能爽。

在旧时代,一个地区想编出一部像样的地方志(包括省志、府志、县志),必须具备几个条件。第一,是这个地区的“长吏”(用现代话说叫“第一把手”)对文化事业有点兴趣和眼光,想把这一地区的传统文化总结总结,备以启迪此后文化的昌盛。他有权,有权就有钱,有钱一切就好办事了。第二,还必须网罗几个全国范围的学者来审审稿,把把场,也就是说,从宏观和微观方面杜绝错误的发生。例如康熙十二年修《山东通志》,就请了顾炎武、薛凤祚、李焕章、张尔岐去从不同学科的专门化方向,保证地方志的质量。第三,这一条是最重要的,是地方上原来就积累下来的,经多年多人调查勘察得出来的资料,例如,明万历初年,蓟辽总督戚继光就派手下幕僚郭某把旧燕国地面(明朝叫营州、平州和幽州)的山山水水古迹人文做了一次普查,据说曾写成《燕史》数百卷,《咏平志》员四卷(可惜均不传)。这就是基层资料的积累了。将来甘南州有没有一把手出来提倡修志,提倡修一部有质量的州志,这是另一话

---

\* 此书于 1984 年 11 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

题。但假如有的话,那么,振翼同志的这部书和继之还要出的书,无疑将是修志非参考不可的基层积累下来的重要资料集。

二

回忆 源年前我从山东调来兰州,那时运动已经展开,振翼已载入另册,过了一年,我又被我所从来的那个单位扩大化入另册。入另册是会成为贱民的。从前,校系以及学生团体头头有事找我,都是到家下来,而今不行了,于是从贱民中寻一名“传令兵”,就找到了振翼。我二人的友谊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得以频频接触,而又不犯嫌疑。

振翼,天水人。小我 员远岁,现在也是 透岁半老翁了。他个儿不高,肤色偏黑,性情内向,他从来没反抗过谁,反抗过什么,但他心底里也从来没服过谁,服过什么。他毅力很强,不管受多大的苦,总是一声不响。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甘南首府合作。从此他就扎下头来,一千三十几年,走遍了甘南的山山水水,仔细地勘察着每一块残碑,每一个古城堡的遗迹,回到研究室里,再拿史书一一勘对。他工作在合作,家在天水,每半年或一年探亲一次,必过兰州,过兰州必过家下,必以他的新作交我先读为快。我们这近 源年的友谊,就是这么积累下来的。振翼又喜欢画画(主要画山水),也喜欢写字。我喜欢画画,也喜欢写字,所以一见面就拿出书画新作互相欣赏,亦是一乐。

现在,振翼的一部代表性著作要出版了。而我已垂垂老矣,无可大的作为。只是想到明末清初江西“宁都三魏”的魏禧对他的朋友的儿子王源(昆绳)要求很严,一次说“文章可底于用者,十之三矣”;一次说“文章之底于用者,十之七矣”。我很惭愧,已说不出振翼文章之“底于用者”的百分比,只能说了以上的一大篇话,作为对振翼出书的一种祝贺。

圆年 猿月 怨日序于兰州大学之 圆楼  
圆室,时虚龄已八十有四岁

## 吕绍纲《庚辰存稿》\* 序

记得在一本郭沫若全集的扉页上看到一张照片，郭先生手拄一枝大笔，比人高一倍，毛锥快到房顶了。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说大笔如椽。我就想，当前如果有谁家会做或者卖这种笔，我真想弄一枝赠给绍纲兄。为什么？因为我周视当前文史界，绍纲这枝笔杆子够得上大，够得上硬，够得上泼。一句话，他当得起“如椽之笔”的这个称号。

举一个例。他在三年之内，就一口气写两本大著，一本是秉承老师金景芳先生的立意，由绍纲兄执笔，用师徒二人的名字问世的，书名叫《周易全解》。另一本是绍纲个人立意，在全解之外有所增益的，书名叫《周易阐微》。两书加到一块，快八十万字了，笔不大、不硬、不泼，能写得出来吗？这还只是就易学而言，若再加上孔学、儒学，那就更浩渺无涯际了。

这不单单说明一个人会写文章而已。会写文章，写文章多，说明作者的脑瓜好用，会思维，善于思维；第二说明作者知识面宽、知识面厚。绍纲兄恰好是这样一位能把宽厚的知识面用精妙的思维充分提调起来呈现给读者的大手笔。

这本《庚辰存稿》，其实已经是几本大著生产流程中的副产品了。请注意副产品的这个“副”字，并不意味着低一格的意思。有

---

\* 此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 1994 年 12 月出版。



时相反,反而比大著更耐人寻味。清朝人的一些札记和小文集,反而比本人的大著更受重视,即是显著的例子。大著是走大路子,副产品是缠住一个问题、一件事,缠来缠去,不觉就比大著更鞭辟入里。

还有一点,我最敬佩绍纲兄,即他与金景芳先生的长期谐和的师生关系。很多人做不到。戴东原出名后,就把江永叫“婺源老儒江永慎修”了。金、吕他们师生相随,如兄如弟,如父如子,历三四十年而不衰。这说明,他们师生二人学孔子,学儒家之道,没有白学,没有学白,而是身体力行出来了。我非常非常敬佩。

我长于绍纲一十六岁,金景芳先生长于我亦一十六岁,我尝戏谓自己处于贤师徒中间,恰好“比例中项”,绍纲尝为之发噱。转瞬之间,金老先生已近百龄,我亦八十三四。绍纲嘱为此书撰序,我的最初反映是我何人斯,不敢应命。而转思,倘不借此结一段翰墨之缘,一失之际,将成无涯之戚。故勉成此,是为序。

一九五九年 源月 圆日,谷雨后一日,写于兰州大学

## 《陈大羽九十春秋书画集》\* 序

承大羽先生不弃，命我为他九十春秋书画集撰序。我认为，这是我一生中最荣耀的事情之一。荣耀之中，也夹杂些惭恧。

为什么？理由很简单，我不是画家。对画家行当来说，我是个外行，外行就说不出内行的话，所以惭恧。可是我在 猿园至 源园岁之间有一段经历，值得在这里说一说。那是在青岛。青岛曾经是德、日、美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当时民国初建，胜朝遗臣多以此地为逋逃藪。所携除珍宝外，每有字画。三代过去，到孙子辈，式微式微了，就拿字画出来求售。这是其一。再者，土地改革轰轰烈烈地过去了，像诸城那种地方，大地主家藏龙卧虎，像刘喜海家，黄县丁佛言家，潍县陈介祺家，有些藏品，就成了贫下中农的胜利果实。贫下中农要此无用，就一转身、二转身拿到青岛求售。我恰好遭际这个机遇，眼底下就看到了不少其他年代看不到的东西。当然，赝品也不少，但赝品有时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这段时间，就等于我业余上了一次美术专科学校，对美术史不知不觉有了一点积累。猿岁办离休前，我还有意想给学生开一门《中国美术史》，以为临别遗念，虽然终于没有开成，但之所以敢于开这门课，其凭借也还是 猿园岁到 源园岁间的这点积累。

应该说，我很喜欢大羽先生的画。

为什么？就是因为大羽的画，能给人带来一股乐观主义的阳

---

\* 此书画集由中华书局于 圆园年 源月出版。

刚之气,使人受了画的感动和激发,就能像画中的一花一木一藤一蔓那样泼辣地在人生中闯生活,不悲观、不消极、不堕落。这就是大羽先生的风格和作用。不同的艺术家各有不同的风格和作用。譬如有的画家用英国式的线条去描绘苏州水乡的宁谧,它给人的是一种阴柔之美,使人沉郁,陷入沉思。再譬如梵高,他为人倔强,连他的画中人物(如医生、邮递员等)也是倔强的,甚至他画的云彩和树头都是倔强的,这就给人带来一种不妥协的顽抗之气。这种不平之气,在财产不均等的社会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那么,大羽的这种乐观、阳刚的画风是从哪里来的呢?自然,遗传和个人气质会起一定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怕还是他在文化传统中的选择。大羽 1914 年进上海美专,师从吴昌硕的弟子诸乐三先生,学习吴派大写意画风,1924 年又到北京拜在白石翁的门下。这说明大羽一生倾情大写意,拜师求教,对艺术事业的虔诚。从大羽画里,这里那里,会看出一些缶老和石翁的影响。但我个人始终有一个看法,即大羽画风不应该归于白石派。他的画比白石画更开放,更大胆。缶老和石翁有一个习惯,把自己得意之作立为框框,此后就不断地重复这个框框,如缶翁的底下一片菊花,背后一块山石,山石后面又露出一丛菊花;石翁的一片高石,上一喜鹊或八哥,下一丛梅花,梅枝呈几何形的编织之状。在画市上,不管是真是贗,已经见过无其数了。这是卖画人不得不为之道。大羽不立框框,一张梅花跟另张梅花不同,一张菊花跟另张菊花不同。大羽画的梅花跟白石的梅花很不相同,大羽画的菊花跟吴昌硕的很不相同。他仿佛不大考虑画卖不卖得出去,或者卖多少钱的问题。窃以为,大羽先生在某些方面倒是酷似咸丰、同治、光绪年间的赵之谦(诌叔)。赵之谦承“扬州八怪”之后,也是一个“不衫不履”的落拓型人物,少年当幕僚,中年混了一名举人,在京师借教馆为业,得广交京中名士,且著力于北碑。北碑虽然是书法,但对绘画的运笔是有很大影响的。拓跋氏族的犷狂,渗入到北碑,再渗入绘

獠

画 就出现了赵之谦的松干 ,藤蔓粗蔓 ,以及钟馗的袍袖 ,等等。

在我看来 ,从传统方面 ,大羽似受赵**勃**叔影响为深为大。举一些例 ,**勃**叔喜欢把一股浓墨或一股浓色猛地泼在纸上 ,在别人这就糟了 ,必须换纸 ,但**勃**叔不然 ,经过他的经营、陪衬 ,这股浓墨或浓色非但不是“伤” ,反而成为醒目的标柱。大羽也喜欢这么干。再如**勃**叔喜欢画一些传统人不画的事物 (如仙人掌、夹竹桃) ,这在有些人看来 ,叫做“费力不讨好” ,但我们站在美术史的角度上看 ,那就是开拓 ,所以郑振铎选近代画集以赵为首页 ,不是没有见地的 ,他带有开创的架式。

大羽先生的画很多方面 ,其精神、神气颇似赵**勃**叔 ,开拓新对象 ,开拓新意境的情况也是很多的。他的篆书行草 ,底蕴足 ,豪放不羁 ,书韵画趣交相映。且又加以时代的新精神 ,如画鸡画蜡嘴的题词等。赵**勃**叔和大羽之所以气魄宏大 ,气势磅礴 ,大胆敢于创新 ,其原因在于心无**罣**碍。佛经《心经》中说“无**罣**碍故 ,是无恐惧”。我尝细读白石翁的自述 ,他老人家的**罣**碍 ,实实在在是太多了 ,这会大大影响他老人家的开拓与创新。你看莫奈 ,垂老之际 ,还念念池塘中睡莲花叶下的水草 ,在水流过时 ,草上和水上光影变化 ,如何用油画表达出来。这就是一心许给了事业 ,其余全无**罣**碍。

大羽有没有**罣**碍 ,我不知道。但从画上看 ,是无**罣**碍的。愈老而胆愈大 ,愈加狂纵恣肆 ,四朵洋红 ,就是一盘寿桃 ,唯大羽能也 ,人不及也。

我喜爱大羽先生的画。

今逢先生九十大寿 ,我因病废 ,足不下楼者已五年 ,故不能亲赴金陵称觴 ,谨草此文略抒敝见 ,借以祝大羽先生长寿。

圆田年 猿月 源日 写于兰州大学 圆田楼  
之 圆田室 ,时年 愿缘岁

## 《二妙轩文集》序

二十年前,一个偶然的的机会,到甘谷县旅游、访问,并做了几场学术讲演。在那里,看到了大象山,看了蔡家寺,还看到当年王辅臣和张勇激烈对战的地方。当然,也结识了一些地方人士,其中就包括陈冠英同志及其夫人,记得还应邀到他们家下去吃了一顿便餐,看到他们书房里琴棋书画,文化气氛相当浓郁。

一转眼二十年过去了。冠英同志已经当上了天水市文艺方面和文化方面的负责干部。他干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业,即把“二妙轩”刻石挖掘出来,加以整补,纳入“杜甫纪念馆”以为重点内容。什么“二妙”?“二妙”者,一指杜甫秦州诗,二指清初诗人宋琬(荔裳)在当秦州道台时,聘请学人从明肃王府存《游化阁帖》中将“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字按杜甫秦州诗的文,一个个集到一起,这个工作没点文化水平还是不容易做的,但宋琬办的很妥当。于是晋人的字和唐人的诗就融合到一起,这不叫“二妙”,又叫什么。当然,历来人们也用过更沉重的字眼,如称杜甫为诗圣,称王右军为书圣,但这一“圣”,人们的头皮就紧张起来,倒不如“妙”字来的更令人轻松愉快。

这几年,冠英同志又征集很多友好、文人、名人从不同的方面来阐发“二妙”,有的钻研宋荔裳的生平和诗作,有的考证《淳化阁帖》二王字的由来,等等。这又是一件大工程。工程快完成之际,冠英同志又向我提出要求,叫我在书前头写一篇《序》。对此,我

有三种反映。

第一,我感到是一种荣耀。陇右自古文武人才济济,我何人斯,一侨寓之人而找到我。第二,我深感力不从心。以今年论,一年倒住了半年医院,还动了手术。走路要两个孙子两边架住。从前拿起笔来,文思喷涌,而今拿起笔来,一片枯竭。到底人是老了,不是一般的老,我看吴昌硕题画只到愿岁,那就是说,八十四五之人,婉言谢绝社会任务,已是人情之常,一点都不出格了。但是第三,我对杜甫的秦州诗和清初宋荔裳的诗,却都有过一番翰墨因缘,虽老不能忘情于怀。根据这一点,我还是应该把这写文章的任务接受下来,拼着老命去试试,即便写出大纰漏,读者也会原谅,“一个望九之人啦嘛。”

先来说和秦州诗的因缘。大约源年前,我被打入了“另册”,工资拿掉,还~~源~~一家八口靠~~源~~的数额过活。当时大孩子刚进大学门,二孩子高中应届毕业,三孩子上初中,四、五、六则在高小、初小、或幼儿园,一开学都要缴费。有个朋友就说,“另册”是不能发文章的,你找个笔名,我拿去找刊物发表,赚点稿费,也可以补贴家用嘛。于是我就写了《谈杜甫的秦州诗》。那是~~源~~年,距“文化大革命”只有三四年。这本来平安无事了,可是从上边吹来一股风,说这篇文章需要嗅一嗅。一到“文化大革命”,这嗅的成果就满园大字报铺开了,众口一声说这是一株大毒草。当时笔名用的是“鹿其莘”。这是取我原学名一个“姓”字的典故“姓 麋鹿”。“姓”读“莘”,我取的笔名,由此而来。但一位青年教师却在大会上说,“这是一套隐语。‘鹿’同‘戮’,‘莘’同‘心’,就是说共产党已经把他的心戮碎了。”看,这真是上纲上线的绝妙佳例。

其实当年那篇文章,把秦州诗并未说尽。现在老了,理解的更周全。假如杜甫的诗可以分三个时期的话,那么第一期我们叫“京洛期”,主导风格是现实主义的,像“三吏”、“三别”以及“北征”。第二期我们叫“秦州期”,作者的人生观有了变化,诗的风格

也有了很大的变化,诗的主导风格渐近于浪漫主义,调子激越苍凉,像《同谷七歌》,李太白写得出来写不出来,我们还未敢必。它在三个时期中起着一种“高屋建瓴”的作用。这点作用,在那篇“毒草”中尚未发挥出来。第三期我们叫“锦城——夔州期”,作者自己说“老来渐觉诗律细”,他用字更斟酌了,用韵更完美了,写一花一草一鸟一木,带有了某些自然主义色彩。但晚年当他回忆起开元、天宝间一些名臣猛将时,秦州风格和《同谷七歌》的调子,有时还有某些复辟。

现在,来说说宋荔裳。

我的老家是山东,从小就听见长辈们说一些有关地方文人王渔洋、赵秋谷、蒲松龄以及宋荔裳等的轶闻佳话,不知不觉在幼小的脑子里打下一点基础,老来就这些线索,进行某些研究。关于宋荔裳,我只听说他和于七起义的关系历来有两种说法,一是说他的侄子为了霸产,对他诬告;另一说法是于七本人就是一大豪绅,他的起义,栖霞、莱阳各地大户给予支持,所以声势很大,震动了满洲贵族的朝廷,派氏族兵“八旗”前来镇压,所以《聊斋志异》中《野狗》、《公孙九娘》都有“杀人如麻”的字句,这说的是镇压的残酷。当时,宋荔裳在外做官,未曾身历。但家族间的牵连不能没有。而《安雅留集》中很少反映。其实当时的文集,在发刻前,碍于害怕文字狱的牵连,无不经过大量的芟薙,把有一点“连碍”的都芟掉了。所以现在要找寻宋荔裳诗文感情的原貌,已经是很困难的了。

反正,宋荔裳跟王渔洋、赵秋谷间,是有很多不同之点的。明清换代时,宋已三十一,渔洋才十一二岁,秋谷更晚,已是纯粹而又纯粹的大清子民了。至于诗文风格,渔洋倡言神韵,施润章说“神韵”是一座“七宝楼台”。袁枚子才说渔洋“文深于情,才余于学”,意思是辞藻很多,但真实感情少;才分不小,可惜学问根底不深。赵秋谷一意不服渔洋,处处与之相抵,自己以善于独立思考,文章多有新意有名于时。宋琬则遭历大狱,诗文散失,今日吾人已远不

能窥其全豹。只是沈德潜说他“多悲愤激荡之音”，如何激荡，悲愤什么，我们后世人已很难说清楚了。

以《同谷七歌》的悲愤激荡，加以根据沈德潜所传的宋荔裳的悲愤激荡，合在一起想，不是不知不觉间对“二妙”的含义，又增加新的什么意思了吗？

是为序。

辛巳中秋前二日，写于兰州东郊



## 《刘克训画选》\* 序

弘宇老弟擦过年就届花甲了,朋友们都怂恿他出画集,可是我认定这画集只是弘宇前半生的反映和总结,并以此为跳板,过渡到后半生更繁茂更丰盛的艺术成果上来。

我和弘宇结交,有两个因缘。其一是我二人青少年时代都是在青岛渡过的。其二我二人都到了西北,他在格尔木和西宁一共过了二十七八年,现在又回到了山东。我在兰州一转眼已源年了,渐渐混籍为陇右之民,“东人不复返矣”。

就基于以上两条,在缘年代末,源年代初他开始访问我。记得那正是你好容易买到一包“高级糕点”,马上就被抢走;你在馆子里刚叫了一碗大米饭,马上就被抢走的年代。什么都要“券”、什么都要“票”的年代。在我那间“仰承”(顶棚)呼扇呼扇响着的小屋里,弄了一点酒来接待弘宇。从喝酒上,从画画上,我已经领略到弘宇有点儿狂。很多人讨厌狂,有的还深恶痛绝。我不然,我倒喜欢朋友中会有几个狂士,因为我从史书中读到过弥衡、嵇康这些人的事,还读过《游侠列传》,懂得这类人往往有比平庸的人有更多独特的造诣和成就。

有些年,有些人大批天才论,说天才是唯心主义虚构出来的东西。我当时想,大家伙都成了驯服的庸才,社会就前进了吗?曾几何时,现在翻过来了,报纸上到处登着“诚聘”人才的广告,报酬提

---

\* 此画集由学苑出版社于 圆园年出版。

到唬人的程度。用这种引诱法 ,就会出来货真价实的人才了吗?也未见得。

人才、天才、英才 ,都不是什么虚构出来的 ,它是实打实的。人既是自然人 ,又是社会人 ,所以人才的产生与遗传、少年环境、所受教育 ,特别是自我锤炼分不开的。人才的出现 ,并不像戏台上的文雅小生台帘一掀 ,啊哈一声摇着折扇出来的 ,而是从土里、粪里、骆驼蓬堆里滚着爬着出来的。弘宇成为一方有名的画家 ,也是如此。

特别画画的人 ,更需要有这种才。白石老人诗曰 ,“缶翁晚年有异才” ,什么是异才?根据我的理解 ,它是一种特殊思维的产物。现在天下人普遍使用的逻辑思维 ,特别是科技人员 ,全靠逻辑地分析。但逻辑分析 ,是普泛的方法 ,可不是唯一的方法。譬如说 ,“直觉”就是另一种方法。中国古时候传下的《易》和《诗》里就很多。八大山人和虚谷画的禽鸟和小动物之所以动人 ,就是因为它是通过“直觉”得来的。神韵派和性灵派的某些精辟诗句 ,若干高僧所谓忽然说出来的“偈”语 ,也都是这样。弘宇画的猫头鹰 ,也是如此。一看觉着好 ,怎么好说不明白。因为它感人的方式不是“明喻”而是“暗喻”。闻一多先生说 ,暗喻就是把明白的东西说的更不明白点。好极啦 ,那些有“异才”的画家 ,所给予观众和读者的 ,就是这种不明白点中的明白。

最后 ,再说点老事。

清初江西有个大学者叫魏禧。我们在中学课本里的《大铁锤传》就是他写的。他有个老朋友儿子叫王源号昆绳 ,拿了自己得意的文章叫魏禧看 ,意思是要得到大家的奖誉。魏禧却不说奖誉的话。过多少年 ,王昆绳又到扬州来 ,颊下须已数寸 ,目炯炯有光 ,写的文稿摞起来已数寸。魏禧看了 ,只说“文章可底于用者 ,十之三矣” 。又过多少年 ,王昆绳也老了 ,又来扬州 ,说是要出文集 ,请魏禧作序 ,魏在序的末尾写道 ,

“人学问当有变化。少年英发 ,及中晚之岁 ,贵深沉掩

抑 ,使不显其光…… ”

我拿这些情节 ,比附到弘宇的事上来。人学问当有变化 ,艺事也应当有变化。弘宇也越不出这个规律。试观弘宇所画猫头鹰 ,题辛巳的比庚辰的有一点不同了。这就是变化。魏禧是遗民 ,所以他提“掩抑”和“不显其光”。我们是新时代人 ,“掩抑”是不必了 ,但“深沉”还是要的。祝愿弘宇下半辈子的另本画集 ,既要保持少年时的“英姿” ,又要增添许多“深沉” ,是为序 ,兼以为嘱。

愿家老人赵俪生写于兰州大学 ,时  
惟辛巳深秋 ,奄忽冬之将至

# 师友回忆

# 混着血丝的记忆

## 摇摇摇摇——悼念闻一多先生

摇摇惨此世之无乐，咏在昔以为言。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陆机

我也还有记忆的，但是，零落得很。我自己觉得我的记忆好像被刀刮过的鱼鳞，有些还留在身体上，有些是掉在水里了，将水一搅，有几片还会翻腾，闪烁，然而中间混着血丝，连自己也怕因此污了鉴赏家的眼目。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鲁迅

我初番知道闻一多先生的姓名，怕是十五六年以前的事了。那时我正是青岛一个初级中学里的小学生。像北伐以后的每个中学生一样，我们在刚刚从“五四”退下阵来的许多国文英文老师的启发之下，及早地邂逅了新的思想和新的文学。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茅盾、徐志摩……都像“霓虹灯”般地照亮着当时我们那些半幼稚半愚昧的头脑。在那些《呐喊》、《彷徨》、《落叶》、《塔》、《迷羊》之中，有一天便闯入进来一本特殊地装帧了黑封皮的诗集《死水》，那种相当严格地将西洋诗的节奏应用到中国的新诗中来的风格，颇为当时我们那一群也多少读过几首英文诗的学生所欢迎。从那以后，我们的脑海里便又增添了一个崇拜的偶像。

我初次得瞻仰他的丰采，则是在读了《死水》之后的两年，在我族伯的客厅里。我的族伯是清末的一名进士，也是乡中最大的

地主。民国以后，便以收藏家的令名斐声于岛上了。那时同他老人家往还的，差不多都是名流学者，我每次去给他“请安”的时候，都会遇到几位的。记得叶誉虎（恭绰）先生是最常碰到的一位，他常常为了搜求或者考订什么古书、字画、碑贴等事，不惜从上海前来商谈。此外，还有新文学家王剑三（统照）先生和山东图书馆馆长王献唐先生。有一天，我又邂逅了一位厚发清癯，鼻上架有银丝眼镜的中年人，我的族伯事后介绍说，那是青岛大学的教授浞水闻一多先生。

那次我并没有能够同他交谈，因为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大庭广众之中，只有“怡然敬父执”的份儿，而没有“问客来何方”的份儿的。以后不久，我便从传闻中得知，青岛大学因为山东省府、青岛市府、胶济路局和教育部诸派势力的分化与磨擦，爆发了学潮。许多愚昧的学生受了地方势力的挑动，对校长杨振声先生，院长梁实秋先生，系主任洪深先生和闻一多先生肆力攻击。记得当时偶尔走经青岛大学旁的山石边时便看过一条刺目的标语“驱逐不学无术的闻一多”。据说当时支持了闻先生的学生只有一个人，那便是在他那无窗室中苦吟着生活的烙印的臧克家君。

时光流逝了几年，一直等到“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前一年，我从大学一年级不分院系的普通学生走入了分系的二年级时，这才在教室里亲炙他的教诲。那时，作为一个外系的学生，我竟能在系主任严格地执行选课规划时，“偷漏地”选了中国文学系的四门功课：“诗经”、“楚辞”、“唐诗”和“中国古代神话”。而且那又都是闻先生的功课，在一般人看来不免会觉得希奇，或认为我这行径有着甚深的“捧角儿”的意味。确实，连我们自己也不否认，我们当时有一般同学就真是回避了那些强迫我们记忆英、美文学家的生卒年月的课程，而去听几位为我们所崇敬的有正义感的教授的讲演。像那样的教授除闻先生外，还有当时哲学系的教授张申府（崧年）先生。自然，在他们两位中间，因为性格与学业的不同，也

自有他们的差别在。

那正是“九一八”之后，国内国外双重的压力正加紧地煎迫着中国的人民，也煎迫着学府中有血气的师生。那时，发生过刚从苏联游历归来的冯芝生（友兰）教授被逮捕到保定的事。<sup>①</sup>张申府先生在课堂里以热泪激动了学生的正义，还闹过一点乱子。而闻先生在当时，却未免显得含蓄而又固执。他当时在课堂内不大谈什么政治（有时自不免发两句牢骚），而只谈考据。他说话的本源不外是《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古今图书集成》这些“类书”和《玉函山房辑逸书》一类道家的纬书，这是他研究作为“神仙家”的屈原及《离骚》以及古代神话，所自必遵循的道路。当时他给予学生的印象是苦学、诚挚、而且神秘。在这里，“苦学”与“诚挚”自不需另加诠释，至于“神秘”二字，我愿引用他自己题名为《玄思》的一首诗中底两节来加以说明：

摇摇在黄昏的沉默里，  
摇摇从我这荒凉的脑子里，  
摇摇常进出些古怪的思想，  
摇摇不伦不类的思想：

摇摇仿佛从一座古寺前的，  
摇摇尘封雨渍的钟楼里，  
摇摇飞出一阵猜怯的蝙蝠，  
摇摇非禽非兽的小动物。

的确，他的诗里是常常提到蝙蝠的。在另首诗里，还有过“黄昏里织满了蝙蝠的翅膀”，我至今还喜爱而且还能背诵这句诗。在当时，由我们某些个学生看来，他确实有着一一种蝙蝠般神秘不可

<sup>①</sup> 那件事后来被冯先生自己写在一本“贞元之际所著书”里，说是“洞中才五日，世上已千年”。

测的什么。例如他书斋的墙饰、桌饰以及窗帘、家具等大都纯是黑色，以及他喜欢在黄昏时走来上课等等，便都是有力的证据。

记得是初夏的黄昏，马缨花正在盛开，那桃红色绒线穗儿似的小花朵，正发放出轻淡的香味。七点钟，电灯已经来了，闻先生高梳着他那浓厚的黑发，架着银边的眼镜，穿着黑色的长袍，抱着他那数年来钻研所得的大叠大叠的手抄稿本，像一位道士样地昂然走进教室里来。当学生们乱七八糟地起立致敬又复坐下之后，他也坐下了，但并不即刻开讲，却慢条斯理地掏出自己的纸烟匣，打开来，对着学生露出他那洁白的牙齿作蔼然地一笑，问道：“哪位吸？”学生们笑了，自然并没有谁坦直地接受这早烟早烟风味的礼让。于是闻先生自己擦火吸了一枝，使一阵烟雾在电灯光下更浇重了他道士般神秘的面容。于是，像念“坐场诗”一样，他搭着极其迂缓的腔调念道：

“痛——饮——酒——  
熟——读——离——骚——  
方得为真——名——士！”

这样地，他便开起讲来。显然，他像中国的许多旧名士一样，在夜间比在上午讲得精彩，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不耐烦向注册课交涉把上午的功课移到黄昏以后的理由。有时，讲到兴致盎然时，他会把时间延长下去，直到“月出皎兮”的时候，这才在“凉露霏霏沾衣”中回他的新南院住宅。在讲课中，他显得繁征博引，那股儿浓烈的学院气息，颇有泰山压顶之势。但说句老实话，他的治学方法，在我们某些个学生们觉得，是并非完全没有缺陷的。他太喜欢根据两件事物在文字或音韵上的一点偶同（就这点偶同也往往是经多日的穷搜才得到的材料），而大胆地把它们牵扯到一起。例如在讲诗经时，他把《桑中》“要我乎上宫”的“要”字解作现在北方俚语中的“操”字（这还是等到班中两位女生同时请假了，才讲了出来）；在讲“中国古代神话”时，他把“尧”字和《列子》中被



上帝派去轮班用脑袋顶住归墟五山的“鳌”解为一事，并且还根据“封于有庳”（“庳”，一作“瘳”，今有鼻墟）一句把舜的弟弟象和“殷人服象，为乱于东夷”的“象”说成一起了。自然，这不仅闻先生如此，自乾嘉以后的若干许多“翻案”学者，以及顾颉刚先生和早期的郭沫若也大都如此。在这里，我记起了一个笑话。那时，我已经随便捡拾了“冯夷”二字作为发表文章的笔名了，这件事闻先生自然并不知道，但同学们却是知道的。有一天，他在“神话”班上兴致勃勃地开讲了：

“我今天要讲讲冯夷。冯夷是什么呢？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位水神的名字，其实这说法还不彻底。冯夷就是‘羿射封豕长蛇’的‘封豕’，一作‘封豨’——也就是：一条大猪！一条大猪！”

同学们轰堂大笑了，有几位跟我特别熟的还拿铅笔头儿描住我，笑得腰都直不起来。这颇使闻先生为之不解，他几乎要怀疑同学们在“起他的哄”了，直到事后有位向他一语道破，他才一笑置之。

但不拘他有时考据得不免有几分大胆的地方，我们也还是热切地听他底讲，记录他的笔记，因为他到底能够从荒谬的传统见解中剔罗出许多较之牵强处为数更多的确切的新见。例如他从古代神话中找出许多有关古代礼俗的宝贵的材料（如关于社、郊祀、高禘、祓除不祥等等），是颇能使我们折服的。此外，我们尤其爱戴这位老师的，倒是他的全人格。只要你跟他上过一堂，你便会看出他多么热情，多么坦直。（自然，那时，他有时也很乖僻；不过我想他后来一定并不如此了。）前数年，在有一次跟束衣人君闻谈时，我曾引用了傅青主赠李天生（因笃）诗中的一联“由来高格调，发自好心肝”来描述清华园中的闻一多先生，自觉十分惬意。不过昆明时代的闻先生恐怕就绝不只此了，在那个阶段中我虽然在形骸上与他隔离了，但据我的设想，他是以“好心肝”为基础，又复挣脱了“个人主义”、“名士”的羁缚，而英勇地站上了为广泛的人民

而服务而战斗的前哨了。

当时北平的大学生正在两年中连贯地发动了“一二·九”、“一二·一六”、“三·三一”、“六·一三”、“一二·一二”五次请愿示威的游行,此外还有一次到保定高碑店被打回去的“扩大宣传”和到绥东的“战地服务”。闻先生曾几次为这些事情慷慨捐钱,并曾为绥东战士绝食一日,这是我确实知道的。在赞助文艺活动方面,他曾为当时我们组织的国防文艺社和后来由国防文艺社改组扩大而成的清华文学会帮忙不少,曾出席过鲁迅先生追悼会,而且还登坛致词,后来还替我们介绍了许多文学前辈梁实秋、沈从文、朱光潜诸先生到会讲演。在这方面,闻先生较之那些托辞“我们要唱昆曲”因而“没有时间”参加“你们的会”的教授和最初也“签名”,也“发动”,也“题字”,也“领衔”,然而一旦人家对他的半月刊社发给津贴之后,便一切都“婉辞谢绝”的名流,是有着截然的区别的。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使我们仓皇地离别了。后来只是同年10月在武昌会过一面,谈过一个多钟头,此后便再无晤面的机缘,而根据本年本月15日的昆明电讯,他的遗体业已火葬,那么当年武昌之别,显已成为永诀了!从那次分别之后,闻先生徒步走向了西南,到了昆明,我徒步走向了西北,在太行、吕梁、中条诸山中,流徙地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者作了两年余的战斗,直到1945年我因为疾病的缠累不得不退到后方开始营这“呻其占毕”的生涯时,这才偶尔在一份画报上看到闻先生参与演出了一场什么剧之后,和编剧演员们合拍的一张照片。出乎意料地,他竟留起胡子来了!(这又不禁使我想起一度飘洒在六全大会主席团上的冯芝生教授底胡子。)不久,又听人说他已在由蒙自到昆明途中某次敌机轰炸时“被炸身死”了,又有人说是“身负重伤”。这使我很焦虑,不能不写封信,迳直地去打听打听。也许是我信中叙述戎马生活的字句有些打动了他的吧,这位一向疏懒于复信的老师,竟破格

地用蝇头正楷给他的学生复了一封长信：

俪生同学：

离故都瞬将三载，同事教职员十九随校南迁，仍得朝夕晤对，无异昔日。唯旧时同学诸君，分散略尽，消息杳然，存亡莫卜。每一念及，辄为之黯然神伤。顷接手书，藉知吾弟数年来情况，并诸同学近状，回环展诵，悲喜交集。八年前旅居青岛时，曾得谒见令伯父孝翁先生，追陪履杖，古貌高风，暖然似春，私心仰慕不已，顷闻遽归道山，曷胜震悼。冯芝生、朱佩弦、吴雨僧诸先生均在昆明本校……多自离平后，初居武汉数月，及学校迁湘复课，即往长沙。学校迁昆明时，有同学二百余人，组织旅行团徒步西来，多亦随行，在途中两阅月，虽倍极辛苦，然亦有想象不到之趣味。现行年四十，已鬢鬢有须，即途中之成绩也。空袭受伤，乃至昆明后事，来函云云，谅系传闻失实。平时对舞台设计，极感兴趣，前者陈铨先生导演《祖国》，曹禺自导《原野》，均系由多设计。早年本习绘画，十余年来此调久不弹，专攻考据，于故纸堆中寻生活，自料性灵已濒枯绝矣，抗战后，尤其在步行途中二月，日夕与同学少年相处，遂致童心复萌，沿途曾作风景百余帧，到昆后又两度参与戏剧工作，不知者以为与曩日之教书匠判若两人，实则仍系恢复故我耳。校中休假办法，去岁又经恢复，多年限已届，遂即请求休假，迁居距昆明四十公里之晋宁县城。到此闲居将近一年，除略事整理《诗经》、《楚辞》、《乐府》、《神话》诸旧稿外，又从易经中寻出不少的古代社会材料，下年将加开“上古文学史”一课，故对于诗歌、舞蹈、戏剧诸部门之起源及发展，亦正在整理研究中……同学施忠说君曾随校至湖南，读书数月，后赴陕晋一带工作，一年以前学校文学院在蒙自时，曾一度来函，后即音信杳然，颇深系念。吾弟若知施君消息，务望见告，否则，亦请设法向熟人打听，至荷至荷！此复顺颂，文

安！

一多手启摇五，廿六，晋宁。

这封信无异是闻先生的一段忠实的自叙传，在我看来尤其觉得足以宝贵的，是在这里闻先生自己指出了他脱离书斋生活走向人民的转枢——从衡阳走到昆明的两个月的徒步旅行和在这段旅行期间他与群众（虽然只是青年知识分子）初步打成一片的经验所给予他的启发。这是他一生中最坚实的生活实践的起程碑。从那以后，他的正义感，他的人道主义，便像江河的水流通过了闸门，越流越汹涌，越流越壮阔了。

昆明双十节以后，我收到挚友王瑶兄从昆明寄来的一封信，其中以大部的篇幅描述着闻一多先生：

……闻一多先生近来甚为热情，对国事颇多进步主张，因之甚为当局及联大同仁所忌，但闻先生老当益壮，视教授如敝履，故亦行之若素也。昆明宪政促成会闻先生推动甚力，双十节召开纪念会时，闻先生朗读宣言，中有“……政归于一党，权集于一人……节节溃退，国民党实不能辞其咎……”等语，态度激昂，群众甚为感动，未决议如召集国是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等，中央特务当场开枪，略事骚动，复归镇静。现闻先生为援助贫病作家，纪念鲁迅文协及青年人主办之刊物等，皆帮忙不少，态度之诚挚，为弟十年来所仅见……在联大上课时，旁听者常满坑满谷，青年人对之甚为钦敬……

同年同月后接束衣人君自复旦来信，也同样地道及闻先生：

……在双十节，昆明举行数万人的大集会，冯夷师，你知道吗，你底那位说“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的《死水》的作者闻一多老师，不久前高喊田间为时代的擂鼓的诗人，现在，索性抛开书本，高喊民主，做起这个数万人呼喊自由与愤怒的群众大会的主席啦！当三位主席之一——云大校长说及学问研究的重要性的时候，这位从旧堡垒里走出来的

老诗人立即吼起来：“什么学术，什么研究，抛开它们吧，我们要干，干，干！”冯夷师，你会相信吗，这样大喊大叫的是闻一多先生呢……

就这两段也已足够了，足够给闻先生被害前两三年中的生活，做一个生动而概括的写照了。由此可以看出，本月 5 日昆明大街上的狙击事件，虽然投给了闻先生生前的一切故旧和中国爱好自由、和平与民主的人民以不可遏止的愤怒，并使他们更坚定自己的意志去为闻先生未竟的遗志而努力，但在闻先生本身则是业已尽了他最后的牺牲，毫未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地躺倒了。他底死，在他的卑鄙的谋杀者和敌人看来，也许是一个值得夸大的胜利，但在他自己则不过是好像走到了一个旅程的预期的终点而已。清初的全谢山（祖望）在记述张苍水（煌言）的一篇碑文里曾说：“且天下无惜死之忠臣，剖肝绝腹，正所以全归也。”我认为把这话拿出来状述人民忠臣的闻一多先生，也是惬当的。

七十岁的老翁罗曼·罗兰对苏联的人民说：“从巴黎到莫斯科这个旅程并不平顺，但我已经走到了。”相同地，作为闻先生的友生之一，我也曾眼瞅着这位“行年四十，鬢鬢有须”的老青年，踏着他那矫健的步伐，走出了他那黝黯的书斋，经历了一段并不平顺的旅程，终于走进了人民的群中。他已走到了。而且，他死了。只此而已。我觉得，需要替已死者表白一番，并且向后死者述说了一般的，也正在此，也仅在此。至于他底诗的风格与所谓“新月诗派”对于中国新诗坛的影响，他在殷商贞卜文字，诗经、楚辞、唐诗、乐府、中国古代神话诸方面的精湛的研究，他早年所习的绘画与舞台设计，以及他晚年也常常玩玩的金石篆刻的技术等等，则在我这毛头小子看来，都未免是“次焉者”的事，有的则简直是“末节”而已。

一九四六年七月廿七日陕西蔡家坡

## 谨评闻一多先生的学术成就

### 摇摇摇——兼论新中国文献学所可能预期的水平

闻一多先生为民主事业而壮烈牺牲,到现在已经三年半了。他的全集问世,也已一年有余。在这期间,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已经获致了基本的胜利,中国社会已经起了基本的变化,中国的学术水平也行将在改造中大大地提高。在闻先生遇殁的次日,我曾衔哀写过一篇小文,题名《混着血丝的记忆》,载上海《文艺复兴》杂志,以志悼念。而今我又复感觉一种必要,去对闻先生的学术成就试做一次严肃的评鹭。然而我是闻先生的学生,无论从师生的关怀上,或从治学经历的修短上来做这一工作,确是有些诚惶诚恐的。但闻先生自己在《匡斋尺牘》中也曾说过:“当我为一个较新的观点申诉理由时,若有非难旁人的地方,请你也记住,我的目的是要站稳我自己的立足点,我并不因攻倒前贤而快意。这点动机上的微妙的差别,也不要忽略了才好。”同样,当我企图对中国文献学水平之应大大提高的这一论点有所阐述时,假如我冒昧地对闻先生学术成就的美中不足之处有所触及,那末先师地下有灵,或当不加呵斥的吧。

我敬谨阅读了闻先生的全集,至再至三,现在将主要意见归纳成三点,胪列并阐论于下:

第一点意见:闻一多先生是一位在早、中年期中,在世界观人

生观方面颇为动荡、颇为摇摆不定的人，然在晚年，由于对蒋介石的疯狂反动的憎恶，由于受了进步青年们的拥护与影响，由于参加民主运动的组织活动的实践，他在思想意识上大大的改变，获得了人民意识，并开始试验着运用新的方法与观点去治理学术。然而，也究竟因为他在逝世前倾向于新事物的时间短暂，他新理论的修养与新实践的基础尚不深厚稳固，因而他尚不能很好地、充分地运用人类最进步的理论去用之于学术。

闻先生在早、中年时期确有行动摇摆的表现，这可见于季镇淮先生所作年谱，以及先生自己的书札。例如 1927 岁时，自美国寄信回国说：“留居美国之滋味，非笔墨所能形容。俟后年年底我归家渡岁时当与家人围炉絮谈，痛哭流涕，以泄余之积愤。我乃有国之国民，我有五千年之历史与文化，我有何不若彼美人者？将谓吾国人不能制杀人之枪炮遂不若彼之光明磊落乎？总之，彼之贱视吾国人者一言难尽。我归国后，吾宁提倡中日之亲善，以抗彼美人，不言中美亲善以御日也。”抗美是好的，但提倡亲日则是偏差。又如 1937 岁时，写信说：“纽城同人皆有意于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我决意归国后研究中国画并提倡恢复国画，以推尊我国文化。”想研究中国画也是好的，但提倡恢复国画则又是有些偏差了。我举这些例证，仅是借此来说明一种事实，并因而显示闻先生晚年的猛烈的进步之不可企及，以及闻先生新基础之并不深厚（因为与他这一时期的同时前后，李大钊、瞿秋白等人，已在正规的革命道路上斗争着了）。

然而闻先生晚年的猛烈的转变及其壮烈的死，实在是不可企及的，那几乎是中国正义的士大夫自杨椒山（继盛）以来“嫉恶如仇”的德性之最高的表现。在学术方面，在这一时期中，他也初步地试验着去运用新的方法与观点了，这一事实最典型地表现在他的《屈原问题》一文，在这篇文章里，闻先生对孙次舟先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纯粹考据予以批判与发扬，又对于当时成都文艺

界的盲动亦予以批评。他说：

孙先生以屈原为弄臣，是完全正确地指出了一桩历史事实，不幸的是，他没有将这事实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代表的意义，充分的予以说明，这也便是误会之所由发生吧！我以为，事实诚然有些讨厌，然而不先把意义问个水落石出，便一窝蜂地拥上来捣毁事实，以图泄愤，这是文艺界朋友们太性急点，至于这时不赶紧宣布意义，让意义去保护事实，却只顾在事实的圈子里招架，也不能不说是孙先生的失策……

孙先生的误会，是把事实看倒了头，那便是说，事实本是先有弄臣，而后变成文人（而且不是一个寻常的文人），孙先生却把它看成先有文人，而后变成弄臣。这样一来，真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依我们的看法，是反抗的奴隶，居然挣脱枷锁，变成了人，依孙先生的看法，是好好的人偏要跳入火坑，变了奴隶，二者之间，何啻天渊之隔！……所以，依照孙先生指出的事实，加上他的看法，文艺界对他群起而攻之，是极其自然的现象。<sup>①</sup>

在对于这一事件的批判里，闻先生所持的观点是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因为他不是把事实孤立起来看，而是把屈原的活动和成就作为历史发展中的一件事来联系地看的。这种见解之获得，这种方法之掌握，实实在在是闻先生积极参加民主运动的群众活动与组织活动的体会与结果。郭沫若先生在全集的序文里说：“由庄子礼赞变而为屈原颂扬，而他自己也就由绝端个人主义的玄学思想蜕变出来，确切地获得了人民意识。”这评语是确凿的。

但，我为什么又说闻先生的新基础尚不稳固呢？也有证据。《现代诗钞》（或名《新诗选》）的编选工作是在他 35 岁及其以后的数年中做的，并不是早期的选作，但在那本诗选中他所悬的政治标

<sup>①</sup> 见《闻一多全集》甲，第 30 页。



准是有欠严格的。一方面,他歌颂田间为“擂鼓的诗人”、“明日的诗人”,同时他也的确选入了不少艾青和田间的诗,然而另一方面,他又以唯美的尺度把陈梦家的《白俄老人》一类的诗选入进去;苏金伞本身是一位战斗的诗人,但闻先生却只把他《夜猎银狐》的一首美诗收入;此外,他又把被郭沫若先生指为“蓝色文学”派的几个青年诗人的诗,选入了不少;至于他选入赵令仪的一首“鸳鸯蝴蝶”派的诗,即是闻先生自己也已作过自我批评的了。这种“兼包并容”的态度,亦即旧民主主义的态度,表现在与颂扬屈原的同时稍前稍后,是可以充分证明闻先生在某些场合对新事物新理论的掌握业已相当坚强,但在另些场合还不能避免政治上软弱的症象。

第二点意见:基本上,闻一多先生是一位诗人(自然,他的诗人之中还包有斗士和学者的两重人格,一如朱佩弦先生所说),但作为诗人的他的卓越贡献,如其说是在于《红烛》和《死水》那两部诗集带给中国新诗坛以摹拟西洋诗格律的影响,倒不如说在于他用诗人的经验去解释文学史上的诗篇,使那些为汉学家和宋学家糟踏得稀烂的诗句和诗,重新恢复了它们那自然而又新鲜的意义。

关于这一点,首先我想的是闻先生虽是一个内心炽烈的人(其炽烈的程度也许并不亚于“天狗”时代的郭沫若先生),然而他那《红烛》、《死水》两部诗集带给当时中国新诗坛的影响,基本上却是唯美主义的。不管闻先生生前对这一点如何不服气,例如他给臧克家先生的信中就曾控诉过,他说:“说郭沫若有火,而不说我有火,不说戴望舒、卞之琳是技巧专家而说我是,这样的颠倒黑白,人们说,你也说,那就让你们说去。”然而今天我们公允地判断,固然闻先生的诗是大大有别于戴、卞,然其影响却也大大有别于创造社之革命浪漫主义的狂飚运动。因此,在这里,我仍不愿把作为新月派诗人的闻先生的诗的影响,估价得过高。

然而闻先生作为一位诗人，他对历史上的诗歌遗产却了解得那样深远微妙，以致令人感到去听闻先生讲诗，或去阅读闻先生讲诗的文章，实在是一大享受！举一个例证：《匡斋尺牋》中有连续几段讲《诗经·狼跋》篇的文章，讲得真是高明而美妙！在他引用《易林·震之恒》的“老狼白獠，长尾大胡，前颠后踬，岐人悦喜”来和《狼跋》的“狼跋其胡，载疐其尾，公孙硕膚，赤舄几几”对比并解释了“膚”字之后，他说：

在一个人的服装中，鞋不是最打眼的一部分，除非你是在注意他走路的姿态。此诗上以跋胡疐尾说明老狼行步艰难，下文即描写公孙的赤舄，可知诗意是以狼之跋胡疐尾形容公孙的步态。一只肥大的狼，走起路来，身子作跳板状，前后更迭的一起一伏，往前颠时，前脚差点踩着颈下垂着的胡，往后坐时，后脚又像要踏上拖地的尾巴——这样形容一个胖子走路时，笨重，艰难，身体摇动得厉害，而进展并未为之加速的一副模样，可谓得其神似了。<sup>①</sup>

《狼跋》的作者固然得其神似，而闻先生的这段说诗也真是更得其神似了。另一个例证：《唐诗杂论》中有三篇讲初唐诗歌的文章（《类书与诗》、《宫体诗的自赎》、《四杰》），在这里，闻先生用了他那简洁锋利的文笔，把从“堆砌辞藻”“螭螾转丸”式的六朝宫体诗到唐太宗、虞世南所代表的“类书式的诗”，到打开风气的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到刘希夷的宁静，到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这一条表现崭新事物如何从僵死的旧时代中生产下来的鲜明线路，极清晰极凸出地刻划了出来。像这些地方，都不能不说这是作为诗人的闻先生底独特的造诣。

第三点意见：由于闻一多先生一生最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学院气息极为浓厚的学校里教书，因而他大部分精力就不能不在“故

<sup>①</sup> 见《闻一多全集》甲，第猿园页。

纸堆中讨生活”，因而他一生的成就（如全集所表现出来的），也就不能不主要地表现在文献学这方面。他曾对《楚辞》、《诗经》、《周易》、《庄子》这四种文学，同时也是历史的古代文献，下了很大的功夫，做出了若干相当精彩的考证；同时，他在殷商卜骨文字和两周青铜器铭文方面，也下过一番相当大的功夫。然而，由于他过早地逝世，由于他那“热烈的爱憎与精悍之气”（朱佩弦先生语），使他在这一方面的造诣始终未能达到顶极，使他在他的考证学的既成业绩方面表现为胆大而不冷静，在蒐查类书与堆积证据时还不免于受自己主观的支配，因而使他在古文献字句的琐节考证方面，最多亦未能超越高邮王氏父子所表现的境界，在大关节目的解决问题方面，与“通方知类”（梁启超语）的王国维的业绩，亦尚有其距离。

谈到文献（广义的文献）考证学，就我在这方面极疏浅的经验，我是喜欢把它分做两类的，一类是在文字、章句、训诂、版本、目录诸方面的琐节考证，一类是在大关节目上解决问题的考证，而同时我愿附带地说明，我这样分，丝毫没有瞧不起前一类考证的意思，恰恰相反，这种在文字、章句、训诂、版本、目录诸方面的琐节考证，假如能够做得十分精细并且在量上做得相当的大，则也是一个极基本的工作，而且那些在大关节目上解决问题的考证，也必须以这样琐节考证的大量集合，充当其基地与凭藉。然而，反过来说，假如我们不是来泛论整个中国近代文献考据考证学的成就，而是个别地去检查并评判一个文献考证学的个人成就时，那末，我们就不能不看他的琐节做得是否十分精细并且相当大量，同时（而且是尤其重要的），还要看他能不能以自己（和别人）的琐节考证的精细而大量的成绩同做出发点，使自己上升到大关节目的解决问题的考证。例如我们悬了如上的尺标来衡量闻先生，则可得出结论，即闻先生在琐节考证方面颇有几处是精彩的（如《诗·新台‘鸿’字说》），然大部分仍不免于主观地堆积证据和自信心太强的

弊病，在量的方面以先生的寿数来比并不太小，然一般地说并不太大，尤其重要的是他还很少能以自己（和别人）的琐节考证做基础，使自己升到大关节目的解决问题的考证（自然，在这里我们又不能不重视他之年未五十遽尔遇害的事实，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了）。

假如我可以拿王国维、陈寅恪二先生的学术风貌与闻先生试作一番对比的话，那末我要说，王国维的特点是博而精，冷静，多解决问题。自然这种解决问题并不是永恒的，然而在他当时的学术水平上则是解决问题的（例如他的《殷周制度论》，甚至像一篇《生霸死霸考》，后来都经董作宾先生和郭沫若先生做了修正和补充，但在清末民初实物证史的幼稚期中，这些文章还是解决问题的，还是学术水平从较低提到较高中间必经的阶梯）。陈寅恪先生则以他掌握的极度谨严为其特色，即以其《隋唐制度渊源论》来说，当他运用一个证据（哪怕那仅是胡三省的一条《通鉴注》）时，他必先用几个副证据来把这一主证证得确凿了，然后再用。同时他不忽视反证，也不抹煞反证或隐蔽反证，而是从反证的攻倒中稳步地建立自己正面的证据。这些特点，在在都值得现在的史学工作者学习的。闻先生绝不是冒险主义者，他不跳越问题，但他也没有能够很多地解决问题。他大胆而不冷静，不免于主观自信力的太强，喜欢查类书，喜欢堆积证据而不善于挑剔证据，喜欢作假设而不善于做定讞（自然这里所谓定讞也是暂时的定讞）。根据以上的比较，我对于郭沫若先生全集序中的下列论断未能苟同。他说：

……就他所已成就的而言，我自己是这样感觉着，他那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

郭先生是我最钦仰的一位近代学者，他的《两周金文辞大系》是我学治金石学阶段所极尊奉的经典，并且我认为他的《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是截止到目前中国文献学之最高水平的标志，然

而 ,当他赞扬闻先生的文献学成就为“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时 ,我则期期以为不可了。尤其到了今天 ,在革命胜利后 ,大家的政治水平事实上已大大提高 (而且今后仍要继续提高) ,不久即将出现的文献考证学的新水平亦自必较前大大地提高。这绝非痴人说梦 ,而完全是意想中事。那末 ,在新文献学水平上来衡量 ,我们仍要推尊闻一多先生的业绩为前一段落中学术工作者个人努力之登峰造极的表征。然而此后的文献学 ,倘能在四五十年中培育出数十个或者近百个闻一多式自强不息的工作者 ,而他们在理论方面假如又能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具体的客观真理作了充分的掌握 ;假如他们又能够深入资料、结合理论、把工作成绩从琐节考证的量的增高 ,引到质的移行 ,因而使中国文史学的若干大关节上悬而未决的问题——得到了相当满意的解决 ;假如他们又能把各自孤立的研究和发明联系起来作一种集体的成绩而表现 ,那末到那时候 ,人们会像发现奇迹一样 ,惊讶地看出了中国文献学和历史学的水平业已远远地超迈了为闻一多先生所代表的时代。到那时候 ,假如闻先生地下有知 ,也会含笑于九泉的。

一九五九年 八月 苑日 ,于济南

## 忆述嵇文甫前辈的学术风貌

—

嵇老逝世，转瞬已 100 年了。《史学史研究》季刊从去年就叫  
我写一篇评述嵇老的文章。对此，我的心理反映是复杂的，大体第  
一是不敢承担，第二是不敢推拒。稽老是一位“极·高·明”的学者，  
学术界早有公见，我亦知之甚悉；但有无不足之处呢？此则后学之  
不宜议，即议亦应恰如其分，很难掌握尺寸。至于不敢推拒的理  
由，则是我中年时候颇受嵇老的“知遇”，为我的习作撰序，给与热  
情的期许，我从他的“警·教·之·微”中，领会到很多东西；并且我平生  
所教功课如《明清思想史》、《中国社会经济史》与嵇老当年在北  
大、河大所讲课目，也十分一样。看起来，绳绳相继，作为后来人是  
有责任讲一讲前行者的。

在讲嵇老的学术之前，让我先讲一点我所知道的他的生平践  
履。旧时代的理学家很讲究“践履”这一条。那么我要说，假如嵇  
老的学术风貌可以用“极·高·明”三个字来表达的话，他的生平践履  
可以用“坚持进步”来表述。记得 1952 年的严冬，我在牛维鼎同  
志和周可任烈士的陪同下，到开封刷绒街去对嵇老做第一次的晋  
谒。伪河南警备司令部政训处在嵇家门口的外墙上刷制巨幅蓝底  
白字的标语：“纷杂错综的思想必须纠正”！可是嵇老处之泰然，  
长袍马褂、翁头棉鞋，两手不断挥动，吐嘉言如锯木屑，霏霏不绝。  
当时谈的是孙夏峰。并且接连谈了三个深夜。稽老的次子嵇道之

先生前年为乃翁撰传<sup>①</sup>说嵇老平生心仪“一峰二山”，慕孙夏峰之平实、王船山之深微、全谢山之淹贯。确实，嵇老在哲学方面，颇有契于船山的“极深而研几”；而在生平践履方面，则极肖孙夏峰。傅青主（山）有一次到夏峰来为其母寿髦君求墓志，归去后回忆说：

顷过共城，见孙钟元先生，真诚谦和，令人诸意全消也。……不知者以为世法模棱之意居多，其中实有一大把柄！……理学家法，一味板拗，先生则不然，专讲作用。此等学问，亦大难向腐儒讲矣。<sup>②</sup>

在满洲贵族多方监视下的夏峰与在反动派多方监视下的嵇老，两者何其相似？！但这两位一古一今的思想家，胸中都有一大把柄，在生活上尽可模棱，但把柄（坚持进步）不可丧失。这一点非常宝贵。以区区数十载之所目见，积学甚深者不乏其人，但在践履方面，戡乱者有之，献鼎者有之，护跽者有之，劝进者有之，甚至叛国者亦有之，由此观之，“把柄”一事，殊非易易。这是我个人认为在嵇老的践履方面，作为后死者不能不说到的一点。

## 二

先生姓嵇名明字文甫，以字行。河南省（旧卫辉府属）之汲县人。生清光绪元年（~~1875~~），逝世于~~1958~~年，终年~~83~~岁。平生生活于清朝者~~83~~年，生活于民国年间者~~75~~年，解放后又~~19~~年。以~~75~~岁赴苏留学为平生重要经历，从此学到了马克思主义。生平著作，想其次子道之先生或有编年目录，但未见发表。我所见到的嵇老著作，为数极少。嵇老晚年很有兴趣的题目“政术论”，我几乎

① 见《中国社会现代科学家传略》（《晋阳学刊》编）第一辑，页~~78~~~~~80~~

② 傅山（青主）《霜红龕集》卷~~75~~杂记（三）。

迄今毫无所知。目前写此小文,仅凭二书,其一《左派王学》,其二《王船山学术论丛》。

先谈《左派王学》。

《左派王学》一书,成书并出版于灵猿年,正当嵇老源岁前后。全书缘万字,是一本小书,但写的极精辟。“王学”指阳明之学。阳明之学,继朱(熹)学之后,为近古理学中一大学派,其影响深度,以地域讲影响及于日本、朝鲜,以时间讲清末学者受其影响者尚甚多。当代大学者郭沫若即曾于王学中深受启发。但后来在“左倾思潮”侵袭下,人们把唯物和唯心两大系列、两大路线间的关系看成绝对的、僵化的,二者间几乎是两军对垒、炮火连天的架势,从而“王学”在某些哲学史中就给人一种十月革命后的“白匪”和中国红军长征中所面临的“白狗子”那样的印象。这不符合历史的实际。讲“心”,不一定是唯心论。有很多思想家讲“心”,是指人的主观能量和主观能动性,并且不一定脱离作为客观存在的“物”。如陈白沙(献章)讲“求诸吾心”,求到一定程度,便感到“我大而物小,物尽而我无尽”<sup>①</sup>。这讲的是人对客观认识能力的幅度。阳明也讲“心”,但也给予“心”以物质的规范,他说“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sup>②</sup> 阳明未把“心”说作是无限的和万能的。王船山也讲“心”,他谴责他当代的人“世之衰也,学不以心而以耳目”<sup>③</sup>,这里的“心”也指的是人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有些书把这些思想家截然区别,说船山是唯物的,白沙、阳明是主观唯心的。其实他们间并无两军对垒的迹象。嵇老此书写在猿年代,他不把哲学两大体系看做是僵化了的、绝对的,他在书中说

① 《白沙语要》(见《百陵学山》丛书)及《白沙子》卷猿“与时矩”。

② 《王文成公全集》卷猿

③ 《读左氏传博议》(船山遗书)。



阳明也讲“物”，船山也讲“心”，这样讲更符合于历史的真实，并且使人亲切地感到两大阵营中人也往往使用着相同的思想资料，并且给予这些思想资料并不是“大相径庭”的解释。

嵇老著书讲学，每多独到之处，看出许多别人多年以来不曾看出来的问题。例如阳明之学为明正德、嘉靖时候在浙右、江右地区甚为流行的一种思潮，而（颜）习斋之学则是清康熙时候大河南北地区流行的一种思潮，王学重良知而颜学重实用，二者似乎是不相类的，而嵇老却在《左派王学》一书之第 员袁- 员原页、与第 员缘- 员愿页处指出，颜学与王学“有许多共鸣之点”，并且进一步指出“陆、王可说是颜、李的前驱”，他甚至准备写一篇《从陆、王到颜、李》的文章。他做出这样判断的根据有二，其一、两派都主张“学”不离“行”。他们主张只有通过“行”才能体现“学”，把“行”抛到一边的“学”不能真正“学”到什么。其二、两派都主张“务实”，颜习斋用学琴作比喻，王阳明用学射作比喻，主张人们应该各按自己的才性务其专长，这比提倡虚诞夸伪的作法要好得多。从这条自陆、王通向颜、李的大线索、大脉络中，我们可以印证到朱学、王学、清初经世济用之学三者之间的“正·反·合”关系。他们每后一个学派对其前一学派执行着“入其垒袭其辎”的批判、扬弃和综合、继承的关系，体现着发展的规律性。《左派王学》出版后二年，钱宾四先生（穆）亦出版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于“颜习斋”章中提出了与嵇文甫先生相同的看法，又增加了一点论据，如谓习斋“攻朱多、攻王少”、“其攻陆王语皆随分无气力”，又谓颜氏“攻朱语多似王说”<sup>①</sup>，以充佐证。当时嵇、钱二氏均设帐都门，其间究为何人与闻何人绪论，今事隔近 缘年，本文作者当时正在大学一年级肄业，缘年后，殊难辨其究竟，亦殊不愿辨此究竟，似作“所见略

①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大学丛书”）页 员原- 员愿

同”观之可耳。

### 三

再谈《王船山学术论丛》。

此书出版于 1984 年，为嵇老逝世前一年出版的著作。全书约 60 万字，分前后两部分，后半为 1983 年旧作《船山哲学》，前半主要为解放后的新作。由于船山行文的积习经常表现为汗漫陈说，不像阳明那么干脆爽利，所以嵇老论船山文，也往往表现为引文过多、引段过长，相对地说对这些段的剖析有时显得简略，有时显得欣赏者多，指出不足之为少，如对《宋论》中赵匡胤即皇帝位一段天命如何启之牖之的史观，仅欣赏其为“活灵活现”，而不加更深刻的评鹭，即一显例。但海外华人学者许冠三先生遽尔指此为“以新黑格尔主义之观点解说船山之天理学说及其史观”<sup>①</sup>云云，“新黑格尔主义”这顶帽子是不切实际的，扣的十分突兀，无怪嵇老后人对此相当愤慨，曾著文驳辩（未见发表）。许文又说，嵇老或受贺麟先生文之启发而写成，“亦未可知”。既然“亦未可知”，又何必生此无谓之是非，徒伤学界关系，并遗泉下人不能自辩之苦？！

船山思想，受不受阳明思维方法的影响？这倒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嵇老接触到了。犹记 1983 年冬，徐旭生先生与嵇文甫先生几次在开封卢方胡同姚从吾先生客厅中议论此事，此时本文作者以后辈得聆端绪。后来，徐老将此义写成一段“论学书”发表，略云：

（船山）先生对于陆、王之学，辨之极精。然先生之父武夷先生实为邹东廓弟子，而邹氏则王门之龙象。然则先生之

---

<sup>①</sup> 《中国哲学》第 3 期许冠三《船山学术思想生命年谱》，页 303。

学果对王学不受丝毫之影响乎？经学术史之研究，可知一学派对当代其他有力学派，或从正面，或从反面，必受若干影响；完全绝缘，殊非可能。<sup>①</sup>

此处徐老有一小误，船山之父王朝聘非邹守益弟子，而是其孙邹德溥（泗山）之弟子，应在此订正。船山学与阳明学之间，并非绝缘，则是千真万确之事。嵇老指出“船山尽管反对陆、王，但他们（陆、王）所指程、朱的种种弱点，他却也不能一概否认，而于不知不觉间已受着陆、王的影响了”。<sup>②</sup>

本文作者于此，愿有所增益。窃尝反复思考，明朝初、中叶之学术思想界，并不只阳明一人一家，自陈白沙至湛若水、至王阳明，再加以为数不少的第二流思想家，形成一种大时代弥漫的总气氛。他们主张“向内”寻求，发扬每个人本人主观思维的能量，以与在“外”者相感应。他们大都思想解放，不喜欢依傍经文和圣人。船山对于白沙，丝毫不抱反感，观其《读李大崖（承笈）墓志铭书后》<sup>③</sup>一文可知。即对阳明，也曾有过褒语：

阳明抚赣以前，举动俊伟，文字紧密，又岂人所易及？！后为龙溪、心斋、绪山、萝石辈推高，便尽失其故吾。<sup>④</sup>

这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船山之所攻击，尽是阳明后学，斥为禽兽，十分过火。但对阳明除指其“无善无恶”为“近乎禅”之外，并无过分的恶言恶语。可见徐、嵇二老往岁所论，也是触及到思想史上提倡实事求是、反对框框的学风问题。试想，当年之船山，并不知其帽上应书“唯物”二字；当年之阳明，亦并不知其帽上应书“唯心”二字，更不懂得他们之间应该划清界线，而且这种界

① 《学原》灵隐元年，灵卷苑期页缘。

② 《王船山学术论丛》页灵弱。

③ 《姜斋文集》（《船山遗书》）卷猿。

④ 《俟解》（同上注）。

线是不可逾越的。任继愈同志说：

学了马克思主义以后，过去看不清的东西看清了，不明白的明白了，觉得这个武器非常锋利。但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把现在所达到的分析能力和分析水平强加到古人身上去，这就违反了科学性……<sup>①</sup>

我个人十分钦佩这段说话。

以上短短一篇小文，受到种种局限，第一是个人觉悟和学识水平的局限，第二是以后辈谈论前辈学术成就时所可能存在的局限，致使对嵇老的真实风貌，容有失真的极大可能，敬候同志们的批评和指正。

## 附 嵇文甫前辈的学术风貌

一九四六年冬，解放战争已经展开，反动派色厉内荏，仓皇挣扎。在一个傍晚，我和周可任（烈士）、牛维鼎同志三人踏着积雪，从原河大的东二斋到龙亭以东的刷绒街去，我对嵇先生作初次的晋见。伪河南保安司令部政训处在嵇先生所住院落的临街墙上，刷制了巨幅的蓝底白字的标语：“纷杂错综的思想必须纠正”（“总裁训词之一”），真是触目惊心，这是多么可恶的精神压制呀。然而嵇先生怡然恬然，照样大袍马褂，头戴风帽，耳戴耳暖，脚蹬衲制棉鞋，坐黄包车一星期两次到河大礼堂去讲哲学史，用不带马列的词句传播马列的实质，气得特务们由于抓不到把柄而暴跳如雷。

记得初见的那一夜，我们一直谈到深宵，并且一直连续了三夜。我自然很兴奋，嵇先生于寂寞受抑制之中，也难得一个谈得拢的晚辈。他谈的是孙夏峰（名奇逢）。夏峰保定人，家乡土地被初

---

<sup>①</sup> 一九四四年冬，衡阳“王船山学术思想讨论会”《简报》第 缘号 页猿

入关的满洲族圈占，后来大半生住在豫北辉县，距嵇先生老家汲县不远。夏峰学派在 17 世纪影响很大，颜习斋（名元）就是继承又发展了他的绪余。当时，大家谈到，北方学者和南方学者的不同，南方学者三杯酒后就赋诗，北方学者三杯酒后就上房，这见于颜习斋弟子李恕谷的记述。当时似乎还谈到窦尔敦和壬遁（奇门遁甲）之术，谈的很热闹。嵇先生家很清简，夜深无以待客，叫起一个儿子到午朝门买了一盘豆腐粉条馅素包子，大家一面抓着吃一面继续谈。

我当时在陕西省已当了八年的英文教员，课读之暇，搜求关中文籍阅读，对“关中三李”和顾炎武的亲密战友王宏撰（山史），有了一点体会，当即向嵇先生汇报。嵇先生高兴极了，后来他为我的《王山史年谱》写序，中有“我当时大为兴奋，不禁拍案称快，深引为同调”之语。对此，我自然是很感激的。记得当时又谈到傅青主（名山）的《霜红龕集》，我说我得知傅曾到苏门山来谒见夏峰先生，在事后的札记中谈到他对夏峰的印象，有两句话是“外似模棱，而其中实有一大把柄”。嵇先生对这两句欣赏极了，后来一直念叨这两句话。我后来体会到嵇先生为什么如此欣赏这两句话的原因，那是由于孙夏峰在清初的处境跟在反动派抑制下坚持斗争的嵇先生的处境有着很相似之处的原故。

当时我想进河大。周、牛二同志也大力推动。可是嵇先生说，若由他推荐，将产生“不但无益，而又害之”的结果，他叫我向正统方面找门路。不久，当我拿着正统方面的信函先请他过目时，他高兴地说这样做就有效果了。果然不久之后，我以 34 岁的青年受聘到河大教书，除教工学院两班《中国通史》之外，嵇先生把他亲教多年的三、四年级选修课《明清思想史》让给我教。这是多么高的风格呀。在旧社会，谁肯把自己的拿手课让给后辈的？自然，这中间也有锻炼我的意思，如像京剧中所说，“试试你的膂力如何”。所以我也要努力接受得起这场考验，一年之后，证明我勉强可以接

得住这个班了。

旧时代也有些好事情,并非全是一团糟,例如学术渊源、师弟承受,旧时很讲究。只有“四人帮”才叫后辈打倒前辈,再踏上一只脚。还说这种师受渊源是什么黑根黑线。那个“理论家”,当他谈到教育家江隆基时说“乜(火)就不简单了,乜就调上线了!”这里的“调上线”是说江和杨虎城将军的关系。当时听到这段广播,我嘴里不敢说,心里暗暗地想,“你就没和丁维汾调上线吗?”后一代总是要和前一代相沾连,接受这样那样的关系,然后形成自己一套,再去影响更后面的一代。前代人对后辈的帮助、奖掖、提携、鼓励,是后辈成长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上文说的,就是亲身体会。我常常说,我这一生,今已年逾花甲,假如没有河南嵇文甫先生领我走了一段“宋学”路子,没有山东王献唐先生再领我走了一段“汉学”路子,那么我今天连这点极其微薄的成就也是谈不上的。人老了,爱流眼泪,爱唠叨前辈们对自己的爱护,觉得人世间没有比这更宝贵的东西。

从1947年到1948年,跟嵇先生同事一年,开封就第一次解放了。解放军腾出运送大炮的卡车,把他们解放的第一个省会、第一座国立大学的一批教师,送进了解放区。记得那时又和嵇先生同坐一部卡车,车上架着机枪,以防“土顽军”的突然袭击。卡车打开远灯,我们注视着通许、鄢陵、许昌的夜景,黎明到达襄城,在一座小教堂里光荣地受到刘伯承、陈毅、陈赓三位领导人的接见。往事历历,仿佛如昨。此后,又在鲁山的中原局同住了一阵,嵇先生留下来筹办中原大学,其余的人一大批都到华北局去听候分配工作了。从那以后,再未和嵇先生见过面。嵇先生已作古人,我这后生晚辈,东望云天,只能有流着眼泪写这么一篇短文的本领了。

## 回忆张恒寿先生

恒寿先生长我一十五岁，是名符其实的我老师一辈的人了（譬如，与恒寿先生同龄的贺麟先生教过我们《西洋哲学史》，小于恒寿先生七岁的岱年先生也给我们开过《哲学概论》和《中国哲学史问题》），可是恒寿先生却一直和我们以“同学”相称。他有一条理由：“我们是同一年（灵璧）进清华的”。不错，不过他是进研究院，我们是进大学本科的，只是当年这种界线还不像以后这么僵硬罢了，大家一起在一二九气氛中办社团、办刊物，这倒是真的。

我在上文中接连说“我们”，除我之外，至少还包括王瑶。王瑶和恒寿先生早已是太原晋山中学的老同学了。记得灵璧年夏天，有一天王瑶兄忽然对我说，“我带你去看一个朋友”。出了西校门向西南方向走，越陌度阡，到达一个半市镇、半村庄的所在，我知道这地方叫城府，顾颉刚先生的《禹贡》社就设在这里。恒寿先生一家人租住着一个小院落，清楚记得院子里按北平人的生活习惯，打着席天棚，太阳毒时将席遮上，太阳过去后再拉开，透空气。记得我当时想，做一个研究生比做一个大学生要富裕多了，学校有一笔不坏的奖学金，加之山西的阎锡山确实要比什么张宗昌、韩复榘之流眼光深远些，他还懂得培养乡邦子弟，每年大概有不少于猿园元的奖学金。加之恒寿先生自己家里也还丰厚，所以就带上一家老幼来读研究生了。

我在上文中接连称“恒寿”先生，其实老规矩这是有些失礼的。“恒寿”是学名，是名讳，朋友后辈理应称号，可是说来惭愧，

我与恒寿先生相交数十年，一直没有问过他的“次章”。只是在他逝世前大约一年吧，忽然寄给我赠诗一首，并写为横幅，书法猷美；在用章时，正名章之下，盖有“越如”二字另一方章子，我想这也许就是“号”吧，但我吃不准，所以未敢使用。

写到这里，老伴问我：你准备写张先生些什么呢？我答曰，写三件事，一是他的诗，二是他的庄子研究，三是他对汉朝社会的看法。

他的诗，晚年印成一个小本，叫《韵泉室旧体诗存》，寄我一本，我把“诗”放在三项中的第一位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从诗中可以看见恒寿先生这个“人”，而在其他项中只能看到他的“学问”。恒寿先生的诗，假如让一个浮躁的、不懂诗的也不懂人生的小伙子去读的话，会认为不过是胡乱写出的一堆顺口溜。但在经历了沧桑的人读起来，就知道这里边有“味”。什么味？恒寿先生自己作答：

“终恨乏雄魄，未改狷者型”。（《诗存》页苑）

“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纵观恒寿先生一生，他一直不汲汲于进取，但他坚持了他的“有所不为”，这就是他的这个“人”。就以教书所在的学校讲吧，他若置身于京都名牌第一流学府之中，比起那些“文是文山，会是会海”的衮衮诸公来，他将丝毫不逊色之处，但他却宁愿在天津、宣化、石家庄这些次一等城市生活中，怡然自乐地教教书，写写诗和文章。所以我说他的诗和人是：

“颇得柴桑意，隐隐似霜红”。

说恒寿先生的诗近于陶潜，这是谁都看得出来的，诗集页缘~缘处八句，音乐味何其相似；但说近于傅青主，则似乎“自我作古”。我这样比拟有三条理由，第一他们古今二人都是山西人，自旧时代以来，地缘始终是一条很要害的关系；第二他二人均精研庄子，颇得其中三昧；第三他二人都狂狷，只不过傅青主在狂狷两方面都是阳性反映，而恒寿先生则只在“狷”方面是阳性反映，在“狂”方面



作阴性反映罢了。所以他的诗比起霜红龛来，其辛辣颇不足，而其恬淡则有余。窃以为一个“淡”字，就可以把恒寿先生的诗和人概括尽了。须知，写诗要写得很浓并不难，要写得淡才难，这如同白牡丹比紫牡丹更令人感到珍贵是一个道理。

《诗存》后面有一篇《后记》，这真是一篇了不起的大文章，它不仅是恒寿先生的自叙，更是一篇文、史、哲综合的议论，无论对治文学史的人，或是治思想史的人，都会从这篇短而宏深的文章里，获致到绵绵的启发。

他的《庄子新探》，应该说是他一生中的代表了。就写作时间说，几乎绵亘了一生，自青年到老年，何况中间还经历了由文言转白话的一场周折。但所有这些还都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这本书反映了恒寿先生的学术风貌。那么，他的学术风貌究竟是指什么呢？

照我说，应该叫大考证，落落大方的考证，大关节目上的考证。说起考证，自清朝乾（隆）嘉（庆）以来，特别以下江三角洲地带为典型地区，人们把这门学术越做越琐细了，有时我对其中一些令人不耐卒读的作品私下里对自己的研究生说过一句刻薄的话：“鸡零狗碎之学”。足见我一生对此积愤之深。可是恒寿先生的考证却丝毫不沾这种边。我常说，读他的庄子考证，如同进入一座宏大的手术室，人们静悄悄地，只听见钳子、剪子、镊子的轻轻碰响，主治医生对应切除什么，缝合什么，心中井井有条。恒寿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位手术师，来给庄周动手术，他把《庄子》书猿猿篇总共四四四余个段节一一加以精心的料理。猿猿篇原本分三类，内篇、外篇、杂篇。当初这么划分是有一定道理的，人们通过这种划分，反映这些篇章之可靠性的等次。但这又不是铁板一块的。有时内篇文章中会出现一些与原庄周不合的思想、或者说是较庄周本人要晚出的思想，有时外、杂篇中会出现一些反而像是庄周本人或者当时的思想。这些情况，清朝人不是一点也没有接触到的，但动大手术来切

除什么、缝合什么,却是恒寿先生的业绩。我说“落落大方”,是指恒寿先生做这些考证不像三角洲人们那样挑起一个针鼻子大小的事就大动干戈,不惜繁征博引以炫其腹中之富,而到头来于主题毫无补益。张先生处理庄子是从思想实质出发,经过足以说服人的论证,又回到思想实质上做出结论;有时,也举一些同时前后的子书(如吕览、韩非、荀子、淮南子等等)作比较,但具体比较过程往往留在“暗场”,而只把比较得出的结论拿到舞台上,令人有台面干净利落之感。有时,也在《庄子》本书不同篇、不同章段之间作比较,同样也是做得毫不烦琐。须知,做到这个地步已经很不容易了,叫乾嘉以后的人写,写几十卷、出一套一套书也写不完的,而恒寿先生却只用二十几万字,这是一种本领,十分高强的本领。

《庄子新探》分上、下篇。上篇是考证,考证《庄子》书中可靠性的等次。这是一种奠基工作。我常常这样想,假如每部先秦古籍都有人做这种大手术,该多么好呀。下篇是分析,在这里又显示出恒寿先生的另一种能力与能量,那就是理论的能力与能量,这是只有经历了多年精心阅读和体会马克思、恩格斯以及黑格尔、康德、斯宾纳莎等人哲学专著才能获致到的水平。没有这种水平,是驾驭不住庄子这匹骏马的,而恒寿先生若无其事地驾驭住了,像家常唠嗑样地把庄子的自然主义、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一一分析出来了。在书尾,他又像诗集末尾一样,写了一篇短小精悍的“结束语”,在其中提到了庄周“不与当权者合作”的传统,他的“未改狷者型”,又一次地显影了出来。

1957年春,恒寿先生写过一篇大论文,是关于汉代社会性质的。在我看来,这也应该是恒寿先生一生中一桩大事。文章发在《历史研究》1957年10月号的头篇,文长~~猿~~猿四万字。但据后记说,原稿远万余字。三十几年后,恒寿先生将它收入一本论文集中,这本论文集他也寄给我了,可惜当时我的小女儿在普林斯顿写论文,我认为有参考这本论文集的必要,就即刻寄走了,所以这本论文集

我始终未来得及细读。据说,论文集中收的是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远万字稿的原貌,可惜已见不到了。

说起来话长。缘年代,左倾思潮已经渐渐浓重起来,教条主义则一直很严重。五种生产方式,人们直按单线衔接的观点去看待,后来人们才慢慢产生了复线的看法,并且上一个社会阶段跟下一个阶段相连的问题上也有了较灵活、较多样的看法。并且,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经常缠在一起,例如当时曾有人说,谁不赞成五种生产方式谁就是反党。在那种情况下,中国历史上奴隶社会跟封建社会在哪里衔接、怎样衔接的问题,就成为尖端的问题了。范、翦两先生主张在西周初,郭沫若先生主张在战国,还有人主张在魏晋。恒寿先生这篇长文,看起来是经当时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郑重组织讨论然后刊出的支持郭说的一篇大著。

恒寿先生当时在天津,这篇稿的组稿、撰写过程,他从未向我谈过。这是一篇支持郭说最有分量的一篇,也是不同意郭说诸家对之较少异议、很少反感的一篇。因为恒寿先生在这篇文章里显示了他史料的功力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功力。须知当时,有些史料派对哲学理论修养不足,有些理论派对史料功底又短少些,所以写出文章来不是左腿跛就是右腿跛,总是给人一种印象:一跛一跛的,偏偏斜斜。只恒寿先生这篇文章不跛,在“史论结合”方面做到了好处。

当然,我们这些人对这篇文章也不是连一点意见也没有的。譬如,把西汉古典经济的分量和比重有所压缩,把小农经济和租佃有所放大,把西汉和东汉看做差不多,把汉武帝政策的作用估计过高,等等。这些意见,我未向恒寿先生提,并且也不具备这种身份了。当时在“万方声一概”之下,我已成为人们中的另一个档次了。但我私下里对恒寿先生这篇文章还是称道不遗余力,我对研究生们说,张先生对马克思有关“城乡关系”在亚细亚的、古典的、中世纪的、以及近代布尔乔亚的形态中的不同,了解的最深,讲解

的最透，后生们应该很好地向他学习。

我和恒寿先生最后一次见面，是1985年的12月在北京饭店，在孔子诞生2544年的会上。当时，大家住总布胡同空军招待所。他已渐渐老迈，需要研究生扶持，有时要乘坐轮椅了。在会议第一天下午的大会上，恒寿先生、王瑶兄和我，三个人又碰在一起。事隔两月，王瑶兄就在上海逝世。据恒寿先生为王瑶兄写的纪念文章看，王瑶兄高度评价了恒寿先生的书法，并要他为他写诗并书写成字幅。遗憾的是，字和法书还未寄出，王瑶兄的噩耗已经见报。大概是接受了这次的遗憾吧，恒寿写了给我的赠诗并亲笔写为横幅。我非常感激。王瑶兄生前想望而未及看见的，我得到了。可是又怎么会想到，在接到法书之后不久，竟又接到了恒寿先生的讣告呢？

## 回忆江隆基校长

我跟江校长相识是在 1955 年。那时 ,他是西安二中校长。当时 ,陕西省教育界有那么一伙人 ,包括李敷仁、武伯纶、袁若愚、李瘦枝、朱茂青、李一清、余达夫等。特别是李敷仁 ,白手起家创办了个《老百姓报》,很有销路 ,在国外 (主要是苏联 )也很受重视 ,所以小有名气。国民党第四处 (肃反处 )很恼火这伙人 ,经常派人盯梢。后来就发生了袁若愚被绑架 ,继之李敷仁被绑架并枪杀 (未死 )的事件。最后 ,到胡宗南把我们这伙人的最高层人物杜斌丞悍然杀害 ,达到了顶点。1955 年情况还不那么紧张 ,大家常常聚会 ,有一次在北大街二中聚会 ,江校长是东道主 ,热情致词。我们相识 ,就是在那次会上。

过了一年多 ,我所在学校——西安高中搬到了泾阳。那是一个小小的县城 ,城外有个泾干湖 ,湖中有芦苇和野鸭 ,同事们教完了课经常到湖边散步。那附近还有一个私立初中叫泾干中学 ,校长也是一个民主人士。他告诉我们说 ,江隆基可能到泾干中学来住几天 ,我们都盼望着。可是等接到信息去看望他时 ,他已经到陕北去了。这次行踪可能是有点保密的。

时光一闪就是 1956 年。1956 年夏 ,我正在十里店西北师院东苑区的宿舍里养病。情况是这样的 :

当时兰大文科各系并到西北师院去 ,这属于当时的“折腾”之一吧。我的身份是右派分子 ,被送到山丹农场去劳改一年 ,刚刚回来。当时师院派到山丹农场去的领导人真可说是无法无天的 ,他

对这些人进行了残酷的折磨,致使四个教师接踵死去。当时我已濒于危险。但突然的事发生了。

我的第二个女儿叫赵纪,当时在兰大附中高中临届毕业生,准备考大学。由于十里店居住条件很差,她放了假也不回家住在学校宿舍里温课。有一天小雪初过,她们三个女孩跑到皋兰山上,不慎二人摔了下来。其中一人业已气绝,我的女儿还微有气息。当地红山根砖瓦场就打电话给兰大。当时江校长已接掌兰大有一段时间了,对我的山丹劳改已有所闻,现在又听说孩子出事,他就一面派他自己的小汽车去红山根把孩子接送甘肃省人民医院,并打电话请求抢救小组大力抢救;另一方面,他通过省里拍急电到山丹农场,叫即刻放我回来。

我在山丹一年,当真是数度濒于死亡。一天三顿糊糊,劳动很重,因为要浇水,需要打塘坝,打地埂子。有时场领导宣布几个人的名单,说这些人不好好劳动、不老老实实改造,罚三天不吃饭,跟班劳动。有饭票也不打给糊糊,空着肚子打了整整一天塘坝,我一面打一面想,世界上怕没有比这更惨重的刑罚了。我也曾口头、书面打报告,要求回兰州来看看家属。回答是:“你要好好考虑,你是什么身份,你是什么货色。”在做一月一次的“鉴定”时,还把“想回兰州”这一条提出来,作为批斗的根据。

但是突然,在一个大雪铺天盖地的深夜里,我被叫到场部去结账,叫我把东西收拾好,明天一早回兰州。为什么对我开恩了?这个闷葫芦怎么也打不开。第二天黎明,我看到狐狸在雪上飞,心里想怪道俗话说“飞狐”呢。搭上一列运牛的铁篷车,坐在牛粪上,回到了兰州西站。老伴痛哭着告诉我说,老二已死去十天了……

兰大文科系又奉命编回兰大,江校长正筹备建成一座文理兼备的综合大学。有一天,我正在丧女悲痛中卧床养病,忽然有一部小汽车接我到兰大开会。真是又摸不着头脑。原来是第一批右派分子左宗杞等三人的摘帽子会在旧文科楼二楼会议室召开。就在

这间会议室门口的走廊上，江校长握着我的手说，“你的女儿，我们没有招呼好，遭遇了不幸……”我自认我这一辈子还算个会写文章的人，写了一辈子写到死的人，但死前在旧文科楼二楼听到江校长这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寥寥数语的时候，我的感情是什么，我的思想是什么，我确实实是不会描写的了……

远届学生招进来，要开课。当时，我是没有资格开课的，只配在资料室里打打杂，有时候做清洁卫生工作。可是忽然通知我开《历史文选》，第二天又改通知我开《中国通史》。这真是一步登天了。没有沦落过的人，是不会懂得这种滋味的。我一贯有一种“报恩的思想”（我也不管这种思想是属于什么范畴），于是我一鼓气教了五个学期，从中国猿人讲到鸦片战争。江校长经常带了校委、党委的一些人来听课，其中崔乃夫、丁桂林同志一直听了一两年之久。

又发生一件事。我的大女儿赵绛，原考入兰州科学技术大学，可是不到一年，该校奉命停办，学生转入兰大现物系和物理系。其余学生全报到了，只我女儿未接通知。去打听，回话是“她父亲是右派”。我们一家焦急，团团转。无法之余，我抽中午12点下班前到四号楼门洞里等江校长下班，我匆匆忙忙把事情对他说了，他叫把名字记下来，只隔一天，就接物理系通知，叫报到。这个女儿今年18岁了，她的物理专业道路，不能不说是江校长为她开辟的。所以，当江校长平反追悼大会要开的时候，我们一家人精心制作了一个小小的花圈，绸带上下款写着赵某、高某“率长女赵绛”敬挽。为什么要这么写？无非还是“报恩”思想，表达对这位执行公正政策的伟大领导人的感激之情罢了。

最后，我还不能不写一写江校长含冤离世的前一夜的情景。这一夜，很多人通宵未睡。“造反”的暴徒们在奔走策划。牛鬼蛇神们在被勒令写批判江校长的大字报。历史系，是我和王翼洲。印象十分牢固深刻，真是往事历历，仿佛如昨。在一间教室里，

源园

“造反”的人们把大字报稿拿来，我二人就用毛笔蘸了墨汁一张一张地抄，抄完还要用红墨水把江隆基以及王翼洲、赵俪生的名字加上红叉。这件事后来习惯了；开始第一次干，心情非常奇特：“不是要枪毙的人才画这样的红叉吗？”等所有大字报写完，还要去贴，提着浆糊，拿着刷子，贴呀贴呀，把兰大的每一片大字报棚都贴得铺天盖地，在黎明前的微光中看到一片的白，心里陡然想：“这不像出丧吗？”但立刻警惕到，千万不能说出来。贴完看看表已远点多了，“造反”的人们训话说：“你们这些混蛋不配参加明天的会，你们滚回去睡一下，马上回来接受人民的批斗。”谁会想到，当我一觉醒来，孩子们从邻家孩子们听来，我们当代的教育家、我们敬爱的江校长，已含冤永离人世而去了！



# 一个既过五关、又走过麦城的人

## 摇摇摇摇——记我所知道的张申府先生

—

我15岁那年初识张申府先生。那是1935年秋，在清华大学三院的平房教室里。记得当时的环境是绿柳低垂，蝉声聒耳。当时清华同时开三班《逻辑》课，第一班由金岳霖先生教，第三班“数理逻辑”由沈有鼎先生教，由于内容艰深不易听懂，所以选课者极少，有一次沈先生傻乎乎地笑着说：“对影成三人。”第二班由张崧年（申府）先生教，选课的人格外多。为什么格外多？当时我不明白。因为有关张是李大钊的得力助手，有关他曾介绍周恩来、朱德入党等事，作为学生，我毫无所知。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他是清华幕后的指导人、在西单亚北点心铺楼上他和姚依林是运动的指挥者——所有这些，统统是以后知道的。当时，仅仅知道他爱借用逻辑讲坛作为他自己进行政治评论、宣扬反蒋观点的场所，是吸引群众的最大魅力。拥护的自然来听，反对的也得来一知究竟。记得他身材较高，方脸膛，微胖，穿一身考究的西装，严整地打着领带，用一口并不浓重的河北中部河间、献县的口音（如“安”不读<sub>ㄛ</sub>而读<sub>ㄛ</sub>）讲课。

课堂里挤得满满的，窗口上也站着人。未选课的随便来，选了课的可以不来，这就是自由化的大学风格。张先生从来不点名，但

有一次“风云突变”，他突然点起名来了。他手里拿着一大把半联的黄色选课卡，一张一张地念那上面登记的学号，被念的人站起来，张先生问姓名、籍贯、系别、年级。这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影响讲课的进程，学生们都愣着。好容易把一大把选课卡对完，自然还有很多是没有选课卡的，张先生也挑问了几个。忽然，他从口袋里飏地掏出一封信，随口说“我收到一封信”，然后把信纸对着听众张开。

信纸上原来是一幅画。中间一人，大约是张先生了，两旁两人各持手枪向他发射，画上清楚地画出了弹火的飞进。上边，一行大标语：“第三党万岁！”

“谁写的？请站出来！”张先生声色俱厉地说。课堂里鸦雀无声。好半天，张先生把语调和缓了一下。“说我是第三党，大概是由于我认识邓演达先生吧？可是我要说明，在认识邓先生之前，我早在莫斯科认识了蒋介石先生，又在柏林认识了朱德先生，那么，怎样来定我的党派呢？”他停顿了一下，“其实写这封信的是谁，我是知道的，就在这教室里，不过没有勇气站出来罢了。至于我本人，我声明，我是学哲学的，像苏格拉底一样，从来不怕死。”

下课铃响了。我们上了一堂非常异样的课。大家怀着各不相同的想法，走出教室。想来有一个想法怕是共同的：社会上政治上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已经冲击到高等学府的课堂里来了。

## 二

一转眼，缘年过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在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的编译局工作。有一天，我们局分到一张票，听苏联专家吉谢列夫的考古学报告。我们局长杨钟健先生说：“你去吧。”从东城东厂胡同到西城辅仁大学礼堂，要乘好长一阵子电车。记得报告会由范老和翦老主持。那种一段一段念稿子、并且俄语一段汉语一段的办法，着实令人不感兴趣。于是乎左顾右盼。倒也顾

盼到不少熟人。陈援庵先生手拿一柄硕大的放大镜,问我他的老友赵孝孟是我的什么人,当我回答是我的叔父并说此人已在天津谢世时,援老为之凄然。我身后一排坐着原河大训导长马非百(元材)先生,他轻声地埋怨说开封解放为什么不约他同到解放区,我也轻声地回答说,假如预约了马先生,也许大家都出不来开封了。忽然,又一位老先生跟我打招呼:“你是**馮**吧?”我仔细认了半天,才认出来是张申府先生。

报告会结束,我陪张先生乘电车返回东城。这些年来,我也隐约听到张先生发过“划江而治”的议论,从而不符合“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意旨,而被“一抹到底”了。他为什么发这种议论?有什么动机?有没有背景?我全不知道。假如是同学,就可以破釜沉舟地打问,但老师不行。还有,“一抹到底”到什么程度?政治上、生活上怎么待遇?他也不肯自道其详,只说“在北京图书馆工作”如此而已。他随身带着一部木刻线装书,一套四本,我拿过来打开一看,竟是一部《麻衣相书》。呜呼!张先生竟研究起这种东西了,怎不叫人吃惊!

我经常这样想:一个人一辈子是不平衡的,也不可能平衡。总有起伏、涨落、高低。总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时候,也有走麦城的时候。这是旧的说法。新的说法是,欢迎人对革命立功勋,也允许人对革命犯错误。即便是犯了极大的错误,也不要打入冷宫,永不起复。一个当年那么勇敢地斗争过的人,一旦落到靠读《麻衣相书》过日子的地步,其心情的寂寞是可以想象的。这,本人有责任,本人以外的人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责任。……

在上述过了**1953**年之后,又过了**1964**年**1965**年缘月,我到北京参加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纪念大会。在一次“召集人”的会上,讨论到五四“老人座谈会”应该邀请什么人参加的时候,有人说叶圣陶,有人说顾颉刚,忽然有人提议张申府。有人说:“怕已经死啦吧?”又有人说:“哪里哪里,还好好活着,就在距国务院二招不远

的一条胡同里嘛。”从此,我才知道这位老师仍在人间。“老人会”是严格限岁数的,当时我才六十二三岁,所以没有可能看到张先生。

### 三

又过了缘年。员愿年源月,天气仍寒肃,我到北京参加“中国史学会”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次会议。这时,我跟张先生的小女儿张燕妮已经通过好多次信了。这次来京,就预定要去家里见张先生。源月员远日星期六下午圆时半,燕妮从北图弄了一部车到京西宾馆来接,我们就到了王府仓胡同。这大约是阜成门一带,距当年鲁迅离开八道湾自买的小院,想非遥远。前院是杂院,住着不只一家房客;后院是独家独户,上房甚高,还有东西二厢房。燕妮说,周总理生前留下亲笔批示,这房子张先生活一天都归张家居住,水电修缮全由国务院承担。我们首先见到燕妮的生母、张先生与刘清扬离异后晚年娶的最后一房妻子,也七十上下年纪了。她说,她是清末一个老“戈什哈”的女儿。燕妮说,当张先生献县原配妻子所生女儿(是一位 迺 岁的女教授)和刘清扬所生两个女儿来看望“爸爸”时,她们管老太太不叫“妈”而叫“燕妮她妈”,这甚至引起了左右邻舍们的愤慨。……

张先生家里,凡贴墙处,全是书橱,竖的橱和横的橱,里面全是书,中国古书和西洋书,主要是英文书和德文书。张岱年先生有一次说:“你到大哥房里,随你动什么他都不管,可只要动一动他的书橱,他就瞪着眼睛,像牛的眼那么大。”有一次,我买到一本《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其第三部分的第 猿 节有“张申府与许刻书”一段,记张先生中年到琉璃厂访书的经过,可见张先生一生也是收藏善本古书的。

师生见面,已经不能谈什么了,他的记忆已全然模糊。拍照人摄取了不少镜头,然后告辞。四年过后,在 员愿 年冬,张即溘然长逝。

## 四

1957年春,我以“交流学者”身份到美国访问了两个月。动身之前,接到美国东部康涅狄克州的威斯连大学(按美国有好几个威斯连,冰心上的是麻省威斯连,洪煊莲上的是俄亥俄州的威斯连)的舒尔茨(艾琳·科恩·舒尔茨)副教授的邀请,去谈张申府的事,她正在写一部张的英文传记。因此,我在源月四日到缘月廿日应邀到~~艾琳·科恩·舒尔茨~~去做了两天的访问。

舒尔茨,女,1907年生,犹太血统,原德国人。祖父母全给希特勒抓进集中营害死了。她跟随父母流亡到罗马尼亚,成为罗马尼亚国籍的人。后来她又流亡到美国,在加州伯克利加州大学和东部耶鲁大学得硕士、博士学位。曾在北大学习,是王瑶的研究生。她著有《五四启蒙运动》一书。因慕中国女作家陈衡哲之名,取中国名曰舒衡哲。她曾多次访问梁漱溟先生与张申府先生,取了录音和复制文献材料共约数箱,带回美国。

与其说我能帮助她些什么,勿宁说,她倒告诉了我许多关张的事。例如她说,张写“划江而治”一文的背景,是李宗仁。她又说,张曾亲口对她说,当年李大钊是北大图书馆长,张是馆长室秘书,馆长不在时可以代拆代行。有一次,毛先生缴来职应由他缮写的一份材料,可能缮写的工整速度不满李的意吧,李叫张转毛重缮一份。张回忆说,他非常客气地对毛说:“请拿回去重作一道。”他看到对方的脸上露了不愉快的神色。(后来,我偶然读到一本有关陈伯达的书,那里边说,当陈初到延安,初与毛先生相见时,当毛得知陈是从北平出来的,他即刻打听张申府的下落。足见毛先生一直将张惦记在心。)

这些内容,也给了我很多很深的启发。中国历史是长期专制,所以中国知识分子除“隐逸”一类外,大都免不了要找政权去挂钩。梁启超当总长、当造币局长,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张先生假如

真的在 1958 年跟李宗仁挂了钩的话 ,那也不足为怪。近百年的中国学者 ,纯学者很少 ,大部分都兼 “政客 ”身份。中国知识分子 ,命运不悲惨的极少 ,大都是在 “挂钩 ”中遭到了这样那样的 “折腾 ”。

1988 年 8 月 28 日 ,兰州

## 记被《一二·九运动史要》说作 是“右倾投降主义者”的一伙人

今年 苑月中旬 ,突然接到 缘年不通音问的同班老同学韦君宜的来信。信中主要说 ,以“老蒋”(按 ,指蒋南翔)为首的中央党校的一个“党史研究班”编写了一部《一二·九运动史要》,最近就要出版了 ,出版后寄我一本 ,嘱我读后寄一书评 ,由她送《光明日报》发表。其实 ,在收信之前 ,我已知晓一点她的情况。《清华十级级友录》说 ,她发了两次脑血栓 ,痊愈后在房中无端又摔伤了右臂。从来信看 ,明显地已不良于书写。

韦君宜 ,原籍湖北 ,但给同学们一个印象 ,她仿佛家在天津 ,并且她的家族仿佛跟天津大财阀们(如周作民)有不少关系。在学校时 ,她用原姓名魏蓁一。人极聪明 ,个儿偏矮 ,不漂亮 ,大家都喊她“小魏”。抗战军兴 ,她在武汉嫁给了也是我们同学的孙世实。不幸 ,孙很快在一场敌机轰炸中遇难了。后来 ,她又嫁了杨述 ,即杨德基 ,杨和蒋是齐名的学运起家的大人物 ,后来做到北京市大专院校党委总书记。小魏原本是相当“左”的 ,但经历“四人帮”残酷迫害“走资派”以后 ,思想上似乎有一定程度的游离 ,我读过她一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悼念杨述的文章 ,写他死前拖着不方便的腿 ,爬三楼、五楼 ,探询有关自己的“处理” ,这种写法很不寻常 ,

似乎有了一点觉醒。她多年以来一直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记得为了出版节本《金瓶梅》的事,有读者写信说“……你们这些大官僚”,她的答语是“说实在的,我们也够不上什么大官僚”云云。不过,不小的负责干部,恐怕是已经不容辞让的了。

《一二·九运动史要》寄到了,相当精致,彭真题的封面。全书近 100 万字,字数不算多。由于我对这本书特感兴趣,且书中所叙尽是我亲历之人之事,所以未用完一昼夜就读毕了。感到不坏,特别是第 7 章讲少奇把瓦窑堡精神带到北方局的这段大文章,过去不仅在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的时候无人敢写,就连这顶帽子未扣上以前,人们也是不敢这么铺开来写的。这是本书最主要的优点。其次,若干细节(包括人名、地名、年月日等等)显然经历过仔细的查对,较比从前的几本一二·九史要精确多了。当然,也还有不足之处,如不平衡。运动发生在北平,记北平的就详实而生动,记天津、上海的就逊色一些,记西安、桂林等就粗疏多了。但我个人意见集中在书的第 10 章第 3 节,题目是“反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我认为至少后一半不应该是这么个提法。

这一章所写的是继反动教授杨立奎以及反动中学校长吴葆三、焦实斋等跳出来分裂学生运动之后,天津《大公报》记者王芸生和北平学生运动领袖人物徐芸书(按,即徐高阮)、黄刊(按,即王永兴)以及蒋□华(即蒋福华)等发表的一些对学运的不同意见。我与王芸生素昧生平,他当年为何写这些文章,我一概不知不晓,故在此不予置喙。但与徐芸书、王永兴、蒋□华三人则不仅是一般泛泛的同学,而且是过从尚好、尚密的朋友。其中除王兄仍健在人间、并且担任着北大“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的导师之外,徐、蒋等人早已“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的了,我认为不应该再给这些活的和死的人头上扣上“投降主义”的帽子。加一百倍说,他们不过是革命阵营中个别的“持不同政见者”,是革命列车在半路小站上



下了车的旅客，但他们当年都是极优秀的青年，聪明绝顶，并且洞察了“左”倾关门主义之危害的人。在反关门主义的时候，他们可能有过游离开“大局”的一偏之见，这在今天显然是允许的，在当年也不过是一种“不同政见”而已，远远够不上什么“投降主义”；理由，他们的意见在当年远远构不成为一条“路线”（如王明）。既然未构成一条“路线”，哪还称得上是什么“主义”呢？故第 5 章第 3 节的提法显然不合适。

我把这些意见，直言无隐地写给了韦君宜，她回信说——

“你的那些高见自然无法发表。”

妙哉，妙哉！这陡然加来的写文章任务，就又这么陡然地被摘除了。不久，《光明日报》上刊出书评署名“韦君宜”，文中通篇说好，无一字的不同意见。其实，韦的信中原已写的很清楚了，“我们搞这一本书，非个人一家之言”。这句话就是说，这部书是代表组织的，故难以容纳个别人的看法。由此，我对“个人”和“组织”的关系，又一次受到了教育。

### \* 摇摇 \* 摇摇 \*

现在，让我来回忆一下这一伙人的影像吧。

为头的，自然是徐高阮。徐，江浙人，我说不清他是哪省哪县的人了。面皮是少有的白皙，而且不像北方人那样胖乎乎的两个腮，他的皮是紧紧贴在颊骨上的，鼻子像刀削。在清华园里，他属于革命者中最老的一层。这老一层的人包括：牛佩琮、何凤元、高承志以及陈国良。至于蒋南翔、姚克广（依林）、黄诚，那已是第二层。像李昌（雷骏随），已是很晚的一层了。由于是最老一层，他带着一种前辈式的倨傲。他虽然反对关门主义，但在他身上正留有关门主义时代的残余：诡秘、不说真话、声东击西，令人捉摸不透。他有一位很密切的女友许留芬，他们俩无论上教室、上图书馆、进城，总是比翼双飞。可是，听说他们终久没有成为夫妇，徐单



丽的笔触。但却引起了辩论。辩论的主旨倒不是关于译文如何的,而是关于纪德和巴比塞的比较。当时,有三个法国大作家到过苏联,罗曼·罗兰和巴比塞回来后是高度赞誉和大力鼓吹,巴还写了《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纪》,只纪德比较冷静缄默,不指摘也不歌颂。于是,从苏联那边就流露出议论,用中国辞汇来说,就是“第三种人”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于是我们辩论:巴比塞好呢?还是纪德好?杨述、蒋□华、郑庭祥和我都表了态。只蒋一个支持纪德,是少数。可是事隔多年今天再看,确实确实巴比塞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纪德并没有什么特别坏,不过他更多一些思辨,更少一些个人崇拜罢了。当年,鲁迅翁对施蛰存、杜衡等人的挖苦,也不过反映他老人家的一些“左”罢了。我把这段往事写在信里告诉了韦君宜,韦回信中说,“以今日视五十年前,何妨若一百年后视今日?”这两句话,也不过表示她对此事不拟深论、略打马虎过去就是了。

1957年夏我和蒋在西安马房门生活书店的书摊边,又邂逅了。我的山西新军的军装已换成便服,他倒是绿色军装,由于没有番号,不知道究竟属于哪家部队,也不好问。那天夜里,约好在莲湖公园的茶座上作彻夜之谈,记得还碰上警报,管制了一阵灯火。当时谈的是我想写一部《欧洲十九世纪文艺的神髓》,被他大大挖苦了一番,意思是皮毛还未抓住,上来就是什么“神髓”?!自从那次分别以后,他就返回晋城探亲,据说在距家一日路程的地方被暗杀了。什么人杀的?这怕是千古之谜了。因为当时当地驻军很复杂,八路军有,山西新军有,国民党军有,阎锡山部队有,日本特务也有。1958年我重过晋城打听,事隔九年,人们竟连个影子也没有了。像湖底泛起的一个水泡,它永远永远地破灭了。

记得徐、蒋合办《学生与国家》刊物,二人到燕京后往城府红葫芦胡同顾颉刚家请求题写刊头时,恰巧我刚好从顾先生处出来,碰了个对面。刊物出来后,还送了我一本。现在,想找这本刊物,

怕比登天还难。那上面蒋写的《青年思考独立宣言》,我也无由再读了。

还有一个人,也有必要在这里写一写。他就是丁则良。丁,似乎是那种江南人做官落籍北京者的后裔。他没有徐蒋深刻,咋咋唬唬的,爱领大家呼口号。解放后,他成了教授,仿佛是东北人民大学的历史系主任。1957年春夏之交,他正从巴基斯坦参加全世界史学年会飞回北京,东北方面已经派人守候着,叫他回校“交代问题”。那时,他住在周一良家,留下一封遗书,就投未名湖自绝了。我追忆起1957年夏一大批在思想改造中刚刚洗了第一次脑筋、从而不大舒畅的知识分子到青岛来舒畅一下胸怀,有邓广铭、齐思和、阎简弼,也有丁则良。在山大历史系的欢迎晚会上我与丁握手时,顺便说了句“我们还是一二·九的老战友呀”。丁脸色微沉,用不大的声音说:

“惭愧,我走了弯路。”

这句话在我脑际盘旋了若干年。我想,他是说了一句诚实话,不失为真诚的君子;但什么“弯路”呢?直到1980年代西北师院的外语教授李学僖才告诉我,当年他在英伦留学,每天早晨打开收音机(那时是月爆雷音晨间广播)时,总听见丁的播音。这一下,我才明白了,原来他“失”过“足”。

我自己问自己:你写这些是什么意思呢?我想我的意思应该是:像这样的人物,已经是在1949年代那场“大浪淘沙”中再也不会去写的“魂灵”了。真如朱德元帅所说,革命如一次列车,有从起点上、到终点下的,有半路上、半路下的。这两种人中间在价值上自然有很大的差别;但只要不是预先带了炸弹上车来搞破坏的之外,就总是“同路人”吧。我盼望,大家伙不要带着过分“恶劣”的印象和言词,去追忆他们。

原因是除了这些“同路人”主观方面有着这样那样的弱点、有的甚至是很严重的弱点之外,在革命队伍本身,也正存在着更严重

的弱点 ,那就是“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 ,正如少奇所说 ,它长期残留在革命队伍之内 ,缺乏对它的揭发斗争 ,使它千百次地重演 ,损害最大。长期以来,“左”倾思想的领导者们对搞关门主义的有奖 ,对联系群众和同盟者的处分。在组织上 ,他们深深惧怕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进入先锋队里来。因此 ,那些已进来的必然日子很不好过、心里很不好受。久而久之 ,一些阶级觉悟不够坚持的人就有可能游离开革命的总轨道 ,有的坚持自己的“民主个人主义”终身 ,有的就不免有了“失足”的行为 ,事情的原过程说到底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说到底 ,这是个双方有责任的事 ,不能片面怪罪这些“坏家伙”们“混进来”又“滚出去” ,一块臭肉搅浑了一锅汤。

一九五七年 八月 二十日 ,兰大 圆楼 圆办公室

## 从铮园到绿杨邨 ,再回到铮园

### 摇摇摇摇——记我与徐中舒先生的几次接触

同事汪受宽从昆明开文献学的会回来说 ,他遇到缪文远了 ,缪说徐老前几年还可以看小人书 ,这一半年连小人书也看不懂了 ,缪站在他床前大声说 ,“先生你看我是谁呀?”徐老竟认不出来。一个人活得太长 ,往往如此。 1984年 12月 12日我到北京王府井胡同去看张申府老师 ,他不是也糊涂了?一见面傻乎乎地说“你四十几了?”大家大笑。老师改口说 ,“噢 ,你五十几啦吧?”大家仍然大笑。这一下 ,他糊涂地不知说什么好了。徐老的情况 ,看起来比张还不如。据说他只剩下能吃能睡两条 ,所以生命还能延续。

在此之前 ,曾接到过川大历史系的来信 ,说本年 12月 12日是徐老 80寿辰并从教 50周年纪念 ,叫写贺信或贺电。贺电拍去了 ,又收到信说 ,要出纪念论文集。好嘛 ,我准备写一篇《公社农·小农·依附农》的文章寄去。

但我和徐老间的接触 ,其最动人的场景 ,还远不是这些。话说从 1982年春二三月到 1983年秋九十月之间 ,我有两年半多一点的时间被兰州大学“动员”退职 ,变相地被“清洗”了。这期间 ,我常往返于贵州与兰州之间 ,因为大孩子在贵州工厂里 ,老伴带两个小的仍在兰大家属院住。往返必经成都换车 ,换车期间必在成都游览一番 ,顺便到川大看看徐和缪(钺)。

1984年这次未看成。这时距离“横扫”虽已四载 ,余威未尽 ,



小床和二人合用一张小桌，一把暖瓶，从这暖瓶里倾出白开水来奉客。谈了一会，徐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似地，爬到家具堆很高的层次上（这是有一定危险的），打开一只箱子，在里面翻来翻去。这时，徐婆婆进屋来打了一个转身，看见徐先生的举动，显然要发怒的样子，但终于抑制住了，未公开阻止丈夫的行动。徐终于找到了一本显然是为了防止被抄走而藏得很诡秘的书。我一看，原来是中华书局刚刚出版的一本《左传选》。徐把书铺开在小桌上，一面郑重地对我说：

“这本是新出的，我只有一本，所以不能奉送。书前书后，有我写的两段文章，里面是有点东西的，你就坐在这里把它读读。”

我照徐先生的好意，仔细地读了，原来是他对《左传》由来的一个新看法，说《左传》原来是瞽史的演唱，后来我把这看法叫做“瞎子唱书”。徐先生所谓“有点东西”，就是指的这个。这件事虽小，但我一生久久在念。我想：一个诚实的学者对他自己的学术见解是多么地珍惜呀！试想，当年的那个环境也够离乱的吧，徐婆婆已查出患癌，大家心绪也够糟的吧，但徐老仍不惜爬高，翻出这点“东西”来以飨同好，这是一个多么动人的场面哪！

转眼到了1974年，我又过成都。记得这时正是基辛格秘密访华首次发布消息的时候，说尼克松次年缘月将访华：中美关系打开了。这年，徐先生应该是75岁。他已从绿杨邨搬回铮园，但徐婆婆已经死了，五个儿子全回来奔丧，臂上都缠着黑纱。别人告诉我，五个儿子全是右派，这一点我不好意思落实。反正都分配到成都以外，记得最近的在贵阳，最远的刚从乌鲁木齐回来。他们告诉我，川大落实政策，从徐开始。头头找徐谈了话，四句。第一句：从今往后，可以不参加政治学习了。第二句：在家里想干点啥，就干点啥。第三句：想写点啥，就写点啥。第四句：假如需要，我们可以给你派助手。

徐本人似乎比绿杨邨时候疲乏一点，儿子们烧饭，徐还开了一



瓶“成都大曲”。他谈了一些顾颉刚在北京的遭遇和陈寅恪在广州死前死后的情景。我在贵州与世隔绝,听了感到很新鲜。我说我想去拜望一下顾炎武研究者黄少荃,徐惨然地说,不久前她刚刚悬梁自尽,你已见不到这个人了。五个儿子中的一个送我到九眼桥,借机在路上边走边谈谈。他说,他父亲不久前发过一次病,有六天光景,躺在地上打滚,也笑,也哭,用手抓自己的胸脯,骂人,骂的那些话是儿子们从来没听说过的。请来医生诊断,说是“心源性精神病”。“心源性精神病”是怎样的病,我不懂医学,不敢乱说。但看起来,这病又像歇斯底里,又不像。理由是,以后并未多次复发过,可见生理上没有“根”,只不过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残酷迫害的一次总爆发就是了。“文化大革命”快收尾子时候,徐老的具体情况就是如此,谨立此存照吧。

补充写一点。据说,徐老的大弟子不少,其中有唐嘉宏、缪文远和罗世烈。有一次唐到兰州来,在饭桌上告诉我一个场景。有一年,蒙胡子(按,蒙文通)死了,开了一个以斗争会代替的“追悼会”,正面悬挂着蒙胡子的放大像,加两条黑叉。台上跪着一个戴高纸帽的,就是徐中舒。第一个上去进行批判的,就是蒙的儿子,这真是“划清界线”的绝好事例了。不过这样的例子既非空前,又不绝后。我的老同学牛荫冠(此人解放后担任过几个省的财政厅长,还当过财政部副部长)家是山西兴县最大的富户,土改时,牛是土改组的组长,坐在上边,他父亲跪在下边。游街时用铁丝像穿牛鼻一样穿了他父亲的鼻子,由牛荫冠牵着。据说这件事后来被“上边”知道了,可“上边”并不欣赏,据说还下了一道什么“文”。

自落实政策以来,徐是一天比一天好,但也一天比一天衰老了。1984年缘月圆日,在“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的开幕式上,记得徐就坐在我的旁边。照安排,他要代表四川省史学会讲话,他还特意用一页纸竖行毛笔写了提纲,但即便有提纲也中途讲不下去:思维断线,接不起来了。对此,大家谅解。这年他应该是愿衰岁。又

过两年，~~1984~~年缘月缘日，在“先秦史学会”的成立大会上，他的精神较上次好得多，做了一个小时的学术发言，大体讲的是周民族从今山西省迁徙过来。这天仍是我坐在他的旁边，亲自看到他老人家精神奕奕，言语无丝毫失误之处，不觉私心大慰。这年，他~~84~~岁了。倏忽五载，谁会想到，他竟在~~84~~岁上连小人书都看不懂了呢？

~~1984~~年~~12~~月~~18~~日，兰州

## 一个绝顶聪明但被扭曲了的人

### 摇摇摇摇——为童书业逝世二十周年而作

张维华死了，终年 84 岁，算是好寿数。来了讣告，我也去了唁电，其中说“先生在五十年代山大历史系教师中，为具有真正水平之一员”。写着这样的电文，不禁想起了童书业。童死去已 32 年，终年差几个月不到 34 岁，真是寿夭之事不可测。1982 年我到杭州，童的小女儿童教英同志对我说，“你是先父生前好友，为什么不见写一篇纪念文章呢？”当时我未作答，并非我“语为之塞”；而是要答，需要涉及很复杂的一段历程，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1983 年在西安我把情况一股脑对童的老友史念海讲了，史说还是不写文章为好。但不写不写，连我本人也要按自然规律办事，岂不遗闻湮没了吗？因此，还是趁 1983 年忌辰的前夕，把它写出来吧。

童的长婿黄永年写的童传，好几年前就读过了，感到不少形式化的地方。这也不能怪黄，那时的风气就是如此，打就要打到地，好就要好上天。我要从另一个角度来写童，他平生弱点，就在一个“怕”字。有六怕，怕失业、怕雷电、怕空袭、怕传染病、怕癌、怕运动。童的一位学生又补充了两条：怕地震、怕蒋记反攻大陆。所有这些他都怕，有时怕得要死。在此还要说明，这里的“运动”，非指体育运动，而是指政治运动，这一项是他最怕的。每当运动前奏，“先吹吹风”的会开过之后，第二天童的脸马上就像烟灰一样的颜色。单这一条，在过去“左”的时代，能写吗？我想有朝一日教英

同志读到这里，七年前的疙瘩就可以解开了。

以 1957 年的肃反运动为例，先是批胡风，接着从党内揪出华岗，慢慢就要深入到本单位的问题了。照例先开一个“吹风会”。记得“吹风会”的主持人是三个：杨向奎、蒋捷夫、孙思白。不久之后，我就是肃反的大对象，可是“吹风”之时，我还侥幸有资格跟若干积极分子坐在一起听“吹风”。“吹风”的大意是，山大历史系有三个大反革命。其一是张维华，他是美帝的忠实走狗，齐鲁大学的洋人离去时，给他留下埋在地下儿的几缸金银，作为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资本，还有一张地图，标志埋缸的方位。我们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张缴出这张图，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其二是童书业，他有血债，他一夜之间杀了一千个共产党员，有检举材料可证。其三是韩连琪，济南解放后他化装成乞丐到青岛去给国民党通风报信。听了“吹风”内容后我回来对妻子高昭一说，童先生看见咱家杀鸡都吓得捂着脸，他怎么会一夜之间杀死一千个党员呢？

原来事出有因。童跟他父亲的关系，不甚协调。童夫人时常谈起抗日战争时，童的父亲受其妾的挑唆，将童夫妇赶出家门，逼得童夫妇从江南到江北、从江北到江南跑“单帮”生意过活。那时童的鞋底上都是大洞，用一把稻草塞住。解放后，童父及其妾住在上海，写信到青岛来，说你现在是大教授了，应该按月给一点赡养费。最初，准备每月给 400 元，不知怎么一来没有给。上海那边就写了检举信，信在肃反之前早已由市委转下来，贮藏在党委的组织部了。

事情是这样的，1949 年徐州解放之前，顾祝同为了勉强点缀升平，发起要邀请一些学者到徐州去讲学。很多人拒绝前往，童书业和杨宽二人应邀前去了。当时使用军用卡车把他二人送往苏北，黑夜之间有不断的枪声，童问这是什么声音，蒋军官兵回答说，“打共产党，我们一夜可以消灭他们千把。”回到上海之后，童是“书呆气”很重的人，不懂得这话的轻重，就把这话传出来了，传来

传去,话的主词从蒋军官兵讹成了童本人。童父之妾,就是按这话头写成了检举材料的。

童如何对待的,我就不太清楚了,因为我在他们之前被斗,并被宣布为“披着马列外衣、猖狂向党进攻的反革命分子”。斗争的气氛,远较他们的为盛大激烈。但我心里并不太紧张,因为对我一未抄家,二未隔离,一直让我“逍遥”着,不久,山东省委宣传部长夏征农来青岛以“有反必肃、有错必究”的原则,替我宣布了平反。

事情过了很久,已经是运动“收尾子”的阶段,突然发生了一件新鲜的事。似乎是一个星期天,家里人大部分都出门了,只剩高昭一在家合衣午睡。当时只有我三岁的小女儿赵红从外面偶然跑回家,意外地发现一个瘦老头跪在妈妈床前。这一下,可把她吓坏了。她喊着跑着出去找人。后来高昭一也醒了,我也从街上回来,研究的结果,那个跪着的人是童书业。

事情的关键是,童有一份“交代材料”在党委组织部,运动过去了,他想索要回来毁掉,可是又不敢自己去要,想求我代他去要,又不敢当面提出,所以想到我的妻;可来时正值我妻午睡,所以就出了这怪相了。“交代材料”中说了些什么呢?说的是有一个受美国情报局指挥的,隐藏在大陆很久、很深的,以研究历史、地理、绘制地图为幌子的反革命集团,其最高首脑是顾颉刚,各地分设代理人,上海代理人是杨宽,山东代理人是王仲萃,东北代理人是林志纯,底下还有一句“我和赵俪生也是其中的成员”。这份“交代”写了一厚本,题曰《童书业供状》。我得悉之后,立刻去找了组织部长高芸昌,高派人到合江路宿舍把童找来,就在组织部办公室内找来一只盆子当着童的面,把《供状》撕开,烧成了一盆灰。童从此才释然了。

在这件事情以后,我与孙思白之间,曾展开过多次激烈的争论。孙认为,我去替童要求将《供状》焚毁的事,是一件严重无原则的行为,因为这份文件需要永远保存下来,作为童书业不惜陷害

老师好友的品质问题的铁证。但我不以为然。任何人,任何人的性格、品质,都是跟他的环境条件分不开的。在“左”的路线下,一次次运动的架势,真是吓得死人。前文表述过,童是个“怕”字当头的人,旧社会怕失业,曾怕到神经失常,这是被扭曲的头一回,解放后不怕失业了,可又怕运动,试想,一千条性命的“血债”,不够他发疯的吗?这是被扭曲的第二回。当然,我从来没有说过,童写那样的《供状》是好的、应该的。童在平时经常对我谈,一个变态心理的人制造的谎言和假相,往往是最精致的。可是他究竟还是在长达数万言的《供状》中并未遗漏下连他自己也是其中成员之一的“坦白”。存心害人的人,是光害别人,绝对不害自己。而他既害别人,也没有忘记了害自己,这是他“精神病”、“变态心理”的铁证。法律不是规定,有精神病的人,杀了人也是不判死罪的吗?根据这一点,我对童采取的是谅解态度。

童在生前经常给我讲弗洛伊德,我腹内所存的一点有关弗洛伊德的知识,都是从他那里听来的。似乎弗氏在谈到陀斯妥也夫斯基时,说他有时对别人是“施虐狂者”,有时对自己是“施虐狂者”,但最终结点上却是个“受虐狂者”。这话高明极了,并且完全可以适用于童书业。试看,长达万言的《供状》一案,到头来还不是害了自己吗。再举一例。有一年,咱们大陆方面宣传蒋记要反攻大陆,童的神经又紧张起来了,紧张到控制不住了,他去找当时的山东大学历史系党总支教师支部书记,说,“他们来了,首先要抓住我,用枪口对准我的胸口,要我带他去搜捕共产党员。你知道我是胆小的、怕死的,我不能不带他们去抓你。但我和你约好,当我到你窗口时我拼命咳嗽,你听到咳嗽声,马上躲起来就是了。”这简直比小孩还幼稚。可是不久,“受虐”的时机很快到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对童书业的第一张大字报上写着“童书业有变天思想”、“童书业借反攻大陆谣言恫吓党员干部”。想来,光这两条就够他受的了。

## \* 摇摇 \* 摇摇 \*

我和童的友谊 ,建筑在三件事情上 ,一、谈学问 ;二、看京戏 ;三、品画。

童书业最爱谈学问。谈到高兴时眉飞色舞 ,手舞足蹈。不管听的人爱听还是不爱听 ,他一直谈下去 ,谈到午夜以后。他最怕黑夜中出事 ,但谈起学问来就什么都不怕了 ,因而造成过小事故 ,有时迷路 ,有时被警察收容。因此很多人厌烦他谈学问 ,径直撵他走。我夫妻能有耐心地听他谈 ,所以他认我二人为终生好友 ,一到周末或星期天 ,就一定到家下来。我家的饭并不特别好吃 ,个别菜的烹调技术距童夫人远甚。但他恋着谈学问 ,就到处宣传我家的饭如何好。童在吃东西方面也有怪癖 ,如裸露的肉他是绝对不吃的 ,吃了就吐出来 ;但包裹起来的肉他却大口大口地吃 ,这不是“闻其声不忍食其肉” ,倒是见其形不忍食其肉的“仁者”了。我们就顺着他 ,把肉用面糊、豆腐皮或茄片、瓠片包夹起来 ,做给他吃。吃完就谈 ,吃是次 ,谈是主。他谈的 ,都是治学中新收获的萌芽 ,或者说 ,是一些论文成形前的毛胚。并且在这里又须加一笔 ,童有时很傻 ,但有时又很精。例如他跟一个人谈过某个他自己的“精义” ,这些时候这“精义”不知不觉被摄入该人的论文中去了。从此 ,他就再不到这家去谈学问 ,我们问起来 ,他只把眼睛弯成蛾眉那样咪咪地笑着 ,不出一语。再者 ,他总有一种偏执 ,认为我夫妻二人接近革命早一步、接触马列早一步 ,而他晚一步 ,从而对我们产生某种莫名其妙的信赖 ,仿佛我们听后没有认为大谬的论点 ,就是可以站住脚的了。其实这是十分靠不住的 ,我们自己的许多论点后来不都变成“反动透顶”的啦吗 ?

当时有四个人是京戏迷 :杨向奎、卢振华、童书业和我 (我妻因脚有湿气不能常去)。大家一起去 ,互相请客。童听戏 ,也有他的怪癖。第一、他不听票价高的戏 ,如梅兰芳 夔愿元、马连良 夔愿

元、张君秋、员元等，他都不听。原因之一，怕是夫人卡得紧。（有一次他跟我一起从合江路宿舍到大学路去上课，他花缘分钱买了一个尖底纸包的花生米，倒给我一半，一面吃一面唠唠叨叨地说：“连剃头加吃花生米，才给我发缘块钱！”）他只听东镇一家小剧院门票猿角的戏。第二、在一夜三块或四块的戏中，他有他的选择。他厌烦老生和旦角的唱工戏，每当慢三眼、慢四平或反二黄慢板时，我们三人都眯起眼睛听得入神的时候，童却不见了，他到吸烟室休息去了。等武打戏一上场，什么《龙潭鲍骆》，什么《杨香武三盗九龙杯》，他高兴极了，神采奕奕，并且在戏散回家的路上，他一定告诉我，听了这样的戏，他的精神所得到的恢复，要比睡过一场好觉、或者接受一次“休克”治疗要强得多，明天的第一堂课一定讲得特别精彩。他甚至约请我专门去听他那一堂课。有时，联系“龙潭鲍骆”和“杨香武”，他能谈出一系列宋、元、明、清的社会礼俗，一直谈到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在夜深人静的街道上，他高声放肆地讲着，简直是意气风发了。

童书业是历史学家，此外，他还兼备画家和画论家的身份，这是大家所公认的。他早年习过画，卖过画，还专门到北平跟胡佩衡学过。他画山水，路子是“四王”。他仿过王石谷，也仿过戴醇士（名熙）。他自己说，仿石谷达不到“乱真”，仿醇士完全可以“乱真”。他说，旧社会有做假画的集团，谁着墨，谁上色，谁题字，谁刻图章，谁把新画来“加旧”，谁上裱，都有专行任务，赚了钱大家分。有时，眼看着自己参与制造的伪品，连社会上最著名的鉴赏家的眼睛都骗过，使那人连连表示珍赏的时候，他想笑不敢笑出来，只好憋着。但说来可怜，他家纸、笔、墨、砚，一概不备，只有正月初一到黄公渚（孝纾）家拜年时，借黄家高档的画具设备，才即兴给朋友们画一两幅。

当时解放不久，诸城一带大官僚、大地主家里的字画，在“扫地出门”时成了贫雇农家的“胜利果实”，一转手二转手到了青岛



出卖。此外，青岛是德、日、美三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许多“先朝”政客，如今失意了，都愿到青岛来当“寓公”，老一辈死后少一辈就把所藏书画也拿到店里出卖。所以缘年代前半段，在青岛市面能见到的字画比较多，价钱比后来也便宜不少。童是从来不买画的，但是我买。买来之后挂在墙上，由童来品评。他的品评，带专家气息，也带偏执气息。他往往不从画法、纸色、绢色、墨色、题款、用章、藏章诸方面的综合情况上去下判断；而是“单打一”，根据某年某地他见此画家有某种画法、笔法为理由，判断与此画法笔法极相类似的一幅画为真品，而判断与此画法笔法迥不类似的一幅画为赝品，等等。这样做的结果，误差往往很大。所以在当时青岛的卖画、买画、品画的人们当中，他的品评不太被人重视，理由是他的观点太偏执了。

当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童已经支持不住了。我听说，在山东大学“牛鬼蛇神”们拔草时大家都是蹲着拔，“红卫兵”只准许两个人带板凳：一是冯沅君，因为她是小脚；二是童书业，因为他有病。后来我问杨向奎是否如此，杨说：“哪里？！板凳已坐不住了，是躺着拔；后来是童太太代拔。”有一年在杭州郊外我见到童太太，我问童先生是怎么死的，童太太说，她也不知道。她问医生，医生说：

“他的肺没有了。”

王仲荦告诉我，当童的噩耗传来时，一位讲师的夫人在阳台上“又替人民节约了二百多元人民币”。现在这位夫人的丈夫也已上了“教授”职称，照我看这批人民币也不能“亿万斯年”地领取，有朝一日也会像童书业名下那笔人民币一样地被节约下来的。

# 由一个人的死引起的政治风波

## 摇摇摇摇——回忆丁山先生

丁山死去，一转眼已经在十五年零几个月了。假如他还活着，也不过才 64 岁。今年夏天在青岛，山大历史系 1964 年代毕业生刘士圣请客吃饭，席间有另一 1964 年代山大学生尹铁铮在座。尹是安徽亳州人，丁是安徽和州人，尹初入学时因缘安徽同乡关系曾不只一次到丁家去。我们谈起三四十年前的往事，我轻轻问了一句，“丁先生到底是怎么死的呀？”这一下，尹激动起来了，厉声说：

“简直可以说是给害死的呀！……”

说着他极其异常地哇哇地哭起来了，哭到连饭也不能继续吃下去，只好退到一边去。尹是青岛民主党派的秘书长，由于一生耿直不屈，也遭遇了不少磨难。他这番哭，不是没有来由的。

记得 1954 年的冬天，冒着冰雪和严寒，我一家人从长春迁去青岛，从东北师大转到山东大学教书。一路所乘火车在站会车、错车时，记得全是军车，战士们正“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去打抗美援朝战争。在济南转车，我去看望了算是我多半个老师的王献唐先生。王先生嘱咐说，到山大后，代他去看望两个老朋友，一是丁山，一是郑鹤声。这两位老友，都比献老小五岁。这是我与丁山发生接触的缘起。

当时山大历史系主任是杨向奎，副系主任童书业。我到校不久，就跟童交上了朋友，懂得童做学问是一把高手，但当系主任却

远非其才。学生们又告诉我,丁、童之间也有点积怨。事情是这样的,杨不给丁开课,说他的立场没有转变,净说反动话,怕开了课学生起哄。丁呢?正像他自己非常自负地说过的,第一是贫农出身,第二是没有科班学历,却在廿八九岁上就当上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专任研究员。他专治殷商史和甲骨文。通史课第一段就是商周史,杨偏偏不叫丁开,叫童开。童知道系里有一函甲骨影印片的资料集,去借,资料员说,“一直在丁先生那里。”童托第三者去讨借,丁不给,并说,“我已经在上面写了很多条‘跋’了,都是个人的心得,怕别人偷了去。”童听了自然不愉快,但他也有他的办法,他对学生去说,“我的课,本来可以上得更好,但丁先生垄断了资料,我受到局限。”学生一听,派了七八个人夜中闯进丁的住室,说:“丁山,系里的资料你不能垄断,缴出来!”积怨就这样地积累下来了。这也是童没有带我去看丁山的原因之一。

我一个人去看了丁山。那时似乎丁的家眷还未从上海迁来,他独身住在文学馆的一间房里。第一次的印象是,此人很硬,不打弯,在学问上是一位唯我独尊者。我是晚辈,“诺诺而退”就是了。但不久在灵隐的一个冬天清早,丁先生到合江路宿舍来回拜我了。丁是从来不回拜人的,这次回拜,使我受宠若惊。那天他穿一灰罩皮袍,长围巾,拄一支拐杖,看上去绝不像源岁,俨然还多老翁的样子,挺老相的。这次也绝口不谈是非话,足见丁倔强之中亦有其世故在。他告别时,我送他出门,原来他还有一件事情要办。他有一个私淑的弟子叫刘敦愿,住在合江路宿舍门口,刘此时到苏州进修去了,其母病死,这天去埋。只见一个老年街工,拉一辆地排子车,将薄薄一具棺木安放在上准备往墓地拉。丁山赶上前去,摘下自己棉帽向拉车工人深深鞠了一躬,弄得那个工人不知所措。丁说,“我叫丁山。是山大的丁山教授。棺材里的,是我学生的母亲。他学习去了,没人送葬,请你把她埋好。钱已付过,我再给你鞠一个躬!”这一情节,是我亲眼目睹,至今猿年犹历历在

目。为什么死者的儿媳妇和孙儿孙女一个也未去送丧呢？我至今不得其解。

到第二年（~~1958~~）元月，丁山本人也死了。只我听得到的死因，就很多。对此，我不做任何判断。有人说，他是老肺结核。又有人说，他太倔，不相信西医；中医开了方子，他自己要加加减减，才取来吃。有人说，他从《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图书集成》中查药方叫药。有人说，不给他开课，是他精神上最致命的伤害。等等，等等。

在他死前几天，孙思白约人同去看望丁山，我去了。这时家眷已迁来，一家人住在金山二路一座洋房的第三层上。第三层近乎楼顶间，房子的墙矮一点。丁的女儿和我的女儿是同学，早已见过的了。丁太太是初见，一位淳朴的“南京型”老太太。丁这天并未躺在床上，而是坐在椅上，或者在房中走来走去。他的面目黧黑，两颊火烫般的红，身穿一件皮茄克，像是猎装。他气呼呼的，不大说话。孙当时是第二副主任，丁不说话，可能与此有关。厨房里案板上放着两只褪了毛的白净的胖鸭子，丁太太说这是杨主任派人送来，给先生滋补身体的。

丁山未死在家里，而是死在山大医院。尹铁铮说，“头一天学生们去看望，还好好的，第二天就死了。”接着就出了事。历史系四年级学生四川人李定钧带头拦阻丁的遗体不准出丧，说要法院验尸。山大党委采取紧急措施，夜间在鱼山路校部大楼的六二礼堂召开紧急座谈会，当场宣布李定钧是“托匪”，由党委组织部副部长武杰亲自给他带上手铐，由校警带走了。“丁山之死”的各种议论，遂一举压平。

1958年 元月 猿日，兰州

## 明史专家王崇武逝世四十周年祭

王崇武先生离开我们一转眼已经整整 四十 年了。我 ,叨天之怙 ,迤邐活了下来 ,感到有责任将崇武兄的轶事写出来 ,一来可备后世治 四 世纪史学史的人作参考 ,二来也权当一份炙鸡絮酒之奠吧。

王崇武 ,河北雄县人。说起雄县 ,据说大路边一座石碑 ,上面刻着四个大字 ,道是“燕南赵北”。就这四个字 ,也就够耐人寻味的了。我常常这样想 ,咱们祖国各地区都有各自文化遗传的脉络 ,以河北说 ,以敝见所及就至少有两条 ,一条在衡水、河间一带 ,自北朝刘焯、刘炫以来 ,成为东汉经学到隋唐经学中间的传递集团 ;一条在保定 ,颜习斋说 ,高阳孙相国与鹿善继、孙夏峰三先生论道河北 ,噫吁盛哉 !崇武兄出生在这一带 ,什么经学、历算之学、兵学 ,甚至任侠、壬遁、风角之学 ,在乡里间都有不自觉察的感染。这一带对押韵做诗 ,则相对疏淡。正因为如此 ,他进了北大 ,进了历史系。他是 一九四 四年进大学 ,比我早两年。他那一个班级 ,真可以说人才“倍”出 ,杨向奎属狗 ,崇武与何兹全兄属猪 ,张政烺属鼠 ,傅乐焕、全汉升属牛 ,他们的岁数都是联着璧的。平素北大学生宿舍都是破破烂烂的平房 ,在他们临毕业前的 一九四 五年 ,盖起了松公府灰楼一座 ,很是气派 ,记得我从西郊进城来看过一次 ,门上只一小窗如镜框状 ,内挂绸帘 ,有人还悬上一半件小玩具。崇武大学毕业时就住在这样的宿舍里。

他在学术定向方面很早熟 ,在大学期间就写了好多篇与明史

有关的文章。那时顾颉刚先生办了个《禹贡》，陶希圣先生办了个《食货》，他们大学高年级学生就在上面投稿。什么宦官制度啦，军屯、商屯制度啦，记得都谈论过。当时虽未形成家数，但苗头已经茁然长出来了。

抗战军兴，他一直在重庆李庄。这个地方我未去过，只是听人说。有一年，王献唐先生自济南到青岛，住在旅馆里。我邀请他午餐，并探以何人陪席为妥，他冲口而出：“高亨！”他二老在酒席上说的全是李庄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往事，把我都给听傻了。酒至多半酣，忽然问有手杖没有，并且还要两支，原来他二人要表演在李庄用手杖打架的情况。文人之酸状、之天真状，真是表演得活龙活现了。

崇武兄当时够不上跟这辈老人扯皮。历史语言研究所给级别刻薄，只给个助理员，后来给个助理研究员已经仿佛很宽厚了。幸好他尚未结婚，一个人关起门来，死钻洪武、永乐两朝的史料和史事。在日本投降以前，他一连串写成了三本书：《皇明本纪校注》、《奉天靖难录校注》、《明靖难史事考证稿》。三本都编为研究所的“专刊”，编号分别为 001 和 002。三本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要经所长傅斯年批准的，可见傅对崇武兄还说得上是器重。

后来崇武结婚了，夫人是四川人，也是学历史的。后来，不知怎么一来二去的，他们夫妇弄到一批中英庚款留学奖学金，到英国去了。他们在英国的情况，崇武兄未给我谈过，只送给我一本他夫妇翻译的有关太平天国的书：《太平天国史料译丛》。连来加去，总要三个年头吧，所以一赶他们回来，祖国已经解放一年多了。

崇武兄在著作中不太爱发议论，他的拿手本领是做“细工活”。说起“细工活”，美国伊朗史专家福来（福来）先生告诉我，伊朗出的手工品最富代表性的是“细工艺”。人们右眼戴着显微镜筒，精雕细琢。他过兰州时还专送我一件实物，其精细令人惊叹。崇武兄在历史方面的操作，令人不断想到与波斯“细工艺”媲

美。

在《皇明本纪校注》和《奉天靖难录校注》这两本书里显示出来的，正是一种令人惊叹的“细工艺”本事。凡治明史的人都知道清修《明史》水份很大，漏洞很多，研究生们往往就去死钻《实录》。可是，《实录》就可靠了吗？王崇武先用他这两本书来回答这个问题。专制主义帝王是不放松一丁一点的，于自己统治不利的统统要删去，于自己统治有利的统统要龘进来。这一点我们治历史的人一定要心中有数，不可被煌煌史料骗过。中国历史上的专制主义发展到朱元璋、朱棣（明太祖、明成祖）手里，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了，他们父子间本来是统一的，但中间又出了个建文，出现一个“大统”的继承问题，老父子二人的文章就做得不一样了。多少文臣武将在中间吃了夹饼。情况出人意料地残酷，充分暴露了专制主义的可怖。关于这一点，崇武兄一句话也没有说，但凡仔细阅读了这两本书并且没有偏见的人，都会自觉不自觉获致这一结论。在这里，“细工艺”是显现了它的很深的作用的。

在北京，他参加了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但他在古代史方面还是出了很大的力，一是帮助范文澜先生修订《中国通史简编》，一面是帮助顾颉刚先生标点《资治通鉴》，这后一工作，其主要重量还是压在崇武的肩头上，因为顾先生究竟是老了，还要以主要精力招呼《二十四史》的标点工作。此外，他还以私人负责的名义，校点了明史要籍《小腆纪传》和《小腆纪年》。这些沉重的工作堆积在他的手边，压在他的心头，自~~员缘~~年绵延至~~员缘~~年，他已经感到疾病会越来越严重地影响他的健康和工作了，于是他提出来到青岛去疗养两个月。

那是~~员缘~~年的愿怨两个月份。他住在栖霞路科学院的休养所里，距我家蓬莱路很近，拐一条小街就到对方那里。于是我二人敞开心怀要好好在一块玩一玩了。记得我们经常去的地方是汇泉中山公园的一家茶座。这里很幽静，记得小业主姓屈，莱阳人，除源圃

茶外,还可提供新鲜面包、大腊肠、冷热咖啡、小点心、果酱等等,有时,他还可以告诉我们一些故事。我二人在公园里坐久了,就搭马车进街里中山路,在“青岛咖啡”吃顿西餐,或是到“乐口福”吃一盘大虾炒面。他不喜欢看京戏,所以天黑我们就各自回家。

当时他的病只挑明了一种:高血压。我还请我的好朋友、山大医学院内科主任杨枫设法买到印度用蛇液制的降压药。服下后,有时有效,有时无效。这就告诉人们,崇武史除却高血压外,还有别的病。果然,怨月末尾他回到北京住进协和医院,医生力主开刀。开刀是要亲属或至友签字的,结果是由他的同班张政烺签的字。打开肚腹,各部脏器上密密麻麻布满了癌点!至此,已不需要治疗了,把肚腹缝上,回家调养。次年源月,崇武兄与世长辞,终年源岁!上有父母,下无子女,呜呼哀哉!对于再过两三个月的反右派,他已经“盖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了。

在本文文尾还需要补叙一笔的,是通过崇武兄的搭桥,我与远在广东的另一位明史专家梁方仲先生发生了学术通信的关系。崇武给我说,梁方仲这人非常好,你可以和他交成极好的朋友,他是“广东十三行”一行的后代,很有钱,家里藏的书画很丰富。假如你到广州,他会邀请你看他的藏画,但我要预先嘱咐你,即便遇到你最欣赏的画,你也不要露出爱不释手的样子,因为那样,等你回到旅馆时,那幅画或那几幅画已经包扎好送到你的书桌上。他就是这么一个伉爽的人。

梁长我怨岁,与我的另一好友童书业同庚。梁在清华研究院读经济学硕士毕业后两年,我才进入大学,可见他的班次比我高多了。自从发生通信关系之后,他陆续将他研究粮长制度、研究一条鞭法的论文和专著源源寄给我。在这中间,又夹杂一段我与陈寅恪先生的因缘。

事情是这样的,我写过一篇分析北魏六镇起义的文章,发表在《文史哲》上。其中有这么一个论点,大体说陈寅恪不接触马克思



主义,但由于他忠于史料,所以他获致的结论与通过马克思主义所获致的结论,每有符合。这段意思可能被陈先生知道了,就私下里嘱咐将他的南北朝史、隋唐史的油印讲义,每批卷成卷寄给我,并又小声嘱咐说,讲义看不看不打紧,那补白地方刻着我的诗,其中透露一点心声。梁先生就把这在信里告诉我了。这件事多少年来,我未敢向任何人透露,因为到“文化大革命”中,假如叫红卫兵掌握了这个情节的话,就成为再典型不过的“反革命串连”了。

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有连锁反应。到“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位金应熙先生其人者,在《中山大学学报》上发表了批判陈寅恪的煌煌大文,在其中也把我捎带上,说有那么个“右派分子”如何如何说,以证明天底下的反动派总要沆瀣一气的。我读到后哈哈大笑,对老伴说,赵大秀才拿竹杆要打阿匝,顺手打到小阅的头上了。拨乱反正后开“史代会”,在京西宾馆,有客人敲我房门,“进来”;“贵姓”;“金应熙”;“哦,哦”……在这两声“哦哦”里,我又映出了赵大秀才打小阅的一幕。这次不打了,但也未明示歉意。我端详了来客的模样,真是仪表非凡,确是南国的才子。我感谢他的下顾,但听说此公也于 1984 年下世去了。

以上这些,崇武兄全然不晓得的。但这是由他的“搭桥”招惹出来的这么一串的事,故也附写在这里。

## 怀念任访秋先生

我牢牢记住,任先生长我八岁。也就是说,他已是我长兄一辈的人了。我们相识,是在1937年。我初进河南大学,当时中文、历史尚合在一块,叫“文史系”。嵇文甫先生是系主任。有一次嵇先生告诉我,任访秋是他教的后期师范生里最早一班的学生,后为考进北平师范大学中文系,在北平报刊上发了不少文章,也是出名最早的。此人宽厚平易,从来不与别人计较。这是嵇老当年在我脑海中注入的有关访秋先生的最早印象。

后来,我们就相交成朋友了。除互作家访外,很多机会都是在七号楼二楼教员准备室里相遇。那时,大家都穿长袍,我二人都属高个(当时他还未驼背),任先生经常提一个皮包,包很大,里面装的东西很重,包的成色也很旧了。当时蒋记政权已岌岌可危,物价腾飞,货币急剧贬值,往往上午发薪水,即刻去买面粉,还可以买一袋,若迟到下午,就只能卖半袋了。有一天,他在教员准备室里忽然高声吟诵两句诗,道是

“无衣无褐,何以卒岁?!”

有两位经济系的讲师也循声吟诵,一时俨然构成为对蒋记政权的一种讽刺和抗议。

生活无以维持,当时有人办了一家嵩华学院,请人兼课。记得任先生教《中国文学史》,我教《西洋文学史》,工薪不发货币,发面粉,教一小时每月一袋面,挺实惠。在这家的教员准备室里,我俩又增添了若干“无话不谈”的机会。

不久,开封面临解放。解放军入城后,要接一批教员到解放区工作,因为当时地下城工部通知的名单里没叫通知任先生,我们这就没通知他,他就留在开封,等候第二次的解放了。

一转眼, 50年过去了。我们初识时,我是 30刚出头,他是快到 40了。而今我已年近 60,任已快到 70了。记得他住轱辘湾,院中有一棵楝树。曹雪芹祖父曹寅号楝亭,我却只从字面上知道有种楝树,实际未接触过,而今接触到了。我详细地咨询了有关楝树的情况,记得嫂夫人是陕北(似乎是米脂?),她详细地向我介绍了楝树开花结果的情节,我在日记里记了一首小诗:

“重上华堂十七年,中庭有树才拂檐,  
闻道花放紫薇致,想是香飘夜合欢;  
枝头撷取金铃子,我心长系汴水沿。  
再来何日迎花信,苦楝风轻看春残。”

一转眼又过了 30年,已是改革开放的年代了,河大邀请我讲学,这时我已 70开外,任先生已近 80,驼背已显得很严重。他已不住在轱辘湾,而是住在学校新建的宿舍楼里,记得是二层。上次他约我上馆子,我因匆匆要走,婉辞了,这次辞不掉。记得我二人各偕老伴,任先生的儿媳也参加了,由北土街缓缓往南走,边走边谈。但这已是我二人最后一次的相聚了。

前些时,从与姚羸艇先生的电话里获悉,访秋先生已作古人。计寿,当在 80以外。近几年来,我们这一批 20世纪 60年代活跃起来的人,已纷纷谢世。寿登 80以上者为数不多,仅缪钺先生、邓广铭先生、杨向奎先生数人而已,而任先生也在其中。

记得当年河大文史系中文方面的主干教师是任访秋、李嘉言、张长弓三位。我常拿任、李二位作对比回忆。任先生豫南人(记得是方城),李先生是豫北人(记得是武陟),任心胸开阔,做学问往大路子上看问题,李心胸不够开阔,做学问是细工绣花活,考证的很细密。听说李先生在“史无前例”中正在巨像前请罪,忽闻鞭

炮之声 疑是红卫兵要枪毙自己 ,一阵昏迷就作古了。呜呼 ,看起来任先生得享高寿 ,还是沾了他心胸开阔的光。

圆年 缘月 圆日 ,写于兰州大学 圆楼之 圆室 ,时年 愿

## 也怀孟超

—

我 19 岁时 ,也就是说 1937 年后半年 ,开始浏览上海大型文艺刊物《现代》和《申报》上的杂文副刊《自由谈》。我留心到一位短文作家的名字 ,叫楼适夷。一晃功夫 1947 年过去了 ,我又买到一本《适夷散文选》,这是北京人民出版社为他祝寿而出版的。祝几十寿 ,书里没有说 ,但我私下里估摸 ,我 19 岁他就能写那么成熟的杂文了 ,少说也有 100 吧 ,那么 ,这寿怕是 100 了。

打开书 ,顶头碰到一个题目 ,是《我怀孟超》。孟超吗 ,倒是我的家族中最大龄姐姐的丈夫。我们全村同辈的弟弟妹妹们全喊他“大姐夫”。记得很小很小的时候 ,天下着很厚的雪 ,孟超迎亲的队伍 ,就要出发了。有仪仗 ,有锣鼓 ,一顶蓝轿一顶红轿 ,我全看着过去了 ,跑回家跟娘说 ,“这个天坐在轿里不冻杀了?”娘说 :“在霸山歇一夜 ,第二天到家。”这霸山 ,是韩信跟项羽潍水较劲的地方 ,也是著名作家王统照的老家 ,他的那个镇子叫相州 ,正是景芝镇和诸城县城间的中点站。

楼适夷先生写的孟超 ,却是他晚年在上海滩的事。楼和孟 ,都是太阳社的成员。说起太阳社 ,我也有一点记忆 ,头头叫蒋光慈 ,后来也许嫌“慈”字太儒化了吧 ,改名蒋光赤。1930 年代的激进主义者就是这种风格 ,无政府主义气味非常浓厚。孟超后来写了昆剧剧本《李慧娘》,康生初看了还写了祝贺信 ,可是江青看了说是

“反党”，于是孟超成了“中央专案”下的犯人。后来未能熬到平反，就孤零零在上海寓所里死了，口里流出来血。楼适夷这篇小文就是说的这些。小文两千多字，我认为写的好极了，真应该选入时下流行的什么精品选刊，或者编入大学或高中的课文中去，加上注释，叫后代学子去读。这种文章跟《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的效应不一样，后者只能给人一种“闲情逸趣”，而楼文却能使后辈们懂得某个时代是多么的严峻。

## 二

假如楼先生写的是孟超的晚年的话，那么，我倒知道一些与孟超早年及其身世有关的一些事。

孟超的父亲叫孟练生，行二。行三的叫孟方达，兄弟二人是我伯外祖父和外祖父的私淑弟子。诸城这地方有个传统，就是做诗的兴趣很高。你到诸城博物馆里查找地方文献，立刻就会发现，诗集最多，文集相对较少，理学语录之类有一点，但更少了。所以我说，诸城出个臧克家不是偶然的。我伯外祖和外祖做不做诗，我不清楚；留给后世的，只是文字学一类。有一年我到诸城访问，一位县政协的副主席（苑园多岁了）告诉我，他四五岁时，随他祖父探望我伯外祖父郭芝农（金篆）时，未进门就听到笛韵悠扬，原来郭先生酷爱昆剧，搜集一些爱好者和职业演员在家中演练。这一点，给这位苑园多岁的政协副主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的，我听之后，也顿悟出一条线索：孟超单单写《孽慧娘》，形式是昆剧，难道跟少年时候在乡里传统上的影响一点关系也没有吗？

郭氏兄弟和孟氏兄弟，这师徒二家，私谊是很深的。我们小时候听说，郭氏兄弟后来穷得揭不开锅了，孟氏兄弟家还积有田亩，就打发两个长工各扛两块粮食给老师送去。我们那时的粮食口袋是用比较细而特长的麻布口袋，上面印有堂号（伊伊堂记），一袋装三斗。各有六斗粮食，老哥儿俩可以够吃些日子的了。

我和孟超的三叔——孟方陆，曾有过亲身的接触。仍是 1949 年，一个冬天，孟三先生找我父亲来了。这时，我们的那个家已经贫穷到不能接待客人的水平。远元租金租来的（而且要“上打房钱”）愿 10 平方的一间房，四周摆四张床，父亲一张，母亲带我一张，两个姐姐各一张，中间一个“瞥儿气”煤炉，架着烟筒。客人进来，连个坐的椅子都没有。孟三先生仿佛很懂得这些，就不坐下，站着把一个大纸包递给我的父亲，说那是他的诗集原稿，要刻去了，请我父亲题辞，说《序》已经有好几篇了，你就填一首词罢，长短句是你的拿手戏。说完就走了。我父亲是非常疏漏的，但这次例外，他当然能掂量出他们间情谊的份量，一夜之间，就填就一首《念奴娇》，中有句云：

“记否燕台旧侣，长醉海棠荫里，微雨湿春晴。”

这“微雨湿春晴”的句子，叫我这 19 岁的儿子历 1949 年，而不忘。我当时在心里默默地想父亲是有才气的，而且才气不小。

第二天一清早，父亲命令我把题辞连同原诗稿一齐给孟三先生送去。孟三先生和我们是一条街（苏州路），走不到半里路就到了。那是坐落在高坡上一家小公馆，要爬几十蹬洋灰台阶才能上去。房不是楼房，是平房，在某种程度上也显示了山东土地主的吝啬。他接过诗稿，把题辞看了一遍，露出非常满意的神色。我要告辞了，他说“等一等”。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三方刻图章的石头，三把尺子，一本他自己历年刻印积存下来的印谱，意味深长的对我说：

“课余之暇，练习练习篆刻之术，日后也是一个饭门嘛。”

我深深明白孟三叔爱护朋友儿子的深情厚意。可是我后来把这番情谊辜负了。原因是不久父亲死了，我进了高中，每天要演算几十道大代数和解析几何的题，实在精力顾上不来。我只刻过一个图章，用的是父亲的一句词。父亲说，欧阳修的句子“郎似东风，妾似东风絮”未免凉薄了一点，我替他改改吧“郎似桐花，妾似

桐花凤”。他问,你看怎么样?我冲口说“凉薄是不薄了,只是微粉了些”。父亲听了,似乎不愉快。我就拿这怨个字刻了一方图章,不敢刻白文,只能刻朱文,刻的我的左手中了数处刀伤,血流不止。

以上这些内容,似乎走题了,跟孟超大姐夫缺乏直接关系。但这对孟超的家族还是有所渲染的。

### 三

现在,该切到本题上来了。

1959年缘月,北京召开五四运动40周年的会,兰州去两个人,兰州大学是我,甘肃社科院是叶林生同志(此人现在是苏州大学历史系的主任了)。会址在动物园(旧名叫万牲园)附近的国务院第二招待所(简称“二招”)。我分配的同房是山东大学的孙昌熙,隔壁是王瑶。孙是我中学的同学,王是我大学的同学,两个都是研究鲁迅的(用当前若干自称是现代主义者的用词,这两人都是“吃鲁迅饭的”。)有一天我开会回来,看见台灯下压着两张戏票,是当天夜里初次上演的《李慧娘》。我问孙是什么人送来的,孙说两个中年女同志,自己说是你的外甥女,她们叫你“五舅”。噢,我明白了,这是孟超和我大姐的遗孤。当晚,我和叶林生一同去了剧场。

剧场很大,但观众已经满坑满谷,气氛很热烈。演出之前有广播,大意说,“观众同志们,我们的演员们,经受了史无前例的残害,有的嗓音已不正常,有的胳膊腿啦已经失灵,所以假如在演出中有什么失误,希望观众同志们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爱护演员,不要拍倒好。”听到这番广播,全场更提神儿啦,大家心里想,作者孟超破着命写剧本,现在演员们又破着命来演这场戏,大家能不以最凝聚的精力来观赏这场戏吗?

戏演到临终场前大约一刻钟,最动人的场面出现了。那时贾



似道戴着平帽翅的丞相帽，身穿袍服，手扶玉带，突然一个“铁板桥”躺在舞台上了。这“铁板桥”是中国传统戏剧中的“功夫活”，没有练就的功夫是演不出来的，勉强演要么躺倒的形象很难看，要么演员的腰部和颈部会受到损伤。这次的演员功夫很好，躺倒的形象很爽快麻利，而且没有声响。这一下，全场被感动了，大家不约而同地鼓起爆烈的掌声，池座和楼座的后排观众甚至站起来鼓。这种空前的场面，似乎用无声的喇叭在说，“这个老家伙终究是倒下了”。

孟超的效果就在这里。

#### 四

古书里说，“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我的伯外祖父和外祖父虽然也说不上是什么“圣人”，而且原话所说的“圣人”也并不是指孔子，而是宋国的臣子正考父，他是孔子的先祖。所谓“达者”的“达”，自然是指“闻达”，即为官作宦，闻达于世间。孟超的父亲和叔父是“郭氏兄弟”的私淑弟子，他们把文字之学、训诂之学、甚至昆剧传统，以及做诗填词一一传递到后辈，到孟超身上，到《李慧娘》一剧如此成功的演出上，这股郁勃之气，不就传达出了吗？我是把“必有达者”的“达”字，未训作“闻达”之达，而是训作“传达”之达的。

一九五九年八月八日，写于兰大圆楼之圆室

## 水天同先生五年祭

水天同先生仙逝，一转眼已经五年了。我，作为后死者，是应该替他写一篇《传》的，但是资料不足。资料不足，包括文献的和口头的都不足，要写一篇好《传》就很难了。油画画不成，只好作速写。

应该说，水先生一辈子是一个潇洒的人，一个洒脱的人，不汲汲于事功。不少人，把讲师和教授间的差别，科长和处长间的差别看的非常沉重，水先生不这样。他认为人一辈子只要活得自如，就很够了。写三本书和写三十本书，有多大差别呢？说到事功，记得德国传记作家路德维希到苏联去找斯大林，问功业心是一种刺激呢？还是一种障碍？在水先生身上，功业心作为一种刺激或者作为一种障碍，效用都不明显。他认为，一个人只要像他自己这个人一样，原模原样地活一辈子，也就够了。这就很难。很多人需要加工。我们走在街上，假眼皮、假头发、假胸脯……不是比比皆是吗？这还只是形体的，至于精神的，也就是说灵魂方面的，伪装就更多了。骨子里明明是个卑鄙污浊到极点的人，却蒙着一身正人君子的堂堂外衣。水先生最不要这么干，他要做他自己。

他想教教英语的时候就教教英语，他想翻译点什么的时候就翻译点什么。他平生翻译的量不大，甚至有点过分的小了，但他对翻译之道的理解却是极其精妙和深刻的。他反对两套框框之争，一是“直译”与“意译”之争，一是译文用文言抑或用白话之争。关于使用直译还是意译，他认为要区别不同的情况，有时西文语句与

中方行文不约而同,那么顺笔写来,自然巧合。可是这种情况是不多遇到的;多遇到的情况是,中西文字相差甚巨,那么,完全直译,必不可能。就需要将西文构架拆卸开,个别小句可以颠倒,然后按中文传统重新构架起来。他认为,究竟何时何处需用意译,何时何处需用直译,关键在于译者中、外文字之造诣如何。窃以为,这句话深刻极了。时下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时髦书从国外传进来,于是四五个人急急忙忙凑成一伙,你翻甲章,我翻乙章,修养各各不同,文笔更多差异,这样译出来的东西,直译也说不上,意译也说不上,只能让读者啼笑皆非,这从哪里谈得上造诣呢?

关于译文用白话抑或用文言之争,水先生又说了一句深刻而又精妙的话:翻译者旨在传达原作口吻。须知,这“口吻”二字,可就难煞人了。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词汇、典故、习用语、幽默和噱头,西方人有西方人的词汇、典故、习用语、幽默和噱头,要在这二者中间找寻对上茬口的东西,实在是一番大学问。举例来说,我个人生平曾经多次企图将“三言两拍”中的一些最佳篇章译为英文,但都未能坚持下去,如唐末五代草泽将相说比武是“比个大哥二哥”,这在英文里怎么译?旬月踌躇,我一直想不出好译法。说这些,在于说明水先生“传达原作口吻”这句话实践之难,要求水平之高。

到 70 岁上,他才勉强写了《自述》(见书目文献出版社《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 2 辑)。这篇自述也写得洒脱,很多事不提,包括他出身的水家也一字不涉,只记得上小学时兰州街上的少年在身后编着歌儿骂他。他的一点温馨的记忆是关于那位日本籍的夫人,水先生生前也曾多次对我说起过,他与她的婚姻生活是一生中最宁贴的。在《自述》的尾部,水先生用谦虚的口气说,他这一辈子“书也念了几本,路也走过不少”,用我们的话说是已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了,然而犹有遗憾。遗憾什么?根据我的揣度,他是说,他的莎士比亚研究未能大幅度地展开,他的文化人类学研究连初步展开也说不上。这是他潇洒一生中的两大遗憾,连我们做

友人都为之遗憾不置 ,因为凭水先生的高才 ,以及对中西文化、中西语文的深厚根底 ,假如他生前能带起一批徒弟把莎士比亚研究大幅度展开的话 ,那种效应 ,那种贡献 ,将是垂青史而不朽的了。

当然也不是说 ,水先生平生连一点事功也不讲求。譬如 ,他在云南办了八年英语专科学校 ,这个事功就不算小 ,培养了多少外语人才。连他临终那天下午 ,他还是陪云南来的客人谈笑风生兴奋过度而气阻的呀。

水先生是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最后一班的学生 ,我是清华改大学后第十班的学生 ,相差十个班次。旧时代晚中进士五年递贴子 (名片)时必书“小门生”字样 ,那么 ,我对水先生说 ,已是双料的小门生了。逢此谢世五载之际 ,我只能洒着眼泪对后辈们说 ,像这样的老先生此后是不会很多的了。

癸卯年 癸月 癸日于兰大 圆楼

## 记王瑶与冯契

旧语词中有两个词我很喜欢,一个是“含苞”,一个是“脱颖”。前者说的是花朵,后者说的是毛锥(毛笔)。花朵在开放以后,自然是璀璨如锦;毛锥一旦脱颖而出以后,自然是笔走龙蛇。但我感到,都没有含苞待放和脱颖欲出时更富于情趣,更耐人寻味。话归本题,1952年时王瑶兄 19岁,冯契兄 19岁,鄙人 18岁,在一块上学,使得鄙人得以领略二位学兄如何含苞欲放、脱颖欲出时候的情景,而今活在阳世之间的人中,熟悉此情此景之人,恐怕是舍我其谁了。故不顾耄耋,愿就此有所撰述。

王瑶兄出生在山西平遥。这个地方,无论在政治上或者在金融事业上,都是不寻常的。在政治上,它一度是“代”郡的郡城,故城郭保留,宛然至今。在金融业上,它是票号的发祥地,有清代华尔街之称。这种在操业上和历史上积淀下来的娴于计算的明敏,不能说一点也没有沾染到王兄的身上。从同学的时候开始,我就觉察到遇事他比我反映快,他即刻反应能力很强,而我要过好一阵才能做出反应。所以我在给嫂夫人的信中,说我的智商打 100分,而王兄在 120分以上。而我心底里暗暗设想,这和金融业中长期积累下来的明敏,怕是分不开的。

冯契兄出生在浙江诸暨,我们同学间常开玩笑的,那是出了西施的地方,可我们一面开玩笑,一面心里清楚,冯兄跟西施没有一丝一毫的相似。他出自农家,性格偏于内向,在大学一、二年级时就不声不吭地啃大本大本的西文版的康德和斯宾诺莎著作。很

快,他就被老师们器重,冯友兰先生讲《中国哲学史》课,每讲到自认为淋漓尽致的时候,总是向班上说:“密密密斯忒儿冯冯冯宝麟,你你有什么意见?”引得我们一教室的人既新奇又嫉妒,整个讲堂七八十个人,你的眼睛里就只瞧得上一个冯宝麟,那么我们大家伙就只是“叨陪末座”了。从此中也可以看出,冯兄的脱颖而出,已经被老有城府的冯先生觉察到了。

人总有个“坏子”的时候,也就是说,还没有挂釉,还没有彩绘。等一挂釉,一上彩,一只美丽华贵的瓷器就出来了。我要说,论“坏子”,王瑶兄应该是一个革命者,或者说是一个激进主义者。很长一段时间,看不出他准备当学者的意图。可是历史总是曲折的,那时候的革命队伍很“左”,关门主义很严重,对成员要求这样,要求那样,兼之本人也有些弱点,于是进去又出来了。当学者,在他,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到昆明复学,当研究生,那些措施,与其说是属于事业的,勿宁说是属于职业的。

我看,他的本行,还应该是文艺理论和当代作家研究。那时,他整天手不释卷的是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卡爾斯基。在这方面,应该说他的底子很深。至于陶渊明以及魏晋文人等等,那是很远以后的事了。他后来之所以能带出那么多精彩的研究生,一个一个对周作人、郑振铎、夏衍等做出那么精湛的研究,其中那股“气”,是在 ~~1935-1937~~ 年间积贮下来的。

冯契,作为“坏子”,不是一个激进主义者,虽然他一辈子保有党员身份。他似乎是一个天生成的学者,温柔,内向,早年写诗和小说,喜欢思维,往深邃的地方思维。当然,那时我们也都挺左。我们三个人一起参加了“左联”,到现在的《左联辞典》里,还编入我们三个人的词条。当时双十二事件刚刚爆发,学生中左右两派分裂得很厉害,礼堂里的“民主”不解决问题,就到校园里大打出手,曾把一个云南省党部派遣来的研究生丢到小河里去。从今天看,就是违法的暴行了。不过人一辈子总有那么一段的。







桌旁念一辈子书,有的念出一点点名堂,有的连一点点名堂也未念出来。现在不同了,把古的和新的串在一起,把中的和洋的串在一起,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方面、角落去考虑问题,所以新义往往如雨后春笋丛生。

但也并不是说这新一代完全没有弱点。他们很广,又很杂,但在功底上显出过硬不够。我常把导师跟研究生中间的交谈,叫做探测,像探测海底一样,看有没有珊瑚,珊瑚有多少。举例来说,1987年我初进河南大学,表面上和嵇文甫先生是同事,但实际上我是以师礼事之,他似乎也默认了我这个门徒,于是开始了交谈,也就是探测。这一探测,我惊讶地感触到嵇先生在理学方面,也就是思想史方面,确实是浩无际涯。这就是老一辈人根底之硬,在后辈心里所建立下的威望。话归本题,王、冯二位学兄的徒弟们虽然绚烂多姿,开拓面很广,但假如从论文和专著中伸进手去,摸一摸功底的话,就感到比他们的导师稍逊一筹,有的一筹还打不住。这些,就是新时代带来的异化了。

1988年 猿月 圆日,于兰州大学

## 宛在的音容

小时候看人家出丧，见挽帐上四个大字：“音容宛在”。当时看过也就过去了。而今垂垂老矣，由古稀向耄耋转进，若干至亲好友一位跟一位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一觉醒来，“落月满屋梁”，这才矍然领会到上面四个大字的确实意义。

我与王瑶兄是大学时代的同窗学友，自 1934 年至于 1938 年，首尾四年。那时候，我们一起到教室听课，一起到大食堂或小饭铺吃饭，一起到琉璃厂买旧书或到北京饭店楼下法文图书公司买外版书，一起在城内大街上游行示威，一起组织会社、编刊物、写文章。同时，我们一伙青年朋友们自发地各有所好，各有所趋，有的写小说和报告文学，有的写诗或散文诗，有的搞翻译，王瑶兄一直喜爱并写作文学评论和文学理论方面的文章。因此，我们私下里对他有“小周扬”和“小胡风”这样的称号。

王瑶兄一直是快步走路，急口说话。他走起路来，得得作响。他讲起话来，山西乡音很重，内容像连珠炮般喷出，语音越说越高亢。但我留心到，当他露出快要发脾气的时候，同时却又流露出一股孩童般的真纯。这个境界很美丽，很高乘。他后来博得若干学生的崇敬，我想这是原因之一。当时我曾对另外的同学说，“假如我是女同学，我一定爱上这个人”。他理性能力很强，非常善于辩论，在一场辩论中从不饶过对方。他口边喷着唾沫，两手挥动，我们私下里说这是“抛砖引玉”。

我们当时组织过两个会社，一个叫“国防文学社”，出版《国防

文学》两期；一个叫“清华文学会”，出版《新地》两期，王瑶兄还主编过第 源卷《清华周刊》。但就在他手里，《周刊》被教务长先生勒令停刊了。王瑶兄写了一篇“告师长同学”的大文，这篇文章在当时很有名气，义正辞严，不卑不亢，显示了王瑶兄的气度。

可是在芦沟桥事变前的一段时期里，王瑶兄的情绪不是很高扬的。他主编的刊物被勒令停刊了，此其原因之一；当时的革命，虽然瓦窑堡精神已经下达，但正如少奇同志文章里讲的，左倾关门主义残余仍很严重，组织对成员的看法有时很片面，有时也引起成员对基层组织有看法。此其二。王瑶兄在爱情上也遭挫折，此其三。前一条是众所周知的，后两条是我作为密友探测出来的。为此，他很早就启程返回他的故乡——山西省平遥县道备村隐居起来了。

我们有三四年互不知下落，互不通音讯。灵源年，我夫妇在陕西省乾州中学找到一个教书的职业，王瑶兄突然自西安来乾州相访。乾州，是唐高宗和武则天皇陵墓之所在，也是唐德宗被朱泚之乱团团围困的地方，那时叫奉天。我当时每周獮小时的英语课，喊得嗓子经常暗哑。租得民房东厢厦房一间，四壁萧然，只一盘大炕，夫妇二人带一新生不满周岁女儿，连孩子衬布都是山西新军带下来的供给制军装的破片。有被两床，我妻带婴儿一床，我与王瑶兄合盖一床。街上买点乾州名产——锅夔和挂面，妻子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拉风箱煮些挂面，三人饱肚。日本飞机时常飞临上空，丢个把不大的炸弹或打一索子机枪。

这时叶圣陶先生自成都寄给七律一首，末句云，“遥知此中皆战场”。我与王瑶兄即从此谈起。当时既有枪炮战场，也有思想战场，还有精神战，其中再夹杂着若干人际战场。经过几个昼夜的畅谈，我们认为，进《宰辅传》压根没有门，进《忠烈传》也未必有资格，进《货殖传》根本没有本领，到头来还是进《儒林传》吧。这就是我们的路线。可是道路又各有不同，他辗转自宝鸡，而汉中，而

重庆,而昆明,拿大学文凭和研究生文凭去了,我则边教边读,自力苦苦营生,且不懈于学业的上进。

时光又一闪过了若干年,我的右派帽子刚刚摘掉,组织上说叫我舒畅一下,叫我携带巨款到琉璃厂替学校图书馆选购古书。我借机到中关村王瑶兄家,他也“儿女忽成行”了,而且家道殷实,駸駸然驾小康而上之矣。老友重逢,直出直入。他说:“你没有我够朋友。比如,你老婆姓什么、你儿女名字叫什么,我全能说出来。可是我老婆姓什么,儿女叫什么,你全说不出。我的书,每一种都寄给你,可是我相信你连一个字都没有看!你的书,一本都不寄给我,我从别处找来,一一看过,不信其中某个论点我都可以举出来。”

我说:“老兄,不能这么说。咱俩虽然都入‘儒林’,但传也有个大小之别。您身居京华,车马冠盖,小弟僻居边塞,自然会有些自卑,也是人情之常嘛。至于尊著,则确已一一拜读。《新文学史》两巨册,且有日文译本,因为隔行隔道,老老实实说只粗略翻过,也说不出具体意见。后面那本《中古文学史论集》,学院气派,考据气息已很坚硬,老老实实说小弟对之兴趣不大。只对老兄中间三本《思想》、《生活》、《风貌》,鄙人则深深拜倒石榴裙下,理由是老兄当年‘小胡风’之音乐味在此三书中犹未全泯,思辨气息尚未被考据全压下去,文中尚有几分活气,此最最宝贵者也。”

这次以后不久,就来了“史无前例”。他的学校的红卫兵来提审我,我的学校的红卫兵也提审过他。说我们中间说过许多“黑话”。从那以后,我们之间连红话也不说了。夫子曰:或语;或默。我们从此一直默下去,直到王瑶兄逝世。他死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却永远活在我的心里。当然,这里所说的“永远”,也不过是祈祷性言辞。我很快也要逃不过自然规律的,所以趁此一息尚存,写为此篇。

## 记蒋□华君轶事

从《九级级刊》第愿期上,读到张国良兄写王玉发的一篇文章,很有感触。这种文章不写,好多事情就要永久地淹没了。历史是公正的,也应该是公正的。健康的要著录下来,轰轰烈烈的更要著录下来,残疾的、也就是说少胳膊没腿的,不是也应该著录下来吗?

蒋福华,又作□华,九级社会学系学生,山西晋城人,回族。他,不高的个儿,卷曲的头发,一脸小落腮胡,戴副小眼镜,冬天穿件半旧的棉袍。他不跛,但走起路来,像鸭子的步法,给人一种“跛”的感觉;后来我才明白,那是一种名士派的派头,对于风格有所助长。

他住六院(新斋)底层第三排西半截,我住第一排东半截,所以来往很方便。经常跟他一同出入的有两个人,周荣德和王勉。当时郑庭祥开玩笑说,蒋□华带着他的两个“徒弟”。在思想上相一致的,还有徐高阮,和徐的女友许留芬。说起徐高阮,应该多说几句。他是江南人,清华园中很早的共产党人之一。那些人应该包括何凤元、高承志、牛佩琮,还有徐高阮。徐当时大概已经是党员,而蒋□华只是外围“社联”的成员。但他二人都有点“异端”,或者说是“不走正路的安得伦”。他二人编了个刊物《学生与国家》,请顾颉刚题的签,在刊物中表达了他们跟正统的革命不太相同的道路。徐在天津《国闻周报》上发了他的《谈谈共产党问题》,蒋在《学生与国家》上发了他的《青年思想独立宣言》,这就闯下大

事了。平心静气而论,那两篇东西不过是反对“左”倾路线而已,若在今日反“左”人人皆知的情况下,也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就几乎等于“叛变”。试翻历来编写的一二九运动史上,千篇一律给他们头上加一顶帽子;“右倾投降主义”,好大、好吓人的一顶帽子呀。于是乎,徐高阮到了大西南,成了陈寅恪的助手。陈的《寒柳堂集》里还收有一篇陈替徐写的序。徐后来因病死在台湾。

那么蒋□华呢?他的下落知道的人很少。我有机会在他猝死前几个月,在西安与他邂逅数日,略有盘桓,故在此做些历史资料性质的著录。

大概是 1949 年夏。在西安马坊门的生活书店的门市部里,我二人意外地相遇了。那时我已脱了山西新军的军装,当中学教员。他却穿起一身草绿的“中央军”军装,可是既无胸章又无臂章,弄不清他是哪个番号的。他约我当天傍晚到莲湖公园的茶座上作通宵之谈,我去了。记得当时日本飞机大轰炸,我们躲到西城墙的防空洞里,警报解除再回茶座。时已半夜,凉风吹拂,荷气沁人。我告诉他,程骏声(之平)在东木头市《秦风日报》社,洪绥曾(洪同)在梁府街青年团陕西支团部,熊秉葵在王曲第七分校,问他要不要接头,他说,“一个也不要”。几天后他就要回晋城老家探亲去了。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早已婚娶,岳父(或祖岳父)是马骏。马骏和张培梅是阎锡山部下的老军官,新一辈军官提到这两个名字,都会流露一股害怕的神气来。我又问他,现在在哪个部队里“发财”,他举着打麻虎眼的神气说,跟一个在部队里的朋友混个少校薪资吃一口饭就是了。我不便再问下去。

此后不久,忘记是从清华校友会系统得知呢,还是通过地下“城工部”系统得知呢,蒋□华在返回老家的路上,在阳城被杀害了!阳城那地方我呆过,情况很复杂,中央老三军的部队有,四川四十七军李嘉裕的部队有,阎记旧军陈长捷的部队有,薄一波、戎武胜的“决死”一、三纵的部队有,十八集团军的一二九师的部队

有……一直到现在,谁也弄不清楚蒋□华是谁人,为什么被杀害的,成为一桩千古悬案了。

我之所以到今天还想起来写一点蒋兄轶事的原因是,他是同学中少见的才人,是人类中的一个花朵。我之年近耄耋,可以说得上是“阅人多矣”,但是我似乎未曾经历过一个比蒋才华更高的人。回首 缘年前,假如没有那么多层面,抗日的和降日的,革命的和反革命的,“左”倾的和右倾的,托派和干部派……人们不需要在这些层面里翻上去、倒过去,那么像蒋□华这样的人,无疑会成为一名罕见的学者。说到这里,已经接近于说傻话了。本来嘛,人在变老的过程中就是不免要越来越傻。

员源年 员圆月 员怨日

## 记赵正楹君轶事

—

赵正楹,山西崞县人,清华外语系学生,年级恐怕比九级还早,因为我查过九级几种名单,都没有他。他住六院(新斋)前排三楼,我住一楼,时常有来往。来往的缘由,多半是与清华“世界语学会”有关。这个学会早先的头头是李选青,山西榆次人,也住六院中排。我是会员,右胸口袋上插一绿色五角星会徽,上面一个“耘”字,表示耘~~嘉~~嘉~~非~~非~~噪~~噪。

芦沟桥事变前几个月,赵正楹来找我,说他忙得很,李选青已毕业离校,把在《世界日报》上的《世界语之光》副刊的编校发寄事宜留给了赵,赵太忙,就来委托我“代劳”两期。这任务很繁重,要把许多来稿爬梳爬梳,批上字号,进城交给报馆,隔两日进城校对(要在夜里),出报后取来单份,一一分发出去。这些工作,我都做了,赵正楹仿佛很满意。

接着芦沟桥事变爆发,我去了太原,赵留在北平,直到愿月~~缘~~缘日以后,才与赵继昌结伴通过天津,经由青岛、济南到大后方。谁料这时日本占领军接到一个什么情报,说清华、燕京两校学生要到天津组织示威,反对日本占领平、津。天津站口一直是不盘查的,现在盘查了,凡清华、燕京师生,一律扣留审查。赵正楹、赵继昌就恰好碰上了。



## 二

赵继昌,山西五台人,经济系十级学生,曾任《清华周刊》源卷编辑,我和王勉、周荣德三人是他的《副刊》编辑。解放后,他做到驻民主德国商务参赞,1954年去世了。听说他身后留有《回忆录》,我本想写信去向夫人讨要,又听说夫人是第二任,与第一任子女不谐,所以也就一直未敢去讨要。今年10月,接级友赵儒洵兄寄来他新出版的《洪波序曲》,其中就包含有《赵继昌回忆录》的节录。这是非常宝贵的。其中“天津遇险”一段,说的就是他和赵正楹一同被扣的事。

他们被扣留在日租界一幢小洋楼的地下室里,地下铺有芦席,门口放一马桶,天天发几个米团团(煤煤蛋),根本吃不饱。这样拘留了10天,要放他们,但须在一份《契约书》上签字。《契约书》上写的是“保证不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活动,保证致力中、日亲善”等等。当时,赵继昌还不是党员(只是“左联”成员),赵正楹已是资深的党员了。他们当时的思想是,骗过日寇,保存自己,返回大后方,投身抗战。这场事,本是一场寻常的事体。过去就过去了。可是假如有人往“忠节”这类原则上追求的话,就会是个不大的或者很大的问题。果然,在赵继昌身上什么问题都没出,在赵正楹身上可就出了大事了。

## 三

在这里,要插进来说一说郑庭祥(天翔)。郑,内蒙(旧绥远)凉城人,十一级。他后来是大人物了,做过北京市第一副市长,七机部副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等职。当年在清华园,王瑶、郑庭祥和我三个人,却是至好的朋友,连吃饭都是三个人连袂去东门外倪家小饭铺吃,饭帐合算一块,从来不分,这次你付,下次他付。一个人需要钱了,到另一个的抽屉里拿来花,有了钱再自动还回去。

这个关系,已经很“铁”了。芦沟桥事变后,三人各自分飞,一晃缘多年。现在,王兄已经仙逝。八十过后,郑和我又想起了彼此间的旧情,“鱼雁频通”已经两三年了。

他写信说,当年他由赵德尊介绍入党,拨归赵正楹单线领导,故二人有一段交谊。作为“平津流亡同学”大家从青岛到济南后,又碰到一堆了。二人去了延安,入了陕北公学,想把由芦沟桥事变散失了的组织关系恢复起来,大概赵正楹在班上也把在天津日本人那里,在一个什么东西上签了字的事也不当回事说出去了。突然有一天,郑受到了隔离批斗,说他包庇“民族叛徒”赵正楹,不把他在天津日本人那里填写反共书的事向组织揭发出来。这时,赵正楹遭遇的什么,他已经不知道了。他只好请妻子拿一张《大公报》去给赵正楹,上面刊登着山西清华同学写给徐芸书(高阮)的一封信,下面有九级赵寿贞(征夫)在临汾的机关和地址,暗示他,你还是到临汾投他们去吧。

赵正楹去了临汾没有?不清楚。只牛荫冠说过,他下班回来,桌上摆着一张纸条,上写着他“回来了”,此后就如石沉大海,无踪无影了。当时牛是晋西的行署主任。赵正楹原有个叔叔在天津当小职员,两赵被日人拘留时,此人曾花钱营救过,几十年后仍然活着,远从台湾来大陆,找到郑天翔,讨个“说法”。郑说,他也没有“说法”给那个赵正楹的叔叔。

过多少年后,我们只能说赵正楹是当年极“左”时代的一个无辜牺牲者。当然,这仅仅是个人的说法而已。

再须附增者:最近接郑天翔学兄赐寄其新出版诗集《大庆之声》(北京出版社),在页边及扉页中,即两次悼及赵正楹,一曰“从来伏虎多悲壮,未有正楹沉冤深”;二曰“问君瑶台居何处,好将确讯慰和青”。(小注云,赵和青,正楹女儿)。足见赵正楹有后代留在人间。

癸卯年 庚月 庚日

源恕

## 记丁则良君遗事

在学校时,我和丁则良只是见面打招呼的一点交情,没有来往。只记得游行队伍到了大街上,有两个领喊口号的人,一个是化学系的曹国枢,一个是历史系的丁则良。

1957年夏,北京一批高级知识分子来青岛散心。据说,他们刚刚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洗过一点脑筋,这比“史无前例”中冲击的力度要温和得多啦,但不少人仍受不了,所以安排他们到青岛来松弛一下。史学界的记得有邓广铭、聂崇岐、邵循正、齐思和等人,其中还有丁则良。山东大学历史系同仁在一个夜晚设清茶一杯接待他们。大家都来了。握手时握到了丁则良,我说:“我们不仅是清华十级的同班同学,我们还是一二九运动中手拉手的战友哪。”他突然低下头用压低了的声音说:“惭愧,我走了弯路。”

这个话,久久萦绕在我的脑际,多思不得其解。1957年他死了,就杜绝了当面交谈的机会。事隔19年,读到九级级友赵德尊寄赠的《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1957年他是清华团支部的书记,书中记载不少个外围(如《左联》、《社联》等)成员条件成熟可以转党的,其中就有丁,可是又说,丁进入组织因政见不合又退出来了。从这中间,我得到了“走了弯路”的第一种理解。

大约1957年吧,当时兰州大学文科并入西北师范学院,有一次两校合在一起的四个大右派一起拔草。所谓“大”,是指划右派以前的身份是教授。其中一人是李学禧,他划右派的主诉是由于他是甘肃省“九三”的秘书长。拔草时监督不严,大家就侃开了,

我问他留英的情况,他说当时在伦敦的有王崇武,还有丁则良。他说每天早晨打开收音机,有一段 ~~配乐朗诵~~ ~~配乐朗诵~~ ~~配乐朗诵~~ 就是针对刚刚建立的新中国,这段话的撰者和讲者,都是丁则良。从这中间,我得到了“走了弯路”的又一种理解。

当年,丁则良是跳北大未名湖死的。为什么跳湖?这也该落实落实。当时他住在周一良教授家。我就写信去问周,周回信说,因为当时东北人民大学(即现在吉林大学)把他划成了“余、丁、徐反党集团”的分子,叫他回去交待问题,他不声不吭跳进湖里去了。我又写信到吉大向朋友吕绍纲教授打问,回信说,他当时是四年级应届毕业生,当时所有批斗会他都亲自参加过,所以情况很熟悉。“余、丁、徐反党集团”的余是余瑞璜,是物理系教授,据说是杨振宁的老师,徐是徐利治,是数学系教授,三人都是民盟的执委。

丁死后,东北人大还开了个定案批斗会,丁的胞弟丁则民教授还登台批判(这种现象一点也不奇怪,川大蒙文通教授死后的批斗会,由蒙的儿子蒙默登台批判;山东黄县的土改大会斗争牛荫冠父亲,由牛亲自主持)。当时,东北人大校长(匡亚明)竟拨款一千余元为丁治丧,还引起有人不服,给匡贴了大字报,说他“右倾”。

我们十级级友,正如洪同学兄所说,都是“八老九十”(不是“七老八十”)的人了,有些事再不弄清楚,已经没有什么时间了。关于丁则良学兄的事,我就数十年来断续所知的材料,爰写出之如上。

丁终年仅 ~~溷~~ 岁,很多著作还没有来得及写出来就死了,所以现在国内流行的几本社会学家辞典和史学家辞典中都未列他的条段。

1985年 5月 14日

## 我对牛维鼎同志的回忆

收到朱伊君同志的来信，乍一展读，吓了一跳。怎么比我小六个整岁的维鼎同志，会走在我的前头了呢？但信中所说，是铁的事实。况且，像这类似的事，已经不是一桩了：“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怎么能使我们这些后死人受得了呢？！

我认识维鼎同志，是因缘另一个朋友：周可任。周可任，陕西岐山县益店镇的人。自十几岁肄业乾州中学时，我就是他的英语教员兼级任。我和可任同志一直关系密切。1957年冬，我从西北到上海参加“全国文联”由重庆复员上海的年会，路过开封，就下车来看看可任，也看看河大，就住在河大西二斋。就在这时候，结识了文史系四年级应届毕业生牛维鼎同志。以那时我18岁计，那么维鼎不过才12岁。

记得那时他给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深沉。他个子不高，脸色偏黑，两只眼睛深沉地打量着对方，话不多，有时很呛，反正是个不会讨人好的青年。我一眼看上去，就明白他是个搞地下工作的，因为截止到当时，我接触同样的人已经不少了。我在认识他以前，就从可任嘴里知道他是个革命者。他穿一件棉袍，一见面交给我他的两篇文章叫我提意见，一篇是《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后来发表在河大的学报上；另一篇是《阮稹年谱》，厚厚的一本稿子，是他毕业论文的原稿。我拿着这部原稿，跟牛、周二位在七号楼前拍了一张照片。

夜里在灯下，我一面翻读这些文章一面心里想：多么好的人

哪！干革命干的那么沉着带劲，做科研又如此老练、对路子。这样起步的人，未来的造诣真是不可限量的。哪里想到，~~缘~~年代后在红旗底下，他竟受了二三十年的冤屈，严重地挫伤了他的能量和成就。到今天，我认为我们大家都该痛切地反思，像维鼎同志所受的挫伤，一个革命者一个革命者加在一起，是我们整个革命事业多么大的挫伤呀！但有些人就是不考虑这些，只要你不会讨好我，说话又呛，眼睛又骨碌不服气，那么打你个什么什么，就够你半辈子受的了。前些年，事情不就是这样进行的吗？！

现在维鼎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可任走的更早，他是在泌阳被白崇禧部活埋的。~~缘~~年代，我接到二野总政治部宣传部的信叫写纪念文章，我写了。他虽然走的早，但那没有什么说的，革命嘛，碰上了反革命嘛，有什么说的呢？！记得可任脸上有一块疤，他告诉我，那是他祖母带他在地里做活，给狼叼了一口，他祖母拼着老命从狼嘴里把她唯一的孙儿夺回来，可是后来终究被另一种狼杀害了。可是维鼎呢，他小时没有碰见狼，中年也没有碰见狼，他碰见的都是人，都是自己革命队伍中的同志，可是他终于赍志以歿，没有干出出色的事业，没有写出有大分量的著作，这是他九泉之下也不会甘心的，可是这又去向谁说呢？！

安息吧，牛维鼎同志！我们这些还活着的，只要活一天，也还是要干革命，要干四化，要干改革。历史的大流是谁也截拦不住的，君不见“四人帮”乎？！只是你受委屈了。

1987年 怨月 缘日，兰州

# 记我所结识过的安丘当代人物

## 一摇张公制

张公制,我叫他表大爷。因为我的嫡亲祖姑,是他的大娘(伯母)。他和我父亲表兄弟之间,似乎通过一点声问,后来就疏淡了。1954年,正是“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时候,我从东北师大调至青岛山东大学。过济南时尊长们说,到青岛要见见两位至亲,一是张公制,一是刘次萧。我到职后因故一位都未去拜见。

有一次,大概是1954年吧,我收购了一个卷子。卷子分为两截,装裱成一块。前半截是文征明的横幅浅绛山水,山水画的不坏,题款也挺像,但文征明名头究竟太大了,假冒太多。可是右下角盖着“北海刘可宗”的两方图章。刘正宗,原名可宗。这两方图章是稀罕的!更稀罕的下半截是张继伦的一段书法,笔力骨硬,似乎是写黄的,记不准确了。于是我把这后半段剪下来,恭恭敬敬托在山大大语系当副主任的张健表弟转呈表大爷,因为那是他祖上的手迹。公制收下后并未做出即刻反映,过了一阵之后,他叫表弟带给我一幅他亲撰亲书(章草)的对联,以为酬答。联曰:

摇摇“弯弓射虎可没羽”;

摇摇“解衣对客若无人”。

——噢,我明白了。上联是表扬我的,下联是批评、告诫我的。上联用汉李广善射的典故,说我才华尚可;下联用五胡十六国苻坚

手下的王猛(北海人)的典故,说他“扞虱而谈”,太不拘礼法,容易开罪当世,借以警我之狂傲。我把这幅对联裱装起来,每逢节日必挂在客厅里,告诉后辈们,这是老姻长的一份厚赐。此外,表大爷还请我到他观象路官邸里吃过一顿午餐,仅二人就餐,吃安丘擀单饼卷菜。席间简朴雅洁,至今历历犹如昨日。

## 二摇张任

张任,字仲伊,我叫表兄,是公制的侄子。1952年我考进清华大学肄业,当时全校数千学生中安丘籍的只有三人。一、王贲,白芬子人;二、秦馨菱,高崖人(现归昌乐);三、我。当时张任刚从美国康乃尔大学学成归国,回清华土木工程系教水利。按当时习惯,一位教授要定期请同乡学子到家下就餐。事先打出电话,我们三人都去了。记得张表兄年华正茂,身体很健壮,面色较黑,想是喜欢体育活动的结果。他英语自然说得娴熟,但说华语时安丘味仍较浓厚。

记得抗战开始后,在西安还邂逅另一位表兄叫张坚,当时他是中国驻苏联塔什干的领事。

## 三摇秦馨菱

这个名字,我第一次见名单,认为是位妙龄女郎。见面之后,原来是铁一般硬的男子汉。他比我高一个年级,他九级,我十级。当时清华大学有个西乐队,十月革命后沙皇的乐队指挥捷克人古朴卡流亡到中国,清华把他请下来当乐队指挥。在这个乐队里吹奏最大号喇叭的,就是秦馨菱。他样子挺古怪,不留头发,一直推光头,冬天清华园够冷的了,他不穿棉毛衣,一身夹衣过冬。

他学的物理系。一生专门从事探矿和地震探测两门专业。根据清华校友资料,他直到现在仍是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兼第四室名誉主任。



## 四摇秦佩珩

佩珩上大学是住的燕京。燕京与清华是邻家，但前者私费，后者公费，所以我估量秦家供应大学生的财力要雄厚些。1936年，他在《燕京学报》四期上发表了他第一篇明史考据文章，是关于吴梅村一首诗的。吴的诗，特别是篇幅长的歌行体诗，往往是晚明的重要史料，但吴喜欢朦胧处之，不露真人、真姓名、真地方，所以要考证，需要很繁难的考证。

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四川当过几个学校的历史系主任，足见治学之外，他还擅长于料理人际关系。郑州大学成立，他一直担任系主任。拨乱反正以后，我每出外经郑州换车，必到郑大，每到郑大，必先趋秦府。佩珩不爱修边幅，满口安丘乡音，豁达不拘小节。有一次他高兴地说，“嚯咱安丘出了不少史学家啦。你是一个，韩连琪是一个，我也算一个，这不就仨啦嘛。”他把“个”不读 个 而按安丘语调读 个

在北京平息暴乱那个月份的末尾，他在郑州逝世了。听说是坐在车子里，往省政协开会的路上突然不行了。过不多久，夫人也去世。记得夫人是“南五处”（潢、光、固、息、商）的人。他的少君，已经是郑大哲学系的主任了。

## 五摇韩连琪

韩连琪，字东生。在他逝世前三个月，我有缘与他做了最后一次的盘桓。那是 1982年 10月我到北京开孔子诞辰 1894年大会，转到曲阜，再转济南，住在山东大学。首先去拜望他，人不在，到医院检查去了。第二天黎明，他就由女婿用自行车推着来我的住处，恰逢山大派车送我去万竹园参观，我就约他同去了。万竹园坐落在趵突泉以西、捍石桥以东的东青龙街上，现在是李苦禅画的长期展馆。记得那天他精神还好，一直评论画的所长与所短，侃侃而

源

谈极饶兴味。

他说他“快死啦”。我说，“还写点什么不？”他说“想弄弄《管子》”。我问，“是专著吗？”他说，“哪里有精神写专著？能弄出个札记来就不操（错）了。”我问，“有稿子吗？”他说，“哪里有稿？只在书上做了很多眉批罢了。要等医院的检查结果，倘是良性的，还可以试试，倘是恶性，那一切都完了。”第二天深夜我上火车，山大历史系总支书记在我耳边细语说，“老韩的检查报告出来了，对本人和家属保密，只告诉组织了，是恶性的。”呜呼……

他一辈子光治先秦史，兼及两汉。搞中国史的都知道，这两段是最难治的。他对传统绘画和书法，鉴别力很高。

## 六摇王正

我和王正只见过一面。那是 1955 年春，陕西省清华校友会决定在武功农学院开会庆祝校庆。那天中午野餐过后，我问沙玉清教授：“你们这里有位王正教授吗？”他说：“有，教森林学的。”我请沙先生带我去，他欣然同意了。记得王家刚撤午餐，午餐是西餐，刀刀叉叉，夫人是德国人，还有一个女儿。王先生和夫人讲德语，对我讲华语，安丘味很重。他的特点是一身猎装：长筒袜，短装的骑马裤，上身皮茄克。留学回来的人，这种装束的不少，如清华的莎士比亚专家王文显和体育主任马约翰等，都是这样打扮。

## 七摇孙沾群（霖）

记得 1949 年代末、1950 年代初，青岛市一年总有几个画展。参观的人很踊跃，定画的人也很多，一幅自 1949 元、1950 元至 1951 元。当时山水画，推胶济铁路局的主任科员宋贻素，花鸟推铁路中学的图画教员孙沾群。孙先生，安丘符姑庄人，他的一方图章是“家在汶水之东浯水之西”。他每次办展览，都叫我去帮着跑跑腿，挂挂画，在签到处请人把评语写下，等等。

孙为人豪放,不拘小节。大口饮酒,大口吃肉。他的花鸟,专学吴昌硕,字也有点学吴的石鼓文风韵。曲阜孔府孔德成卧房中一直挂着一幅桃,硕果累累,就是孙画的。他教我们画桃时说,“我画的桃,不但甘甜,而且一包水”。其诙谐如此。他比较喜欢我,举两个例:一、我 15 岁考上大学后,写信回来,请老师赏一幅画,他很快满足了我的要求。画的是芙蓉,记得胭脂膏画花瓣,铅粉勾筋,加几片芦苇。题字是“谁写少年容,樵人剑南老”,是放翁的句子。这幅画经芦沟桥事变,丢失了。二、我 14 岁,初进河南大学当副教授,老师得知了很欢喜,画了一幅樱花麻雀,并自赋长诗,诗曰:“经年不把笔,把笔恒惴惴,胆小心自怯,手生笔作祟,不敢狂挥笔,唯恐一笔废。今画小折枝,意在求其媚,一媚遮百丑,有疵谁理会?花开两三枝,来禽四五对,春风骀荡中,声色互点缀。一片大浑囷,笔笔仍破碎。”这幅画,写此文时仍安然挂在我的书桌边,不觉已历 30 寒暑矣。

他可能由于平生食驴、马、牛肉过分,晚年患皮癌,疼痛至不能忍受,尝谋自绝者二次,被家人救下。1956 年,我随李希张(“希张”后作“希章”)老师到东镇探病一次,时已垂危,不久逝世,又往吊祭一次,柩下一哭而已。

## 八 摇李希张(巡)

李老师至今仍健在,听说下个月要庆九十大寿了。他是李家官庄人,北高师(北师大前身)英语系毕业。我在高中三年的《英语》课,全是他教的。他在词汇积累、语法架构、语法分析等方面,给我们学生打下极其坚实的基础。我 14 岁那年到美国访问 20 天,虽然许多新兴词汇和语言习惯我已非常陌生了,但老根基依然有用场,特别在专业场合而不是生活场合,李老师教下的东西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个别外国朋友还说我老英语根底好,我心里想这全是李老师的栽培。他早年身体不好,好像有过轻度的肺结核。

脾气也不好,爱生气,所以学生都怕他。他很讲究孝道,寒暑假前要回家见老太爷之前就明显改变衣装,平时西装革履,回家前换成一派中国衫裤,冬天还在棉裤上扎上腿带。他父亲是一位进士公,有一次他从箱子里翻出老先生殿试的卷子(白折)来叫我看。

“九·一八”那年,我父亲死了,我回安丘送丧回来,按当时礼俗,发长如鬼。李先生把我叫到他房里,拿他用了几年的一部英汉字典给我,说:“我知道你家穷,这本字典你拿去用吧,我再买一本新的。”这部字典,至今仍在我身边。前几年我写了一块字,写的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后来我到青岛沙岭庄谒见他,见他在这块字挂在他卧榻边的墙上。

这几年读《安丘文史资料》,得知他写了很多回忆文章,滔滔千万言,笔气不衰。在此,谨祝老人家达成更长的寿数!

### 九摇赵孝陆(录绩)

他是我的族伯。六十几岁,日本统治时期,在青岛胶东路去世。计冥寿,该 录 岁。他是清末的进士,他的特长有二,(一)善填词。南方词学名家朱古微很推崇他的词。他的集子叫《彙 (cháng) 阁词》,未印行,最近到处访求他的遗稿,竟不可得。只记得我少年时人们传诵的一阕词,说的是当时人民生活痛苦悲惨,但军阀们仍酣战不已,句云:“微闻碧海冤禽瘁,怎寒潮落了还生?”只记得这一点点。(二)喜欢收藏著名书画家的字画和古书的稀见的古刻本。在这些藏本上,他都写有跋文。这些跋文,价值很高。举例子说,王菡友的若干刻本、稿本上,都有这样的跋文。在这里,插入一段轶事。菡友当年有副画像,在上面题了几句,曰“哀哉王筠,王筠可怜!子孙若贤,多存几年;子孙不贤,长街卖钱”。(齐鲁书社校印《清诒堂文集》页 录 原载此)到孝陆考科举时,这件东西果然在安丘冷摊上卖了钱了。他收购回来,加上跋语,悬在案头。他还寻菡友后裔,鼓励并资助此人进青岛大学中文

系肄业。他藏画中最著名的有《十行乐(图)》。旧时代没有摄像录像等事,只能请画师或画匠来画行乐图。他藏的《十行乐》我也未得全见,只见过一幅《(王)渔洋放鹞图》,是《十行乐》中的名品。我见过原件,还有过一幅影印件,已经失传了。微闻《十行乐》现在台湾。

他晚年喜爱《公羊传》,曾在书眉上批了许多字,密密麻麻,今已不可知矣。

他行大,有堂弟行六,名录绰,字孝孟。我叫他六叔。原是平大工学院毕业,应该做工程师的,但因上唇有先天性裂口,不适用于应酬事宜,就到北平图书馆工作,与谢国桢、赵万里都是同事,陈垣是他们的上峰。他写过一些版本、目录学方面的文章。陈、谢、赵诸公都曾向我询问过他,可惜他四十几岁在天津逝世了。遗稿存其长女手中,有待整理。

员~~九~~年 远月 员~~九~~日写完于兰州大学

## 死三人记

猿年前 ,在那个农场里 ,大半年功夫就死了三个人 ,大家替我排上了个队 ,是“第 源号亡人 ”。但是 ,由于一个非常偶然的情况 ,我没有在农场里死去 ,并且一直活到今天。从而 ,使我感到有责任把那三位前行者久被湮埋的事 ,写在下面。

### —

第 员号亡人 ,叫叶明恕。他是福州人 ,北师大中文系毕业 ,职称嘛 ,假如未升讲师 ,那就是两三年资历的助教。他本人据说没有问题 ,或者问题不大。问题据说在他的父兄。他的父亲是福建省警察厅长 ,哥哥是福州市警察局长 ,一个逃到台湾 ,一个在镇反时被镇压了。光这段家庭历史 ,就够叶明恕呛的了。其实 ,中国自古时就不讲论这些 ,如尧的儿子如何 ,舜的爹如何 ,尧还是尧 ,舜还是舜嘛。可我们那时候不成 ,“龙生龙、凤生凤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于是叶明恕就被下放到山丹农场来了。

叶明恕的死 ,明显地说明了一点 ,那就是 ,强制 (或者叫“专政 ”)最终不能解决问题。你施行强制 ,他有三种办法对付 ,一是“顺着 ”;二是偷奸摸滑、拐弯抹角地跟你对抗 ;第三种就是毫不拐弯地对抗到底 ,一至于死。试想 ,我们是猿月下旬出发的 ,叶缘月中旬就死了 ,连来加去不过 缘天工夫。

记得出发那天 ,叶明恕的行李已被统一运走了 ,人已经坐到大巴士上了 ,可一转眼他又溜回宿舍去 ,多亏他的支部书记爱才 (当

时的话是“右倾”)，拿一条好烟、几个罐头好说歹说又把他拉回来。他就是思想不通，他就是不愿被下放，最终你还是拿他没办法，只能说他“花岗岩”脑袋。

我们当年那个农场，设在河西走廊山丹县的三十里铺。八九十个人，八九十支铁锹，先住在庙里，自己浇水，自己种粮食，自己打土坯、盖场房，自己养羊、牛、猪。这个劳动当然是重的，但当时吃喝还可以。有时跟河西土著并肩劳动，有时跟河南移民一起劳动，“你追我赶”，拔白旗，插红旗，叶明恕怎么赶得上趟呢？！他偷偷与司机师傅商量把他带回城市，司机岂能隐瞒，汇报后当晚开批判会“帮助”。所谓“帮助”，开头是恶言恶语，慢慢几个干部就带头拳打脚踢起来。“要文斗不要武斗”是六年以后的话，这时还未出场。

我们那个种地，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先浇水。打电话给祁连山的水库，由他们安排哪一天几点钟到几点钟给你开闸放水，放多少水。我们就在放水日期前，展开大规模的准备工作，目的是叫水流到你想叫它流到的地方去，不要叫水流到你不想叫它流到的地方去。较平的地方打一点土埂子，所费劳力不大，沟沟洼洼的地方就得打起塘坝。塘坝有半人高，要用铁锹一下一下地拍实，这个劳动耗费力气是很大的。所有这些，都由“老龙”们指导。“老龙”就是农村中浇水的老把式、老师傅，从公社里请来。到水放下来的日子（一般都在夜间），大家就统统投入战斗，非常紧张。一不小心，叫水跑了，跑到长城的方向去，那这股水就算浪费了。所以“老龙”们很“歪”（脾气很大），在抢水时候你上不去他会用铁掀没头没脸地打你。叶明恕到这种时候就只好运送运送骆驼蓬草以备堵口子时使用罢了。

浇过水后，地埂子早冲得不见了，塘坝顶多剩一点残迹。这时候就犁地。犁地使用人力和畜力。人力就是四五个人一架犁铧，人像伏尔加纤夫样弯下腰拉着绳子，这个办法既耗力而又效率不

缘圆

高。畜力较高,可农场初建还不曾买下牲口,只好到公社去借。人家忙时不借给,等借给时却已经抢种过了。借来的牲畜,牛、马较少,以骆驼、牦牛居多,这些牲畜负拽力大,但不好调教,扶犁的人很艰难。叶自然不胜任这种工作,只好牵着牲畜的鼻绳在大田里走过来走过去而已。碰到人工拉犁的时候,据说有人观察过,四根绳子绷得紧紧的,只叶的这一根是松弛的弧形,他就是死下心不用劲拉嘛。

犁过地,撒过种,还有一道工序,叫“磨地”。“磨”是西北的叫法,东边叫“耙”,或者叫“□”,就是把翻起来的地收平一下,种子埋进土里,还可以保墒,就是说让那些可怜的水份,不至于被阳光很快地蒸发掉。

叶死的那天,恰好被安排和我一组“磨地”。所谓“磨”,是用大荆条编织成像一床褥子那样的东西,底下安六枚铁齿,以使土块瘠遇之便成粉碎。一人站在上面,平衡压力,另一人拉。轮番互换。这个劳动不重,分配者隐隐寓有惜老怜乏之意。

可是另外还有一个插曲。原来我们那个支书叫刘子卿,陕西凤翔人,他确实是个特殊的人物。原来他在大学里不过是个总务处的副处长,可是一下来,他就成了土皇帝了。他富有创造性,创设了罚跪、罚不准吃饭,即使有饭票炊事员也不敢打给。这是严重违法的,但那个时候法制观念还未普及,东西南北中党管理一切,一切支书说了算数。那天正是叶明恕被宣布不准吃饭跟班劳动的第二天。

那一天,我也被宣布不准吃饭,跟班劳动,可我还能支撑得住,叶明恕就支撑不住了。这说明我的血里糖的补偿的能量大。这就不禁想起一件古事,说殷纣王清早看见祖孙二人过河,老者不打颤抖,少年打颤抖,殷纣王问大臣为什么,大臣说,老的骨髓已经长满,小伙子骨髓还没长出来哩,于是殷纣王叫把祖孙二人抓来,敲骨验髓……我比叶年长十五六岁,所以我的耐饿度比他强些。



正午,大家在地头上歇晌。叶明恕装作小便,到另一小队的人堆里掏一只布口袋,掏到一个馍,就急忙往嘴里送。可是说时迟、那时快,旁边一位装作睡着而实是眯着眼在看的队员顿时高喊起来:“叶明恕偷馍了!”于是人们纷纷爬起,一顿拳打脚踢……

叶明恕下午一直没劳动,小队长另派一人跟我一起磨地。河西地方气温的差度很大,有时达 15℃,而东南沿海的温差才 5℃,所谓“早穿皮袄午穿纱”者是也。叶明恕觉察没觉察到这一点,我不得而知。但他一直躺在一堆干草上,棉袄撇在一旁,呼呼大睡,在可以不劳动中得到满足。

那是 1958 年 10 月 15 日下午的事。10 月 16 日凌晨 1 时,睡在我旁边的一位党员干部悄悄起身,叫起另外两人,带好手电筒、点起马灯,悄悄出去了。两小时后悄悄回来,复又睡下。从他们悄悄的话语中,似乎在说,叶明恕一夜没有回来睡觉,寻觅到场地里,他仍躺在那堆干草上,冻死了。

早晨 7 点大家排队到场地。调皮的人说起怪话:“叶明恕真能睡,一天一夜还不醒来。”另一个说,“怕是要到另一个世界醒来了。”8 点钟,吹哨子紧急集合,有刘书记,有县公安局一个副局长,还有个县法院的代表。先由刘书记讲话,说毛泽东教导说,矛盾是可以转化的,叶明恕本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因为他誓死对抗人民的态度,他已经堕落成为敌我矛盾了。那两个县里的人连连点头,表示同意。

可是事隔两月,到 1958 年 12 月份,农场的第 100 号亡人死了,校党委派人送来两副棺木,两架花圈,花圈的带上写着“明恕同志灵右”。说怪话的人又说了,“咱们党委犯了极严重的右倾错误!叶明恕,咱们刘书记早就宣布他是敌我矛盾了嘛,花圈上怎么还称呼他是‘同志’呢?!”

二

第 圆号亡人 ,叫李纲 ,生物系助教。人们说 ,他是“三新” ,大学刚毕业 ,新任助教 ,是一新 ,新结婚 ,妻子美貌 ,是毛纺厂的女工 ,是二新 ,新入党 ,入党前是校团委委员 ,是三新。他和叶明恕是截然两种人。叶是明摆着的“破罐破摔” 。李不然 ,年轻有为 ,爱劳动 ,样样带头 ,是被场里竖起来的“标兵” 。而他那年轻的生命就恰恰断送在这个“标兵”上了。

夫“标兵”有两种 ,“死标兵”和“活标兵” ;而“死标兵”好当 ,“活标兵”难当。因为“死标兵”受崇拜的时候 ,他本人已经不在人世 ,一任世人把塑造的东西加到他的身上 ,而他本人没有负担。“活标兵”不然 ,他还活着 ,那么对他除了崇拜之外 ,还会有对不足处的责难。所以他的弓弦一定是拉得非常紧 ,弄不好就会绷断的。

李纲死在“七一”党的生日前后。他死的时候我不在农场 ,而是被送到县城的卫生院 ,住院开刀。原因是浇水的时候 ,祁连山山水中冰块砍到我的腿上 ,流血、感染、化脓 ,左腿肿得像一条粗棒子 ,注射链霉素都消不下来。场部的人也担心把我浑身肿死在农场里了 ,这个名声他们承担不住 ,这才把我送往医院的。从我的腿肉里 ,撕出来七八条长长的脓袋 ,像剖鱼时候从鱼肚子里撕出来鱼膘、鱼苦胆似的。住院 员缘天 ,所以李纲的死 ,我未亲见。

记得我被送往医院离开场部的时候 ,他正参加场房的基建工作。基建工作就是盖房子 ,而盖房子先要合泥 ,制坯。“坯”又叫“积” ,也叫“堪” ,或叫“胡堪” (讹音叫“胡秸”)。泥里拌铡碎了 的 麦 草 ,要用光着的脚踩。这踩泥工作 ,是很沉重的活儿 ,李纲是“标兵” ,义不容辞 ,就踩上去了。而踩泥这个活儿是要干干歇歇的 ,李纲年轻 ,不懂得利害 ,一口气踩了一天 ,不换工种 ,到夜里就急病死了。

等我从医院回来 ,场部替我换了工种 ,叫我养马、放马。这个

工种有它的优越性,它使我可以不必在苦干调皮的中年人中间亮相,可以独自把马带到僻静的地方,马吃草吃得正酣的时候,我可以读书。但也有很麻烦的方面,马夜里需要喂一遍草;马很容易感染肺气肿,弄不好会死,一害上就得牵它到兽医家用药筒子给它灌药,还要带它去配种,要帮助它产马驹,要防止它突然发性狂奔而去,等等,等等。

我一般是缘点半牵马出去吃草,因为这时草上带有露水,最鲜美。怨点,把马带回场部,叫它吃些槽里的干草,我也吃早饭。有一天,大约是七一后一个星期的时光吧,我牵马回来,见到学校来了大卡车,还有一辆吉普。一个中老年女子和一个中年男子。这个中年男子我认得是人事科科长,那么那个中老年女子我也可以推想出来是人事处长了。从卡车上卸下来两副棺木,两架花圈,带子上写着“明恕同志灵右”和“李纲同志灵右”。从场部办公室里透出来两个女子撕心裂肺的哭声。我立刻明白,是李纲的新婚妻子与姐姐到了。

第二天,小队长吩咐我早一个小时把马牵出去,晚一个小时回来,食堂给我留饭。我立刻明白,叫我不要看见出丧的场面。可是世界上的事,就往往有天然的弥补。有个姓刘的,原化学系实验室的管理人员,管药品和玻璃器皿。现在他是采购员,骑自行车到各公社去搞“公关”。他知道我放马的水草之地,有一天骑自行车来了,坐下来跟我唠了半天嗑。他说,“人死了最臭,比死狗死猪还臭。那天挖开,叶明恕已经烂完了,李纲刚开始烂,颜面已经乌黑,看不出模样来了。我们赶紧告诉领导,拦住不要叫家属到跟前来。学校还带来两套制服,谁也没办法给那么稀软稀软两堆东西穿上,就只好盖在上面了。可就这么两件沾了血水的新制服,被雇来挖土筑坟的老乡留心上了,半夜又来挖开,把两套制服拿走,洗净后拿到市场上卖了缘块钱。人穷嘛。手里的活便钱太少啦,就只好干这种缺德的事。”呜呼……

### 三

第 猿号亡人,叫周新治。周是四川人,广东师范学院地质地理系毕业,分配到大西北。一般,四川人大家都叫“川耗子”,即有洞即钻,无孔不入。而周新治的性格恰恰相反。譬如,他有心肌梗塞,就凭这一条他就不应该下放,可是他从来不据理力争。他认为领导既然把他定在名单里了,他也不该再说什么。检查身体时,心肌梗塞查出来了,但那个医生是个混事的医生,说不要紧,下去锻炼锻炼,心肌梗塞会好的。真是见鬼的话!但周新治却经常重复这个话,把这当真理传述。

他死的时候,已经是严冬了。忽然传开,说中文系有临届毕业生 猿人要来农场短期锻炼;又说,校长也要来场视察。这一下,场里紧张起来了。平时场里是一天三顿糊糊。有个下放人员说怪话,“喝三顿糊糊,就干三顿糊糊的活罗。”可是校长大人下来了,总不能叫他喝糊糊吧。临届毕业生伺候不好,还会给你起点小风潮呢。所以要吃几顿馍馍。有人还提议到山丹县城弄些大米来。肉嘛,肉多着呢,山上放的两群羊,每夜都要“乏”死一只两只的,拖回来剥剥皮,下锅就是啦。可炊事员反映,锅太小,要换大的。于是打电话到新河镇去借锅。谁去背呢?有人说,“周新治在家泡病号,叫他去!”他就老实巴交地去了。镇距农场 缘里之遥,往返 猿里。锅背回来了,但还是小,于是又打电话到县城去借。那边答应了,谁去背呢?“还是叫周新治去。”县城距农场 猿里,往返是 远里的路程。

学校图书馆有个站柜台借书的娃娃叫小刘,也不晓得他犯了点什么错误,也下放到农场来了。那一天,他恰好要进城看病,场部就小刘陪伴周新治一路走。小刘事后对大家说:“周新治已经饿得走不动了。可是他很乐观。他说小刘呀,我身上有粮票,咱们到公社食堂吃顿饱饭去。谁想到二十里铺、到十里铺、到五里发

电厂,平素只要拿出粮票,立刻卖给。现在不中了,要单位的出差证明。大师傅拍打着围裙说,同志,你们听见没有,定西饿死了万把人呢,省里捂着,说是闹瘟疫,周总理派保密人员来查,死人肚子里全是草哇!这就是说,粮食紧啦,不是我们不卖给。周新治走到距县城一里半地方,摔到地下就再也没有爬起来。”

我和周新治接触,是在他死前约莫一星期的时候。那几天,场领导派遣两个人一小组去到野地里拔或者割芨芨草。芨芨草,是河西名产,它类似苇子,比苇子细,比苇子硬,不易腐烂。可以用来编帘子、编炕席,特别是铺房顶,上面抹上泥,最耐风吹雨打。拔或者割芨芨草,一天有限量,缘斤以下是不及格,圆斤上下是合格,源斤以上受表扬。那一天我们二人割了一天芨芨草,各约圆余斤,中不溜秋的,过秤时不会挨骂了,于是就各就一方土台,像是分宾主般坐下。

“先生——”他开口说。这使我非常惊讶。他看出我的眼神后继续说:“这有什么值得惊讶的?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你已经是名满全国的大教授啦。我把你看做我的老师,叫你先生,有什么不应该的?”

“可我现在是劳改人员呀。”

“不管这些。那都是历史,历史是一晃就过去的。我现在要跟你说的,就是这块表,”说着他掏出一块怀表让我看。“我这一辈子就只剩这一件东西了。”

我很敏感。从“我这一辈子”这个短语里,我隐隐感到一种不祥。才三十出头的人,怎么冒出来这样的话?

他继续说,“建国以来很少有英国的商品销到中国来。这是极稀有的一批,物美价廉。比国产的‘火车头’表又美观又便宜,那时我刚刚分配工作,就买下来了。我带它在怀里快十年了,比老婆还亲。说起老婆啦,我们已经有个小男孩,可老婆能干我不能干,她老嫌我窝囊吧,只有这只表它最理解我。”猿年过去了,我想缘愿

到这是他的一篇《遗言》,他在野地里对我说这一篇话,也是考虑过的,有选择的。

周新治 1954年 11月 18日死的,到 11月 21日,他的夫人由地理系办公室一位同志陪着来到农场。当时大雪铺天盖地,天气严寒。场部替她准备的饭,她说“不吃啦”。场部提议请她到菜窖里看看遗体,她说“不必啦”。匆匆忙忙把被褥等物卷成一个小卷,就要起身。突然,她像记起一件最紧要的事似地喊道:

“那只怀表呢?”

很多人还明白不过来是怎么一件事。最后,还是由厨房一位老师傅下到地窖在遗体的衬衣口袋里摸到了它,交给了夫人。

看着送夫人到车站的马车启动之后,这位老厨师嘟嘟囔囔地说:

“这年头,把人就这么做(zu)着哩嘛。”

\* 摇摇 \* 摇摇 \*

周新治的死,在这座农场的兴衰史上,划了一个阶段。假如叶明恕的死,还标志着农场的初兴;李纲的死,则标志着这种被称作“思想改造”圣地的神话的最彻底的破产。

冬天来了,这是自然环境。大田上的活完全停止了。几匹马,陆续冻死了,其中一匹肚子里带着驹一起冻死。羊放到山上,夜里在破庙里歇宿,每清早放出时至少有三只五只“乏”死了,有的刚产下的羔子就被大羊踩死了。猪呢,我们经常在清晨打扫猪圈时,发现一只母猪和几只刚刚产下的猪崽子一起被羊水和尿水坚实地冻成一块冰饼。人呢,现在的人的局面也在变化。极“左”思潮的代表人物——省委书记张仲良受批判了、做检讨了,要调到南京去了。我们农场的土皇帝刘子卿也调回学校做检讨去了。夏天时候那根绷得很紧的弦,嘎嘣断了,一种效果产生出另一种效果:一片混乱和极端的无组织无纪律。这令人反思,夏天时候那种高组织

高纪律,是用高压强制出来的。从前 缘点半人们就起床了,现在 怨点半还躺在地铺的草堆上。夜里,从前不到 怨点就吹哨熄灯,现在午夜以后仍然热闹非常。赌博的人大呼小叫,悠闲的人喝着茯茶聊天,肚子饿了的人到野地里埋死小猪的地方把小猪的尸体挖出来,用极快的速度剥皮、洗净,用两只反扣着的洗脸盆煮,煮烂,狼吞虎咽地吃掉,再用最快的速度把皮骨埋藏掉,把洗脸盆清洗掉,以免场部的人来检查时找到痕迹。个别人,堕落得更严重。把下放人员的夹克衫、呢裤、皮包等偷出去,卖给村里的老乡。所谓“卖”,不是用货币买卖的意思,而是原始的以物易物。换一条羊腿,一只羊头,一堆羊杂碎,一两个糜子面炕的硬馍,等等。这些东西并不是自己吃的,而是带回到场部来卖给下放的同事们。这个“卖”也不是换回来货币,而是粮票和饭票。倒来倒去,这个青年干部再不是饿得天天睡觉,而是腰缠若干粮票和饭票的“大亨”了,谁缺吃的,都得低声下气去跟他借或者买。谁会想到,当时这个投机倒把的“能人”,在学校里还是共青团员呢。

农村社会,也在经历着“巨变”。抢羊、抢粮、抢甜菜仓库的事,已经屡有所闻。抢羊是有一定组织性的行为。大家都是一个公社,甚至是一个大队,知道羊群夜里歇在哪个庙里,于是天黑下来抢羊的人就出动了,其中自必有几个壮汉,但多数是婆娘和未成年的男女少年。这些人,也多多少少懂点法律,懂得抢羊是犯法的,懂得 16 岁以下的犯罪不判刑。这些人随身带着宰羊、剥羊的工具。他们到得庙前,“临战”啦,放羊人照例是有两只狗的,狗都很恶,死命地咬,死命地扑。那就得来点“狠”的了,捡大石头往狗的身上砸去。狗很灵性,一只狗砸死了,另一只狗就放弃战斗,躲到一边去了。放羊人就更“诡”,躲在庙窑深处装做睡熟了的。于是抢羊人放开行动,但他们并不多抢,每夜四五只,五六只,捡肥的,拖到一个山凹子里,点起篝火,宰的宰,剥的剥,剥的剥,顷刻之间,每家分到一份。大家“偃旗息鼓”,扑灭篝火,各回到家,立即

缘园

把“胜利果实”煮烂,吃掉,骨头埋到园子里,躺下睡觉。

至于抢粮库、抢糖萝卜(甜菜)窖,那是在大白天,“明火执仗”。也是老婆子、婆娘、未婚嫁的小子、闺女们一马当先。区委书记在窑口,两边两个民兵,枪口向着群众。书记力竭声嘶地喊:“父老兄弟们,不能抢呀,这是国家财产,也是集体所有的财产呀!”又喊:“父老兄弟们,你们逼着我犯错误呀,我开了枪,打死人命,我犯错误,我不开枪,你们把公家的东西抢走,我也要犯错误呀!”大家听了这个话,心眼里知道这个书记还是个好书记,可是窖还是抢了,没抢光,抢了一多半,老老少少各人肩上扛着脏兮兮的口袋子,一口袋甜萝卜各回家去了……

#### 四

文章写到这里,应该结束了,但还有一条尾巴。这就又要提到“第源号亡人”。“第源号亡人”本该是我,但我濒临死亡却没有死,那个死的第源号不在山丹而在临夏(河州),那里农场规模较山丹略小,但与山丹同属西北师范大学的兄弟单位。刘子卿也曾在那家农场里当过支部书记。

第源号亡人,叫李崇裕,物理系中青年副教授。这个人我曾同他在一幢宿舍里、一条通道上住过,我知道他是谁,他也知道我是谁,就是没有彼此打过招呼。上厕所,上下楼梯,经常碰面。

据说此人自高自大,自以为了不起。可能他是一个人才,但他的自我估价比社会对他的估价要高得多。他一到农场,就给校党委写了一封信,要求即刻宣布他为二级教授、物理系主任,并派小汽车把他接回学校,并且在副食品和粮食供应上要特别从优、加倍。他还开了一个清单,计猪肉每月几斤、大米若干斤、白糖几斤之类。这样的事,要在寻常的时代,遭逢上胸襟开阔的领导,那么,这仅仅是哈哈一笑的事而已。顶多说,这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娃娃。可他偏偏碰上大饥饿的时代,又偏偏碰上肚肠狭窄、头脑极



“左”、又极官僚主义的领导，于是他们感到自己是受到了严重的冒犯，于是乎加上“按语”，用红头文件批转下来，叫群众从反面学习。“按语”千言万语，要害一句话：“猖狂向党进攻。”

于是，李崇裕死在了临夏。医生怀疑他自杀，剖腹检验，原来是一肚子青草。

饥饿是一种自然的生理本能，无法使用政治力量把它压服下去，叫他不饥饿。劳动也是一种自然的本能，适当进行有利无害，但不能使用政治压力施行超强度劳动，施行了也不会持久。这两者结合到一起，美其名曰“思想改造”，更是一件明目张胆、自欺欺人的行为。可是在 1958 年前，我们的某些领导者们，却像疯魔了一样，死不回头地这样干下去，在人类社会上，在历史上，造成如上述的累累的疮疤。

1987 年 7 月 15 日，于兰州大学 圆楼之 圆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赵俤生文集. 第5卷/赵俤生著.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2. 4

ISBN 7-311-01966-4

I. 赵… II. 赵… III. ①赵俤生—文集②赵俤生—生平事迹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8254 号

赵 俤 生 文 集

第五卷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路 308 号 电话:8617156 邮编:730000

E-mail:press@onbook.com.cn

http://www.onbook.com.cn

---

兰州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兰州奥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17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插页:4

字数:421 千字

印数:1-3000 册

---

ISBN7-311-01966-4/Z·29

定价:平装 180.00 元

精装 240.00 元

(共六卷)